

目录

[M譯叢序 11](#_Toc55745754)

[序言 14](#_Toc55745755)

[一 14](#_Toc55745756)

[二 16](#_Toc55745757)

[三 19](#_Toc55745758)

[第一章 歷史遺產 23](#_Toc55745759)

[第一節 德意志的獨特性 23](#_Toc55745760)

[一 23](#_Toc55745761)

[二 25](#_Toc55745762)

[三 28](#_Toc55745763)

[第二節 宣揚仇恨 31](#_Toc55745764)

[一 31](#_Toc55745765)

[二 33](#_Toc55745766)

[三 36](#_Toc55745767)

[第三節 1914年的精神 40](#_Toc55745768)

[一 40](#_Toc55745769)

[二 41](#_Toc55745770)

[三 44](#_Toc55745771)

[第四節 陷入混亂 48](#_Toc55745772)

[一 48](#_Toc55745773)

[二 51](#_Toc55745774)

[三 52](#_Toc55745775)

[第二章 民主之殤 56](#_Toc55745776)

[第一節 魏瑪的弱點 57](#_Toc55745777)

[一 57](#_Toc55745778)

[二 59](#_Toc55745779)

[三 61](#_Toc55745780)

[四 65](#_Toc55745781)

[第二節 大通脹 68](#_Toc55745782)

[一 68](#_Toc55745783)

[二 70](#_Toc55745784)

[三 71](#_Toc55745785)

[第三節 文化戰爭 74](#_Toc55745786)

[一 74](#_Toc55745787)

[二 79](#_Toc55745788)

[三 80](#_Toc55745789)

[第四節 適者與不適者 83](#_Toc55745790)

[一 83](#_Toc55745791)

[二 85](#_Toc55745792)

[第三章 納粹主義的興起 89](#_Toc55745793)

[第一節 波希米亞式革命者 90](#_Toc55745794)

[一 90](#_Toc55745795)

[二 92](#_Toc55745796)

[三 95](#_Toc55745797)

[第二節 啤酒館暴動 98](#_Toc55745798)

[一 98](#_Toc55745799)

[二 101](#_Toc55745800)

[三 103](#_Toc55745801)

[第三節 卷土重來 106](#_Toc55745802)

[一 106](#_Toc55745803)

[二 108](#_Toc55745804)

[三 111](#_Toc55745805)

[第四節 使命感的來源 116](#_Toc55745806)

[一 116](#_Toc55745807)

[二 118](#_Toc55745808)

[三 120](#_Toc55745809)

[第四章 通往權力之路 123](#_Toc55745810)

[第一節 大蕭條 124](#_Toc55745811)

[一 124](#_Toc55745812)

[二 126](#_Toc55745813)

[三 128](#_Toc55745814)

[第二節 民主制度的危機 130](#_Toc55745815)

[一 130](#_Toc55745816)

[二 132](#_Toc55745817)

[三 133](#_Toc55745818)

[第三節 暴力的勝利 139](#_Toc55745819)

[一 139](#_Toc55745820)

[二 141](#_Toc55745821)

[三 143](#_Toc55745822)

[四 146](#_Toc55745823)

[第四節 致命的決策 149](#_Toc55745824)

[一 149](#_Toc55745825)

[二 152](#_Toc55745826)

[三 154](#_Toc55745827)

[第五章 建立第三帝國 175](#_Toc55745828)

[第一節 恐怖開始了 176](#_Toc55745829)

[一 176](#_Toc55745830)

[二 178](#_Toc55745831)

[三 180](#_Toc55745832)

[第二節 國會縱火案 184](#_Toc55745833)

[一 184](#_Toc55745834)

[二 186](#_Toc55745835)

[三 188](#_Toc55745836)

[四 191](#_Toc55745837)

[第三節 民主政體被摧毀 194](#_Toc55745838)

[一 194](#_Toc55745839)

[二 196](#_Toc55745840)

[三 198](#_Toc55745841)

[四 200](#_Toc55745842)

[第四節 德國的一體化進程 204](#_Toc55745843)

[一 204](#_Toc55745844)

[二 206](#_Toc55745845)

[三 208](#_Toc55745846)

[第六章 希特勒的文化革命 211](#_Toc55745847)

[第一節 不和諧音符 212](#_Toc55745848)

[一 212](#_Toc55745849)

[二 213](#_Toc55745850)

[三 215](#_Toc55745851)

[四 216](#_Toc55745852)

[第二節 藝術的凈化 218](#_Toc55745853)

[一 218](#_Toc55745854)

[二 219](#_Toc55745855)

[三 221](#_Toc55745856)

[四 223](#_Toc55745857)

[第三節 “打倒非日耳曼精神” 224](#_Toc55745858)

[一 224](#_Toc55745859)

[二 225](#_Toc55745860)

[三 227](#_Toc55745861)

[四 229](#_Toc55745862)

[五 231](#_Toc55745863)

[第四節 一場“摧毀舊秩序的革命”？ 234](#_Toc55745864)

[一 234](#_Toc55745865)

[二 238](#_Toc55745866)

[三 240](#_Toc55745867)

[注釋 243](#_Toc55745868)

[序言 243](#_Toc55745869)

[第一章　歷史遺產 246](#_Toc55745870)

[第二章　民主之殤 256](#_Toc55745871)

[第三章　納粹主義的興起 268](#_Toc55745872)

[第四章　通往權力之路 276](#_Toc55745873)

[第五章　建立第三帝國 285](#_Toc55745874)

[第六章　希特勒的文化革命 293](#_Toc55745875)

[參考文獻 300](#_Toc55745876)

版權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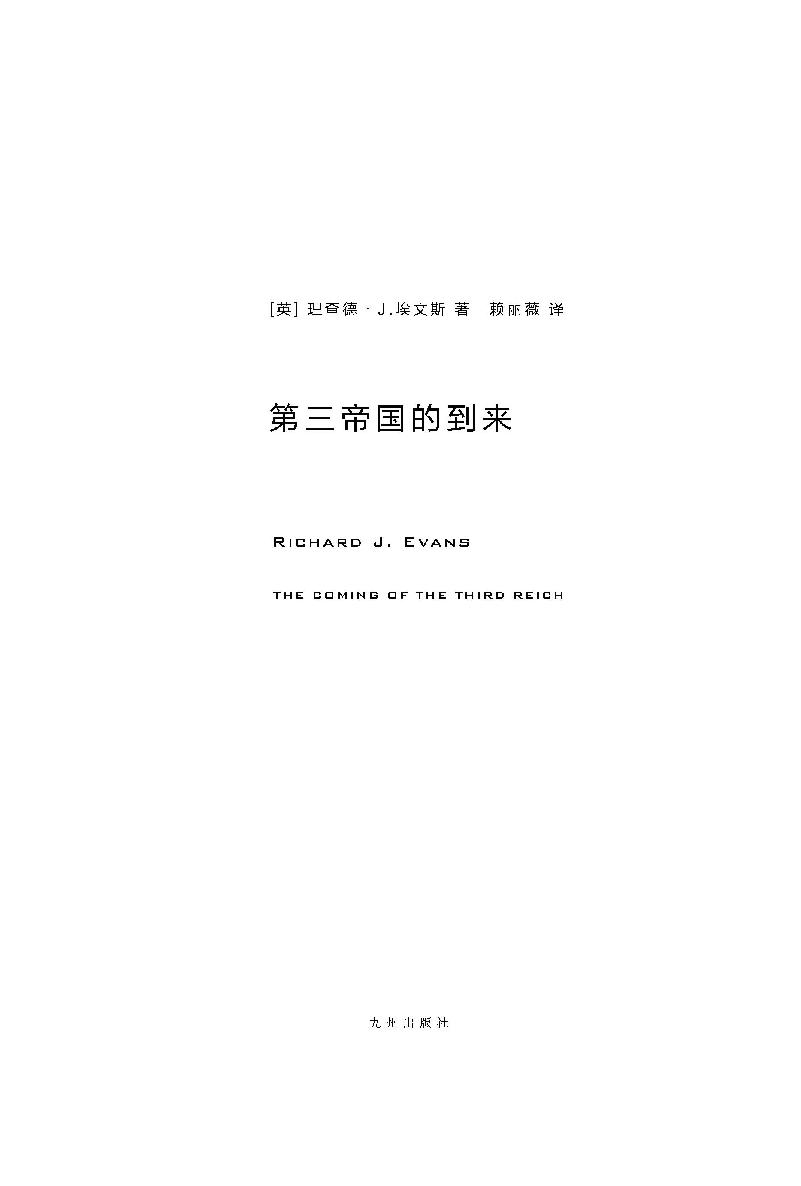
書名：第三帝國三部曲（理想國譯叢 038-040）

作者：［英］理查德·J. 埃文斯（Richard J. Eva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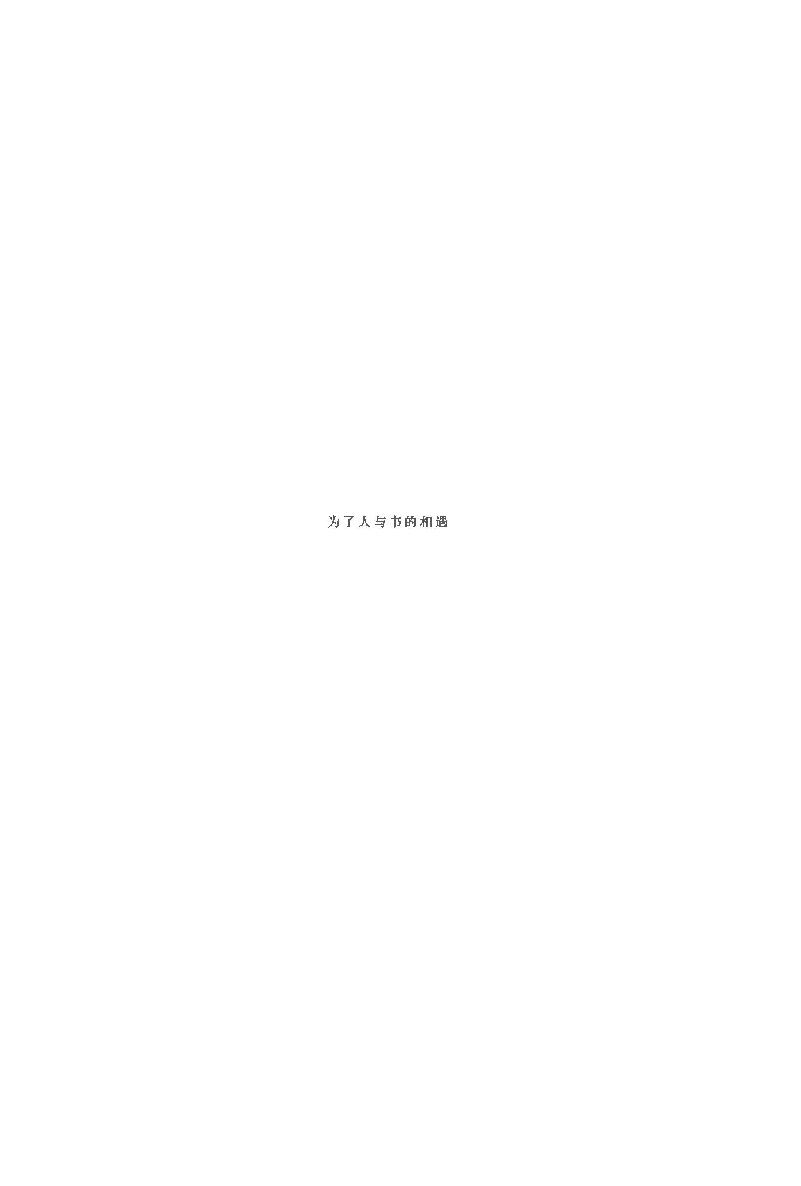
出版時間：2020-08-01

版權方：北京理想國時代文化有限責任公司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第三帝國的到來 /（英）理查德·J. 埃文斯著；賴麗薇譯．--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9.11（2020.6重印）

ISBN 978-7-5108-8676-8

Ⅰ．①第… Ⅱ．①理… ②賴… Ⅲ．①德意志第三帝國－研究 Ⅳ．①K516.44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9）第293386號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by Richard J. Evans

Copyright © 2003, Richard J. Evan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20

Beijing Imaginist Time Cultur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權合同登記號：圖字01-2019-7159

地圖審圖號：GS（2019）1526號

第三帝國的到來

作　　者　［英］理查德·J. 埃文斯 著；賴麗薇 譯

出版發行　九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區阜外大街甲35號（100037）

發行電話　（010）68992190/3/5/6

網　　址　www.jiuzhoupress.com

電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山東臨沂新華印刷物流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開　　本　965毫米×635毫米　16開

印　　張　45.5

字　　數　598千

版　　次　2020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20年6月第2次印刷

書　　號　ISBN 978-7-5108-8676-8

定　　價　145.00元

★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

# M譯叢序

“如果沒有翻譯，”批評家喬治·斯坦納（George Steiner）曾寫道，“我們無異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語不通的省份。”而作家安東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回應說，“翻譯不僅僅是言詞之事，它讓整個文化變得可以理解。”

這兩句話或許比任何復雜的闡述都更清晰地定義了理想國譯叢的初衷。

自從嚴復與林琴南締造中國近代翻譯傳統以來，譯介就被兩種趨勢支配。

它是開放的，中國必須向外部學習；它又有某種封閉性，被一種強烈的功利主義所影響。嚴復期望赫伯特·斯賓塞、孟德斯鳩的思想能幫助中國獲得富強之道，林琴南則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變國人的情感世界。他人的思想與故事，必須以我們期待的視角來呈現。

在很大程度上，這套譯叢仍延續著這個傳統。此刻的中國與一個世紀前不同，但她仍面臨諸多嶄新的挑戰。我們迫切需要他人的經驗來幫助我們應對難題，保持思想的開放性是面對復雜與高速變化的時代的唯一方案。但更重要的是，我們希望保持一種非功利的興趣：對世界的豐富性、復雜性本身充滿興趣，真誠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經驗。

M譯叢主編

梁文道　劉瑜　熊培云　許知遠

獻給馬修和尼古拉斯

# 序言

## 一

本書是第三帝國史三部曲的第一卷。它從19世紀的俾斯麥帝國[\*](#_41)、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及處在戰后苦澀年代的魏瑪共和國（Weimar Republic）著手，追溯了第三帝國的起源；繼而講述了1929—1933年經濟大蕭條期間，納粹黨徒通過贏得選舉并結合大規模政治暴力手段上臺掌權的過程。本卷的核心主題是，納粹黨徒是如何在很短時間內在德國建立起一黨獨裁統治的，而且似乎沒有受到德國民眾實質上的抵抗。第二卷講述第三帝國在1933—1939年的發展，分析其各個核心機構，描述其運作方式及其治下民眾的生活狀況，講述它為恢復德國在歐洲的霸主地位而對國民進行的戰爭動員。最后一卷的主題是戰爭始末，講述了第三帝國的軍事征服政策、社會和文化領域的動員與鎮壓政策，以及種族滅絕政策的迅速極端化，一直寫到它最終在1945年全面崩潰與覆滅。結尾一章將剖析第三帝國在其短短12年的歷史中所造成的后果及其遺留給現在與未來的問題。

這三部曲主要是為那些對第三帝國一無所知，或者略知一二并想要了解更多的人而寫的。我希望專家們可以從中發現一些他們感興趣的東西，但這套書的主要目標讀者并不是他們。近年來，第三帝國的遺留問題在媒體上被廣泛討論，一如既往地吸引著普遍的關注，歸還與賠償、罪責與道歉已成為敏感的政治問題和道德問題。雖然隨處可見第三帝國的影像，以及提醒我們注意納粹德國在1933—1945年間影響的博物館和紀念碑，但這一切的產生背景在第三帝國史的相關撰述中尚付闕如，那恰恰是這三部曲旨在提供的內容。

任何要開始這樣一項工程的人必定首先自問：是否真的有必要另寫一部納粹德國史。我們確實已經寫盡了嗎？確實已經書寫到幾乎無可增補的程度了嗎？毋庸置疑，極少有哪個歷史課題曾受到過如此密集的研究。由勤勉的邁克爾·魯克（Michael Ruck）出版的關于納粹主義的標準參考文獻，在2000年最新版中列出了37,000多個條目；而1995年第一版中所列的條目僅有25,000個。標題數量的驚人增長，雄辯地證明了有關此一課題的出版物持續涌現、從未斷絕。[[1]](#1)沒有哪位歷史學家有望通曉如此之多的文獻，哪怕只是其中的主要部分。確實，有些研究者面對如此卷帙浩繁、幾乎不可能整合在一起的參考資料，就已經望而卻步，絕望地放棄努力了。結果就是，書寫第三帝國全史的作品實際上出乎意料地少之又少。近年來確實出版了一些精彩的概括式簡史，尤其是諾伯特·弗賴（Norbert Frei）和盧多爾夫·赫布斯特（Ludolf Herbst）的著作[[2]](#2)；出版了一些有啟發性的分析性史論，特別是德特勒夫·波伊克特（Detlev Peukert）所著的《納粹德國內幕》（Inside Nazi Germany）[[3]](#3)；也出版過一些實用的文件匯編，其中由杰里米·諾克斯（Jeremy Noakes）編選并詳細評注的4卷英文版文選相當出色。[[4]](#4)

然而，為普通讀者撰寫的有關納粹德國史的全景式鴻篇巨制屈指可數。其中首推的，也是迄今為止最受歡迎的作品，是威廉·L. 夏伊勒（William L. Shirer）的《第三帝國的興亡》（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出版于1960年。自問世以來，夏伊勒的著作在40年間[†](#_42)可能已售出數百萬冊，或者更多；它從未斷版，對于許多需要一部通俗易懂的納粹德國全史的人來說，它一直是首選讀物。該書的成功自有充分的理由：夏伊勒是位美國記者，在1941年12月美國參戰之前，一直從納粹德國發回報道。憑借記者所特有的觀察力，他擅長捕捉生動的細節和富有啟示性的事件。該書充滿人情味，引用了許多絕妙的戲劇對白，而且文筆盡顯一位老練的記者從前線發回新聞報道時所展露的那種才華與風格。但它受到了歷史專業人士的一致抨擊。流亡的德國學者克勞斯·愛潑斯坦（Klaus Epstein）道出了許多人的看法，他指出，夏伊勒作品所呈現的德國歷史，是一種“粗糙得令人難以置信”的敘述，似乎在說納粹攫取政權完全是歷史的必然。其報道存在“明顯的缺陷”，過分側重高層政治、外交政策和軍事行動，即使在1960年，它也“根本無法與當今學界對納粹時期的研究相提并論”。近半個世紀之后，這一評語比愛潑斯坦當時更加令人信服。因此，盡管優點很多，但夏伊勒所呈現的納粹德國史無法真正滿足21世紀初讀者的需要。[[5]](#5)

德國政治學家卡爾·迪特里希·布拉赫爾（Karl Dietrich Bracher）的研究與夏伊勒的作品截然不同，他在1969年出版的《德國的獨裁政府》（The German Dictatorship）中，總結了自己對魏瑪共和國倒臺以及納粹攫取政權所做的開創性研究，他的研究至今依然具有價值，其中最精彩之處是納粹主義的起源與發展及其與德國歷史的關系，這恰恰是夏伊勒作品最薄弱的地方。布拉赫爾用將近半部書的篇幅論述這些專題，其余部分則略論了第三帝國的政治結構、外交政策、經濟與社會、文化與藝術、戰時政權以及納粹體制的崩潰。盡管存在這種不平衡，但其論述既精辟又權威，至今仍是一部經典作品。布拉赫爾著述的突出優點，在于其分析的清晰，以及他對書中所涵蓋的一切內容尋根究底式的說明、敘述和闡釋。它是一部可以一讀再讀、常讀常新的作品。不過，該書不僅在論述專題時用力不均，而且行文方式顯然是學術性的，往往令人難以卒讀。在過去的35年間，它已不可避免地被許多領域的研究所超越。[[6]](#6)

關于納粹德國的著述，如果說夏伊勒呈現了通俗的一面、布拉赫爾呈現了學術的一面，那么最近，有位作者則成功地彌合了二者之間的鴻溝。英國歷史學家伊恩·克肖（Ian Kershaw）的兩卷本《希特勒》（Hitler）成功地將希特勒的人生嵌入德國現代史，展示了他的個人興衰與宏觀的歷史因素有著怎樣的關聯。但克肖所著《希特勒》并非一部納粹德國史。實際上，隨著希特勒本人在戰爭期間日漸孤立，該書的關注范圍也不可避免地隨著敘述的推進而漸趨狹窄。它著重探討了希特勒最為關注的領域，即外交政策、戰爭和種族事務，而顯然無法采用普通人的視角，或大量著墨于希特勒并不直接關注的諸多領域。[[7]](#7)因此，我寫作這三部曲的主要目的，一是涵蓋第三帝國史所涉及的范圍廣闊的主要方面，不僅包括政治、外交和軍事事務，還包括社會、經濟、種族政策、警察與司法、文學、文化與藝術，這樣的廣度是以往著述出于各種原因而缺失的；二是將這些方面整合起來，展示它們之間有著怎樣的關聯。

克肖所著傳記的成功，表明對納粹德國的研究是一項不分國界的事業。最新出版的關于此專題的全景式大部頭，也是由一位英國歷史學家撰寫的——邁克爾·伯利（Michael Burleigh）的《第三帝國史新編》（The Third Reich: A New History）。該書以其他著作不曾達到的廣度和深度，使讀者從一開始就清楚地認識到納粹政權的暴力本質。伯利的抱怨沒錯：學院派作者描繪的納粹黨徒形象，往往顯得蒼白、近乎抽象，似乎有關納粹黨徒的理論和辯論比他們本身更加重要。他的著作極大地修正了這種平衡。伯利的主要目的是從道德的角度書寫一部第三帝國史。《第三帝國史新編》側重于大屠殺、抵抗與合作、政治暴力與政治脅迫、罪惡與暴行，從而有力地重申了一個近年常常被淡化的觀點：納粹德國屬于極權獨裁政體。然而該書沒有詳細探討近年來人們一直在研究的有關納粹德國的專題——外交政策、軍事戰略、經濟狀況、社會變遷、文化與藝術、宣傳、婦女與家庭等等。而且，由于優先考慮的是價值判斷，因此該書在解釋和分析時往往失之草率。例如，將納粹意識形態斥為“歪理”、“自負的謬論”等等，以此強調德國人的道德墮落——拋棄了對于道義的思考。但是人們有理由采用與伯利不同的處理方式，比如像布拉赫爾那樣，認真地對待納粹的思想觀點，無論它們在現代讀者看來多么令人厭惡或感到荒謬，并對那么多德國民眾如何以及為何相信它們做出解釋。[[8]](#8)

本書盡量博采如上述作品等以往著述之所長。像夏伊勒的作品一樣，本書首先是敘述式的，旨在按時間順序講述第三帝國的歷史，并展示事件之間的因果關系。敘述史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時有好多年不再流行，因為各地的歷史學家普遍側重于使用社會科學領域的分析方法。但是近年出版的各種大部頭敘述史著作表明，史家能夠做到用敘述體書寫歷史，同時又不犧牲分析的嚴謹或解釋的力度。[[9]](#9)與夏伊勒一樣，本書也試圖展現那些生活在書中所述歲月里的個人。納粹黨對德國歷史的歪曲、個人崇拜，以及第三帝國歷史書寫者對領袖的尊崇，導致二戰后的德國史學家走向另一面，在修史時完全不述及個體人物的性格。20世紀七八十年代，在現代社會史研究的影響下，史學家最感興趣的是宏觀的結構與進程[[10]](#10)，這一時期所產生的作品極大地推進了我們對納粹德國的認識。然而在追求知性解讀的過程中，有血有肉的個人幾乎從史家視野中消失了。因此本書的寫作目的之一，就是將個人放回到歷史圖景中去。我在書中自始至終盡量引述當時人物的文字和言論，并將宏觀敘述和分析性梳理與卷入歷史事件中的真實男女的故事并置呈現，涉及的人物上自政府高層，下至普通公民。[[11]](#11)

沒有什么比個體經歷的敘述更能使今人深切地體會到，時人不得不做出的抉擇是多么復雜，其面臨的處境是多么困難，常常令人迷惘。時人判斷事情，不像今人有后見之明的優勢：他們無法在1930年知道1933年將發生什么，無法在1933年知道1939年或1942年或1945年將發生什么。如果能有先見之明，時人無疑會做出不同的選擇。歷史寫作最重要的一個問題是，想象自己置身昔日世界，懷著時人在面對未來（對歷史學家來說那已成為過去）何去何從時的全部疑慮與彷徨。今人回顧歷史時覺得似乎不可避免的發展進程，在當時則絕非如此。我在本書中一再提醒讀者，在19世紀下半葉和20世紀上半葉德國歷史的許多節點，事態的發展本可以輕易地走到截然不同的方向。馬克思說過一句令人難忘的話：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那些條件不僅包括他們所處的歷史環境，還包括他們的思維方式、他們行動依據的基本假定，以及影響其行為的原則與信念。[[12]](#12)本書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為當今讀者還原上述所有條件，并且，借用另一句關于歷史的名言，提醒讀者：“往昔猶如異鄉，那里的人們做事都和今天不一樣。”[[13]](#13)

基于以下原因，我認為歷史著作如果津津樂道于道德判斷是不恰當的。其一，那樣做罔顧歷史情境；其二，那樣做失之傲慢自負。我無法知道如果自己生活在第三帝國治下會如何行事，因為，如果生活在當時，我也許是一個不同于今日之我的人。自1990年代初以來，道德、宗教和法律領域的概念與方法，不斷被用于有關納粹德國以及越來越多其他專題的歷史研究。做出評判有時是恰當的，比如判斷某些個人或群體是否應該因其在納粹治下所遭受的苦難而獲得賠償，或者相反，判斷是否應該強制某些個人或群體以這樣或者那樣的形式為他們施加給他人的苦難做出賠償。在這種情況下，評判不僅正當，而且重要。然而評判并不屬于歷史著作的范疇。[[14]](#14)正如伊恩·克肖所說：“對于一個局外人，一個未曾親歷納粹統治的外國人來說，批評親歷者、指望他們秉持在當時環境下幾乎難以達到的行為準則，未免過于輕率。”[[15]](#15)反思那個已經遠去的年代時，克肖所說的道理同樣適用于當今的絕大多數德國人。因此，我盡量避免使用那些背負著道德、宗教或者倫理包袱的語言。本書旨在理解那段歷史，評判則留給讀者。

搞清楚納粹是如何以及為何上臺的，在今天與在過去一樣重要，或許隨著記憶的消退，甚至更為重要。我們需要探究納粹黨徒的心理；需要揭示納粹的反對者為何未能阻止他們；需要明白納粹所建立的獨裁政權的本質和運作方式；需要了解第三帝國將歐洲和世界拖入一場空前殘酷的戰爭的過程，那場戰爭以帝國自身災難性的覆滅而告終。20世紀上半葉還發生了其他幾場浩劫，然而沒有哪場浩劫具有像納粹統治這樣深遠或持久的影響力。從種族歧視和種族仇恨被奉為其意識形態的核心思想，到發動一場殘酷的毀滅性征服戰爭，第三帝國在現代世界的思想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這是其他政權未曾做到的——或許我們該為此感到慶幸。德國這樣一個穩定的現代國家，如何在不到一個世代里將歐洲引入道德、物質和文化的廢墟與絕望之中，這段歷史對世人來說蘊含著發人深省的教訓；重申一下，這些教訓有待讀者從本書中汲取，而不是由作者直接提供。

## 二

從第三帝國登場伊始，各類歷史學家和評論家就致力于解釋這是如何發生的。持不同政見的流亡知識分子，比如康拉德·海登（Konrad Heiden）[‡](#_43)、恩斯特·弗倫克爾（Ernst Fraenkel）[§](#SS_1)和弗朗茨·諾伊曼（Franz Neumann）[¶](#P_1)，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發表了對納粹黨和第三帝國的分析，這些文本至今仍值得一讀，它們在指引研究方向上有著持久的影響力。[[16]](#16)然而在事后，第一次真正試圖把第三帝國置于其歷史語境中思考的，是當時杰出的德國歷史學家弗里德里希·邁內克（Friedrich Meinecke）于二戰剛結束時的著述。邁內克將第三帝國的興起主要歸咎于德國自19世紀末以降對世界霸權的日益癡迷，這種癡迷始于俾斯麥，并在德國皇帝威廉二世在位和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日益加深。他認為，軍國主義精神彌漫德國，使軍隊對政治局勢擁有了遺患無窮的決定性影響力。德國取得了令人贊嘆的工業實力，但這一成就是以犧牲更廣的德育和文化教育、過分注重狹隘的技術教育為代價的。“我們當時在希特勒的工作中尋找‘積極因素’，”中上層階級智識精英邁內克如是寫道，然后又老老實實地加上一句，人們找到了他們認為滿足時代需要的東西。但結果證明那完全是錯覺。長壽的一生足以使他在回首過去時，想起1871年俾斯麥領導下的德國統一，以及統一后至第三帝國覆滅之間所發生的一切。邁內克得出的初步結論是，德意志民族國家自1871年成立之時起就存在某種缺陷。

出版于1946年的邁內克回憶錄[\*\*](#_44)具有重要價值，既在于他勇敢地反思了一生的政治信仰與抱負，也在于其反思的局限性。第三帝國期間，這位年邁的歷史學家一直待在德國，然而不同于其他許多歷史學家，他從未加入納粹黨，也不曾為它寫作或工作過。但他還是受到了自己在成長過程中所形成的自由民族主義視角的局限。這場浩劫在他看來，正如其1946年回憶錄的書名所稱，是德國的浩劫，而不是猶太民族的浩劫、歐洲的浩劫或者世界的浩劫。同時，像德國歷史學家長期所做的那樣，他認為引起浩劫的主因在于外交和國際關系，而不在于社會、文化或經濟因素。在邁內克看來，問題實質上不在于他一帶而過的納粹統治下籠罩德國的“種族狂熱”，而在于第三帝國馬基雅維利式（Machiavelli）的強權政治，及其所發動的謀求世界霸權的戰爭，這最終導致了帝國的覆滅。[[17]](#17)

盡管存在種種不足，但邁內克的反思提出了一系列關鍵問題，如他所料，這些問題此后一直縈繞在人們的心頭：像德國這樣一個先進的、極有教養的民族，怎么會如此迅速、如此輕易地屈從于國家社會主義的野蠻力量？納粹攫取政權過程中所受到的認真抵制為何如此之少？一個無足輕重的極右翼政黨怎會如此戲劇性地突然上臺掌權？為什么如此多的德國人沒能意識到無視納粹運動的暴力、種族主義和殺戮天性，有可能帶來災難性后果？[[18]](#18)隨著時間的推移，不同國籍的歷史學家和評論家、不同政治立場的人，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呈現出極大的差異。[[19]](#19)20世紀上半葉，歐洲多個國家都建立了殘暴的獨裁體制，德國的納粹政府只是其中之一，這種趨勢蔓延甚廣，以致一位歷史學家將當時的歐洲稱為“黑暗大陸”。[[20]](#20)這種現象轉而引出了新的問題：納粹主義在多大程度上植根于德國歷史？另一方面，納粹主義在多大程度上是廣義的歐洲發展的產物？就其起源與統治的核心特征而言，納粹與當時歐洲的其他獨裁政權有多大程度的共性？

上述比較思考顯示，認為與經濟和文化落后的社會相比，經濟發達、文化先進的社會似乎不那么容易墜入暴力與毀滅的深淵，這樣的假設是有問題的。德國孕育了貝多芬，俄國孕育了托爾斯泰，意大利孕育了威爾第，西班牙孕育了塞萬提斯，而這幾個國家在20世紀都經歷了殘暴的獨裁統治，兩者之間毫無關聯。擁有數世紀高度文明的社會墜入政治野蠻主義，并不比文化成就乏善可陳的社會的墮落更令人費解；文化與政治根本不是以如此簡單和直接的方式相互作用的。如果說第三帝國的經驗使我們得到了什么教訓的話，那就是：對偉大的音樂、偉大的藝術和偉大的文學之熱愛，并沒有賦予人們任何道德的或政治的免疫力，從而拒絕暴力和暴行、免于聽命獨裁統治。實際上，1930年代以來的許多左翼評論家認為，德國文化和社會的先進性本身就是納粹主義勝利的主要原因。德國經濟是歐洲最強勁的，德國社會是發展最完善的；在德國，資本主義企業已經達到前所未有的規模和組織化程度。馬克思主義者認為，這意味著資本家與他們的剝削對象之間的階級矛盾不斷加劇，直至瀕臨崩潰的邊緣。不顧一切地渴望維系其權力和利益的大企業主及其依附者，利用他們的全部影響力以及任其支配的全部宣傳工具，創造出一種專門服務于其利益的群眾運動——納粹黨，然后操縱它攫取權力，并在納粹掌權之后，靠它謀取利益。[[21]](#21)

這種觀點在1920年代至1980年代被各派馬克思主義學者進行了相當精妙的闡述，不應僅被當作宣傳而草率否定。在1945年至1990年冷戰期間，分裂歐洲的“鐵幕”兩邊都有數量可觀的學術著作受到這種觀點的啟發。然而，作為一種寬泛的概括性解釋，它也受到了不少質疑。它幾乎忽略了納粹主義的種族理論，全然沒有解釋納粹黨徒為什么不僅在言論上，而且在現實中對猶太人傾注了如此惡毒的仇恨。鑒于第三帝國投入了可觀的人力物力來迫害和消滅數以百萬計的生命，包括許多無疑屬于中產階級的人，他們富有創造力、生活優裕，而且其中為數不少的人本身就是資本家，因此很難理解納粹主義的現象怎能歸結為針對無產者的階級斗爭，或者歸結為企圖維護資本主義制度——這個制度恰恰是許許多多德國猶太人盡力維護的。而且，如果說納粹主義是隨著帝國壟斷資本主義的來臨而不可避免的結果，那么如何解釋納粹僅僅出現在德國，而沒有出現于其他同等發達的資本主義經濟體，比如英國、比利時或美國？[[22]](#22)

這個問題正是許多非德國人在二戰期間所提出的，也是至少一部分德國人在戰爭結束后立刻問自己的。尤其是在那些已于1914—1918年經歷過一次對德戰爭的國家中，許多評論家認為，納粹主義的崛起與得勢是幾個世紀以來的德國歷史不可避免的產物。持此觀點的作者來自不同的背景，包括美國記者威廉·L. 夏伊勒、英國歷史學家A.J.P. 泰勒（A. J. P. Taylor）和法國學者埃德蒙·韋爾梅伊（Edmond Vermeil），他們認為，德國人一直排斥民主制度和人權，臣服于強人領袖，拒絕接受“積極公民”（active citizen）這一理念，沉迷于模糊但危險的世界霸權之夢。[[23]](#23)奇怪的是，這附和了納粹版本的德國歷史，即認為德國人也一直將上述基本特征作為自己的種族天性加以固守，卻因受到外來影響——比如法國大革命——而偏離了它們。[[24]](#24)然而正如許多批評家所指出的，這種簡單化的觀點立刻引出一個疑問：為什么德國人在1933年之前未曾屈從于納粹式的獨裁統治。該觀點忽略了一個事實，即在德國歷史中存在著根深蒂固的自由和民主傳統，這些傳統在政治動蕩中得到表達，比如1848年革命，當時德國境內的專制政權全部被推翻。而且該觀點增加——而非減輕——了解釋“納粹如何上臺與為何上臺”的難度，因為它忽略了甚至在1933年也曾普遍存在于德國的反納粹聲音，從而妨礙了我們提出這一至關重要的問題：那種反對聲音為什么被壓制住了？如果認識不到德國內部這種反納粹力量的存在，納粹主義從崛起到稱霸的戲劇性故事也就毫無戲劇性可言，而僅僅是不可避免之事的實現。

歷史學家總是很容易從1933年這個制高點來回顧德國歷史，將歷史進程中所發生的幾乎任何事情都解讀為納粹主義崛起與得勢的夙因。這導致了各種各樣的曲解，有些歷史學家從德國思想家——比如18世紀末的民族主義鼓吹者約翰·戈特弗里德·馮·赫爾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_45)或者16世紀基督教新教創始人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言論中斷章取義，用以闡釋他們的論點，即蔑視其他民族、盲從本國權威深植于德意志民族性當中。[[25]](#25)然而，更加仔細地閱讀上述那些思想家的著作就會發現，赫爾德宣揚以寬容的態度和同理心對待其他民族，路德的著名主張則是堅守個人良知，捍衛反抗精神權威和知識權威的權利。[[26]](#26)而且，盡管思想確實自有其力量，但不管如何迂回，那力量總是受到社會環境和政治環境的制約，這一點往往被那些籠統地談論“德意志性格”或“德意志心靈”的歷史學家所遺忘。[[27]](#27)

另一種思潮所強調的，不是意識形態和信仰在德國歷史中的重要性，而是它們的無足輕重，持此論者與上文提到的那些歷史學家有時竟是同一批人。德國人有時候被說成對政治缺乏真正的興趣、從未適應平等交換意見的民主式政治辯論；然而在所有被用來解釋1933年第三帝國登場的關于德國歷史的錯誤觀念中，沒有比“不關心政治的德國人”更缺乏說服力的了。這個概念多半出自小說家托馬斯·曼（Thomas Mann）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創作[‡‡](#_46)，德國中產階級智識人士后來將它當作遁詞，即接受自己“不曾反對納粹主義”這個不那么嚴重的罪名的批評，以免遭“支持納粹主義”的譴責。許多來自不同背景的歷史學家斷言，德國中產階級在1848年革命失敗后即從政治活動中退出，轉而在賺錢生財或者文學、文化與藝術中尋求慰藉。他們還斷言，德國智識人士把效率與成功看得比道義與意識形態更重要。[[28]](#28)然而如我們在本書后面將會看到的，有大量證據表明，實際情況恰恰相反。無論1920年代德國的問題出在哪里，都一定不是缺乏政治責任感和政治信仰，情形甚至剛好相反。

毫不奇怪的是，德國歷史學家極其反感對德國人的性格做如此籠統而不懷好意的概括。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他們通過指出納粹意識形態的歐洲根源，盡其所能地引開批評的矛頭。他們讓人們注意這一事實：希特勒本人不是德國人，而是奧地利人。他們引證納粹與當時歐洲其他獨裁政府的相似之處，從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到斯大林的蘇俄。無疑，他們認為，鑒于歐洲民主政治在1917—1933年間的全面崩潰，納粹的上臺不應被視為悠久而獨特的德國歷史發展的高潮，而應該被視為德國的既有秩序像其他國家一樣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災難性沖擊下崩潰。[[29]](#29)這種觀點認為，工業社會的興起，第一次將大眾推上了政治的舞臺；戰爭摧毀了整個歐洲的社會等級、價值觀以及經濟穩定；奧匈帝國的哈布斯堡王朝（Habsburg）、德意志帝國的霍亨索倫王朝（Hohenzollern monarchy）、俄國的羅曼諾夫王朝（Romanov dynasty）以及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全部垮臺，繼之而起的各個新的民主國家很快淪為不擇手段的煽動蠱惑的犧牲品，煽動家們誘騙民眾投票同意自己的奴隸地位。20世紀變成了極權主義的時代，高潮是希特勒和斯大林試圖建立起一種新的政治秩序，其統治的基礎一方面是實行全面的警察控制和恐怖政策，并殘酷鎮壓和殺戮數百萬真正的或憑空臆斷的反對者，另一方面以巧妙的宣傳手法不斷動員群眾、激發群眾的熱情。[[30]](#30)

不難看出，這些論據符合20世紀五六十年代冷戰中的西方擁護者的利益，他們或含蓄或明確地將斯大林的蘇聯與希特勒的德國等同起來，認為二者都是同一種現象的變體，近年來又有人重提此觀點。[[31]](#31)將這兩個政權進行類比當然并無不妥。[[32]](#32)極權主義思想作為一種普遍的政治現象，可以追溯到1920年代初。它被墨索里尼作為一個褒義詞加以利用，墨索里尼與斯大林和希特勒一道，宣稱要控制整個社會，包括對人性進行有效的改造，塑造出“新”型人類。然而，無論這幾個不同的政權之間有什么共性，促成納粹主義與斯大林主義的興起、盛行以及最終掌權的兩種力量之間的差異依然極其明顯，以至于很難用極權主義概念解釋清楚這個問題。因此，極權主義更適合被用來描述而不是解釋，也許它更有助于我們理解20世紀的獨裁政權在上臺后是如何運作的，而不是解釋獨裁政權是如何上臺的。

當然，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俄國與德國之間具有某些相似性。兩國的政體都是君主專制，以強大的官僚機構和強悍的軍事精英為后盾，都面臨著工業化所帶來的急劇的社會變化。兩種政治制度都被由一戰挫敗引發的深刻危機所摧毀，取代它們的都是短命且矛盾重重的民主政體，這些矛盾不久又被獨裁體制的出現所解決。但二者也存在許多關鍵性差異，其中的主要差異是，布爾什維克在自由選舉中完全沒有贏得基本的民意支持，而自由選舉則為納粹的上臺提供了重要基礎。俄羅斯是個落后國家，絕大多數人口是農民，缺乏公民社會的基本功能和代議制政治傳統。它與德國這個發達的、人民受教育程度很高的工業國家截然不同，德國擁有長期孕育的代議制政治傳統、法治傳統以及積極參與政治事務的公民。第一次世界大戰摧毀了全歐洲的舊秩序，這是確切無疑的；然而各國的舊秩序之間存在著很大差異，被摧毀的方式以及產生的后果也各不相同。如果我們想尋找一個在發展進程方面與德國具有可比性的國家，那么正如我們將會看到的，與德國一樣在19世紀剛剛實現統一的歐洲國家意大利，遠比俄國更加適合作為參照系。

從德國歷史中為納粹主義的起源與崛起尋找一種解釋，無疑存在著這樣的風險，即可能將整個過程視為不可避免的。然而，幾乎在每一個轉折點，事情都有可能發展到另一個方向。納粹主義的勝利，直到1933年最初的幾個月，都還遠遠不是必然的結果；但那也絕非歷史的偶然。[[33]](#33)有人認為，納粹的上臺在本質上屬于歐洲發展格局的一部分，持此觀點者在某種程度上是正確的。但他們甚少注意到這一事實，即納粹主義雖然遠不是德國歷史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的結果，然而它的成功確實得益于特別符合德國人天性的政治傳統、意識形態傳統以及發展方式。這些傳統也許追溯不到馬丁·路德那么遠，但肯定可以溯源到德國歷史在19世紀的發展方式，尤其可以溯源到1871年俾斯麥領導德國實現統一的過程。因此，從這個時間點切入是合理的，正如弗里德里希·邁內克在其1946年回憶錄中所做的那樣，尋找理由來解釋納粹為什么在德國統一60多年后得以上臺，給德國、歐洲以及世界造成如此巨大的破壞，而在大多數德國人那里遇到的反對卻如此之少。我們將從本書以及后面的兩卷中看到，對這些問題有著許多不同的回答，涵蓋了從1930年代初壓垮德國的那場危機[§§](#SSSS_1)的本質，到納粹攫取權力之后建立并鞏固其統治的方式，在所有這些答案中斟酌取舍絕非易事。然而德國的歷史包袱不可否認地在納粹的上臺過程中發揮了作用，因此，本書必須從德國歷史說起。

## 三

21世紀初是啟動這個寫作項目的絕佳時機。自1945年以來，關于第三帝國的歷史研究主要經歷了三個階段。在第一階段，即二戰結束至1960年代中期，史學界高度專注于回答我在本卷中主要探討的問題。卡爾·迪特里希·布拉赫爾等政治學家和歷史學家出版了關于魏瑪共和國的垮臺和納粹攫取權力的幾部重要著作。[[34]](#34)第二階段是20世紀七八十年代，盟軍繳獲并保管的海量文件被歸還給德國檔案館，借助這些文件，研究焦點轉向1933—1939年間的歷史（我所著三部曲第二卷的主題）。特別地，馬丁·布羅薩特（Martin Broszat）和漢斯·莫姆森（Hans Mommsen）發表了一系列關于第三帝國內部結構的開創性研究成果，反駁了流行觀點所認為的，納粹政權是決策由最高層——希特勒——做出，然后自上而下逐級執行的獨裁體制；并且剖析了各個相互競爭的權力中心的復雜性，他們認為，各中心之間的相互較量，驅使納粹政權逐步采取越來越激進的政策。他們的作品又得到大量新研究成果的補充，這些新成果探究了納粹治下的日常生活，尤其側重于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的那幾年。[[35]](#35)從1990年代開始，研究進入第三階段，尤其側重于1939—1945年間的歷史（三部曲第三卷的主題）。人們在蘇聯集團的檔案中發現了新的史料，公眾也越來越關注納粹對猶太人，以及對從同性戀者到“離群索居者”，從奴隸勞工到殘疾人等其他群體的迫害與滅絕，這一切促成了大量重要研究成果的出現。[[36]](#36)因此，撰寫一部綜合作品的時機已經成熟，本書將整合上述三個階段的研究成果，并充分利用最近可資參考的大量新材料——從約瑟夫·戈培爾（Joseph Goebbels）和維克托·克倫佩雷爾（Victor Klemperer）[¶¶](#PP_1)的日記，到德國內閣會議的記錄和海因里希·希姆萊（Heinrich Himmler）的預約簿。

對任何一位歷史學家來說，這樣的任務即使算不上輕率甚至莽撞，也可謂大膽，對于一位非德裔的歷史學家來說更是如此；但我對本書中所探討的歷史問題已經思考了很多年。我對德國歷史最早的興趣，是弗里茨·菲舍爾（Fritz Fischer）真正喚起的，他在牛津大學的客座講座使當時在那里讀本科的我有如醍醐灌頂。后來在漢堡（Hamburg）做博士研究期間，我對菲舍爾及其團隊所掀起的學術熱潮略有與聞，菲舍爾提出的德國現代史的連續性問題，在追隨他的年輕一代德國歷史學者中激起了真正的騷動，甚至革命。在當時，即1970年代初，我感興趣的主要是從魏瑪共和國和威廉帝國著手，追溯第三帝國的起源；只是到了后來，我才開始寫作在現代的德國史研究者中間引起激烈論戰的納粹德國相關問題，并自己做些1933—1945年間的檔案研究，為關于德國現代史中死刑問題的更大研究項目的部分內容做準備。[[37]](#37)那些年里，我非常幸運地得到了眾多德國朋友和同事的各種幫助，特別是于爾根·科卡（Jürgen Kocka）和沃爾夫岡·莫姆森（Wolfgang Mommsen）、福爾克爾·烏爾里希（Volker Ullrich）和漢斯-烏爾里希·韋勒（Hans-Ulrich Wehler）。在亞歷山大·馮·洪堡基金會（Alexander von Humboldt Foundation）和德意志學術交流中心（German Academic Exchange Service）等機構的慷慨資助下，我多次、往往是長時間地駐留德國，我希望這些留德經歷令我學有進境，使我對德國歷史和文化的理解，比我在1970年代初剛起步時更加透徹。對于想要研究其問題重重且令人不安的歷史的外國人，幾乎沒有哪個國家能夠比德國更加慷慨或開放。英國的德國史專家共同體也自始至終支持著我；早年在牛津大學期間，蒂姆·梅森（Tim Mason）對我來說是個獨特的靈感來源，安東尼·尼科爾斯（Anthony Nicholls）則老練地指導著我的研究工作。當然，這一切終究無法彌補我并非德裔的事實，但是身為外國人而難免存在的距離感，也許還能賦予我某種超然的視角，或者至少賦予我一種不同的視角，從而在某種程度上彌補這個明顯的劣勢。

在20多年的時間里，雖然我書寫過關于第三帝國的起源和影響，編纂過第三帝國的史料，從檔案中研究過第三帝國的部分歷史，為本科生講授過一門徐緩漸進的、基于文獻的第三帝國史課程，但是直到1990年代，我才被驅動著全身心地投入第三帝國史的研究。為此我將永遠感謝安東尼·朱利葉斯（Anthony Julius）邀請我在“戴維·歐文（David Irving）訴德博拉·利普施塔德（Deborah Lipstadt）及其出版商”的誹謗案中擔任專家證人，也將永遠感謝整個辯護團隊，特別是首席法律顧問理查德·蘭普頓皇家大律師（Richard Rampton QC），以及我的研究助手尼克·瓦克斯曼（Nik Wachsmann）和托馬斯·斯凱爾頓—魯賓遜（Thomas Skelton-Robinson），他們投入了大量時間，對訴訟期間浮出水面的第三帝國史諸多方面的問題進行了激烈的、富有成果的討論。[[38]](#38)該案的重要性最后超出了我們每個人的預料，我為能參與其中感到榮幸。此外，為此案工作時我們還驚訝地發現，我們所處理的問題在許多方面都欠缺文獻資料。[[39]](#39)另一個同等重要的發現是，盡管已有許多優秀作品以較小的框架分析了納粹對猶太人的政策，但在第三帝國全史中，關于這些的更大歷史背景尚無真正全面而詳細的著述。不久之后，我應邀參加英國政府設立的掠奪品咨詢委員會（Spoliation Advisory Panel），籌備有關1933—1945年間被非法與原主分離的文物的索還事務，在此期間，我越發強烈地感到納粹德國的相關知識是如此支離破碎。在這個領域，與在誹謗案所涉及的領域一樣，回答專業問題同樣往往需要依賴更廣闊背景下的歷史知識，但我卻找不到可以在此方面指導委員會其他成員的納粹德國通史。同時，在這兩個截然不同的情境中，直面法律和道德這兩個納粹經驗的重要維度，使我比任何時候都更加確信，我們需要一部不以道德判斷或法律判斷為參照系的第三帝國史。

以上就是我撰寫本書的部分原因，它們也許有助于解釋本書的某些顯著特征。首先，在這種以大眾為目標讀者的歷史書中，重要的是避免使用專業術語。本書是為英語讀者而寫的，因此我已將幾乎每一處德文術語譯為對等的英語詞匯。保留德文是一種故弄玄虛，甚至浪漫化的做法，應予避免。只有三個詞例外。第一個是“Reich”（帝國），正如我在第一章中所解釋的，這個德文單詞所引發的不可翻譯的獨特聯想，遠遠超出了它所對應的英語單詞“empire”。還有與之相關的德文稱謂“Reichstag”，指的是帝國國會。這個詞想必是每位說英語的讀者所熟悉的，不用它反倒顯得做作——比如提到“第三帝國”時不稱“Third Reich”，而稱為“Third Empire”；或者提到“國會縱火案”時不稱“Reichstag fire”，而稱為“Parliament fire”。提到皇帝時，保留了德文“Kaiser”，因為此詞也承載著具體而深刻的歷史記憶，所以沒有使用不夠精準的英文對應詞“Emperor”。其他一些與第三帝國有關的德文單詞或術語也已在英語中通用，但在使用過程中漸漸脫離了原意，例如德文“Gauleiter”，專指“大區長官”，因此為了賦予它更加確切的含義，我在本書英文版中全部譯為“Regional Leader”。同理，書中沒有稱希特勒為“Führer”，而是使用了這個德文稱謂的對等英文單詞“Leader”。而且，雖然人人熟知希特勒寫過一本名為《我的奮斗》的書，但是除非看得懂德文，否則極少有人知道“Mein Kampf”的意思是“My Struggle”（我的奮斗）。

翻譯的目的之一，是讓說英語的讀者明白這些詞語的實際含義。它們不僅僅是稱謂或者詞語，還承載著意識形態的重負。有些德文詞匯并無確切的對等英文，因此我在翻譯時的選詞也隨語境而變，把“national”譯為“民族的”或者“民族主義的”（它兼具這兩種意味），把同樣多義的術語“Volk”根據上下文譯作“人民”或者“種族”。翻譯的內容并非全部出自我手，凡是采用現有英語版本之處，我均已對照原文校對過，并在有些地方做了相應的修改。懂德文的專業人士讀到這些譯文也許會感到惱火，我建議他們去讀與本書英文版同步發行的德文版 Das Dritte Reich, I: Aufstieg，由德意志出版社（Deutsche Verlags-Anstalt）出版。

其次，本書盡最大可能限制尾注的篇幅，這同樣是因為我始終不忘它并非寫給專業人士的學術專著。尾注的主要目的是便于讀者查閱正文中的內容，而無意為本書所探討的問題提供全部的參考書目，除了極個別的例外，也無意包羅對于詳盡的派生題目之探討。但是，我盡量為感興趣的讀者列出相關的延伸閱讀資料，使其可以就某一題目進行比本書更加深入的探究。對于已有英文譯本的德語書，我在本書中盡量優先引用英文版，而不是德文原版。為限定尾注的篇幅，我只提供了鎖定資料來源的必要信息——作者、標題與副標題、出版地與出版日期。現代出版是一項全球業務，各大出版社均在不同國家設有發行機構，因此尾注中僅標明首要出版地。

正如維克托·克倫佩雷爾很久以前在其經典論著《第三帝國的語言》（Lingua tertii Imperii）中所指出的，書寫納粹德國的最大難題之一，來自納粹用語對當時語言的滲透。[[40]](#40)有些歷史學家為了拉開自己與之的距離，將所有納粹用語打上引號，或者加上表示貶義的修飾語，就像這樣：“第三帝國”，甚或“所謂的‘第三帝國’”。然而，在一部本書這樣的作品中采用這兩種處理方式的任何一種，都會嚴重損害閱讀的流暢性。有句話雖然不是非說不可，但在此處加個按語也無妨：本書中所采用的納粹語言，僅僅表示它在當時的用法，而不應被理解為認同——更不用說是贊同——文中的納粹用語是正當的表達方式。在提到“納粹黨”（Nazi Party）的地方，我使用首字母大寫的“Party”，而提到其他政黨時則不大寫。同理，大寫的“Church”（教會）表示基督徒的正式組織，而小寫的“church”（教堂）則表示建筑物；“Fascism”表示墨索里尼領導的意大利法西斯運動，而“fascism”則泛指作為政治現象的法西斯主義。

如果這種處理方式使后面的文本更加清晰易讀，其目的也就達到了。此外，如果本書如我所希望的那樣流暢，那么大部分功勞需歸我的朋友和同事們，他們善良友好，爽快地同意閱讀初稿，并且消滅了許多不恰當和錯誤之處，特別是克里斯·克拉克（Chris Clark）、克里斯蒂娜·L.科頓（Christine L. Corton）、伯恩哈德·富爾達（Bernhard Fulda）、伊恩·克肖爵士、克里斯廷·塞門斯（Kristin Semmens）、亞當·圖茲（Adam Tooze）、尼克·瓦克斯曼、西蒙·溫德爾（Simon Winder）和埃瑪·溫特（Emma Winter）。伯恩哈德·富爾達、克里斯蒂安·格舍爾（Christian Goeschel）和馬克斯·霍斯特（Max Horster）核對了注釋并確認了原文出處；凱特琳·默多克（Caitlin Murdock）核對了保存在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的納粹沖鋒隊員的自傳并確認了文件的出處。伯恩哈德·富爾達、利茲·哈維（Liz Harvey）和戴維·韋爾奇（David Welch）慷慨地提供了一些關鍵文獻。我由衷感謝他們每個人對我的幫助。安德魯·懷利（Andrew Wylie）是位出色的經紀人，其說服能力確保了本書找到最好的出版商；企鵝出版社的西蒙·溫德爾是我在倫敦的堅實后盾，與他密切合作出版此書是一次愉快的經歷。在紐約，斯科特·莫耶斯（Scott Moyers）用他的熱情激勵著我，并對書稿做出精辟的評論，令我獲益匪淺；在德國，邁克爾·內爾（Michael Neher）以驚人的組織才華迅速推出德文版。再次與譯者霍爾格·弗利斯巴赫（Holger Fliessbach）和烏多·倫納特（Udo Rennert），以及繪制地圖的安德拉什·拜賴茲瑙伊（András Bereznáy）合作，我感到非常愉快。我還要感謝企鵝出版社的克洛艾·坎貝爾（Chloe Campbell），她為書中的插圖投入了大量精力，幫助我做圖片研究、獲取使用許可并查找原件；感謝西蒙·泰勒（Simon Taylor）的慷慨幫助，他為本書提供了一些圖片；感謝伊麗莎白·斯特拉特福德（Elizabeth Stratford），她一絲不茍地為終稿文本做了文字編輯；感謝英文版與德文版的制作和設計團隊為本書的同步發行所做的工作。

最后，感謝我的家人，他們永遠是我最依賴的人：感謝克里斯蒂娜·L.科頓的務實支持以及她在出版事務上給予我的專業意見；感謝她與我們的兒子馬修（Matthew）和尼古拉斯（Nicholas），這部三卷本著作獻給他們，是他們在項目期間支撐著我去書寫那些費解的、往往令人恐怖的史事，幸運的是我們在人生中都不曾經歷過那樣的事情。

2003年7月于劍橋

\* 俾斯麥帝國（Bismarckian Empire），即普魯士王國在奧托·馮·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1815—1898）主導下，于歐洲中部德語區建立的統一的德意志民族國家“德意志帝國”。本書把俾斯麥主政期間的德意志帝國（1871—1890）稱為“俾斯麥帝國”，而把1890年威廉二世（Wilhelm Ⅱ）迫使俾斯麥辭職至1918年威廉二世退位期間的德意志帝國稱為“威廉帝國”（Wilhelmine Empire）。——除特別說明，本書腳注均為譯者注

[†](#_5) 本書原著出版于2003年。

[‡](#_16) 康拉德·海登（1901—1966），德裔美國記者、歷史學家，1936年在流亡期間出版《希特勒傳》（Hitler: A Biography）。——編注

[§](#SS) 恩斯特·弗倫克爾（1898—1975），德國政治學者，1941年出版《雙重國家》（The Dual State），對納粹國家的政治體系進行了分析。——編注

[¶](#P) 弗朗茨·諾伊曼（1900—1954），德國猶太政治活動家、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1944年出版《巨獸：國家社會主義的結構與實踐，1933—1944》（Behemoth: The Structure and Practice of National Socialism, 1933—1944）。——編注

[\*\*](#_17) 書名是《德國的浩劫：反思與回憶》（The German Catastrophe: Reflections and Recollections）。

[††](#_25) 約翰·戈特弗里德·馮·赫爾德（1744—1803），德國哲學家、詩人、神學家和文藝評論家。

[‡‡](#_28) 托馬斯·曼（1875—1955）在發表于1918年的文章《一位非政治人物的反思》中寫道：“我堅信，德國人永遠不可能愛上民主政治，原因很簡單，他們對政治根本不感興趣；備受譴責的‘獨裁國家’現在是、并將永遠是適合德國人民的體制，也是他們最需要的體制。”他后來放棄了此立場。

[§§](#SSSS) 指1930年代的經濟危機，導致魏瑪共和國失業率飆升，政治轉向極端主義。——編注

[¶¶](#PP) 維克托·克倫佩雷爾（1881—1960），德國學者，猶太人。其日記詳細記錄了他在德意志帝國、魏瑪共和國、第三帝國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治下的生活。其中第三帝國時期的日記自1995年在德國出版以來，已成為歷史學家經常引用的史料。

# 第一章 歷史遺產

## 第一節 德意志的獨特性

### 一

從俾斯麥說起，難道不對嗎？從好幾個層面說，他都是導致第三帝國登場的關鍵人物。一方面，在俾斯麥去世后的歲月里，對他的緬懷和崇拜促使許多德國人期盼他所代表的強人領袖能夠再現；另一方面，他在19世紀中后期的行動和政策，為德國的未來留下了一份不祥的遺產。然而在許多方面，俾斯麥是一位有爭議的復雜人物，他既屬于歐洲又屬于德國，既現代又傳統；他的這種復雜性同樣傳承了下去——第三帝國也明顯帶有新與舊錯綜交融的特征。值得注意的是，俾斯麥于1871年建立德意志帝國（German Empire），與1930—1932年納粹在選舉中獲勝，僅僅相隔了50年。二者之間存在的關聯似乎無法否認。我們發現，德國歷史上第一個可能真正與1933年第三帝國的登場直接相關的時刻，正是1871年德意志帝國的建立，而不是久遠的宗教改革中的宗教文化和等級制度，也不是18世紀的“開明專制”[\*](#_57)。[[1]](#1_1)

奧托·馮·俾斯麥生于1815年，以“德國保守主義的野蠻人”著稱，他慣于采用冷酷的言辭和暴力行動，從不憚于強硬而明確地表明謹慎之人不敢大聲說出的話。俾斯麥生長于傳統的貴族家庭，既屬于容克[†](#_58)地主階級，也屬于文官貴族。許多人覺得他代表了普魯士主義的極致，集它的美德和劣根于一身。19世紀后半葉他對德國的統治殘酷、專橫、全面。他毫不掩飾自己對自由主義、社會主義、議會政治、平等主義，以及現代世界的其他許多方面的蔑視，但這似乎無損于他身后所獲得的神話般的名聲——德意志帝國的締造者。1915年，在他的百年誕辰，德國正忙于打第一次世界大戰，秉持人道立場的自由派可以從作為武力與強權之化身的“鐵血宰相”這一形象中得到安慰，乃至受到激勵，比如歷史學家弗里德里希·邁內克就寫道：“正是俾斯麥的精神阻止了我們犧牲自己的根本利益，并驅使我們做出英勇的決定，去與東方和西方進行殊死較量，用俾斯麥的話來說就是，‘像個強者，握有兩只凌厲的拳頭，一只打擊一個對手’。”[[2]](#2_1)這種有魄力的偉大領袖，正是許多德國人在此國運攸關之際深感缺失的。在一戰結束后的歲月里，他們這種缺少強人領袖的感覺甚至會更加強烈。

然而，現實中的俾斯麥遠比其追隨者在他死后所塑造的這種粗糙形象要復雜得多。他并非后來傳說中無所顧忌、喜歡冒險的賭徒。極少有德國人后來還記得，將政治定義為“可能性的藝術”的，恰恰是俾斯麥。[[3]](#3_1)他始終堅稱，他所擅長的是審時度勢，然后利用時勢達到自己的目的。他本人對此的描述更富有詩意：“政治家自己無法創造任何事物。他必須等待，直至聽到上帝的腳步穿過重重事件，然后一躍而起，抓住上帝的衣角。”[[4]](#4_1)俾斯麥知道，他無法強行把局勢變成他想要的樣子，用他所喜歡的另一個比喻來說就是，政治的藝術在于引領國家之船行駛在時間之河。那么在19世紀的德國，河流是朝哪個方向流動的呢？在19世紀之前的一千多年里，中歐分裂成了無數自治的邦國，其中一些實力強大、組織完善，比如薩克森（Saxony）和巴伐利亞（Bavaria）；有些是中小規模的“自由市”；還有一些小公國和騎士領地，其領土只不過是一座城堡加一小塊田莊。它們全部被所謂的德意志民族神圣羅馬帝國（Holy Roman Reich of the German Nation）整合為一體，該帝國于公元800年由查理曼（Charlemagne）建立，1806年在拿破侖的逼迫下解散，這個著名的“千年帝國”最終成為納粹野心的效仿對象。在受到拿破侖入侵的壓力而解體之前，帝國危機四伏，建立名副其實的中央集權統治的努力已告失敗，于是奧地利和普魯士等實力強大、野心勃勃的成員國越來越飛揚跋扈，無視帝國的存在。

1815年拿破侖兵敗滑鐵盧之后，等到塵埃落定，歐洲各邦國組建了德意志邦聯（German Confederation），作為神圣羅馬帝國的后繼。邦聯的疆界大致如舊，與從前一樣包括德國以及奧地利的捷克語地區。由奧地利首相梅特涅親王（Prince Metternich）在中歐全境建立的警察制度，不久就成功地壓制住了1815年以前受法國大革命影響、在少數活躍的智識人士中間燃起的自由運動與革命活動的熊熊烈火。然而到1840年代中期，新一代的知識分子、律師、學生和地方政客對現狀日益不滿，他們開始相信，讓德國擺脫遍地大大小小的專制政府的最便捷方法，是取消邦聯的各成員國，代之以單一的德意志政府，政府建立在代議制基礎之上，保障基本的人權與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等等，這些基本權利當時在德國的很多地方依然不被承認。“饑餓的四十年代”[‡](#_59)由貧困和饑餓所激起的民怨為他們提供了機會。1848年，革命在巴黎爆發，隨后在歐洲全境呈燎原之勢。德意志邦聯各成員國的政府紛紛被推翻，自由派上臺執政。[[5]](#5_1)

革命者很快在邦聯（包括奧地利）組織了選舉，國民議會在法蘭克福（Frankfurt）正式組成。經過審慎考慮，代表們表決通過了一系列基本權利，遵循典型的自由派立場制定了德國憲法。但他們未能取得兩個主要邦國奧地利和普魯士的軍隊控制權，這后來被證明是決定性的錯誤。1848年秋天，這兩個邦國的君主和將軍們緩過神來，拒絕接受新憲法，在來年春天一波席卷德國的激進民主革命運動之后，他們強行解散了法蘭克福議會，將議會代表遣散回家。革命失敗了。德意志邦聯重新建立，革命領導人被逮捕、監禁或者被迫流亡。接下來的10年被歷史學家普遍視為極度反動的年代，自由主義價值觀和公民自由被德國極權主義的鐵蹄踏成了碎片。

許多歷史學家將1848年革命的失敗視為德國現代史上的關鍵事件，用歷史學家A.J.P. 泰勒的名言來說，當時“德國歷史發展到了轉折點，卻沒能實現轉折”[[6]](#6_1)。然而德國在1848年之后并不是堅定不移地徑直走上了侵略性民族主義和政治獨裁的“特殊道路”。[[7]](#7_1)這一路波詭云譎，有許多可以避免走向獨裁的機緣。首先，1860年代初，自由派的命運又一次出現戲劇性的轉機。革命后的政治和解遠遠不是全盤恢復舊秩序，而是在否決國家統一和議會主權[§](#SS_3)的同時，設法滿足自由派的許多要求。到1860年代末，德國幾乎每個地方都實現了由陪審團公開審理案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企業自由、集會和結社自由、廢除最令人反感的文學和新聞審查制度，以及其他許多權利。而且，至關重要的是，許多邦國已經設立代議制議會，在議會中，民選的代表有辯論的自由，并且至少享有某種程度的立法權和增稅權。

后者恰恰是東山再起的自由派于1862年在普魯士行使的權利，他們阻止增稅法案的通過，以此施壓，要求把軍隊收歸立法機構管轄，此事是他們在1848年不幸未能辦成的。這對普魯士軍隊籌措經費構成了嚴重的威脅。為應對危機，普魯士國王起用了那位后來主宰德國政壇30年的人物——奧托·馮·俾斯麥。在此之前，自由派曾做出正確的判斷：與1848年一樣，將奧地利的德語地區納入德意志民族國家的時機尚未到來；德意志的統一將意味著哈布斯堡王朝所統治的奧地利帝國的分裂。奧地利帝國涵蓋德意志邦聯之外的廣闊疆域，從匈牙利（Hungary）一直延伸至意大利北部，有數百萬非德語人口。然而隨著1859—1860年意大利的統一，自由派認為德國統一的時機也已到來：既然意大利人做到了締造他們自己的民族國家，那么德國人當然也能這樣做。

俾斯麥與英國的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P_3)、法國的拿破侖三世（Napoleon III）[\*\*](#_60)和意大利的加富爾（Cavour）伯爵[††](#_61)屬于同一代歐洲政客，他們樂于使用激進的，甚至革命的手段，來實現本質上是保守主義的目標。俾斯麥意識到，民族主義的力量是不可否認的。但他也看到，許多自由派在1848年受挫之后，開始愿意在國家統一的祭壇上犧牲至少一些自由主義的原則，以換取他們想要的東西。俾斯麥采取一系列迅猛而冷酷的行動，先與奧地利結成同盟，從丹麥王國掠奪了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Schleswig-Holstein）兩個有爭議的公國；然后策動了普魯士與奧地利之間爭奪領導權的戰爭[‡‡](#_62)，戰爭以普魯士軍隊的完勝而告終。德意志邦聯解體，取而代之的新邦聯將奧地利及其在南德的諸盟友排除在外，俾斯麥為新政權取了個缺乏想象力的名字——北德意志邦聯。感到德意志民族國家的建立指日可待，大多數普魯士自由派立即原諒了俾斯麥的稅收政策以及不經國會同意就為軍隊撥款的做法（俾斯麥在主政的前4年里，以極端藐視國會權利的做派執行他的政策），他們在俾斯麥策動另一場對法國的戰爭時為他加油鼓勁。法國有理由擔心，德國的統一將終結過去15年間法國在歐洲的強權政治中所享有的主導地位。[[8]](#8_1)

法國軍隊在色當（Sedan）[§§](#SSSS_3)等地被擊潰，一個新的德意志帝國隨之在從前的法國皇宮凡爾賽宮的鏡廳宣告成立。大約200年前由“太陽王”路易十四（Louis XIV）在其權力巔峰期所建的凡爾賽宮，竟變成了法國無能與失敗的恥辱象征。這是德國現代史，其實也是歐洲現代史上的關鍵時刻。對自由派來說，這似乎實現了他們的夢想，然而他們將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俾斯麥建立的帝國所具有的幾個特征為未來留下了隱患。首先，將新帝國稱為“德意志帝國”的決定，不可避免地令人想起其前身——主宰了歐洲千年的神圣羅馬帝國。事實上，有人將俾斯麥建立的帝國稱為“第二帝國”（Second Reich），詞語的使用也暗示，第一帝國敗于法國的入侵，在它失敗的地方，第二帝國成功[¶¶](#PP_3)了。俾斯麥建立的德意志帝國于1918年垮臺，但帝國的許多方面延續了下去，其中，魏瑪共和國的正式國名沿用“德意志國”（Deutsches Reich），全部建制名稱均冠以“帝國”字樣，這絕非微不足道之事。“帝國”一詞在德國智識階層中間所激發的聯想，遠遠超越了俾斯麥所創建的體制：它是羅馬帝國的繼承者；是對塵世中“上帝之國”的想象；宣示了其宗主國地位的普適性；用一個雖然沒什么詩意但卻頗有氣勢的概念來說，德意志國家將包括中歐所有說德語的人口——正如納粹口號所說的“同一個民族，同一個帝國，同一個領袖”。[[9]](#9_1)在德國，始終有人認為，俾斯麥建立的帝國只是部分地實現了真正德意志帝國的構想。他們的聲音起初被勝利的喜悅淹沒了，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持這種觀點的人數逐漸增多。[[10]](#10_1)

俾斯麥1871年為新建立的德意志帝國制定的憲法，在許多方面都遠未達到自由派在1848年所追求的理想。在現代德國的所有憲法中，它是唯一一部沒有表達任何有關人權和公民自由原則的。嚴格說來，新建立的帝國是由獨立的邦國組成的松散邦聯，很像其前身。它名義上的首腦是“Kaiser”（皇帝），此頭銜沿用自神圣羅馬帝國對領袖的稱呼，最早可溯源到拉丁文名字“Caesar”（愷撒）。皇帝大權在握，有權宣戰和停戰。帝國的機構比以前的強大，包括全國選舉出的帝國國會（Reichstag），其名稱源自神圣羅馬帝國，是又一個越過1918年這道革命性分水嶺的舊帝國之遺緒；以及許多中央行政機構，尤其是外交部，機構的數量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不斷增加。但是憲法并未授予國會選舉或者解散政府、解除政府大臣職務的權力，而且政治決策的關鍵部分，特別是宣戰與停戰以及軍隊的管理事務，仍保留在君主及其親信手中。政府各部大臣，包括由俾斯麥設立，并由他任職約20年的文官政府最高首腦“帝國宰相”，均屬于公務員，而不是為黨派服務的政客，并且其效忠的對象是皇帝，而不是人民或者國會議員。國會的影響力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逐漸增強，盡管增幅不是很大。偉大的革命家、思想家卡爾·馬克思（Karl Marx）描述俾斯麥帝國時略帶夸張、用詞晦澀，但他捕捉到了其許多內在的矛盾：“以議會形式粉飾門面、混雜著封建殘余、已經受到資產階級影響、按官僚制度組織起來的軍事專制制度。”[[11]](#11_1)

### 二

軍隊的實力，尤其是普魯士軍官團（Prussian officer corps）的實力，并非僅僅是歷次戰爭的產物，而是源自悠久的歷史傳統。在17和18世紀，擴張中的普魯士王國已經在沿著主要軍事防線進行組織，由著名的容克地主階級與農奴構成的新型封建制度，嚴絲合縫地同軍隊的募兵制度相協調，為軍隊輸送軍官與士兵。[[12]](#12_1)這種募兵制度隨著農奴制的結束而廢除，普魯士軍隊的傳統威望因其在拿破侖戰爭（Napoleonic wars）[\*\*\*](#_63)中節節慘敗而嚴重受損。1848年和1862年，普魯士自由派兩度差點把軍隊收歸國會管轄。俾斯麥于1862年被起用，主要是受命維護普魯士軍官團的自主權，使之免受自由派的干涉。他上臺后立即宣布：“解決當前的種種重大問題，靠的不是演說以及多數票通過的決議——那正是1848年和1849年的重大失誤——而是靠鐵與血。”[[13]](#13_1)俾斯麥說到做到，他策動的1866年戰爭摧毀了漢諾威王國（Kingdom of Hanover），使之并入普魯士；又把奧地利和波希米亞（Bohemia）逐出德意志邦聯，過去數世紀里，這兩個邦國在塑造德國命運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同時通過1870—1871年的普法戰爭，從法國手中掠奪了阿爾薩斯—洛林（Alsace-Lorraine），使之直接處于德意志帝國管轄之下。俾斯麥被稱為“白色革命家”（white revolutionary）[†††](#_64)是不無道理的。[[14]](#14_1)他憑借軍事實力和軍事行動締造了德意志帝國。在此過程中，他無視法統，重新劃定國界，推翻了根深蒂固的傳統，其激進態度與鐵血手段給德國后來的發展之路投下了綿長的陰影。德國從此將武力作為實現政治目標的合法手段，其黷武程度遠遠超出了其他大多數國家的通行做法，除非那些國家有開疆拓土、稱霸世界的打算。政府里和社會上的黷武風氣，在1920年代侵蝕德國的民主制度以及第三帝國登場的過程中，將起到重要作用。

俾斯麥確保了軍隊實質上成為國中之國，擁有可以即時面見皇帝的渠道以及自治權。國會僅僅有權每7年批準一下軍隊的預算[‡‡‡](#_65)，陸軍大臣對軍隊負責，而不是對立法機構負責。軍官享有許多社會特權和其他特權，在街上與平民相遇時，會受到對方的尊重。毫不奇怪，許多資產階級專業人士的志向就是被接納為陸軍預備役軍官；同時，由于實行義務兵役制，民眾對于軍隊的行為規范以及軍人的理想與價值觀已經耳熟能詳。[[15]](#15_1)在緊急情況下，軍隊有權頒布戒嚴令、中止公民自由權，威廉二世統治時期曾相當頻繁地考慮采取此措施，難怪有些歷史學家夸張地描述道，當時的政客和議員們生活在高層政變的永久威脅之下。[[16]](#16_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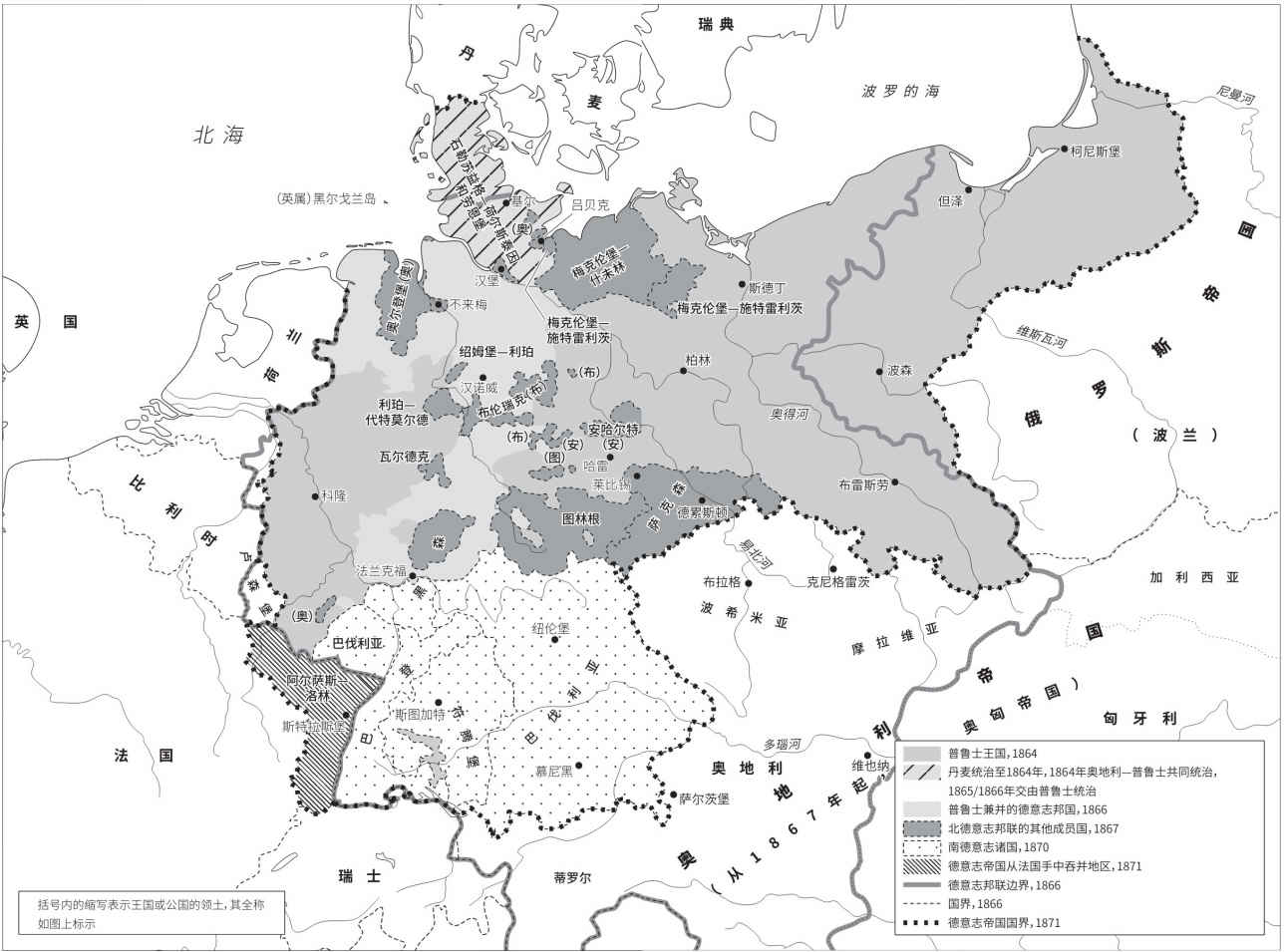
軍隊通過各種方式對社會施加影響，其中對普魯士的影響最為深刻。1871年之后，又通過普魯士的示范作用，間接地影響到德意志帝國的其他邦國。統一戰爭中的輝煌戰績為軍隊贏得了崇高威望。士官——那些服滿義務兵役之后留在軍中，繼續服務數年的士兵——最終離開軍隊時，自動獲得在政府機構就業的權利，這意味著絕大多數警察、郵遞員、鐵路員工以及其他基層公務員都是退伍兵，這些人已在軍隊中被社會化，舉手投足都顯示出習以為常的軍人姿態。警察機關之類的政府機構的規章手冊注重體現軍隊的行為規范，堅決要與公眾保持一定距離，并保證在街頭游行和大規模示威活動中盡可能把人群當作敵軍而不是集會的公民對待。[[17]](#17_1)軍隊的榮譽觀已深入人心，足以保證平民，乃至中產階級始終斗志不衰，盡管俄國和法國的情形也普遍如此。[[18]](#18_1)

隨著時間的推移，軍官團與普魯士貴族階層之間的身份同一性逐漸減弱，軍事貴族集團吸納了草根軍國主義的各種新組織，包括20世紀初的海軍聯盟（Navy League）以及退伍兵俱樂部。[[19]](#19_1)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軍官團的大部分關鍵職位均由專業人士擔任，而貴族階層控制的主要是那些社會地位優越、能滿足虛榮心的傳統領域，比如騎兵和近衛軍；在歐洲其他國家，情形也大致如此。從機槍和帶刺鐵絲網到飛機和坦克，這些軍事新技術的出現推動了軍官團的專業化，但是專業化并未使其更具民主意識。相反，在德軍對殖民地原住民的反抗進行殘酷鎮壓的過程中，其殖民經驗助長了軍官團的軍事自負。[[20]](#20_1)比如，1904年至1907年，在一場蓄意滅絕德屬西南非（今納米比亞［Namibia］）的赫雷羅族（Hereros）的行動中，德軍屠殺了數千名成人和兒童，又將更多數量的人趕入沙漠，任其餓斃于大漠之中。結果是，赫雷羅族人口由交戰前的大約8萬人，銳減至1911年的1.5萬人。[[21]](#21_1)在德意志帝國的占領區，比如1871年從法國手中強占的阿爾薩斯—洛林，德軍的表現常常如同征服者，似乎面對的是一個心懷敵意、難以駕馭的群體。這類行為中最駭人聽聞的幾例，于1913年在國會引發了激烈的辯論，議員們投票通過對政府的不信任案。此舉當然沒能迫使政府下臺，但依然表明了德國社會對于軍隊作用的看法越來越兩極分化。[[22]](#22_1)

在一連串軍事勝利之后，俾斯麥曾經極力控制軍隊更加狂野的沖動，抑制其大規模吞并領土的欲望，但當時很多人都沒有注意到俾斯麥的這種努力；甚至在他1890年被迫辭職之后，還出現了俾斯麥神話——憤憤不平的前宰相及其追隨者也大力為之推波助瀾——說他是一位魅力超凡的領袖，快刀斬斷政治的亂麻，用武力解決了當時的種種重大問題。留在德國公共記憶里的，是俾斯麥于1860年代發動的幾場革命性戰爭，而不是他為了讓德意志帝國站穩腳跟，在隨后20年里極力維持歐洲和平的努力。正如1944年抵制希特勒的保守派領袖、外交官烏爾里希·馮·哈塞爾（Ulrich von Hassell）在造訪位于腓特烈斯魯厄（Friedrichsruh）的俾斯麥故居后，于日記中所言：

令人遺憾的是，德國人自己所創造的俾斯麥形象竟然最為錯謬，我們把他描繪成崇尚暴力的專制政客，幼稚地為終于有人把德國重新推上舉足輕重的地位而欣喜。其實，他的卓越天賦在于高超的外交技巧和克制持中的氣度。他對于如何贏得世界的信任有獨特的理解，而當今之德國恰恰在背其道而馳。[[23]](#23_1)

獨裁領袖的神話并不是德意志性格中某個古老的、根深蒂固的方面的表達，而是一種近代產物。



地圖1　德國的統一，1864—1871年

此神話在20世紀初又被這樣一種公共記憶所強化：俾斯麥對待那些他所認為的帝國內部的敵人毫不手軟。教宗為了加強對天主教教區的控制，分別于1864年和1871年頒布《謬論舉要》（Syllabus of Errors）和《教宗無誤論宣言》（Declaration of Papal Infallibility）。俾斯麥在1870年代對此予以反擊，啟動了被自由派稱為“文化斗爭”的一系列法律和警察措施，旨在將天主教會置于普魯士政府的控制之下。新法律要求天主教教士在國有機構接受培訓，并申請由政府頒發的圣職委任書，但天主教教士拒絕遵從這樣的法律。不久，那些違反新法律者遭到了警察的跟蹤、逮捕和監禁。到1870年代中期，989個教區無人主持，225位牧師被監禁，除了與護理有關的修會之外，所有其他天主教修會均遭查禁，2位大主教和3位主教被免職，被監禁9個月的特里爾主教（Bishop of Trier）在獲釋后不久死去。[[24]](#24_1)更加令人不安的是，這種針對帝國大約40%人口的對公民自由權的大規模侵犯，受到了德國自由派的歡呼，他們認為天主教對文明的威脅，已經嚴重到應被施以上述極端手段的程度。

斗爭終于平息，天主教教會自此成了自由主義和現代思想的怨敵；它決心證明自己對國家的忠誠，主要是通過當初為保護自己免受迫害而組建的政黨，即所謂的中央黨（Centre Party）。但是輸誠尚未完成，俾斯麥就以《反社會黨人法》（Anti-Socialist Law）再次向公民自由權出擊，該法于1878年在老皇帝威廉一世（Wilhelm I）兩度遇刺之后由帝國國會通過。實際上，羽翼未豐的德國社會黨人運動與暗殺未遂的刺客毫無關系，它是守法組織，主張通過議會道路掌握政權。然而，當被曉以國家利益的大義時，自由派再一次被說服，拋棄了自由主義的原則。于是社會黨人的集會被取締，社會黨人的報刊被查禁，社會主義政黨被定為非法。原先在普魯士以及德意志的其他主要邦國暫停使用的死刑被恢復。對社會黨人的大規模逮捕和監禁隨之而來。[[25]](#25_1)

如果說《反社會黨人法》產生了什么后果的話，那就是它比與天主教會做斗爭的法律具有更加深遠的影響。與后者一樣，它也根本未能實現其直接目的——鎮壓假想的“帝國的敵人”。法律不能禁止社會黨人以個人身份參加國會選舉，而且由于德國工業化步伐的加快以及產業工人階級人數空前迅速的增長，參加競選的社會黨人贏得的選票份額日益增多。《反社會黨人法》于1890年期滿失效之后，社會黨人重新組織起來，借德國社會民主黨（Social Democratic Party of Germany）重整旗鼓，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黨員人數已超過100萬，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政治組織。盡管選舉制度使保守的鄉村選區具有先天優勢，但在1912年的選舉中，社會民主黨贏得的席位超過中央黨，成為國會中的第一大黨。《反社會黨人法》的鎮壓，促成了社會民主黨的左傾，從1890年代初開始，該黨堅持一種僵化的馬克思主義教條，認為現有的教會制度、國家制度和社會制度，從君主制和軍官團到大企業和證券市場，都將在一場締造社會主義共和國的無產階級革命中被推翻。自由派對《反社會黨人法》的支持，導致社會民主黨不信任一切“資產階級”政黨，拒絕與資本主義的政治支持者合作，拒絕與被他們視為只想治標不治本地改良現有政治制度的人合作。[[26]](#26_1)社會民主黨發動的運動聲勢浩大、紀律嚴明、不容異見，而且似乎勢不可擋地朝著贏得大選的目標挺進，這讓溫文爾雅的中產階級和上層人士膽戰心驚。社會民主黨與一切“資產階級”政黨之間裂開一道鴻溝，這種無法彌合的政治分歧將一直持續到1920年代，并在那場最終導致納粹掌權的危機中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

但同時，社會民主黨決定盡其所能始終在法律許可范圍內活動，不給常常威脅要恢復取締令的官方提供任何口實。據說列寧曾經以他罕有的、一閃而逝的幽默口吻評論道，德國社會民主黨人永遠不可能在德國發動一場成功的革命，因為他們去襲擊火車站時，首先會秩序井然地排隊購買站臺票。該黨已養成習慣坐等時機出現，而不是采取行動去制造機會。其包括文化機關、報刊、酒館食肆、體育俱樂部以及教育機構的龐大而精密的組織結構適時出現，既為黨員提供了一整套生活方式，也構成了黨內極少有人愿意打破的一套既得利益。作為一個守法組織，社會民主黨相信法庭可以阻止政治迫害，但即使是在1890年之后，始終守法也不易做到，因為警察的小花招受到保守派法官和檢察官以及法庭的支持，法庭依然視社會民主黨人為危險的革命者。到1914年，社會民主黨的發言人或黨報編輯幾乎沒有誰沒坐過幾次牢，罪名是冒犯君主或者侮辱政府官員；根據法律，批評君主或警察屬于犯罪，就連批評那些維持國家運行的公務員也算犯罪。在1914年之前，打擊社會民主黨人成了整整一代法官、州檢察官、警察頭子和政府官員的事業。這些人，以及支持他們的中產階級和上層人士中的大多數，從未承認社會民主黨的活動為合法的政治運動。在他們眼中，法律的作用是維護現有的國家制度和社會制度，而不是在對立的政治派別之間擔當中立的裁判者。[[27]](#27_1)

自由派對此當然無能為力，他們自身就在19世紀八九十年代失去了大量選票和議席，雖然他們設法在德國的鄉鎮和城市中留住了許多支持者。自由派的主要問題在于，他們在19世紀晚期一再分裂，甚至在更為左傾的派別于1910年再次聯合之后，自由派依然分屬兩個主流政黨——民族自由黨（National Liberals）和進步黨（Progressives），二者的分歧可追溯到后者不肯原諒俾斯麥在1860年代不經國會批準就在普魯士征稅的做法。不過，政治光譜中的右翼也同樣呈分裂狀態。保守黨（Conservative Party）不是一個，而是有兩個，因為那些在1871年支持俾斯麥把普魯士的各種自主特權收歸帝國相關機構的人，一直保留著所謂“自由保守黨”的獨立身份，而極端保守的普魯士貴族（容克階級）對俾斯麥的這一做法則深惡痛絕。而且，這兩個德意志北方政黨的多數黨員信奉基督教新教，他們還不得不與一個更大的右翼政黨中央黨相抗衡。中央黨對社會福利的倡導以及對德國在非洲的殖民統治所持的批評態度，沖淡了它反對現代主義以及支持德意志帝國的立場。因此在1914年之前，德國的主流政黨不是兩個，而是六個，即社會民主黨、兩個自由派政黨、保守黨的兩個派別，以及中央黨，這與其他現象共同反映了德國社會由地域、宗教和社會等級所造成的多重分裂。[[28]](#28_1)德意志帝國的行政機構大權在握，并且不直接對立法機構負責，在這種國情下，政黨的分裂狀態削弱了政黨政治在國家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可能性。

### 三

上述對立政黨之間的競爭，不但沒有引起普遍的政治幻滅感，反而促使政治氣氛逐漸升溫，直至1914年達到極其狂熱的程度。在國會選舉中，男性普選權以不記名投票和嚴格規定的選舉程序為后盾，這使選民對選舉制度產生了信心。在1912年的國會選舉中，具備選民資格者的投票率達到了驚人的85%。[[29]](#29_1)全部證據都顯示，選民對待其義務是嚴肅的。德意志帝國憲法規定，國會選舉采用比例代表制，因此經常需要進行二次投票以決勝負，遇到這種情況時，選民們會慎重考慮如何兼顧自己的思想立場與政治大局。在法律的規定與保障下，選舉制度為民主辯論開辟了空間，讓數百萬持不同政治立場的德國人相信，政治屬于人民。[[30]](#30_1)而且德意志帝國的日報幾乎全部帶有政治色彩，各家報紙都毫不隱諱地與某個黨派緊密關聯，把該黨派的觀點放進所發表的幾乎每篇文章里。[[31]](#31_1)政治不僅是精英階層和中產階級的主要談資，也是工人階級出沒的酒館食肆里的重點話題，甚至支配著民眾對消遣活動的選擇。[[32]](#32_1)

進入20世紀之后，政治討論與政治辯論的題目逐漸轉入德國在歐洲和世界的地位。德國人越來越意識到，俾斯麥所創建的帝國在很多方面還未完成。首先，帝國境內存在大量的少數族裔和非主流文化群體，這是過去數世紀里國家擴張和民族沖突的遺留問題。北方有丹麥人，阿爾薩斯—洛林有法語人口，德國中部有一小支屬于斯拉夫語族的索布人（Sorbs），但最重要的是，有數百萬波蘭人居住在18世紀被普魯士吞并的波蘭王國（Kingdom of Poland）的部分舊地。在俾斯麥主政期間，德國就已經不斷設法讓這些少數族裔歸化德意志民族——禁止他們在學校使用本民族語言，積極鼓勵德意志族裔到那些地區定居。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德語已在帝國全境成為公共會議的法定語言，政府還以剝奪波蘭人基本經濟權利的方式修改了土地法。[[33]](#33_1)僅有極少數的德意志人認為，少數民族理應受到與多數民族同等的尊重，而且持此觀點者的數量也在逐漸減少。在1914年以前，甚至社會民主黨人也認為俄國和斯拉夫語族的東部地區是落后野蠻之地，他們對德國境內講波蘭語的工人組織起來的維權行動幾乎一點也不同情。[[34]](#34_1)

放眼德國和歐洲以外的廣闊世界時，俾斯麥之后的歷任帝國宰相都將本國視為遜于英國和法國的二流國家，因為英法兩國均擁有分布在全球各地的大片海外帝國。作為海外殖民的遲到者，德國只能揀拾那些占得先機的歐洲殖民列強留下的殘羹剩飯。坦噶尼喀（Tanganyika）[§§§](#SSSSSS_1)、納米比亞、多哥蘭（Togoland）[¶¶¶](#PPP_1)、喀麥隆（Cameroon）、新幾內亞（New Guinea）、太平洋諸島和中國的通商口岸膠州灣，幾乎構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德意志海外帝國的全部版圖。俾斯麥曾認為它們無足輕重，極其勉強地同意接收這些地方。但其繼任者卻另有見解，他們認為德國在世界上的聲望與地位需要1890年代末擔任外交大臣，后來出任帝國宰相至1909年的伯恩哈德·馮·比洛（Bernhard von Bülow）所說的一個“太陽下的位置”。此構想的執行，是以組建一支大型艦隊為開端的，艦隊的長期目標是從坐擁世界最大海外帝國的英國手中奪取租界地，方法是恫嚇對方，甚至在北海（North Sea）發動一場大規模海戰，重創或摧毀英國海軍的主力。[[35]](#35_1)

闡述這些越來越野心勃勃的世界強權之夢的，主要是那位夸夸其談、自命不凡、喋喋不休的德皇威廉二世，他幾乎不放過任何機會來表達自己對民主和人權之蔑視、對他人觀點之不屑，以及對德意志大國地位之信心。像他的許多崇拜者一樣，威廉二世成長于德國統一之后的年代，不甚了解俾斯麥在1871年實現統一之前所走過的動蕩不安、充滿危險的道路。受與他同時代的普魯士歷史學家的影響，威廉二世以為整個統一進程是歷史的必然，而根本不明白俾斯麥在19世紀七八十年代之所以采取極其謹慎的外交政策，正是出于對德國未來的深切憂慮。不可否認，威廉二世的脾氣秉性過于反復無常、變幻莫測，以致處理國家事務時無法保持真正的連貫性；政府各部門的大臣常常發現，他們所做的工作是在消解他的影響，而不是在執行他的意志。威廉二世常常自詡為德國所需要的偉大領袖，結果反而讓人們注意到了他在這方面的缺陷。他的自我標榜還起到了另外一個作用——人們對俾斯麥式魄力與詭道的追慕，營造了俾斯麥神話。許多德國人開始將二者做對比：俾斯麥無視道德標準、冷酷無情，完全是政治家做派，為達目的不擇手段，說一套做一套，或者準備做一套；而威廉二世則魯莽沖動、夸夸其談、思慮欠周、有勇無謀。[[36]](#36_1)

除了人物性格以外，俾斯麥締造的德意志帝國所具有的全部特征，或多或少也可見于其他國家。在意大利，魅力型領袖的典范加里波第（Garibaldi）[\*\*\*\*](#_66)領導民間力量幫助國家于1859年實現統一，為后來的獨裁者墨索里尼樹立了榜樣。在西班牙，軍隊受政治操控的程度不亞于德國。在意大利，軍隊與德國一樣聽命于最高統治者，而不受議會控制。在奧匈帝國（Austria-Hungary），行政部門與德國的一樣強大，而立法機構的權力甚至比德國的更有限。在法國，教會與政府之間沖突的激烈程度，并不比德國政教沖突在“文化斗爭”中的狂暴表現遜色多少。在俄國，與“帝國”等同的理念也被運用于處理國內政治以及與鄰國的關系中。[[37]](#37_1)俄國的沙皇政權鎮壓社會主義者的手段甚至比德國當局更加嚴厲，強迫其統治下數百萬波蘭人歸化的力度也絲毫不遜于德國當局。無論自由主義的定義是什么，它在1914年之前的東歐和中歐各主要國家都是弱勢的，而不是僅僅在德意志帝國如此。意大利政壇比德國政壇更加四分五裂。歐洲列強普遍認為，戰爭是實現政治目標，尤其是締造一個陸上帝國的正當途徑，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異常清晰地展示了這種邏輯。在整個歐洲大陸，方興未艾的民主力量威脅著保守派精英的統治地位。19世紀末20世紀初是民族主義的時代，不僅在德國如此，在歐洲全境也是一樣，“群眾性民族主義運動”同樣發生在其他許多國家。[[38]](#38_1)

不過，沒有哪個歐洲國家能像德國那樣同時具備上述所有條件，并且達到同等程度。而且德國并不是一個普通的歐洲國家，歷史學家已有許多著述，描述了德國當時各種所謂的落后方面——公民價值觀的缺失、過時的社會結構、懦弱的中產階級，以及新型的封建貴族。但當時大多數人并不這樣看。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德國早已是歐洲大陸最富裕、最強大、最先進的經濟體。在戰前的最后幾年和平歲月里，德國的鋼產量占歐陸的三分之二，煤炭和褐煤占歐陸的二分之一，電力比英國、法國和意大利加起來還多20%。[[39]](#39_1)截至1914年，德意志帝國擁有大約6,700萬人口，它所掌控的人力資源遠遠超過除俄國之外的任何歐洲強國；與之相比，英國、法國和奧匈帝國當時各自擁有4,000萬至5,000萬人口。在諸如化工、制藥和電力等最現代的產業中，德國均居于世界領先水平。在農業領域，1914年之前，人工化肥和農用機械的大規模使用，改善了德國北部和東部的土地利用率。舉例來說，當時德國出產的土豆占全球產量的三分之一。進入20世紀之際，德國人的生活水平飛速提高——假如不是在20世紀之前就已如此的話。德國的大型工業企業均以產品質量享譽全球，比如克虜伯（Krupp）和蒂森（Thyssen）、西門子（Siemens）和AEG、赫斯特（Hoechst）和巴斯夫（BASF）等。[[40]](#40_1)

一戰結束之際，很多人心懷眷戀地回顧往昔歲月，覺得1914年之前的德國猶如一個和平、繁榮、社會和諧的安樂之鄉。然而在繁榮與自信的外表下，它其實緊張不安、前途未卜，飽受內部矛盾的困擾。[[41]](#41)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遷的快節奏，令許多人感到恐懼和困惑。舊有的價值觀似乎正在消逝，讓位于實利主義與狂妄野心的大雜燴。現代主義文化，從抽象畫到無調性音樂，加深了某些社會領域中的迷失感。[[42]](#42)德國社會遽然進入現代時期，普魯士土地貴族世代承襲的統治地位被削弱，而那曾是俾斯麥極力維護的傳統。到1914年之前，資產階級的價值觀、習慣和行為模式已贏得上流社會和中產階級的認同，但卻遭到越來越自負的產業工人階級的抵制，這些產業工人已在社會民主黨發動的大規模勞工運動中被組織起來。不同于其他歐洲國家，德意志民族國家的建立時間，不是在工業革命之前，而是在工業革命的巔峰期；德意志帝國不是建基于單一國家之上，而是由許多不同邦國組成的邦聯，各邦國中的德意志公民主要因為共同的語言、文化和民族而維系在一起。關于德意志邦國和國家的性質，以及它們在更廣闊的歐洲和世界中的位置，存在著各種互相沖突的觀點，這些觀點與高速工業化所引起的壓力和緊張感交織在一起，因此德國社會并不是在一種完全穩定的條件下于1871年進入民族國家的。迅速加劇的內部沖突日益蔓延，與俾斯麥所創政治制度中不曾解決的矛盾交匯到一起，造成了德國社會的四分五裂。[[43]](#43)上述矛盾在甚囂塵上的民族主義里找到了釋放的渠道，這種民族主義混雜著立場強硬得令人驚駭的種族主義和反猶主義，給德國的未來埋下了隱患。

[\*](#_47) 開明專制（Enlightened Absolutism），受法國啟蒙運動思想家伏爾泰的開明君主制理論影響，普魯士國王腓特烈二世（Friedrich II，1712—1786）在位期間（1740—1786）執行的一種政策，包括奉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以寬容開放的態度對待移民和宗教少數派等。

[†](#_48) 容克（Junker），普魯士貴族地主階級，德文本意為“貴族之子”，中文通常譯作“容克地主”。起源于12世紀；自16世紀起有權向領地內的農民征收勞役地租、行使警察權和審判權，并長期壟斷軍政要職；19世紀中葉開始成為資本主義化的半封建性貴族地主；二戰后逐漸不再作為一個階級而存在。

[‡](#_49) 饑餓的四十年代（Hungry Forties），1840年代中期歐洲因馬鈴薯歉收而導致的大饑荒。

[§](#SS_2) 議會主權（parliamentary sovereignty），亦稱議會至上原則（parliamentary supremacy）或立法至上原則（legislative supremacy），是一些議會民主制國家（如英國）憲法中規定的原則——作為立法機構的議會擁有最高的國家權力，高于行政機構和司法機構，議會有權修改或廢除任何成文法，其他機構無權廢除議會制定的法律或者宣布其無效。這有別于另一些民主制國家（如美國）所遵循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機構互相制衡的三權分立原則。

[¶](#P_2) 本杰明·迪斯雷利（1804—1881），英國首相（1868；1874—1880）。

[\*\*](#_50) 拿破侖三世（1808—1873），即路易—拿破侖·波拿巴，拿破侖之侄，1848年當選法蘭西第二共和國總統，1851年發動政變，成為法國皇帝（1852—1870）。

[††](#_51) 加富爾伯爵（1810—1861），即卡米洛·奔索（Camilo Benso），意大利王國的首任首相兼外交大臣（1861）。

[‡‡](#_52) 即1866年的普奧戰爭（Austro-Prussian War）。

[§§](#SSSS_2) 色當，位于法國東北部，1870年普軍在此打敗拿破侖三世率領的法軍，為進軍巴黎開辟了道路。

[¶¶](#PP_2) 原文“succeed”在此為雙關語，既指“成功”，也有“繼承”神圣羅馬帝國之意。

[\*\*\*](#_53) 拿破侖戰爭（1803—1815），法國在拿破侖率領下，與奧地利、俄國、普魯士、英國、葡萄牙等歐洲國家組成的反法聯盟之間進行的一系列戰爭，以法軍在滑鐵盧戰敗而告終。

[†††](#_54) 白色革命家，指俾斯麥以革命的手段實現保守主義（即“白色”）的目標。

[‡‡‡](#_55) 1874年德意志帝國國會批準俾斯麥提出的“七年期限法”，規定常備軍兵員和軍費7年不變，國會由此喪失了審批軍事預算的權力。1880年和1887年俾斯麥又提出第二和第三個“七年期限法”，均得到國會批準。

[§§§](#SSSSSS) 坦噶尼喀，位于東非，是現在坦桑尼亞（Tanzania）的一部分。

[¶¶¶](#PPP) 多哥蘭，位于西非，東部為現在的多哥（Togo），西部為現在加納（Ghana）的一部分。

[\*\*\*\*](#_56) 朱塞佩·加里波第（1807—1882），意大利統一運動領導人之一。1860—1861年，他領導由志愿者組成的“紅衫軍”從西班牙手中收復西西里島和意大利南部，對意大利的統一起了關鍵作用。

## 第二節 宣揚仇恨

### 一

1889年歲末，柏林（Berlin）的一位小學校長赫爾曼·阿爾瓦特（Hermann Ahlwardt）陷入了財務窘境。1846年生于波美拉尼亞（Pomerania）一個貧困家庭的阿爾瓦特，發現自己在普魯士教育系統底層任職所掙到的薪水過于微薄，不夠支付他那高昂的日常花銷。情急之下，他犯罪了，從學校為孩子們募集的圣誕晚會經費中偷了錢，干這種勾當簡直是故意要讓他的上司們難堪。劣跡很快敗露，他被解雇，失去了最后的收入來源。出了這種丑聞，很多人會崩潰，會內疚悔恨得無地自容，可是赫爾曼·阿爾瓦特不會。“校長”——不久他就以此稱號被公眾所知——決定主動出擊，四處為自己的不幸尋找罪魁禍首，很快他就盯上了猶太人。[[44]](#44)

當時的德國猶太人是文化高度適應的成功群體，與其他德國人的區別主要在于宗教信仰。[[45]](#45)在19世紀，針對非基督徒實行的“褫奪公權”（civil disabilities）法規在德意志各邦國里逐漸被廢除，其他國家也取消了正式的宗教歧視，例如英國是通過1829年的“天主教解放”[\*](#_91)實現的。最后的法律障礙也隨著1871年的德國統一而被掃除，非基督徒充分獲得了平等的法律權利。由于德國全境已用公證結婚[†](#_92)取代了宗教儀式，猶太人與基督徒通婚的人數開始迅速增加。以布雷斯勞市（Breslau，今波蘭城市弗羅茨瓦夫［Wrocław］的德語名稱）為例，到1915年，每100對夫妻雙方都是猶太人的婚姻，相應就有35對猶太人與基督徒的婚姻，與之形成對照的是，在1870年代末，猶太人與基督徒通婚只占9對。在猶太人與基督徒締結的婚姻中，基督徒伴侶極少出身于改信基督教的猶太家庭，而且這種婚姻存在于社會各階層。1914年，柏林有19%的猶太男性和13%的猶太女性與基督徒伴侶結婚。1905年前后，杜塞爾多夫市（Düsseldorf）所有已婚猶太人中，有四分之一伴侶是基督徒，至1914年這個比例增加到三分之一。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每100對純猶太人婚姻，就相應有38對猶太人與基督徒締結的婚姻；漢堡市的數字高達73對。轉信基督教的猶太人也越來越多，在19世紀前70年里有11,000位，后30年里有11,500位。1880年至1919年，大約2萬德國猶太人受過洗禮。上述成果逐漸消解了猶太群體作為一個封閉宗教團體的身份特征。[[46]](#46)

約有60萬虔誠的猶太教徒生活在德意志帝國，在以基督徒為主的社會中，他們是一個極小的宗教少數派群體，占總人口的1%左右。猶太人被排除在擁有土地等傳統的財富來源之外已達數世紀之久，始終不屬于帝國體制內的任何階層，因為無形的社會歧視依然拒絕他們在重要機構里占有一席之地，比如軍隊、大學和行政部門的高層；事實上，在1890年代和1900年代，這些機構中的猶太人比例是下降的。[[47]](#47)改信基督教的猶太人在日常生活中吃盡了反猶主義的苦頭，于是他們中的許多人改用更像基督徒的名字。[[48]](#48)在19世紀，多達10萬的德國猶太人為擺脫歧視而選擇了移民，主要是去美國；但多數人選擇留了下來，尤其是鑒于19世紀末德國經濟開始蓬勃發展。留在德國的猶太人聚居在較大的鄉鎮和城市，1910年時，其中四分之一住在柏林，而到1933年，德國將近三分之一的猶太人都在柏林。他們在這些城市里聚居于特定的區域：1885年，近半數的漢堡猶太人住在中產階級聚居的兩個區——哈維斯特胡德（Harvestehude）和羅森伯姆（Rotherbaum）；1900年，近三分之二的法蘭克福猶太人住在14個行政區中的4個區里；到1925年，70%的柏林猶太人住在市中心和西部的5個區，其中絕大多數是中產階級。1871年，即使在猶太人口最多的城市——柏林、布雷斯勞和法蘭克福，他們也只是極少數群體，占當地人口的比例分別不超過4.3%、6.4%和7.1%。[[49]](#49)

許多猶太人都在商界以及各個專業領域找到了立足之地。除了銀行業巨頭羅斯柴爾德家族（Rothschilds）之外，猶太人開辦的重要金融機構還有很多，比如布萊希羅德（Bleichröder）的銀行，俾斯麥就是委托這家銀行為自己管理私人財務的。[[50]](#50)一戰前夕德國約有200家百貨商店，這種新型零售業的業主通常是猶太人，比如蒂茨（Tietz）家族或者韋特海姆（Wertheim）兄弟。[[51]](#51)猶太男性在醫學、法律、科學研究、高等教育、新聞和藝術等領域，均有出類拔萃的代表人物。[[52]](#52)猶太族裔由原先受排斥的少數派宗教群體，慢慢融入了一個文化日趨多元的社會，與許多其他少數族群，比如波蘭人、丹麥人、阿爾薩斯人、索布人等等一起，成為少數民族的一員。像其他族群一樣，猶太人也有自己的越來越世俗化的代表機構，特別是創立于1893年的猶太教德國公民中央協會（Central Association of German Citizens of the Jewish Faith）。然而不同于大多數其他族群，猶太人普遍是經濟上的成功者，他們不組建自己的政黨，而傾向于加入主流政黨，尤其是政治光譜中的左翼和中間派政黨，有時還在其中擔任領導職務。大多數猶太人強烈認同德意志民族主義，如果說自由派政黨對他們特別有吸引力的話，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這些政黨毫不含糊地支持建立統一的德意志民族國家。[[53]](#53)因此，總體來說，猶太人在19世紀晚期所走的道路是成功的，而且猶太人與社會、文化和經濟領域中最現代、最前沿的發展有著最為緊密的關聯。[[54]](#54)

正是由于上述發展，猶太人成了赫爾曼·阿爾瓦特那類心懷不滿的無良煽動家的攻擊目標。在那些失意者和失敗者看來，猶太人代表著文化、經濟和社會的現代性，而他們自己則被工業化巨輪推到了邊緣；他們一心向往更加簡單、更有秩序、更有保障、更加等級分明的社會——那種他們以為在并不遙遠的往昔曾經存在過的社會。最能體現這種心態的，恰恰是阿爾瓦特所居住的城市——柏林。伴隨帝國建立時的狂喜氛圍而來的那輪消費與投資熱潮于1873年驟然停止，重創了柏林的經濟。美國的鐵路投資失敗所引發的一場全球性經濟蕭條，在德國造成了大量破產和企業倒閉，小企業和小作坊受到的打擊尤為嚴重。那些損失慘重的人并不明白，破壞其生計的是更大范圍的力量，于是輕信了天主教和保守派記者的說法，認為猶太金融家是罪魁禍首。

隨著蕭條的繼續，法庭牧師阿道夫·施托克爾（Adolf Stöcker）加入了記者們的口誅筆伐。出身寒微的施托克爾，以從社會民主思潮的影響下贏回工人階級為使命，組建了基督教社會黨（Christian Social Party），直截了當地以反猶主義政綱參加1880年代的競選。這項新事業得到了馬克斯·利伯曼·馮·松嫩貝格（Max Liebermann von Sonnenberg）的支持，他在1880年協助組織了一次全國范圍的請愿，要求免除猶太人的公職。尤為極端的是恩斯特·亨里齊（Ernst Henrici），他激烈的言辭在波美拉尼亞地區的新斯德丁鎮（Neustettin）[‡](#_93)引起了騷亂，最終導致當地的猶太會堂被焚燒。赫爾曼·阿爾瓦特在1880年代末受到吸引而投身其中的正是這場運動，他寫了一本書洗刷自己的恥辱，將財運不濟歸咎于猶太放貸者的詭計，并暗示說猶太人在德國社會中無所不能。不走運的是，阿爾瓦特用作證據來指控猶太銀行家格爾松·馮·布萊希羅德（Gerson von Bleichröder）收買德國政府的文件，被發現是阿爾瓦特自己偽造的，他因此被判4個月徒刑。剛一獲釋，阿爾瓦特就再次無中生有地炮制出一套聳人聽聞的指控，這次他宣稱，一家猶太軍火制造商故意為德軍供應有缺陷的步槍，目的是進一步實施法國與猶太人之間的陰謀，削弱德國軍隊的作戰效力。可想而知，這些指控又為阿爾瓦特換來了刑期，這一次是5個月。[[55]](#55)

但阿爾瓦特并未入獄服刑。因為與此同時，他成功地說服了勃蘭登堡（Brandenburg）某個偏遠鄉村選區的農民將他選為國會[§](#SS_5)議員。阿爾瓦特奔走于田間地頭，告訴農民，導致他們不幸的是猶太人，就是那個他們所知甚少、住在遙遠的大城鎮以及歐洲和帝國的金融中心的宗教少數派；盡管事實上，農民的經濟損失是由全球性的農產品價格低迷造成的。位列國會使阿爾瓦特享有了議員豁免權[¶](#P_5)。他的成功證明了這種煽動對于吸引農村選民是有效的，確實，其他一些反猶主義者也成功當選，比如黑森（Hessen）的圖書管理員奧托·伯克爾（Otto Böckel），他主要靠的是為農民提出具體辦法，例如成立合作組織幫他們克服經濟困難。到1890年代初，德國保守黨認為，反猶主義者已對保守黨在農村地區的競選支配權構成嚴重威脅，因此當他們驚覺政府的某項政策有可能進一步損害農民的利益時，即在1893年該黨的蒂沃利（Tivoli）會議上投票通過在黨章中增加了一項要求——為抗擊“猶太影響力對德國民生的廣泛干擾與侵蝕”而戰。[[56]](#56)

這后來被證明是德國形形色色政治反猶主義的一個命運轉折點。雖然另一位反猶主義煽動家特奧多爾·弗里奇（Theodor Fritsch）曾認真地嘗試各股反猶主義政治勢力整合起來，并且把不滿意經濟狀況的城市中下階層吸引到這場運動中來，然而伯克爾那類以自我為中心的人妨礙了任何真正聯合的實現，反猶主義陣營因內訌而四分五裂。弗里奇轉而以另一種方式發揮其影響力，他繼續發表大量反猶主義的通俗讀物，直到他1933年9月去世以后，這些小冊子還被廣泛閱讀。弗里奇去世前是國會中的納粹黨議員，但在一戰前的幾年里，他始終屬于邊緣型政治人物。到20世紀初，柏林基督教社會黨與保守黨的實際結盟，遏制了反猶主義陣營的勢頭；而且中央黨自發地操起與之類似的反猶論調，也妨礙了反猶主義陣營在天主教地區的發展。伯克爾和阿爾瓦特這類非常規上位者失去了國會席位，他們的黨也漸漸淡出政壇、歸于烏有，隨之而散的還有弗里奇那樣的反猶主義者以城市為基礎建立的組織。阿爾瓦特本人言語兇橫，甚至與其他反猶主義者也格格不入。他去美國待了一段時間，回國后即致力于與共濟會（Freemasonry）之邪惡做斗爭。1909年他再次入獄，這一次是因為敲詐勒索。顯然，持續的財務困境已經迫使他嘗試比以前更直接的犯罪手法了。最終，有點兒虎頭蛇尾的是，阿爾瓦特于1914年死于交通事故。[[57]](#57)

### 二

阿爾瓦特是個偏執的人，然而在某些方面，他可謂一種新式反猶主義的典型代表，代表了19世紀行將結束之際出現于德國以及歐洲其他地方的那種反猶主義。傳統的反猶主義針對的是猶太人的非基督宗教，這種觀點的政治權力來源于圣經的支持。《新約》將基督之死歸咎于猶太人，宣判他們永世遭受譴責，因為他們心甘情愿讓基督的血歸到他們和他們的子孫身上。[\*\*](#_94)在一個由基督教信條和基督教機構統治的社會中，作為非基督徒的猶太人屬于少數派，在出現危機時顯然易于成為民眾的泄憤對象。比如14世紀中期黑死病[††](#_95)肆虐之時，全歐洲狂怒的暴民將如此之多的人口死亡歸咎于猶太人，并采取了無數充滿暴力與破壞力的報復行動。德國現代反猶主義的歷史始于法庭牧師阿道夫·施托克爾，這絕非偶然的現象。基督徒對猶太人的敵意，為現代反猶主義提供了一個至關重要的平臺，主要因為基督教本身常常帶有強烈的種族偏見成分，并被以各種方式納入種族反猶主義。然而到19世紀晚期，基督宗教相關的反猶主義變得越來越過時——至少在以最純粹、最傳統的形式出現時如此。尤其因為猶太人不再是一個易于辨識的宗教少數派，并且開始通過改信基督教以及與基督徒通婚而加快步伐融入基督徒的社會。1870年代，當中下階層的煽動家和蹩腳文人為自己的經濟困境尋找替罪羊、把矛頭轉向猶太人時，他們是將猶太人當作種族少數派，而不是宗教少數派的；他們開始主張將猶太人全面排除在德國社會之外，而不是讓猶太人全面歸化德國社會。[[58]](#58)

這種從宗教反猶到種族反猶的轉變，大體上要歸功于——如果“功”是恰當字眼的話——默默無聞的作家威廉·馬爾（Wilhelm Marr），他在1873年的小冊子《猶太勢力戰勝德意志勢力：無教派者的觀點》（The Victory of Jewdom over Germandom: Viewed from a Non-confessional Standpoint）最早提出種族反猶主義，正如他后來在一部作品中所言：“我絕不會在此大談宗教偏見，因為這是種族問題，因為差異在于‘血統’。”[[59]](#59)借用了法國種族主義者約瑟夫·阿瑟·德·戈比諾伯爵（Count Joseph Arthur de Gobineau）的時髦理論，馬爾沒有把猶太人與基督徒做對比，而是與日耳曼人做對比，堅稱二者是截然不同的種族。他宣稱，猶太人在種族較量中已占上風，并實際上管理著德國，因此難怪誠實的日耳曼手藝人和小企業主正在遭受痛苦。馬爾進而創造出“反猶主義”（antisemitism）這個詞，并在1879年組建反猶主義者同盟（League of Antisemites），它是世界上首個在名稱中使用“反猶”一詞的組織。按照他的說法，該組織的宗旨是減少猶太人對日耳曼人生活的影響。馬爾的作品表達了末世般的悲觀情緒，他在自撰的“新約”中宣稱：“猶太問題是軸心，世界歷史的車輪圍繞著它轉動，”接著，他沮喪地寫下自己的觀點，“我們在社會、商業和工業領域的發展，全部建立在猶太世界觀之上。”[[60]](#60)

馬爾的絕望，其實源自他個人的境況。長期處于財務窘境的他，在1870年代的金融危機中雪上加霜。他的第二任妻子是位猶太人，她一直在經濟上支持著他，直到1874年去世。他的第三任妻子有一半猶太血統，他們的婚姻短暫而糟糕，后來以離婚收場。馬爾認為自己之所以缺錢，某種程度上要歸咎于她，因為他不得不付給她一大筆錢撫養孩子。馬爾大膽地從私人體驗中提煉出世界歷史的一般規律：種族純凈是可貴的，而種族融合則注定造成災難。考慮到馬爾的反猶主義這些非常私人化的緣起，也就不難理解他為什么沒有深入、活躍地投身政治了。反猶主義者同盟以失敗收場，馬爾拒不支持各種反猶主義政黨，認為它們過于保守。[[61]](#61)然而他所鼓吹的新型種族反猶主義，很快得到其他許多作家的響應。比如，革命者歐根·杜林（Eugen Dühring）將資本主義與猶太人畫等號，認為社會主義必須致力于清除猶太人在金融和政治領域的影響力。民族主義歷史學家海因里希·馮·特賴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認為猶太人正在破壞德國文化，他到處散布“猶太人是我們的不幸”，這句話在隨后幾年里成了許多反猶主義者的口號，包括納粹黨徒。這些作家遠不是赫爾曼·阿爾瓦特所代表的那類邊緣人物。比如，歐根·杜林對社會主義運動產生了相當強大的影響，導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在1878年寫下了那本著名的《反杜林論》（Anti-Dühring），成功地壓制了杜林在社會主義工人運動中的影響力。在19世紀出版的所有德國歷史著作中，海因里希·馮·特賴奇克的作品是讀者最多的書之一。特賴奇克對他眼中猶太人的實利主義與不誠實所做的抨擊，引起了他在柏林的教授同事們的大規模反擊，包括古典學者特奧多爾·莫姆森（Theodor Mommsen）、病理學家魯道夫·菲爾紹（Rudolf Virchow）和歷史學家古斯塔夫·馮·德羅伊森（Gustav von Droysen）在內的許多德國學者直言不諱地譴責特賴奇克的“種族仇恨與狂熱”。[[62]](#62)

這樣的反擊提醒我們，雖然反猶主義作家的影響力迅速提升，但在德國不論左翼右翼、中產階級還是工人階級，絕大多數受人尊重的觀點依然反對這類種族主義。試圖讓德國人不加思考地全盤接受反猶主義觀點而做出的各種努力，均收效甚微。尤其是德國工人階級及其主要政治代表社會民主黨（德國最大的政治組織，早在1912年之前就已是全國選舉中得票最多的政黨，1912年之后成為國會中席位最多的第一大黨），都堅決反對反猶主義，視之為落后的、反民主的。就連普通基層黨員也反對反猶主義那些宣揚仇恨的口號。1898年，一位負責在漢堡的酒館食肆偷聽政治議論的警探聽到一位工人評論道：

民族感情不應該墮落到一個民族凌駕于另一個民族之上。如果把猶太人看作劣等種族，并為此向他們開戰，就更糟糕了。猶太人有辦法改變血統嗎？他們一直是被壓迫民族，因此流散（在世界）各地。社會民主黨當然希望人人平等。猶太人遠遠不是最壞的。[[63]](#63)

還有人在別的場合聽到其他工人十分鄙夷地談論反猶主義者，譴責反猶主義的暴力行為，支持猶太人對公民平等權的向往。這些是1914年以前的勞工運動環境中工人的典型觀點。[[64]](#64)

若要指責社會民主黨人，至多只能說他們對于反猶主義所構成的威脅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縱容了反猶主義的某些陳詞濫調悄悄出現在他們發行的娛樂雜志上的一小部分漫畫里。[[65]](#65)在某些地區，社會民主黨人與反猶主義者在決勝選舉中互相支持，但這并不表示他們贊同彼此的原則，而僅僅表示兩黨希望暫時結成同盟，對抗根基深厚的精英階層。[[66]](#66)在一些落后的小鎮和鄉村，主要是偏遠的東部鄉村，中世紀那些關于猶太人活人祭祀的指控，有時會被用來控告當地猶太人，并且贏得了一些民眾的支持，有時甚至引發抗議示威活動；然而這些指控沒有一宗被法庭裁定為有罪。相比之下，小企業主、店主、手工業者和農夫更傾向于接受公開的反猶主義，這是一種有組織的群眾反猶主義傳統的延續，在某些地區至少可以溯源到1848年革命，盡管那時它并不是以現代的、種族主義的反猶形式出現的。[[67]](#67)但大多數教養良好的中產階級、非猶太企業主和專業人士都與猶太同事合作得相當愉快，他們在自由派政黨中有強大的話語權，足以防止這些政黨采取反猶主義者的任何核心觀點或者態度。各反猶主義政黨一直作為一種邊緣的抗議現象存在，并大多在20世紀初銷聲匿跡。

不過，反猶主義政黨的式微與消亡，在某種程度上是個假象。其消失的原因之一是它們已與主流政黨合流，即它們的反猶主義觀點被保守黨和中央黨采納，這些主流政黨的選民包括陷入經濟困境的中低階層群體，他們正是反猶主義者最初吸引到的群體。保守黨依托1893年蒂沃利會議上制定的反猶主義政策，繼續主張削弱其臆想中的“猶太人在公共生活中的顛覆性影響力”。保守黨的反猶主義偏見不僅吸引了德國北部鄉村信奉基督教新教的各主要社會團體，還吸引了保守黨中基督教社會陣營所代表的手工業者、店主和小企業主。對于規模比保守黨大得多，但在帝國治下影響力相對較小的中央黨而言，猶太人代表了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和現代性，即教會所反對的一切事物。這與其說是猶太人形象，毋寧說是一種被歪曲的、有爭議的猶太人形象。這種觀點吸引了黨內大量的農民和手工業者，并被天主教農民中的抗議團體自發傳播，他們的想法與奧托·伯克爾的觀點并無不同。出于同樣的原因，這種觀點也得到了教會系統中多數教士的認同。在梵蒂岡，一些發表在持強硬教宗至上論立場的報紙上、由教士作家撰寫的抨擊猶太人的文章，融合了宗教反猶主義與種族反猶主義的觀點。[[68]](#68)

而且，在法庭、政府部門、軍隊和大學等社會地位較高的領域，反猶主義偏見之強烈，足以構成對猶太人的持久提醒：他們是德意志國家的下等成員。[[69]](#69)反猶主義者成功地將“猶太人問題”提上政治議程，因此凡有猶太人進入重要社會機構任職，必會引起議論和論戰。但即使按照當時的標準衡量，這種偏見相對而言也不算嚴重。有位歷史學家曾經設想過，假如一位時光旅人從1945年穿越回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的歐洲，告訴一位聰慧博識的時人，在30年之內，將有一個歐洲國家試圖系統性地滅絕歐洲的所有猶太人，并且在此過程中屠殺了近600萬人，對方會做何反應。假如時光旅人請那人猜猜這發生在哪個國家，對方很有可能猜是法國，因為德雷福斯事件（Dreyfus affair）[‡‡](#_96)不久前在心懷仇恨的民眾中引發了大規模反猶浪潮；他也有可能猜是俄國，因為沙皇的“黑色百人團”（Black Hundreds）[§§](#SSSS_5)在1905年革命失敗之后屠殺了大量的猶太人。[[70]](#70)他幾乎不會想到，德國這個擁有高度同化的猶太族群、相對而言并無公開或暴力的政治反猶主義的國家，竟會發動這場種族滅絕運動。反猶主義政治當時依然明顯處于邊緣地位，但反猶主義者的某些宣傳言論已開始在政治主流中傳播——比如，某種叫作“猶太精神”的東西頗具“顛覆性”，或者猶太人在新聞和法律等社會領域具有“過分的”影響力。此外，反猶主義政黨開創了一種挑動暴民、蠱惑人心的政治新風格，將自己從政治禮儀的傳統束縛中解放出來。同樣，這種政治風格依然是邊緣性的，但此時在國會會議和競選集會上宣講仇恨與偏見已成為可能，而在公共演說中發表這樣的言論在19世紀中葉還被視為完全不成體統。[[71]](#71)

從本質上說，1880年代和1890年代初期既見證了這種反猶主義被逐漸接受，也見證了五花八門的思想在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邊緣的積聚，這些原料后來被混合勾兌成了“國家社會主義”（National Socialism）的烈酒。在此過程中起關鍵作用的是反猶主義作家，比如通俗小說家尤利烏斯·朗本（Julius Langbehn），他的作品《作為教育家的倫勃朗》（Rembrandt as Educator，出版于1890年）宣稱，荷蘭畫家倫勃朗是北日耳曼人的典范，并呼吁德國藝術回歸其種族之根，這個文化使命后來被納粹黨徒以極大的熱情予以執行。這些作家在謾罵猶太人的過程中形成了一種充滿憤怒與暴力的新式語言。在朗本筆下，猶太人是“我們的毒藥，我們也必將像對待毒藥一樣對待他們”；“猶太人只是一場短暫的瘟疫和霍亂”，他于1892年如是寫道。朗本的書出版剛滿一年就已加印40次，并持續暢銷了很長時間，他在書中惡語謾罵“猶太人與白癡、猶太人與惡棍、猶太人與娼妓、猶太人與教授、猶太人與柏林人”，同時呼吁恢復等級社會，由一位“秘密皇帝”領導，這位皇帝終有一天會從陰影中現身，恢復德意志昔日的榮耀。[[72]](#72)

以居住在拜羅伊特（Bayreuth）的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納（Richard Wagner）[¶¶](#PP_5)的遺孀為核心的圈子繼承并發展了上述觀點。瓦格納在1883年去世前定居在這個巴伐利亞北部城市，并專門建造了音樂廳，用于每年上演自己的史詩音樂劇。這些音樂劇旨在宣揚經過改編的日耳曼民族神話，劇中的英雄人物源自北歐神話，為德國未來的領袖樹立了典范。瓦格納本人在1850年代初就已經成為文化反猶主義者，他在那部風評不佳的著作《音樂中的猶太教義》（Judaism in Music）中指出，“猶太精神”有損于音樂的深度。瓦格納對此提出的解決之道是，使猶太人完全歸化日耳曼文化，并用他在自己的音樂劇中傾注的那種世俗美學沖動取代猶太教，確切地說是取代所有宗教。然而到了晚年，在他的第二任妻子、作曲家弗朗茨·李斯特（Franz Liszt）的女兒科西瑪（Cosima）影響下，瓦格納的觀點越來越呈現出種族主義的調子。1870年代末時，瓦格納對文明的前景顯然是悲觀的，科西瑪在日記中寫道，他閱讀了威廉·馬爾1873年發表的反猶主義小冊子，并在很大程度上表示贊同。轉變立場之后的瓦格納不再渴望猶太人歸化德國社會，而是渴望將猶太人排除在德國社會之外。1881年，在談論萊辛（Lessing）[\*\*\*](#_97)的經典劇作《智者納坦》（Nathan the Wise）與維也納環形劇場（Vienna Ring Theatre）的火災慘劇——400多人在火災中喪生，其中許多是猶太人——時，科西瑪記錄她的丈夫說道：“說句狠話，所有猶太人都該燒死在《納坦》的演出中。”[[73]](#73)

瓦格納死后，他的遺孀把拜羅伊特變成一處紀念圣地，吸引了一群忠實的追隨者在此緬懷已故的大師。這個以科西瑪為核心、位于拜羅伊特的圈子，所持觀點是極端反猶主義的。他們盡其所能地將瓦格納的歌劇解讀為北歐英雄與猶太惡棍之間的較量，盡管他的音樂當然還可以用其他很多方式來解讀。這個圈子的領軍人物包括獨立學者路德維希·舍曼（Ludwig Schemann），他于1898年把戈比諾論述種族不平等的專著翻譯成德文；以及英國人休斯頓·斯圖爾特·張伯倫（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他生于1855年，是瓦格納的女婿，后來為這位音樂大師出版了一部充滿仰慕之情的傳記。科西瑪和她的朋友們通過期刊 《拜羅伊特文獻》（Bayreuth Papers）傳播他們的觀點；與此同時，舍曼周游全國，在反猶主義會議上發表演講，并成立了各種激進的種族主義組織，最著名的是1894年創建的戈比諾學會（Gobineau Society）。這些組織都不很成功，但舍曼對戈比諾觀點的傳播還是很有效果的，使這位法國種族主義理論家的術語“雅利安人”（Aryan）在德國種族主義者中間流行起來。這個詞最初用于表示講英語、德語等日耳曼語支的人的共同祖先，但很快就獲得了當代的用法，戈比諾提出：只有血統的純正才能保障種族存續，據說在日耳曼——即“雅利安”——農民階層中就保留了這樣的純正血統；而種族融合則導致文化和政治的衰落。[[74]](#74)

然而影響力最大的，是張伯倫及其出版于1900年的著作《十九世紀的根基》（The Foundation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在這部全憑臆想、神秘莫測的作品中，張伯倫把日耳曼人種與猶太人種之間爭奪主宰權的較量作為講述歷史的脈絡，認為它們是這個種族融合的世界上僅存的、保留著最初純正血統的兩個族群。與英勇、文明的日耳曼人一爭高下的，是冷酷、刻板的猶太人，張伯倫因此將猶太人升格為對人類社會的巨大威脅，而不是僅僅將其當作一個邊緣的或劣等的族群加以摒棄。與種族較量相關聯的是一種宗教的較量，張伯倫煞費苦心地試圖證明，基督教在本質上是日耳曼人的宗教，且不顧所有證據，堅稱耶穌根本不是猶太人。張伯倫的作品訴諸科學支持其論點，令許多讀者印象深刻。他在這方面最重要的貢獻是將反猶主義和種族主義與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融為一體。英國科學家查爾斯·達爾文（Charles Darwin）認為，動物王國與植物王國遵循著優勝劣汰的自然選擇法則，從而保證了物種的進化。社會達爾文者將這一模型也應用于人種。[[75]](#75)因此，這里已經匯集了一些后來被納粹黨徒采納的主要觀點。

### 三

張伯倫并不是唯一提出上述觀點的人。許多作家、科學家和其他人等都促成了1890年代一種強硬的、自然選擇論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新變體的出現，它強調的不是和平進化，而是生存競爭。這個思想流派的代表人物是人類學家路德維希·沃爾特曼（Ludwig Woltmann），他在1900年提出，雅利安或日耳曼人種代表了人類進化的高度，因此優越于其他一切種族。于是他聲稱，“日耳曼人種是被選擇出來統治地球的”[[76]](#76)，但其他種族要阻止這種情況的發生。在一些人看來，日耳曼人需要更多的“生存空間”（德文為Lebensraum），生存空間的獲得將不得不以犧牲他人的生存空間為代價，最有可能的是斯拉夫人（Slav）的生存空間。這并不是因為德國真的已經人滿為患——沒有證據可以證明這一點——而是因為提出這種觀點的人把動物王國中領地的概念運用到了人類社會。他們為德國城市的蓬勃發展感到不安，希望恢復理想的田園生活，在那里德國定居者是“劣等的”斯拉夫農民的主人。歷史學家開始告訴他們，中世紀時人們在東中歐就是那樣做的。[[77]](#77)這種把國際政治想象為不同種族之間爭奪統治權或生存權之較量的看法，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已成為德國政治精英階層的流行觀點。陸軍大臣埃里希·馮·法金漢（Erich von Falkenhayn）、海軍大臣阿爾弗雷德·馮·提爾皮茨（Alfred von Tirpitz）、帝國宰相貝特曼·霍爾維格（Bethmann Hollweg）[†††](#_98)的顧問庫爾特·里茨勒（Kurt Riezler）和帝國海軍參謀長格奧爾格·亞歷山大·馮·米勒（Georg Alexander von Müller）等人都把戰爭視為維護日耳曼人種優越于拉丁人（Latin）和斯拉夫人的一種手段。正如弗里德里希·馮·伯恩哈迪將軍（General Friedrich von Bernhardi）在1912年出版的著作中寫下的名言，戰爭是一種“生物必然性”：“如果沒有戰爭，劣等或腐朽的種族就會輕易扼殺新興的健康因素的成長，隨之而來的將是普遍的衰落。”外交政策將不再用于國與國之間，而是種族與種族之間。不以國別為重的觀念正是由此濫觴，后來成為納粹外交政策的核心原則。[[78]](#78)

打贏戰爭，是德國領導人以及中間派和右翼政客在20世紀之初越來越關心的問題，為此（在一些人看來）也需要采取積極的步驟實行人種優化。1890年代，社會達爾文主義轉向自然選擇論的一個方面是比以往更加強調“負選擇”理論。盡管有些人主張，當時也在通過改善住房、營養保健、個人清潔和衛生設施，以及類似政策有效地改進人種，但這幾乎無法抵消社會拋棄扶弱濟困原則所產生的影響。一些醫學家認為，扶弱濟困的政策導致了人種的退化，而新興的遺傳學為他們的觀點提供了更多證據，必須通過一種科學的繁育方法來抵消其影響，即通過減少或者消除弱者、優化并繁殖強者。持此觀點者包括威廉·沙爾邁耶（Wilhelm Schallmayer），他主張將優生學方法運用于社會政策的文章，在由實業家阿爾弗雷德·克虜伯（Alfred Krupp）于1900年組織的全國性競賽中獲得一等獎。另一位醫學專業人士阿爾弗雷德·普勒茨（Alfred Ploetz）也認為，目前日耳曼人已達到人類進化最高水平。他建議，如果戰爭來臨，應該把劣等人種送往前線，于是不合適者將首先被消滅。在所有自然選擇論作家中，讀者最多的是恩斯特·海克爾（Ernst Haeckel），他通俗化闡述達爾文觀點的著作《世界之謎》（The Riddle of the World）在1899年剛一出版即成為搶手的暢銷書。[[79]](#79)

然而，如果以為上述觀點形成了一種連貫或統一的思想體系，卻是一種誤判；說它直接演變成了納粹主義，則屬于更大的誤判。舉例來說，沙爾邁耶并非反猶主義者，他強烈反對“雅利安”人種優越論。沃爾特曼也并不敵視猶太人，他對法國大革命基本上持肯定態度，此立場與納粹黨徒極不投契。不過有點兒匪夷所思的是，他聲稱正如所有偉大的歷史人物一樣，法國大革命的領導人都屬于日耳曼人種。而海克爾確實主張應該大范圍使用死刑，以將罪犯清除出遺傳鏈；他還提倡用注射化學藥劑和電刑的方式殺死精神病患者。海克爾也是種族主義者，他曾下定論，滿頭羊毛狀小卷發的人種從未取得任何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成就。但另一方面，他認為戰爭是優生學的災難，因為戰爭會犧牲國內最優秀、最勇敢的青年。因此，海克爾的信徒——他們組織起來，自稱“一元論聯盟”（Monist League）——成了和平主義者，全盤否定戰爭思維，這種信條不可能受到納粹黨徒的青睞。1914年，當戰爭終于來臨的時候，他們中的很多人為其信奉的原則付出了高昂的代價。[[80]](#80)

這其中最接近于納粹意識形態之發端的，見于普勒茨的著述，他在自己的理論中摻入了濃重的反猶主義味道，還曾與日耳曼種族至上主義團體合作。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似乎并無證據顯示普勒茨本人認為“雅利安”人種優越于其他種族，盡管與他合作最密切的弗里茨·倫茨（Fritz Lenz）確實那樣認為。普勒茨在優生規劃問題上持一種冷酷無情的精英主義立場，比如他主張，每逢接生都應該有一個醫生小組在場，由他們判斷嬰兒是適合生存，還是應該作為體弱和先天不足者而被殺掉。達爾文主義者亞歷山大·蒂爾（Alexander Tille）公開主張處死精神和身體不健康的人，并且贊同普勒茨和沙爾邁耶的主張，即對于患病幼兒應當不予治療，以便將弱者淘汰出遺傳鏈。普勒茨與他的前妻舅、志趣相投的恩斯特·呂丁（Ernst Rüdin）于1905年組建了種族衛生協會（Racial Hygiene Society），用以傳播他們的觀點，協會很快在醫療和福利行業贏得了威望。戈比諾在很多方面一直屬于保守派，認為貴族階層體現了優生學的理想；而上述德國思想家所持的則是一種更加強硬，可能也更為革命的立場，他們通常認為遺傳特征在很大程度上與社會階層無關。[[81]](#81)

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他們的觀點已經以各種形式傳播到醫學、社會服務、犯罪學和法律等領域。妓女、酒鬼、小偷、流浪者之類的社會邊緣人越來越被視為帶有遺傳瑕疵者。有些專家呼吁強制這些人做絕育手術，其呼聲甚高，很難不引起人們的注意。這些觀點對福利制度產生了巨大影響，就連社會民主黨也開始認真考慮阿爾弗雷德·格羅特雅恩（Alfred Grotjahn）的提案，把住房和福利條件的改善與強制精神失常者、不愿工作者和酒鬼做絕育手術聯系起來。[[82]](#82)這些進展反映了醫療行業對犯罪學和社會服務等迅速發展的專業領域的影響與日俱增。德國醫學界在19世紀發現了引起霍亂和肺結核等疾病的桿菌，這些成就為醫學界贏得了無與倫比的威望，也無意中為反猶主義者提供了一種全新的語言，用以表達他們對猶太人的仇恨與恐懼。這促使德國社會普遍在日常生活中采用醫學方法，普通人，包括比例越來越高的工人階級，也開始采取清潔措施，比如定期洗澡、給臥室消毒、煮沸飲用水等等。清潔觀開始從醫學擴展到生活的其他領域，其中不僅包括“社會衛生”，關鍵是還包括“種族衛生”。

雖然關于這些問題存在著各種討論與辯論，但上述觀點其實并未對1914年以前政府政策的制定與執行產生很大影響。除了科學界的權威人士，那些鼓吹繁育一個白膚金發碧眼的雅利安超級種族的人，比如自稱蘭茨·馮·利本菲爾斯（Lanz von Liebenfels）的《奧斯塔拉：白膚金發碧眼者的報紙》（Ostara: Newspaper for Blond People）的編輯，其號召力僅限于由極端分子構成的一個政治黑社會以及幾個規模極小的非主流政治派別。[[83]](#83)盡管具有上述特性，但這些觀點的出現，連同它們在公共討論中日益增強的影響力，卻是納粹意識形態諸種起源之中的一個重要因素。使包括科學家、醫生和種族衛生學鼓吹者在內的各色人等團結在一起的，是幾條基本原則。其一，遺傳特征對于決定人的性格和行為有著重要的作用。其二，由第一條引申出來，為了提高國民效率，由國家引導的社會應該對人口進行管理——必須說服或者強制“適者”多生育、“不適者”少生育。其三，無論對這些術語如何理解，種族衛生運動采用的是一種給人以不祥之感的理性而科學的分類方法——把人分成對國家“有價值的”和“無價值的”。“低素質”（德文為minderwertig，字面意思是“無價值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成了常用術語，被社會工作者和醫務人員用來稱呼各種社會邊緣人。通過這種給人貼標簽的方式，種族衛生學者開辟了通過強制絕育，甚至處決等手段來實現由國家控制、虐待并最終滅絕“無價值”者的道路，其中一些手段至少在1914年之前就已經有人在提倡了。最后，用這種技術專家式的理性主義方法進行人口管理，意味著以一種完全世俗的、工具主義的方式處理道德問題，而把婚姻神圣、父母神圣、被賦予不朽靈魂的個體具有平等價值等基督教義拋諸腦后。無論以上4條原則還有什么別的特征，它們都不是傳統的或保守的。事實上，一些提倡者，比如沃爾特曼和沙爾邁耶，甚至認為自己屬于政治光譜中的左翼而非右翼，盡管他們的觀點只得到了極少數社會民主黨人的認同。從根本上說，促使種族衛生學出世的，是一種新的構想——用科學原理管理社會，而不考慮任何其他原則。種族衛生學代表了德意志民族主義的新變種，它永遠不可能得到保守派或守舊派的認同，也永遠不可能得到基督教教會的支持，或者更確切地說，不可能得到任何形式的宗教組織或者官定宗教的支持。[[84]](#84)

反猶主義和種族衛生學后來都成了納粹意識形態的關鍵元素。二者同為19世紀晚期普遍的思想世俗化的組成部分，是一種更大范圍的反叛的兩個方面，反叛的是19世紀中期支配著德國的自由主義的資產階級態度，即那種被越來越多的作家和思想家視為冷漠與乏味的自滿。眾多德國中產階級智識人士因1870年代德意志民族國家之實現而產生的陶醉感，正讓位于各種不滿情緒，因為他們覺得德國的精神成長與政治發展已趨于停滯，需要推動它再次前行。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在入職演講[‡‡‡](#_99)中尖銳地表達了這些不滿，他把1871年德國的統一稱為德意志民族的一樁“青春鬧劇”。[[85]](#85)在持此觀點的人當中，最有影響力的先知是哲學家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他以雄辯而簡潔的散文體怒斥當時的道德保守主義。尼采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位堪與瓦格納比肩的人物，他在大部分時間里都對后者推崇備至。像瓦格納一樣，尼采也是個復雜的人物，他的作品可以在各種意義上進行解讀。尼采的著作為個人擺脫傳統的道德約束而辯，在1914年以前通常被解讀為呼喚個人解放，對包括女權主義運動在內的形形色色的自由派和激進派團體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女權主義運動中一位最富創造力的人物是海倫妮·斯托克爾（Helene Stöcker），她模仿尼采的散文體撰寫了大量文章，宣稱大師的意思是，在機械避孕和私生子平等權利的幫助下，女性可以自由建立婚外性關系。[[86]](#86)

然而其他人從這位哲學巨子的著作中所吸收的，則完全是另一種經驗。尼采是反猶主義的激烈反對者，他深刻地批判了對權力與成功的庸俗崇拜，這種崇拜在他看來源自1871年以武力實現的德國統一；他最著名的那些概念，比如“權力意志”和“超人”，本來只是用于思想和觀念范疇，而不是政治或行動。但尼采語言的力量讓這些詞匯很容易被簡化為口號，脫離原來的哲學語境，以他也許極不贊同的方式使用。尼采的“理想人”概念，即擺脫了道德約束、憑借權力意志戰勝弱者的人，可以輕易被挪用，那些挪用者所信奉的，是根據種族與優生的標準來繁育人種，但尼采并無此信念。這種解讀主要是受尼采的妹妹伊麗莎白·弗爾斯特（Elisabeth Förster）的影響，她編注尼采作品時將其思想做了庸俗化和通俗化的處理，強調其冷酷的、精英主義的方面，迎合了極右翼民族主義者的口味。恩斯特·貝爾特拉姆（Ernst Bertram）、阿爾弗雷德·博伊姆勒（Alfred Bäumler）和漢斯·金特（Hans Günther）等作家將尼采簡化為權力的先知，將他的超人概念簡化為祈盼一位擺脫了道德約束或者基督教神學羈絆的德意志偉大領袖的降臨。[[87]](#87)

還有一些人則借鑒了對新幾內亞等德國殖民地的原住民社會所做的人類學研究，將尼采的心靈精英主義（spiritual elitism）推進了一步，呼吁建立一個由一群朝氣蓬勃的青年精英統治的新社會——他們將像一幫有著兄弟情誼的中世紀騎士那樣治理國家。以這種重度歧視女性的世界觀，女人除了生育未來的精英之外沒有任何作用，許多優生學家和種族衛生學者也以不那么激進的態度持此觀點。學者型作家，比如海因里希·舒爾茨（Heinrich Schurtz），則通過各種出版物傳播青年精英統治的思想，然而其理論只在諸如青年運動等領域發揮了最大影響力，參加青年運動的年輕人大多是中產階級男性，熱衷遠足、親近大自然、圍著篝火大唱民族主義歌曲，他們肆意奚落成人世界里乏味的政治、虛偽的道德和裝腔作勢的社交。漢斯·布呂厄（Hans Blüher）這類作家深受青年運動的影響，以更加極端的姿態呼吁：國家應按照反民主的路線進行重組，并由一群志同道合、以同性戀式的愛與溫情凝聚在一起的英雄男子來領導。這些理念的鼓吹者在一戰前就已經開始建立偽裝成隱修會的秘密組織，尤其是組建于1912年的日耳曼隱修會（Germanic Order）。在這種小型世俗宗派中，“雅利安人”的符號和儀式扮演著主要角色，組織成員以復古的如尼字母（rune）[§§§](#SSSSSS_3)和太陽崇拜作為日耳曼民族的重要標志，并采用印度的卐字符作為“雅利安人”的徽章，這是受到慕尼黑詩人阿爾弗雷德·舒勒（Alfred Schuler）和種族理論家蘭茨·馮·利本菲爾斯的影響，后者于1907年在奧地利自家城堡上懸掛了一面卐字旗。上述觀點雖然怪異，但不應低估它們對于許多在一戰前參加過各種青年運動組織的中產階級青年男子所產生的影響。就算沒有起到別的作用，它們也是1890—1910年之間出生的那代人普遍反叛資產階級傳統的原因之一。[[88]](#88)

這些思潮所強調的東西，既與資產階級清醒穩重、自我克制的美德形成了鮮明對照，也迥異于自由民族主義所倚賴的原則，比如思想自由、代議制政府、容忍異見，以及基本人權。絕大多數德國人在進入20世紀之際，依然很可能相信這些原則。德國最大的政黨社會民主黨自詡為那些原則的守護者，在他們看來，自由派顯然未能捍衛這些原則。自由派本身依然是一支不可小視的力量，在1914年一戰爆發前最后幾年的和平日子里，自由派甚至顯示出些許復興的跡象。[[89]](#89)然而在此時，已經有人開始認真地嘗試將極端民族主義、反猶主義以及對傳統的反叛整合成一個新的綜合體，并賦予其某種組織形式。早在一戰之前，各種激進思想激蕩而成的政治漩渦就已經強力旋轉起來，納粹主義終將從中浮現。[[90]](#90)

[\*](#_67) 天主教解放（Catholic Emancipation），英國國王喬治四世（George IV）頒布《1829年羅馬天主教解放法》（Roman Catholic Relief Act 1829），宣布廢除“禁止天主教徒擔任公職”等限制性法律，給予英國和愛爾蘭的羅馬天主教徒以充分的政治權利和公民自由。

[†](#_68) 公證結婚（civil marriage），不舉行宗教儀式而由民事官員證婚。

[‡](#_69) 今波蘭什切齊內克（Szczecinek）的德語名稱。——編注

[§](#SS_4) 指帝國議會（Reichstag）。——編注

[¶](#P_4) 議員豁免權（parliamentary immunity），議會民主制國家的法律為保障議員有效履行其職能而賦予議員的不受國王、法院和議會之外的機構以及公眾干涉的特權之一，即在法院或議會剝奪其議員豁免權之前，議員享有免受民事拘禁的特權。

[\*\*](#_70) 語出《圣經·馬太福音》27：25。猶太人的祭司長和長老把耶穌押解到羅馬總督彼拉多（Pilate）面前，要求“把他釘十字架”。彼拉多找不到定他死罪的證據，本應釋放耶穌，卻擔心猶太人生亂，就拿水在眾人面前洗手，說：“流這義人的血，罪不在我，你們承擔吧！”眾猶太人答道：“他的血歸到我們和我們的子孫身上。”于是彼拉多把耶穌鞭打了，交給人釘十字架。

[††](#_71) 黑死病（Black Death），14世紀造成30%～60%歐洲人口死亡的鼠疫。

[‡‡](#_72) 德雷福斯事件，1894年，法國陸軍參謀部猶太裔軍官阿爾弗雷德·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1859—1935）被誣陷犯有叛國罪，被判終身監禁，法國右翼勢力乘機掀起反猶浪潮。德雷福斯后來被證明是無辜的，并于1899年獲釋；但直到1906年，法國最高法院才裁定他無罪并恢復軍籍。

[§§](#SSSS_4) 黑色百人團（1905—1917），以保皇、反猶為宗旨的俄羅斯極端民族主義團體。

[¶¶](#PP_4) 理查德·瓦格納（1813—1883），德國作曲家，創造了被他稱為“音樂劇”的歌劇形式——集音樂、戲劇、詩歌、傳奇和表演于一體。

[\*\*\*](#_73) 萊辛（1729—1781），德國劇作家和評論家。

[†††](#_78) 特奧巴登·馮·貝特曼·霍爾維格（1856—1921），德意志帝國宰相（1909—1917）。下文有時稱之為貝特曼。

[‡‡‡](#_85) 指馬克斯·韋伯（1864—1920）于1895年5月就任德國弗賴堡大學（Universität Freiburg）國民經濟學教授時發表的演講，同年7月以《民族國家與經濟政策》為題出版。

[§§§](#SSSSSS_2) 如尼字母，一種已滅絕的字母，在中世紀歐洲用來書寫某些北歐日耳曼語支的語言。

## 第三節 1914年的精神

### 一

在國境線另一邊的德語國家奧地利，格奧爾格·里特爾·馮·舍納勒爾（Georg Ritter von Schönerer）提供了激進反猶主義的另一個版本。舍納勒爾的父親是一位鐵路工程師，曾被哈布斯堡皇帝授予貴族頭銜，以獎勵他對國家的服務。1866年，奧地利在普奧戰爭中戰敗；第二年，哈布斯堡王朝重組為由奧地利和匈牙利兩個平等國家組成的邦聯，以皇帝弗朗茨·約瑟夫（Franz Josef）為共主，中央政府設在維也納。在中央政府內任職的絕大多數是說德語的人，奧地利境內大約600萬德語人口接受了被逐出德意志邦聯的命運，轉而強烈認同哈布斯堡家族，將自己視為奧地利帝國的統治集團。但舍納勒爾對此不以為然，他在1878年的奧地利議會上喊道：“要是我們屬于德意志帝國該多好！”作為一位激進的改良地主，舍納勒爾倡導成年男性普選權、完全世俗化的教育、鐵路國有化——這一點或許體現了他父親的職業——以及國家扶持小農和手工業者。他將哈布斯堡王朝中的匈牙利裔和其他民族視為德語人口進步的障礙，認為奧地利的德語人口如果與德意志帝國統一起來，將能夠在經濟與社會方面取得長足的發展。[[91]](#91)

隨著時間的推移，舍納勒爾所信仰的德意志種族優越論，開始與越來越強烈的反猶主義結合在一起。1885年，他在自己于1879年提出的11條《德意志民族主義者林茨計劃》（Germannationalist Linz Programme）中增加了第十二條，要求“在公共生活的所有部門清除猶太人的影響”，以此作為他所希望實現的改革的前提條件。舍納勒爾在奧地利議會的席位，使他不但能夠反抗猶太人在諸如鐵路公司等領域的影響力，而且可以免于因言辭過激地譴責猶太人而受到控告。他創建了一系列組織，用以宣傳自己的觀點，其中的泛日耳曼協會（Pan-German Association）在1901年的議會選舉中成功獲得了21個席位。該協會不久即在領導層的私人交惡中散伙，但是以它為榜樣的其他反猶組織紛紛出現。泛日耳曼協會喋喋不休地談論臆想中的猶太人的邪惡影響力，使憤世嫉俗的地方政客更容易獲得支持。比如基督教社會黨保守派卡爾·盧埃格爾（Karl Lueger），他通過煽動反猶情緒贏得了足夠的選票，于1897年代表崛起的右翼政黨基督教社會黨出任維也納市長。盧埃格爾擔任此職一直到1910年，他在任時混合了蠱惑人心的民粹主義與富于想象力的、促進社會進步的市政改革，對這座城市產生了深遠的影響。[[92]](#92)

舍納勒爾從未像盧埃格爾那樣得到過廣泛支持。但盧埃格爾的反猶主義雖有影響力，其本質卻是機會主義的。他因為與維也納的猶太名人一起進餐而招致批評，對此他曾說過一句名言：“誰是猶太佬，由我說了算。”而舍納勒爾的反猶主義則是發自內心、堅定不移的。舍納勒爾宣稱，反猶主義確實是“本世紀最偉大的成就”。[[93]](#93)隨著時間的推移，他的想法甚至越來越極端。自稱“異教徒”的舍納勒爾發起了一場反對羅馬天主教的運動，其口號是“遠離羅馬”。他還杜撰了假裝成中世紀詞匯的問候語“Heil!”（萬歲！）。1902年舍納勒爾在議會里使用此問候語，引起了議員們的普遍憤慨，因為他那次演講的結束語是：“起立，祝霍亨索倫（Hohenzollern）家族[\*](#_117)萬歲！”以此表達他對德意志皇室而非奧地利皇室的忠誠。舍納勒爾的追隨者稱他為“Führer”（元首），這可能是那場運動給極右翼政治詞匯表增加的另一個術語。他提議用日耳曼名稱重新命名每年的節日和月份，比如稱“圣誕節”為“Yulefest”，稱“六月”為“Haymoon”。更古怪的是，他提議使用新的紀年，將元年定在公元前118年，即日耳曼族的辛布里人（Cimbri）在諾里亞戰役（battle of Noreia）中打敗羅馬軍隊的那一年。舍納勒爾真的舉辦了一次（不太成功的）慶典，迎接新千年2001 n.N.（n.N.為“nach Noreia”的首字母縮寫，意思是“諾里亞戰役之后”）。[[94]](#94)

舍納勒爾是毫不妥協的種族反猶主義者，“宗教無高下，種族有優劣”是他特有的那些朗朗上口的口號之一。舍納勒爾的極端言行使他與當局多有抵牾，尤其是在1888年，一家報紙誤發了德皇威廉一世的死訊，結果他怒闖出錯的報社，毆打了該報的幾位員工。在舍納勒爾公開宣揚威廉為“光榮的吾皇”后，被激怒的哈布斯堡王朝皇帝弗朗茨·約瑟夫褫奪了他的貴族頭銜，議會也剝奪了他的議員豁免權，以便讓他入獄服4個月的刑期。但這也沒能阻止他在獲釋之后宣稱，他“期待著德軍開進奧地利并摧毀它的那一天”。如此極端的言行，表明舍納勒爾從未真正離開政治的邊緣地帶。的確，在1907年的奧地利議會選舉中，他沒能保住連任，其追隨者贏得的席位也縮減至三個。與贏得權力相比，舍納勒爾也許更熱衷于傳播思想。然而正是在這樣的幌子下，他后來對納粹主義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95]](#95)

奧地利的反猶主義，遠不是獨立于德國反猶主義的現象。奧地利與德國有著共同的語言和共同的文化，而且奧地利曾在1,000多年里屬于“德意志民族神圣羅馬帝國”的一部分，后來又歸屬于德意志邦聯，直至1866年被俾斯麥粗暴地逐出邦聯，這意味著思想影響與政治影響可以不費力地跨越國境。例如，舍納勒爾自稱是德國反猶主義者歐根·杜林的信徒。那些從維也納尋求靈感的德意志帝國公民，尤其是居住在信奉天主教的南部地區者，肯定能注意到盧埃格爾將社會改革、天主教忠誠和反猶主義論調融為一體的理論。舍納勒爾從種族主義角度為猶太人下的定義、對“雅利安人”神話的崇拜、公開承認不信仰并且厭惡基督教、篤信日耳曼民族的優越性，以及對其他種族——尤其是斯拉夫人——的蔑視，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德意志帝國境內更加極端的反猶主義者的共識。他的觀點無一與德國反猶主義相悖，二者在本質上屬于同一種極端主義思潮。只要哈布斯堡王朝繼續存在，舍納勒爾的泛日耳曼主義就注定會失敗。但是，如果奧地利有朝一日滅亡了，那么它境內的少數德語人口將面臨一個亟待回答的問題：他們是希望加入德意志帝國，還是單獨組建自己的國家？假如出現這種情況，泛日耳曼主義的時機就可能到來。

### 二

在德意志帝國內部，德皇威廉二世于1888年即位，導致俾斯麥帝國宰相的地位被迅速削弱。《反社會黨人法》含有對公民自由的諸多限制，對于是恢復還是廢除該法，二人意見相左，俾斯麥被迫辭職。隨著該法的廢除，各式各樣新型社會運動和政治運動乘勢興起，所有政治派別都參與其中。如今，各種鮮活有趣的新人物登上歷史舞臺，與接替俾斯麥相繼出任宰相的卡普里維（Caprivi）[†](#_118)和霍恩洛厄（Hohenlohe）[‡](#_119)的沉悶乏味恰成反差。其中至少有一位是備受敬慕的人物，因為他剛好是德國民族主義者所尋找的那種英雄。卡爾·彼得斯（Carl Peters）是19世紀末典型的殖民冒險家，其拓殖事跡很快成為傳奇。在俾斯麥于1884年很不情愿地接收了幾塊名義上的德國殖民地之后，彼得斯立即出發，把紙上的征服變為真正的征服。到達東非海岸后，他組建了一支遠征隊，向內陸進發，與各地的原住民首領簽署了許多條約。按照其一貫作風，他事先并未與德國政府商量此事，俾斯麥得知后拒絕承認這些條約。隨后，彼得斯陷入了更多的麻煩，因為有消息透露說，他不僅苛待男仆，還與多位非洲女子有染。關于其不端行為的報道震驚了資產階級輿論界，但這并沒有妨礙彼得斯為在非洲建立一個偉大的德意志帝國而繼續求索。[[96]](#96)

豐富的想象力和旺盛的精力促使彼得斯創建了各種組織，包括1884年組建的德意志拓殖學會（Society for German Colonization），它于1887年與一個有同樣目標的團體合并為德意志殖民學會（German Colonial Society）。由于彼得斯本人聲望卓著，加之他的支持者也頗有影響力，俾斯麥只好承認他的東非冒險，宣布他已經拓殖的地區為德國的保護領地，這是建立德屬坦噶尼喀殖民地的第一步。然而在1890年，俾斯麥的繼任者列奧·馮·卡普里維同意把彼得斯已宣示主權之領土的某些部分，尤其是桑給巴爾島（Zanzibar）割讓給英國，以換取英國將北海的黑爾戈蘭島（Helgoland）出讓給德國。怒火中燒的彼得斯于1891年初主持了一次會議，會議的組織者是一群民族主義者，其中包括年輕的公務員阿爾弗雷德·胡根貝格（Alfred Hugenberg），此人后來在納粹的崛起與掌權過程中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他們組建了德意志總同盟（General German League），1894年更名為泛日耳曼聯盟（Pan-German League）。這個組織的宗旨是大力推動德國在海外開疆拓土，在國內德意志化少數族群。受這一宗旨的吸引，東部邊區學會（Society for the Eastern Marches）于1894年加入聯盟。該學會致力于在德國東部省份摧毀波蘭人的身份認同感。相對于泛日耳曼聯盟而言，它擁有更為密切的政府關系。彼得斯創建的另一個組織與聯盟并無二致，即1881年因參與哈布斯堡王朝官方語言之爭而組建的德語學派協會（German School Association），該協會致力于在德意志帝國境外的德語人口聚居地保留德語。它后來更名為境外德語區協會（Association for Germandom Abroad），以此表示協會的影響范圍正在極大地擴展，涵蓋了德國以外世界各地德意志文化的所有方面。[[97]](#97)

更多的民族主義協會隨之興起，其中最重要的大概要算1898年由軍火商克虜伯出資組建的海軍聯盟，當時帝國國會批準組建一支規模龐大的德意志海軍，克虜伯對此有明顯的興趣。不到十年，海軍聯盟就在各種民族主義組織中獨占鰲頭。如果分支機構也計算在內的話，其會員總數已遠超30萬。相比之下，其他民族主義壓力團體的會員人數極少能夠超過5萬，泛日耳曼聯盟的人數似乎始終卡在2萬以下。[[98]](#98)這些壓力團體的領導人多為職業煽動家，比如因從事新聞活動而升遷受阻的軍官奧古斯特·凱姆（August Keim）。這些人是眾多民族主義協會中的重要人物，通常起著激進的推動作用。以凱姆為例，他是海軍聯盟和國防聯盟（Defence League）的領軍人物，還創建了另外一些名氣不大的協會，比如組建于1912年的防止婦女解放之德意志聯盟（German League for the Prevention of the Emancipation of Women），旨在讓女性回歸家庭，為帝國繁育更多后代。[[99]](#99)

除了這些邊緣人物，還有各類心懷不滿的顯要人物，他們正在為施展政治抱負而在日趨民主的世界里尋找新的出路，因為在這個世界里，對有產者和智識階層的尊重已不再發揮作用，而在1860年代至1880年代，那種尊重曾使民族自由黨和其他更加偏向右翼的政黨在選舉中保持了好運氣。這些煽動家中的許多人通過刻苦攻讀取得了大學學位，然后在不太熱門的部門里沿著公務員序列緩慢上升，謀得了一定的社會地位。此外，相當程度的社會焦慮也是一個重要的驅動力。對德意志民族的認同，或許是過分的認同，賦予了各種民族主義協會中的所有領軍人物一種自豪感與歸屬感，以及一種奉獻和動員的目標，而不論他們的背景為何。[[100]](#100)而且常常有人同時加入不同的組織；在特定的政治斗爭中，幾個人拋開個人恩怨和政治分歧為共同的事業而聯手合作，也不是什么不同尋常之事。

暫不談困擾著它們的頻繁內斗，各種民族主義協會除了追求各自的具體目標之外，還普遍認為俾斯麥建立德意志民族國家的工作遠未完成，而亟須促成它的完善；他們也越來越覺得帝國領袖在此方面未盡其責。1912年，民族主義者的信仰以一種極為戲劇性的方式大白于天下，泛日耳曼聯盟的主席、律師海因里希·克拉斯（Heinrich Class）用筆名發表了標題醒目的宣言：《假如我是皇帝》（If I Were the Kaiser）。他的目標毫不謙虛。克拉斯昭告世人，假如他握有威廉二世手中的權柄，則首先要對付帝國內部的敵人——社會民主黨和猶太人。他怒斥，社會民主黨年初在國會選舉中的勝利是猶太人陰謀損害國家的結果；猶太人正在顛覆德國的藝術、破壞德國的創造力、腐蝕德國的民眾。克拉斯寫道，假如他是皇帝，他將立即褫奪猶太人的公民權，將其列為異類；取締社會民主黨，將其領導層、議員、報紙主編和工會書記驅逐出德國；重新制定議會普選權，給予智識階層和有產者更多投票權，只允許最優秀的成年男子擔任公職；利用全國性集會和愛國慶典號召人民群眾投身民族事業。[[101]](#101)

民族主義者主張，國內綏靖政策將包括壓制少數民族的文化，比如普魯士東部省份波蘭人的文化——把波蘭人從自己的土地上趕走，禁止他們使用自己的語言，必要時使用武力逼迫這些被認為劣等、蒙昧的“斯拉夫人”就范。在克拉斯的領導下，泛日耳曼聯盟及其盟友力主大規模擴充軍備，甚至要超過1898年以來遵照《海軍法》（Navy Laws）已經啟動的擴軍規模；擴軍之后要打一場戰爭，德國將征服歐洲，吞并德語地區，比如瑞士、荷蘭、比利時、盧森堡和奧地利。他們毫不顧及居住在這些地區的其他民族的感受，也無視語言和文化的差異，這種差異使得甚至比利時境內的佛蘭德分離主義者（Flemish separatists）都不太可能支持他們，更別提其他各種持不同政見者了。出于戰略考慮，他們把羅馬尼亞（Romania）包括了進來，并且強調，可以在比利時和荷蘭的海外領地——比如剛果——的基礎上，建立一個規模遠超英國殖民地的殖民新帝國。泛日耳曼聯盟及其民族主義者盟友有選擇地借用尼采、朗本、達爾文、特賴奇克等作家的作品，而且在借用過程中屢屢將他們的思想進行庸俗化解讀、斷章取義或者簡化到不可辨識的程度，然后將自己的意識形態建立在這樣一種世界觀之上：以斗爭、沖突、“雅利安”種族優越論、反猶主義和權力意志作為其核心信仰。[[102]](#102)

然而，在他們懷有這些幾乎毫無節制的野心要謀求德國的世界霸權的同時，泛日耳曼聯盟和其他民族主義協會也對德國的現狀與前途提出了強烈警告，甚至表達了失望情緒。他們認為，德意志人民受到了敵人的內外夾擊——“斯拉夫人”和“拉丁人”從外部包圍，猶太人、耶穌會士（Jesuit）[§](#SS_7)、社會主義者和形形色色顛覆性的煽動家和陰謀家從內部搞破壞。泛日耳曼的種族主義是通過語言的使用表達出來的，他們將各民族簡化為一個簡單的、行為一致的種族實體——“日耳曼勢力”（Germandom）、“斯拉夫勢力”（Slavdom）、“盎格魯—撒克遜勢力”（Anglo-Saxondom）或者“猶太勢力”（Jewdom）。他們認為，其他種族的繁殖率已超過日耳曼人，有“淹沒”日耳曼人的危險；或者說，其他種族像法國人一樣正在墮落，于是通過自身的衰落對日耳曼人施加腐蝕性的影響。極端民族主義者將自己描繪成“曠野里呼喊者的聲音”[¶](#P_7)，除非有人聽到這呼喊，否則日耳曼民族將無藥可救。重癥需下猛藥：只有通過在農民階層、個體經營的手藝人和小企業主，以及傳統的核心家庭[\*\*](#_120)中恢復日耳曼民族的種族之根，才能夠挽回局面。大城市已成為非日耳曼種族道德敗壞與混亂無序的淵藪，需要采取強硬措施恢復秩序、禮節以及一種正確的日耳曼文化概念。德國需要一個新的俾斯麥——他應該強硬、冷酷，在國家需要拯救時，不憚于對內施以鐵腕政策、對外奉行侵略政策。[[103]](#103)

隨著時間的推移，民族主義協會批評德國政府對內、對外的軟弱時越來越直言不諱。社會民主黨在1912年大選中的勝利，以及被民族主義者視為德國恥辱的1911年摩洛哥危機解決方案，驚醒了動輒爭吵不休的各民族主義協會，他們開始采取激進行動，聯合加入新組建的國防聯盟——該聯盟旨在為陸軍提供像海軍聯盟對海軍艦隊那樣的支持。合并后的新組織與政府的關系，比海軍聯盟與政府的關系獨立得多。它完全認同泛日耳曼聯盟的觀點，會員人數在1912年組建之后的兩年內達到9萬，為泛日耳曼聯盟提供了廣大的群眾基礎，這是后者靠自身力量一直未能做到的。與此同時，泛日耳曼聯盟與殖民學會聯手發起了一場運動，游說政府停止承認殖民地的德國居民與非洲黑人之間婚姻的合法性。保守黨中的知名人士開始與泛日耳曼聯盟合作。農業主同盟（Agrarian League），一個由大、小地主組成的與保守黨關系密切的大型壓力團體，于1913年8月與德意志工業家中央同盟（Central Association of German Industrialists）以及手工藝匠人和手工業工人的全國性組織合并，組建了“生產型產業卡特爾”（Cartel of Productive Estates）。卡特爾不僅會員人數高達數百萬，而且采納了泛日耳曼聯盟的許多主要目標與信念，包括排擠或解散國會，壓制社會民主黨，以及奉行侵略性外交政策，乃至發動一場大規模的征服戰爭。[[104]](#104)

這些極端民族主義壓力團體，并非威廉二世統治集團的任何一種操縱策略的產物，而是通過在底層進行政治動員所產生的真正民粹主義運動。但這些團體在工人階級中根本得不到選票；在社會各等級中，它們最底層的票倉是白領工人和職員階層，此階層的工會之一、與猶太人不共戴天的德意志國家商業雇員工會（German-National Commercial Employees' Union），怒斥猶太人的商業利潤造成了工會會員的工資下降，并攻擊說女性進入秘書和行政崗位是猶太人企圖破壞德國家庭的產物。[[105]](#105)然而，各種民族主義協會自1912年以來贏得的聲望已使德國政府倍感壓力；隨著泛日耳曼聯盟在右翼新聞媒體中結交了一些新朋友，政府感受到的壓力就更大了。泛日耳曼聯盟的支持者之一、退休將軍康斯坦丁·馮·格布薩特爾（Konstantin von Gebsattel）被《假如我是皇帝》打動，寫下一份備忘錄。他在這篇長文中呼喚一場斗爭，抗擊“猶太人的陰謀詭計和社會民主黨領導人的煽動”；呼喚一個“沒有議員的”帝國；呼喚一個并非僅為傀儡，而是真正統治國家的、揮動“全副武裝的拳頭”、奉行侵略性外交政策的皇帝；以及呼喚一種最大程度限制民眾影響力的選舉制度。

他在備忘錄中提議把猶太人當作異類對待：禁止他們購買土地，如果他們移居國外就沒收其財產；禁止他們在國立機構任職，比如政府行政部門、法律界、大學和軍隊。在格布薩特爾看來，接受洗禮當然改變不了一個人是猶太人的事實，任何人只要有四分之一以上的“猶太血統”就應該被當作猶太人而非日耳曼人對待。“猶太出版機構”應予取締。格布薩特爾說，這樣做是完全必要的，因為德國的全部生活已被“猶太精神”主宰，這種精神淺薄、消極、具有破壞性的批評欲，是實利主義的。是回歸真正的德意志精神的時候了——回歸深刻的、積極的、理想主義的精神。這一切將由一場上層發動的有效政變來實現，并通過宣布軍事管制、頒布戒嚴令來提供保障。格布薩特爾及其朋友、泛日耳曼聯盟領導人海因里希·克拉斯認為，備忘錄的基調是溫和的。之所以表現出這種所謂的溫和，是因為考慮到這份備忘錄將呈送給以同情民族主義事業著稱的皇儲弗里德里希·威廉（Friedrich Wilhelm）。皇儲隨即滿懷熱情地將備忘錄轉呈他的父親，以及當時接替俾斯麥擔任帝國宰相的特奧巴登·馮·貝特曼·霍爾維格。[[106]](#106)

宰相貝特曼和皇帝禮貌但堅決地否決了格布薩特爾的提議，認為它們不切實際，甚至會危及王朝的穩定。帝國宰相承認，“猶太問題”是“德國未來發展的巨大隱患”；但他又說，格布薩特爾的嚴苛方案不能當真。皇帝對提案潑了更多冷水，他告誡兒子，格布薩特爾是個“古怪的熱心人”，很多想法都“幼稚透頂”。然而他也承認，盡管把猶太人逐出德國在經濟上是不明智的，但確實有必要“將猶太影響力排除在軍隊和行政部門之外，并且盡最大可能限制猶太人對藝術與文學的影響”。他認為，在新聞界也是如此，“猶太勢力已經建立起了最危險的輿論陣地”，但是像格布薩特爾所倡導的那樣全面限制新聞自由，將會適得其反。反猶主義的成見就這樣滲透進了政權的最高層，皇帝讀了休斯頓·斯圖爾特·張伯倫的《十九世紀的根基》之后成見愈益加深，他將此書譽為德意志民族的警鐘。加之不屈不撓的泛日耳曼聯盟在公開場合和暗地里對宰相的批評不斷升級，貝特曼越來越感到必須在外交政策上采取強硬路線，而這種強硬路線在危機處理時造成了災難性后果——導致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107]](#107)

###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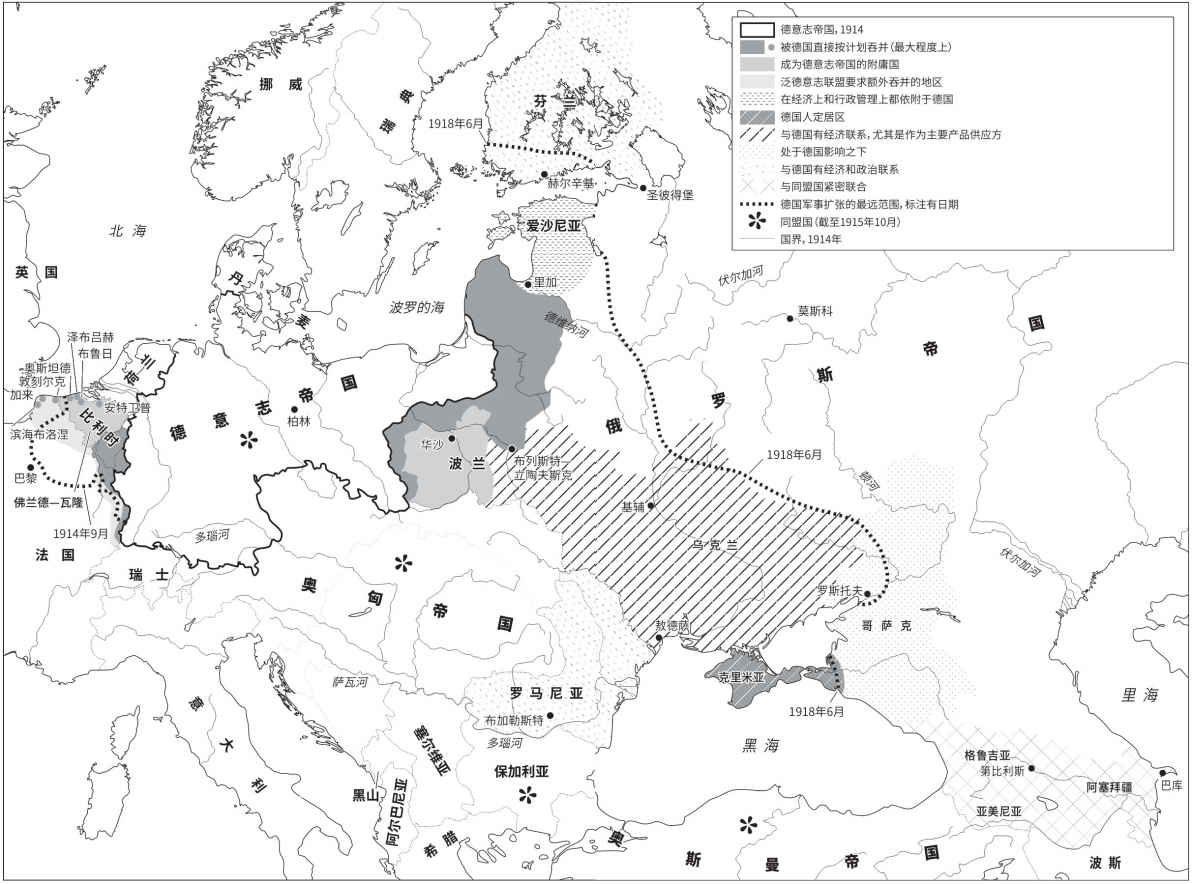
與其他歐洲國家一樣，德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心態樂觀，滿以為勝利在望，極有可能在較短的時間內凱旋。陸軍大臣埃里希·馮·法金漢等軍界人士則預測沖突將持續較長時間，并且擔心德國最終有可能戰敗。然而他們的專業意見未能使民眾信服，確切地說是未能使許多掌握著德國命運的政客信服。[[108]](#108)此前幾十年間經濟的大幅增長，在民眾心中催生了德國不可戰勝之感，1914—1915年德軍在東線的幾次大捷又助長了這種情緒。俄國提前入侵東普魯士，促使德國總參謀長起用退休將軍保羅·馮·興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一位生于1847年、參加過1870—1871年戰爭的老將接手戰事，其得力助手、參謀長埃里希·魯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是一位非貴族出身的技術專家和軍事工程師，他在戰爭初期攻打列日（Liege）的戰役中為自己贏得了聲譽。兩位將軍誘敵入彀，殲滅了入侵的俄軍，隨后又取得一連串勝利。到1915年9月底，德軍占領波蘭，重創了俄軍，致使敵軍由上一年占領的陣地后退了250英里[††](#_121)。

這些戰績使興登堡聲譽卓著，被視若無敵戰將。英雄崇拜很快圍繞他建立起來，他那厚重結實的體態似乎為瞬息萬變的戰局帶來了一種穩定因素。但實際上，興登堡的政治遠見和能力都相當有限，在很多方面，他只是充當著其精力充沛的下屬魯登道夫的門面，而魯登道夫的作戰思路遠比興登堡的想法更加激進和無情。這對搭檔在東線的勝利與在西線的僵局形成了鮮明對比：西線戰場在戰爭爆發后幾個月內，沿著從北海至瑞士邊境的450英里[‡‡](#_122)戰壕，雙方大約800萬部隊面對面地相持著，均無法有效突入敵軍防線。松軟的土地使他們可以修建一條又一條深深的防御戰壕；帶刺鐵絲網阻礙了敵人的推進；防線上密布的機關槍火力點，能夠射殺從對面陣地成功突入射程的任何部隊。雙方都為這種徒勞的較量投入了越來越多的資源。到1916年，壓力開始讓雙方吃不消了。

在戰爭中期，主要參戰國全部更換了領導層，反映出各國都意識到需要以更大的力量、更無情的手段動員國民、調動資源。在法國和英國，上臺的分別是克列孟梭（Clemenceau）[§§](#SSSS_7)和勞合·喬治（Lloyd George）[¶¶](#PP_7)。德國別具一格，上臺的不是激進的文官，而是兩位功勛卓著的將軍——興登堡和魯登道夫于1916年接掌政權。“興登堡計劃”（Hindenburg Programme）[\*\*\*](#_123)旨在振興并重組德國經濟，使之服務于那個壓倒一切的目標——贏得戰爭。在另一位中產階級將軍[†††](#_124)威廉·格勒納（Wilhelm Groener）的管理下，戰爭辦公室拉攏工會和平民政客承擔動員任務；但這引起了企業主和其他將軍的反感，格勒納很快被調離。興登堡和魯登道夫甩開平民政客，在德國建立起一種“幕后獨裁統治”（silent dictatorship）：在幕后實行軍事管制，嚴格限制公民自由，中央調控經濟，將軍們對戰爭目標與外交政策的制定發號施令。上述發展為十幾年之后德國民主政治和公民自由所遭遇的更加慘烈的命運提供了重要先例。[[109]](#109)

德國轉向實行更加殘酷的戰爭政策，它所產生的反作用表現在不止一個方面。魯登道夫下令對德軍占領的法國、比利時和東中歐地區實行系統性的經濟剝削，被占領國對此的記憶，讓德國人在戰爭結束時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將軍們那些野心勃勃、不容變更的戰爭目標，使國內的許多自由主義中間派和左翼人士與他們逐漸疏遠。1917年初，為了切斷美國對英國的物資供應，德國決定在大西洋實行無限制潛艇戰（unrestricted submarine warfare）[‡‡‡](#_125)，結果卻激起美國參戰，加入協約國。自1917年起，對世界上最富裕經濟體的動員使協約國實力大增，當年年底，美軍開始源源不斷地開進西線戰場。在德國人看來，戰爭中唯一真正的亮點，是他們在東線戰場的節節勝利。

但東線的勝利也有其代價。德軍及其盟友在東線不斷施加的軍事壓力，在1917年初有了結果——效率低下、不得人心的俄國沙皇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政府垮臺，被俄國自由派執掌的臨時政府所取代。然而事實證明，自由派并不比沙皇更有能力調動俄國巨大的資源以贏得戰爭。國內瀕臨饑荒狀態；政府陷入混亂；前線節節敗退，絕望情緒日甚一日；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氣氛越來越轉向反戰；臨時政府的合法性原本已經搖搖欲墜，此時開始徹底消失。這種局面的最大受益者是俄國唯一自始至終持反戰立場的政黨：布爾什維克黨（Bolshevik Party）。它是一個組織嚴密的、以馬克思主義為唯一信仰的政黨，其領導人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列寧（Vladimir Ilyich Lenin）始終認為，戰敗是引發革命的最快捷方式。他抓住時機，在1917年秋突如其來地發動政變，幾乎沒有遭到直接的抵抗。



地圖2　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擴張

“十月革命”很快淪為血腥的亂局。當布爾什維克的反對者企圖發動一場反政變時，新政權則應對以暴力的“紅色恐怖”，鎮壓了其他一切政黨，建立起以列寧為首的中央集權式專政統治。新組建的紅軍由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領導，與志在恢復沙皇統治的“白軍”（Whites）進行了一場殘酷的內戰。“白軍”的努力未能幫到沙皇本人，他很快就與家人一起被布爾什維克處死。布爾什維克黨的政治警察組織契卡（Cheka）無情地鎮壓了政權的反對者，各政治派別無一幸免——從左翼陣營中的改良社會主義者孟什維克（Mensheviks）、無政府主義者和農民社會革命黨人，到右翼陣營中的自由派、保守派和保皇黨。數千人遭到折磨、殺害，或者被野蠻地關押在第一批勞改營，到1930年代，勞改營開始成為一種規模龐大的拘禁系統。[[110]](#110)

列寧的政權最終獲勝，打敗了“白軍”及其支持者，控制了前沙俄帝國的大部分地區。布爾什維克黨領導人列寧及其繼任者將精力轉入建設蘇俄版本的共產主義國家和社會：至少在理論上體現了經濟社會化的財產公有制；取締宗教，以確保一種世俗的社會主義覺悟；沒收私有財產，建立沒有階級的社會；建立“民主集中制”和計劃經濟，賦予設在莫斯科的中央政府前所未有的獨裁權力。但列寧也知道，這一切將要建立在一個經濟落后、缺乏現代資源的國家和社會。在他看來，像德國那類比較先進的經濟體擁有更加完善的社會制度，爆發革命的可能性甚至大于俄國。事實上，列寧認為，除非其他國家也成功地發生同類型的革命，否則俄國革命可能難以為繼。[[111]](#111)

于是布爾什維克組建共產國際（Comintern），向全世界輸出蘇俄版本的革命。在此過程中可資利用的是，許多國家的社會主義運動已經因戰爭引起的問題而發生分裂。尤其是在德國，社會民主黨起初支持以戰爭為主要防御手段抵抗來自東方的威脅，但隨著政府大規模吞并領土的要求日益明顯，曾經鐵板一塊的社會民主黨對于政府的疑慮越來越深，從而備受困擾。1916年，該黨分裂為主戰與反戰的兩派。多數派有所保留地繼續支持戰爭，他們倡導的是溫和改良，而不是大規模革命。少數派獨立社會民主黨（Independent Social Democrats）中的一些人，在卡爾·李卜克內西（Karl Liebknecht）和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的領導下，于1918年12月組建了德國共產黨（German Communist Party）。最終，大部分少數派的支持者都于1920年代初加入了德共。[[112]](#112)

上述事件在西歐和中歐許多地區的民眾中間傳播時所引起的不安和恐懼，無論怎樣形容都不過分。聽到共產黨的激進言論，看到俄國中上層人士失去財產、消失在契卡的刑訊室和勞改營，德國的中產階級和上層人士警覺起來，社會民主黨人擔心，如果共產黨在德國掌權，他們也將面臨改良社會主義者孟什維克以及為農民發聲的社會革命黨人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所遭受的厄運。各國的民主派從一開始就意識到，共產主義意在壓制人權、廢除代議制、廢止公民自由。恐懼感驅使他們相信，應該不惜一切代價在本國制止共產主義，甚至通過暴力手段、通過中止那些他們承諾要捍衛的公民自由權。在右翼人士看來，共產主義和社會民主理論相當于同一枚硬幣的兩面，威脅性似乎不分伯仲。1918年，匈牙利共產黨在庫恩·貝拉（Béla Kun）[§§§](#SSSSSS_5)的領導下上臺執政，這個短命的政權試圖取締教會，但很快被霍爾蒂·米克洛什海軍上將（Admiral Miklós Horthy）領導的君主主義者推翻。反革命的政權繼而實行了“白色恐怖”，數千布爾什維克和社會主義者遭到逮捕、殘酷虐待、監禁和殺害。匈牙利變局第一次讓中歐人感到，從戰爭造成的緊張局勢中滋生出的政治暴力與政治沖突可以達到怎樣的新水平。[[113]](#113)

在1918年初的德國本土，共產主義的威脅似乎還比較遙遠。為了獲得鞏固新政權所需的喘息機會，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黨很快開始與德國談判，以謀求其迫切需要的和平解決方案。德國漫天要價，憑借1918年初簽訂的《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約》（Treaty of Brest-Litovsk）吞并了大片俄國領土。當大量德軍從已經停戰的東線被調往西線去增援一場春季新攻勢時，最后的勝利似乎指日可待。在1918年8月對德國民眾發布的年度公告中，皇帝向所有人保證，戰爭最糟糕的階段已經結束。局面確實如此，但趨向并不如他所愿[[114]](#114)，因為魯登道夫的春季攻勢讓德軍傷亡慘重，協約國在美國大規模輸送的新兵和物資的增援下，在德軍防線上撕開缺口，從西線長驅直入。德軍士氣開始瓦解，越來越多的士兵開小差或者向協約國部隊投降。最后的打擊隨之而來，德國的盟友保加利亞（Bulgaria）求和了，南線的奧匈帝國軍隊在意大利新一輪進攻面前一觸即潰。[[115]](#115)興登堡和魯登道夫不得不在9月底告訴皇帝，敗局已定。在勝利的希望實際已經破滅之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嚴苛的新聞審查制度確保了報紙還在繼續展望最后的勝利，因此德國戰敗的消息所造成的沖擊波特別強烈。[[116]](#116)后來的事實證明，戰敗對于俾斯麥1871年所建帝國的殘存政治制度造成了過于沉重的打擊。

正是在戰爭與革命的烈焰中，煉成了納粹主義。1918年德國戰敗與1933年第三帝國來臨之間，僅僅相隔15年，但這一路波詭云譎、充滿變數。希特勒的上臺絕非在1918年就已注定，也絕非由此前的德國歷史進程所預設。德意志帝國的建立，及其經濟實力的提升和強國地位的確立，使許多民眾心生希望，然而在一戰結束時，人們清楚地看到，帝國及其各級機構無法實現他們的希望。在許多人心目中，俾斯麥冷酷、強硬，為達目的不憚于使用暴力和詭計，是領袖人物的典范；采取行動抑制政治天主教運動（political Catholicism）的民主化威脅，以及抑制社會主義勞工運動時，俾斯麥所顯示出的魄力，使他在信奉新教的中產階級中贏得了廣泛愛戴。1916年在民族危機最嚴重的時刻，興登堡和魯登道夫的“幕后獨裁”把殘酷的專制統治準則付諸實踐，為德國的未來開創了一個不祥的先例。

德國的歷史遺產，從很多方面看都是一份沉重的負擔，但它并沒有使納粹主義的興起與得勢成為必然。俾斯麥投下的那些陰影本來有可能最終被驅散，然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行將結束時，它們卻幾乎無限地加深了。俾斯麥及其繼任者遺留給德國政治制度的問題，因戰爭的影響而無盡地惡化下去，而且在這些問題之上，又添加了其他后患無窮的問題。如果沒有戰爭，納粹主義可能不會崛起為一支值得重視的政治力量，可能也不會有那么多德國人不顧一切地尋求一位獨裁者，來取代在國運攸關之際看起來顯然有負眾望的文官政治。1914—1918年，每個人所下的賭注都如此之高，以至于右翼和左翼都準備采取某種極端主義的措施，這在戰前只有處于邊緣的政治人物才敢想。討論德國戰敗之責應由誰承擔時，各派相互攻訐，其結果只是加深了政治沖突。面對巨大的犧牲、極度的物資匱乏和奇高的死亡人數，德國所有政治派別都在苦苦尋找原因。超乎想象的戰爭開支給世界經濟造成的巨大負擔，再花30年也無法擺脫，而其中負擔最重的是德國。所有參戰國在戰爭期間盡情發泄民族仇恨，給未來留下了一種可怕的后遺癥——宿怨。不過，當德軍逐漸回國，德皇心有不甘地準備將政權移交給民主派時，一切似乎仍有希望。

[\*](#_100) 勃蘭登堡—普魯士（1415—1918）和德意志帝國（1871—1918）的主要統治家族。——編注

[†](#_101) 列奧·馮·卡普里維（1831—1899），普魯士王國首相（1890—1892）和德意志帝國宰相（1890—1894）。

[‡](#_102) 霍恩洛厄—席林斯菲爾斯特親王（Prince of Hohenlohe-Schillingsfürst，1819—1901），普魯士王國首相和德意志帝國宰相（1894—1900）。

[§](#SS_6) 耶穌會士，創建于1534年的羅馬天主教修道會“耶穌會”（Society of Jesus）的成員，強烈反對宗教改革。

[¶](#P_6) 曠野里呼喊者的聲音（voices in the wilderness），語出《圣經·約翰福音》1:23。猶太人從耶路撒冷差遣祭司和利未人來見約翰，問他：“你是誰？”約翰答道：“我是曠野里呼喊者的聲音，說：‘修直主的道路’。”

[\*\*](#_103) 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由一對夫妻及其子女組成的小家庭。

[††](#_109) 約402公里。——編注

[‡‡](#_110) 約724公里。——編注

[§§](#SSSS_6) 喬治·克列孟梭（1841—1929），法國總理兼內政部長（1906—1909），總理兼陸軍部長（1917—1920）。

[¶¶](#PP_6) 勞合·喬治（1863—1945），英國首相（1916—1922）。

[\*\*\*](#_111) 興登堡計劃，由魯登道夫于1916年8月制定，其目標是到1917年春，彈藥供應量增加一倍、機槍供應量增加兩倍。但由于原料供應不足而無法實現。1916年10月，在國防部內成立戰爭辦公室（War Office），由威廉·格勒納（1867—1939）負責，統一指導軍需供應與人力動員。

[†††](#_112) 意思是格勒納與魯登道夫一樣，都不是貴族出身。

[‡‡‡](#_113) 德國海軍部于1917年2月宣布，德國潛艇可以事先不發警告，擊沉開往英國海域的任何商船。

[§§§](#SSSSSS_4) 匈牙利語為Kun Béla，匈牙利人名的書寫順序是姓在前、名在后，中文譯名從匈牙利語。

## 第四節 陷入混亂

### 一

在1918年11月，大多數德國人預計，由于戰爭結束之時協約國尚未踏足德國本土，所以停戰協議的條款可能會相對公平合理。而此前4年里德國人激烈辯論的，卻是取得勝利之后應該吞并多少領土，就連官方戰爭目標中的帝國任務也包括吞并西歐和東歐的大片領土，確立德意志帝國在全歐洲的霸主地位；右翼壓力團體則走得更遠。[[117]](#117)鑒于德國人曾期待在戰勝時大肆侵占，那么他們理應可以想見戰敗時將要承擔多大的損失。然而1918年11月11日德國被迫同意的停戰協議條款，卻出乎所有德國人的意料：德軍必須全部撤到萊茵河東岸，德國艦隊應向協約國投降，大量軍事裝備必須移交，廢除《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約》，德意志公海艦隊及其潛艇必須向協約國投降。與此同時，為確保德國遵守約定，協約國繼續對德國實行經濟封鎖，使本已極度糟糕的食品供應狀況進一步惡化。直到第二年7月，經濟封鎖才被解除。[[118]](#118)

幾乎所有德國人都覺得這些條款不合理，視之為國恥。條款的執行，尤其是法國的行動，又極大地加深了德國人的怨恨情緒。許多德國人不肯相信他們的軍隊真的戰敗了，以這種心態看待停戰協議，其條款之苛刻也就愈加明顯。在高級軍官的協助和慫恿下，一種引起致命后果的說法很快在中間和右翼政治派別的廣闊輿論陣地流傳開來——很多人從瓦格納的音樂劇《眾神的黃昏》（The Twilight of the Gods）得到靈感，開始相信軍隊之所以戰敗，完全是因為國內的敵人從背后捅了刀子，就像瓦格納劇中勇敢的主人公齊格弗里德（Siegfried）所遭遇的那樣。德國的軍事領導人興登堡和魯登道夫在戰爭結束后不久宣稱，軍隊是一場“秘密的、有計劃的蠱惑運動”的受害者，這場運動注定了德軍的全部英雄壯舉以失敗告終，“一位英國將軍說得對：德軍被人從背后捅了一刀”[[119]](#119)。德皇威廉二世在1920年代撰寫的回憶錄中重復了這個說法：“在30年里，我為軍隊而自豪。我為之而生、為之操勞，可是如今，在輝煌的、取得空前勝利的四年半戰爭歲月之后，在和平唾手可得的時刻，革命者的匕首從背后捅了一刀，瓦解了我軍！”[[120]](#120)甚至社會民主黨也參與制造了這個自我安慰的說法。1918年12月10日，社會民主黨領導人弗里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 Ebert）對陸續進入柏林的歸國部隊說：“你們沒有被任何敵人打敗過！”[[121]](#1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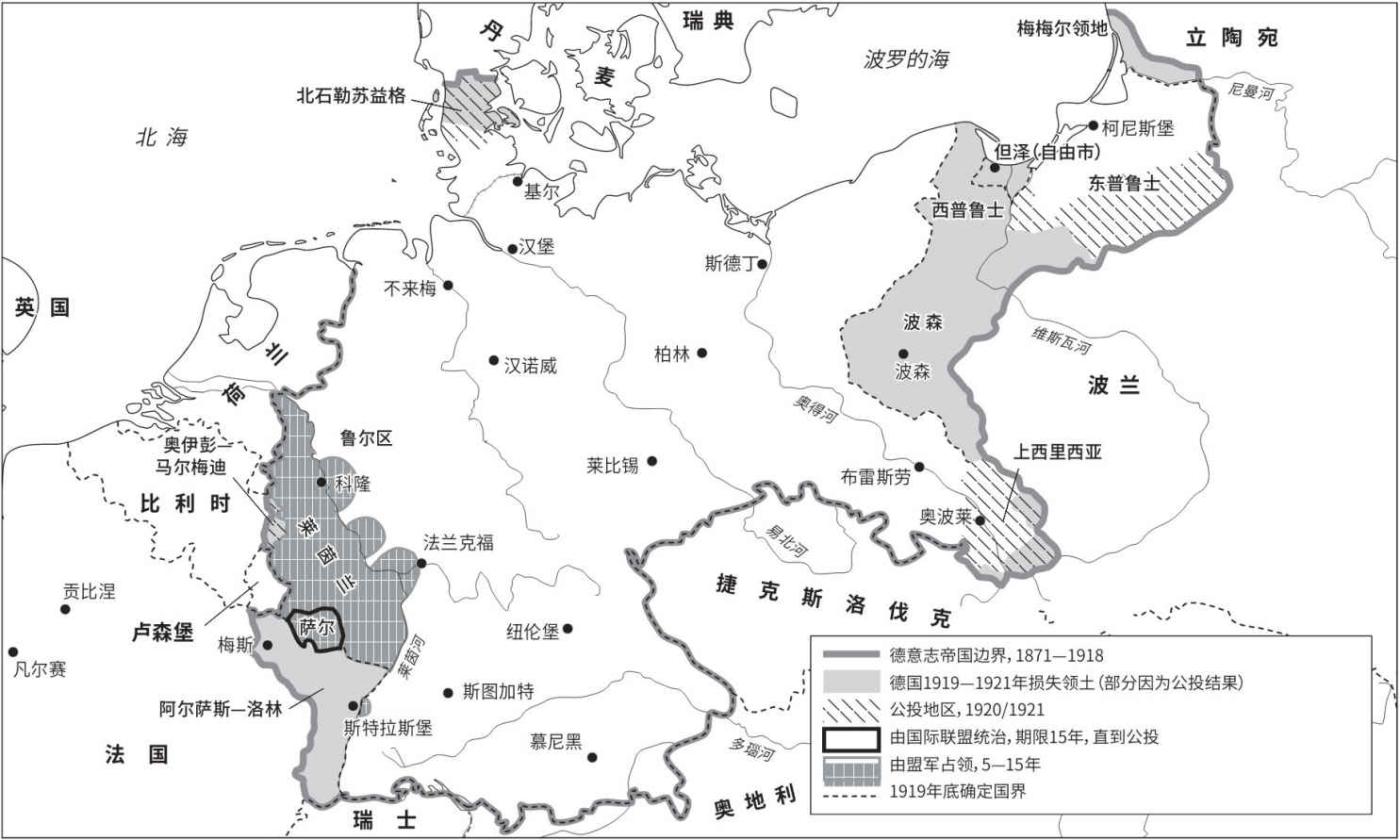
戰敗直接導致了俾斯麥在近半個世紀之前所創造的政治制度的崩潰。1917年俄國二月革命加速了沙皇專制制度的終結，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以及西方協約國隨后宣布，戰爭的主要目標是為民主制度提供安全的世界環境。魯登道夫以及帝國的領導層在斷定戰敗已無可挽回之后，轉而主張對德意志帝國的政體進行民主化改革，希望協約國有可能因此而議定出合理的，甚至有利于德國的停戰條款。政治民主化還有一個副產品，它絕非偶然所得，而是出自魯登道夫的盤算：如果停戰條款不被德國民眾接受，那么媾和不利的責任自然會落到德國的民主派政客身上，而與德皇或者軍隊領導層無關。新組建的政府由自由派的巴登親王馬克斯（Prince Max of Baden）領導，但事實證明，它控制不住海軍，軍官們為捍衛海軍的榮譽，打算啟航出海，去進行最后一場毫無希望的戰斗——抗擊英國艦隊。毫不奇怪的，水兵嘩變[\*](#_162)了。暴動在幾天之內蔓延到平民階層，德皇以及包括巴伐利亞國王和巴登公爵在內的所有王公貴族全部被迫退位。11月11日停戰協議簽字時，德軍就地解散，民主派政黨留下來——如魯登道夫所愿——為《凡爾賽和約》（Treaty of Versailles）的條款進行談判，如果那算得上談判的話。[[122]](#122)

《凡爾賽和約》生效后，德國失去了十分之一的人口，以及13%的領土，其中包括阿爾薩斯—洛林，在德國統治了近半個世紀之后被歸還法國，此外還包括邊境領土奧伊彭（Eupen）、馬爾梅迪（Malmédy）和莫雷斯內（Moresnet）。薩爾蘭（Saarland）脫離德國，由戰勝國托管，《和約》承諾最終將由當地居民決定是否愿意歸屬法國，這顯然是期望他們最終能同意并入法國，起碼法國人可以從中施加影響。為了確保德國的武裝力量不進入萊茵蘭（Rhineland），192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里，英國、法國以及美國在那里派駐了大量部隊，其中美國駐軍時間較短。北石勒蘇益格（Northern Schleswig）割讓給丹麥，梅梅爾（Memel）于1920年割讓給立陶宛（Lithuania）。18世紀被奧地利、普魯士和俄國瓜分的波蘭重新建國，這意味著德國失去了波森（Posen）、西普魯士的大部分以及上西里西亞（Upper Silesia）。但澤（Danzig）成為“自由市”，名義上由新建立的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控制，它是二戰后建立的聯合國的前身。為了讓剛獨立的波蘭得到出海口，《和約》給波蘭劃出一條“走廊”，將東普魯士與德國其余部分的領土分隔開。德國的海外殖民地被沒收，在國際聯盟的托管下被重新瓜分。[[123]](#123)

同樣影響深遠、同樣令人震驚的是，戰勝國不允許德國與講德語的奧地利合并。德奧如能合并，將意味著1848年激進派夢想的實現。隨著奧匈帝國在一戰結束時分崩離析，其成員國有的建立了民族國家，比如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Czechoslovakia）和南斯拉夫（Yugoslavia）；有的加入了相鄰的、或新或舊的民族國家，比如波蘭和羅馬尼亞；大約600萬德語人口則留在了奧地利，被夾在德國和意大利之間的阿爾卑斯山脈及其附近地區，其中絕大多數人都認為最好的出路是加入德意志帝國，幾乎無人認為殘存的奧地利在政治上或經濟上能獨立生存。在過去的幾十年里，這些德語人口中的絕大多數將自己視為多民族的奧匈帝國的主體民族。那些倡導1848年解決方案，即德語人口脫離奧匈帝國，加入德意志帝國的人，比如舍納勒爾，過去只是被人看作極端分子。而現在，奧地利突然間被從它以前在經濟上極為倚賴的內陸，尤其是匈牙利，切割出來；突然間從哈布斯堡王朝政府機構和軍隊裁撤下來的官員，造成首都維也納人口激增，人口所占比例超過這個新國家居民總人口的三分之一，成為奧地利的沉重負擔。于是，從前被視為奇談怪論的政治觀點現在似乎有了政治上的合理性。甚至奧地利的社會主義者也認為，如果奧地利加入較為先進的德意志帝國，將會比獨自努力更快地實現社會主義。[[124]](#124)

此外，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在其著名的“十四點計劃”（Fourteen Points）[†](#_163)中列出了他希望協約國致力于實現的目標，其中就有：讓各民族都能夠決定自己的未來，不受他國干涉。[[125]](#125)如果這個原則適用于波蘭人、捷克人和南斯拉夫人，那么它當然也應該適用于德國人，對不對？但答案是否定的。協約國自問：我們為何而戰，難道是為了在戰爭結束時坐視德意志帝國增加600萬人口，并且大面積擴張領土，包括將歐洲最大的城市之一納入囊中嗎？于是德奧合并被否決。在《凡爾賽和約》有關領土的全部條款中，這一條似乎是最不公平的。協約國立場的支持者與批評者可以討論其他條款的利弊，可以辯論為解決上西里西亞等地的領土糾紛而進行的全民公決是否公平，但奧地利問題則根本沒有爭論的余地。奧地利人希望合并，德國人愿意接受合并，民族自決的原則也支持合并；因此，協約國對德奧合并的否決，一直是德國人心懷怨恨的根源，同時也使新建立的“德意志—奧地利共和國”（Republic of German-Austria）[‡](#_164)（當時的國名）陷入了20年的頻繁沖突、危機四伏，該國公民幾乎無人承認這一否決的合法性。[[126]](#126)

許多德國人意識到，協約國禁止德奧合并，就像《凡爾賽和約》中的其他條款一樣，其合理性都來自《和約》第二百三十一條——強制德國為1914年爆發的戰爭承擔“全部罪責”。同樣令德國人感到冒犯的條款還有：授權以戰爭罪審判德皇等人。1914年德軍入侵比利時和法國北部期間，確實犯下了極其殘暴的罪行。然而在萊比錫（Leipzig）一家德國法院進行的寥寥幾次審判幾乎均告失敗，因為德國法官裁定，多數指控都不成立。在最初甄選出接受審判的900名戰犯中，最終僅有7人被認定有罪，10人被宣告無罪，余者則從未經歷過一次完整的庭審。長留于德國公共記憶中的想法是，戰爭罪的全部概念，確切地說是戰爭法的全部理念，是戰勝的協約國根據虛假宣傳中的虛構暴行，憑詭辯而捏造出來的。這種觀點對于德軍在二戰期間的心態與行為有著致命的影響。[[127]](#127)



地圖3　凡爾賽和約

其實第二百三十一條的真正意圖，是為協約國向德國征收懲罰性戰爭賠款提供法律依據，尤其是賠償法國和比利時在被德國占領的4年零3個月時間里所蒙受的損失。德國掠奪了200多萬噸商船、5,000個火車頭和136,000節車廂、2,400萬噸煤炭和其他大量物資。戰爭賠款將在未來很多年里以黃金支付。[[128]](#128)為防止戰爭賠款仍無法阻止德國籌資重建武裝力量，《和約》還限定德國軍隊的規模最高不得超過10萬人，禁止使用坦克和重型火炮，禁止征兵；600萬支德國步槍、15,000多架飛機、超過13萬挺機關槍以及大量其他軍事裝備必須銷毀；德國海軍實際上已被解散，并被禁止建造任何大型新艦只；根本不允許德國擁有空中力量。這些條款就是1918—1919年西方協約國擺在德國人面前的和平條件。[[129]](#129)

### 二

大多數德國人對這些條款深惡痛絕。[[130]](#130)憤怒與不信任感如沖擊波般蔓延到德國上層和中產階級的幾乎每個角落，也對工人階級中許多支持社會民主黨溫和派的人產生了極大影響。自1871年統一以來，德國的國際實力與威望一直處于上升階段，所以此時多數德國人突然間感到，德國已被野蠻地逐出強國之列，并蒙受了他們認為不應得的恥辱。《凡爾賽和約》被譴責為一方強加給另一方的、沒有談判余地的、強行規定的和約。眾多德國中產階級人士在1914年顯示出的戰爭熱情，4年后轉為對停戰條款的痛恨。

實際上，停戰協議為德國在東中歐的外交政策創造了新的機會，盛極一時的哈布斯堡和羅曼諾夫王朝被一堆爭執不休、不穩定的小國所取代，比如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蘭、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凡爾賽和約》的領土條款相對而言是溫和的，因為如果德國戰勝，它施于歐洲其他國家的條約會更加強硬；這種強硬，原則上的明確表述見于德國宰相貝特曼·霍爾維格在1914年9月制定的計劃，實踐上的生動表現見于1918年春德國與戰敗的俄國所訂立的《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約》。假如德國戰勝，也會有一張巨額的賠款賬單送達戰敗的協約國，其數額無疑會比俾斯麥在1870—1871年戰爭之后送交法國的賬單高出很多倍。德國從1919年開始實際支付的戰爭賠款，并未超出國內資源的承擔能力；而且考慮到德國占領軍對比利時和法國的肆意破壞，賠款數額也并非不合理。從很多方面看，1918—1919年的停戰協議都是在已經急劇變化了的世界里，將原則與實用主義相結合的一次大膽嘗試。這在其他環境下也許有成功的機會，但在1919年的環境下則不行，當時幾乎任何和約條款都會遭到德國民族主義者的譴責，因為他們認為對方不公正地竊取了勝利。[[131]](#131)從戰爭結束直到大約1920年代末，協約國沿著萊茵河谷對德國西部地區實施的長期軍事占領，也引起了民眾的普遍怨恨，并使當地的德意志民族主義情緒日益高漲。有一位生于1888年的社會民主黨人，原先持反戰立場，后來卻寫道：“我漸漸感覺到法國兵槍托的存在，又變得愛國了。”[[132]](#132)盡管英國和美國駐軍遍布萊茵蘭的廣大地區，但在萊茵蘭和薩爾蘭，最招人憎恨的是法軍。尤其令人憤怒的是，法國人取締了德國的愛國主義歌曲和節日，在當地鼓勵分離主義運動，宣布激進的民族主義團體為非法。薩爾蘭有位礦工說，新接管國有礦山的法國人以苛待工人的方式表達他們對德國的仇視。[[133]](#133)消極抵抗——特別是在愛國的基層公務員中間，比如拒絕為新上臺的法國當局服務的鐵路職員——激勵著人們仇視那些接受現狀的柏林政客，反對無力改變現狀的德國民主政府。[[134]](#134)

雖說停戰協議和《凡爾賽和約》激怒了大多數德國普通民眾，但與它們對極端民族主義的鼓吹者所造成的影響，尤其是對泛日耳曼聯盟成員所造成的影響相比，那根本算不了什么。泛日耳曼聯盟在1914年對戰爭的爆發表現出了無限的熱情，近乎狂喜。對于海因里希·克拉斯那類人來說，這是實現畢生夢想的契機，事情似乎終于要按他們的想法發展了。泛日耳曼聯盟曾在戰前為吞并領土和稱霸歐洲擬定了雄心萬丈的計劃，此時似乎有了實現的機會，由貝特曼·霍爾維格領導的政府制定的一套戰爭目標，在范圍和規模上非常接近于他們的計劃。工業家中央同盟等壓力團體和保守黨等政黨眾聲喧嘩，強烈要求德意志帝國在戰勝后兼并廣闊的領土。[[135]](#135)但勝利并未降臨，且反對領土兼并的呼聲漸高。在此形勢下，克拉斯和泛日耳曼聯盟開始意識到，他們應該另想良策擴大支持基礎，以便再次向政府施壓。然而正當他們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千方百計與其他團體結盟時，卻突然被一場新興的運動搶占了先機，該運動的發起人沃爾夫岡·卡普（Wolfgang Kapp）曾為公務員，擁有不動產，是商業巨頭以及泛日耳曼聯盟創始人之一阿爾弗雷德·胡根貝格的合伙人。在卡普看來，沒有群眾基礎的民族主義運動是不可能成功的。1917年9月，他創建德意志祖國黨（German Fatherland Party），黨綱的核心內容包括兼并主義者的戰爭目標、獨裁式修憲，以及泛日耳曼聯盟的其他政綱。在克拉斯、工業家中央同盟、前海軍大臣阿爾弗雷德·馮·提爾皮茨，以及實際上包括保守黨在內的所有兼并主義者團體的支持下，祖國黨展示出一種超越黨派之爭，只以德意志民族為重，而不糾結于抽象意識形態的形象。教師、新教牧師、軍官等各界人士紛紛加入。在一年之內，祖國黨聲稱其黨員人數不下125萬。[[136]](#136)

但實際情況與表象并不相符。首先，黨員人數被夸大了，許多人既作為入黨的個人又作為合并進來的團體成員而被重復計數，因此根據該黨1918年9月的一份內部備忘錄，真正的黨員人數不超過44.5萬。其次，克拉斯和泛日耳曼聯盟不久即遭冷落，因為祖國黨領導層認為，與之結盟會使政治立場不那么極端的潛在支持者望而卻步。祖國黨遭到自由派的極力反對，并引起政府的高度警惕，禁止軍隊官兵加入，還通知公務員不得以任何方式幫助祖國黨。祖國黨吸納工人階級入黨的雄心被兩股力量挫敗：一股來自社會民主黨，他們尖銳抨擊祖國黨的意識形態是在制造分裂；另一股來自戰爭傷殘人員，他們于1918年1月（應邀）參加祖國黨在柏林召開的會議，與發言者激烈地爭吵起來，結果被聽眾中的超級愛國者趕出會場，還招來警察制止他們斗毆。這一切表明，祖國黨實際上是以往各種極端民族主義運動的又一個版本，甚至比那些運動更被中產階級名流所左右。祖國黨既無爭取工人階級支持的新舉措，也無工人階級的代言人；它雖然大力宣傳鼓動，卻全無平易近人之風；它在政治活動中言行得體、堅不逾矩，避免使用暴力；最重要的是，它顯示了傳統的泛日耳曼政治野心的破產，當泛日耳曼聯盟無力應對戰后德國的政治新局面，在1918年之后漸漸淡出政壇時，這種破產即得到了證明。[[137]](#137)

### 三

改變極端民族主義格局的不是戰爭本身，而是戰敗的經歷、革命以及戰爭結束時的武裝沖突。在其中起重要作用的，是1914—1918年“前線一代”（front generation）的傳奇。“前線一代”指的是，在超越了一切政治分歧、地域界限、社會地位和宗教差異的英雄事業中，以袍澤之誼和自我犧牲精神為紐帶凝聚在一起的軍人。作家們著書贊美將士們的事跡，比如恩斯特·容格爾（Ernst Jünger）的暢銷書《鋼鐵風暴》（Storm of Steel），在這些作品的熏陶下，人們很快就懷念起戰爭年代的團結精神。[[138]](#138)中產階級尤為迷戀這種傳奇，戰爭期間他們在戰壕里與工人和農民共同承擔的現實困難和精神痛苦，為他們在戰后歲月里的懷舊文學盛宴提供了素材。[[139]](#139)許多戰士極度厭惡1918年爆發的革命，從前線歸來的部隊有時候會解除途經地區的工人與士兵委員會（Soldiers' and Workers' Council）的武裝，或者逮捕他們。[[140]](#140)有些參戰人員轉而信奉激進的民族主義，因為革命者迎接他們的是侮辱而不是贊揚，強迫他們摘掉肩章、放棄對帝國黑白紅旗（black-white-red Imperial flag）[§](#SS_9)的忠誠。一位老兵后來這樣回憶道：

1918年11月15日，我從巴特瑙海姆（Bad Nauheim）的醫院返回勃蘭登堡的軍營。我正拄著拐杖、蹣跚地走在柏林的波茨坦（Potsdam）車站，一伙身穿制服、故意晃著紅袖章的人攔住了我，要求我交出肩章和徽章。我舉起拐杖作為答復，但我的反抗很快被制服。我被打倒在地，直到車站的一位工作人員出面干涉，我才得救，擺脫了受辱的處境。從那一刻起，我的心中就燃起了對十一月罪人[¶](#P_9)的仇恨。等健康狀況稍有起色，我就加入了那些致力于推翻叛亂勢力的團體。[[141]](#141)

德國已經推翻了將士們為之而戰的體制，有些士兵在歸國時受到了“可恥的”、“羞辱人的”迎接。他們之中后來有人發問：“朝氣蓬勃的德國青年在數百場戰斗中捐軀，難道就是為了這個？”[[142]](#142)有位在戰斗中失去了一條腿的老兵，1918年11月9日正住在一家軍隊醫院，他寫道：

我永遠忘不了那一幕：有位失去一條胳膊的戰友走進病房，撲到自己的床上大哭起來。那幫沒聽過一聲子彈呼嘯的紅色暴民毆打了他，扯掉了他所有的徽章和勛章。我們憤怒地大吼。幾年來，我們獻出鮮血、犧牲健康，勇敢地面對地獄般的煎熬和無數的敵人，竟然是為了這樣的德國。[[143]](#143)

“是誰出賣了我們？”有人問道。答案不久就出現了：“是那些想把德國毀為廢墟的歹徒……邪惡的異類。”[[144]](#144)

這種情緒在部隊中并不普遍，戰敗的經歷并沒有把所有老兵變成極右勢力的政治炮灰。面對協約國敵人的大軍壓境，許多德軍無心戀戰，開了小差。[[145]](#145)數百萬工人階級出身的士兵回歸他們原先的政治陣營，加入社會民主黨，或者被吸引到共產黨的旗下。[[146]](#146)一些由老兵組成的壓力團體堅定地表示，他們希望任何人都永遠不再經歷他們在1914—1918年所遭受一切。然而，對于戰后的暴力與不滿氛圍的最終形成，老兵和他們的怨氣確實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并且在從戰爭狀態調整到和平環境的過程中，許多人因為受到刺激而趨向極右翼立場。那些已經在政治上融入保守和民族主義傳統的人，發現自己的思想在1920年代的政治新語境中變得激進了。左翼陣營亦然，親身經歷或間接感受的戰爭痛苦，使他們開始樂于使用暴力。[[147]](#147)隨著戰爭的遠去，“前線一代”的傳奇逐漸使人們普遍感到，在戰爭期間為國家做出巨大犧牲的老兵們，理應得到比實際得到的好得多的待遇，許多老兵當然認同這種觀點。[[148]](#148)

最重要的幾個老兵協會都對這些不滿情緒深有感觸，極力呼吁恢復那個曾經領導他們戰斗的舊帝國體制。“鋼盔前線士兵聯盟”（Steel Helmet: League of Front-Soldiers）成立于1918年11月13日，創始人弗朗茨·澤爾特（Franz Seldte）是馬格德堡（Magdeburg）一家小型汽水廠的廠長。生于1882年的澤爾特曾是學生決斗隊（student duelling corps）的活躍分子，后來赴西線作戰，并因作戰英勇而被授予勛章。在“鋼盔”成立之初的一次公開集會上，聽眾中有人質疑他對民族主義事業的貢獻，澤爾特便揮揮左臂殘肢，向他們展示自己在索姆河戰役（Battle of the Somme）[\*\*](#_165)中失去的手臂。出于本能的謹慎與保守，他更愿意強調“鋼盔”的主要功能是為陷入困境的老兵提供經濟援助。澤爾特容易受強勢人物的影響，尤其是那些比他立場更強硬的人，其中之一是同為“鋼盔”領導人的特奧多爾·杜斯特伯格（Theodor Duesterberg），此人也是曾在西線作戰的軍官，后來在參謀部的一系列崗位任職，主要負責與土耳其和匈牙利等盟國的聯絡事務。杜斯特伯格生于1875年，曾就讀于陸軍士官學校，屬于典型的普魯士軍官，迷戀紀律與秩序，政治立場頑固僵化，而且像澤爾特一樣，完全無法適應一個沒有皇帝的世界。因此，二人都認為“鋼盔”應該“超越政治”，但這意味著他們在實踐中需要克服黨派分歧，恢復1914年的愛國主義精神。該組織在1927年的柏林宣言中宣稱：“鋼盔”向一切軟弱和怯懦的行為宣戰，這些行為試圖通過放棄防御權與防御意志，來削弱和破壞德意志人民的榮譽意識。宣言譴責并要求廢除《凡爾賽和約》，希望恢復俾斯麥時期德意志帝國的黑白紅國旗，并且將德國的經濟困難歸因于“缺少能夠施展拳腳的生存空間和領土”。要執行這個計劃，需要強有力的領導人。在戰爭中結成的袍澤之誼，必須為民族團結提供基礎，從而克服當前的黨派分歧。到1920年代中期，“鋼盔”號稱擁有大約30萬團員。在街頭游行和集會時，他們是一支令人生畏的、堅定的軍國主義力量。確實，至少13.2萬身穿軍裝的“鋼盔”成員參加了1927年在柏林舉行的閱兵式，以示對舊秩序的忠誠。[[149]](#149)

與“鋼盔”一樣，多數德國人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創傷，尤其是意料之外的戰敗所帶來的打擊，是無法愈合的。1918年之后，當德國人說起“和平時期”，指的不是他們當下實際生活的年代，而是大戰開始之前的歲月。德國在1918年之后未能實現從戰時到和平年代的過渡，而是一直處于戰斗狀態：與國內對手戰斗，與全世界戰斗，因為《凡爾賽和約》使政治光譜中的幾乎所有派別都下定決心，力圖廢除和約的核心條款、收回失去的領土、停止支付賠款、恢復德國在中歐的霸權。[[150]](#150)1914年以前，軍隊的行為規范已廣泛地影響著德國的社會與文化；到了戰后，它們更是變得無處不在。政治語言彌漫著火藥味，其他黨派成了應被打倒的敵人，斗爭、恐怖和暴力已經普遍被接受為政治斗爭的合法武器，到處都是穿制服的人。可以把19世紀早期軍事理論家卡爾·馮·克勞塞維茨（Carl von Clausewitz）的名言[††](#_166)倒過來說：政治成了戰爭通過另一種手段的繼續（Politics became war pursued by other means）。[[151]](#151)

第一次世界大戰將暴力合法化的程度，甚至超過了俾斯麥在1864—1870年統一戰爭中所達到的程度。一戰前，就連彼此政治信仰南轅北轍、針鋒相對的德國人，也能夠不訴諸暴力地討論彼此的分歧。[[152]](#152)然而到了1918年之后，風氣徹底改變。氣氛的變化已經可以從國會的議事過程中觀察到：在帝國時代，國會議事一向比較穩重得體；但1918年之后卻頻頻淪為不體面的吼叫比賽，一方公開表示對另一方的鄙視，議長無法維持秩序。不過，街上的情形遠比國會糟糕，各派別組織了流氓別動隊，打架和罵戰已成家常便飯，痛毆與暗殺是常見手段。采取這些暴力行動的，不僅有以前的軍人，還包括十八九歲和二十多歲的男子，他們之前因年幼而無法上戰場，此時平民暴力成了他們證明自己有資格與傳奇中的老一代前線戰士相提并論的一種方式。[[153]](#153)青年雷蒙德·普雷策爾（Raimund Pretzel）的經歷比較有代表性，這位富裕的高級公務員之子后來在1930年代回憶說，1914—1918年，他和同學們一直在玩戰爭游戲，熱切地關注戰報，他們那一整代人都“覺得戰爭是偉大的、激動人心的、迷人的國與國之間的游戲，它帶給人的興奮與情感滿足遠遠超出和平所能給予的一切；而那種體驗現在成了納粹主義的根本看法”[[154]](#154)。戰爭、武裝沖突、暴力和死亡對他們來說往往是抽象的概念，他們從中讀取到的信息是殺戮，然后在青春期的頭腦中進行信息處理時又受到宣傳的影響——這種宣傳將殺戮描繪成英勇的、必要的愛國主義行為。[[155]](#155)

不久之后，各政黨開始與穿軍裝的武裝別動隊合作，這種準軍事組織的任務包括：在集會上擔任警衛；整齊劃一地列隊行進在街道上，吸引公眾的注意；恫嚇、毆打，并在必要時刺殺與其他政黨合作的準軍事組織成員。政客與準軍事組織的關系往往矛盾重重，準軍事組織一直保持著或多或少的自治，但它們的政治色彩通常相當明顯。“鋼盔”表面上只是個老兵協會，但當他們列隊走在街上或者與敵對團體發生沖突時，他們的準軍事功能一覽無遺。從1920年代中期開始，“鋼盔”與極右翼的關系日漸密切，立場也愈加激進，它拒絕猶太人加入，盡管其宗旨是扶助所有上過前線的老兵，而且有大量猶太老兵像其他老兵一樣需要它的幫助。民族黨（Nationalists）[‡‡](#_167)也組建了自己的“斗爭同盟”（Fighting Leagues），這使他們可以專心追求自己的目標，有了比與混亂、分裂的“鋼盔”合作時更好的發展機會。1924年，社會民主黨領銜組建了“黑紅金帝國國旗團”（Reichsbanner Black-Red-Gold），他們用魏瑪共和國國旗的顏色為自己的組織命名，以示對共和國的忠誠，但名稱中的“帝國”又表達了與共和國遙遙相悖的理念。共產黨組建“紅色陣線戰士同盟”（Red Front-Fighters' League），其中“紅色陣線”一詞本身就明顯地把軍事隱喻納入了政治斗爭。[[156]](#156)極右翼陣營也有一些規模較小的“戰斗同盟”（Combat Leagues），它們逐漸淪為非法的陰謀團體，比如與“鋼盔”密切合作的“埃舍里希團”（Organization Escherich），以及從事政治暗殺與仇殺的黑社會組織“執政官組織”（Organization Consul）。成群結伙身穿制服的人在街道上穿行，互相沖撞、野蠻地大打出手，在魏瑪共和國成了司空見慣之事，使政治生活中的暴力與攻擊性氣息更加濃重了。[[157]](#157)

1918—1919年的德國革命并未解決戰爭最后階段不斷加劇的國內矛盾，極少有人對革命的結果感到完全滿意。在極左陣營，卡爾·李卜克內西和羅莎·盧森堡領導下的革命者認為，1918年十一月革命是建立社會主義國家的契機，那些隨著帝國舊體制的瓦解而雨后春筍般出現在全國各地的“工人和士兵委員會”，將成為新國家的管理者。他們以列寧的布爾什維克革命為榜樣，加緊執行二次革命的計劃。對他們而言，社會民主黨的主流派害怕革命者會重蹈當時俄國的覆轍。他們為自己的生命擔心，認為有必要防止國家陷入全面的無政府狀態，于是批準招募全副武裝的準軍事組織，即由一戰老兵和青年男子混編而成的“自由軍團”（Free Corps），用以鎮壓繼起的革命暴動。

1919年最初的幾個月里，極左陣營在柏林發動了一次組織松散的暴動，自由軍團在社會民主黨內主流派的慫恿下，做出空前暴虐與野蠻的回擊。李卜克內西和盧森堡被殺害，革命者在許多他們曾經控制或者似有奪權威脅的德國城市被擊斃或者草草處決。這些事件給左翼政黨留下了永久的痛苦與仇恨，1920年春爆發的另一場大規模政治暴力又加深了他們的創傷。為了應對右翼勢力在柏林發動的一次未遂政變、保衛魯爾（Ruhr）工業區公民的自由，社會民主黨內的左翼和共產黨組建了一支工人“紅軍”（Red Army），并開始提出更加激進的政治要求。右翼政變被一場總罷工挫敗之后，自由軍團就在社會民主黨主流派的支持以及正規軍的協助下鎮壓了“紅軍”。這場政治暴力的規模相當于一場局部內戰，被屠殺的“紅軍”成員逾千人，其中多數是“企圖逃跑時被擊斃”的俘虜。[[158]](#158)

這些事件注定了社會民主黨與共產黨之間的任何合作，從一開始就必然失敗。兩黨間相互的恐懼、指責和仇恨，遠遠多于他們之間可能存在的任何共同目標。1918年革命留給右翼陣營的后遺癥，并不少于留給左翼的創傷。社會民主黨內的溫和派即使沒有鼓勵以極端暴力的手段對付左翼人士，也促成了這種做法的合法化；但這絲毫沒能使他們自己免于被反噬，自由軍團現在突然開始對自己的主人下手了。自由軍團的許多領導人都曾經是軍官，對“背后一刀”的說法堅信不疑。軍團對革命及其支持者痛恨之深，幾乎沒有限度。他們的宣傳語言、回憶錄、對自己參加過的軍事行動的虛構式描述，都顯示出瘋狂的攻擊意識和報復心理，往往近乎病態。他們認為，“赤色分子”是沒有人性的群體，如同一群老鼠，帶著毒素，洪水般漫過德國。如果想控制住他們，就需要使用極端暴力的手段。[[159]](#159)

自由軍團的情緒，在不同程度上得到大量正規軍軍官和絕大多數右翼政客的認同，許多未能參加一戰的青年學生和其他人士如今麋聚到右翼政客旗下。在這些人看來，任何政治陣營中的社會主義者和民主派都堪比賣國賊——他們不久即被稱為“十一月罪人”或“十一月賣國賊”，意思是他們先在背后捅了軍隊一刀，然后又在1918年11月犯下推翻皇帝和簽署停戰協定的雙重罪行。對某些民主派政客而言，簽署《凡爾賽和約》其實就等于簽署了自己的死刑執行令，因為自由軍團的成員組建了暗殺隊，意在清除和刺殺那些被他們視為賣國賊的人，包括民主派政客瓦爾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社會主義者領軍人物胡戈·哈塞（Hugo Haase）和著名的中央黨議員馬蒂亞斯·埃茨貝爾格（Matthias Erzberger）。[[160]](#160)政治暴力在1923年達到了新的高度，當年的標志性事件不僅包括共產黨在漢堡的未遂起義遭到血腥鎮壓，還有慕尼黑敵對政治團體之間的槍戰，以及有法國支持的分離主義者參與的萊茵蘭武裝沖突。1920年代初，極左人士，比如卡爾·普拉特納（Karl Plättner）和馬克斯·赫爾茨（Max Hölz），從事武裝搶劫與“征用”活動，直到他們被逮捕并被判處長期徒刑才告收場。[[161]](#161)

正是在這種民族創傷、政治極端主義、暴力沖突和革命暴動的氛圍中，納粹主義誕生了。其意識形態中雜糅的大多數元素，在1914年之前就已經流行于德國，并在戰爭期間更加為公眾所熟知。德國在1918年底驟然陷入政治亂局，這種混亂狀態在戰后又持續了數年，刺激了極端思想向暴力行動的轉化。曾經令少數泛日耳曼極端主義者興奮沉迷的仇恨、恐懼和野心的大雜燴，突然間獲得了一個至關重要的元素：使用武力的意愿，乃至決心。國恥、俾斯麥帝國的崩潰、社會民主黨的上臺、共產主義的威脅，這一切在某些人看來似乎提供了正當的理由，可以使用暴力和謀殺的手段，去執行泛日耳曼論者、反猶主義者、優生學家和極端民族主義者在即將進入20世紀時就已開始鼓吹的，德意志民族如欲復興所需要采取的措施。

然而即使在1918年之后，持上述觀點者也依然是少數，使用武力將其付諸實施者更是僅限于個別的極端分子。德國社會和德國政治都因1918—1919年帝國的崩潰而呈現出兩極分化，但并未轉入對極端民族主義的普遍熱衷。而且至關重要的是，占據政治中心地帶的依然是這樣的人物和政黨：致力于建立一個穩定的、功能正常的議會民主制度，致力于社會改革，致力于讓所有人都享有文化自由和經濟機會。威廉帝國的垮臺為這樣的人物和政黨提供了機會，他們也欣然抓住了機會。因此，極端民族主義要想闖入政治主流，必須先掃除由德國的第一個民主政體——魏瑪共和國所制造的障礙。

[\*](#_126) 即“基爾水兵起義”。1918年10月29日，德國海軍統帥部下令集結在基爾港的遠洋艦隊出海同英國決戰，幾百名水兵因拒絕執行命令而遭逮捕；11月3日，基爾港水兵舉行示威游行，并發展成武裝起義，是德國十一月革命的開端。

[†](#_127) 威爾遜于1918年1月發表的和平原則，主張實現民族自決，倡導建立公正而持久的和平；提出成立國際聯盟，以維護各國的領土完整和政治獨立。8月，德國提出愿意在“十四點計劃”的基礎上和談。10月，協約國同意以“十四點計劃”作為議和的指導綱領。但最后議定的《凡爾賽和約》條款大多不符合“十四點計劃”的初衷。

[‡](#_128) 德意志—奧地利共和國（1918—1919），奧匈帝國解體后，地位未定的德語地區使用的國名，以此表達與德國合并的意向。1919年9月，協約國與之簽署《圣日耳曼昂萊條約》（Treaty of Saint-Germain-en-Laye），禁止奧地利與德國合并。“德意志—奧地利共和國”遂改稱“奧地利第一共和國”（First Austrian Republic）。在1919年6月協約國與德國簽署的《凡爾賽和約》中，也禁止德國與奧地利合并。

[§](#SS_8) 黑白紅旗，1871—1918年德意志帝國國旗。

[¶](#P_8) 指《凡爾賽和約》的簽訂者，被指為出賣民族的罪人。——編注

[\*\*](#_149) 索姆河戰役，一戰期間英法聯軍與德軍在西線的一次重要戰役，1916年7月至11月發生于法國北部索姆河區域，雙方傷亡超過百萬。

[††](#_151) 卡爾·馮·克勞塞維茨的那句名言是：“戰爭是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的繼續。”（War is the continuation of politics by other means）

[‡‡](#_156) 即德意志民族人民黨（German National People's Party），是魏瑪共和國時期主要的保守和民族主義政黨。——編注

# 第二章 民主之殤

## 第一節 魏瑪的弱點

### 一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際，恐懼與仇恨籠罩德國。槍戰、暗殺、騷亂、屠戮和社會動蕩，使德國的民主新秩序無法獲得生存繁榮所需的穩定環境。然而，皇帝退位以及俾斯麥建立的帝國解體之后，政權必須有人接管。社會民主黨填補了權力的真空。在1918年11月初的亂局中，勞工運動的一群領軍人物出面組建革命的“人民全權代表委員會”（Council of People's Delegates）[\*](#_172)，它至少在短時期內將社會民主運動的兩翼（支持戰爭的多數派與反戰的獨立社會民主黨）聯合了起來，委員會由長期在社會民主黨內任職的弗里德里希·艾伯特領導。艾伯特生于1871年，是裁縫之子，后來成為馬具匠。他通過參與工會活動步入政界，先是在不來梅（Bremen）的社會民主黨黨報當編輯，后來于1893年在該市開了一家酒館，其功能與許多同類機構一樣，是當地勞工組織的活動中心。到1900年，艾伯特已是不來梅市政壇的活躍人物，作為當地的社會民主黨領導人，他為提高黨的效力做了大量工作。1905年，艾伯特當選設在柏林的社會民主黨中央委員會書記，并于1912年進入帝國國會。

艾伯特不是作為偉大的演說家或者魅力超凡的領袖，而是作為冷靜、耐心和機敏的談判者，贏得了黨內的尊重，他似乎總能把勞工運動的不同派別凝聚在一起。艾伯特是社會民主黨第二代領導人中典型的實干家，他認同該黨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但致力于運用自己在勞動法和社會保險等領域的專長，逐步改善工人階級的生活。黨的管理機構和競選機構在戰前實現改組、提高了效率，主要得益于艾伯特的辛勤工作，他對于社會民主黨在1912年國會選舉中那次著名的大勝可謂厥功至偉。1913年，長期擔任黨魁的奧古斯特·倍倍爾（August Bebel）去世，艾伯特與更加激進的胡戈·哈塞同時當選為黨的聯合領導人。像許多社會民主黨組織者一樣，艾伯特把對黨的忠誠看得幾乎高于一切，他對哈塞等反戰人士拒絕服從黨內多數人的決議感到憤慨，這是促使他將他們開除出黨的主要因素。這些異見人士在哈塞的領導下于1917年組建獨立社會民主黨，他們從各種角度入手，努力推動停戰。艾伯特相信紀律與秩序、折中與改革，在戰爭期間努力促成社民黨與中央黨和左翼自由派的合作，以便推動皇帝的行政機構接受議會制度。出于清醒的執政者所特有的務實態度，他把1918—1919年的主要目標設定為：維持基本的公共服務正常運行，阻止經濟崩潰，恢復法律與秩序。他之所以轉而贊同敦促皇帝退位，僅僅是因為意識到如果不這樣做，社會革命就會一觸即發。在與皇帝的末任宰相巴登親王馬克斯談話時，艾伯特說：“我不想這樣，事實上我討厭這樣，就像討厭罪惡。”[[1]](#1_2)

艾伯特想要的不是革命，而是議會民主制度。激進派希望以工人與士兵委員會為基礎組建某種蘇維埃式政府，艾伯特及其在人民全權代表委員會的同仁為了抵制這種做法，與中央黨和當時已更名為民主黨的左翼自由派合作，于1919年初為制憲會議組織了全國選舉。許多德國普通選民，無論有著怎樣的個人政見，都認為防止德國建立蘇維埃式政權、抵御布爾什維克革命威脅的最好辦法，是投票給這三個民主政黨。因此，社會民主黨、左翼自由派民主黨和中央黨在制憲會議的選舉中毫無懸念地贏得了絕對多數票。制憲會議于1919年初在德國中部小鎮魏瑪召開，那里是18世紀和19世紀初的德國詩人、小說家和戲劇家約翰·沃爾夫岡·馮·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長期生活和工作過的地方。[[2]](#2_2)1919年7月31日通過的憲法，基本上是俾斯麥在近半個世紀之前為德意志帝國制定的憲法的修訂版。[[3]](#3_2)其中規定，由帝國總統取代皇帝，總統將像美國總統那樣通過普選產生。憲法不僅從法律上賦予總統獨立于立法機構的地位，還支持總統行使憲法第四十八條所授予的寬泛的緊急處置權。在危機期間，只要總統認為哪個州受到了威脅，就可以通過總統令的形式行使專制權，動用軍隊恢復那里的法律與秩序。

設計這項專制權的初衷僅僅是針對非常緊急的狀況，然而艾伯特作為共和國的首任總統，卻非常廣泛地行使著這一權力，在不少于136種情況下使用過。他解散了薩克森州和圖林根州（Thuringen）由民選產生的合法政府，因為覺得它們有挑動騷亂的危險。更加危險的是，在1920年魯爾區內戰期間，他頒布法令，宣布死刑適用于擾亂公共秩序罪，并且具有追溯力，因此自由軍團和正規軍分隊此前草率處決許多紅軍成員的行為屬于合法。[[4]](#4_2)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兩種情形中，專制權都被用于鎮壓所謂左翼對共和國的威脅，而幾乎未被用于應對在很多人看來嚴重得多的、右翼對共和國的威脅。實際上并無有效措施可以防范第四十八條被濫用，因為假如國會否決總統令，那么總統可以行使憲法第二十五條賦予他的權力解散國會。而且無論在何種情況下，總統令都可以用于制造既成事實，即造成國會除了批準總統令之外別無選擇的局面（例如，總統令有可能被用來恐嚇和鎮壓現任政府的反對者，盡管艾伯特從未如此行事）。誠然，在有些狀況下，除了某種形式的專制統治，也許沒有其他選擇。但是第四十八條并未包含適當條款，用以約定立法機構最終有權在總統專制權被濫用時收回此項權力。艾伯特不僅將專制權施用于緊急狀態，而且施用于形勢并不緊急，但提案可能難以獲得國會同意的情形。結果，艾伯特對第四十八條的過度使用以及偶爾的濫用，致使專制權的行使范圍擴大到了成為民主制度之潛在威脅的程度。[[5]](#5_2)

艾伯特領導了魏瑪共和國的創建，功不可沒。然而他也做了許多輕率的妥協，這些折中之策后來轉而以不同形式困擾著共和國。他注重從戰爭到和平的平穩過渡，因此與軍隊緊密合作，但卻沒有要求軍中強硬的君主主義者和極端保守的軍官團做出任何改變，而他在1918—1919年完全有資格那樣要求。可是艾伯特與舊秩序妥協的意愿，根本未能取悅那些痛惜舊秩序之逝去的人。擔任總統期間，他始終是右翼媒體無情詆毀、肆意討伐的對象。在一張廣為傳播的報紙照片上，又矮又胖的帝國總統與幾位友人在海邊度假，身上只穿了條泳褲，這讓他招致那些覺得國家元首應該超然絕俗、天神般高貴的人的嘲笑和鄙視。另一些反對者供職于揭露黑幕的右翼媒體，企圖把他與金融丑聞扯在一起，以此誹謗他。艾伯特的反應也許傻氣，他以誹謗罪起訴那些造謠者，接連興訟不少于173宗，無一得到滿意的結果。[[6]](#6_2)在1924年審理的一宗刑事案中，被告因稱艾伯特為叛國者而受到指控。法庭對被告象征性地罰款10馬克，裁決的理由是，艾伯特確實顯示自己是個叛國者，因為他在戰爭的最后一年與柏林罷工的兵工廠工人保持聯系（但實際上他這樣做是為了通過談判盡快結束罷工）。[[7]](#7_2)極右翼源源不斷傾瀉到艾伯特身上的仇恨見效了，不僅動搖了他的地位，也令他身心俱疲。艾伯特執著于辯誣、自證清白，忽視了闌尾穿孔這種以當時的醫療技術本可輕松治愈的疾病，于1925年2月28日病逝，終年54歲。[[8]](#8_2)

隨后的總統選舉對魏瑪共和國的民主前景來說是一場災難。魏瑪的政治分裂和法統欠缺所產生的致命影響，于此時顯現出來。因為在第一輪投票中，各位候選人均無獲勝的跡象，于是右翼陣營把不愿參選的陸軍元帥保羅·馮·興登堡推到前臺，用他的號召力來聚攏四分五裂的支持者。在接下來的決勝投票中，假如共產黨或者中央黨內獨立自主的巴伐利亞派投票給興登堡最強勁的對手、天主教政客威廉·馬克思（Wilhelm Marx），那么陸軍元帥就有可能敗下陣來。不過，主要拜巴伐利亞派的自大自私之所賜，興登堡以明顯的多數票當選。壯碩魁梧的興登堡是昔日的軍事秩序和帝國秩序的卓越象征，他儀表堂堂，一身戎裝，勛章累累，因坦嫩貝格（Tannenberg）大捷以及此后主宰了德國的軍事命運而獲得傳奇般的聲望——多半是徒負虛名，這一切使他成了備受尊崇的首腦，尤其是對右翼而言。興登堡的當選受到右翼勢力的歡迎，被他們視為復辟的象征。對此不以為然、充滿憂慮的保守派學者維克托·克倫佩雷爾在日記中記錄下他的觀察：“5月12日，興登堡宣誓就職，到處是黑白紅旗，只有政府大樓掛著帝國國旗[†](#_173)。”克倫佩雷爾說，他那天看到的黑白紅旗中有五分之四是兒童用的那種小旗子。[[9]](#9_2)對許多人來說，興登堡的當選是背離魏瑪民主制度、朝著恢復君主制舊秩序邁出的一大步。有個應景的謠言不脛而走，說興登堡覺得應該在就任總統之前征得當時流亡荷蘭的前皇帝威廉的同意。這個傳聞并不屬實，但它的流傳很能說明興登堡功高望重的程度。[[10]](#10_2)

出乎多數人意料的是，興登堡就職之后，受強烈的責任感驅使，不折不扣地遵照憲法行事；但是，隨著7年任期逐漸耗盡，加之年已八旬，他對于政局的錯綜復雜越來越沒有耐心，也越來越容易受親信幕僚的影響，這些人都對他直覺認為君主制是德國唯一合法的政體表示贊同。前任艾伯特的例子，讓興登堡相信行使總統的緊急處置權是正確之舉，他開始認為要想擺脫共和國在1930年代初面臨的危機，唯一的出路是以他的名義實行保守的獨裁統治。因此，不論興登堡的當選在短期內怎樣有助于共和國的反對者接受它的存在，從長遠看，他的當選對于魏瑪民主制度完全是一場災難。最遲至1930年，人們已經可以清楚地看出，這個掌握著總統權力的人并不信仰民主制度，也無意在民主政體的敵人面前捍衛它。[[11]](#11_2)

### 二

國家的立法機構與從前一樣稱作“帝國國會”。除了“帝國總統”職位，按照魏瑪憲法的規定，帝國國會也由選舉產生，但此時的選民既包括所有成年男子，也包括所有成年女子，選舉所采用的比例代表制形式比1918年以前的更加直接。在實際操作中，選民投票給他們選擇的政黨，各政黨在國會中的席位數精確地按照各黨所得選票的比例進行分配。也就是說，獲得30%選票的政黨將分到30%的席位，而頗令人擔心的是，獲得1%選票的政黨也將分到1%的席位。常有人說這是一種有利于小黨派和邊緣團體的制度，此言無疑是事實。不過，各邊緣型政黨所獲得的票數加起來從未超過15%，因此，大黨組建政府時實際上很少需要考慮它們。比例代表制的真正作用，在于平均分配大黨競爭選票的機會，所以如果采用得票最多者當選的選舉制度，大黨可能會做得更好，并且有可能與數量較少的合作伙伴建立較為穩定的聯合政府，從而讓更多的人相信議會制度的好處。[[12]](#12_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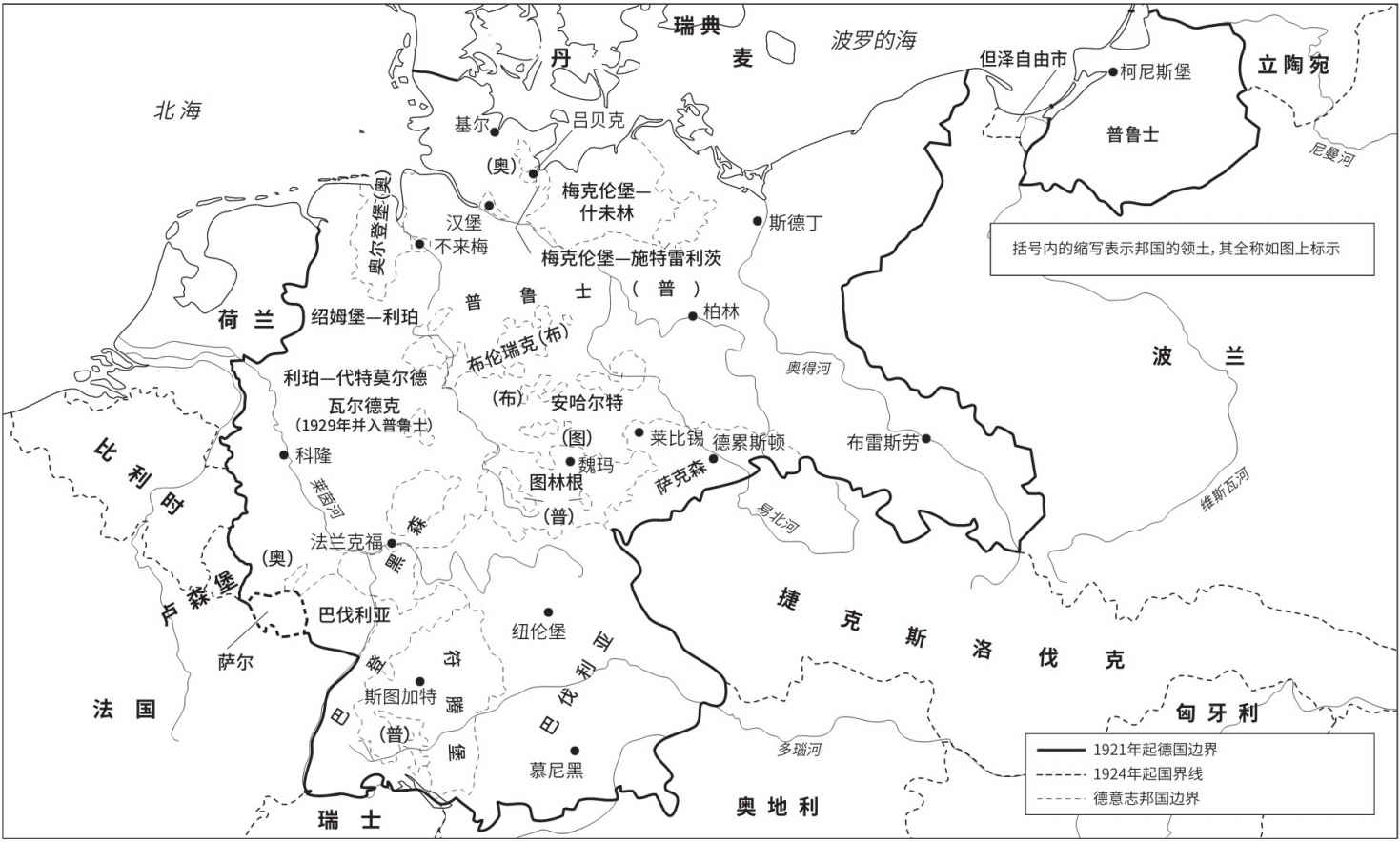
事實上，魏瑪共和國的政府更迭非常頻繁。在1919年2月13日至1933年1月30日期間，至少有過20個內閣，平均當政239天，即每屆內閣不到8個月就倒臺。有人說，聯合政府導致不穩定的政府，因為不同政黨之間經常為人事和政策爭吵不休；聯合政府還導致軟弱的政府，因為它們能夠商定的僅僅是最簡單的事情和阻力最小的路線。然而，魏瑪的聯合政府不僅是比例代表制的產物，它也源于德國政治體系內長期存在的深深裂痕。曾經主宰帝國政壇的政黨全部保留下來，繼續存在于魏瑪共和國。民族黨由原先的保守黨與其他小型團體合并而成。自由派未能彌合分歧，依然分裂為左翼（民主黨）和右翼（人民黨[‡](#_174)）。中央黨幾乎保持不變，雖然黨內的巴伐利亞派分裂出去，組建了巴伐利亞人民黨（Bavarian People's Party）。在左翼陣營，社會民主黨不得不面對一個新對手：共產黨。但比例代表制并不是造成黨派林立的唯一原因，甚至不是主要原因。促成上述各種政黨出現的政治環境，自俾斯麥帝國初期起就一直存在。[[13]](#13_2)

這種政治環境，以及存在于其中的各種黨報、俱樂部和學會，都出奇地僵化和同質化。1914年之前，德國社會生活諸領域已經全面政治化，但其他國家的社會生活則遠未如此具有意識形態上的身份認同。比如說，一位普通德國人如果想參加一個男聲合唱團，那么在有些地區，他必須選擇是加入天主教還是新教唱詩班，在另一些地區，他必須選擇是加入社會主義還是民族主義合唱團；參加體育俱樂部、自行車俱樂部、足球俱樂部等社團時也是如此。在戰前，社會民主黨黨員的全部生活幾乎由黨及其機關包辦了：他可以閱讀社會民主黨的報紙，在社會民主黨的酒館食肆進餐，加入社會民主黨的工會，從社會民主黨的圖書館借書，參加社會民主黨的節日和演出，娶社會民主黨的婦女組織成員為妻，讓子女加入社會民主黨的青年運動，死后也用社會民主黨資助的喪葬費入土為安。[[14]](#14_2)類似的描述還可以用于中央黨（它可以依賴由天主教德國人民聯盟［People's Association for a Catholic Germany］的支持者組成的群眾組織、天主教工會運動、天主教休閑俱樂部以及各種學會），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用于其他政黨。[[15]](#15_2)這些界限分明的政治—文化環境并沒有隨著魏瑪共和國的到來而消失。[[16]](#16_2)然而商業化大眾休閑方式的出現，即主要發布聳人聽聞的消息和丑聞的“林蔭道小報”、電影院、廉價小說、舞廳以及各種各樣的娛樂活動，在1920年代開始為年輕人提供身份認同的替代來源，因此年輕人不像他們的長輩那樣與政黨關系密切。[[17]](#17_2)老一輩政治活動家過分依附于某種政治思想，所以不太容易與其他政客和政黨達成妥協和合作。與1945年后的形勢截然不同之處在于，當時的主要政黨沒有合并成更大、更有效率的組織。[[18]](#18_2)因此，正如在其他許多方面一樣，1920年代和1930年代初的政治動蕩，主要是因為對俾斯麥和威廉二世時代政治結構的承襲，而不是因為魏瑪憲法的新條文。[[19]](#19_2)

比例代表制并不像有些人說的那樣，鼓勵政治無政府狀態，從而助長了極右翼的興起。假如采用得票最多者當選的選舉制度，各選區中得票最多的候選人自動贏得議席，納粹黨在魏瑪共和國最后幾次選舉中得到的席位，甚至有可能會多于該黨的實際所得。但不能下此定論，因為各黨在這種選舉制度下可能會采取不同的競選策略，而且此制度在共和國初期可能發揮的有益作用，也許可以減少納粹黨后來的總得票數。[[20]](#20_2)同樣，憲法中全民公決條款所具有的引發動蕩的效果，也經常被夸大。擁有這種憲法條文的其他政治制度都安然無恙地存在著，況且全民公決的實際發生率實在少之又少。與全民公決有關的宣傳活動確實有助于魏瑪共和國過熱的政治氣氛保持在沸點，不過全民公決幾乎沒有直接的政治作用，盡管1932年舉行的一次省級公投確實成功地推翻了奧爾登堡市（Oldenburg）的民主政府。[[21]](#21_2)

總之，魏瑪共和國政府的不穩定往往被夸大了，政府的頻繁更迭掩蓋了某些部門長期保持的連續性。有些職位，尤其是司法部長，在黨際聯合的談判中被用作討價還價的籌碼，因此頻頻更換，這無疑讓部門內始終留任的高級公務員掌握了比往常更多的權力，盡管他們的職權范圍由于許多司法行政功能被分權給聯邦中的各州而有所削減。然而在聯合政府變幻莫測的重組過程中，其他一些部長職位則基本上成了某個政客的禁臠，因此制定和執行強硬的關鍵政策也就更加容易。例如，人民黨的領軍人物古斯塔夫·施特雷澤曼（Gustav Stresemann）連續在9屆政府中擔任外交部長，不間斷地留任了6年多。中央黨議員海因里希·布勞恩斯（Heinrich Brauns）連續在12屆內閣中擔任勞工部長，任期從1920年6月至1928年6月。民主黨的奧托·格斯勒（Otto Gessler）連續在13屆政府中擔任陸軍部長，任期從1920年3月至1928年1月。這些部長能夠制定和執行長期政策，而不受政府首腦頻繁更替的影響。另一些部門的部長職位也在兩屆、三屆或四屆不同的政府中由某位政客連續占據。[[22]](#22_2)并非出于偶然的是，正是在這些領域，共和國能夠制定最強硬、最有連續性的政策，尤其是在外交、勞工與福利領域。

然而，魏瑪共和國政府堅決、果斷地采取行動的能力，總是受制于憲法的另一個條文，即憲法規定共和國沿用德意志帝國的聯邦結構。這是俾斯麥于1871年為德國統一的苦藥裹上的一層糖衣，用以安撫德意志王公貴族，比如巴伐利亞國王和巴登公爵。這些王公貴族已在1918年革命中被毫不客氣地趕下臺，然而他們的邦國以州的形式繼續存在，這些州此時已建立議會民主制度，但在州內政策的關鍵領域依然保留了許多自治權。有些州，比如巴伐利亞，其歷史與身份認同可以追溯好幾個世紀，因此有足夠的底氣去抵制它們所不喜歡的共和國政府的政策。另一方面，直接稅當時掌握在共和國政府手中，許多小州在陷入財政困境時依賴于柏林的救濟。各州脫離德國的企圖看似危險，尤其是在共和國初期的艱難歲月里，但情況從未嚴重到需要認真對待的程度。[[23]](#23_2)如果普魯士州與共和國之間出現矛盾，所引發的問題會棘手得多，因為普魯士州的面積大于其余各州面積的總和；但是整個1920年代和1930年代初，普魯士都由溫和的、親共和國的政府領導，是抗衡巴伐利亞等州的極端主義和動蕩的一支重要力量。因此，綜合考慮上述因素之后可知，盡管共和國與各州之間存在種種尚未解決的矛盾，但聯邦制度似乎并不是破壞魏瑪共和國穩定與合法性的主要因素。[[24]](#24_2)



地圖4　魏瑪共和國

### 三

總體而言，魏瑪時期的德國憲法并不遜色于1920年代大多數國家的憲法，它遠比許多國家的憲法更加民主。假如處在不同的環境下，它那些有瑕疵的條文也許不會如此事關重大。然而，共和政體在德國缺乏法統，這個致命缺陷把憲法的瑕疵放大了許多倍。有三個政黨支持新政體——社會民主黨、自由的德意志民主黨（German Democratic Party），以及中央黨。在1919年1月贏得76.2%的明顯多數選票之后，三黨在1920年6月的總得票率僅為48%，1924年5月為43%，1924年12月為49.6%，1928年為49.9%，1930年9月為43%。因此從1920年起，它們一直屬于國會中的少數派，人數少于共和國的左派敵人和右派敵人。而且，這三黨組成的“魏瑪聯盟”（Weimar coalition）對共和國的支持，往好里說，經常是言勝于行，往壞里說，則是模棱兩可、妥協，或者在政治上毫無用處。[[25]](#25_2)

社會民主黨被很多人視為共和國的締造者，他們也常以此自詡。然而作為一個執政黨，他們一直不太如意，在魏瑪的20屆內閣中，他們參加組閣的只有8屆，僅在其中的4屆出任總理。[[26]](#26_2)他們繼續固守戰前的馬克思主義教條，依然期待推翻資本主義制度，由無產階級取代資產階級的統治地位。無論1920年代的德國還有什么別的特征，不可否認它是一個資本主義社會，對于許多社會民主黨人來說，在政府中擔任領導者，似乎與其意識形態的激進論調格格不入。社會民主黨人在戰前的兩個世代里一直受到排斥、無緣參政，因此缺乏執政經驗，他們覺得與“資產階級”政客合作是一種痛苦的體驗。如果擺脫馬克思主義思想，他們必然會失去大量的工人階級選票；但另一方面，如果采取更加激進的政策，比如建立一支由工人組成的紅軍民兵組織，而不依賴自由軍團，他們肯定不但無法加入資產階級聯合政府，還會招致軍隊的憤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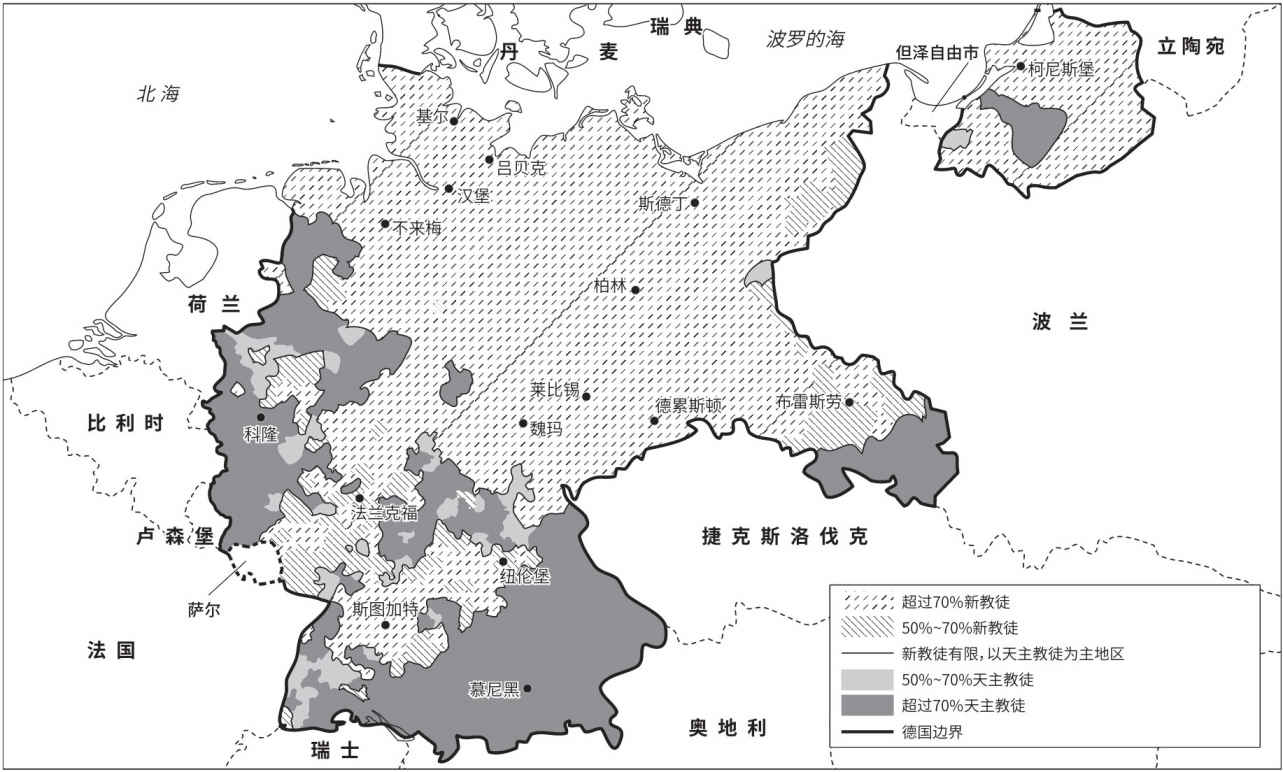
社會民主黨的主力在普魯士州，該州占魏瑪共和國領土面積的一半以上，擁有柏林等大城市以及魯爾等工業區，容納著全國57%的人口，主要信奉新教。在此主政的是社會民主黨人，其政策是使該州成為魏瑪民主制度的堡壘。盡管他們并沒有不遺余力、持續不斷地謀求改革，但把他們從德國的第一大州趕下臺，成為魏瑪民主制度的敵人在1930年代初以前的主要目標。[[27]](#27_2)然而在全國范圍，社會民主黨遠未取得主導地位。他們在共和國初期的優勢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產階級選民的支持，因為中產階級認為，一個強大的社會民主黨將能夠實現向議會民主制的迅速過渡，從而最有效地保護國家免受布爾什維主義的控制。隨著威脅的逐漸消除，社會民主黨在國會中的席位也減少了，從1919年的163[§](#SS_11)席降至1920年的102席。盡管后來曾有大幅度的恢復——1928年的153席，以及1930年的143席——但社會民主黨永久失去了將近250萬張選票。而且該黨于1919年獲得38%選票之后，在1920年代以及1930年代初，其選票一直徘徊在25%左右。盡管如此，社會民主黨依然是一個極其強大、組織良好的政黨，贏得了全國數百萬產業工人的忠誠與奉獻。如果說有個政黨值得被稱為魏瑪共和國民主制度的保護者，那就是社會民主黨。

“魏瑪聯盟”中的第二支力量是德意志民主黨，它有著更高的參政熱情，效力于1920年代的幾乎每一屆內閣。畢竟，那部飽受詬病的魏瑪憲法的主要起草人胡戈·普羅伊斯（Hugo Preuss）就是民主黨人。盡管該黨在1919年1月的選舉中贏得了75席，但在1920年6月的下一次選舉中失去了36席，在1924年5月的選舉中僅剩下28席。中產階級選民向右轉，民主黨深受其害，再也沒有恢復。[[28]](#28_2)該黨對1928年選舉失利做出的反應是災難性的。在埃里克·科赫—韋澤（Erich Koch-Weser）的領導下，民主黨的幾位領軍人物聯合了青年運動的準軍事分支“青年德意志騎士團”（Young German Order）和幾位來自其他中產階級政黨的政客，于1930年7月將民主黨改組為德國國家黨（German State Party），旨在創建一個強大的中間派集團，以阻止資產階級選民流向納粹黨。但此次合并是草率的，而且阻斷了與其他較大的中間派政治團體聯合的可能性。有些人反對此舉并辭職，主要是左翼民主黨人。在右翼，青年德意志騎士團的舉動使其失去了許多內部成員的支持。合并后的新黨在選舉中運氣未見好轉，1930年9月的選舉之后，該黨在國會中僅占14席。合并實際上意味著一次急劇右轉。青年德意志騎士團和許多青年運動一樣對議會制度持懷疑態度，而且其意識形態頗具反猶主義色彩。新建立的國家黨繼續維持社會民主聯合政府在普魯士的運轉，直至1932年4月的州議會選舉。然而按照歷史學家弗里德里希·邁內克的說法，它的目標是實現政治權力均衡的轉移，實現權力從國會和各州轉移到強大的、中央集權的帝國政府。因此，支持者的日漸流失也促使該黨向右轉；但這樣做的唯一作用是消除了該黨與其他那些提出同樣主張的、更有效的政治組織之間的區別。國家黨晦澀費解的黨章不僅表明該黨缺乏政治上的務實精神，也表明它對魏瑪民主制度的承諾在減弱。[[29]](#29_2)

“魏瑪聯盟”的三個政黨之中，只有中央黨留住了選民的支持，始終保持著大約500萬選票，即國會中有85至90個議席，其中包括巴伐利亞人民黨的席位。中央黨也是自1919年6月至魏瑪共和國結束期間每一屆聯合政府的主要成員，而且它極其關注社會立法，是創建魏瑪福利制度的驅動力，它在這方面的功績也許與社會民主黨不相上下。中央黨在社會事務上持保守立場，投入大量時間抵制色情讀物、避孕以及其他現代世界的罪惡事物，在學校系統內維護天主教的利益。其致命弱點是不可避免地受到羅馬教宗的影響。作為天主教會的領袖，教宗庇護十一世（Pope Pius XI）對持無神論的共產黨人和社會主義者在1920年代取得的進展感到越來越不安。與后來成為教宗庇護十二世的駐德國教廷大使歐金尼奧·帕切利（Eugenio Pacelli）一樣，他極其不信任許多天主教政客的政治自由主義，認為要想保護教會利益免受迫在眉睫的、來自不信上帝的左翼的威脅，最安全的辦法是轉向一個更獨裁的政體。基于這種想法，他在1929年與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法西斯政權簽署政教協定[¶](#P_11)，后來，教會在1934年奧地利內戰中支持恩格爾伯特·陶爾斐斯（Engelbert Dollfuss）的“教權法西斯主義”獨裁政權，在始于1936年的西班牙內戰中支持佛朗哥將軍（General Franco）領導的民族主義者。[[30]](#30_2)

梵蒂岡在1920年代已然發出這種信號，因此政治天主教運動在德國的前景不容樂觀。1928年12月，它的前景顯然更加不妙。當時中央黨黨魁威廉·馬克思退休，左右兩派為繼任人選爭執不下。教廷大使帕切利的密友、高級教士路德維希·卡斯（Ludwig Kaas）同時也是德國國會的議員，作為折中人選接任。然而，受帕切利的影響，卡斯越來越轉向右翼，帶動許多天主教政客步其后塵。1930年和1931年，德國開始陷入日益無序的動蕩局面，已是梵蒂岡常客的卡斯按照不久前與墨索里尼所簽協定的思路，與帕切利合作籌劃教廷與德國之間的政教協定。確保教會在未來的生存，是這種局面下的首要目標。像其他許多主要天主教政客一樣，卡斯認為，此目標只有在獨裁國家才可能真正實現，因為可以通過警察鎮壓消除來自左翼的威脅。卡斯在1929年宣稱：“祖國及其文化已陷入危機，人人倍感壓抑，對領袖的強烈呼喚，從未如此時此刻清晰而急切地回蕩在德國人民的心頭。”[[31]](#31_2)卡斯提出的許多要求中包括，德國的行政機構更加獨立于立法機構。中央黨的另一位政治領袖、符騰堡州（Württemberg）部長會議主席歐根·博爾茨（Eugen Bolz）在1930年初對他的妻子說得更加直白：“長久以來我的看法是，國會無法解決嚴重的國內政治問題。假如有可能設立任期十年的獨裁官，我樂見其成。”[[32]](#32_2)在1933年1月30日之前的很長時間里，中央黨就已不再像曾經那樣是魏瑪民主制度的捍衛者了。[[33]](#33_2)

因此，到1920年代末，就連魏瑪共和國民主制度的主要政治支柱也在坍塌。在“魏瑪聯盟”以外的地界，民主的田園更加荒蕪。其他政黨都不曾為共和國及其機構提供過實實在在的支持。在左翼，共和國面對的是共產黨的群眾現象。1918至1921年革命期間，共產黨是個緊密團結的精英團體，支持它的選民寥寥無幾；然而，以反對一戰為共同事業而組建的獨立社會民主黨，在戰后失去了奮斗的目標，于1922年解體，其中大部分人加入共產黨，使后者成為群眾性政黨。獨立社會民主黨與共產黨在1920年就已經聯手贏得了88個議席。1924年5月，共產黨贏得62席，其議席數在當年年底小幅下降之后，于1928年恢復到54席，并在1930年贏得77席。1924年5月投票給共產黨的選民有325萬，到1930年9月達450多萬。這些選票都是贊同魏瑪共和國倒臺的。



地圖5　新教與天主教徒的分布

德國共產黨在1920年代雖然反復調整政策，但始終堅信，共和國是資產階級政權，其首要目標是保護資本主義經濟秩序、剝削工人階級。共產黨期盼的是，資本主義必然崩潰，“資產階級”共和國將由一個按照俄國路線建立的蘇維埃國家取而代之。盡快實現這一目標是共產黨的責任。在共和國初期的幾年里，這意味著準備在德國發動一場以武裝暴動為手段的“十月革命”。然而在1919年1月的起義失敗以及1923年更加慘烈的未遂起義之后，這個設想被暫時擱置。斯大林（Stalin）日益專權，受其影響，蘇聯政權在1920年代后期從經濟和思想上加強了對各國共產黨的控制。面對莫斯科越來越旺盛的操縱欲，德國共產黨別無選擇，只好在1920年代中期轉向較為溫和的道路，不料又在1920年代末回歸激進的“左傾”立場。這意味著該黨不僅拒絕與社會民主黨聯手保衛共和國，甚至還積極地與共和國的敵人合作，意圖推翻共和國。[[34]](#34_2)實際上，出于對共和國及其制度的敵視，共產黨甚至反對改良，因為那也許會使共和國在工人階級中更受歡迎。[[35]](#35_2)

左派堅決反對共和國，右派對共和國的瘋狂仇恨比左派更甚。魏瑪共和國面臨的最大，也是最重要的右翼挑戰來自民族黨，該黨在1919年1月贏得44個議席，1920年6月71席，1924年5月95席，1924年12月103席，從而成為國會中僅次于社會民主黨的第二大黨。在1924年的兩次選舉中，民族黨都贏得了大約20%的選票。也就是說，這兩次選舉中有五分之一的選民投票給這樣一個政黨：從一開始就明確表示它認為魏瑪共和國根本不具備合法性，呼吁恢復俾斯麥帝國、讓皇帝復辟。這種立場以多種方式表達出來，從民族黨人極力爭取用舊帝國的黑白紅國旗取代新建立的共和國的黑紅金旗，到默許，有時明目張膽地縱容與自由軍團有關的武裝陰謀團體暗殺共和國政要。民族黨通過其宣傳和政策，在1920年代大力向選民傳播激進的右翼思想，為納粹主義鋪設了道路。

1920年代，民族黨加入了兩屆聯合政府，但合作經歷并不愉快。他們在一屆政府中任職十個月后退出；而中途加入另一屆內閣時，他們不得不做出妥協，這讓許多黨員深感不滿。民族黨在1928年10月選舉中的重大失利（議席從103席降至73席）使黨內的右翼分子確信，是時候開始采取不妥協的立場了。因循守舊的黨主席韋斯塔普伯爵（Count Westarp）被罷免，由報業巨頭、實業家和激進的民族主義者阿爾弗雷德·胡根貝格取代，從1890年代泛日耳曼運動興起以來，胡根貝格就一直是其中的領軍人物。受胡根貝格的影響，起草于1931年的民族黨綱領，明顯比以往的黨綱更加偏向右翼。它提出的要求包括：霍亨索倫王朝復辟；恢復義務兵役制；指向修改《凡爾賽和約》的強硬外交政策；收回失去的海外殖民地；與居住在歐洲其他地區，尤其是奧地利的德語人口加強聯系。國會僅保留立法機構的監督職能和作為一種“批評的聲音”，議員的構成根據經濟領域和文化界的職業等級設置，遵循當時法西斯意大利創造的社團國家（corporate state）路線。黨綱還說：“我們抵制任何形式的、顛覆性的非日耳曼精神，無論它源自猶太族群還是其他族群。我們堅決反對猶太勢力在政府和公共生活中的盛行，其盛行始于十一月革命，此后不曾中斷。”[[36]](#36_2)

在胡根貝格的領導下，民族黨人還偏離了黨內民主，而趨向“領袖原則”（leadership principle）。民族黨的新領袖想方設法按照自己的意圖制定黨的政策，指示該黨的議員在國會表決時如何投票。許多議員反對這種做法，有十幾人于1929年12月脫黨，1930年又有更多議員脫黨，加入右翼的邊緣團體以示抗議。胡根貝格促使民族黨與極右翼結盟，試圖搞一次反對楊格計劃（Young Plan）[\*\*](#_175)的全民公決，楊格計劃是1929年由美國主導、經國際會議通過的、重新安排戰爭賠款事宜的計劃。一番苦斗之后，運動失敗，這讓胡根貝格愈加確信，有必要采取更加極端的手段反對魏瑪共和國，代之以獨裁的民族主義國家，重溫俾斯麥帝國的光輝歲月。但這根本行不通。民族黨人的優越感和精英意識妨礙了他們贏得大眾的真心追隨，使他們的支持者很容易被納粹黨采用的真正民粹主義的花言巧語所蠱惑。[[37]](#37_2)

不那么極端的，是規模較小的德國人民黨，但它只不過是略微不那么激烈地反對共和國而已，它繼承了原先那個支持俾斯麥的民族自由黨的衣缽。該黨在1920年選舉中贏得65個議席，在1920年代余下的時間里保持著45至50席，吸引了大約270萬至300萬張選票。該黨對共和國的敵視，部分被其領軍人物古斯塔夫·施特雷澤曼的決策所掩蓋了。他決定正視當時的政治現實、承認共和國的合法性，這與其說是出于信念，不如說是權宜之計。盡管施特雷澤曼從未得到黨的充分信任，然而他的說服能力相當強。主要得益于其高超的談判技巧，人民黨在共和國大多數內閣中都占有一席之地，而不像民族黨那樣在192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里都處于反對黨的地位。但這也意味著在共和國初期之后的多數內閣中，都存在著對共和國的合法性至少有所懷疑的部長。而且，在人民黨中本已舉步維艱的施特雷澤曼又病倒了，于1929年10月去世，該黨領導層中的主要溫和力量隨之而逝。[[38]](#38_2)在此之后，人民黨也迅速向極右翼傾斜。

因此，即使到了1920年代中期，民主政體看起來依然極度脆弱。在其他環境中，它或許可以存在下去。回過頭來看，確實，1924—1928年一直被許多人描述為“魏瑪的黃金時代”。然而那種認為民主制度當時在德國正處于自我實現階段的觀點，是一種因事后聰明而產生的錯覺。實際上，沒有跡象表明民主制度正在變得越來越穩健；相反，兩個主要的資產階級政黨，中央黨和民族黨，很快落入民主制度公開的敵人之手，這預示了未來的厄運，厄運的到來甚至并不令人震驚。人民黨對共和國不過如此的忠誠完全歸功于古斯塔夫·施特雷澤曼一個人的鍥而不舍和睿智領導，這是共和國之脆弱性的又一個標志。即使在1928年相對有利的環境下，“魏瑪聯盟”的各政黨也未能成功贏得國會中的多數席位。1923年之后，人們普遍感到布爾什維克革命的威脅已經消退，這意味著資產階級政黨不再那么愿意為了保留共和國作為反共堡壘而同社會民主黨妥協。[[39]](#39_2)更為不祥的是，“鋼盔”之類的準軍事組織開始將斗爭從街頭擴展到競選活動，試圖使其反共和國的觀點發揮更大的影響力。同時，盡管尚未發生共和國初期大部分時間里所特有的那種公開內戰，但政治暴力在1920年代中期依然處于令人擔憂的高水平。[[40]](#40_2)殘酷的事實是，即使到了1928年，共和國依然像以往一樣，遠遠未能實現穩定、取得合法性。

### 四

魏瑪共和國根基不穩的另一個原因是未能贏得軍隊和公務員全心全意的支持，這兩個群體都感覺極其難以適應1918年從專制帝國向民主共和國的轉型。尤其對于軍隊領導層來說，1918年的戰敗構成了一種令人擔憂的威脅。在機智敏銳的威廉·格勒納將軍主導下，總參謀部與弗里德里希·艾伯特領導的多數派社會民主黨達成共識：如果他們同心協力實現一種穩定的議會民主制度，就可以最有效地抵御革命的工人與士兵委員會的威脅。在格勒納看來，此舉屬于權宜之計，無關信仰。社會民主黨保證，《凡爾賽和約》生效后，在被裁減的軍隊中保留舊有的軍官團；軍方同意《和約》所要求的軍隊規模限制在10萬，禁止使用坦克之類的現代裝備，大規模招募的軍事武裝必須由小規模的職業軍人所取代。格勒納與社會民主黨的妥協遭到軍隊頑固派的激烈反對；同樣，格勒納的談判對手、社會民主黨軍事專家古斯塔夫·諾斯克（Gustav Noske）也遭到黨內同志的猛烈抨擊，因為他同意原封不動地保留軍官團，而不是用一種更加民主的編制取代它。[[41]](#41_1)但在1918—1919年的絕境中，他們商定的路線最終得以通過。

然而不久之后，工人與士兵委員會淡出政治舞臺，于是在許多高級將領看來，與民主力量妥協的需要似乎不再那么迫切了。這在1920年3月已十分明顯，當時自由軍團各分隊為了抗議即將來臨的裁撤而進軍柏林，推翻民選政府，試圖按照舊王朝的運轉方式恢復專制政體。在泛日耳曼聯盟成員、前公務員、原祖國黨核心人物沃爾夫岡·卡普的領導下，暴動者還得到許多地區軍方人士的支持。陸軍總司令瓦爾特·賴因哈特（Walther Reinhardt）將軍由于盡力確保軍隊效忠政府而遭到驅逐，由偏右翼的漢斯·馮·澤克特（Hans von Seeckt）將軍接替。澤克特隨即禁止所有部隊抗擊暴動者，對政變的支持者聽之任之；然后又命令軍隊協同血腥鎮壓魯爾區反對政變的工人武裝起義。實際上，從共和國建立伊始，澤克特就對它充滿敵意。他高傲、專斷、難以接近，戴在左眼上的單片眼鏡標示著其顯赫的社會地位，在澤克特的身上，體現著普魯士軍官階層的傳統風格。但他又是一個政治現實主義者，知道武力推翻共和國的可能性有限，因此盡力維持軍隊的統一，使之免受國會控制，以待更好的時機。為此他得到了軍官階層的全力支持。[[42]](#42_1)

在澤克特的領導下，軍隊在“軍旗”上保留了舊帝國國旗的顏色——黑白紅。澤克特認為，德意志國家與共和國根本不是一回事，前者蘊含著抽象的帝國理想，后者則只是暫時的反常現象。他的良師益友威廉·格勒納將軍曾在1928年把軍隊描述為“無上權力”和“國家內部無人可以輕視的權力要素”。[[43]](#43_1)無論澤克特嘴上如何宣稱，他領導下的軍隊，遠非超越黨派政治之爭的中立組織。[[44]](#44_1)當他認為民選政府違背了帝國利益時，就會毫不猶豫地加以干涉。澤克特甚至一度考慮過由自己接掌總理之職，其施政構想是，建立中央集權的帝國，約束普魯士的自主權；取締工會，代之以“行業協會”（很像墨索里尼后來在意大利設立的職團）；總之，“動用帝國的強力措施，鎮壓一切反對帝國之存在、反對帝國和各州之合法當局的傾向”。[[45]](#45_1)最后，他成功地推翻了政府，但是沒能當上總理；這個職位留給了其繼任者之一庫爾特·馮·施萊謝爾（Kurt von Schleicher）將軍，此人在澤克特執掌陸軍司令部那幾年位列他的親信幕僚。

1920年代，一向自行其是的軍方盡其所能地規避《凡爾賽和約》對它施加的限制。軍隊領導層暗中與蘇聯這個同樣遭到削弱、同樣心懷怨恨的大國共謀，在俄羅斯為那些渴望學習如何使用坦克和飛機、愿意從事毒氣實驗的德軍軍官安排秘密培訓課程。[[46]](#46_1)軍方還秘密安排訓練后備部隊，以規避《和約》所設定的十萬兵力上限，并一直把民兵視為軍隊的預備役。[[47]](#47_1)上述掩人耳目的手段，以及包括坦克模擬訓練在內的其他做法，清楚地表明軍方無意遵守1919年《和約》的條款，只要條件允許，就會掙脫它的束縛。這些規避《和約》的秘密行動，遠非僅僅由徹頭徹尾的普魯士保守派領導，而主要是由具有現代思維的技術人員組織的，他們沒有耐心領受民主政治和國際協定的約束。[[48]](#48_1)軍隊的不忠，加之高級將領一再施展詭計反對文官政府，預示著在真正的危機到來時，共和國的存續能力不容樂觀。[[49]](#49_1)

如果德國首個民主政體指望不上軍事人員的大力支持，那么它也無望獲得文職人員的有力襄助，后者同樣是共和國從原德意志帝國繼承而來的。文職人員舉足輕重，因為它覆蓋了非常廣闊的社會領域，不僅包括在中央政府工作的公務員，還包括所有已經取得穩定的任期、地位和薪酬的州政府雇員，這種待遇最初是為資深管理人員設計的。他們包括各州政府、鐵路和郵局等國有企業，以及各級院校等州立機構中的工作人員，因此大學教授和高中教師也屬于此類別。按照這樣寬泛的歸類，文職人員數量龐大。上述顯貴級別往下，還有數百萬公職人員，靠政府機構支付的月薪或周薪生活。例如，德國國有鐵路當時是魏瑪共和國境內最大的雇主，在1920年代末擁有70萬雇員；其次是郵局，有38萬雇員。如果算上家庭成員、受贍養者和領養老金的人，單是鐵路部門就要供養大約300萬人。[[50]](#50_1)到1920年代末，德國共有160萬公務員，其中約一半為政府機構工作，另一半為鐵路等公用事業服務。政府雇員的人數如此龐大，其政治立場必然是極為多元的，成千上萬的人屬于社會主義者工會、自由派政黨或者政治傾向迥異的各種壓力團體。1919年有100萬公務員屬于自由派的德意志公務員聯盟（German Civil Servants' League），但其中6萬人于1921年分裂出去，組建了一個偏右翼的團體，翌年又有35萬人退出并組建了一個工會。因此，公務員群體絕不是從共和國建立之初就一致地敵視它，盡管他們受到的訓練和社會化過程都發生于威廉帝國時期。[[51]](#51_1)

作為革命的過渡政府中的領軍人物，弗里德里希·艾伯特于1918年11月9日呼吁全體公務員和政府雇員繼續工作，以避免出現無政府狀態。[[52]](#52_1)絕大多數人留了下來，公務員的職業結構和職責保持不變。不管理論上如何，但在實踐中，魏瑪憲法中的相關條文使得解雇公務員幾乎成為不可能之事，因為極難在法律上證明他們違反了效忠誓詞。[[53]](#53_1)這個體制來源于18世紀末19世紀初專制的官僚政府，遠遠早于議會和政黨的出現，因此高層公務員早就習慣于將自己視為真正的統治階層，在普魯士尤其如此。例如，直到1918年，政府各部的部長全是公務員，由君主任命，而不是由國會或者聯邦各州的立法機構任命。在共和國治下，某些政府部門的部長頻繁更替，因此高級公務員大權在握。比如，司法部的庫爾特·約埃爾（Curt Joel）的在職時間幾乎貫穿了共和國始終，而在他最終于1930年成為部長之前，至少有17位司法部長來而復去。對于這些人來說，行政的連續性是職責的最高要求，壓倒一切政治考量。因此，無論他們私下里如何看待1920年3月的卡普暴動，柏林的高級公務員，包括財政官員，依然繼續工作，無視暴動者要求他們離職的命令。[[54]](#54_1)

公務員對此事持中立態度，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們素來履行誓言、恪盡職守。后來，政府于1922年頒布一項新法律，旨在讓公務員對共和國承擔更加具體的義務，并對那些與共和國的敵人沆瀣一氣者施以紀律處分。然而此措施作用不大。只有普魯士，在相繼擔任內政部長的社會民主黨人卡爾·澤韋林（Carl Severing）和阿爾貝特·格熱辛斯基（Albert Grzesinski）領導下，盡心盡力地裁汰舊帝國的行政人員，主要是在省級機構，而代之以社會民主黨人和其他忠于共和國的人士。[[55]](#55_1)然而，就連普魯士建立一個忠于民主原則、滿懷責任感地服務于現政府的公務員群體的努力最后也被證明是不夠的。因為澤韋林和格熱辛斯基認為，各黨在高級公務員中的比例，應該與它們在普魯士聯合內閣中的席位比例大致相同，這意味著許多要職把持在某些政黨手中，比如中央黨和人民黨，在一定程度上還包括國家黨，這些政黨從1920年代末開始，對共和國若即若離，忠誠度銳減。在德國的其他地方，包括國家公務員階層，就連這種程度的改革也鮮有嘗試，更別提實現了，況且公務員群體非常保守，有些甚至極度敵視共和國。[[56]](#56_1)

然而，問題不在于高級公務員階層積極削弱魏瑪共和國，而在于共和國在確保各級公務員主動維護民主政治秩序、抵制顛覆民主企圖等方面做得太少。而那些積極反對共和國的公務員——就整體而言，他們可能屬于少數——能夠安然免于相應的懲處。例如，有位生于1885年，在1918年之后加入民族黨的普魯士高級公務員，在公務員以及其他群體中創建了各種各樣的邊緣團體，目的是直言不諱地抨擊“國會，即紅色司令部”，挫敗“叛國的、無宗教信仰的社會民主黨人”的政策，反對天主教會的“帝國主義世界霸權”，最終打擊“所有猶太人”。他的反猶立場在1918年之前相當含蓄，十一月革命之后變得清晰明確。他后來回憶道，從此，“只要在高架鐵路或者火車上遇到言語無禮、不聽我的教訓、繼續犯渾的猶太人，我就嚇唬說，再不住嘴，我就把他從開著的火車上扔出去……”他有一次拿槍威脅過“馬克思主義”工人。在反對共和國的公務員中，他顯然是個極端的例子。盡管一度因擾亂治安而受審，但他并未遭到開除，僅被處分過兩次，不得晉升。“我在行政部門里的政敵每次都如此輕易地讓我脫身，”他寫道，“我一直把這看作他們的弱點。”在共和國治下，他遭遇的最糟糕的事情是升遷之路受阻。[[57]](#57_1)

毋庸置疑，即使在共和國的堡壘普魯士，絕大多數公務員對于他們宣誓效忠的憲法都沒有幾分真正的忠誠。假如共和國面臨被毀滅的危險，他們當中甚至絕少有人會想到去提供支援。敬業精神不僅使他們在國家面臨挑戰時繼續工作，就像1920年卡普暴動時那樣，而且讓他們在政府被推翻時也繼續工作。因此，公務員這個重要群體所忠于的也是帝國的抽象概念，而不是具體的民主原則。在這方面，與在其他方面一樣，魏瑪共和國的政治合法性從一開始就脆弱不堪。[[58]](#58_1)共和國被政治暴力、暗殺和關于其存續權的不可調和的沖突等無解難題所困擾，軍人和文職人員既不愛它也不保護它，許多人將《凡爾賽和約》的國恥歸咎于它。共和國還不得不面對嚴重的經濟問題，問題始于大規模通貨膨脹，它使許許多多的人在共和國試圖站穩腳跟的歲月里生活得如此艱難。

[\*](#_168) 人民全權代表委員會，1918年11月10日由社會民主黨和獨立社會民主黨分別派出三位代表組建的德國臨時政府。獨立社會民主黨的三位代表于12月29日退出。1919年2月10日，委員會將權力移交給國會。

[†](#_169) 此處指的是魏瑪共和國的黑紅金國旗。

[‡](#_170) 指德國人民黨（German People's Party），前身是民族自由黨。——編注

[§](#SS_10) 社會民主黨在1919年1月的選舉中獲得163個席位，2月在東部軍隊舉行的補選中增加2席，實際獲得165個席位。——編注

[¶](#P_10) 指庇護十一世與墨索里尼為解決“羅馬問題”于1929年2月11日簽訂的《拉特蘭條約》。條約規定意大利政府承認圣座在梵蒂岡城的完整主權，梵蒂岡由此成為主權獨立的國家；但意大利境內的其他主教必須報意大利政府批準，而且必須具有意大利國籍，必須宣誓效忠國家。——編注

[\*\*](#_171) 1929年英法美日比意德7國重新審議德國賠款問題，由美國代表歐文·揚（Owen Young）提出的報告書。主要內容包括，德國賠款總額確定為1,139.5億馬克，賠償期限為58年7個月；取消對德國財政經濟的一切國際監督，交由新成立的國際清算銀行處理賠款事宜。1931年德國停付賠款，1932年協約國在洛桑會議上同意停止索取賠款，楊格計劃中止。

## 第二節 大通脹

### 一

假如共和國為其公民提供了合理水平的經濟穩定，以及體面的固定收入，那么就連最頑固的反革命人士最終也可能會接納它。但是自建立伊始，共和國就受困于德國歷史上規模空前的經濟敗局。第一次世界大戰戰端一啟，德意志政府就開始借錢打仗。從1916年起，軍費遠遠超出貸款，乃至遠遠超出政府能夠從任何來源獲得的財政收入。顯然，德國原指望通過以下方式彌補其損失：吞并西面和東面的富庶工業區，強迫戰敗國支付巨額戰爭賠款，并把德國主宰的經濟新秩序強加于被征服的歐洲國家。[[59]](#59_1)然而這些期望全部落空，到頭來戰敗國是德國，不得不付賬的也是德國。這簡直是雪上加霜。政府此前已經在沒有經濟資源支撐的情況下大印鈔票了。戰前，按照柏林的匯率，1美元可兌換4馬克多一點。到1918年12月，1美元兌換的馬克數幾乎翻倍。1919年4月，匯率繼續降至1美元兌換12馬克多一點，到當年年底，兌換47馬克。[[60]](#60_1)

魏瑪共和國的歷屆政府都落入了一個政治陷阱，這陷阱至少有一部分是它們自己導致的。政府必須將財政收入以戰爭賠款的形式輸送給別的國家，這意味著資源的加倍流失，因為德國當時仍須償還戰時債務，其經濟資源和國內市場也已萎縮。人口密集的工業區洛林和西里西亞已遵照《和約》條款被割讓出去。1919年德國的工業產量只有1913年的42%，糧食產量不到戰前的一半。把經濟調整到和平時期的水平、給找工作或者因戰爭傷殘而找不到工作的退伍兵提供福利措施，都需要大筆資金。然而如果任何一屆政府打算通過稍稍提高稅額的辦法來填補資金缺口，那么它在民族主義右翼陣營的政敵就會立即指責說，征稅是為了向協約國支付戰爭賠款。共和國歷屆政府大多認為，在政治上更精明的做法不是加稅，而是告訴外國列強，要想解決德國的貨幣問題，只能廢止賠款，或至少應按照可接受的額度重新設定賠款方案。歷屆政府走這步險棋時投入的精力和表現出的冒險性各有不同，1920—1921年，馬克對美元匯率的下滑不止一次得到了遏制。然而，到1921年11月，德國人要想買進1美元，須支付263馬克；到1922年7月，價格又翻了將近一倍，達到493馬克。[[61]](#61_1)

這種規模的通脹對經濟游戲中的不同玩家有著不同的影響。有的玩家貸款購買商品、設備、工業廠房之類的東西，然后在幣值僅為原先價值的一小部分時償還貸款，這種本事幫助刺激了戰后的工業復蘇。在臨近1922年年中的那段時間，德國的經濟增長率達到高點，失業率降至低點，接近充分就業的水平。假如沒有這個背景，發動總罷工就會困難得多，很難出現像1920年3月挫敗卡普暴動那樣的罷工。實際稅率也低得足以刺激需求。德國為經濟恢復到和平年代的基本水平所做的努力，比有些通脹沒那么明顯的歐洲經濟體更見成效。[[62]](#62_1)

然而經濟復蘇卻建立在不牢固的基礎之上。因為盡管在此過程中通脹曾得到短暫緩解，但事實證明它是不可停止的。在1922年兌換1美元，8月需花費1,000多馬克，10月3,000馬克，12月7,000馬克。貨幣貶值應劫而生、愈演愈烈，導致了災難性的政治后果。德國政府再也拿不出約定的賠款，因為賠款必須用黃金支付，而它已無力承受國際市場上的黃金價格。不僅如此，到1922年底，德國已嚴重滯后履行賠償方案的另一部分——向法國交付煤炭。于是法國和比利時軍隊在1923年1月占領了德國的主要工業區魯爾，目的是奪回損失的煤炭，迫使德國人履行《和約》規定的義務。柏林政府幾乎立即宣布采取消極抵抗、不與法國合作的政策，從而使占領軍當局難以拿走魯爾區的工業生產成果。臨近9月底斗爭才停止。消極抵抗導致經濟形勢惡化。1923年兌換1美元，1月需花費17,000多馬克，4月24,000馬克，7月353,000馬克。這種程度的惡性通貨膨脹實在是觸目驚心，在當年余下的時間里，美元對馬克的匯率，其數字很快就漲得比電話簿上的號碼還要長：8月為4,621,000，9月98,860,000，10月25,260,000,000，11月2,193,600,000,000，12月4,200,000,000,000。[[63]](#63_1)不久，報紙開始向讀者介紹大數字的命名法，各國的名稱都有所不同，易于混淆。某專欄作家寫道：法國人把100萬乘100萬稱為1兆，而“在我國，1兆等于100萬乘10,000億（1,000,000,000,000,000,000），我們只能祈求上帝，保佑我們每天的通貨不要膨脹到如此之高，乃至更高的數值，否則會搞得瘋人院人滿為患”。[[64]](#64_1)

達到最高點時的惡性通貨膨脹可謂恐怖，貨幣幾乎完全失去了意義。紙幣面值如同天文數字，印鈔機已跟不上越來越大的貨幣需要量，地方政府開始印刷各自的應急貨幣，只在紙的單面印刷。雇員用購物籃或手推車領取工資，因為付給他們的工資是數不清的紙鈔；拿到工資后立即沖到商店，趕在持續貶值的貨幣失去眼下的購買力之前買進物資。在校生雷蒙德·普雷策爾后來回憶道，他那身為高級公務員的父親每個月底領到工資后，就趕緊買一張火車季票以便下個月能乘車上班，寄出支票為日常花銷付賬，帶全家去理發，然后把剩下的錢交給妻子，她會帶著孩子們到當地的批發市場，買許多不易腐爛的食品，全家靠這些東西撐到下一個發薪日。在這個月余下的日子里，家中根本沒有現金。寄信必須在信封上貼最新面值的紙幣，因為價格上漲的速度太快，來不及印刷面值適用的郵票。英國《每日郵報》（Daily Mail）駐德國記者在1923年7月29日報道：“商店里每小時打印一次價簽。例如，留聲機上午10點的售價是5,000,000馬克，下午3點則是12,000,000馬克。在街上買一份《每日郵報》，昨天花35,000馬克，今天則要花60,000馬克。”[[65]](#65_1)

波動最劇烈、影響最嚴重的，是食品價格。一位女士在咖啡館落座點餐時，一杯咖啡的價格可能是5,000馬克，一小時后起身結賬，要付給侍者的價格卻變成了8,000馬克。德國人作為日常主食的黑麥面包在1923年1月3日價值每公斤163馬克，在7月價格翻了10倍多，在10月1日為900萬馬克，在11月5日為78萬億馬克，兩星期后的11月19日為233萬億馬克。[[66]](#66_1)惡性通貨膨脹達最高點時，普通家庭90%以上的花銷都用于食品。[[67]](#67_1)靠固定收入生活的家庭為了得到食物，開始變賣家產。商店開始囤積食品，因為預料到價格會隨時上漲。[[68]](#68_1)買不起最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人們開始鬧事、搶劫食品店。農民不愿意出售糧食以換取毫無價值的鈔票，礦工拉幫結伙沖進鄉村，把田地洗劫一空，與試圖保護莊稼的農民爆發槍戰。由于馬克暴跌，從國外進口物資即使不是完全不可能，也變得十分困難。饑餓的威脅觸手可及，尤其是在法國占領區，那里的運輸系統因消極抵抗而陷于癱瘓。[[69]](#69_1)營養不良直接導致了結核病死亡率的上升。[[70]](#70_1)

學者維克托·克倫佩雷爾的經歷代表了當時的普遍現象，他的日記為這一時期的德國歷史全景提供了個人觀察。他是簽臨時合同的教師，收入僅能勉強糊口。作為一戰老兵，克倫佩雷爾在1920年2月收到一小筆額外退伍金。他當時很高興，但后來抱怨說：“原先的一小筆收入如今只夠付一次小費。”[[71]](#71_1)隨后的幾個月里，隨著通貨膨脹步伐的加快，克倫佩雷爾的日記里記下了越來越多的財務計算。1920年3月，他就已經在慕尼黑郊外的火車上遇到過“背著背包撿剩飯的小孩兒”。[[72]](#72_1)隨著時間的推移，克倫佩雷爾“以一種麻木的宿命心態”支付數額越來越荒唐的賬單。[[73]](#73_1)1920年，他終于在德累斯頓工業大學（Dresde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謀得永久教席。但這并未帶來經濟保障，他每個月收到一筆數額越來越龐大的工資和通脹補助。1923年5月底，盡管工資收入將近100萬馬克，但他仍然無法支付煤氣和稅務賬單。他認識的每個人都想方設法在股票市場投機賺錢。克倫佩雷爾也試了試手氣，但他的第一筆收益23萬馬克，與同事弗爾斯特（Förster）教授的收益相比就微不足道了，弗爾斯特是“大學里最激烈的反猶主義者、日耳曼煽動家和愛國主義者之一”，據說他炒股可以日賺50萬馬克。[[74]](#74_1)

克倫佩雷爾是咖啡館的常客，他記錄自己7月24日消費一杯咖啡和一塊蛋糕花了12,000馬克，8月3日一杯咖啡和三塊蛋糕花了104,000馬克。[[75]](#75_1)看電影是克倫佩雷爾生活中的主要消遣之一，8月28日星期一，他寫道，幾星期前他花100,000馬克買了10張電影票。“然后票價立即飛漲，我們花10,000馬克買的票最近已漲到200,000馬克。昨天下午我想再買幾張電影票，池座的中間幾排已漲到300,000馬克了，”這是電影院中第二便宜的座位；劇院已經宣布，下周四，也就是三天后，票價又要上漲。[[76]](#76_1)他在10月9日記下：“我們昨天去看電影花了1.04億馬克，包括車費。”[[77]](#77_1)和許多人一樣，他被這種形勢推到了絕望的邊緣：

德國正在以一種駭人的方式一步一步走向崩潰……今天1美元的匯價是8億多馬克，每天都比前一天上漲3億馬克。這一切不僅僅是從報紙上讀來的東西，而是直接影響到人的生活。我們有東西可吃的日子還能維持多久？下一回我們該把腰帶勒緊到什么程度？[[78]](#78_1)

克倫佩雷爾消耗在金錢問題上的時間越來越多，他在11月2日寫道：

昨天我去領錢，在學校的出納室等了整整一上午，一直待到快兩點，結果一分錢也沒拿到，連10月份工資的尾款也沒取出來。因為美元昨天從65萬億漲到130萬億馬克，所以我今天付煤氣費和其他費用必須花比昨天多一倍的價錢。單說煤氣，差價很可能高達150萬億馬克。[[79]](#79_1)

克倫佩雷爾在日記中寫道，德累斯頓爆發了食品騷亂，其中一些帶有反猶色彩，他開始擔心瘋狂覓食的人會闖進自己的家。他已無心工作。“錢糧之事耗掉了大量時間，把人磨得心力交瘁。”[[80]](#80_1)

德國漸漸陷入癱瘓。企業已付不起工人的工資，市政當局也已買不起公用設施所需的補給。到9月7日，柏林90條有軌電車線路中的60條已停止運營。[[81]](#81_1)顯然不能任由局面惡化下去，有位政治人物憑借精明的政治手段與明智的金融改革，把國家從崩潰的邊緣拉了回來。從1923年8月開始，古斯塔夫·施特雷澤曼長期擔任德國外交部長，在任期的前幾個月里還兼任總理，他啟動“履約”政策，在9月展開談判，要求法國撤出魯爾區，交換條件是，德國保證無論遇到什么困難都會履行賠款義務。結果國際社會同意重新審議賠款方案，在1924年談判并接受了由美國金融專家查爾斯·道威斯（Charles Dawes）擔任主席的委員會所擬定的計劃。

道威斯計劃（Dawes Plan）并未讓人看到任何終止賠款的前景，但至少做出了一系列安排，以確保支付方案的切實可行，在隨后的5年里，賠款的支付確實沒遇到太多問題。[[82]](#82_1)施特雷澤曼的政策沒有為他贏得民族主義右翼的任何褒揚，他們抵制對賠款原則所做的任何讓步。不過，當時通貨膨脹的嚴重程度使多數人相信這是唯一現實可行的政策，大約一年以前人們還不太可能這樣想。[[83]](#83_1)在金融方面，施特雷澤曼政府于1923年12月22日任命亞爾馬·沙赫特（Hjalmar Schacht）執掌德國的中央銀行——帝國銀行（Reichsbank），沙赫特是位精明的金融家，在政界擁有強大的人脈。一種新貨幣“地產抵押馬克”（Rentenmark）已于11月15日發行，其價值與黃金價格掛鉤。[[84]](#84_1)沙赫特采取了許多措施防范對地產抵押馬克的投機，而且隨著新貨幣——不久被改名為帝國馬克（Reichsmark）——的流通范圍越來越廣，它取代了舊貨幣，被普遍接受。[[85]](#85_1)惡性通貨膨脹結束。

其他國家也受到戰后通貨膨脹的影響，但無一像德國這樣嚴重。各國惡性通脹的最高點各不相同，奧地利為戰前水平的14,000倍，匈牙利23,000倍，波蘭250萬倍，蘇俄40億倍。不過嚴格說來，蘇俄的通脹率與其他歐洲國家沒有可比性，因為布爾什維克黨基本上使蘇維埃經濟退出了世界市場。這些國家的通脹率已經夠糟糕了，但在德國，物價高達戰前水平的10,000億倍，其蕭條程度前所未有，已作為最嚴重的惡性通貨膨脹被寫入經濟史。顯然，上述國家均不是一戰的勝方。各國最終都穩定了其貨幣，而沒有過多參照別國的經驗。1920年代并未出現切實可行的新國際金融體系，不像二戰后那樣，產生了一套精心設計、用于維護國際金融秩序的機構和協議。[[86]](#86_1)

### 二

惡性通貨膨脹及其結束方式所產生的后果可謂巨大，但其對德國民眾的經濟狀況的長期影響卻難以衡量。人們過去常常認為它破壞了中產階級在經濟上的興旺富足，但中產階級群體的經濟狀況和理財方式是非常多元的。投資于戰爭債券或其他國債的人全都賠了本，而用一大筆按揭貸款購買房子或公寓的人，最后可能花不了幾文錢就得到房產，這兩種情況往往不同程度地發生在同一個人的身上。然而對于那些靠固定收入生活的人，后果則是毀滅性的。債權人苦不堪言。當贏家與輸家隔著新劃分的社會界限彼此對立的時候，中產階級的經濟向心力與社會凝聚力隨之瓦解，結果導致中產階級政黨在1920年代后半葉日益四分五裂，在極右翼的煽動性攻擊面前束手無策。而且至關重要的是，當貨幣穩定政策產生的緊縮效應開始反噬時，所有社會群體都感到手頭拮據。大眾記憶把通貨膨脹、惡性通貨膨脹和貨幣穩定政策的影響混同為單一的經濟災難，德國社會的幾乎每個群體在其中都是輸家。[[87]](#87_1)維克托·克倫佩雷爾是這個過程中的典型人物。當穩定到來時，“對貨幣驟然貶值的恐懼，以及瘋狂的搶購”結束了，但取而代之的是“貧困”，因為按照新的幣制，克倫佩雷爾幾乎既無值錢的東西也無現金。一番估算之后，他沮喪地得出結論：“我的股票勉強值100馬克，家里的現金也是這個數，全部財產就這些了；我的人壽保險已蒸發凈盡，保險單上的1.5億芬尼如今只值0.015芬尼[\*](#_177)。”[[88]](#88_1)

金錢失去了價值，因此實物成為唯一值得持有的東西，大規模犯罪浪潮席卷全國。被裁定犯有盜竊罪的人數，在1913年為115,000，1923年達到峰值365,000。1923年窩藏贓物的罪犯比1913年多7倍。窮人在1921年就已陷入絕境，以至于社會民主黨的報紙報道說，在100名被送往柏林普洛岑湖（Plötzensee）監獄的男性中，80人沒有襪子，60人沒鞋穿，50人甚至衣不蔽體。[[89]](#89_1)漢堡碼頭的工人以前通常在受雇裝貨和卸貨的過程中順手牽羊，此時小偷小摸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據說有工人拒絕裝某些貨物，理由是他們用不上那些東西。工會報告說，許多工人去碼頭只是為了偷東西，誰敢阻攔就揍誰。咖啡、面粉、熏肉和糖是稱心如意的贓物。工人們實際上是用這種方式強行給自己發放實物工資，因為拿到工資時錢已經貶值了。這種現象變得非常普遍，以至于有些外國航運公司在1922—1923年開始到別的地方卸貨。[[90]](#90_1)類似的盜竊經濟和以物易物，也開始在其他行業和商業中心取代貨幣交易。

暴力或者暴力威脅，有時以驚人的方式顯現出來。有人看見多達200名全副武裝的小混混席卷了鄉間谷倉，搶走農產品。不過，盡管犯罪行為幾乎已無法控制，但裁定犯有傷害罪的人數從1913年的113,000下降到1923年的僅僅35,000人，與盜竊無直接關聯的其他罪種的犯罪率也相應下降。為了維持生命，幾乎人人都把精力用于小偷小摸地弄些食品和生活必需品。據報道，有些姑娘為幾小袋黃油而賣身。這種局面引起的痛苦和怨恨越來越強烈，因為大家覺得有人通過非法貨幣交易、跨境走私、囤積居奇以及非法貨運從中牟取了巨額利潤。早在急速的通貨膨脹演化為惡性通脹之前，黑市商人與奸商就已成為民粹主義煽動家的譴責目標，此時更是成了眾矢之的。人們普遍認為，奸商夜夜笙歌，而誠實的店主和手藝人卻不得不變賣家具以換取一塊面包。在很多人看來，傳統的道德價值隨著傳統的貨幣價值一路下滑。[[91]](#91_1)德國似乎全方位陷入了混亂——經濟領域、社會領域、政治領域、道德層面，亂象紛呈。[[92]](#92_1)

貨幣、收益、金融穩定性、經濟秩序、規律性和可預測性，戰前一直是資產階級價值觀和資產階級生存條件的核心，此時，這一切似乎已隨著看似同樣穩固的威廉帝國的政治體制一起被清除了。俯拾皆是的諷世作品開始在魏瑪文化中嶄露鋒芒，從《賭徒馬布斯博士》（Dr Mabuse the Gambler）等電影，到托馬斯·曼的《騙子費利克斯·克魯爾的自白》（Confessions of the Swindler Felix Krull，1922年開始寫作，但后來擱置，直到30年后才完成）。主要由于通貨膨脹的影響，魏瑪文化日益癡迷于刻畫各種各樣的罪犯、貪污者、賭徒、幕后黑手、竊賊和騙子，似乎生活是一場碰運氣的游戲，幸存與否完全聽憑不可思議的經濟力量肆意決斷。在這種環境下，陰謀論開始盛行。賭博，無論是在牌桌上還是在證券交易所，成了用來比擬生活的一個喻體。1920年代中期使魏瑪文化犀利前衛，讓許多人最終渴望回歸理想主義、自我犧牲和愛國奉獻精神的諷世作品，大多來源于惡性通貨膨脹所造成的迷失感。[[93]](#93_1)惡性通貨膨脹成了一道創傷，后來長久地影響著德國各階層人士的行為方式。它強化了保守派人士先后由于戰敗、革命、經濟困境而產生的天翻地覆之感；破壞了法律的公信力，使人們不再像以前那樣相信法律作為債務人與債權人、富人與窮人之間的社會規范所具有的中立性，不再像以前那樣信奉法律所應維護的公正與平等原則；它解構了那些受1918—1919年時勢所驅而被過分強調的、夸大其詞的政治語言；它激發了新的靈感，虛構出一個又一個邪惡的形象，不僅有罪犯和賭徒，還有投機者，以及操縱金融的猶太人——這種猶太人形象后來產生了致命的影響。[[94]](#94_1)

### 三

大實業家和金融家被德國公眾歸入了1920年代初經濟動蕩中的贏家之列，這是德國許多社會階層普遍憎恨“資本家”和“奸商”的原因。但德國商界人士并不認為自己像人們言之鑿鑿的那樣獲利豐厚，他們中的許多人眷戀著舊日的威廉帝國——在那個時代，國家、警察和法庭遏制了勞工運動的發展，企業可以對經濟和社會政策的關鍵事務向政府進行游說。雖然這種樂觀的追憶也許屬于錯覺，但大企業在戰前確實具有特權地位，盡管他們有時候會反感政府對經濟的干預。[[95]](#95_1)德國工業化的速度之快和規模之巨，不僅使它在1914年躋身歐陸的主要經濟強國，并且造就了因擁有大型企業以及聲名顯赫的經理人和企業家而令世人矚目的德國企業界。軍火制造商克虜伯、鋼鐵巨頭施圖姆（Stumm）和蒂森、船東巴林（Ballin）、電力公司老板拉特瑙和西門子等許多名字都家喻戶曉，他們富裕、顯赫、有政治影響力。

這些人通常反對工人組織工會，抵制勞資談判，其態度的強硬程度因人而異。然而在戰爭期間，由于政府加強了對勞資關系的干預，資方的對立情緒有所緩和。1918年11月15日，胡戈·施廷內斯（Hugo Stinnes）與卡爾·萊吉恩（Carl Legien）分別代表企業與工會簽署協議，設立了勞資談判的新機制，包括確定八小時工作制。雙方都想要抵御來自極左陣營的全面社會主義化的威脅；雙方同意，既保留現有的大企業結構，又在全國性的勞資談判聯合委員會中給予工會平等的代表權。與威廉帝國的其他階層一樣，大企業之所以接受共和政體，是因為覺得走這條路最有可能避免更壞的制度。[[96]](#96_1)

因此，在共和國的最初幾年里，企業界的日子不算太糟。等到發覺通脹將繼續下去，許多實業家就貸款購買大量機器設備，到還貸的時候，他們所借的錢已經貶值。但這并不像有些人所說的那樣，意味著他們因為覺得有利可圖而對通脹推波助瀾。相反，他們中的許多人頗為困惑、無所適從，尤其在1923年惡性通貨膨脹期間，而且他們在整個通脹過程中的收益也不像人們常說的那樣巨大。[[97]](#97_1)此外，貨幣穩定措施不可避免地導致急劇的通貨緊縮，給過度投資的企業帶來了嚴重問題。破產企業成倍增加，龐大的工業與金融帝國胡戈·施廷內斯家族垮掉了，大型企業紛紛尋找避難所，引發了一波合并與聯合浪潮，其中最著名的是由幾家重工業公司于1924年合并而成的聯合鋼鐵公司（United Steelworks），以及同年創建的大型企業法本公司（I.G. Farben），即德國染料托拉斯（German Dye Trust），它是由化工企業愛克發（Agfa）、巴斯夫、拜耳（Bayer）、格里斯海姆（Griesheim）、赫斯特和韋勒（Weiler-ter-Meer）合并而成的歐洲最大的集團公司，也是世界第四大公司，僅次于通用汽車（General Motors）、美國鋼鐵（United States Steel）和標準石油（Standard Oil）三大公司。[[98]](#98_1)

合并與聯盟的目的在于既要主導市場，又要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新企業十分重視按照超級高效的美國福特汽車公司（Ford Motor Company）的生產模式，對生產進行合理化安排。這種被稱為“福特制”（Fordism）的模式以提高效率為目的，盡可能實行自動化和機械化生產。德國企業還熱衷按照美國“工時與動作”研究的新成果——“泰勒制”（Taylorism）重新設置工作定額，泰勒制在1920年代后半段的德國引發了不少爭論。[[99]](#99_1)采用這兩種模式后，魯爾區煤炭開采業的變化達到了令人驚嘆的程度，人工開采的煤炭在戰前占98%，而1929年只占13%。使用風鉆挖煤，以機械傳送帶輸送到裝載點，再結合重新設計的作業方法，使每名礦工每年的產煤量從1925年的255噸提高到1932年的386噸。如此大幅度的效率提升，使礦業公司能夠迅速削減勞動力規模，從1922的545,000人減少到1925的409,000人和1929年的353,000人。類似的合理化和機械化進程也發生在其他經濟領域，尤其是在高速發展的汽車業。[[100]](#100_1)然而在另一些領域，比如鋼鐵制造業，效率的提高主要得益于企業合并與壟斷，而非機械化和現代化。盡管“福特制”、“泰勒制”以及類似的生產模式引起了各種討論與辯論，但在1920年代末，德國工業界中的大部分依然保持著傳統樣貌。[[101]](#101_1)

要適應貨幣穩定之后的新經濟形勢，無論如何都意味著緊縮開支、削減成本和裁員。戰前幾年里出生的人此時進入了就業市場，他們的數量較為龐大，在替代了那些死于戰爭或者死于戰爭剛結束時席卷全球的毀滅性流感的勞動力之后，仍有剩余，這使就業形勢變得更加糟糕。1925年的勞動人口普查顯示，勞動力人口比1907年多500萬；1931年進行的下一次普查顯示，勞動力人口又增加了100萬或者更多。在生產合理化和新一代人口增長的雙重作用下，到1925年底，失業人口達到了100萬；1926年3月超過300萬。[[102]](#102_1)面對新的形勢，企業失去了與工會妥協的意愿，因為貨幣穩定意味著雇主不再能夠把加薪的成本轉嫁到產品價格。資方與工會在一戰期間同意設立的勞資談判機制解體了，取而代之的是日益緊張的勞資關系，勞工的回旋余地越來越有限。然而雇主在努力降低成本和提高生產效率時，仍然感到受挫于工會的力量以及國家從法律和制度上為他們設置的障礙。魏瑪共和國實行的仲裁制度在處理勞資糾紛時偏袒工會，或者說資方是這么覺得的。1928年，魯爾區鋼鐵企業由工資引起的激烈沖突通過強制仲裁得到平息之后，雇主拒不支付裁定的小額加薪，并且關閉工廠，把20多萬金屬加工工人拒之門外達4星期之久。工人們不僅得到德國政府的支持，還拿到了政府發放的救濟金，當時主政的是由社會民主黨領導、于1928年初組建的大聯合政府（Grand Coalition）。資方開始感到，魏瑪共和國的整個體制都是用來對付他們的。[[103]](#103_1)

在資方看來，政府要求他們承擔的財政義務使情況變得更糟了。為了盡量緩解貨幣穩定對工人的不利影響，也為了防止再度出現惡性通貨膨脹期間福利供給難以為繼的局面，政府在1926年和1927年分階段向國會提交了精心制定的失業保險方案。方案中最重要的法律于1927年獲得通過，其設計初衷是為大約1,700萬工人提供保障，以緩沖失業造成的影響。它要求雇主繳納與雇員所交保險費數額相同的資金，并設立一個政府基金，用以處理因失業人數超出保險方案解決能力的上限而出現的重大危機。由于這個上限僅為80萬，因此一旦失業人數有所增加，保險方案必然捉襟見肘。實際上，在方案生效之前，失業人數就已超出上限。[[104]](#104_1)該福利制度無疑意味著政府加強了對經濟的干預，而這正是企業所反感的。它強制雇主為工人的福利方案出資，從而進一步增加了資方的成本，并且把越來越沉重的稅務負擔強加給企業，其實也就是直接加諸富裕的企業主。最強烈的敵意來自魯爾區的重工業企業家，由于法律規定了工作時間的上限，所以他們在很多情況下無法晝夜不停地使用工廠設備。在他們看來，給1927年實施的失業福利方案出資，導致了他們的實力嚴重受損。1929年，工業家的全國組織發表意見，認為國家再也無法負擔這樣的福利方案，呼吁大幅削減政府開支，并且正式停止與勞工的談判，而正是這種勞資談判，曾在1918年革命期間保全了大企業。有人說是福利制度而不是國際經濟狀況造成了他們的困境，這不可不謂言過其實；然而，許多雇主在1925—1930年間對工會和社會民主黨生出了新的敵意，卻是毋庸置疑的。[[105]](#105_1)

因此到1920年代末，大企業對魏瑪共和國已經不再抱有幻想。它在1914年之前所擁有的影響力、在戰爭期間和戰后的通脹歲月里所發揮的更大影響力，如今似乎急劇減弱。而且，它曾在公眾中享有的極高聲望，也由于通脹期間浮出水面的財務等方面的丑聞而受到重創。在不靠譜的投資中失去財富的人要尋找罪魁禍首。在1924—1925年，這個替罪羊鎖定為俄國裔猶太企業家朱利葉斯·巴爾馬特（Julius Barmat），他在戰爭剛結束時曾與社會民主黨領導層合作從事食品進口業務，后來又在通脹期間把從普魯士國家銀行（Prussian State Bank）和郵政局取得的貸款用于金融投機。1924年臨近年底時，他的公司倒閉，留下1,000萬帝國馬克的債務。極右翼抓住機會發動了一場輿論戰，他們惡語誹謗社會民主黨領導層，例如指控前總理古斯塔夫·鮑爾（Gustav Bauer）收受賄賂。此類財務丑聞經常被極右翼用來支持這樣的說法：猶太式腐敗正在對魏瑪政府施加不正當的影響，導致許多普通中產階級德國人走向破產。[[106]](#106_1)

企業界對此局面可以做何補救？政治運作的空間是有限的。自共和國建立伊始，企業界就力圖使其既免于政治干涉，又擁有政治影響力，至少得到善意的對待。其方法是捐款給“資產階級”政黨，尤其是給民族黨和人民黨。大企業通常以投資的方式，從財務上控制各大報紙，但很少直接植入其政治立場。有的報紙老板確實經常插手編輯政策，就像阿爾弗雷德·胡根貝格所做的那樣（他的出版與傳媒帝國在魏瑪共和國期間迅速發展壯大），但這往往與企業自身的具體利益沒什么關系。實際上，到1930年代初，商界領袖們被胡根貝格的極右翼立場激怒，謀劃將他逐出民族黨領導層。企業界對于那些影響到自己的事務遠沒有統一口徑，它自上而下都呈分裂狀態——不僅存在胡根貝格的例子所顯示的那種政治分歧，也存在經濟利益的分歧。因此，盡管魯爾區的鋼鐵和礦業公司激烈反對魏瑪共和國的福利制度和勞資談判制度，但是經濟領域中前沿產業的巨頭，比如西門子或者法本公司，則更愿意妥協。有些利益沖突也存在于出口型企業與主要面向國內市場的企業之間，前者在貨幣穩定和開支緊縮的那幾年間業績較好，后者則包括魯爾區的鋼鐵巨頭。然而即使在后者當中，也存在嚴重的意見分歧，例如克虜伯實際上就反對1928年把工人鎖在工廠門外的那些雇主所持的強硬立場。[[107]](#107_1)到1920年代末，企業界在政治上呈分裂狀態，并且受制于魏瑪政府為其設置的種種限制，它在通脹期間享有的政治影響力已所剩無幾。企業界對共和國的失望，很快將由其最有影響力的代表發泄出來，表現為對共和國的公開敵視。

[\*](#_176) 芬尼，德國輔幣，100芬尼為1馬克。

## 第三節 文化戰爭

### 一

導致魏瑪共和國分崩離析的各種沖突，超出了政治或經濟范疇，不僅貫穿于議會斗爭和競選，也滲透到生活的各個方面，由此大致可以判斷出這些沖突源自內在因素。在走向第三帝國的那幾年里，德國民眾的特點并不是不關心政治，甚至可以說人們表現出了過高的政治參與度和過多的政治責任感，這從競選中極高的投票率可見一斑——在多數選戰中，選民的投票率不下80%。[[108]](#108_1)據說成熟民主制度的標志是視選舉為平常之事，但這種情形在魏瑪共和國的歷次選舉中從未出現過。相反，選戰期間在德國的許多地方，外墻和廣告欄的每一處空隙似乎都貼滿了海報，每扇窗戶都掛著標語，每棟建筑都涂上了此政黨或彼政黨的標志色。這遠遠超出了有些人所說的在戰爭以前的歲月里促使選民去投票的那種責任感，社會或政治領域似乎無處免于政治化。

這在新聞界最為明顯。1932年，德國至少有4,700家報紙，其中70%是日報。許多報紙是地區性的，發行量較小；有些則是享譽國際的大報，比如自由派的《法蘭克福報》（Frankfurter Zeitung）。這類機關報在有政治傾向的報紙中僅占一小部分，有政治傾向的報紙總共占全部報紙的大約四分之一。將近四分之三的有政治傾向的報紙效忠于中央黨或與之類似的南方政黨巴伐利亞人民黨，或者效忠于社會民主黨。[[109]](#109_1)各政黨非常重視自己的日報，社會民主黨的《前進報》（Vorwärts）和共產黨的《紅旗報》（Rote Fahne）分別是兩黨的主要宣傳工具，統領著由周刊、本地報紙、時尚畫報和專業刊物構成的精密網絡。報紙的宣傳組織者能夠博得神話般的名望，例如共產黨的報刊主管維利·明岑貝格（Willi Münzenberg）被視為媒體的開創者和駕馭者。[[110]](#110_1)在政治光譜的另一端，擁有同樣傳奇般地位的是阿爾弗雷德·胡根貝格。作為軍火制造商克虜伯公司的董事會主席，胡根貝格于1916年買下謝爾報團（Scherl newspaper firm）；兩年后又收購了一家大型新聞機構，該機構在魏瑪時期為報紙的許多專欄提供新聞稿和社論；1920年代末，胡根貝格又成為規模龐大的電影制作公司UFA的老板。胡根貝格利用他的媒體帝國，把自己惡毒的日耳曼民族主義觀點傳播到全國各地，還四處宣揚說恢復君主制的時候到了。到1920年代末，他已聲名顯赫，被稱為德國的“無冕之王”和全國“最有權力的人之一”。[[111]](#111_1)

然而，無論人們如何看待，這種媒體力量并沒有直接轉化成政治權力。胡根貝格在傳媒界的主導地位，根本無力阻止民族黨在1924年之后的不斷衰落。黨報的發行量通常較小，以1929年為例，《紅旗報》的日銷量為28,000份，《前進報》74,000份，胡根貝格的《晝報》（Der Tag）70,000份出頭。這些數字無論如何也算不上可觀。不僅如此，1930年代初，正當共產黨的選票開始增加時，《紅旗報》的銷量降至15,000份。總之，帶有明顯政治色彩的報刊在1925—1932年間發行量下降了近三分之一。銷量下降的還包括那些散發著人文氣息的高端日報。[[112]](#112_1)《法蘭克福報》也許是最負盛名的人文報紙，其銷量從1915年的100,000份滑落到1928年的71,000份。報紙編輯清楚地意識到，支持共和國的自由派報紙的許多讀者都把選票投給了反對魏瑪的政黨。這樣看來，媒體編輯及老板的政治影響力似乎也是有限的。[[113]](#113_1)

在1920年代消解政治報刊影響力的，主要是新興的所謂“林蔭道小報”，即刊登聳人聽聞消息的廉價小報，它們不依賴穩定的訂戶，而是兜售于街頭，尤其是在下午和黃昏時分銷售。這些報紙配有大量插圖，刊登關于體育、電影、本地新聞、犯罪、丑聞和轟動事件的廣泛報道，注重娛樂甚于信息。不過，小報也可能有政治傾向，比如胡根貝格的《夜報》（Nachtausgabe），其發行量從1925年的38,000份增長到1930年的202,000份；再比如明岑貝格的《晚間世界》（Welt am Abend），其銷量從1925年的12,000份增長到1930年的220,000份。總的說來，支持共和國的報紙難以跟上這樣的競爭節奏，盡管自由派新聞帝國烏爾施泰因報團（Ullstein press）確實成功發行了《速報》（Tempo）和《正午商報》（BZ am Mittag），二者在1930年的銷量分別為145,000和175,000份。社會民主黨沒有能力參與小報市場的競爭。[[114]](#114_1)正是在這個層次的市場，媒體政治發揮了真正的威力。八卦小報用聳人聽聞的報道挖了共和國的墻腳，它們曝光那些支持共和國的政客在財務上的舞弊行為，有的屬實，有的則屬臆造；還配圖呈現共和國與帝國時代的對比。通俗小報上充斥著關于兇殺案庭審和警方調查的報道，給人的印象是社會正在被暴力犯罪的浪潮所吞沒。在外省，表面上不關心政治的本地報紙經常采用右翼新聞機構提供的消息，它們起到了與小報相似的作用，盡管效果沒那么顯著。胡根貝格的媒體帝國也許未能挽回民族黨的頹勢，但它喋喋不休地談論共和國的不公正，以另一種方式動搖了魏瑪共和國的合法性，使人們相信有必要改換一下政體。因此，媒體最終確實對改變選民想法產生了作用，尤其是以一種通俗的方式引導他們反對魏瑪民主制度。[[115]](#115_1)

1920年代和1930年代初，媒體和文化界出現了許多讓一些人感到不安的新進展，聳人聽聞的通俗小報只是其中之一。實驗文學、達達主義的“具象詩”、阿爾弗雷德·德布林（Alfred Döblin）的現代派小說、貝爾托特·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的社會批判劇、庫爾特·圖霍爾斯基（Kurt Tucholsky）和卡爾·馮·奧西茨基（Carl von Ossietzky）犀利的時事評論，全都把讀者分化成了兩派，其中的少數派挺身接受新事物的挑戰，而多數派則將上述作品視為“文化布爾什維主義”。與柏林文化界生機勃勃的激進文學并存的，是吸引著中產階級內的保守派民族主義者的另一個文學世界，它根植于對逝去的俾斯麥時代的緬懷，并且預言魏瑪共和國終將崩潰、俾斯麥時代終將回歸。尤其受歡迎的是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Oswald Spengler）的《西方的沒落》（The Fall of the West），它把人類歷史分為春夏秋冬的四季循環，將20世紀初的德國歸入冬季——以“沒有宗教信仰、沒有智性的世界主義傾向”為特征，其藝術“被外國的藝術形式占了上風”。

斯賓格勒認為，在政治學領域，辨別其為冬季的依據是，社會是由許多都市大眾組成的無機體，傳統的城邦形態已然瓦解。斯賓格勒贏得了許多追隨者，因為他宣稱，冬季預示著社會即將轉型到新一輪的春天，即“具有農業直覺的”、由一個“有機的政治體制”管理的社會，從而“造就覺醒的、充滿理想的強者”。[[116]](#116_1)另有一些作家給即將來臨的復興時期取了個新名字，此名不久就被極端右翼陣營熱情采納：第三帝國。使這個名稱家喻戶曉的，是新保守主義作家阿瑟·默勒·凡登布魯克（Arthur Moeller van den Bruck）于1923年出版的作品《第三帝國》（Das Dritte Reich）。他宣稱，帝國理想發軔于查理曼時代，復興于俾斯麥治下，它與魏瑪共和國所特有的政黨政治恰好相反。凡登布魯克寫道，第三帝國目前還是個夢想，需要進行一場民族主義革命來實現它。屆時，那些分裂德國的政黨將被清除。當第三帝國最終來臨時，它將把所有的政治團體和社會團體匯攏到民族復興的事業中。它將恢復德國歷史的連續性，再現帝國在中世紀的榮耀；它將是“終極的帝國”。[[117]](#117_1)其他一些作家，比如法學家埃德加·容（Edgar Jung），接受了此觀點，主張發動一場“保守的革命”，從而在不久的將來建立起“第三帝國”。[[118]](#118_1)

上述觀點高深抽象，有點兒曲高和寡，在此之下的許多作家，以各種方式頌揚帝國的優點，在他們看來，那些優點都是魏瑪共和國所不具備的。退伍軍官恩斯特·容格爾鼓吹1914年的奇跡，在他的暢銷書《鋼鐵風暴》中拔高了前線部隊的形象，其實那些人只有在行使暴力、遭受痛苦和制造痛苦時才找得到存在感。[[119]](#119_1)自由軍團催生出了一整套小說，贊頌老兵對革命者的仇恨，其措辭常常令人毛骨悚然，將殺戮和混亂描繪成憤懣不平的男子漢在尋機復仇時的終極表達，他們要報復1918年的戰敗以及隨之而來的革命和民主制度。[[120]](#120_1)上述這類作家以及許多其他人士宣稱，取代議會民主制的軟弱妥協，需要的是強人領袖——冷酷強硬、毫不妥協，愿意無所顧忌地打倒國家的敵人。[[121]](#121_1)另外一些作家則眷戀著往日田園詩般的鄉村世界，那里完全沒有現代都市生活的復雜與“墮落”，比如阿道夫·巴特爾斯（Adolf Bartels）的小說《迪特馬爾森人》（The Dithmarshers）里的世界，截至1928年，此書賣出了20多萬冊。[[122]](#122_1)

所有這些都表達了一種普遍的文化危機感，它不僅存在于保守派精英中間。當然，現代主義文化和媒體的許多方面在戰前就已經引人注目了。前衛藝術對公共意識有著明顯的影響，比如表現主義畫家恩斯特·路德維希·基希納（Ernst Ludwig Kirchner）、奧古斯特·馬克（August Macke）或埃米爾·諾爾德（Emil Nolde）以及旅居慕尼黑的俄裔抽象派畫家瓦西里·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等人的作品。無調性音樂和表現主義音樂起源于勛伯格（Schoenberg）、韋伯恩（Webern）、貝爾格（Berg）和策姆林斯基（Zemlinsky）的第二維也納樂派（Second Viennese school）；而以戲劇形式出現的色情劇已經引起群情激憤，比如弗蘭克·韋德金德（Frank Wedekind）編劇的《春之覺醒》（Spring's Awakening）。在威廉帝國治下，關于文學是否得體的邊界，以及所謂不愛國和顛覆性文學或者色情和淫穢圖書造成的威脅經常引發爭議，許多此類圖書都遭到警方的查禁。[[123]](#123_1)

進入20世紀，現代派藝術和文化的出現給中產階級帶來的文化危機感在威廉帝國時期得到了控制，以極端形式表達危機感的僅限于少數人。然而1918年之后，危機感四處彌漫。威廉二世時期一直起作用，且在一戰期間非常嚴苛的審查制度之終結，或者至少是范圍的縮小，鼓勵媒體涉足從前的禁忌領域。戲劇成了激進實驗和左翼宣傳鼓動的載體。[[124]](#124_1)復制成本的降低和印刷技術的進步，使得為大眾市場出版廉價的配圖報刊變得越來越容易。在魏瑪，建筑師瓦爾特·格羅皮烏斯（Walter Gropius）把魏瑪藝術學院（Weimar Art Academy）和魏瑪工藝美術學校（Weimar School of Arts and Crafts）合并起來，創建了包豪斯（Bauhaus），這個教育中心旨在把高雅藝術與實用設計結合起來，其教師包括瓦西里·康定斯基、奧斯卡·施萊默（Oskar Schlemmer）、保羅·克利（Paul Klee）、特奧·凡杜斯堡（Theo van Doesburg）和拉茲洛·莫霍利—納吉（László Moholy-Nagy）。包豪斯備受爭議，市民不歡迎該校那些放浪形骸的男生女生，當地政客貶斥包豪斯那種極其簡潔的超現代設計，說它來自原始種族的藝術形式，而不是源于德國藝術。1924年，國家不再為包豪斯撥款，學校遷往德紹（Dessau），但它依然飽受爭議，尤其是在新校長漢內斯·邁爾（Hannes Meyer）任內。邁爾由于同情共產主義而在1930年去職，由建筑師密斯·凡·德·羅（Mies van der Rohe）接替。密斯驅逐了學生中的共產黨員，用等級式，乃至獨裁式的管理制度取代了包豪斯原先的社群氛圍。然而，1931年11月，贏得德紹市議會多數席位的納粹黨派出《藝術與人種》（Art and Race）一書的作者、極端保守派保羅·舒爾策—瑙姆堡（Paul Schulze-Naumburg）對包豪斯進行了官方審查，隨后關閉該校。學校遂遷至柏林的一個工廠舊址，但自此以后，它僅僅是包豪斯從前的影子而已。包豪斯的命運顯示，即使是在文化氛圍寬松的魏瑪共和國，前衛藝術也多么難以獲得官方認可。[[125]](#125_1)

新的通訊手段愈發使人感覺傳統的文化價值受到了威脅。在這個時期，廣播電臺開始取得真正的成功，成為廣受歡迎的文化機構：1926年聽眾為100萬，到1932年又增加了300萬，電波傳送著各種各樣的觀點，包括左翼思想。大城鎮在1914年以前已經開設了電影院；到1920年代后期，電影吸引了大量觀眾；1920年代結束之際出現有聲電影，又吸引了更多的觀影者。在許多文化保守人士中間催生出審美迷失的，有表現主義電影，比如《卡里加里博士的小屋》（The Cabinet of Dr Caligari），以扭曲變形的布景著稱；也有色情電影，比如美國女演員露易絲·布魯克斯（Louise Brooks）主演的《潘多拉的盒子》（Pandora's Box）。辛辣諷刺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電影《藍天使》（The Blue Angel）改編自海因里希·曼（Heinrich Mann）的小說，由埃米爾·強寧斯（Emil Jannings）和瑪琳·黛德麗（Marlene Dietrich）主演，該片的創作團隊與制片方——胡根貝格的UFA電影公司發生齟齬，主要是因為影片把女主人公塑造成了玩世不恭、慣于挑逗的色情形象。[[126]](#126_1)改編自埃里希·瑪麗亞·雷馬克（Erich Maria Remarque）小說的電影《西線無戰事》（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受到了極端民族主義者的猛烈抨擊，他們認為該片的反戰立場是不愛國的。[[127]](#127_1)

達達主義的各種表現形式所嘲諷的美、心靈的提升、藝術的純粹性，是資產階級文化所崇尚的恬淡理想，而“新即物主義”（Neue Sachlichkeit，字面意思是“新寫實主義”）則把日常事物置于作品的中心，試圖呈現現代都市生活的美感。這并不符合所有人的口味。瓦格納作品《尼伯龍根的指環》（Der Ring Des Nibelungen）中的神話世界或者宗教儀式音樂劇《帕西法爾》（Parsifal）所喚起的不祥之感，不曾讓身穿燕尾服來聽歌劇的資產階級紳士們感到迷失；令他們尷尬的，反倒是克羅爾歌劇院（Kroll Opera）當時上演的保羅·欣德米特（Paul Hindemith）的作品《今日新聞》（News of the Day）中，女主角裸坐在浴缸里演唱詠嘆調的場景。作品甜美流暢的理查德·施特勞斯（Richard Strauss）是德國浪漫主義晚期的代表作曲家，他少年成名，但此時專門譜寫情緒平和的輕歌劇，比如《間奏曲》（Intermezzo）和《埃及的海倫》（The Egyptian Helena）；與他同時期，觀眾還能欣賞到阿爾班·貝爾格（Alban Berg）的表現主義杰作《沃采克》（Wozzeck），它以19世紀初的窮人和受壓迫者為背景，將無調性音樂和日常的言談方式融入歌劇。保守派作曲家漢斯·普菲茨納（Hans Pfitzner）把上述趨勢斥為民族退化的征兆，將其歸咎于猶太人的影響力和文化布爾什維主義，他的話引起了人們的共鳴。他疾呼，必須保護德國的音樂傳統免受這些威脅。普魯士州政府于1925年聘請奧地利裔猶太人、無調性音樂家阿諾爾德·勛伯格到柏林的國立音樂學院講授作曲，普菲茨納認為此舉加劇了德國音樂所受的威脅。音樂生活是德國資產階級認同感的核心，甚于在其他任何歐洲國家，因此上述發展動態直接擊中了德國資產階級的要害。[[128]](#128_1)

按照這種思路，更大的威脅來自美國爵士樂的影響。爵士樂進入了德國音樂，比如庫爾特·魏爾（Kurt Weill）作曲、貝爾托特·布萊希特作詞的《三分錢歌劇》（The Threepenny Opera），該劇以盜賊和罪犯的世界為背景，尖刻地譴責了人與人之間的互相利用，1928年首演時震撼了整個文化界；產生同樣效果的還有恩斯特·克熱內克（Ernst Krenek）的《容尼奏樂》（Jonny Strikes Up），該劇于1927年2月首演，特色是以一位黑人音樂家擔當主角。許多現代主義作曲家從爵士樂中發現了新的藝術靈感。當然，爵士樂主要是一種通俗的藝術形式，以各種風格在無數夜總會和酒吧中演奏，尤其是在柏林，逐漸進入舞廳、時俗諷刺劇[\*](#_180)劇場和飯店。大樂團以及踢樂女郎（Tiller Girls）等歌舞劇團的訪問演出，為柏林的舞臺注入了活力；而更大膽的人可以一晚上待在俱樂部，比如待在被當紅作曲家弗里德里希·霍倫德（Friedrich Hollaender）稱為“色情超級市場”的埃爾多拉多（Eldorado）俱樂部，坐在有不少異裝癖和同性戀的觀眾中間，觀看安妮塔·貝爾貝（Anita Berber）表演色情舞蹈，比如《可卡因》（‘Cocaine’）和《嗎啡》（‘Morphium’）。她于1928年因吸毒過量而早逝。卡巴萊[†](#_181)為這些晚間表演添加了一種辛辣的、反獨裁的政治諷刺元素，表演者講的笑話激怒了自負的保守派，有一位憤怒地抱怨說，他們嘲笑了“基督徒和德國人的民族感情、宗教情感和行為方式”。衛道士們被探戈、狐步和查理斯頓（charleston）之類的舞蹈激怒，種族主義言論則直接指向了黑人音樂家（雖然當時他們人數極少，而且大多擔任鼓手或舞者，主要是為表演增添一股異域風情）。

權威的音樂評論家阿爾弗雷德·愛因斯坦（Alfred Einstein）把爵士樂稱為“對一切文明的西方音樂最令人作嘔的背叛”，漢斯·普菲茨納也言語尖刻地反對法蘭克福音樂學院（Frankfurt Conservatory）把爵士樂納入教學內容，痛詆爵士樂的所謂原始風格為“黑鬼血統”的產物，是“崇美主義的音樂表現”。[[129]](#129_1)爵士樂和搖擺樂可以說是文化美國化浪潮中的翹楚，浪潮中那些迥然不同的現象，比如查理·卓別林（Charlie Chaplin）的電影以及現代工業方法“福特制”和“泰勒制”，在有些人看來已威脅到了德國的所謂歷史認同。大規模生產使大規模消費成為可能，大型百貨商店供應的國際商品琳瑯滿目，品種多得驚人，在沃爾沃斯超市（Woolworth's）等外資連鎖店里出售的，至少有一部分是普通工人階級家庭買得起的商品。大眾住宅規劃與現代家居設計挑戰了保守派理想的鄉居風格，引發了激烈的辯論。在右翼陣營的文化評論家看來，美國作為現代性的卓越代表所展現的影響力，意味著德國迫切需要恢復德意志生活方式、德意志傳統、德意志人的血統傳承和德意志人與土地之間的紐帶。[[130]](#130_1)

隨著官方審查制度和警察控制在1918年的終結，出現了文化自由和性自由的新氛圍，在很多人看來，其縮影就是柏林的夜總會。對此，老一輩德國人深感與時代格格不入。一位生于1878年的軍官后來回憶道：

回國后，我們看到的不再是誠實的德國民眾，而是被最下作的本能挑動起來的暴民。德國人曾經擁有的美德，似乎已經徹底陷入泥淖……淫亂、無恥和腐敗大行其道。德國女人似乎已忘記她們的德國式教養，德國男人似乎也已忘記他們的幽默感和誠實。猶太作家和猶太媒體可以“為所欲為”而不受懲罰，把一切攪成渾水。[[131]](#131_1)

無論右翼還是左翼陣營，都有人感到秩序與紀律已被革命掃除殆盡，道德淪喪與性變態充斥社會。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往往以清教徒式的態度看待人際關系，將政治責任感和自我犧牲精神置于自我實現之上，其中不少人都對“咆哮的二十年代”（Roaring Twenties）里柏林等地許多青年公然崇尚享樂主義文化感到震驚。在電影院、八卦小報、舞廳和電臺，休閑娛樂的商業化導致很多年輕人日益遠離勞工運動文化中那種較為嚴肅和傳統的價值觀。[[132]](#132_1)

大城市里的青年公然享受著性自由，這是上一代人對他們不以為然的具體原因之一。這也是在戰前就有先兆的。女權運動的風起云涌，讓公眾和媒體習慣了婦女對各種事務發表意見、占據至少某些管理崗位、在社會上闖出自己的道路。1910年以來，每年3月8日“國際婦女節”（International Women's Day）這一天，各大城市都有女性為爭取選舉權而舉行的街頭示威，就連中產階級女權運動者也在1912年游行過一次，盡管是坐在馬車里。除了最終取得成功的女性選舉權運動，當時一起出現的還有這樣一些要求：性滿足、未婚母親的平等權利和免費的避孕指導，雖然只是少數女權主義者提出的。弗洛伊德（Freud）傾向于認為人類的行為和欲望具有性動機的觀點在一戰前就已經有人在討論了。[[133]](#133_1)尤其是柏林，隨著城市規模的迅速擴展以及地位向國際大都市的躍升，它已成為社會學和性學領域各種亞文化的中心，包括生機勃勃的男同性戀和女同性戀圈子。[[134]](#134_1)

批評者認為，上述趨勢意味著家庭有日益式微之虞，主要是因為女性在經濟上越來越獨立。服務業在經濟領域的勃興，為女性帶來了新的就業機會，包括大型百貨商場的銷售崗位，以及蓬勃發展的白領世界里的秘書職位（由于打字機女性化的強大影響），這不但創造了新的剝削形式，也讓越來越多的年輕單身女性在經濟上和社會上取得前所未有的獨立地位。這在1918年之后愈益明顯，當時有1,150萬女性在職，占工作人口的36%。雖然與戰前狀況相比，這根本算不上大幅變化，但她們中的許多人此時從事著在公共場合隨處可見的工作，比如電車售票員、百貨商場的店員，或者——雖然寥寥可數——成為法律、大學和醫學領域的專業人士。[[135]](#135_1)越來越多的女性與男性競爭工作，民族主義者越來越擔心出生率在世紀之交的下降將削弱德國的實力，加之日益蔓延的文化焦慮感，共同引發了對于女性就業的抵制，這樣的抵制在1914年以前就已日漸明顯。[[136]](#136_1)戰前，德國有一場顯而易見的男性危機，民族主義者和泛日耳曼聯盟開始疾呼，號召女性回歸家庭、履行她們的天職——為國家生養和教育更多的子女。人們對于來自女權的挑戰所做出的強烈反應，致使女權主義者被迫轉入防守，開始排擠那些比較激進的支持者，更多強調自己無可挑剔地具有民族主義者的資格，強調自己無意要求過多的變革。[[137]](#137_1)

1918年之后，女性獲得選舉權，從地方議會到帝國國會的各級選舉，她們都有權參與投票和擔任候選人。她們正式獲得在主要專業領域工作的權利，在公共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也遠比戰前重要。相應地，男性至上論者的觀點也越來越有市場，他們反對女性就業，認為女性的歸宿是家庭。在大城市的自由氛圍中，人們的性觀念遠比戰前開放，這加深了男性至上論者的不滿。令保守人士更為震驚的是，有些人公開爭取同性戀權利，例如，馬格努斯·希施費爾德（Magnus Hirschfeld）于1897年創建了聽起來無傷大雅的“科學人道主義委員會”（Scientific-Humanitarian Committee）。實際上，希施費爾德是公開的同性戀者，他在許多出版物中宣傳自己備受爭議的觀點：同性戀者是“第三性”，其性取向是天生的，而不是環境因素的產物。他的委員會致力于廢除《德意志帝國刑法典》（Reich Criminal Code）第一百七十五條，該條規定成年男性之間“有傷風化的行為”為非法。令保守人士震怒的是，1919年在社會民主黨主政的普魯士州，政府撥給希施費爾德大筆資金，把他的非正式的科學人道主義委員會轉為州立的性科學研究所（Institute for Sexual Science），辦公場所設在首府的中心大蒂爾加滕區（grand Tiergarten district）。研究所提供性咨詢，舉辦科普式答疑會，回答諸如“做愛而不懷孕的最好辦法是什么？”之類的問題，呼吁修改管制性行為的所有法律。希施費爾德很快建立起廣闊的國際交流網絡，組成性改革國際聯盟（World League for Sexual Reform），其研究所是聯盟在1920年代的實際總部。他推動了公立和私立的避孕與性咨詢診所在魏瑪共和國的普及。毫不奇怪，他一再受到民族黨和納粹黨的詆毀，兩黨與中央黨聯手，試圖制定更加嚴苛的法律，但在1929年國會刑法改革委員會（Criminal Law Reform Committee）的表決中，它們的提案以微弱劣勢被共產黨、社會民主黨和民主黨否決。[[138]](#138_1)

民族主義者的反對立場，不僅僅是出于天然的道德保守主義。德國已在戰爭中失去200萬成年男性，而出生率還在迅速下降。1900—1925年間，每千名45歲以下已婚婦女的活產數急劇降低，從280例降至146例。法律對避孕套的銷售限制于1927年被放寬；到1930年代初，在公共場所有1600多部自動販賣機，僅柏林的一家公司每年就生產2,500萬個避孕套。提供避孕指導的性咨詢中心相繼開業，其中許多家和希施費爾德的研究所一樣，出資者或實際運營者都是普魯士州政府和其他地方政府，這激怒了道德保守派。墮胎飽受爭議，主要是因為它存在嚴重的醫療風險，但這方面的法律也放寬了。1927年，墮胎由重罪改為輕罪；1930年12月的教宗通諭《圣潔婚姻》（Casti Connubii）猛烈抨擊墮胎行為，為爭論推波助瀾；1931年，共產黨發起一場大規模的反對非法墮胎運動，在此期間舉行了大約1,500場集會和示威活動。[[139]](#139_1)

在許多人看來，上述社會運動似乎是陰謀的一部分，蓄意要破壞日耳曼人種的生育率和繁殖力。保守派和極端民族主義者發問：這一切后果難道不是來自婦女解放、來自道德敗壞地倡導不受繁衍欲望約束的性行為嗎？在民族主義者看來，女權主義者似乎比叛國者好不了多少，因為這些人鼓勵女性離家工作。然而，女權主義者自身對于性解放的新氛圍幾乎同樣感到恐慌。多數女權主義者都抨擊戰前關于性道德的雙重標準——自由歸男性、貞潔歸女性，而提倡對兩性實行同一標準的性約束。她們開展運動反對色情圖書以及包含性暴露畫面的電影和繪畫，譴責那些喜愛舞廳甚于讀書小組的年輕女子，她們在此過程中表現出來的清教徒做派，讓許多年輕女性感到可笑。到1920年代末，由于女性選舉權的實現，傳統女權主義者組織的主要奮斗目標已經過時，正苦于組織成員日漸老去，又吸引不到年輕人。[[140]](#140_1)女權主義運動處于守勢，曾經的主要支柱中產階級女性拋棄了以往所屬的自由派陣營，轉而支持右翼政黨。面對損害了日耳曼人種的指責，女權主義運動感覺有必要為自己辯護，于是強調自己支持民族主義者關于修改《凡爾賽和約》的提議，支持重新武裝德軍，支持家庭價值觀，支持克制性欲。后來的事實證明，右翼極端主義對女性的吸引力，絲毫不遜于對男性。[[141]](#141_1)

### 二

年輕人，尤其是青春期男孩，已在一戰前形成了他們自己獨特的文化風格。其中起關鍵作用的是“青年運動”，它是由五花八門而又發展迅猛的各種非正式俱樂部和協會組成的集合體，主要活動包括遠足、親近大自然、圍坐在篝火旁高唱民歌和愛國歌曲。當然，所有政黨都極力通過為青年人提供他們自己的組織招募年輕人，尤其是在1918年之后，比如民族黨設立的俾斯麥青年團（Bismarck Youth）、中央黨的溫特霍斯特同盟（Windthorst League）；但是總體而言，青年運動最引人注目之處在于它獨立于正式的政治機構，其領軍人物往往蔑視成年人的政治生活，視之為道德妥協和不誠實。運動助長了人們對現代文化、城市生活和正式政治機構的不信任感。即使不是大多數，也有許多青年團體的服裝是男童子軍式的準軍事制服。這些團體頗有反猶主義色彩，常常拒絕猶太人加入它們的行列。有些團體強調道德純潔的必要性，反對吸煙、飲酒或者濫交女友。另一些團體，如上文所述，持男性至上論立場。盡管認為青年運動為納粹主義鋪設了道路、應該對此承擔責任是歷史學家的夸大之辭，但獨立青年組織的絕大多數成員確實敵視共和國及其政客，他們在世界觀上是民族主義者，性格和抱負則是軍國主義的。[[142]](#142_1)

青年運動的影響力并沒有受到學校教育的消解，且對信奉新教的中產階級影響最大。“全體高中生都信奉民族主義，”維克托·克倫佩雷爾在1925年記錄道，“這是他們從老師那里學來的。”[[143]](#143_1)不過，實際情況也許比他想象的要復雜一點兒。在威廉帝國治下，皇帝運用個人影響力，主張改革德國教育，用側重于德國史和德語的愛國主義課程取代基于經典教學模式的自由主義傳統。到1914年，許多教師在世界觀上都是民族主義者、保守派和君主主義者，教科書和課程也極力秉承同樣的政治立場。不過，還有人數相當多的少數派持有各種自由主義中間派和左派立場。而且，1920年代，在社會民主黨主政的那些州，尤其是普魯士，政府竭力勸說學校把學生教育成忠于新建立的共和國民主制度的模范公民，教育系統的氛圍隨之而變。完成學業、走出校門的青年，除了有數百萬堅持保守派立場或者極端右翼政見之外，還有數百萬成為有堅定信仰的共產黨人或社會民主黨人，或者忠于中央黨。最終，無論是自由派和社會民主黨教師，還是保守派和君主主義者教師，似乎都沒能對學生的政治立場施加多少影響，學生們不接受老師的許多政治觀點，認為它們與魏瑪共和國治下的現實生活毫無關聯。就那些后來成為納粹黨徒的年輕人而言，政治忠誠往往發端于從政治上反叛學校教育的刻板僵化，其次才是受到了納粹黨徒或者親納粹的教師的啟發。一位生于1908年、持民族主義立場的學生回憶說，他總是與老師發生沖突，“因為我從小就討厭盲目的服從”。他承認自己受到一位民族主義教師的政治影響，但同時又評論道，其偶像的教誨“與學校所教的其他一切內容形成了強烈的反差”。另一位學生對自己從前的學校心懷舊怨——學校因他侮辱猶太同學而一再處罰他。[[144]](#144_1)

年輕人對極右翼的政治忠誠，最明顯地表現在德國的大學，其中許多是傳統可追溯至中世紀的著名學府。在魏瑪共和國治下，的確有一些左派教授設法保住了職位，但為數不多。大學在一戰后依然是精英機構，錄取的學生幾乎全部出身中產階級。特別有戰斗力的是各校的學生決斗隊，他們無一例外地是保守派、君主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其中有些人積極參與了鎮壓1919—1921年的幾次革命的暴力行動。為了抵消他們的影響力，1919年初，各高校的學生組建了與新共和國相適應的那種民主代議機構——學生聯合會（General Student Unions）。所有學生都必須加入，并且有權投票選舉他們在這些學生管理機構中的代表。[[145]](#145_1)

學生聯合會組成了一個全國協會，開始在學生福利和大學改革等領域發揮一些影響力。但這些領域也受到了極右翼的影響。從1919年最終接受《凡爾賽和約》到1923年法國占領魯爾區，這期間的各種政治事件促使一屆又一屆學生源源不斷地加入各個民族主義協會，聚集到傳統的學生決斗隊旗下。不久，各高校都有右翼候選人被選入學生會，同時，學生們對德國新建立的民主政體越來越不抱幻想，因為通貨膨脹把他們的收入變得一文不值，擁擠的校園環境也令人越來越難以忍受。學生人數迅速增長，從1914年的6萬增加到1931年的10.4萬，這主要是受人口結構變化的影響。政府投入大筆資金擴大招生，大學成了基層公務員、小企業主，乃至某些體力勞動者的孩子改變社會地位、實現向上流動的重要路徑。共和國的財政困難迫使許多學生靠勤工儉學讀完大學，這讓他們心里更加不滿。然而，數量不斷增多的大學畢業生找到工作的可能性在1924年就已開始減少，1930年之后幾乎機會全無。[[146]](#146_1)

絕大多數教授也具有濃厚的民族主義思想，正如他們曾經集體公開宣布支持德國1914—1918年的戰爭目標時所表現的那樣。許多教授在課堂上譴責1919年的《和約》，從而促成了右傾思想氛圍的形成。此外，他們還反對來自東部的猶太學生進入大學，將這看作“種族異類”的威脅，并對此提出行政解決方案和決策。許多人用危言聳聽的字眼書寫即將到來的境況（這基本上是出自他們的想象）：大學的全部學科都由猶太教授主導，聘任政策也由他們來定。1923年法國占領魯爾區，民族主義怒潮席卷德國大學，學生團體積極參與鼓動人們進行抵抗。1920年代尚未結束，大學就已成為極右翼勢力的政治溫床。即將畢業的一代大學生自認為是社會精英，在一個僅有少部分人有能力上大學的社會中，大學畢業生往往會有這種感覺；但是這代精英在一戰后重視行動甚于思想，重視民族自豪感甚于抽象知識，種族主義、反猶主義和日耳曼人種優越論幾乎是這代精英的第二天性。這代精英決心用前輩們在一戰中所展示的那種強硬態度，來攻擊過分寬容的自由民主制度所表現出的軟弱妥協。[[147]](#147_1)在這些青年看來，暴力似乎是對德國所遭受的災難的合理回應。對于聰明絕頂、教養良好的學生來說，前輩老兵們似乎受到了過多的感情創傷，過分混亂無序。在民族復興的事業中，需要的是冷靜、計劃和冷酷絕情。[[148]](#148_1)

對這些學生的多數同代人來說，上述影響終究是次要的。比它們重要得多的，是政治混亂、經濟匱乏、戰爭、破壞、內亂、通貨膨脹、國家戰敗以及部分領土被外國占領，這就是出生于一戰前十年左右的年輕人的共同經歷。一位生于1911年的年輕職員后來寫道：

我們什么事情都遇上了。我們知道并感覺到了家人的焦慮。缺乏生活必需品的陰影從未離開我們的餐桌，它使我們變得沉默。我們被粗暴地趕出了童年，沒人給我們指出正確的道路。我們過早地掙扎求生。苦難、羞恥、仇恨、謊言和內戰在我們的心靈上留下了印記，讓我們早早成熟。[[149]](#149_1)

出生于20世紀初至一戰爆發之間的人，確實是無條件地隨時準備應對任何狀況的一代人，他們將從不止一個方面在第三帝國起到決定性的作用。

### 三

魏瑪時期激進的現代主義文化癡迷于變態、謀殺、暴行和犯罪，想必在許多中產階級人士看來，已到了不健康的程度。藝術家喬治·格羅茲（George Grosz）的漫畫充滿了強奸和色情連環殺手的暴力場面，這種主題也可見于同時期其他藝術家的作品。兇手成了故事的中心人物，比如弗里茨·朗（Fritz Lang）的電影《兇手M》（M: Murderer Amongst Us），貝爾托特·布萊希特的戲劇《三分錢歌劇》以及阿爾弗雷德·德布林的現代派小說杰作《柏林亞歷山大廣場》（Berlin Alexanderplatz）。對弗里茨·哈爾曼（Fritz Haarmann）或者“杜塞爾多夫吸血鬼”彼得·屈滕（Peter Kürten）等真正連環殺手的審判，是全國媒體大肆渲染的題材，報刊上登載著繪聲繪色的報道，以迎合追看案件曲折進展的大眾讀者。腐敗甚至成了外國訪客寫作的柏林有關小說的一個主題，比如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的《諾里斯先生換火車》（Mr Norris Changes Trains）。罪犯成了令人既恐懼又著迷的對象，這加深了正派人士對社會秩序的擔憂，使中產階級更加反感價值觀的扭曲，而扭曲的價值觀似乎已成為現代主義文化的核心。連環殺手獲得的極大關注使許多人相信，不僅必須嚴厲地對這些“獸性”之人處以極刑，還應該重新實行新聞審查制度，不讓他們成為流行文化和每天的林蔭道小報上的名人。[[150]](#150_1)同時，戰后歲月的通貨膨脹和混亂無序催生了有組織的犯罪，其規模幾乎與當時的芝加哥黑幫不相上下，尤其是柏林，發展迅猛的黑社會組織“指環聯盟”（ring associations）在《兇手M》等電影中受到贊美。[[151]](#151_1)

許多人認為法律與秩序正在受到威脅，而那些本職工作就是維護法律與秩序的人，則普遍認為犯罪活動已無法控制。威廉時期的整套司法制度原封不動地傳到魏瑪時期，《民法》和《刑法》幾乎絲毫未做修改，為放寬法律限制所做的努力，比如廢除死刑，均徒勞無功。[[152]](#152_1)與從前一樣，法官群體從一開始就是作為法官人選而受到培訓的，而不是（像英國那樣）選任資深的執業律師為法官。因此1920年代在職的許多法官已經在司法系統任職幾十年了，他們的基本價值觀和態度都形成于威廉二世時代。在共和國治下，他們的地位更穩固了，因為像其他民主國家一樣，魏瑪民主政體的一個基本政治原則是，司法不受政治操控，此原則很快毫無爭議地被寫入憲法第一百零二和一百零四條。因此，就像軍隊一樣，司法機構得以不受任何實質政治干涉地運行了很長時間。[[153]](#153_1)

法官比以往更加獨立，因為絕大多數法官認為，由立法機構，而不是由神圣君主頒布的法律，已經不再中立，而是像德意志法官聯合會（German Judges' Confederation，聯合會的8位法官代表著大約1萬名德國法官）主席所說的那樣：“政黨、階級和雜種法律……一部寫滿謊言的法律”。“多黨執政的結果是，”他抱怨道，“制定的法律都是經過妥協的。這些拼湊起來的法律大雜燴，表達了各執政黨南轅北轍的目標，成了雜種法律。一切莊嚴的事物都已坍塌。法律也不再莊嚴。”[[154]](#154_1)他的抱怨也許有些道理：政黨利用司法制度為各自的目標服務，按照各自特有的政治偏見來制定新的法律。極右翼和極左翼政黨都設有專門鉆法律空子的部門，利用法庭審判撈取政治資本，并且聘用了一群訓練有素的政治律師，他們老于世故、不擇手段，有本事把庭審程序變成轟動的政治事件。[[155]](#155_1)這無疑進一步導致許多人不信任魏瑪的司法制度。然而在環境發生變化、出現了議會民主制之后，法官本身也可以被看作是在利用審判以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多年來，實際上是幾十年來，法官們一直把批評皇帝政府的社會民主黨和左翼自由派當作罪犯，在政治形勢發生變化之后，他們仍然不愿意轉變態度。法官們的忠誠不是獻給了新建立的共和國，而是獻給了他們在軍官團中的同道之人繼續服務著的那個抽象的帝國理想，一個主要建立在對俾斯麥帝國獨裁體制的回憶之上的理想。[[156]](#156_1)也許不可避免的是，在大量因魏瑪時期深刻的政治沖突而引起的政治審判中，法官們一邊倒地偏袒那些也在以帝國理想的名義行事的右翼被告，而當那些無此理想的左翼人士被起訴時，他們則喝彩加油。

左翼統計學家埃米爾·尤利烏斯·貢貝爾（Emil Julius Gumbel）在1920年代中期發表的數據顯示，1919年底至1922年中，左翼被告犯下的22宗政治謀殺案中，有38人被定罪，其中10人被執行死刑，余者平均每人服刑15年。與此形成對照的是，在同時期由右翼犯下的354宗政治謀殺案中，只有24人被定罪，根本無人被執行死刑，平均每人的刑期只有4個月；23名已認罪的右翼兇手竟然被法庭宣判無罪。[[157]](#157_1)當然，這些統計也許不完全準確。而且經常有針對“政治犯”的特赦，特赦由國會中的極端政黨共同商定，并獲得其他政治團體的足夠支持而通過，所以許多出于政治動機的刑事犯僅服刑較短時間就被釋放了。但是法官行為的重要之處在于它向公眾傳遞的信息，在整個魏瑪時期對和平主義者、共產黨人和其他左翼人士提起的無數宗叛國罪指控又強化了這個信息。據貢貝爾統計，在俾斯麥帝國最后30年的和平時期里，只有32人被裁定犯有叛國罪，而在同樣相對和平的1924年初至1927年末這4年里，法庭簽發了1萬多份叛國罪逮捕令，最終有1,071人被定罪。[[158]](#158_1)

法庭案件所審理的很大一部分，是那些膽大到在報刊中泄露軍隊的秘密裝備和軍事演習的人。也許最著名的是和平主義者、左翼編輯卡爾·馮·奧西茨基的案子，他于1931年被判18個月監禁，因為發表在其雜志《世界舞臺》（Die Weltbuhne）上的一篇文章透露了德軍正在蘇俄進行戰斗機訓練，而那是違反《凡爾賽和約》的非法行為。[[159]](#159_1)另一個同樣著名的案子牽涉左翼記者費利克斯·費申巴赫（Felix Fechenbach）。費申巴赫的罪名是他在1919年發表了1914年的巴伐利亞文件，因為法庭認定，這些與一戰爆發有關的文件暗示了德國負有一部分戰爭責任，從而在和約談判中損害了德國的利益。費申巴赫在慕尼黑被所謂的人民法庭（People's Court）判處11年徒刑。人民法庭是1918年巴伐利亞革命期間，為了對搶劫犯和殺人犯進行即決審判而設立的應急機構。[[160]](#160_1)在隨后一年的反革命期間，這些法庭被改用來審理“叛國”案件。人民法庭直到1924年才停擺，盡管它們在5年之前就已被魏瑪憲法認定為非法。設立人民法庭，繞開正常的司法系統，比如對它們定罪的案子沒有上訴權，以及暗示正義屬于“人民”而不是法律，這一切都為未來開創了惡例，并將在1933年被納粹黨重新采用。[[161]](#161_1)

為了盡力抵消這些影響，在社會民主黨的努力推動下，《保衛共和國法》（Law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Republic）于1922年獲得通過，據此設立的州法院有義務將右翼政治犯的案子從親右翼的法官手中撤出，移交給總統任命的法官。司法界很快就設法讓這個條款形同虛設，因此它對審判的總體模式幾乎沒有影響。[[162]](#162)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和社會民主黨據說曾承諾把反對死刑作為自己的政治原則，但他們卻將死刑寫入《保衛共和國法》，并追溯核準了戰爭剛結束時的內亂期里所執行的即決處決（summary execution）。這種做法，不但為以后的政府打開了方便之門，使之可以采用類似的嚴刑峻法保衛政府，而且推翻了司法的一個核心原則：任何刑罰均不應追溯施用于該法實施以前所犯罪行。[[163]](#163)這也為未來開了一個危險的先例。

基層法院無暇顧及《保衛共和國法》所闡述的原則。法官幾乎始終如一地從寬處理那些自稱出于愛國動機而犯罪的被告，無論他所犯何罪。[[164]](#164)例如，1920年的卡普暴動試圖武裝推翻合法的民選政府，結果參與者中只有一人被裁定有罪，即使這個人也僅僅被判處在某座城堡中禁閉一小段時間，因為法官把他“無私的愛國主義精神”算作減刑理由。[[165]](#165)1923年，有4位原先各被判處三個月徒刑的人在上訴至歷史悠久的德國最高司法機關帝國法院（Reich Court）后勝訴，他們被判刑是因為在哥達（Gotha）召開的右翼青年團體“青年德意志騎士團”的一次會議上高喊：“我們不需要猶太共和國，猶太共和國滾蛋！”在裁決書中，帝國法院不那么令人信服地認定，被告的言辭語義不明：

這些言辭可能指的是德國的法律和社會新秩序，參與建立新秩序的德國猶太人和外來猶太人作用突出。這些言辭的意思也可能是，在大多數人看來，占總人口很小比例的猶太人實際上卻擁有過多的權力、發揮著過大的影響力……僅僅因為被告辱罵帝國的現有體制，就認定他們辱罵的是憲法所規定的政體，如此判決并非無懈可擊。因此不排除本案存在適用法律錯誤的可能性。[[166]](#166)

帝國法院把兩種體制區別開來，并暗示魏瑪共和國只是某種暫時的反常現象，而不是“憲法所規定的政體”，這無比清晰地展示了法官真正的效忠對象是誰。這種裁決必然會產生影響。政治案件，乃至一切案件的庭審，都是魏瑪共和國的大事——大批民眾聚到公眾旁聽席；媒體進行詳盡報道，有些段落逐字記錄法庭實況；在立法會議上、各種俱樂部和社團里，人們熱烈地對案件展開辯論。像上文那類的裁決，只會讓反對共和國的極右翼人士感到滿足，并且為動搖共和國的合法性推波助瀾。

法官偏袒右翼和反對共和國的人，州檢察官也是如此。在考慮以何種罪名起訴右翼被告時，在起草訴狀時，在詢問證人時，甚至在構思開場陳述和結案陳詞時，檢察官總是將民族主義的信仰和意圖當作減刑理由。法官和檢察官、警察、監獄長和獄警、各種司法行政人員和執法人員，就是這樣通過各種方式偏袒共和國的敵人，動搖了共和國的合法性。盡管他們并不是蓄意破壞新建立的民主政體，盡管他們視共和國為不可避免的權宜之計而暫時加以接受，但他們的做法卻讓越來越多的人產生這樣的臆斷：在某種程度上，共和國并不代表德意志帝國的真正精髓。他們之中幾乎無人信任民主派，也幾乎無人努力推動共和國走上正軌。如果法律及其執行者都反對共和國，那么它還有什么機會呢？

[\*](#_178) 時俗諷刺劇（revue），一種輕松的娛樂性戲劇，以諷刺時事、風俗、人物為主要內容，由歌舞、滑稽短劇和諷刺模仿獨角表演組成。

[†](#_179) 卡巴萊（Cabaret），餐館或夜總會在晚間提供的歌舞表演。

## 第四節 適者與不適者

### 一

如果說魏瑪共和國有一個可以為它贏得大眾的忠心與感恩的貢獻，那就是建立了一個新的福利國家。當然，在1914年以前，德國并不缺少福利機構，特別是在俾斯麥為了切斷工人階級對社會民主黨的依賴而開創性地設立健康保險、意外保險和養老金等制度以后。俾斯麥的方案在當時屬于創舉，不應簡單地將其視為政府威權統治的遮羞布而予以否定，這些制度在他離任后的數年里又得到了詳盡的闡釋和擴充。其中有些制度，尤其是健康保險制度，到1914年已覆蓋數百萬工人，并包含一個真正自治的部門，給予許多工人參與選舉的機會。但這些制度無一覆蓋到社會底層，到威廉時期結束之前，底層的常態是警察管理貧民的救濟事務，同時剝奪了他們的民權，包括選舉權。即使如此，福利制度的運作在1914年以前還是處于不斷改良和標準化的進程，隨著俾斯麥改革而出現的社會工作這一新行業，除了負責普通工人的福利事務，還忙于評估并管理貧民、失業者和赤貧者。[[167]](#167)

俾斯麥的福利制度是普魯士官僚家長制的現代版本，然而在此基礎上，魏瑪共和國建立了一個更加精密而全面的結構，把社會天主教主義和新教慈善事業的雙重影響力，與社會民主黨的平均主義結合起來，盡管兩方面的結合并非毫無抵觸。[[168]](#168)魏瑪憲法的文本中滿是影響深遠的宣言：家庭生活重要性之原則，國家為家庭提供支持之必要性；政府保護未成年人免受傷害之責任；公民之工作權；國家為每位國民提供適當居所之義務。[[169]](#169)以這些原則為基礎制定的一整套法規獲得了國會的批準，包括關于青年福利（1922年）和未成年人法庭（1923年）的法律，為戰爭傷殘人士提供救濟和職業培訓（1920年）的條例，以公共福利制度取代濟貧措施（1924年）的政令，以及，如我們所知最重要的，1927年有關失業津貼的法律條文。既有的健康保險、養老金等方案得到了更加詳盡的解釋，并覆蓋全體國民。啟動了大規模的安居項目，其中許多是社會福利住房的翻新，僅1927—1930年間就提供了30多萬套新建或者翻新的住房。醫院床位的數量比戰前增加了50%，醫療從業人員也隨之同步增加。傳染病銳減，由診所和社會福利機構組成的網絡為社會弱勢群體提供支持，包括單身母親以及有違法行為的青年。[[170]](#170)

建立免費的全面福利制度，把它當作全體公民應得的權利，這是魏瑪共和國的主要成就之一，回過頭來看也許算是它最重要的成就。然而，盡管制定了詳盡的實施細則，它最終卻未能兌現1919年魏瑪憲法中那些華而不實的承諾；承諾與履約之間的鴻溝造成的一個主要后果是動搖了魏瑪共和國在很多人心目中的合法性。首先，共和國幾乎從建立之初就經歷的經濟困難，給它的福利制度增加了沉重的負擔，使之根本難以為繼。戰爭導致許許多多的人需要幫助。1914—1918年間，大約有1,300萬德國成年男子在軍隊服役，其中200多萬陣亡。有人估算，這相當于每35位德國居民中就有1人陣亡，這個陣亡比例幾乎是英國的兩倍（每66位英國居民中有1位陣亡軍人）、俄國的三倍（每111位俄國居民中有1位陣亡軍人）。到戰爭結束時，50多萬德國婦女失去了丈夫，100萬德國兒童沒有了父親。從戰場回來的男人中，約有270萬傷員、截肢者和殘疾人，這些人構成了社會不滿情緒的一個長期來源，因為政客曾經許諾要獎賞他們對國家的服務，卻未能令人滿意地予以兌現。

政府的應對之策是提高富人的納稅額，直至實際稅負幾乎翻倍，據一份有明顯偏差的估計，稅負占國民實際收入的比例從1913年的9%增加到1925年的17%。[[171]](#171)然而這根本不足以支付開銷，政府不敢再加稅，因為擔心被指責靠增稅來支付戰爭賠款，擔心導致納稅最多的人與之更加疏遠。除了原有的國家養老制度之外，德國經濟在1927年之后不僅必須承受失業保險的負擔，到1926年依然還要繼續給將近80萬殘疾退伍軍人和36萬戰爭寡婦發放撫恤金，并且繼續撫養90多萬失去父親的兒童或孤兒。撫恤金支出占政府開支的比例，高于戰爭賠款以外的任何開銷。[[172]](#172)最后，福利制度導致中央和聯邦各州政府中已嫌臃腫的官僚隊伍愈加壯大，1914—1923年增員40%，在此過程中，德國的人均公共管理成本幾乎翻倍。[[173]](#173)如此龐大的開支在一個繁榮的經濟體中也許可行，但在魏瑪共和國危機重重的經濟形勢下根本做不到，除非像1919—1923年那樣印鈔票、加劇通脹，或者像從1924年開始的那樣削減支出、減少國家福利機構的人員編制、對福利申請人實行更加嚴格的審核。

因此，許多申請人很快發覺，福利機構發的錢不足他們所需。福利開支中相當大比例的資金由地方政府負擔，因此地方管理人員特別吝嗇，他們通常要求申請人交出存款或房產作為受助的交換條件。福利密探不但舉報被隱瞞的收入來源，還鼓勵鄰居揭發那些拒不透露收入來源的人。此外，由于福利機構缺少必要的人手來快速處理大量請求，結果總是遲遲不回復那些要求資助的申請，因為它們要與其他機構通信，查明申請人以前是否已獲得福利，或者試圖把資助申請人的負擔轉給別的地方。就這樣，魏瑪福利機構很快成為歧視與控制的工具，因為官員們清楚地告訴申請人，他們只能得到最低額度的救濟，并且用侵犯隱私的方式打探申請人的個人情況，以確保申請人所述屬實。

上述做法沒有一樣贏得了共和國打算救助的那些人的好感。投訴、爭吵、斗毆甚至示威，都是福利局內外的常見景象。關于福利制度所面臨的問題，及其處理問題的方式，鞍匠兼座套工阿道夫·G.（Adolf G.）的例子為我們提供了深入的觀察。[[174]](#174)阿道夫生于1892年，曾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身受重傷，但不是在英勇抗敵的戰斗中受傷，而是被一匹馬踢到了肚子，這種傷在1920年代初至少需要做6次腸道手術。除了戰傷，他先前還受過工傷，加上家中有6個孩子需要撫養，因此他有資格領取多種救濟金。戰后，由于找不到工作，他轉而全力爭取政府救濟。但斯圖加特（Stuttgart）地方政府提出的條件是，要想在1921年之后繼續享受傷殘補助，他必須上交家中的收音機和天線，因為他所居住的市政福利房禁止使用這些東西。阿道夫拒絕交出，結果他和家人遭到驅逐，他對此做出的反應是斗志旺盛地不斷寫信給政府機構，包括柏林的勞工部。他買了一臺打字機，以讓信上的字跡更加清晰，他還盡力申請作為戰爭傷殘人士和一大群孩子的父親而應得到的其他幾種補助。沖突升級了。1924年他由于協助墮胎未遂被判一個半月監禁，他和妻子之所以想要墮胎，大概是覺得在這種境況下6個孩子已經夠多了；1927年他因為侮辱行為而被罰款；1930年他的救濟金被削減并且限于某些用途，比如買衣服，同時他的住房津貼被直接付給房東；1931年他被指控福利欺詐，因為他一直偷偷當收廢品的小販，努力掙點兒錢；1933年因在街頭賣藝又一次被起訴。他找過右翼和左翼的政治組織尋求幫助。他試圖讓政府相信，由于胃傷，他吃下去的多數東西都無法消化，所以需要比普通男人多三倍的食物，但他的要求遭到了生硬的拒絕。1931年，走投無路的阿道夫寫信給柏林的勞工部，把斯圖加特的福利官員比作中世紀的強盜貴族。[[175]](#175)

他與家人不得不過窮日子，這讓有點兒偏執的阿道夫·G. 感到氣惱，而讓他更加憤怒的是福利機構對其名譽的羞辱和對其身份的懷疑——他本已處在德國社會的底層，正在尋求自認為應得的幫助，但福利機構似乎決意要質疑他的動機和資格。不具名的、循規蹈矩的福利官僚侮辱了他的人格，這種感覺在福利申請人中間并不罕見，尤其是那些因為在戰時做出犧牲而申請救助的人。魏瑪共和國曾經高調承諾并且莊嚴載入憲法的是，根據需求與資格實行真正覆蓋全體國民的福利制度，而無情的現實卻是申請人遭到福利機構小氣的歧視、侵擾和羞辱，承諾與現實之間的巨大鴻溝無助于加強憲法的合法地位。[[176]](#176)

然而最讓人感覺不妙的是，醫療和福利機構決心創造出理性的、有科學依據的方法，來處理社會剝奪[\*](#_203)、偏常行為和犯罪，終極目標是在未來的幾個世代里將它們清除出德國社會，這鼓勵了侵蝕窮人和殘疾人公民自由權的新政策。由于社會福利機構迅速發展為龐大的官僚機構，所以戰前已廣泛流傳于福利專業人員中間的種族優生和社會生物學理論，開始發揮更大的影響力。有一種觀點被強化成了信條，認為遺傳因素在多種社會偏常行為中起了某種作用，不僅包括智力缺陷和身體殘疾，也包括長期酗酒和持續輕微犯罪，甚至包括妓女等群體的“悖德癖”（實際上許多妓女是迫于生計才從事性工作的）。醫學家和社會工作者開始編纂詳細的卡片索引，用以登記“反社會的人”——用我們現在對偏常人士的稱呼。自由派刑法改革者認為，州監獄的囚犯中雖然有些可以通過正確的教育項目得到改造、回歸社會，但多數根本無可救藥，主要是因為他們的人格具有遺傳缺陷。[[177]](#177)警察也推波助瀾，鑒別出大量“職業罪犯”和“慣犯”，予以嚴密監視。這經常成為一種自我應驗的預言，刑滿釋放者由于受到監視以及身份被鎖定為罪犯，因此沒有機會從事正當職業。截至1930年，僅在柏林，警察就采集了50多萬份十指指紋卡片。[[178]](#178)

這些觀點通過醫學、執法、刑事管理和社會工作等專業領域得到了廣泛傳播，并產生了十分真切的影響。受邀為已經定罪的罪犯做心理評估的心理學家開始采用生物學標準，比如在1922年于巴伐利亞被判持械搶劫罪和謀殺罪的無業游民弗洛里安·胡貝爾（Florian Huber）一案中，對這位在戰爭中受過重傷、被授予鐵十字勛章的年輕人做的心理評估得出結論，胡貝爾

盡管在其他方面無法被證明具有遺傳缺陷，但他顯示出了某些生理退化的證據：面相呈不對稱結構，右眼的位置明顯低于左眼；動輒大吵大鬧；耳垂細長；最重要的是，他自幼就是個結巴。[[179]](#179)

這份心理評估被當作證據，不是證明他不具備刑事責任能力，而是證明他已無可救藥，應予處決，而他也確實被處決了。德國許多地方的司法官員當時大量使用“寄生蟲”或“害蟲”之類的詞語描述罪犯，以一種新的、生物學的方式，把社會秩序的概念表達為一種生物體，它如果想茁壯成長，就必須把有害寄生蟲和外來微生物從身上清除掉。為了尋找更精確、更全面的方法來定義和運用這些概念，醫學專家特奧多爾·菲恩施泰因（Theodor Viernstein）于1923年在巴伐利亞創建了“罪犯生物學信息中心”（Criminal-Biological Information Centre），收集所有已知罪犯、他們的家人和背景的信息，從中鑒別出偏常人格的遺傳鏈。到1920年代末，菲恩施泰因及其合作者已經收集到大量案件索引，正在有條不紊地實現他們的夢想。不久，圖林根、符騰堡和普魯士也建立了類似的信息中心。許多專家認為，甄別出這種世代相傳的“劣等”人之后，防止他們繼續繁衍下去的唯一辦法就是強制絕育。[[180]](#180)

這類專家中的兩位，律師卡爾·賓丁（Karl Binding）和法醫心理學家阿爾弗雷德·霍赫（Alfred Hoche），于1920年邁出了超越上述觀點的關鍵一步，他們在一本薄薄的、創造了“不值得過的生活”這個短語的書中提出，那些被他們稱為“壓艙物式的存在者”，即毫無價值、只會給社會增加負擔的人，應該一殺了之。他們認為，無法治愈的病患和智障者正在消耗數百萬馬克、占用數千張人們迫切需要的醫院床位，所以應該允許醫生殺死他們。這是關于如何對待精神病患者、殘疾人、罪犯和行為偏常者的論辯中令人不安的新動向。在魏瑪時期，這樣做依然遭到多數醫學人士的強烈反對。共和國的基本原則是堅決捍衛人權，因此就連強制絕育的理論也無法得到任何形式的官方認可，許多醫生和福利官員依然質疑這種措施的倫理正當性或社會作用。天主教會及其開設的福利機構擁有強大影響力，它們也堅決反對這種措施。只要經濟狀況還允許人們想象共和國的社會理想有朝一日可以實現，強制絕育和非自愿的“安樂死”的持續爭論就依然不會有結果。[[181]](#181)

### 二

德國中產階級對1918年革命和魏瑪共和國的反應各不相同。我們已知的關于個人回應的最詳細記錄，也許來自維克托·克倫佩雷爾的日記，他在通脹期間的經歷我們已經看到了。從很多方面看，克倫佩雷爾都是教養良好的德國中產階級的典型，他只想好好生活，政治在其生活中所占比重相對較小，盡管他也在選舉中參與投票，并且始終關心政壇的動向。克倫佩雷爾的事業既不是全然墨守成規，也不是極其成功。他曾靠給報紙寫稿謀生，然后轉行到大學教書，在一戰快爆發時，他按照規定提交了兩篇論文，一篇論德語，另一篇論法國文學，憑這兩篇文章取得了任教資格。作為學術圈的新手和外來者，他只能在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大學（University of Naples）開始其學術生涯。從那里，他憂慮地觀察著1914年之前國際局勢的惡化。他支持1914年德國的宣戰，認為德國的事業是正義的，于是回國參戰，在西線服役，1916年因傷病退役，在軍隊的新聞審查處工作到戰爭結束。

克倫佩雷爾希望有一個穩定的職業，但像其他德國中產階級人士一樣，他發現自己的希望隨著德國的戰敗破滅了。對這樣的人來說，只有回歸到秩序井然的政治環境，才有可能在德國學術機構得到穩定的收入和固定工作。[[182]](#182)1918年最后兩個月發生的事件，在不止一個方面使他感到難過。他在日記中寫道：

報紙帶來了太多的恥辱、災難、垮臺，這些事情從前覺得不可能發生，現在卻多得讓人受不了，我只是木然地收下報紙，基本上不再去讀……根據我的所見所聞，我認為如果不把工人與士兵委員會這個毫無意義、愚昧無知的專制組織盡快清除掉，整個德國就要完蛋了。我把希望寄托于從戰場上回來的隨便哪一位將軍。[[183]](#183)

革命政府1919年初的荒唐行為，讓暫時在慕尼黑工作的克倫佩雷爾感到驚恐——“他們熱烈地談論自由，行為卻越來越專制殘暴”。他還記錄了自己在圖書館做學術研究的幾個小時，當時闖入市區的自由軍團射出的子彈就在外面呼嘯而過。[[184]](#184)克倫佩雷爾盼望的是正常與穩定，卻無法得到。1920年，如我們已在上文讀到的，他設法在德累斯頓工業大學謀得了教授職位，在那里講授法國文學、做研究和寫作，還主編一份期刊。看到比自己年輕的人在更好的機構里得到了高級職位，他感到越來越沮喪。從很多方面看，克倫佩雷爾都是那個時代中典型的溫和保守派，在文化態度和身份認同上，他徹頭徹尾地屬于愛國的、中產階級的德國人；而且他相信民族性格的概念，并在自己所著的18世紀法國文學史中做了詳盡闡述。

但在一個至關重要的方面，他又與典型的德國中產階級人士有所不同。維克托·克倫佩雷爾是猶太人，他的父親在極其支持猶太教改革的柏林猶太會堂擔任牧師。他接受了洗禮成為基督教新教徒，是越來越多以這種方式歸化的德國猶太人之一。這個決定與其說是出于信仰，不如說是出于社交考慮，因為他對任何一種宗教似乎都沒有特別虔誠的信仰。1906年，他與非猶太裔的德國女子、鋼琴家埃娃·施萊默（Eva Schlemmer）結婚，進一步證明了自己的歸化。他與妻子在思想上和文化上有許多共同的興趣，最契合之處也許是兩人都愛看電影。他們一直沒有孩子。然而，歷經1920年代的人世滄桑，正是婚姻給克倫佩雷爾的人生帶來了穩定，盡管夫婦二人越來越頻繁地感到身體不適，這或許是日益嚴重的疑病癥的夸張反應。[[185]](#185)整個1920年代，他的生活雖說不上盡如人意，但還算穩定。1920年代初他因擔心內戰而備受困擾，但內戰并未到來，而且1923年之后看起來更不太可能發生了。[[186]](#186)克倫佩雷爾在日記中寫滿了他的工作、假期和消遣，他與家人、朋友和同事的關系，以及日常生活的其他方面。“我常常問自己，”他在1927年9月10日寫道，“我為什么要寫如此龐雜的日記”，對此他并無真正的答案：這只是強烈的沖動使然——“我就是停不下筆。”[[187]](#187)日記不見得會出版，那么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只是記錄人生。一直記錄。印象、知識、閱讀、活動，什么都記。別問為什么或有什么目的。”[[188]](#188)

克倫佩雷爾有時不經意地寫道，他覺得自己職業前途受阻，原因在于他是猶太人。盡管他出版了一部又一部關于法國文學史的著作，但也只能待在德累斯頓工業大學，無望在名校謀得教職。“有的大學特別保守，有的大學比較開明，”他在1926年12月26日記錄道，“特別保守的大學不要猶太人，開明的大學總是已經有了兩個猶太人，不肯再要第三個。”[[189]](#189)反猶主義在魏瑪共和國的升溫，也給克倫佩雷爾的政治立場帶來了麻煩。他在1919年9月寫道：“我漸漸明白了，反猶主義這個新障礙對我來說是多么的不可逾越。我曾經自愿參戰！而現在，作為受洗的基督徒和民族主義者，我卻沒有立足之地。”[[190]](#190)克倫佩雷爾持保守派政治立場，這在猶太裔中產階級專業人士中間頗為罕見。他相當認同德意志民族黨的基本政綱，但該黨越來越狂熱的反猶主義論調卻使他不可能支持它，盡管他對戰前俾斯麥帝國和威廉帝國的歲月無比眷戀。像許多德國人一樣，克倫佩雷爾發現自己在想到魏瑪共和國時期政黨之間的暴力沖突時，“無動于衷、漠不關心”。[[191]](#191)克倫佩雷爾本能地敵視左翼，但1920年3月當他聽到卡普在柏林發動政變的消息時，又忍不住寫道：

我的右翼傾向大大減弱……因為發現了右翼的永久反猶立場。我非常樂于看到目前的政變者碰壁，我對于違背誓言的軍隊實在沒什么熱情，對于幼稚、混亂的學生更是毫無興趣；但我不會因此去支持“合法的”艾伯特政府，更不會去支持左翼激進派。它們都令我厭惡。

“簡直是一出悲劇與鬧劇的合體，真讓人難受，”他寫道，“5,000至8,000個大兵竟能顛覆整個德國。”[[192]](#192)

也許令人奇怪的是，這位終生從事法國文學研究的人，卻非常支持再次對法國發動一場戰爭——大概是因為他一戰期間在西線的經歷，更因為他對《凡爾賽和約》的明顯憤慨。但在魏瑪共和國治下，發動反法戰爭幾乎是不可能的。1921年4月20日他寫道：

我支持君主制，我渴望恢復往日的德意志強國，我總盼著再和法國打一仗。不過，與日耳曼種族主義者為伍真是太惡心了！如果奧地利與我們合并就更惡心了。我們現在的一切感覺，差不多也是法國人在1870年之后應有的感受。如果在威廉二世治下，我有可能當不上教授，可是……[[193]](#193)

早在1925年，他就已經預見到選興登堡當總統可能是一場災難，堪比1914年弗朗茨·斐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的被刺。“法西斯主義無處不在。戰爭的恐怖已被遺忘，蘇俄發生的事情正在驅使歐洲做出反應。”[[194]](#194)隨著時間的推移，克倫佩雷爾對持續不斷的政治熱潮漸生厭倦。1932年8月，就在魏瑪共和國進入最后的動蕩期時，他寫道：

而且，我沒必要書寫我這個時代的歷史。我提供的信息是枯燥的，我對這個時代半是厭惡、半是恐懼，我不想任人擺布，對任何政黨都全無熱情。一切都毫無意義、不成體統、令人不快——沒人敢作敢當，個個皆是傀儡……希特勒即將上位，還能有誰呢？我這個猶太教授的出路在哪里？

克倫佩雷爾反而更愿意寫那只游蕩到他家里的小黑貓，它立刻成了他們夫婦的寵物。[[195]](#195)政治形勢險惡，妻子又患上了嚴重的臨床抑郁癥且頻繁生病，受這兩個因素影響，克倫佩雷爾寫得越來越少，到1932年底幾乎快要放棄寫日記了。

克倫佩雷爾對政治的悲觀態度，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當時正經歷著的個人困境。然而與他持同樣態度的，還有許多愛國的開明保守派德國猶太人，他們在魏瑪共和國的各種沖突中不知所措。除此之外，他厭惡政治的極端表現，對身邊的暴力與狂熱感到憂慮，這些無疑是許多德國中產階級人士的特征，無論他們來自什么背景。克倫佩雷爾的猶太血統，既讓他遭受了一些不利的種族歧視，也賦予了他敏銳的眼光，以嘲諷的態度旁觀那些為未來留下隱患的政治動向，他的猜測往往是對的。不過他并沒有受到反猶主義的過度傷害，未曾經歷過任何暴力，實際上，他當時的日記中一例個人的受辱經歷都沒有記錄過。正式的說法是，克倫佩雷爾這樣的猶太人在魏瑪共和國治下享有的自由和平等，遠遠多于以往任何時候。共和國為猶太人提供了新的機會，既可以當公務員、從政、從事專業工作，也可以進入內閣，例如猶太人瓦爾特·拉特瑙出任外交部長，這在威廉帝國時期是不可想象的。猶太人擁有的部分媒體，特別是由兩家自由派猶太企業掌控的莫斯報團（Mosse）和烏爾施泰因報團，合計發行的報紙占1920年代柏林報紙銷量的一半以上，有力地支持了共和國的自由制度。藝術不再受限于審查制度和官方禁令，這剛剛獲得的自由，使許多猶太裔作家、畫家和音樂家作為現代派文化的倡導者嶄露頭角，與那些非猶太裔的現代派藝術家輕松交往，比如作曲家保羅·欣德米特、詩人和劇作家貝爾托特·布萊希特、藝術家馬克斯·貝克曼（Max Beckmann）和喬治·格羅茲。猶太人支持共和國，其表達方式是把選票主要投給民主黨，其次投給左翼政黨。[[196]](#196)

另一方面，部分是出于對上述發展進程的抗拒，1920年代也見證了反猶主義思潮在德國政界和社會的蔓延與深化。甚至在戰前，泛日耳曼聯盟和其他右翼團體就已經大肆宣傳，指責猶太人暗中損害德國。這類種族主義陰謀論得到了魯登道夫等軍事將領的高調認同，戰爭期間其臭名昭著的表現是所謂的1916年10月猶太人口普查，做此決策的高級將領希望普查結果有助于他們在戰后拒絕猶太人進入軍官團。普查的目的是揭露猶太人既怯懦又不忠的天性，方法是用統計數據展示參軍的猶太人比例較低、參軍的猶太人從事文書工作的比例過高。普查的實際結果顯示了相反的情況：許多猶太裔德國人，比如維克托·克倫佩雷爾，是徹底的民族主義者，強烈認同德意志帝國；在軍隊中和前線的猶太裔德國人比例過高，而不是較低。這雄辯地駁斥了反猶軍官的預判，導致普查結果被禁止公布。然而，得知軍隊下令做這樣的普查之后，德國猶太人非常憤怒，盡管大多數普通士兵并不認同普查所顯露的態度。[[197]](#197)

一戰后，右翼普遍相信的關于德軍在1918年被革命者“從背后捅了一刀”的說法，很容易地轉化為反猶主義的煽動。魯登道夫這類人顯然認為，在背后捅刀子、領導德國共產黨等顛覆性組織、贊同《凡爾賽和約》、建立魏瑪共和國的，正是“猶太人”。實際上，德軍1918年顯然是敗在了軍事上。正如我們所知，并沒有人在背后捅刀子。簽署《和約》的政界要人，比如馬蒂亞斯·埃茨貝爾格，根本不是猶太人。雖然像羅莎·盧森堡等猶太人在共產黨領導層中所占比例過高，雖然歐根·萊文（Eugen Levine）等猶太人在1919年初發動慕尼黑起義的革命者中所占比例過高，但他們代表的并不是猶太人，而是與許多非猶太裔人士（比如卡爾·李卜克內西，很多右翼人士根據他的極左政治立場想當然地斷定他是猶太人）一起，代表著革命者。多數德國猶太人支持穩重、開明的中間派政黨，其次支持社會民主黨，而不支持革命的左翼政黨，因為它們暴力的激進主義讓克倫佩雷爾這樣的體面公民既震驚又膽寒。然而，1918—1919年的局勢助了右翼反猶主義一臂之力，使許多猶豫不決的人相信，種族主義者關于猶太人的陰謀理論終究是對的。[[198]](#198)

除了極右翼宣傳把猶太人當作1918—1919年變故的替罪羊，還出現了一種更受歡迎的反猶主義形式——專門針對發戰爭財的人，以及在通貨膨脹中趁亂暴富的少數金融家。反猶主義總是在發生經濟危機的時候大行其道，而魏瑪共和國的經濟危機又是德國有史以來最嚴重的。俄國境內那些躲避反猶主義暴力和內戰的猶太貧困難民加快步伐移民德國，成了沖突的一個新來源。一戰前德國大約有8萬“東歐猶太人”，他們的到來，加上來自波蘭等地的數量更多的移民工人，導致德意志帝國政府于1913年實施了一種幾乎獨一無二的國籍法，只允許那些能證明自己的祖先是日耳曼人的人獲得德國國籍。[[199]](#199)一戰后，由于布爾什維克革命席卷俄國，反革命的沙皇支持者乘勢對猶太人進行集體屠殺和大規模殺戮，引發了新一輪涌入德國的難民潮。盡管移民迅速適應了新的文化，且人數不多，但他們很容易成為民眾泄憤的對象。1923年11月6日，惡性通貨膨脹最嚴重的時候，有位新聞記者在柏林一個東歐猶太移民占很高比例的區看到幾次嚴重騷亂：

小巷里到處是咆哮的暴徒，他們在夜色的掩護下搶劫。龍騎兵大街街角的一家鞋店被洗劫一空，窗玻璃的碎片散落在街面上。哨聲突然響起。長長的一隊人馬占據了整個街道，這是警察封鎖線在推進。一位警官高叫：“清空街道！各回各家！”人群慢慢散去。到處是同樣的喊聲：“揍死猶太人！”長久以來，煽動家一直在操縱饑餓的民眾，挑動他們去襲擊那些在龍騎兵大街地下室里慘淡經營著物資交易的可憐人……驅使他們搶劫的，不是饑餓，而是怒火升騰的種族仇恨。年輕小伙子只要見到外表像猶太人的過路者，就立即尾隨，以便瞅準時機揍他一頓。[[200]](#200)

如此公開地訴諸暴力，表明反猶主義者準備像德國政壇的眾多其他邊緣型團體一樣，為了達到目的，挑起或者積極采取暴力和恐怖行動，而不再像1914年之前一樣僅僅滿足于言論反猶。結果是發生了一波針對猶太人及其財產的個人暴力、對猶太會堂的攻擊、褻瀆猶太墓地的行為，這些事件一直缺乏完整的文獻記錄。[[201]](#201)

1918年后的反猶主義與戰前的反猶主義的明顯不同，不僅僅表現在它前所未有地致力于把強烈的偏見轉化為暴力行動。盡管魏瑪共和國時期絕大多數德國人依然反對使用武力對付猶太人，但反猶主義的語言卻前所未有地嵌入了主流政治話語之中，損害德國的“背后一刀”、“十一月賣國賊”、“猶太共和國”和“猶太—布爾什維克陰謀”，這些以及類似的許多煽動性口號經常可以在報紙上讀到——無論是作為社論的表達，還是出現在政治事件、演講和審判的報道中。它們日復一日地回響在立法會議上：共和國中期的國會里僅次于社會民主黨的第二大黨民族黨的言論中充斥著這類反猶主義的言辭。保守黨對這類反猶語言的使用比在戰前更加極端、更加頻繁，右翼小團體則對其予以闡發，此類小團體所得到的支持，總體上遠遠多于阿爾瓦特、伯克爾之流的反猶主義政黨。與許多此類小團體緊密結盟的是德國新教教會，它抱持極其保守的民族主義立場，并且傾向于迸發反猶情緒；而天主教的反猶主義也在1920年代重新抬頭，喚醒它的是對于布爾什維主義威脅的恐懼，因為布爾什維克已在一戰結束時對匈牙利和俄國的基督教實施了暴力打擊。1918年之后，許多右翼和中間派的德國選民都熱切期盼德意志民族自豪感與榮耀的復興，因此他們或多或少地相信，德意志的復興必須通過擊敗“猶太”顛覆精神來實現，正是這種猶太精神被認為在一戰結束時摧毀了德國。[[202]](#202)在這股反猶主義的言論浪潮的洗禮下，許多德國人的感情變得非常麻木，以至于當一個把反猶主義置于其狂熱信仰核心的新政黨——納粹黨——在戰后出現時，人們并沒有意識到其中有什么特別之處。

[\*](#_182) 社會剝奪（social deprivation），由精神疾病、貧困、缺乏教養和低下的社會地位等因素導致的個人與社會的隔離，難以或者無法與他人進行文化上的正常互動。

# 第三章 納粹主義的興起

## 第一節 波希米亞式革命者

### 一

1918年10月，德國宣布大赦，當庫爾特·艾斯納（Kurt Eisner）從慕尼黑的施塔德爾海姆（Stadelheim）監獄70號牢房獲釋時，沒有什么跡象表明他很快將成為德國革命者的領軍人物之一。艾斯納是著名的戲劇評論家，過著慕尼黑市中心附近施瓦賓格區（Schwabing district）藝術家那種波希米亞式的生活。[[1]](#1_3)他的外表張揚著他的波希米亞風格：小個子、大胡子，外出時身披黑斗篷、戴著大大的黑色寬邊帽，鼻梁上架著一副鋼框小眼鏡。艾斯納不是土生土長的巴伐利亞人，他來自柏林，1867年生于一個中產階級猶太家庭。他認同社會民主黨內的右派，20世紀初時因為支持那些主張社民黨放棄馬克思主義的“修正主義者”而丟掉了在當地社民黨黨報的工作。然而，像許多“修正主義者”一樣，艾斯納反對戰爭。他參與領導組建了反戰的獨立社會民主黨，后來在1918年1月組織了一系列罷工，試圖結束沖突。[[2]](#2_3)

1918年11月，當帝國開始分崩離析的時候，是艾斯納憑借他的口才以及對政治會議的不屑，挺身而出領導了慕尼黑。當時多數派社會民主黨提議在巴伐利亞首府舉行傳統的政治游行，就在人們跟著一支銅管樂隊、手持標語、井然有序地進行和平示威時，艾斯納跳上講臺，號召民眾占領軍營、控制城市。艾斯納說做就做，率領一群追隨者直奔軍營，沒有遇到士兵的抵抗。獲得當地革命的工人與士兵委員會的批準，艾斯納宣布巴伐利亞為共和國，成立了由多數派社會民主黨和獨立社會民主黨組成的革命政府，他本人出任總理。但是他領導的政府連維持食品供應、提供工作機會、遣散軍隊和保持運輸系統正常運轉等基本任務都沒有做到。保守的巴伐利亞農民階級被慕尼黑的局面激怒，拒絕供應食品，而大多數火車頭又已被協約國征用。工人們開始在各種會議上詰問艾斯納，給他喝倒彩。在內閣會議上，一位成員憤怒地對艾斯納說：“你是個無政府主義者……你根本不是政治家，你是個傻瓜……我們被無能的管理給毀了。”[[3]](#3_3)因此，在1月12日的選舉中，多數派社會民主黨毫無懸念地取得了壓倒性的勝利，艾斯納領導的獨立社會民主黨慘敗。

艾斯納代表了巴伐利亞極右翼所仇恨的一切：波希米亞式人物、柏林人、猶太人、記者、戰爭期間倡導和平的活動家、因組織1918年1月的罷工而被捕的煽動家。事實上，與他的秘書、記者費利克斯·費申巴赫一起，艾斯納甚至還公布了巴伐利亞檔案館中有關一戰爆發的秘密文件，這些文件可以證明德國的戰爭罪責。總之，他是承擔傳說中“背后一刀”之責的理想對象。1919年2月21日，極右翼一勞永逸地表達了對他的痛恨：在艾斯納步行前往巴伐利亞州議會的路上，貴族青年學生安東·馮·阿爾科—瓦利伯爵（Count Anton von Arco-Valley）近距離朝他射出兩槍，當場殺死了他。[[4]](#4_3)暗殺在巴伐利亞首府引發了暴力風潮。艾斯納的保鏢立即開槍打傷阿爾科—瓦利，后者被憤怒的人群包圍起來，幸虧費申巴赫及時干涉，他才沒有就地被私刑處死。受傷的刺客被押送到施塔德爾海姆監獄，關進艾斯納一年前住過的那間牢房。不久，獨立社會民主黨內一位艾斯納的崇拜者走進議會，拔出槍，在議事廳中所有議員的面前，朝艾斯納最激烈的批評者、多數派社會民主黨領袖埃哈德·奧爾（Erhard Auer）開了兩槍，奧爾差點兒傷重不治。與此同時，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艾斯納的口袋里發現了辭呈的草稿，這場暗殺毫無意義。

然而，由于擔心再次發生暴力事件，巴伐利亞州議會暫時休會，多數派社會民主黨不經投票就宣布自己為合法政府。由名氣不大的多數派社會民主黨人約翰內斯·霍夫曼（Johannes Hoffmann）領導的聯合內閣成立了，但它沒能恢復秩序，因為艾斯納葬禮之后，出現了大規模街頭示威。在隨后的權力真空期，武器和彈藥被發放給工人與士兵委員會。匈牙利爆發共產主義革命的消息，使巴伐利亞的極左翼受到激勵，立即宣布成立“委員會共和國”（Council Republic），準備以蘇維埃式政權取代議會。[[5]](#5_3)然而，巴伐利亞新的委員會共和國的領導人不是列寧式人物。波希米亞式文人再次走到前臺，這一次不是劇評家，而是劇作家——年僅25歲的詩人、劇作家恩斯特·托勒（Ernst Toller）。與其說托勒是社會主義者，不如說他是無政府主義者，他延攬與自己志趣相投的人進入政府，包括同為劇作家的埃里希·米薩姆（Erich Mühsam）和著名的無政府主義作家古斯塔夫·蘭道爾（Gustav Landauer）。施瓦賓格區的才子們組成的政府不久被戲稱為“咖啡館無政府主義者政權”，它得到了慕尼黑工人與士兵委員會的公開支持。面對這種形勢，霍夫曼領導的多數派社會民主黨內閣逃往巴伐利亞北部的班貝格（Bamberg）。與此同時，托勒宣布進行全面的藝術改革，他領導的政府也宣布，慕尼黑大學（Munich University）對所有的申請者開放，但不招收想學歷史的人，因為歷史學已被作為反文明的學科取消。另一位部長宣布，將通過發行免費貨幣的辦法終結資本主義。外交人民委員弗朗茨·利普（Franz Lipp）發電報到莫斯科發牢騷：“逃犯霍夫曼帶走了外交部衛生間的鑰匙”，并且對符騰堡和瑞士宣戰，“因為這兩條狗不肯爽爽快快地借給我60個火車頭。”他還說，“我有把握，我們會打贏的。”[[6]](#6_3)

霍夫曼政府試圖用一支臨時拼湊的志愿者武裝去推翻委員會共和國，卻被從工人與士兵委員會的武裝人員中招募的“紅軍”輕易地鎮壓下去。有20人在交火中喪生，形勢顯然越來越險惡。戰斗發生那天，由俄共黨員馬克斯·萊溫（Max Levien）和歐根·萊文組織起來的共產黨員，粗暴地把“咖啡館無政府主義者”排擠出局。不等德國共產黨批準，他們就在慕尼黑建立了一個布爾什維克政權，并開始與列寧通信，列寧禮貌地詢問他們是否已設法把銀行收歸國有。1914年戰爭爆發時萊溫碰巧待在德國，并應征加入德軍。根據列寧的指示，他開始逮捕貴族和中產階級上層人士作為人質。慕尼黑的主要教堂被改成革命圣殿，由“理性女神”（Goddess Reason）接管。與此同時，共產黨開始擴充和訓練紅軍，紅軍人數不久就達到2萬，個個裝備精良、津貼豐厚。布爾什維克政權發布一系列公告，宣布巴伐利亞將成為實現歐洲布爾什維克化的先鋒；工人必須接受軍事訓練，私人手中的一切武器都必須上交，違者處死。[[7]](#7_3)

這一切都遠比當政一星期的咖啡館無政府主義者的所作所為更讓霍夫曼政府害怕，擔心在布達佩斯、慕尼黑，可能還有維也納，形成一個布爾什維克革命政權軸心。流亡班貝格的多數派社會民主黨顯然需要一支可靠的武裝供其調遣。霍夫曼簽約聘請了一支35,000人的“自由軍團”戰斗隊，由巴伐利亞上校弗朗茨·里特爾·馮·埃普（Franz Ritter von Epp）領導，以包括一列裝甲火車在內的正規軍部隊為后援，并配備了機關槍等重要軍事裝備。慕尼黑已陷入混亂，一場總罷工導致生產癱瘓、公共服務停頓。搶劫和盜竊蔓延全城，城市此時也被自由軍團封鎖。自由軍團宣布不放過任何一個角落，在慕尼黑只要發現有人攜帶武器，就會被立即槍斃。被嚇壞了的慕尼黑工人與士兵委員會投票通過了對共產黨的不信任案，共產黨被迫下臺，城市處于無政府狀態。在這種形勢下，一隊驚慌失措的紅軍開始對關押在當地盧伊特波爾德文理中學（Luitpold Gymnasium）的人質進行報復。人質中有6名圖勒學會（Thule Society）的成員，該學會是泛日耳曼聯盟的一個反猶派別，創建于一戰快結束時。它以純種“雅利安人”的發源地——冰島（“圖勒”）為名，并使用“雅利安人”的卐字符號表示自己的人種優越性。圖勒學會起源于戰前的“日耳曼隱修會”，該隱修會也是一個極右翼秘密組織，由自封的馮·塞博騰朵夫男爵（Baron von Sebottendorf）領導，據警察所知，此人的真名是亞當·格勞爾（Adam Glauer），曾被判犯有偽造罪。圖勒學會中的許多成員后來成了第三帝國的名人。[[8]](#8_3)據說暗殺庫爾特·艾斯納的刺客阿爾科—瓦利一直試圖加入圖勒學會。出于報復欲和絕望心理，紅軍讓人質中的10個人一字排開，站在行刑隊面前，然后槍斃了他們。被處決者包括圖爾恩—塔克西斯親王（Prince of Thurn and Taxis）、年輕的馮·韋斯塔普伯爵夫人和另外兩位貴族，以及一位由于當眾譏評一張革命海報而被逮捕的老教授，其余5位俘虜是從攻打本市的自由軍團那里抓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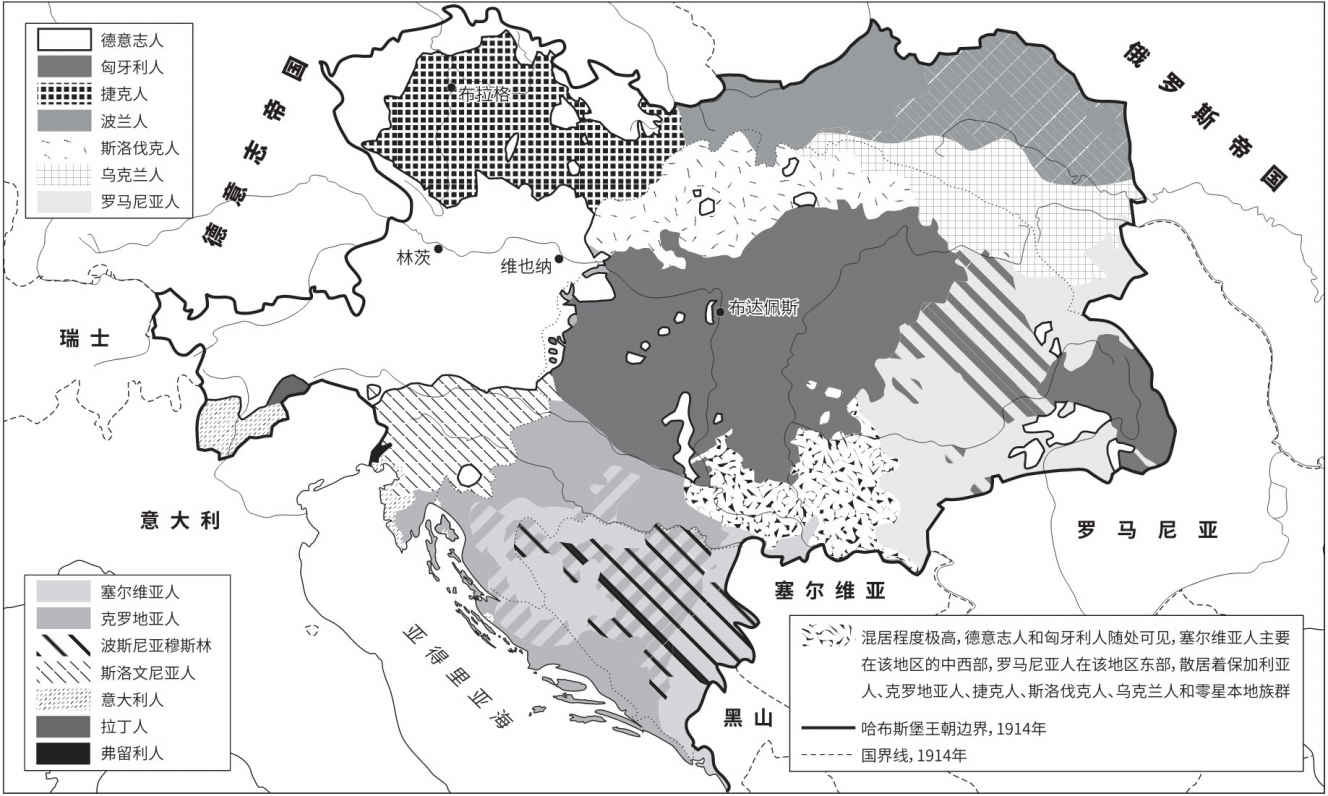
聽到這些人被槍斃的消息，自由軍團的士兵怒不可遏。他們開進慕尼黑，基本上沒有遭到反抗，他們的勝利變成了一場屠殺。歐根·萊文等革命領袖被逮捕并被草草槍斃。無政府主義者古斯塔夫·蘭道爾被帶到施塔德爾海姆監獄，士兵們在監獄的院子里用步槍槍托打爛了他的臉，對他開了兩槍，再把他踢死，陳尸兩天任他腐爛，然后才把尸體移走。5月6日恰逢一個天主教工匠協會開會，一隊喝醉的自由軍團從舉報者那里聽說集會的工匠是革命者，于是逮捕了他們，把他們帶到附近的一間地下室，毆打他們，把這21位無辜者全部殺死，然后洗劫了尸體身上的財物。還有許多人在“企圖逃跑時被擊斃”，因被舉報曾加入共產黨而被殺害，因被告發私藏武器而被射殺，或者因為據說有人從屋里向外開槍而被拉出家門、當場處決。總之，就連官方估計死于進城部隊之手的，也有大約600人；非官方的觀察者認為死亡總數高達這個的兩倍。[[9]](#9_3)大屠殺之后，霍夫曼的社會民主黨等溫和派在慕尼黑并沒有得到很多機會，盡管自由軍團的行動是受他們委托的。“白色的”反革命政府最終接管了政權，開始迫害剩下的革命者，而從輕處理自由軍團，其中有些成員因殘暴的殺戮行為被定罪，但僅被處以最輕的刑罰。慕尼黑成了極端主義政治派別的游樂場，城內幾乎每個社會團體和政治團體成員的心頭，都燃燒著仇恨、恐懼和復仇的欲望。[[10]](#10_3)公共秩序差不多消失了。

這一切深深地困擾著那些受命在舊軍隊的廢墟上重建一支正規軍的軍官們。鑒于工人與士兵委員會在部隊中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新軍隊的管理者不出意料地注重確保士兵受到正確的政治教導，確保慕尼黑大量涌現的政治小團體不會威脅到革命后的政治新秩序。在1919年6月被送去接受政治教導的士兵中，有一位30歲的下士，他從戰爭開始起就一直在巴伐利亞軍隊服役，經歷了社會民主思潮、無政府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所有興衰沉浮，參加過示威游行，與他的同志們一起戴過紅袖標，在受命保衛慕尼黑、抵抗幾星期前攻入城市的自由軍團時，與他的多數同志一起不見了蹤影。他的名字是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11]](#11_3)

### 二

造就希特勒的，主要是環境。假如在另一個環境中，他也許永遠不會在政壇嶄露頭角。巴伐利亞革命期間，他是個默默無聞的普通士兵，從未在任何政治事務中發揮過作用。希特勒生于1889年4月20日，在他身上生動地體現了泛日耳曼聯盟關于民族認同的民族和文化理念，因為就出身或國籍而言，他并不是德國人，而是奧地利人。關于他的童年、青年時代和教養狀況，人們知之甚少，很多——即使不是大多數——關于其早年生活的撰述，在很大程度上都屬于猜測、歪曲或者捕風捉影。但我們確切地知道，他的父親阿洛伊斯（Alois）是私生子，生于1837年，隨母親瑪麗亞·席克爾格魯貝（Maria Schicklgruber）的姓氏，1876年阿洛伊斯改用繼父約翰·格奧爾格·希德勒（Johann Georg Hiedler）的姓氏，也寫作希特勒（Hitler）。沒有證據顯示阿道夫·希特勒的祖先中有過猶太人。約翰·格奧爾格爽快地承認自己是阿道夫之父的親生父親。阿洛伊斯在因河（Inn）畔的布勞瑙（Braunau）擔任海關稽查員，級別雖低，卻是受人尊敬的奧地利公務員。他結過三次婚，第三次婚姻中所生的孩子只有阿道夫和妹妹葆拉（Paula）沒有夭折。“心理歷史學家”分析阿道夫后來的性格時，大量提及他那冷漠、嚴厲、刻板、時而暴戾的父親，以及他深愛的溫良的母親，但他們的結論充其量只是猜測罷了。[[12]](#12_3)

確鑿無疑的一點是，希特勒一家經常遷居，在1898年定居林茨（Linz）郊區之前搬了好幾次家，阿道夫后來一直把林茨當作自己的家鄉。青年希特勒在學校成績頗為糟糕，也不喜歡自己的老師，但在別的方面似乎并沒有異于同學之處。他父親曾打算讓他當公務員，但他顯然不適合循規蹈矩的平凡生活和公務員的勤奮工作。父親于1903年初去世之后，希特勒住在林茨的一套公寓里，由母親、姨媽和妹妹照料。他夢想著未來以藝術家為職業，把時間都花在了畫畫、與朋友聊天、聽歌劇和閱讀上。然而1907年發生了兩件事，終結了這種充滿幻想的閑散生活。一是母親死于乳腺癌；二是他申請入讀維也納藝術學院（Viennese Academy of Art）被拒，理由是他的油畫和素描不夠好，校方說他更適合做建筑師。當然，他的強項是建筑繪畫與繪圖。尤其令他印象深刻的是維也納環城大道（Ringstrasse）上那些歷史悠久、雄渾凝重的公共建筑，它們被塑造成權力與穩固的象征，建于哈布斯堡王朝真正的政治基礎開始崩潰之時。[[13]](#13_3)從一開始，建筑就主要作為權力的昭示吸引著希特勒。他終生保持了這種興趣。但希特勒缺乏成為建筑師所需的勤奮。他又一次申請進入藝術學院，再次被拒。由于失意以及喪親之痛，他動身去了維也納。希特勒一起帶走的，很可能是他在林茨所接受的兩種政治影響。其一是格奧爾格·里特爾·馮·舍納勒爾的泛日耳曼主義，舍納勒爾在林茨的擁躉似乎大多集中在希特勒就讀的學校。其二是對理查德·瓦格納音樂難以遏制的熱情，他在林茨時經常去聽瓦格納的音樂劇，迷戀劇中對日耳曼神話和傳說的浪漫呈現，以及對無所畏懼的英雄人物的刻畫。在這兩種信仰的武裝下，懷著終將成為偉大藝術家的信心，希特勒在隨后的5年都待在奧地利首都。[[14]](#14_3)



地圖6　哈布斯堡帝國版圖內的民族，1910年

希特勒后來對這段經歷的敘述，雖然是邏輯連貫的回憶，但似乎并不屬實。同樣，似乎也沒有可靠的獨立證據可以證明他做過或者想過什么。但是有些事情似乎相當明顯。首先，大學申請被拒，讓希特勒難以釋懷，從而對資產階級的傳統、體制、規范和管理產生了強烈的仇恨。他沒有參加培訓或者申請一份固定工作，而是過著懶散、混亂的波希米亞式生活，把積蓄用于聽瓦格納的音樂劇。錢花光之后，就只好露宿街頭，或者在廉價旅館過夜。只有在收到姨媽寄的錢和開始賣出一些小畫——多數是臨摹作品——時，他的境況才有所好轉，有能力在男子公寓租個便宜房間，可以使用圖書館和閱覽室。他在那里住了三年，生活在波希米亞文化圈的最外圍。

舍納勒爾的泛日耳曼主義在林茨極有影響力，希特勒在林茨接受的政治觀點后來因在維也納接觸到了該主義的更加直接的形式而得以強化。無疑，希特勒厭惡哈布斯堡王朝及其首都，那里的大學不肯給他實現藝術野心的機會。因此，舍納勒爾關于奧地利的德語地區并入德意志帝國的主張，對希特勒產生了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他反感維也納的種族融合，認為只有種族同一的國家才可能取得成功。但他意識到，舍納勒爾無法贏得民眾的支持。能夠贏得民眾支持的，是維也納市長卡爾·盧埃格爾，希特勒認為，盧埃格爾的反猶主義煽動宣傳顯示出對大眾真正的理解。希特勒很少漏掉男子公寓閱覽室的報紙上每天刊載的反猶主義文章，后來他在書中描述的幾種廉價反猶主義刊物也閱讀于這一時期。希特勒在這一時期聽了幾百場瓦格納的音樂劇，對瓦格納的熱愛更加強化了他的政治立場。當時追隨舍納勒爾、瓦格納和盧埃格爾的幾乎全是反猶主義者，其中許多是極端反猶的，希特勒沒有理由成為例外。他把自己的畫賣給猶太商人，從男子公寓的猶太寓友那里借錢，這些并不表示他不是反猶主義者。不過，他當時的反猶立場很可能屬于一種抽象的、近乎理論的性質；他對猶太人的仇恨，直到一戰結束時才變成發自內心的、極端的個人仇恨。[[15]](#15_3)

在希特勒后來的自傳《我的奮斗》里，有幾頁特別有趣，描述了他在維也納觀看社會民主黨大規模示威活動時感到的激動。他厭惡社會民主黨所信奉的馬克思主義，認為他們的宣傳充滿了討厭的、惡毒的誹謗和謊言。那么民眾為什么相信它，而不相信舍納勒爾那些人的理論呢？他的答案是，社會民主黨不容異見，在工人階級內部盡其所能地壓制異見，簡單而強硬地樹立自己的形象，用暴力爭取民眾。“大眾的心理，”他寫道，“不愿意接受任何不全力以赴的、軟弱的東西……民眾熱愛指揮者甚于懇求者。”他繼續寫道，“我還領悟到針對個人和群眾發動恐怖襲擊的重要性……在工作場所、在工廠、在會議廳、在群眾示威的場合實施恐怖行動，總是能夠成功的，除非對方施以同等恐怖的反擊。”他總結道，社會民主黨“控制了精神和體力上的弱者。他們知道如何制造假象，讓人誤以為這是維護和平的唯一辦法，與此同時，他們悄無聲息但卻穩穩當當地贏得了一個又一個職位，有時是通過無聲的敲詐，有時是通過真正的竊取……”這些文字在某種程度上出于人在回憶時的文飾心理，希特勒把自己的感受和意圖投射到了他年輕時奧地利最成功的群眾運動上。但是，任何1914年以前生活在維也納的人，肯定都躲不開社會民主黨對群眾的影響力，我們有理由認為希特勒對此印象深刻，并且從中學到了東西，盡管他反對社會民主黨提出的信條。[[16]](#16_3)

然而希特勒在維也納期間學到的最重要的政治經驗，也許是對政府和法律的極度藐視。沒有理由不相信他后來所說的，作為舍納勒爾的追隨者，他認為哈布斯堡王朝是日耳曼人種的壓迫者，它強迫奧地利的日耳曼人與其他種族雜居，不讓他們有機會與德意志帝國的日耳曼人實現統一。他寫道：“如果人種本身處于被壓迫或被徹底滅絕的危險之中，法律問題就降至從屬地位。”種族的自我保全是高于法律的原則，法律往往只是暴政的幌子。在這場斗爭中，任何手段都是正當的。況且哈布斯堡王朝的“腐朽政府”完全受制于議會制度，希特勒花了大量時間待在奧地利議會的公眾席旁聽，看到敵對民族的政黨在議會里用本民族的語言互相大喊大叫，彼此拆臺、難有建樹，遂對這種政治制度生出了持久的鄙視之心。他尤其仇視捷克人，覺得他們特別能制造混亂。他認為舍納勒爾的失誤在于試圖通過議會斗爭達到目的。希特勒的結論是，只有直接由人民選舉出來的強人領袖才能夠實現任何目標。[[17]](#17_3)

但是沒有跡象顯示希特勒在1914年之前想過自己當領袖，甚至根本沒有跡象表明他打算進入政壇。相反，他仍然一心想當藝術家。由于無法實現這一抱負，他陷入窮困潦倒的財務窘境。1913年4月20日，希特勒收到了父親的遺產，困境才有所緩解，這年他24歲。他迅速了結了在維也納的事情，前往德國，此舉對他從舍納勒爾那里吸收的泛日耳曼思想做出了實際的表達。他后來描述了搬到慕尼黑時發自內心的幸福感，被他拋在身后的是多姿多彩但令他反感的多種族共存的奧地利首都，以及哈布斯堡政治制度所特有的政治亂象和衰亡之勢。他在將屆服兵役年齡時離開奧地利，其原因根本不是為了逃避服役，而是覺得不值得為這種制度奮斗。此時他身在德國，感覺像回到了家。

希特勒在施瓦賓格區的邊緣租了個房間，繼續他在維也納的那種生活——用水彩臨摹明信片上的慕尼黑著名建筑，賣畫的錢僅夠維持生活。像施瓦賓格區的其他波希米亞式藝術家一樣，他在咖啡館和啤酒館消磨了大把時間，但是他不曾進入真正的波希米亞文化圈，與那些令人尊敬的藝術家也沒有交往，因為在艾斯納、托勒、蘭道爾和米薩姆這類人活躍于戲劇界、討論無政府主義烏托邦，或者成為著名詩人和作家時，希特勒一直過著他從前那種漫無目標的生活，并沒有像在維也納那樣申請進入慕尼黑的藝術院校。學院派藝術的學府依然對他關閉著大門，與此同時，在施瓦賓格區的時尚咖啡館里引得人們興奮不已的非學院派前衛藝術，卻突破傳統，隨著瓦西里·康定斯基、保羅·克利、弗朗茲·馬爾克（Franz Marc）、奧古斯特·馬克等畫家，以及“藍騎士”（Blue Rider）團體，發展進入了表現主義和抽象畫。希特勒看不懂前衛藝術，只覺得厭惡。他自己的藝術實踐局限于辛苦細致地再現毫無生氣的建筑。他的藝術品位從未脫離傳統的、受古典藝術啟發的表現形式，這也正是他渴望進入的那家維也納藝術學院的看家本領。[[18]](#18_3)不過，希特勒與施瓦賓格區的波希米亞式藝術家確實存在共同點，他們都內心蔑視資產階級的傳統與規范，相信藝術能夠改變世界。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解救了游離于波希米亞文化圈邊緣的希特勒。有一張照片留下了8月2日他與一群人聚在慕尼黑市中心慶祝宣戰時的樣子，他的臉上閃著興奮的光彩。三天后，他志愿加入巴伐利亞軍隊。剛開戰的那段日子混亂不堪，很多人都是志愿參戰，似乎沒人想到要核實他是不是德國公民。他于8月16日入伍，隨即被送往西線。他后來寫道，這“把我從青春期的苦悶中解放了出來”。人生中第一次，他有了一個可以去相信、去追隨的使命，有了一群休戚與共、志同道合的同志。他的內心“充溢著自豪的喜悅”，因為自己正在為德國而戰。[[19]](#19_3)在接下來的4年里，他一直在團內擔任通訊員，晉升為下士，由于勇敢而兩次獲得勛章，其中第二次獲得的是一級鐵十字勛章，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推薦他的是一位猶太軍官。此后不久，他在一次毒氣戰中負傷，在戰爭末期，雙方都經常發動毒氣戰。暫時失明的希特勒被送往德國東北部波美拉尼亞的帕瑟瓦爾克（Pasewalk）戰地醫院休養。在那里他陸續聽到了德國戰敗、簽訂停戰協定和十一月革命的消息。[[20]](#20_3)

在《我的奮斗》中，希特勒把這稱為“本世紀最大的罪惡”，他的希望全部落空，他的犧牲全都成了徒勞。聽到消息時，“我的眼前一片漆黑”，他踉踉蹌蹌回到房間，哭了起來。這無疑為他留下了可怕的心理創傷，1918年的記憶在他后來的思想和行動中將發揮關鍵作用。災難是如何發生的？要尋求一個解釋，希特勒急切地抓住了迅速傳播開來的“背后一刀”的說法。他原先就懷疑和厭惡猶太人，此時更覺得他們肯定是罪魁禍首。他從舍納勒爾、盧埃格爾、瓦格納等人那里汲取的不成熟的、混亂的觀點和偏見，此時突然間形成了一種條理清晰、極度偏執的思維模式。他再一次認識到宣傳是最佳的政治發動機：敵人的戰爭宣傳，從外部瓦解了德國的意志；猶太人的社會主義宣傳，從內部散布了懷疑和失敗主義情緒。在思考這場災難的過程中他所學到的是，宣傳必須始終面向大眾：

一切宣傳都必須通俗易懂，其知識水平必須要適應宣傳對象中知識最有限的人。因此，想要發動的群眾越廣大，宣傳中純知識的水平就必須越低……廣大人民群眾的理解力非常有限，他們知識不多，但忘性極大。因此，一切有效的宣傳，必須限定于極少的幾個要點，還必須在口號中反復強調它們，直至每一位聽眾都理解了你想要借助口號讓他理解的東西。

而且宣傳必須激發情緒，而不是理性，因為“絕大多數人民群眾的性情和態度都過于女性化，以至于冷靜的說理對其思想和行動的影響，遠遠小于情緒和感情的作用”。最后，宣傳中的觀點必須是持續不變的，決不允許對己方的主張有一絲的懷疑，也不能承認對手的主張有一毫的合理之處。[[21]](#21_3)

具備了這些思想——或許應該說是這些思想的雛形——之后，希特勒遵從上司的調遣，于1919年6月參加了政治教育培訓班，這成為他政治生涯的起點。他來得正是時候。此時的慕尼黑，在許多保守人士看來，已成了一個顛倒的世界，該是撥亂反正的時候了。普魯士雖然失敗了，但巴伐利亞可以指出明路。共產黨政權被推翻之后，慕尼黑的政治語言充斥著民族主義口號、反猶言論，以及簡直是在慫恿人們偏激地表達反革命情緒的反動關鍵詞。后來的事實證明，希特勒是罕見的演說高手，他精通抑揚頓挫之道，善于借用“秩序的敵人”這種形象，把陳詞濫調發揮成慷慨激昂的極端主義語言。[[22]](#22_3)

### 三

希特勒參加的培訓課程，其設置目的是清除巴伐利亞正規軍中殘留的社會主義思想，并向他們灌輸極右翼信仰。講師中包括慕尼黑的保守派歷史學教授卡爾·亞歷山大·馮·米勒（Karl Alexander von Müller）和泛日耳曼經濟理論家戈特弗里德·弗德爾（Gottfried Feder），后者使用反猶語言解釋經濟現象——指責猶太人把資本用于非生產型領域，從而破壞了勤勞的“雅利安人”的生計。希特勒毫無困難地吸收了這些人的觀點，因此在1919年8月被上司選派到一個類似的培訓班當教員。在那里，他頭一回發現了自己在大庭廣眾面前講話的天賦。聽過他講課的人在評價時，都會欽佩地提到他的激情和使命感，以及他與心思簡單的普通人溝通的能力。他們還注意到了他激烈的反猶立場。在一封寫于9月16日的信中，希特勒闡述了自己在猶太問題上的觀點。他寫道，猶太人會帶來“人種肺結核病”，類似這樣的生物學比喻在他后來的許多演講和寫作中一再出現。他反對“純粹從感情角度的反猶主義”，這種反猶主義將導致大屠殺；而贊成“理性的反猶主義”，這種反猶主義必須把目標設定為“有計劃地通過立法來打擊并取消猶太人的特權”。“其終極目標必須是清除全部猶太人，這個目標不可動搖。”[[23]](#23_3)

自由軍團殘酷鎮壓慕尼黑革命之后的幾個月里，在瘋狂報復、極端民族主義的氛圍中，這樣的思想并不鮮見。此時的希特勒深受軍隊的信任，已成為它的政治掮客。他以這種身份被派去考察當時在慕尼黑大量涌現的政治團體之一，看它是否危險，是否可以被招募到反革命的事業中。它就是成立于1919年1月5日的德國工人黨（German Workers' Party），創始人是鎖匠安東·德萊克斯勒（Anton Drexler），他曾經是德意志祖國黨的成員。德萊克斯勒堅稱，自己是社會主義者、是工人，他反對不義之財、剝削和牟取暴利。但他信奉的社會主義是帶有民族主義偏見的。德萊克斯勒把他所反對的那些邪惡行為歸罪于猶太人的詭計，認為發明布爾什維主義這種有害思想的也是猶太人。他爭取的對象不是產業工人，而是“從事生產的各階層人士”，即一切靠誠實勞動謀生的人。[[24]](#24_3)在短時間內，這是指中下階層；但追隨1880年代阿道夫·施托克爾的基督教社會運動的傳統，并且回應德國和奧地利以前尤其是一戰剛結束時出現的許多類似民族主義倡議，工人黨的長期目標是把工人階級從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下爭取過來，為泛日耳曼事業服務。

這個羽翼未豐的政黨實際上是極度活躍的圖勒學會的另一個產物。德萊克斯勒和他的小黨在慕尼黑出現絕非不同尋常之事，因為革命失敗之后，該市已成為極右翼的溫床。不同尋常的是希特勒參加該黨1919年9月12日的會議時所引發的關注，他在聽眾席上充滿激情地發言，反駁前面的發言者關于巴伐利亞從德國分離出去的倡議。德萊克斯勒對他印象深刻，當希特勒再次遵照軍中上司的命令，申請加入工人黨時，德萊克斯勒欣然同意。盡管希特勒后來說自己是第七個入黨的，但實際上他在黨員名冊上是第555號。這其實沒有聽起來那么唬人，德國工人黨黨員的計數起點，按照邊緣型政黨的慣例，不是1，而是501，為的是讓人覺得它已擁有幾百名黨員，而不是只有幾十個人。[[25]](#25_3)

還是在軍中上司的鼓勵下，希特勒很快成為工人黨的明星發言人。他再接再厲，推動該黨舉辦人數越來越多的公共集會，多數是在啤酒館，事先用醒目的海報造勢，會場經常鬧出亂子。到1920年3月底，希特勒已成為該黨不可或缺的一員，他顯然認定這里就是他的歸宿。煽動演說讓希特勒找回了他隨著德國戰敗而失去的歸屬感。他離開軍隊，成為職業政治煽動家。激進反猶主義的號召力在反革命的慕尼黑是顯而易見的，并且已被日耳曼種族防御與反抗同盟（German-Racial Defence and Defiance League）加以利用，這是一個與工人黨立場相近但比工人黨龐大得多的組織，是又一個以卐字符作為主要政治標志的極右翼團體。同盟的總部設在漢堡，自稱在德國全境擁有20萬成員，其中包括祖國黨的前成員、心懷不滿的退伍兵，以及有民族主義傾向的學生、教師和白領職員。它開動著精密復雜的宣傳機器，制造出數百萬傳單，發放到有數千人參加的公眾集會上，而德萊克斯勒的組織只能吸引到幾百人。[[26]](#26_3)該同盟絕不是此類極右翼組織的孤例；另一個比它小得多的德意志社會主義黨（German-Socialist Party）由工程師阿爾弗雷德·布倫納（Alfred Brunner）領導，也在德國的許多城市設有支部，盡管其黨員人數僅有同盟的十分之一。然而就魅力而言，這兩個組織的發言人無一能與希特勒相提并論。[[27]](#27_3)

傳統右翼政客講課或演講的風格，有的浮華夸張，有的平淡乏味，有的粗魯野蠻，而希特勒效仿的榜樣是社會民主黨演說家，比如艾斯納，或者他后來說自己在維也納學習過的那些左翼煽動家。希特勒的演說之所以成功，主要因為他告訴聽眾的是他們想聽的東西。他使用普羅大眾能夠理解的簡單直白的語言——短句子、有力而動人的口號。他的演講常常平穩地開場，先抓住聽眾的注意力，然后逐漸推向高潮，當他調動聽眾的情緒進入癲狂狀態時，他那深沉的、有點兒沙啞的嗓音就會提高語調，越來越高地爬升至咆哮和嘶吼的結語，并伴以精心排練過的戲劇性手勢，他的臉上汗光閃爍，平直的黑發朝前垂到臉上。他的話是不容置疑的，每一句都是絕對的、毫不妥協的、不可撤銷的、始終如一的、不可更改的最終定論。許多聽過希特勒早期演講的人印證，他的話簡直是發自肺腑，說出了他們內心深處的擔憂與期望。他還顯露出了越來越強的自信心、攻擊性、對工人黨終將勝利的信心，乃至天命所歸之感。他的演講常常從自己早年的貧困生活說起，不動聲色地將其與德國一戰后的沮喪、被踐踏和絕望狀態聯系起來。然后，他提高聲音，描述自己的政治覺醒，并指出德國也應在政治上覺醒，從而在未來恢復國力、回歸往日榮耀。無須使用帶有明顯宗教色彩的語言，希特勒就能激發出聽者靈魂深處潛藏的典型的宗教意識：受難、忍辱、救贖和重生。在巴伐利亞戰后和革命之后的環境中，他得到了人們的欣然響應。[[28]](#28_3)

希特勒的演講，把德國復雜的社會、政治和經濟問題簡化成一個共同癥結：猶太人的邪惡詭計。在《我的奮斗》中，他描述了自己認為猶太顛覆分子在1918年是如何瓦解德國的戰斗力的，希特勒宣稱：

假如在戰爭開始時和戰爭期間，把12,000或15,000個希伯來腐敗分子送去聞毒氣，就像成千上萬奔赴戰場的最優秀的德國工人的遭遇一樣，那么數百萬戰士在前線的犧牲就沒有白費。及時清除12,000個惡棍，也許可以挽救數百萬真正的日耳曼人的生命，他們是未來的寶貴財富。可是實際情況恰恰相反，德國碰巧由資產階級“政治家”領導，于是眼皮也不眨就讓數百萬人血染沙場，卻把10,000或12,000個叛國者、奸商、高利貸者和騙子當作神圣的國寶，公然宣稱他們是不可侵犯的。[[29]](#29_3)

這種毫不妥協的激進立場，為希特勒的公共集會平添了一股復興運動的狂熱，那些煽動性不強的政客對此望塵莫及。希特勒用紅色海報吸引左翼人士參加集會，引來集會上社會主義者的抗議，結果常常演變成斗毆和罵戰，希特勒就是利用這種策略提高了自己的知名度。

在戰后的反革命氛圍中，德國人對“背后一刀”念念不忘，對發戰爭財的奸商和在迅猛加劇的惡性通貨膨脹中獲利的商人耿耿于懷，希特勒趁機大肆煽動，專門攻擊那些據說推高了物價的“猶太”商人，“他們都該被絞死，”希特勒在聽眾的叫好聲中如是說道。[[30]](#30_3)也許是為了強調它側重于反對資本主義，并且與奧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同類團體保持一致，工人黨于1920年2月改名為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_205)（National Socialist German Workers' Party）；反對該黨的評論員不久把它縮寫為“納粹”（Nazi），就像社會民主黨的政敵早年將它的名字縮寫成“索粹”（Sozi）一樣。名字雖然帶有“社會主義”，但是如果把納粹主義看作社會主義的一種形式或產物，那就錯了。誠然，正如有些人指出的那樣，納粹黨總是把人人平等掛在嘴上，強調集體利益高于個人利益，常常自稱反對大企業和國際金融資本。還曾有一句名言，把反猶主義稱為“傻瓜的社會主義”。但是從一開始，希特勒就聲稱自己既堅決反對社會民主思想，也反對共產主義，不過起初反對共產主義的程度遠小于反對前者，畢竟簽署停戰協定以及后來簽訂《凡爾賽和約》的“十一月賣國賊”根本不是共產黨，而是社會民主黨及其盟友。[[31]](#31_3)

“國家社會主義者”想讓左、右兩個政治陣營團結起來，他們宣稱，是猶太人的操控，造成了德意志民族內的這種對立。實現聯合的基礎將是種族觀念。這種思想與以階級為出發點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之間，相距不止一個光年。納粹主義在某些方面是一種極端反對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而在反社會主義的過程中又大量借用了它的語言，包括自我標榜為一場運動而不僅僅是一個政黨，以及大肆吹噓自己如何蔑視資產階級傳統和保守派的怯懦。“政黨”的概念意味著忠實于議會民主制度，在已確立的民主政體內穩健運作。然而在演講和宣傳中，希特勒及其追隨者基本上更愿意使用“國家社會主義運動”這個稱謂，正如社會民主黨曾自稱“工人運動”，再比如女權主義者自稱“婦女運動”，戰前叛逆的青少年團體自稱“青年運動”。“運動”一詞不僅表示活力和永不停息地向前運動，還暗示了一個終極目標，即一個確定無疑的努力方向，它比傳統政治那種沒完沒了的妥協更加宏大、更加完美。像勞工運動一樣，國家社會主義通過自詡為一場“運動”，高調地宣稱反對傳統政治，鼓吹顛覆并最終推翻它最初被迫為之效力的體制。

以“種族”替換“階級”，以“領袖獨裁”替換“無產階級專政”，納粹主義就這樣把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常用術語改頭換面了。希特勒于1920年年中親自選定的納粹黨旗，簡明地表達了右翼與左翼的結合：鮮紅的底色代表社會主義，激進民族主義的徽章卐字符被涂成黑色，置于旗子正中的白色圓圈之內，因此整面旗子呈黑白紅三色，正是俾斯麥帝國國旗的顏色。在1918年革命之后，這三種顏色象征反對魏瑪共和國及其所代表的一切，然而納粹黨通過改變設計、添加在戰后已經被形形色色的極右翼種族主義運動和自由軍團各分隊采用的卐字符，同時宣告了它想取代魏瑪共和國的，是一個新的、泛日耳曼的民族國家，而不是原先那個威廉帝國。[[32]](#32_3)

希特勒原先重點攻擊猶太資本主義，到1920年底，其攻擊目標已加上了“馬克思主義”——或者換句話說，“社會民主思想”——以及布爾什維主義。希特勒可以利用俄國內戰中的暴行來強調常見的極右翼觀點：猶太人在背后挑起了1918—1919年發生在慕尼黑的革命暴動。但即使沒有共產主義的威脅，納粹主義也有可能出現。希特勒的反布爾什維主義是其反猶思想的產物，而不是成因。[[33]](#33_3)他的首要政治靶子依然是社會民主黨，以及模糊的“猶太資本主義”幽靈。希特勒重彈戰前的反猶主義老調，無數次在演講中宣稱，猶太人是寄生的種族，只能靠顛覆其他種族而生存，尤其是破壞最高貴、最優秀的種族——雅利安人。因此，他們分化雅利安人、使之內斗，一方面組織資本家進行剝削，另一方面又領導被剝削者與資本家斗爭。[[34]](#34_3)希特勒在1920年4月6日的一次演講中說，猶太人將“被滅絕”；同年8月7日，他告訴聽眾：“別指望不清除病因、不殺死病菌，就可以戰勝疾病；也別以為不必堅持人們遠離種族結核病菌，就可以戰勝種族結核病。”清除意味著不擇手段地用暴力把猶太人移出德國。1921年4月，他告訴聽眾：“猶太問題”只能通過“蠻力”來解決。他在1923年1月說：“我們知道，如果他們上臺掌權，我們就會人頭落地；但我們也知道，如果我們掌握政權，‘那么讓上帝憐憫你們吧！’”[[35]](#35_3)

[\*](#_204) 亦有譯作“民族社會主義德意志工人黨”。——編注

## 第二節 啤酒館暴動

### 一

一戰快結束時，已獨攬軍權兩年時間的埃里希·魯登道夫將軍認為，為謹慎起見，他應該離開政壇一段時間。與皇帝剛任命的最后一屆自由派政府發生激烈爭吵之后，魯登道夫于1918年10月25日被解職。他在柏林逗留了一段時間，然后戴上墨鏡和假胡子，悄悄渡過波羅的海到達瑞典，冷眼旁觀革命。到1919年2月，他顯然認為最糟糕的情形已經過去，于是返回德國。由于在戰爭中贏得了崇高聲望，他很快成為極右翼的首腦。作為1914—1918年的泛日耳曼兼并主義者、停戰協定的激烈反對者，他立刻開始陰謀推翻共和國的新秩序。魯登道夫將一群從前的幕僚召集在身邊，支持沃爾夫岡·卡普和自由軍團為推翻共和國于1920年3月在柏林發動的短命政變。政變失敗后，他離開柏林，前往環境與他更相宜的慕尼黑。魯登道夫很快與那里的極端民族主義陣營取得了聯系，該陣營當時聚集在以前無籍籍名的阿道夫·希特勒周圍。[[36]](#36_3)

到兩人終于會面的時候，希特勒已經擁有了第一批忠心耿耿的狂熱分子，他們將在納粹黨的發展以及第三帝國的建立過程中發揮這樣或那樣的作用。其中最忠心的是在校生魯道夫·赫斯（Rudolf Hess），他是慕尼黑大學地緣政治理論家卡爾·豪斯霍費爾（Karl Haushofer）的門生。他的父親是商人，非常專制，一戰前不許兒子學這個專業，赫斯似乎正在尋找一位自己可以無條件地追隨的強人領袖。像后來許多著名的納粹黨徒一樣，他也來自德意志帝國境外：赫斯于1894年生于亞歷山大（Alexandria）[\*](#_209)。一戰期間赫斯在軍中服役，退役時是空軍中尉，軍隊使他有了一種可以服從的權威；師從豪斯霍費爾，讓他有了另一個可以服從的權威。然而二者都不是他真正想要的那種，赫斯還是自由軍團和圖勒學會的成員，但它們同樣不是他真正需要的權威。1920年他遇到了希特勒，終于如愿。他有著與希特勒一樣的反猶激情：他譴責“猶太團伙”，認為他們在1918年背叛了德國，甚至在見到希特勒之前，赫斯就曾率隊前往慕尼黑的工人階級聚居區，把幾千張反猶傳單塞進工人公寓的門縫。[[37]](#37_3)此后，他把自己全部的英雄崇拜都投向了希特勒。天真、理想主義、毫無個人野心和貪欲，而且據豪斯霍費爾說，也不太聰明，這樣的赫斯傾向于相信非理性的、神秘的教條，比如占星術。他忠犬般地追隨希特勒，帶著近乎宗教式的狂熱，把希特勒看作救世主。從此，他成為希特勒安靜、順從的奴仆，平時隨主人泡黑克咖啡館（Café Heck）時凝神傾聽主人的教誨，還逐漸把希特勒厭煩至極的許多日常工作承擔下來。此外，他向希特勒介紹了常見的泛日耳曼理論中一個詳盡闡述“生存空間”（Lebensraum）的版本，豪斯霍費爾曾運用它論證德國征服東歐之主張的合理性，小說家漢斯·格林（Hans Grimm）1926年的暢銷書《沒有空間的民族》（Volk ohne Raum）使之流行起來。[[38]](#38_3)

以另一種方式輔佐希特勒的，是學醫出身、失敗的種族主義詩人和劇作家迪特里希·埃卡特（Dietrich Eckart）。活躍于極右翼陣營的埃卡特于1918年12月創辦了一份政治周刊《良言》（Auf gut deutsch），資金來源于許多巴伐利亞商人的贊助以及軍隊的政治資助。埃卡特認為，他的劇本無法上演，這要歸咎于猶太人對文化的主導。他與其他種族主義者和“雅利安”種族至上論者保持著私人聯系，比如休斯頓·斯圖爾特·張伯倫，并且大力推介張伯倫的作品。像許多反猶主義者一樣，他把任何“顛覆者”或“唯物主義者”都歸為“猶太人”，所以他認為列寧和德皇威廉二世都在此列。埃卡特人脈廣闊、生活富裕，像赫斯一樣也是圖勒學會的會員。他從朋友和軍隊那里籌集資金，于1920年12月為納粹黨收購了圖勒學會經營不善的報紙《人民觀察家報》（Völkischer Beobachter）。他親自擔任主編，為這份每周兩期的報紙提供了它迫切需要的新聞經驗，又在1923年初將其拓展為日報。然而，埃卡特較為獨立的作風，以及他對希特勒有點兒居高臨下的態度，最終導致兩人的關系逐漸轉淡，他在1923年3月被解除報紙主編之職，當年年底去世。[[39]](#39_3)

但是埃卡特從圖勒學會帶進納粹黨的兩個伙伴，卻比他更受希特勒倚重，為希特勒效力的時間也比他長得多。第一個是波羅的海日耳曼建筑師阿爾弗雷德·羅森貝格（Alfred Rosenberg），這位納粹頭目也來自德國境外——1893年生于愛沙尼亞（Estonia）的雷瓦爾（Reval）[†](#_210)。羅森貝格痛恨布爾什維主義，他逃離俄國革命，在一戰結束時來到慕尼黑，成為埃卡特那份小雜志的撰稿人。他16歲時讀了休斯頓·斯圖爾特·張伯倫的著作，因此在1914年以前就已經成了反猶主義者。羅森貝格對《錫安長老會紀要》（The 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興趣濃厚，這份文件據說提供了猶太人密謀顛覆世界文明的證據，但其實它是沙俄警察偽造的。他還讀過戈比諾和尼采的著作，并在戰后撰寫了一系列挑起論戰的小冊子，攻擊猶太人和共濟會。他最大的愿望是被人們當作知識分子和文化理論家而認真對待。羅森貝格于1930年出版了他的大部頭著作，取名《二十世紀的迷思》（The Myth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以此向他的偶像休斯頓·斯圖爾特·張伯倫的代表作致敬。[‡](#_211)此書旨在為納粹黨提供一部主要的理論著作。截至1945年，它已售出100多萬冊，而且書中的某些觀點并非沒有影響力，但是希特勒說自己只看過一小部分，不喜歡它的偽宗教論調，覺得大概只有少數最專注的讀者才做得到從頭至尾啃完書中大段大段冗長晦澀的文字。不過，在他們慣常的咖啡館聊天中，羅森貝格比任何人都更有能耐把希特勒的注意力轉向共產主義的威脅，以及所謂的共產主義是猶太人陰謀的產物，并且提醒希特勒注意他所認為的蘇俄政體的脆弱本質。通過羅森貝格的推介，俄國的反猶主義及其偏執的陰謀理論和滅絕欲在1920年代進入了納粹意識形態。“猶太—布爾什維主義”（Jewish-Bolshevism）此時成了希特勒的主要仇恨對象。[[40]](#40_3)

另一個由埃卡特帶進納粹黨的人是漢斯·弗蘭克（Hans Frank）。他1900年出生于卡爾斯魯厄（Karlsruhe），是律師之子，一開始追隨父親的腳步。1919年，還在法學院讀書的弗蘭克加入圖勒學會，并且參與了埃普的自由軍團對慕尼黑的突襲。雖然從未成為希特勒的親信，但弗蘭克很快折服于他的魅力。聽了希特勒1920年1月的演說，弗蘭克和許多人一樣，覺得希特勒的話完全發自肺腑，“他說出了在場群眾的心聲，”他后來這樣回憶道。終其一生，弗蘭克都迷戀暴力色情片，他欣賞心狠手辣的動作明星，為了讓自己看起來像他們一樣，他經常使用暴力語言，其直截了當和攻擊性在納粹頭目中幾乎無人能及。然而接受的法學訓練和法學背景讓他心中還殘留著對法律的信仰，所以在說粗話和在為謀殺行為辯護時，偶爾會感到不自在。1924年，弗蘭克獲得博士學位，并取得律師資格，他的法律專業知識盡管有限，但后來證明對納粹黨極有幫助。截至1933年，他代理了2,400多件以納粹黨徒為被告的案子，他們所犯的通常是各種暴力罪。弗蘭克第一次為幾個納粹暴徒出庭辯護之后不久，一位資深律師，也是他曾經的老師說：“拜托你別理這些人！不會有好結果的！在刑事法庭開始的政治運動，也會在刑事法庭結束！”[[41]](#41_2)

等到這兩人以及更多像他們一樣的人加入納粹黨時，這場新興的運動已經有了正式綱領，由希特勒和德萊克斯勒撰寫，“種族經濟學家”戈特弗里德·弗德爾也略有幫助，并于1920年2月24日獲得通過。它的25點內容包括，要求“將全體德意志人統一為一個大德意志國家（Greater Germany）”；廢除1919年的和約[§](#SS_13)；要求獲得“國土與領地（殖民地）以養活我們的人民”；防止“非德意志人移民到德國”；對“普通罪犯、高利貸者、奸商等”處以死刑；剝奪猶太人的公民權，將他們登記為異族，禁止他們辦報或者為德國報紙撰稿；要求沒收不勞而獲的收入和戰爭財，企業托拉斯收歸國有，實行利潤分配制度，這似乎帶有偽社會主義色彩；政綱的結尾要求“建立一個強大的中央集權帝國”，并且“用根據社會階層和職業遴選出的法人（corporations）有效地取代聯邦各州的議會”。[[42]](#42_2)這是一份那個時代典型的極右翼文件。它的實際意義并不大，就像社會民主黨1891年的《愛爾福特綱領》（Erfurt Programme）一樣，它在平常的政治斗爭中總是被繞開或者忽略，盡管這份綱領很快被宣布為“不可更改的”，為的是避免它成為黨內討論的焦點。[[43]](#43_2)

盡管也有其他原因，但引起黨內意見分歧的主因是，德萊克斯勒極力推動納粹黨與慕尼黑的其他極右翼組織合并。德萊克斯勒主要想拉攏“德意志社會主義黨”，該黨與納粹黨規模相近，目標一致。與納粹黨不同的是，它在德國北部擁有支持者。那些像弗德爾一樣不贊成希特勒總用粗野不堪的語言進行煽動演說的人，將會因為兩黨的合并而擁有更大的影響力。希特勒擔心自己可能被新的運動所淹沒，以辭職相要挾，阻止了1921年4月的談判。另一場危機爆發于希特勒與埃卡特在柏林為《人民觀察家報》籌款的時候。希特勒不在慕尼黑期間，談判重啟，這次討論的是三黨合并，比上次多了一個小型反猶政黨，該黨總部設在奧格斯堡（Augsburg），領導人是奧托·迪克爾（Otto Dickel），有人認為他與希特勒的公共演說能力不相上下。納粹黨同意迪克爾關于合并組建一個“西方同盟”（Western League）的計劃，此名稱取自他那帶點兒神秘色彩的種族主義小冊子《西方的復興》（The Resurrection of the West）。由于無法阻止這一計劃，希特勒大發雷霆，干脆退了黨。事關緊要，德萊克斯勒讓步了，他請希特勒開出重新入黨的條件。最終，因為黨內幾乎沒人愿意失去希特勒，他的煽動力是納粹黨在此前的幾個月里不斷壯大的唯一原因，合并計劃被放棄。希特勒絕不妥協的態度在7月29日的一次全體特別會議上受到贊譽：大家在會議結束時要求，應該讓希特勒擔任黨主席，賦予他“獨裁權”，并且肅清“已經滲透進黨內的外國勢力”。[[44]](#44_2)

取得對納粹黨的絕對控制權之后，希特勒在全黨的支持下很快展開了宣傳攻勢，不久就從挑釁淪為暴力。1921年9月14日，一群年輕的納粹黨徒隨同希特勒參加分離主義組織巴伐利亞同盟（Bavarian League）的會議，他們齊步走上講臺，打算把發言人奧托·巴勒施泰特（Otto Ballerstedt）的聲音壓下去。有人關掉了所有的燈，當燈再次亮起時，他們反復呼喊“希特勒”，阻止巴勒施泰特繼續發言。當觀眾提出抗議時，希特勒的青年暴徒襲擊了那位分離主義領導人，痛毆他，粗暴地把他推下講臺，致其頭部受傷，躺在地上血流如注。不久，警察到場，中止了會議。巴勒施泰特堅持起訴希特勒，后者為此在慕尼黑的施塔德爾海姆監獄服了整整一個月刑期。警察警告希特勒，如果再犯，他將作為外僑被遣返奧地利。警告幾乎不起作用。1921年11月初，獲釋不久的希特勒又帶頭在啤酒館鬧事，納粹黨徒與社會民主黨人大打出手，啤酒杯在屋內橫飛。不久，納粹黨徒為自己裝備了指節金屬套、橡皮棍、手槍，甚至手榴彈。1922年夏，德國總統艾伯特走訪慕尼黑時，一群納粹黨徒對著他大喊大叫、吹口哨、吐唾沫。1922年10月，納粹黨徒前往科堡（Coburg）參加民族主義者集會時，與社會民主黨人發生激戰，納粹黨徒最終用橡皮棍把對手從街頭趕走。[[45]](#45_2)毫不奇怪，納粹黨不久即在德國大多數州被取締，尤其是在1922年6月外交部長拉特瑙被刺之后，柏林政府試圖鎮壓極右翼極端主義者，無論他們是否參與了暗殺。但在右翼的巴伐利亞州，納粹黨未被取締。[[46]](#46_2)

納粹運動中肢體暴力的新特征，尤其反映了納粹黨內準軍事組織——創立于1920年初的“會堂保衛”組的迅速發展，不久改稱“體操與運動部”（Gymnastics and Sports Section）。這些人穿著褐色襯衫和馬褲，腳蹬長筒靴，頭戴褐色帽子——這套制服到1924年才有了最終版[[47]](#47_2)，人們常在慕尼黑街頭看到他們痛毆對手、襲擊任何他們覺得像猶太人的人。使他們從一小群欺負人的小混混發展成一場大型準軍事運動的，是一系列與希特勒沒什么關系的事件。他們所享有的不受警察干涉的相對豁免權，首先反映了古斯塔夫·里特爾·馮·卡爾領導的巴伐利亞政府長期同情作為1919—1920年反革命“白色恐怖”一部分的極右翼準軍事運動。在這種氛圍中，曾擔任自由軍團旅指揮官的赫爾曼·埃爾哈特（Hermann Ehrhardt）上尉建立了一個精密的暗殺隊網絡，在德國全境執行政治謀殺，被他們刺殺的包括共和國的幾位主要政客，以及黨內許多被他們懷疑為雙重間諜的黨員。[[48]](#48_2)卡爾認為，共和國是普魯士的創造物，如欲抵制它，就要維持巴伐利亞作為反共和國“秩序”的中心，為了這個目的，他維持了一支被稱為“居民國防軍”（Denizens' Defence Force）的大規模武力。它組建于1919年春共產黨的“委員會共和國”剛剛倒臺不久，裝備齊全，明顯違反了《凡爾賽和約》的條款，1921年初被強制解散。它的解體是巴伐利亞極右翼重組以及暴力發生率激增的信號，因為其成員改編成了種類繁多的武裝小隊，全部持反猶立場，其中很多是巴伐利亞分離主義者。[[49]](#49_2)

1921年8月，埃爾哈特把他的自由軍團老兵帶進納粹黨的“體操與運動部”。他們曾在西里西亞暴力對抗波蘭人和其他種族，在此過程中已磨煉得冷酷無情，西里西亞的德國人普遍反感《凡爾賽和約》，因為它把戰前屬于德國的領土劃給了剛剛建國的波蘭。促成埃爾哈特加入納粹黨的是恩斯特·羅姆（Ernst Röhm），他也是自由軍團的老兵，參加過1919年初春攻打慕尼黑的行動。羅姆生于1887年，是巴伐利亞鐵路官員之子，1906年參軍，兩年后成為軍官。一戰時在前線作戰，但因傷撤離——被炸彈碎片打爛了部分鼻子，導致嚴重毀容，又在凡爾登（Verdun）戰役身負重傷。此后，羅姆在巴伐利亞州的戰爭部工作，負責調撥武器裝備，起初是供應給卡爾的居民國防軍，后來供應給它改編后的各個小股隊伍。這些人都知道羅姆是“機關槍大王”，他在極右翼陣營中人脈廣闊。除了其他事務，他還擔任參謀，在軍中享有盛名，并充當軍隊與準軍事組織之間的聯絡官。羅姆顯然具有組織天賦，但他真正感興趣的不是政治。恩斯特·羅姆屬于典型的前線一代，這代人逐漸相信了關于他們自己的傳說。[[50]](#50_2)

羅姆喜好的是盲目的暴力，而不是政治陰謀。有人對他做過文本分析，發現他幾乎一成不變地把“謹慎”、“折中”、“知識分子”、“資產階級”或“中產階級”之類的詞用作貶義，他用來表達肯定、欣賞的詞包括“魁梧”、“大膽”、“無情”和“忠誠”。其1928年在慕尼黑出版的自傳的開場白是：“我是一個軍人。”他把自己描述為“逆反的”，并抱怨說：“德國人已經忘記了怎樣去恨。娘娘腔的牢騷已經取代了男子漢的仇恨。”[[51]](#51_2)“我是個幼稚的惡人，”他以其特有的坦率寫道，“所以戰爭和動亂比溫文爾雅的資產階級秩序對我更有吸引力。”[[52]](#52_2)羅姆對思想毫無興趣，在行為和信念上，他都崇尚軍人那種粗糙而殘酷的生活方式。他對平民除了蔑視別無感覺，他陶醉于無法無天的戰時生活。痛飲和狂歡、吵架和斗毆，加深了他與一幫兄弟的感情，與他們在一起，他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鄙視女性，不熟悉軍旅生活的人在他的世界里沒有位置。

羅姆看中希特勒，是把他當作滿足自己的暴力欲的天然工具，因為希特勒使用暴力推進其目標的傾向已經非常明顯。羅姆負責擴充納粹黨的準軍事組織，1921年10月將其改名為“沖鋒隊”（Sturmabteilung，簡稱SA）。他在軍界高層、巴伐利亞政界上層，以及準軍事團體中的人脈，對羽翼未豐的組織來說極其寶貴。但與此同時，羅姆始終保持了一定程度的獨立性，從未真正拜倒在希特勒腳下；他一心把沖鋒隊當作工具，用來無休止地執行自己所醉心的暴力活動，而不是讓沖鋒隊無條件地供黨差遣。因此，沖鋒隊在形式上一直是獨立于黨的組織，而且羅姆與納粹黨領袖的關系始終不夠和諧。在羅姆的領導下，沖鋒隊的人數很快開始增加。但截至1922年8月，他們的隊伍依然不到800人；而其他那些被遺忘已久的準軍事團體則遠比它引人矚目，比如帝國戰旗團（Reich War Flag）或者巴伐利亞與帝國同盟（Bavaria and Reich League），它們的成員人數都不少于3萬，全部配有武器。納粹黨及其準軍事組織要想在巴伐利亞政壇掌握主動權，所需的遠遠不止是埃爾哈特和羅姆的影響力以及希特勒的煽動力。[[53]](#53_2)

### 二

1922年，納粹黨信心驟增，因為有消息傳來，法西斯領袖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于10月28日“進軍羅馬”，結果立即被任命為意大利總理。意大利人成功了，他們的德國同志當然也不能太落后吧？墨索里尼一直是形象勝于實質。他生于1883年，早年是一位信仰社會主義的著名記者，在呼吁意大利參戰的過程中，墨索里尼徹底改變了政治立場。戰爭結束時，意大利人因和平條約未能給予他們所期待的收益而感到自尊心受損，墨索里尼成了意大利人表達情緒的代言人。1919年，他發起法西斯運動，以暴力手段、恐怖行動和恐嚇威脅打擊左翼對手。當時左翼為了實現生產資料的公有而執行占領工廠等政策，這引起了企業家、雇主和商人的恐慌。鄉村的動蕩促使地主也投入法西斯行動隊的懷抱，而且隨著局勢在1920年和1921年惡化，墨索里尼被他所發起的法西斯運動的勢頭一路推進。他的上臺，表明戰后的沖突、內亂、謀殺和戰爭并不僅限于德國，而是遍布東歐、中歐和南歐，其中包括1921年剛結束的蘇波戰爭，哈布斯堡帝國解體后多個國家為收復領土而引發的武裝沖突，以及西班牙和希臘短命的獨裁政權之建立。

墨索里尼的例子在許多方面對納粹黨產生了影響，尤其是納粹黨在1922年末、1923年初采用“元首”（意大利語為Duce、德語為Führer）的稱呼，以表示黨魁擁有不容置疑的權威。在意大利先例的刺激下，納粹黨內對希特勒的個人崇拜與日俱增，這也促使希特勒相信，注定要領導德國未來走向民族新生的人是他，而不是尚未出現的某個人物，1923年秋的一系列事件又使之永久地成為他固守的信念。[[54]](#54_2)當時，納粹黨已經開始借用意大利法西斯分子的敬禮方式，即直挺挺地伸出右臂向領袖致敬，這模仿自羅馬帝國的禮節；領袖還禮時也舉起右臂，但肘部向后彎曲、手掌向上揚起，表示接受致敬。納粹黨采用的精細復雜的執旗標準，也源自意大利法西斯分子的做法。然而，墨索里尼在這一時期對希特勒主要的實質性影響，是使他相信進軍首都的策略是最快的掌權方式。隨著法西斯行動隊逐漸控制意大利北部的主要城市和鄉鎮，墨索里尼借鑒了革命者朱塞佩·加里波第在60多年前統一意大利過程中的著名先例，宣布他將以這些市鎮為基地“進軍羅馬”。為了避免流血，意大利國王和政界領袖屈服了，任命他為總理，墨索里尼利用這個職位，以越來越無情的手段在1920年代末建立了一黨獨裁的政府。[[55]](#55_2)

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義運動不僅與納粹主義，也與其他極右翼運動有許多共同的關鍵特征，例如在匈牙利，根伯什·久洛（Gyula Gömbös）早在1919年就自稱是“國家社會主義者”。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是暴力的，有著不竭的行動力，它是軍國主義的，蔑視議會制度，崇尚沖突與戰爭。它不僅強烈反對共產主義，更重要的是，它還強烈反對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它主張把社會看作有機體，階級利益和人民代表將由不分階級、民族統一的指定機構所取代。它是男權主義和反女權主義的，它謀求建立這樣一個國家：男性居于統治地位，女性則主要被貶抑至繁育子女的功能。它把領袖抬高到不容置疑的權威地位。它崇拜青年，聲稱要滌蕩舊制度和傳統，創造一種新型人類——強硬、反智、時髦、世俗，尤其是狂熱地投身于本民族和本種族的事業的新人。[[56]](#56_2)在上述所有方面，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義運動都為新興的納粹黨提供了一個范型和同路者。

因此，早期的納粹主義，就像戰爭剛結束那幾年里眾多相互競爭的極右翼運動一樣，無疑屬于歐洲法西斯主義之崛起這個廣闊的語境。長期以來，希特勒對墨索里尼傾慕不已，把他作為效仿的榜樣。“進軍羅馬”激勵著萌芽中的歐洲法西斯主義運動，恰如加里波第的進軍羅馬以及后來的意大利統一在大約60年前曾經激勵著歐洲的民族主義運動。歷史的潮流似乎正朝著希特勒希望的方向流動，民主制度已時日無多。隨著德國局勢在1922—1923年間急劇惡化，希特勒開始認為，墨索里尼在意大利辦到了的事情，自己同樣可以在德國辦到。當德國政府拖欠戰爭賠款導致法國軍隊占領魯爾區時，德國的民族主義者義憤填膺、倍感屈辱。共和國的合法性遭到重創，政府只好做出要反抗占領的樣子。由德國政府鼓動起來的大規模非暴力抵抗，招致法國人更多的報復——逮捕、監禁和驅逐。民族主義者銘記著關于法國鎮壓的許多事例，有位身為退伍兵的鐵路工人由于在一次戰爭紀念活動上發表支持德國的演講而遭到解雇，并與家人一起被驅逐出境；另一位學校教師因為法軍列隊走過的時候，他讓學生們轉身背對著他們，而遭受同樣的命運。[[57]](#57_2)男生結成團伙，給那些被認為是“無恥地勾搭法國人”的女人剃光頭，另一些學生表達愛國的方式則沒那么激烈，他們步行幾公里去上學，而不乘坐法國人運營的火車。少數工人積極破壞法軍的占領，一位前自由軍團成員阿爾貝特·萊奧·施拉格特（Albert Leo Schlageter）因從事破壞活動而被處決，民族主義者右翼在納粹黨領導下，馬上抓住這件事，作為證明法國人之殘暴和柏林政府之軟弱的例子，在宣傳過程中使施拉格特成了廣為人知的民族主義烈士。工業生產陷于停滯，進一步加重了德國本已極其嚴峻的經濟困難。[[58]](#58_2)

民族主義者有一個強大的宣傳武器：占領軍中包含法屬殖民地的黑人部隊。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歲月里，種族主義盛行于歐洲各國，實際上也存在于美國和世界上的其他地區。歐洲人普遍認為黑人是劣等種族，馴服這些野蠻人是白人的使命。[[59]](#59_2)英國和法國于一戰期間使用殖民地部隊，在德國引起了不少譏評；然而，真正讓聳人聽聞的種族主義宣傳一發而不可收的，是黑人部隊進駐德國本土，他們首先出現在萊茵蘭的占領區，然后在1923年法國短暫占領期間進軍魯爾區。許多居住在萊茵蘭和薩爾蘭的德國人倍感屈辱，正如有人后來所說：“暹羅人（Siamese）、塞內加爾人（Senegalese）和阿拉伯人（Arab）在我們的祖國把自己當成了主人。”[[60]](#60_2)不久，漫畫家用畫筆激發了德國人的種族主義和民族主義情緒，在那些半色情的粗俗畫面中，獸性大發的黑人士兵把無辜的德國白人女子推入生不如死的命運。在右翼人士看來，這成了魏瑪共和國時期德國國恥的有力證明。德國婦女被法屬殖民地部隊輪奸的故事過于震撼，以至于幾乎人人都認為，1930年代初在德國發現的數百個混血兒就是此類事件的產物。實際上，其中絕大多數孩子的父母是兩情相悅而結合的，這通常發生在戰前或戰爭期間的德國殖民者與德屬殖民地的非洲原住民之間。[[61]](#61_2)

當納粹黨人以及其他許多與他們想法相近的人充分利用這些恐懼與仇恨時，柏林政府似乎根本無力應對。陰謀詭計開始層出不窮。希特勒不是唯一一個考慮進軍柏林的人，1945年后成為德國最著名的犯罪學家的“民族布爾什維主義者”漢斯·馮·亨蒂希（Hans von Hentig）也開始為一個輕率的計劃招兵買馬，打算與共產黨聯手暴力奪取政權，目的是使德國不再履行《凡爾賽和約》。[[62]](#62_2)無論誰采取行動，這個想法都不太現實，德國的聯邦制結構和憲法都確保了德國非常不可能重復意大利所發生的事情。然而，它迅速生根。希特勒開展了大規模的宣傳攻勢，痛斥柏林“十一月罪人”的軟弱，為反法的公眾示威活動造勢。

此時希特勒上位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因為又有一群非常有用的新支持者加入納粹運動。其中包括社會名流恩斯特·“普茨”·漢夫施丹格爾（Ernst “Putzi” Hanfstaengl），他高高的個子，有美國血統，來自富裕的藝術品交易與出版世家，優越感使他始終不曾完全被希特勒迷住。但是漢夫施丹格爾認為，糟糕的藝術品位、對酒毫無鑒賞力、不得體的餐桌禮儀，這些小資產階級的質樸表現只是突出了希特勒特有的真誠；措辭不夠優雅是希特勒打動群眾的神奇能力的基本前提。像希特勒的其他許多仰慕者一樣，漢夫施丹格爾第一次接觸希特勒是去聽他的演講；希特勒則對漢夫施丹格爾家客廳的優雅精致驚訝不已，他喜歡聽漢夫施丹格爾用鋼琴彈奏瓦格納，喜歡一邊在房間里走來走去，一邊隨著流淌而出的大師旋律揮舞雙臂做指揮狀。更要緊的是，漢夫施丹格爾能夠把希特勒介紹給慕尼黑上流社會舉足輕重的人物，包括出版人、商界人士和軍官。這些圈子里的人覺得關照他是件好玩兒的事，當他身穿軍大衣、拿著一根狗鞭出現在他們的高雅聚會上時，大家都樂不可支；他們頗為認同他的觀點，愿意為他的貸款擔保，就像鋼琴制造商貝希斯坦（Bechstein）的妻子所做的那樣；他們還用其他各種方式支持著他。然而只有那些最有熱情的人才會大手筆地送錢給他，比如企業家庫爾特·呂德克（Kurt Lüdecke）。另外，納粹黨還必須求助它在上流社會的朋友，比如前外交官馬克斯·埃爾溫·馮·朔伊勃納—里希特（Max Erwin von Scheubner-Richter），設法從魯登道夫的公務經費中撥出一小部分給它，同時納粹黨繼續從黨費收入中抽取它的大部分經費。[[63]](#63_2)

另一種截然不同的支持來自尤利烏斯·施特萊歇爾（Julius Streicher），他于1922年10月帶領自己在紐倫堡的追隨者加入納粹黨。施特萊歇爾也是退伍軍人，像希特勒一樣惹人注目地佩戴著鐵十字勛章，他在戰后參與創建了德意志社會主義黨。希特勒取得的進展令施特萊歇爾印象深刻，他帶著很多支持者加入納粹黨，使納粹的黨員人數一夜之間翻倍。信奉新教的弗蘭肯（Franconia）是納粹黨招募新成員的理想場所，那里有心懷不滿的農民階級，他們容易受反猶主義吸引，而且當地尚無公認占主導地位的政黨。施特萊歇爾的加盟，極大地向北方拓展了納粹黨的影響力。然而，得到施特萊歇爾，納粹黨不僅得到了一個惡毒的反猶主義者，他對猶太人的極端仇恨絲毫不遜于希特勒；也得到了一個暴戾之人，他是那種一旦掌權，就會在公眾面前晃著粗重的鞭子，親自痛毆那些無助的對手的人。1923年，施特萊歇爾創辦了一份登載聳人聽聞消息的通俗報紙《沖鋒報》（Der Stürmer），該報很快確立了這樣的名聲：它用危言聳聽的頭條報道挑起對猶太人最惡毒的攻擊，充滿了性暗示、種族主義漫畫、杜撰的殺人祭祀指控，以及挑逗性的半色情報道——猶太男人勾引天真的德意志少女。由于該報的立場過于極端，那個面相兇橫的禿頭主編過于明顯地表現出偏執的傾向，施特萊歇爾在納粹運動中從未擁有很大的影響力，運動的領導人對他有些反感，該報甚至在第三帝國治下被禁了一段時間。

然而施特萊歇爾并不只是暴徒。當過教師的他還是個詩人，有人說他的抒情詩“相當迷人”，而且像希特勒一樣，施特萊歇爾也畫水彩畫，但他只是把那當作愛好。施特萊歇爾也把自己視為藝術家。他受過教育，是職業記者，因此在某種意義上，他也像希特勒一樣是個波希米亞式人物。他的思想雖然是以極端形式表達出來的，但在當時的右翼陣營中并非特別不同尋常，正如他本人所承認的，這很大程度上受到戰前德國反猶主義的影響，尤其是特奧多爾·弗里奇的影響。而且施特萊歇爾的反猶思想絕非納粹運動中的邊緣理論。希特勒后來甚至評論道，施特萊歇爾在某種程度上“美化了猶太人。猶太人比施特萊歇爾所描繪的更卑鄙、更兇狠、更邪惡”。希特勒承認，施特萊歇爾也許不是個有效的管理者，又總是因為好色而陷入各種各樣的麻煩，但希特勒始終支持他。有時，當納粹黨需要表現出體面的一面時，《沖鋒報》就會成為令它尷尬的污點；但這只是策略問題，從來不是原則或信仰問題。[[64]](#64_2)

### 三

1923年，希特勒和納粹黨認為不必特意裝出體面的樣子了，覺得暴力才是奪權的明路。古斯塔夫·里特爾·馮·卡爾領導的、同情準軍事組織的巴伐利亞極右翼政府已于1921年9月倒臺，此后，卡爾與他的朋友們卷入了反政府陰謀，旨在推翻由歐根·馮·克尼林（Eugen von Knilling）及其巴伐利亞人民黨領導的政府。像許多溫和的保守派后來所做的那樣，克尼林及其盟友把納粹黨人視為威脅，討厭他們的暴力行為，但認為他們是出自公心，只是需要以更富有成效、更健康的方式運用他們的理想主義，因此同樣以比較寬容的態度對待納粹黨的活動。況且，克尼林及其盟友一度試圖壓制納粹黨的努力也未能如愿：巴伐利亞州政府頒布禁令，制止該黨在1923年1月底的一次集會，因為擔心它會演變為暴力行動；而巴伐利亞州的軍隊指揮官赫爾曼·馮·洛索（Hermann von Lossow）將軍在羅姆的請求下，同意支持希特勒行使組織集會的權利，前提是希特勒保證集會是和平的；當時擔任上巴伐利亞（Upper Bavaria）行政長官的卡爾也支持希特勒，于是巴伐利亞州政府只好讓步。[[65]](#65_2)

此時形勢迅速走向高潮。很多時候，事態脫離了希特勒的控制。尤其是頗為獨立、不太受制于他的恩斯特·羅姆成功地將巴伐利亞的主要準軍事組織整合成了愛國戰斗同盟協作社（Working Community of Patriotic Fighting Leagues），其中包括一些比納粹的褐衫軍規模大得多的團體。這些團體把武器上繳給正規軍，正規軍的巴伐利亞州部隊在馮·洛索將軍領導下，顯然正在厲兵秣馬，準備執行已傳得沸沸揚揚的計劃——進軍柏林和武裝對抗魯爾區的法國人；并且招募了準軍事團體作為后備隊，開始訓練他們。加入這個準軍事陰謀雜牌軍的，還有魯登道夫將軍。希特勒試圖搶占先機，要求軍隊把武器歸還褐衫軍，卻遭到斷然回絕。希特勒只好讓步，由魯登道夫出面領導準軍事團體9月初在紐倫堡舉行的大規模游行，穿制服的參加者多達10萬人。希特勒被任命為準軍事團體的政治負責人，但他根本控制不住局面，而是被形勢裹挾著向前。[[66]](#66_2)

在重新組織起來的準軍事運動中，羅姆的作用至關重要。為了專心做此事，他辭去納粹沖鋒隊這個小型組織的領導職務，接替他的，是即將在納粹運動隨后的發展進程以及第三帝國起到關鍵作用的人：赫爾曼·戈林（Hermann Göring）。1893生于巴伐利亞羅森海姆（Rosenheim）的戈林也是個實干家，但與羅姆屬于截然不同的類型。他出身于巴伐利亞中上層階級，父親是堅定的德意志帝國主義者，戰前在德國殖民納米比亞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1905—1911年，戈林先進入士官學校，后來就讀于柏林的普魯士軍官學校，此后一直認為自己是普魯士軍人，而不是巴伐利亞人。戰爭期間，他成了著名的王牌飛行員，退役前擔任由“紅色男爵”馮·里希特霍芬（von Richthofen）創建的戰斗機中隊的指揮官。其飛行戰功為他贏得了德國最高軍事勛章“功勛勛章”（Pour le mérite），也使他成為家喻戶曉的傳奇英雄。戰斗機飛行員被人們視為裝甲內的現代騎士，其大膽冒險的行動與戰壕中沉悶的機械化屠戮形成了強烈反差。戈林在貴族階層頗受追捧，1922年2月與瑞典男爵夫人卡琳·馮·坎措（Karin von Kantzow）結婚，自此在上流社會的交游愈加廣闊。與許多上過戰場的戰士一樣，他在戰爭結束后繼續追求一種行動的人生。短暫地服務于自由軍團之后，他成了斯堪的納維亞半島（Scandinavia）的表演飛行員。借助妻子的影響力，他終于在1922年底找到門路加入了希特勒的納粹運動。總之，此時的戈林是一位風度翩翩、英俊浪漫的人物，許多通俗圖書和雜志文章都在吹捧他的功績。

戈林對于行動的渴望，在納粹運動中得到了滿足。他冷酷、精力旺盛、極端自負，卻從一開始就完全傾倒于希特勒的魅力。對他來說，忠誠是最崇高的美德。和羅姆一樣，戈林也把政治視為戰爭，即一種武裝斗爭的形式，正義與道德在其中都不起作用。強者勝，弱者亡，必要時，法律就是一堆有待打破的“條條框框”。對戈林來說，為達目的不擇手段，而這個目的一直是他所認為的德國的民族利益，他認為德國的民族利益在1918年遭到了猶太人、民主派和革命者的背叛。戈林的貴族人脈，棱角分明的英俊面容，對法語、意大利語和瑞典語等多國語言的精通，以及作為騎士般的戰斗機飛行員的聲譽，使很多人相信他是一位溫和派，甚至是一位外交家；興登堡以及許多像他一樣的人認為，戈林是納粹主義尚可接受的一面，是像他們一樣的威權保守派。然而外表是靠不住的：戈林的冷酷、暴戾、極端，不遜于任何一位納粹頭目。以上種種素質，加上他很快就對希特勒越來越唯命是從，使他在1923年初成了取代羅姆擔任沖鋒隊新首腦的理想人選。[[67]](#67_2)

由戈林掌管，沖鋒隊此時有望重新執行納粹路線了。1923年整個春季和夏初，納粹黨都在籌劃起義，同時輔之以羅姆盡其所能加以引導的大規模準軍事運動。危機終于到來，柏林的德國政府被迫于8月13日辭職，繼任者是包括社會民主黨在內的多黨聯合政府，由古斯塔夫·施特雷澤曼領導，他是右翼的自由派民族主義者，在隨后幾年里證明了自己是魏瑪共和國最老練、最敏銳、最務實的政客。施特雷澤曼認為，為反抗法國占領魯爾區而進行的消極抵抗活動必須結束，急速加劇的惡性通貨膨脹也必須加以控制。他制定了“履約”政策：德國將履行和約條款，包括支付戰爭賠款；同時進行幕后游說，爭取修改和約條款。他的政策在接下來的6年里取得了顯著成果，在此期間他一直擔任德國外交部長。但在極端民族主義者看來，他的政策無異于賣國。巴伐利亞政府意識到極端民族主義者此時可能會發動起義，于是任命卡爾為州行政長官，全權維持秩序。在洛索和警察總監漢斯·里特爾·馮·賽瑟爾（Hans Ritter von Seisser）的支持下，卡爾取締了納粹黨計劃于9月27日舉行的一系列集會，同時執行他們自己制定的推翻柏林政府的計劃。驅使各方采取行動的壓力不斷增加；在準軍事團體的普通成員看來，行動幾乎是大勢所趨，正如希特勒一再提醒的那樣。[[68]](#68_2)

在柏林，陸軍司令漢斯·馮·澤克特將軍不贊成洛索、賽瑟爾和卡爾的計劃。他更愿意用陰謀詭計把施特雷澤曼的政府趕下臺，最終也確實成功了，但繼任的又是一個聯合政府，施特雷澤曼依然在其中擔任外交部長。[¶](#P_13)在慕尼黑舉行的緊張談判未能在洛索領導的巴伐利亞州正規軍、賽瑟爾領導的警察，以及當然是以希特勒為政治代理人的準軍事團體這三方之間達成任何形式的聯合。希特勒意識到，如果繼續優柔寡斷，他將失去準軍事團體的支持，他還擔心卡爾自己有采取行動的打算。于是在魯登道夫的支持下，希特勒決定舉行暴動：逮捕巴伐利亞政府成員，并迫使卡爾及其盟友與準軍事團體一道進軍柏林。暴動的日期定在11月9日，選擇這個日子主要是形勢所迫，而不是考慮到它的象征意義——那天是推翻皇權的1918年革命的紀念日。11月8日傍晚，希特勒和一群全副武裝的沖鋒隊員闖入卡爾發表演說的會場——緊鄰慕尼黑市中心的貝格勃勞凱勒啤酒館（Bürgerbräukeller）。希特勒命令一名沖鋒隊員朝天花板鳴槍，讓人群安靜下來，然后宣布，酒館已被包圍，巴伐利亞政府已被罷免。在戈林讓聽眾保持鎮靜的時候，希特勒把卡爾、洛索和賽瑟爾帶到隔壁房間，解釋說，他將要進軍柏林，親自出任德國新政府的首腦，并由魯登道夫接管國民軍，而他們三人將因支持進軍而被委以要職。希特勒返回隔壁對眾人發表演說，激動地請求大家支持這場他稱之為打倒“1918年的十一月罪人”的行動，并最終贏得了聽眾。卡爾及其同伴別無選擇，只好回到講臺，此時魯登道夫也加入其中，宣布支持希特勒。[[69]](#69_2)

然而，把戲劇性的示威轉化為政治力量沒有那么容易。納粹黨的暴動計劃并不完善。羅姆占領了慕尼黑的陸軍總部，納粹沖鋒隊也接管了警察總部，但其他建筑依然在政府手中，至關重要的是政府掌握著軍營。就在希特勒進入市區，試圖控制局面時，魯登道夫釋放了卡爾和其他人質，這些被迫支持政變的人立即變卦，馬上與軍隊、警察和媒體取得聯系，反對希特勒的行動。返回啤酒館后，希特勒和魯登道夫決定向市中心進軍。他們集合了大約2,000名武裝支持者，付給每人2萬億馬克（按當天匯率僅值3美元多一點），這筆錢來自褐衫軍按照希特勒的命令，突襲兩家據說是猶太人管理的印鈔廠后“沒收”的1.4萬萬億多馬克。縱隊于11月9日中午出發，在支持者的歡呼、鼓勵下，穿過市中心，朝著陸軍部方向行進。在大街的盡頭，他們被警察組成的武裝警戒線攔住。根據官方報告，游行者用打開保險栓的手槍抵在警察的胸口，朝他們吐唾沫，用上了刺刀的步槍指著他們。然后有人開了一槍——至于開槍的是哪一方，雙方各執一詞。一時間，槍聲大作，雙方都開火了。戈林腿部中彈，倒在地上；希特勒摔倒或者被推倒在地，肩膀脫臼。希特勒的外交家朋友、把他引薦給上流社會贊助人的朔伊勃納—里希特當場斃命。總共有14名游行者和4名警察中槍死亡。當警察沖入隊伍，逮捕魯登道夫、施特萊歇爾、羅姆和其他許多人時，戈林設法逃脫了，先是亡命奧地利，然后跑到意大利，最后在瑞典安頓下來，在此過程中因使用嗎啡緩解疼痛而成了癮君子。希特勒胳膊掛在吊帶里，被護送到漢夫施丹格爾的鄉間別墅，11月11日在那里被捕。暴動灰頭土臉地結束了。[[70]](#70_2)

[\*](#_206) 亞歷山大，埃及的港口城市。

[†](#_207) 今塔林（Tallinn），愛沙尼亞首都，也是愛沙尼亞最大的城市。——編注

[‡](#_208) 書名模仿張伯倫的著作《十九世紀的根基》。

[§](#SS_12) 即1919年分別于6月和9月簽署的《凡爾賽和約》和《圣日耳曼和約》。

[¶](#P_12) 施特雷澤曼于1923年8月就任德國總理兼外交部長；同年11月辭去總理職務，留任外交部長直至1929年10月去世。

## 第三節 卷土重來

### 一

1923年11月9日事件之后，希特勒沒花多少時間就緩過神來。他知道，他可以把巴伐利亞州一大串政界要人牽扯進這場未遂暴動，也可以揭露正規軍參與訓練了打算進軍柏林的準軍事團體。意識到這個在審訊希特勒期間就已顯露苗頭的威脅，巴伐利亞州政府設法說服柏林當局，此案的審理不要安排在萊比錫的帝國法院，而是在慕尼黑專門設立的“人民法庭”進行，那里比較便于他們控制事態。[[71]](#71_2)看起來他們很可能以寬大處理作為條件，換取希特勒同意背黑鍋，因為他們挑選的法官是著名的民族主義者格奧爾格·奈特哈特（Georg Neithardt），他于1919年由巴伐利亞州的反革命司法部長弗朗茨·居特納（Franz Gürtner）任命，希特勒1922年初的那次庭審就是由他主持的。1924年2月26日，庭審開始，希特勒獲準身穿便裝、佩戴鐵十字勛章出庭，并且連續數小時進行法庭陳述而未被打斷。奈特哈特任由他恐嚇和侮辱控方證人，州檢察官未能傳召幾個關鍵證人，這些人的證詞本可以推翻辯方的意見。法庭壓下了魯登道夫涉案的證據，駁回了把希特勒作為奧地利公民驅逐出境的請求，理由是他曾在德國軍隊服役，并且證明了自己是一位德意志愛國者。[[72]](#72_2)希特勒獨自承擔了全部責任，他宣稱，服務于德國的利益不能算作嚴重的叛國罪，“不朽的歷史法庭將裁定我們是……為人民、為祖國謀求最大福利的德意志人”。[[73]](#73_2)

盡管事實是，暴動的參與者槍殺了4名警察，而且發動了一場（以任何合理的法律用語來說都屬于）謀逆的武裝叛亂，意圖顛覆合法政府，這兩種罪行均可判處死刑，但法庭對希特勒的嚴重叛國罪僅判處5年徒刑，對同犯判處同等甚至更輕的刑期。不出所料，魯登道夫被無罪開釋。法庭對其寬宏大量提出的理由是，暴動參與者的“行為動機是一種純粹的愛國精神和最高尚的意愿”。即使按照魏瑪時期那種偏袒一方的司法標準，這個判決也是極不公正的。它受到了廣泛的譴責，甚至右翼也對此感到憤慨。希特勒被送往慕尼黑西部萊希河（Lech）畔蘭茨貝格市（Landsberg）的一座古堡，住進了此前關押刺殺艾斯納的阿爾科—瓦利伯爵的那間牢房。這就是所謂的“城堡幽禁”，一種溫和的監禁方式，專為那些被認為動機高貴的罪犯而設，比如戰前為了名譽而在決斗中殺死對手的紳士。希特勒的牢房寬敞、通風良好、配有舒適的家具，探視者可以隨意出入。他羈押于此期間，共有500多人來訪，為他帶去了來自獄外祝福者的禮物、鮮花、信件和電報。他可以讀書，實際上，無客來訪的時候也沒有別的事情可做。他埋頭苦讀各種書籍，比如弗里德里希·尼采和休斯頓·斯圖爾特·張伯倫的著作，主要是從中尋找材料來證實自己的觀點。更重要的是，在納粹出版人馬克斯·阿曼（Max Amann）的建議下，希特勒還坐下來把自己此前的生活與觀點口述給兩個獄友——他的司機埃米爾·莫里斯（Emil Maurice）和他的秘書魯道夫·赫斯。這份口述在次年出版，書名大概是阿曼提議的：《我的奮斗》。[[74]](#74_2)

有些歷史學家認為，《我的奮斗》是希特勒后來行動的一種藍圖，是一本危險而邪惡的書，不幸被那些本應認清它的人所忽視。但事實并非如此。此書被阿曼、漢夫施丹格爾等人精心編輯過，為的是把雜亂無章的初稿改得文理通順一些，不那么語無倫次。可即便如此，它依然晦澀枯燥、啰唆乏味，在1930年納粹黨取得競選的突破性進展之前，此書銷量不大。在那之后，此書成為暢銷書，尤其是在第三帝國時期，如果家中沒有此書，簡直如同叛國行為。購買它的人當中也許只有較小比例的人讀過，而讀過的人肯定覺得難以從這部混亂的自傳體回憶錄與含混不清的政治宣言的大雜燴中得到任何條理清晰的東西。希特勒贏得人心、操縱民意的天賦，在于他的公開演說，而不在于他的寫作。不過，讀過此書的人還是可以確定無疑地了解到這一事實：希特勒認為，種族沖突是歷史發展的動力和本質，猶太人是日耳曼民族的死敵，日耳曼人的歷史使命是在納粹黨的指引下，削弱猶太人的國際勢力，把他們全部消滅。他宣稱：“除了全力為日耳曼人的靈魂而積極奮斗之外，只有滅絕了國際上那些毒害日耳曼民族的人，我們的民族才能夠成功地統一起來。”[[75]](#75_2)

此時在希特勒的頭腦中，猶太人與“布爾什維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有著牢不可破的關聯。在《我的奮斗》中，其重要性遠遠大于通貨膨脹期間他苦苦思索的金融資本主義，因為俄國是德國想要征服的“生存空間”，征服它必然伴隨著清除他認為統治著蘇維埃國家的“猶太—布爾什維克”。這些觀點，在寫于1925年、出版于1926年的《我的奮斗》第二卷中做了更為詳細的闡述，它們是此后希特勒思想的核心。他宣稱：“1914年的國界對德意志的未來根本沒有任何意義。”希特勒用亞歷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_217)征服廣袤東方打比方，宣告：“猶太統治在俄羅斯的終結，也將是俄羅斯作為一個國家的終結”；目前由“俄國及其周邊屬國”占據的土地，未來將移交給“勤勞的日耳曼人來耕種”。[[76]](#76_2)

希特勒的信念清晰地展現在《我的奮斗》中，愿意了解的人自然是有目共睹。每個讀過此書、熟悉該文本的人都不會以為，希特勒的全部愿望就是修訂《凡爾賽和約》、恢復1914年的德國疆界，或者讓占中歐人口少數的德語族群實現民族自決；也沒有人會懷疑其反猶主義具有粗俗、狂熱，甚至殺氣騰騰的特質。但信念和意圖不等于藍圖和計劃。在談到如何執行這些構想時，希特勒的文字自然反映了成書那個特定時期的政治現實。當時，法國人是德國的敵人，不久前剛撤出魯爾區。相比之下，英國人似乎有可能成為德國對抗布爾什維主義的盟友，僅僅幾年之前，他們還曾在俄國內戰中支持過“白軍”。不久，當希特勒撰寫另一部生前未出版的同類作品時，意大利與德國爭奪南蒂羅爾（South Tyrol）的沖突被提上了國際議程，因此他的寫作重點集中到了那里。[[77]](#77_2)然而貫穿這些策略變化始終的，依然是向東開拓“生存空間”的長期目標，以及滅絕猶太人的迫切愿望。這同樣不可能一下子辦到，在此階段，希特勒顯然并不清楚如何或者何時能夠實現目標。為此也要在戰術上隨機應變，各種臨時方案將會隨之出現。但這些既不會改變希特勒對猶太人的仇視所具有的種族滅絕性質，也不會改變他偏執信念，即猶太人是德國一切痼疾的根源，唯一的長遠解決方案就是把他們作為一個生物實體予以徹底滅絕。這種信念很容易從《我的奮斗》的語言、從希特勒的演說措辭、從產生這些言論的狹隘的復興主義氛圍中辨別出來。[[78]](#78_2)他認為，猶太人是一種“比黑死病還可怕”的“瘟疫”，是“德國這具腐尸上的蛆”，他們將被趕下權位，然后全部驅逐出德國，必要時將使用武力。德國在東歐取得生存空間之后，那里的猶太人將遭遇什么，希特勒還說不上來；但他殺氣騰騰的語言無疑昭示了他們不容樂觀的命運。[[79]](#79_2)

假如之前希特勒還不曾確信自己就是那個將要把上述構想變成現實的人，那么未遂暴動之后，他撰寫《我的奮斗》、在審判中聲名大噪、民族主義右翼對他大肆吹捧，這一切都使希特勒對此篤信不疑。暴動的失敗也提醒了他，如果僅僅依靠準軍事組織的暴力活動，他甚至無法邁出第一步——在德國本土掌握最高權力。“進軍羅馬”在德國根本行不通。關鍵要通過宣傳和公開演說贏得大眾的支持，希特勒知道這是他的強項。羅姆所依然主張的采取革命手段奪取權力，如果沒有軍隊的支持，無論如何是無法成功的，他們在1923年11月就顯然沒有得到軍隊的支持。正如后來甚至包括希特勒本人在內的一些人所說的那樣，暴動失敗之后，他并沒有走上“合法”斗爭的道路。然而他確實認識到，要想推翻魏瑪“制度”，需要的不僅是幾次沒有準頭的射擊，即使是在1923年這樣危機最嚴重的年頭。上臺掌權顯然需要與體制內的主要勢力合作，盡管他在1923年得到了一些支持，但事實證明那還不夠。在不到10年之后的下一次危機發生時，他已確保了軍隊和政府的主要機構不是保持中立，就是在積極地為他工作，而不同于1923年的情形。[[80]](#80_2)

然而與此同時，在希特勒被逮捕和監禁之后，納粹黨的殘局似乎已無法收拾。準軍事團體四分五裂、陷入混亂，武器被政府收繳。卡爾、洛索和賽瑟爾因暴動而導致聲譽嚴重受損，被巴伐利亞人民黨領袖海因里希·黑爾德（Heinrich Held）主持的新內閣排擠出局，意味著巴伐利亞分離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的陰謀政治讓位于傳統的地區政治。隨著惡性通貨膨脹的結束，加上柏林政府實行“履約”政策，危局逐漸緩和，重新安排戰爭賠款的道威斯計劃基本上立見成效。失去領袖的納粹黨重新分裂成爭吵不休的小派別。羅姆繼續設法把效忠魯登道夫的準軍事組織殘部重新整合起來。希特勒讓阿爾弗雷德·羅森貝格掌管納粹黨，因為他幾乎是留在國內的唯一沒被逮住的領導人。但結果證明，羅森貝格完全沒有能力在納粹黨內樹立起威信。[[81]](#81_2)

納粹黨與褐衫軍此時成了非法組織。它們對地下活動毫無準備；對于以后采取什么策略——是準軍事行動還是議會斗爭——存在很大分歧；類似施特萊歇爾與魯登道夫之間的人際斗爭，以及各種極端民族主義團體紛紛出面爭奪納粹黨的領導權，嚴重破壞了重振納粹運動的努力。希特勒差不多不再插手這些紛爭，宣布退出政壇、專心寫書。巴伐利亞最高法院駁回了州檢察機構的意見，決定假釋希特勒。當他于1924年12月20日獲釋時，黨內亂象并無多大改善。希特勒尚有大約4年刑期未服，在此期間他必須小心謹慎，不能違反假釋條件。1927年之前，他不能在德國多數地區公開演講；1928年之前不能在普魯士活動，而普魯士占魏瑪共和國疆土的一多半，包含了共和國的大多數人口。極端民族主義右翼在1924年的全國選舉中顏面掃地。陰霾中僅有的一線陽光來自奧地利政府，它挫敗了德國官方遣返希特勒的企圖——拒絕接收他。[[82]](#82_2)

### 二

不過，希特勒仍有一些身居高位的朋友。其中一個關鍵人物是巴伐利亞司法部長弗朗茨·居特納，他認同希特勒的民族主義思想。當巴伐利亞州緊急狀態最終在1925年2月16日結束的時候，居特納同意解除對納粹黨及其報紙《人民觀察家報》的禁令。[[83]](#83_2)暴動以及隨后的審判讓希特勒成了民族英雄，憑借新贏得的聲望與自信，他立即重建納粹黨，號召從前的追隨者入黨，并且（按照一條關鍵的新要求）無條件服從他的領導。尤利烏斯·施特萊歇爾、戈特弗里德·弗德爾、黨報記者和宣傳家赫爾曼·埃塞爾（Hermann Esser）等人公開消除隔閡以示團結。希特勒著手將最強勁的對手排擠到政治邊緣。首先，到了可以合法地重組褐衫軍的時候，希特勒堅持讓它從屬于納粹黨，并切斷與其他準軍事組織的聯系；反對這個主張的恩斯特·羅姆被掃地出門，離開政壇，不得已當了推銷員，然后成了工廠工人，后來接受邀請前往玻利維亞（Bolivia），指導該國的部隊學習歐洲戰法。[[84]](#84_2)其次，希特勒沉穩地逐漸消解魯登道夫依然享有的聲望，魯登道夫不僅是個強勁的對手，其思想也很快更趨極端。魯登道夫于1926年與瑪蒂爾德·馮·克姆尼茨（Mathilde von Kemnitz）結婚，受后者的影響，他組建了坦嫩貝格同盟（Tannenberg League），該同盟出版陰謀理論文學作品，不僅攻擊猶太人，還包括耶穌會和天主教會——這無疑導致了他在巴伐利亞和德國南部其他虔誠教區選舉中的慘敗。決定魯登道夫命運的是1925年的總統競選，他作為納粹黨候選人參選，僅得到可憐的1.1%選票。有證據顯示，希特勒明知魯登道夫的聲譽將在競選中受到無法彌補的損害，依然親自說服他參選。[[85]](#85_2)自此直至1937年去世，魯登道夫及其坦嫩貝格同盟一直無奈地處于政壇的邊緣——完全無足輕重，得不到任何一類群眾的支持。沒有什么比這件事更加清晰地表明，德國的極端民族主義格局已經改變：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大權在握的軍事獨裁者，已經被狂妄自大的新晉納粹政客排擠到政壇的邊緣；將軍已被下士取代。



地圖7　納粹黨在1924年第二次國會選舉中的得票率

妥當地把魯登道夫排擠出局之后，希特勒在極右翼陣營已無真正的對手，終于可以集中精力收服極端民族主義運動中的其余力量。德國南部形形色色的團體紛紛被吸引到納粹黨的軌道上來，與此同時，該黨在北部和西部的各分支機構也顯示出復興的跡象。這主要歸功于另一位巴伐利亞人——來自蘭茨胡特（Landshut）的藥劑師格雷戈爾·施特拉塞爾（Gregor Strasser）。生于1892年的施特拉塞爾是一位在政治上非常活躍的律師之子，受過良好教育，博覽群書，他的中產階級教養和風度使他頗受納粹運動的許多潛在同情者青睞。同時，像與他同輩的許多德國資產階級人士一樣，他的內心銘記著1914年的傳統——團結精神，他認為有必要在全體德國人中間重新喚起這種精神。以中尉軍銜退役后，施特拉塞爾致力于重建這種傳統，糾正他所認為的德國的錯誤。戰爭結束時，他在慕尼黑與自由軍團并肩戰斗，然后建立起自己的準軍事組織，由此與希特勒建立了聯系。在施特拉塞爾看來，事業比領袖重要。1923年11月9日，他率領手下的褐衫軍分隊進入慕尼黑，按照計劃占領了一座重要的跨河橋梁，當暴動的形勢發生逆轉時，施特拉塞爾把自己的分隊撤回蘭茨胡特，在那里他被依法逮捕。[[86]](#86_2)

但最終，由于他在暴動中屬于比較外圍的從犯，當局似乎覺得沒必要予以特別嚴厲的懲罰，因此當其他納粹領導人不是逃亡就是坐牢時，施特拉塞爾一直逍遙法外。1924年4月，他被選進了巴伐利亞州議會。事實證明施特拉塞爾是個天才的管理者，他把許多七零八落的極右翼殘部整合了起來。納粹黨重新成為合法組織之后，希特勒發現了他的才干，派他去重振德國北部的納粹黨。到1925年底，施特拉塞爾通過不懈的招募活動，使支部的數量增加了將近4倍。他明確強調納粹意識形態的“社會主義”方面，以此爭取魯爾等地區的產業工人階級。施特拉塞爾看不起其他那些認為“反猶主義的原始方案就足以解決問題”的極右翼團體。1925年7月，他告訴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納粹主義與眾不同，因為它致力于通過一種德國式的社會主義發動“一場德國革命”。[[87]](#87_2)不過，他的社會主義構想雖然包括國家在大型企業持51%股份、在所有其他中小企業持49%股份，但也包括恢復同業公會，以及支付實物工資，而不是貨幣工資。這種“社會主義”構想是施特拉塞爾與德國北部各地新建立的黨支部中的一些領導人共同制定的。這些黨支部的建立，與希特勒在此期間的領導作用關系不大或者毫無關系；可以說它們基本上是自我重建，而獨立于慕尼黑的納粹黨總部。不久，也許是不可避免地，施特拉塞爾及其盟友表達了他們的懷疑，認為在希特勒撰寫《我的奮斗》第二卷期間負責管理納粹黨的慕尼黑總部的赫爾曼·埃塞爾所領導的小集團既腐敗又獨裁。他們中的許多人從未見過希特勒本人，因此不曾被他越來越強烈的個人魅力所降伏。他們特別反感當時的納粹黨綱領，提出要代之以一份更合乎他們心意的黨綱。[[88]](#88_2)

在這些行動中脫穎而出的，也是一位新黨員——年輕的理論家約瑟夫·戈培爾。戈培爾1897年生于下萊茵（Lower Rhine）的工業城市萊特（Rheydt），是小職員之子，先在文法學校[†](#_218)讀書，然后到波恩大學（Bonn University）學習古典文獻、德語和歷史，又于1921年獲得海德堡大學（Heidelberg University）浪漫主義文學專業的博士學位，因此有資格被稱作“戈培爾博士”，他此后也正是一直被這樣稱呼的。盡管有了博士學位，但戈培爾不以學術為人生志向。他也是個波希米亞式人物，在校期間就已經把課余時間都用于寫劇本，夢想將來成為藝術家。1920年代，他寫了一部小說，并反復修改，最終于1929年出版，書名是《邁克爾日記：德國的命運》（Michael: A German Fate in the Pages of a Diary）。這部小說主要是戈培爾自說自話的載體，表達了他關于民族復興的含糊、混亂的理念，其出發點是對未來的狂熱信仰與信念，小說的主人公最終為了信仰犧牲自己。戈培爾是在通過這種方式，為自己殘缺的生命賦予意義。他一生被十分明顯的生理缺陷所困擾：先天畸形足，因此走起路來一瘸一拐。在校期間，乃至在整個人生中，這都為他招來了無情的嘲弄，并導致他不適合在軍中服役，無法參加一戰。也許是出于補償心理，戈培爾開始相信自己命中注定是干大事的。他一直寫日記，以過人的精力追求女人，情史之豐富、成功率之高令人吃驚。他不肯靠平凡的方式謀生，而是如饑似渴地閱讀——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尼采、斯賓格勒，尤其是休斯頓·斯圖爾特·張伯倫，后者令他相信，只有清除了猶太人，才可能實現斯賓格勒所預言的西方之重生。[[89]](#89_2)

在某些方面，戈培爾不同于其他納粹頭目。他的智力和氣質常常被描述為“拉丁人的”，也許是因為他避免含糊其辭、激昂雄辯地作哲人之語，反而在講話和寫作中表現出非同尋常的清晰和坦率，時不時還夾雜些冷嘲熱諷的俏皮話。[[90]](#90_2)然而像許多人一樣，戈培爾也對德國在一戰中的戰敗深感震驚。他在慕尼黑度過了1919—1920年的冬季學期——德國學生在大學期間通常至少轉學一次，因此，他既受到了學生生活中極右翼氛圍的熏陶，又耳濡目染了慕尼黑那幾個月里的反革命極端民族主義氛圍。戈培爾同情阿爾科—瓦利伯爵這類人，對于他因刺殺庫爾特·艾斯納而被監禁深感不滿，但戈培爾一直沒有真正發現自己的政治抱負，或者說政治能力，直至1924年，在與幾個極端民族主義團體接觸之后，他被一位老同學引薦給了納粹黨。

戈培爾在納粹黨內努力進取之時，結識了埃里克·科赫，他是萊茵河流域的納粹黨員，曾是抵抗法國的暴力組織成員；還遇到了尤利烏斯·施特萊歇爾，戈培爾私下將他描述為“狂暴武士”[‡](#_219)，說他“大概有點兒病態”。[[91]](#91_2)戈培爾對魯登道夫印象深刻，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他就崇拜這位偉大的將軍。不久，戈培爾成為納粹黨在萊茵蘭的組織者，逐漸練就了出色的演說技巧，他也許是除希特勒本人以外最有說服力的納粹演說家，言語清晰、通俗，回答詰問者時機敏、有急智。他開始把自己的文學才華用于政治，為納粹報刊寫文章，在納粹信條中摻入偽社會主義論調。戈培爾終于找到了自己的事業。在幾個月的時間里，他成了萊茵蘭最受歡迎的納粹演說家之一，得到當地納粹黨支部領導層的賞識，開始在決策中發揮重要作用。正是約瑟夫·戈培爾與格雷戈爾·施特拉塞爾，于1925年在幕后策動了北德派質疑慕尼黑的納粹領導層。然而戈培爾不久也開始對希特勒心悅誠服，讀了《我的奮斗》，他激動地寫道：“這個人是誰？半人半神！”[[92]](#92_2)1925年11月6日，才見希特勒本人第二面，戈培爾就贊嘆他那“藍色的大眼睛，宛若星辰”。聽罷希特勒的一席話，戈培爾覺得他就是“天生的保民官[§](#SS_15)，未來的獨裁官[¶](#P_15)”。[[93]](#93_2)

戈培爾與希特勒在許多核心問題上的觀點并不一致。意識到北德派越來越強勢，希特勒召集他們在1926年2月14日到弗蘭肯的班貝格開會，尤利烏斯·施特萊歇爾已在班貝格為他發展了大批支持者。希特勒在會上講了兩個小時，反駁北德派的觀點，重申自己堅信德國未來對外政策的核心是在東歐奪取“生存空間”。德國的王公貴族在1918年革命中被廢黜之后，在國內保留了大量財產，施特拉塞爾和戈培爾竭力主張納粹黨參與沒收這些財產的運動，但希特勒譴責這種運動，斥之為侵犯私人財產。“可惡！”戈培爾在日記中寫道，“我此生最失望的事情莫過于此。我不再毫無保留地相信希特勒。”[[94]](#94_2)盡管戈培爾當時搞不清希特勒是不是反對革命，但在會議上他并沒有公然反對希特勒。施特拉塞爾被希特勒的強硬立場震懾住，完全屈服，放棄了自己的提議。作為回報，希特勒解除了赫爾曼·埃塞爾在慕尼黑的職務，以此平息北德派對埃塞爾腐敗問題的憤怒。[[95]](#95_2)

1926年4月，希特勒請戈培爾到慕尼黑做演講，為他配了專車，以隆重的禮儀接待他。在納粹黨總部，希特勒舌戰戈培爾以及威斯特法倫（Westphalia）區黨部的兩位聯席領導人弗朗茨·普費弗·馮·薩洛蒙（Franz Pfeffer von Salomon）和卡爾·考夫曼（Karl Kaufmann）。薩洛蒙是北德派的領軍人物之一，與許多納粹頭目一樣，他也是退伍軍人和自由軍團成員；考夫曼在法國占領魯爾期間因組織暴力抵抗而成名。希特勒痛斥三人在意識形態問題上自作主張，對他們宣講自己關于黨的政策的看法，然后提議雙方盡棄前嫌，前提是他們無條件服從他的領導。戈培爾當場歸順。他在日記中說希特勒“才華橫溢”。想起1923年的暴動，他在筆端傾訴：“阿道夫·希特勒，我愛你，因為你既偉大又單純，可謂天才。”[[96]](#96_2)從此，他完全被希特勒收服；與有些納粹頭目不同，他至死效忠希特勒。作為獎勵，希特勒任命他為大區長官（Gauleiter），掌管規模較小、內部四分五裂的納粹黨柏林區黨部；普費弗·馮·薩洛蒙被任命為準軍事團體褐衫軍的頭目，格雷戈爾·施特拉塞爾成了納粹黨的全國宣傳工作主管。同時，納粹黨年度大會重申了1920年的黨綱，強調了希特勒在納粹運動中的絕對主導權，把所有關鍵職務的任命權，尤其是各大區長官的任命權交到他手中。[[97]](#97_2)

這次會議是合法的，并且遵循法律要求，正式重新選舉希特勒為黨魁。但納粹黨內部運作的真正性質，展現于1926年7月召開的納粹黨集會，有多達8,000名褐衫軍和黨員參加。會議的時間幾乎全部用來向希特勒敬禮、個人向他宣示效忠，并且舉行群眾游行和展示活動，包括游行展示“血旗”——1923年11月以失敗告終的進軍慕尼黑行動中曾被高舉的那面旗幟。[[98]](#98_2)此次會議并不起眼，但它為未來歲月中那些聲勢浩大的納粹黨集會定下了基調。盡管全黨嚴守紀律、堅定不移地團結在希特勒的領導之下，但納粹黨在當時依然是微不足道的小黨。此后直至1929年底，三年的發展為納粹黨后來的成功打下了基礎。不過，納粹黨如欲取得希特勒此時所謀求的民意支持，那么除了領袖和組織之外，它還需要更多東西。[[99]](#99_2)

### 三

1927—1928年，納粹黨逐漸建立起新的、覆蓋全國的基本組織結構。1928年，按照德國國會選舉中的選區界限，納粹黨完成了區黨部的調整，僅保留其中的35個，每個區都覆蓋很大范圍，以適應魏瑪共和國的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制[\*\*](#_220)，這表明各個區黨部的首要功能是助選。在隨后的大約一年時間里，在區黨部與各地黨支部之間，又設立了新的層級——縣黨部（Kreise）。新一代的青年納粹積極分子在縣級黨組織中發揮著最顯著的作用，他們排擠掉戰前泛日耳曼聯盟和各種陰謀組織殘存的那代人，并且在人數上超過了那些曾經活躍于自由軍團、圖勒學會以及類似組織的成員。然而重要的是，請別忘了上一代納粹頭目依然年輕，尤其是與那些頭發斑白、領導著主流政黨的中年政客相比較而言。1929年，希特勒僅40歲，戈培爾32，戈林36，赫斯35，格雷戈爾·施特拉塞爾37。他們依然舉足輕重，其作用尤其體現在領導與啟發年輕一代上。

例如，戈培爾的成名主要是在他擔任柏林區首長期間，他發表犀利的演說、不懈地開展活動、肆無忌憚地挑釁納粹黨的對手、蓄意挑起街頭斗毆和會場罵戰以吸引媒體的關注，為該黨贏得大批新信徒。讓柏林區黨部更出風頭的，是戈培爾對柏林副警察總監伯恩哈德·魏斯（Bernhard Weiss）等人發動的挑釁性的、極盡誹謗之能事的攻擊，他稱呼魏斯為“伊西多”（Isidor），以此提醒人們注意魏斯的猶太血統。這個名字完全是杜撰的，通常被反猶主義者用來稱呼猶太人。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戈培爾是借用了共產黨報紙的用法。[[100]](#100_2)戈培爾的暴力行為和極端言論，導致柏林的納粹黨于1927—1928年被該市的社會民主黨當局取締了11個月；但也為他贏得了青年積極分子的忠心與欽佩。比如19歲的霍斯特·韋塞爾（Horst Wessel），他是牧師之子，放棄了在法學院的學業，投身準軍事領域，剛剛加入褐衫軍。他在1929年這樣描寫“我們的戈培爾”：“這個人所展現的演說天賦與組織才華是獨一無二的……沖鋒隊愿意為他粉身碎骨。”[[101]](#101_2)

為了競爭地方黨支部和區黨部的主要職位，納粹黨頻頻發生內斗。但總的來說，正如馬克斯·阿曼于1925年底告訴本地黨支部的一位積極分子時所說的那樣：希特勒

在原則上認為，“任命”支部書記并不是黨魁的職責。希特勒先生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堅信，國家社會主義運動中最高效的戰士，是那些憑借業績脫穎而出、成為領袖的人。既然你自稱擁有漢諾威幾乎全體黨員的信任，何不干脆接管這個支部的領導權呢？[[102]](#102_2)

希特勒認為，用這種方式，最無情、最活躍、最高效的人將登上黨內的權位。后來他采用了同樣的原則管理第三帝國。這確保了納粹黨各級組織始終積極行動——經常游行、斗毆、示威、動員。但這并沒有馬上帶來回報。到1927年底，納粹黨依然僅有大約75,000名黨員，在國會選舉中只獲得了7席。施特拉塞爾和戈培爾等人曾希望納粹黨能夠贏得產業工人階級，事實證明這已成泡影。[[103]](#103_2)

自知難以突入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的主要地盤，納粹黨轉向了德國北部信奉新教的鄉村地區，當地農民的不滿情緒日益強烈，逐漸發展成示威和抗議活動。通貨膨脹與貨幣穩定政策在農業地區所發揮的相互矛盾的作用，到1920年代末合力造成了一場全面的農業危機。大地主和大農場主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購買了農用機械，因此能夠以微乎其微的實際成本實現農業現代化，農民則往往因為把錢存起來而在通脹中損失殆盡，或者因為把錢花在購買日用品上而沒有從商業中獲利。通脹結束后，政府為促進經濟復蘇而采取放寬農業信貸限制的措施，反倒使情況變得更加糟糕：農民為了彌補自己的損失而大量貸款，等著新一輪通脹的到來，結果卻發現自己已無力還貸，因為價格不升反降。1920年代即將結束時，破產和終止回贖權[††](#_221)的數量已經在不斷增加，絕望的小農場主倒向了極右翼陣營。[[104]](#104_2)大農場主和大地主備受農產品價格下跌的困擾，已無力納稅，他們覺得自己為支持魏瑪福利制度而承擔的稅費過于高昂。[[105]](#105_2)普魯士州和帝國政府已經嘗試過靠關稅、補貼、進口管制以及類似措施來緩解困境，但事實證明這一切根本于事無補。[[106]](#106_2)為盡力應對1920年代初以來的農業蕭條，各類農場主已實現現代化、機械化和生產的合理化安排，但這還不夠。農業群體開始把對進口食品征收高額關稅視為保護其收入的唯一辦法，因此越來越固執地對此施加壓力。在這種形勢下，納粹黨許諾建立一個自給自足的、“獨裁的”德國，基本上禁止進口外國食品，似乎越來越有吸引力。[[107]](#107_2)

納粹黨意識到自己毫不費力就在信奉新教的北德鄉村地區贏得了支持，于是加速把宣傳對象從城市的工人階級轉向其他行業的人群。此時納粹黨將注意力轉向農村地區，開始在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以及奧爾登堡等地大力發展黨員。[[108]](#108_2)希特勒在北德地區刻意淡化納粹黨的“社會主義”傾向，甚至在1928年4月13日“澄清”——或者換個詞，修訂——了黨綱第十七條，為的是向小農場主保證，納粹黨所主張的“無償將土地充公”，指的僅是沒收“做土地投機生意的猶太公司”。[[109]](#109_2)納粹黨在1928年5月的國會選舉中失去10萬張選票，得票率只占2.6%，因此僅有12位代表進入國會，其中包括戈特弗里德·弗德爾、約瑟夫·戈培爾、赫爾曼·戈林和格雷戈爾·施特拉塞爾。不過，在一些信奉新教的北德鄉村地區，納粹黨的支持率卻高得多。例如，雖然它在柏林和魯爾區僅分別獲得1.4%和1.3%的選票，但在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兩縣的得票率分別不低于18.1%和17.7%。在弗蘭肯的得票率為8.1%，當地居民也是心懷不滿、信奉新教的小農場主。這強化了一種感覺，即5月31日的納粹黨報所說的：“農村地區的選舉結果尤其證明了，花費較少的精力、資金和時間，就能夠在那里取得比在大城市更好的效果。”[[110]](#110_2)

納粹黨很快把宣傳、拉攏的目標轉向農業群體，許諾說將在第三帝國為他們設立一個特殊機構。各類農場主都將獲準加入一個屬于他們自己的“工團”（corporation），他們可以在那里和諧地合作，并得到國家的全面支持。那些難以駕馭的農場工人——其中許多是社會民主黨內的活躍分子——將被馴服，勞動成本最終將受到嚴格控制。在多年不成功的、有時還是暴力的抗議之后，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的農場主蜂擁到納粹黨的旗下。由農業人士領導當地的黨組織，以及明確強調“血與土”意識，即認為農民是民族同一性的核心，這兩種做法都無損于該黨的事業。就連一些歷來認同民族黨的大地主也被納粹黨說服了。納粹黨在中小地主中間的支持率迅速上升。不久，農場主的子弟紛紛加入沖鋒隊，被派往大城市去打擊共產黨。[[111]](#111_2)



地圖8　納粹黨在1928年國會選舉中的得票率

就這樣，新戰略很快開始結出果實。黨員人數從1928年10月的10萬增加到一年后的15萬，與此同時，納粹黨在地方選舉和州選舉中的得票率也開始大幅增加，在薩克森達到5%，在梅克倫堡（Mecklenburg）4%，在巴登7%。在信奉新教的薩克森的一些鄉村地區，納粹黨的得票率幾乎翻倍，比如在施瓦岑貝格（Schwarzenberg）區，從1928年的5.9%增至1929年的11.4%。[[112]](#112_2)在弗蘭肯的科堡市，在上屆市政府因當地納粹黨支部書記發表反猶言論而解除其市政雇員職務之后，納粹黨發起運動，成功扳倒了市政府，并于1929年6月贏得市議會25席中的13席，這是納粹黨接管的第一個市政府。這次勝選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納粹黨在競選中的盡心竭力——它派出一流的演說家助選，比如赫爾曼·戈林，甚至希特勒本人。但這次勝選也表明，納粹黨可以在地方政壇爭取競選資本，在這方面該黨已經比從前活躍多了。[[113]](#113_2)

1929年秋，納粹黨得到了更多選舉紅利，其表現形式是民族黨組織的反對楊格計劃的運動（該計劃包括減少賠款數額、重新設定付款期限，但沒有廢止賠款）。運動的領導人阿爾弗雷德·胡根貝格提議以法律形式否決楊格計劃，并對任何簽署該計劃的政府部長提起公訴；為了推動對此提案進行全民公決，他邀請納粹黨以及其他極右翼組織助陣。納粹黨不僅從這場運動中獲得了知名度，還在一定程度上贏得了主流右翼的尊重，因為希特勒是組委會成員，與他共事的是泛日耳曼聯盟的中堅人物，比如海因里希·克拉斯以及“鋼盔”領導人弗朗茨·澤爾特和特奧多爾·杜斯特伯格。公投本身失敗了，只有580萬票支持。但這場運動讓民族黨的許多支持者看到，與民族黨那些穿禮服、戴高帽的領導人相比，身穿褐衫、足蹬長筒靴的納粹黨人是多么的生機勃勃。[[114]](#114_2)

同時，希特勒很快重新激起民眾的熱情，黨內圍繞他而生成的領袖崇拜讓他顯得更有個人魅力了。表達崇拜的一個重要的、具有象征意義的方式，是使用“德國式問候”：“希特勒萬歲！”說的時候伸出右臂，無論希特勒是否在場。它在1926年的運動中成為強制性禮儀，并且逐漸被用作通信時的結束語。這些習慣既強化了納粹運動對希特勒的絕對服從，也得到了此時圍繞在他身邊的第二層級納粹頭目的熱情傳播。他們之所以這樣做，有的是出于加強黨內團結的戰略考慮，比如格雷戈爾·施特拉塞爾，有的是對“元首”本人——此時希特勒已是人人皆知的“元首”——懷有盲目的宗教式信仰，比如魯道夫·赫斯。[[115]](#115_2)1929年8月在紐倫堡（Nuremberg）舉行的納粹黨集會，是1927年以來首次這樣的集會，該黨新建立起的自信心和凝聚力在集會上鋪天蓋地的宣傳中一覽無余。據警方估計，參加者多達4萬，全部團結在歌頌領袖的諛辭之中。[[116]](#116_2)

此時納粹黨已成為一個難以戰勝的組織，它的區黨部、縣黨部和支部中盡是忠心耿耿、精力充沛的干部，其中許多人受過良好的教育、頗有管理才干；它通過一系列專業的宣傳機構，直接對特定選區發揮號召作用。[[117]](#117_2)盡管希特勒一再強調政治是男人的事情，但此時出現了一個納粹的婦女組織，自稱“日耳曼婦女騎士團”（German Women's Order），1923年由埃爾斯貝特·燦德爾（Elsbeth Zander）組建，1928年并入納粹黨，成為該黨的附屬組織。據警方估計，截至1920年代末，其成員已達4,000人，幾乎占到納粹黨全部7,625名女性黨員的一半。有一類婦女組織頗為吊詭，它們積極活動、公開爭取的是把女性清除出公共生活，日耳曼婦女騎士團即屬此類，其成員是激進好斗的反社會主義者、反女權主義者和反猶主義者。它的實踐活動包括：為褐衫軍開設流動食堂；參與宣傳活動；當納粹準軍事組織遭警察搜查時，為他們藏匿武器和裝備；通過其分支機構“紅卐字會”（Red Swastika），一個納粹版的紅十字會，為受傷的積極分子提供護理服務。[[118]](#118_2)

燦德爾據說是個能打動聽眾的演講者，但她不太具備組織才華。日耳曼婦女騎士團面臨嚴重的財務腐敗指控，和其他一大堆指控，疲于反駁，于1931年初解體。騎士團負債累累，以至于作為負責人的燦德爾本人也面臨破產。此外，坊間飛短流長，盛傳燦德爾與騎士團的司機關系曖昧，還說褐衫軍有時穿著女裝出席騎士團的會議。時任納粹黨組織部長的格雷戈爾·施特拉塞爾對此做出應對，禮貌但果斷地免除了燦德爾的領導職務，并解散所有納粹黨的附屬婦女組織，于1931年7月6日代之以國家社會主義婦女聯盟（NS-Frauenschaft），該機構最初至少是一個分權的實體，地區級協會由當地的大區長官領導。然而不久，婦女聯盟大獲成功，在全國范圍內得到了女性的認同，還獨立發行婦女雜志，它的地區級領導人不僅擁有更大的自主權，而且各地區級協會之間的協調能力也得到加強。[[119]](#119_2)然而，納粹婦女的根本問題在于，她們認同納粹黨根深蒂固的男性沙文主義信念：女人的職責不是參與政治，而是待在家里生兒育女。為了爭取女性選民，婦女聯盟不得不在立場上暫時做出妥協；但從長遠看，一旦納粹黨掌權，聯盟反女權主義的女性積極分子們注定要主張女性退出公共生活。

除了為婦女設立的組織以外，納粹黨還有成立于1922年、面向14—18歲青少年的組織。它最初有個頗為冗長的名字——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青年同盟（Youth League of the National Socialist German Workers' Party），但在1926年改稱希特勒青年團（Hitler Youth）。它最初是專門為招募褐衫軍而設的機構，1929年在庫爾特·格魯貝爾（Kurt Gruber）的領導下成為魏瑪政壇上無數非正式青年團體的競爭對手，這些團體多數都是反對共和國的。希特勒青年團一開始也不太成功，甚至到1932年1月，它在柏林的團員總共也只有1,000人。[[120]](#120_2)它的后援是組建于1929年的國家社會主義學生聯盟（National Socialist School Pupils' League），以及次年成立的德意志少女聯盟（League of German Maidens）。[[121]](#121_2)上述組織無論在規模上還是在重要性上，都很快被威廉·滕佩爾（Wilhelm Tempel）于1926年組建的國家社會主義德意志學生同盟（National Socialist German Students' League）比了下去。該同盟起初也表現平平，直至1928年被巴爾杜爾·馮·席拉赫（Baldur von Schirach）接管。1907年生于柏林的席拉赫后來成為納粹運動中的常青樹和越來越重要的人物，父親是位守舊的退伍軍人，在魏瑪做戲劇導演，娶了一位富有的美國女子。席拉赫在魏瑪小鎮長大，成長于文化保守、反猶的圈子。他在寄宿學校上學，校長注重的是品格培養，而不是學術教育。哥哥的死對青年席拉赫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的哥哥于1919年10月自殺，給家人留書說自己是以身殉“國難”。1920年代中期，席拉赫正在閱讀休斯頓·斯圖爾特·張伯倫的著作，偶然讀了希特勒的《我的奮斗》之后，便轉而信奉納粹主義。1925年在小鎮聽到希特勒的演講，他的信仰又發展成為真正的英雄崇拜。他文思泉涌，寫下一首又一首歌頌納粹運動及其元首的詩歌，不久就引起了元首的注意。據說席拉赫的詩“優于其他那些種族主義蹩腳詩人的煽情之作”，并于1929年結集出版。[[122]](#122_2)

在希特勒的建議下，席拉赫到慕尼黑大學深造（但始終沒有完成學業）。在校期間，他加入了國家社會主義德意志學生同盟，很快晉升為慕尼黑大學分部的負責人。由于在這個職位上取得的成就，他于1928年被推選為同盟的總負責人，取代了威廉·滕佩爾。席拉赫清除了同盟中主張進行社會革命的勢力，領導同盟成員不遺余力地在每一所大學的學生會爭取席位。排擠掉傳統的、頗為古板的學生決斗隊和兄弟會之后，同盟贏得了爭強好斗的名聲，他們積極活動、要求解決的問題包括：限制猶太學生的人數，從而緩解課堂過于擁擠的現狀；解雇教授中的和平主義者；設立新的學科，比如人種研究和軍事科學；讓大學服務于國家利益，而不是以追求知識為目的。到1932年夏，同盟已經取得了一個被其成員大肆吹噓的成就：他們與右翼教授和當地政客聯手，迫使埃米爾·尤利烏斯·貢貝爾這個特別招人恨的猶太人、社會主義者、和平主義者和反對右翼司法偏見的斗士從海德堡大學離職，法蘭克福一家雜志興奮地宣稱，“海德堡大學就這樣在學術界開啟了第三帝國時代”。[[123]](#123_2)

席拉赫小心翼翼地避免惹惱兄弟會，很快在學生會的競選中為同盟爭得了更多選票。在志同道合的其他右翼團體的幫助下，1931年7月，同盟得以接管學生聯合會這個全國性組織。1932年，學生們投票通過了總會的“領袖原則”，完全取消競選。盡管納粹黨學生同盟的全國總人數甚至不到兄弟會的10%，但納粹黨完全控制了德國的學生代表機構。希特勒對這些成績印象深刻，于1931年10月3日任命席拉赫為希特勒青年團的負責人。[[124]](#124_2)

到1920年代末，不僅婦女、青年、大學生、中學生，德國的其他許多社會群體也都有了自己專門的納粹組織，包括公務員、戰爭傷殘人士、農場主，以及眾多其他選民群體。納粹黨對每個群體分別采取了有針對性的宣傳策略，甚至出現了一個生硬地命名為“國家社會主義工廠車間組織”（National Socialist Factory Cell Organization）的工會組織，它拉攏產業工人的努力顯然不怎么奏效，產業工人當時要么已經加入了社會主義者或天主教或共產黨的工會組織，要么因為處于失業狀態而不需要工會。[[125]](#125_2)然而，納粹黨此時對中下階層依然特別有號召力，包括手工業者、店主和個體經營者。納粹經常從其他類似的團體中拉攏這類人。比如，德意志民族主義商業雇員工會（German Nationalist Commercial Employees' Union）就在這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它向青年灌輸政治思想，引導許多青年走上了納粹道路。[[126]](#126_2)該工會成立于威廉二世統治時期，它明確表達了男性職員對于就業環境的不滿：越來越多的女性占據了秘書職位以及類似的行政崗位；銀行、金融機構、保險公司等大機構的老板不是有猶太人的信仰或血統，就是性格像猶太人。早在戰前，它就曾怒斥猶太人是導致工會成員變成無產者的罪魁禍首。[[127]](#127_2)有一位1886年出生、1912年加入該工會的基層公務員后來提到，他認為政府早在威廉二世時期就已被猶太人控制。最終，在參加了一次納粹黨集會之后，他于1932年離開民族黨，加入納粹黨，當時他寫道：“這是1912年以來我一直在尋找的組織。”[[128]](#128_2)許多來自這樣背景的納粹老黨員肯定也是這樣想的。

施特拉塞爾鼓勵在黨內建立這種極其精密的分支結構，盡管這些不同分支中有許多——比如希特勒青年團和工廠車間組織——不但成員寥寥無幾，而且似乎不會很快有長足的發展。這樣做是因為他有一個長遠目標：設立這些分支旨在形成一個基礎，等到希特勒掌權之后，可以在此基礎上建立一個由各種已經納粹化了的社會機構運營的國家。施特拉塞爾投入大量精力、施展各種手段，打造這個處于胚胎期的納粹社會秩序。在短期，這種分支結構把納粹黨的競選感召力傳遞給德國社會的幾乎每個選區，激發出那些原本不太有政治傾向的社會機構的政治興趣。這意味著，假如各分支突然吸收到大批新成員，那么納粹黨就能夠輕而易舉地發展壯大。把整個結構聚合為一體的，是對領袖的無條件忠誠，領袖此時已擁有絕對的權力，在一群親信日復一日的吹捧稱頌中，他顯得越來越有個人魅力。[[129]](#129_2)

[\*](#_212) 亞歷山大大帝（公元前356年—公元前323年），馬其頓國王，曾征服波斯、埃及、敘利亞、美索不達米亞、巴克特里亞和旁遮普。

[†](#_213) 文法學校（grammar school），16世紀前后出現的注重拉丁語教育的學校，后成為教授語言、歷史、科學等學科的中學。

[‡](#_214) 狂暴武士（Berserker），北歐傳說中的武士，作戰時狂暴興奮、兇猛如狼。

[§](#SS_14) 保民官（tribune），古羅馬由平民選出的保護公民權利的執政者。

[¶](#P_14) 獨裁官（dictator），古羅馬在緊急情況下由元老院任命的擁有絕對權力的行政長官。

[\*\*](#_215) 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制（system of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by party list），選民把選票投給自己所支持的政黨，而不是投給特定的候選人；最終根據各政黨取得的選票比例分配議席。

[††](#_216) 終止回贖權（foreclosure），抵押人未在規定期限內清償抵押債務時，抵押權人有權起訴、請求終止抵押人對抵押物的回贖權，由抵押權人取得抵押物的所有權或者變賣抵押物以清償債務。

## 第四節 使命感的來源

### 一

納粹黨在1920年代晚期之前的發展，倚靠的是其活躍分子的干勁和狂熱。假如沒有他們，它可能只是一個普通政黨。第三帝國的建立，相當程度上靠的是褐衫軍和納粹黨中活躍在街頭的普通成員。那么，是什么讓青年們以執著得令人驚駭的使命感投入納粹運動？褐衫軍暴力的源泉在哪里？希特勒的個人魅力顯然發揮了部分作用；然而，許多人，尤其是北德派，加入納粹黨實際上并不是因為希特勒。納粹運動的活力具有更為深刻的根源。許多納粹重要人物的自傳和日記提供了一些線索。有個極好的同時代資源，為我們探究納粹積極分子的思維模式提供了一些獨特的視角。1934年，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社會學家特奧多雷·阿貝爾（Theodore Abel）得到機會，與納粹黨合作舉辦一場征文比賽，要求1933年3月1日之前加入納粹黨或褐衫軍的人寫一份簡短的自述。寄來的稿子有數百篇。雖然納粹黨和投稿者都把這看作一次機會，展示他們對黨的忠誠與奉獻精神，以此給美國人留下深刻印象，但阿貝爾堅持要求大獎應授予最誠實、最值得信任的敘述，他的堅持似乎確保了這些自述具有一定程度的準確性，至少它們可以得到核實。[[130]](#130_2)

基層的納粹積極分子對羅森貝格、張伯倫、斯賓格勒等知識分子的復雜理論一竅不通，就連拉加德（Lagarde）[\*](#_225)和朗本這樣的通俗作家也主要是對有教養的中產階級具有吸引力。遠比他們有影響力的，是那些長盛不衰的反猶宣傳家，例如特奧多爾·弗里奇，他的《猶太人問題手冊》（Handbook on the Jewish Question）于1888年面世，到1933年已出到第40版。弗里奇的錘子出版社（Hammer Verlag）挺過了一戰的劫難，繼續發行大量通俗小冊子和活頁文章，在普通納粹黨徒中擁有眾多讀者。[[131]](#131_2)一位沖鋒隊員于1934年寫道：

戰后，我變得非常關心政治，如饑似渴地研讀各種有政治傾向的報紙。1920年，我初次在右翼報紙上看到一份反猶期刊的廣告，于是訂閱了特奧多爾·弗里奇的《錘子》（Hammer）。在這份期刊的幫助下，我開始了解到猶太人對民眾、對國家、對經濟的毀滅性影響。直至今日我仍然必須承認，這份期刊是真正把我引向阿道夫·希特勒的偉大運動的橋梁。[[132]](#132_2)

不過，更重要的激勵還是來自納粹宣傳的基本元素——希特勒和戈培爾的演講、進軍、標語、游行。普通納粹黨徒接收觀點，更有可能是通過納粹報刊、競選宣傳冊和壁報等宣傳工具，而不是通過嚴肅的思想理論小冊子。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初的納粹黨普通積極分子看來，納粹思想的核心是強調社會團結，即所有德意志人結成種族統一體，極端民族主義以及對希特勒的崇拜則屬于次要方面。比較而言，僅有少數人重視反猶，在這些人中，大部分也認為反猶只是附帶之事。越是年輕的納粹，就越不看重思想體系，他們更重視的是諸如對德意志文化和希特勒的領袖作用的強調。相比之下，反猶思想最強烈的是上一代納粹黨徒，這表明活躍于戰前的反猶團體以及民族主義的家庭環境，對于許多人的成長具有潛移默化的影響。[[133]](#133_2)

納粹黨徒加入該黨的準軍事團體之前，通常于1914—1918年在前線服役，然后參加極右翼組織，比如圖勒學會或自由軍團。[[134]](#134_2)例如，青年魯道夫·霍斯（Rudolf Höss）就是沿著這一路徑加入納粹黨的，后來成為奧斯維辛集中營（Auschwitz）的指揮官。他1901年生于巴登—巴登（Baden-Baden），在德國西南部一個天主教家庭長大。他的父親是推銷員，有意培養他當牧師。據霍斯說，父親不但把強烈的責任感與服從意識灌輸給他，還講述了自己過去當兵時在非洲的經歷，以及傳教士們的無私與英雄主義，霍斯對這些故事非常著迷。霍斯后來寫道，他不再信仰天主教是因為曾在做告解時向神父吐露了一個秘密，但被對方出賣。戰爭爆發時，他加入紅十字會，后來在1916年隨父親的老部隊赴中東服役。戰爭結束時，霍斯的父母都已去世，他加入自由軍團在波羅的海沿岸的分隊，親身體驗了內戰的殘酷。

回到德國，霍斯加入自由軍團余部的一個秘密組織，并在1922年和他的同志一起殘忍殺害了一個被他們認定為打入他們內部的共產黨間諜。他們先用棍棒把那人打得血肉模糊，又用刀割喉，然后用左輪手槍結果了他的性命。霍斯被逮捕，關進勃蘭登堡監獄，他后來寫道，他在監獄里意識到罪惡思想不可救藥的本質。他震驚于獄友“骯臟放肆的語言”，震驚于獄方的管理方式已讓那里成為犯罪學校，而不是改造罪犯的地方。霍斯干凈、利索、有條理、守紀律，很快成了模范囚犯。一些獄卒的粗魯欺凌和腐敗使他想到，以更加誠實、更加人道的方式對待囚犯，也許會有好的效果。但是在他看來，不少獄友完全無藥可救。[[135]](#135_2)霍斯在被捕前幾個月加入納粹黨。1920年代剩下幾年的大部分時間里，他本應在獄中度過，然而像許多同類囚犯一樣，刑期遠未服滿他就被釋放了，因為國會中的極左翼與極右翼議員投票通過了一項決議，對政治犯實行大赦。[[136]](#136_2)顯然，出獄之后，納粹黨為霍斯提供了他迫切需要的紀律、秩序和使命感。

霍斯殺人的同伙之一、與他同為羅斯巴赫自由軍團（Rossbach Free Corps）成員的馬丁·博爾曼（Martin Bormann）是郵局職員之子，生于1900年，接受的是以當農場經理為目標的職業培訓。他在戰爭期間入伍，但被分配到一支衛戍部隊，從未打過仗。戰后他在梅克倫堡的農場工作，然而與霍斯一樣，博爾曼也無法適應平民生活。他與自由軍團聯系，讓他們把農場作為基地。除了自由軍團，博爾曼還參加了另一個極右翼組織“打擊猶太人囂張氣焰協會”（Association Against the Arrogance of the Jews），該協會規模很小，是個沒什么影響力的邊緣團體。博爾曼在兇殺案中的罪行不如霍斯嚴重，只需坐一年牢。他于1925年2月獲釋，1926年底成為納粹黨的全職雇員，處理大量行政事務。先是在魏瑪工作，后來在慕尼黑。博爾曼毫無演說才能，體格也不像霍斯那樣強壯尚武，他的長項是當納粹黨及其成員的保險專家，為處于困境的褐衫軍籌措救濟金、安排其他救濟措施，借此逐漸使自己成為納粹運動中不可或缺的人物。他的主要身份是行政人員，然而這掩蓋不住其政治使命感的狂熱本質。與霍斯和其他許許多多納粹黨徒一樣，對于一戰中德國的戰敗，博爾曼的反應也是倒向了最極端的立場——憤憤不平的民族主義、瘋狂的反猶主義以及對議會民主制度的仇恨。剛與希特勒接觸，他便佩服得五體投地，不久，他那無限的、無條件的敬仰與忠誠也給納粹元首留下了深刻印象。對黨內其他層級的成員，特別是對基層黨員，他則顯示出全然不同的一面：處事冷酷、野心畢露，這種風格最終使他成為第三帝國的關鍵人物之一，尤其是在帝國后期，即二戰期間。[[137]](#137_2)

顯然，自由軍團確如人們所說，是“納粹先鋒”，因為1920年代中期的納粹黨領導干部大部分都從自由軍團而來，包括霍斯和博爾曼這類人，乃至更多稍微年長一些的人物，他們在戰爭中曾鏖戰沙場，獲得了軍事經驗。[[138]](#138_2)然而此時，年輕一代已加入納粹黨，他們是戰后的一代，渴望效仿傳說中前線將士的英勇行為。有些原先是共產黨，吸引他們轉投納粹的，是政治上的極端主義、行動主義和暴力，而與意識形態無關。“我于1929年退黨，”其中一人寫道，“因為我再也不想聽命于蘇聯了。”不過，對于這位激進主義分子來說，暴力是一種生活方式。他繼續參加各種各樣的政黨集會，與他的老戰友們并肩投入街頭斗毆，直至當地的納粹頭目給了他一個職位。[[139]](#139_2)暴力對這些人來說就像興奮劑，顯然它對魯道夫·霍斯的作用就是這樣。他們往往不甚了解自己是為什么而戰。一位年輕的納粹黨徒寫道，看見對手企圖沖散納粹大會，“我本能地成了納粹黨人”，盡管他還不了解該黨的目標。[[140]](#140_2)再比如，有個人于1923年加入納粹運動，生活在幾乎不曾間斷的暴力行動中，十年里的大部分時間都在遭受毆打、刀刺和逮捕，正如他在自述中詳細描述的那樣，正是這些沖突，而不是納粹運動的實際理念，賦予了他人生的意義。對于一位1906年生于社會民主黨人家庭的青年來說，其使命感的核心是反共。他后來說：“我在沖鋒隊‘殺手風暴’小組的經歷太精彩了，也可以說困難重重、難以描述。”[[141]](#141_2)

關于沖鋒隊的活動，有一個雖然相當常見，但特別生動的描述，是一位生于1898年的教師提供的。他在一戰中上過前線，1920年代初參與極右翼活動，后來在1929年加入納粹黨。一天晚上，他與所在的褐衫軍小組被召集去為一場在附近小鎮舉行的納粹集會擔任警衛，防范“赤色分子”：

我們在小鎮的入口集合，戴上白臂章，然后我們這支大約250人的縱隊響雷般地開拔了。沒有武器，沒有棍棒，只有緊握的拳頭，我們嚴守鋼鐵般的紀律，齊步走進會議廳前發出噓聲和尖叫的人群。他們手里拿著棍子和柵欄。當時是晚上10點。我們在街道中間調度周旋了一陣，把人群推到墻邊，清出街道。這時，有個木匠開著小卡車穿街而過，載著一口黑色的棺材。他開過去的時候，我們當中有個人說：“瞧著吧，看我們把誰弄進去。”尖叫聲、吶喊聲、口哨聲、咆哮聲，此起彼伏，越來越響。

我們的縱隊分成兩排穩穩站定，精神飽滿。信號傳來，我們齊步走進大廳，里面有幾百個搗亂分子正在打斷我們的演講人。我們來得正好，步調一致地沿著墻走，直到形成一個環，把他們包圍起來，只在入口處留了一個缺口。哨聲響起，我們收緊人環。10分鐘后……我們把他們轟出了門外。會議繼續，外面的壞蛋全來了。我們護送演講人后撤，再一次圍成封閉的環，隔開了亂哄哄的暴徒。

在這位沖鋒隊員看來，“馬克思主義者”是敵人，正如他們是許多退伍老兵的敵人。老兵們“依靠袍澤之誼浴血奮戰，這種精神穿越戰爭祭壇的硝煙，正在走進已然覺醒的德國民眾的心里”。[[142]](#142_2)

### 二

上述這類“老戰士”自豪地列出對手加諸他們的傷害與侮辱，那些他們不得不承受的“迫害、騷擾、鄙視和嘲笑”只不過堅定了他們的決心。[[143]](#143_2)據一位生于1905年的納粹黨積極分子說，在伊達爾—奧伯施泰因（Idar-Oberstein）舉行的一次集會上，有400位沖鋒隊員到場，包括他自己：

在怒吼和噓聲的干擾下，我們的4位演講人一個接一個地發表了演說。但在隨后的討論中，當一位對話者因為說“我們美麗的小鎮不歡迎褐色瘟疫”而受到斥責時，爆發了騷亂，大家用啤酒杯、椅子之類的東西混戰起來。幾分鐘后，房子塌了，所有人都跑了出去。那天我們帶回來7位身負重傷的同志。對方朝我們扔石頭，雖有警察的保護，但我們還是不時受到襲擊。[[144]](#144_2)

然而，納粹沖鋒隊對社會民主黨所懷有的像對共產黨一樣的深仇大恨，只有從這個角度才能夠理解：他們覺得自己總是不斷地受到攻擊，這些攻擊不僅來自隸屬于社會民主黨的準軍事組織“帝國國旗團”，在許多地區還來自警察，至少在普魯士州，警察由社會民主黨的部長管轄，比如卡爾·澤韋林和阿爾貝特·格熱辛斯基。沖鋒隊憎恨共和國的另一個緣由，正如一位隊員所說，是“警察和政府對我們施加的恐怖手段”。[[145]](#145_2)

痛毆或者殺死自己眼中的帝國之敵就要遭到逮捕，這讓他們感到憤怒；有時他們會被判刑入獄，于是又譴責“馬克思主義司法當局”和魏瑪共和國的“腐敗”。[[146]](#146_2)他們無比痛恨“赤色分子”，例如有位年輕的納粹黨徒直到1934年依然在痛罵“赤色洪水……成群的赤色雇傭軍，潛伏在暗處”；再比如有位褐衫軍成員這樣形容：“赤色殺人狂徒……成群結伙大嚷大叫……滿腔仇恨、怒形于色，值得犯罪學家研究一下。”[[147]](#147_2)無數的沖突不斷給他們的仇恨火上澆油，直到引發可怕的事件，比如1927年3月27日共產黨與褐衫軍之間在柏林開往利希滕費爾斯（Lichtenfels）的火車上那次臭名昭著的槍戰。褐衫軍拿共產黨的犯罪行為來反襯他們自詡的無私的理想主義。有位沖鋒隊員自豪地寫道，1920年代末的斗爭“需要每位同志做出精神上和經濟上的雙重犧牲。一個晚上接著一個晚上，我們把自費印刷的傳單散發出去。每個月都有一次集會……我們這支由5至10人組成的本地小分隊總是為此欠下60馬克的債務，因為如果不交預付款，沒有哪家客棧的老板肯把大堂租給我們”。[[148]](#148_2)經常有人說，許多人加入褐衫軍，僅僅是因為該組織為他們提供免費的食物、酒水、衣服和住所，何況還有刺激、野蠻的消遣，這種說法不足以解釋激勵著許多褐衫軍成員的那種狂熱。只有最早加入的積極分子期冀得到一份工作或者救濟金，年輕人對此并不看重。[[149]](#149_2)納粹學生領袖經常因為自掏腰包印刷海報和小冊子而負債累累。[[150]](#150_2)很多其他人肯定也有類似經歷。

當然，這些投稿給美國社會學家的自述，必定會強調作者的自我犧牲和奉獻精神。[[151]](#151_2)然而，除非相信他們確實常常感到自己是在為黨的事業做出犧牲，否則我們將難以充分理解沖鋒隊員的狂熱與仇恨心理。希特勒在1932年1月的演講中提醒聽眾注意這一點：

請不要忘記，現在，每天有成千上萬的國家社會主義黨黨員做出犧牲。他們爬上卡車、保衛集會、舉行游行，奉獻了一夜又一夜，到黎明時分才離開，然后有的回到作坊和工廠，有的去領取微薄的失業救濟金；他們購買制服、襯衫、徽章，甚至用少得可憐的積蓄支付交通費。請相信，當他們這樣做的時候，就已經展現了理想的力量，偉大的理想！[[152]](#152_2)

納粹黨倚賴這種使命感。該黨之所以如此有力量、有活力，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不像“資產階級”政黨和社會民主黨那樣，不同程度地依賴大企業或者工會等官僚機構的資助，更不像使用蘇聯經費的共產黨那樣仰仗外國勢力的秘密資助。[[153]](#153_2)

許多人是被希特勒的煽動演說爭取過來的。1920年代末，演說被安排在露天集會上，人山人海、場地開闊，這使希特勒的煽動具有了比以往更加強烈的沖擊力。有位生于1908年的年輕民族主義者，以前曾參加集會，現場聽過興登堡和魯登道夫等極右翼豪杰的演說，后來茅塞頓開，是因為他

親耳聆聽了領袖阿道夫·希特勒的演說。這之后，我要做的只有一件事，與阿道夫·希特勒一起走向勝利，否則就為他而死。領袖的品格令我心悅誠服。誰以赤子之心去了解阿道夫·希特勒，誰就會全心全意地愛他。愛他，不是出于功利心，而是為了德國。[[154]](#154_2)

另外還有許多類似的自述。例如，有位生于1903年、持反猶立場的金屬加工工人，他在1927年希特勒的一次集會上發現，“從我們的領袖身上，散發出一種使我們每個人都強大起來的能量”；還有一位生于1907年的沖鋒隊員，說自己1929年在紐倫堡時拜倒在希特勒腳下：“他麾下的沖鋒隊員在火炬的照耀下從他身邊齊步走過，一望無際的火焰之海涌過古老的帝國首都的街道，此刻他那藍色的眼睛是多么炯炯有神啊。”[[155]](#155_2)

納粹黨的感召力，很大程度是因為它許諾要結束在整個魏瑪共和國時期困擾著德國的政治分歧。有位18歲的職員參加了1929年地區選舉的集會，折服于納粹演說者

對全體德國人民做出的真摯承諾。德國人的大不幸，在于分裂成了如此之多的政黨和階級。現在終于有了民族振興的務實方案！取締政黨！消滅階級！真正實現民族團結！這些是我可以全身心地為之奉獻的目標，毫無保留。[[156]](#156_2)

最后，還有少數人是通過閱讀政治或思想小冊子而轉信納粹、開始積極參加納粹運動的。話語確實重要，但不是每個人都被希特勒的演說迷住。例如，像梅利塔·馬施曼（Melita Maschmann）這樣嚴肅的、理想主義的中產階級納粹青年，欽佩希特勒從默默無聞一躍成為“人民之子”，然而即使是納粹黨的年度大會，她也忙得像她后來所寫的那樣，“抽不出時間‘沉湎于’如醉如癡的癲狂”。她覺得游行和表演既無聊又沒意義。在她看來，納粹主義更應該是一種愛國理想，而不僅僅是對某個領袖的崇拜。[[157]](#157_2)對于納粹主義的中產階級支持者來說，或許尤其對于中產階級女性來說，街頭暴力常常是需要勉強容忍或者刻意忽視的事情。

許多中產階級人士接受納粹思想時頗費躊躇，即使入了黨，他們所表現出的投入程度，往往也遠低于特奧多雷·阿貝爾采訪過的那些年輕褐衫軍。很大一部分中產階級黨員在組織里沒待多久就退出了。納粹黨成立以來，其支柱一直是中低階層，但到1930年代初，該黨的影響力開始超出此階層。納粹頭目總是急于宣稱擁有工人階級的支持，因此經常把實際上屬于其他階層的黨員登記為工人。根據1935年納粹黨的一次內部普查所做的詳細研究顯示，10年之前的1925年，在各地黨員人數的標準記錄中，被歸類為工人階級的人數比實際數字多了一倍。也就是說，在德國第二大城市漢堡，這一數字約占當地納粹黨員總人數的10%。[[158]](#158_2)工薪人士似乎也屬于最容易脫離納粹黨的社會群體，因此這個群體最不可能出現在1935年的數據中，而相關研究中的數字計算大多以1935年的數據為基礎。然而漢堡是傳統的勞工運動中心，納粹黨難以抗衡當地的勞工力量，無法在那里取得任何進展。薩克森的許多地區，掙周薪的體力勞動者在納粹黨黨員中所占比例較高，因為當地勞工運動的力量較弱，經濟以小規模的傳統企業為主，迥異于那些現代的、生產線高度合理化的工業中心，比如柏林和魯爾。在薩克森，那些一直處于無業狀態，因此從未加入工會的青年特別容易受到納粹黨的感召。1920年代末，按照基本的經濟概念，該省可能有多達三分之一的納粹黨員屬于工人階級。城鎮和鄉村的中低階層黨員在納粹黨中所占的比例，遠遠高于這個階層在全國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但是，到1930年代初，隨著納粹黨的表現越來越得體，薩克森的納粹黨內中高階層黨員的比例也在提高。漸漸地，納粹黨擺脫了卑微的地位，開始從德國的社會精英階層吸收黨員。[[159]](#159_2)

### 三

在1920年代中期入黨的新一代納粹領導人中，有一位將在第三帝國發揮特別重要的作用。乍看之下，幾乎沒人會想到海因里希·希姆萊終將飛黃騰達。1900年10月7日，他出生于慕尼黑一個受人尊敬、教養良好的中產階級家庭，父親是天主教學校的教師，思想相當保守，因此曾一度作為理想人選，于1890年代被聘為一位巴伐利亞皇室成員的私人教師。希姆萊幼年體弱多病、視力不佳，念過幾所不同類型的學校，但他接受較為扎實的學術訓練是在慕尼黑和蘭茨胡特兩地的文法學校。他在校時的朋友、后來成為著名左翼歷史學家的格奧爾格·哈爾加滕（Georg Hallgarten）證實了希姆萊的智力與才能。學校成績單上的評語說，希姆萊嚴謹、勤奮、有抱負、有才華、彬彬有禮，從各方面看都是一位模范學生。然而，他那位愛國的父親千方百計把他送進軍隊，甚至宣稱不惜為此中斷兒子的學業。青年希姆萊的日記和讀書筆記顯示，他堅信1914年的神話：戰爭是人類成就的頂峰，斗爭是人類歷史和人類生存的動力。但希姆萊最終只是在預備士官隊接受訓練，從未上過戰場。他顯然屬于典型的后方一代——痛悔沒能在前線作戰，因此把后來的大部分生命都用于設法彌補這個重大的人生缺憾。[[160]](#160_2)

以優異成績通過畢業考試之后，希姆萊聽從父親的建議，到慕尼黑的技術高中（Technical High School）繼續學習農藝。在那里，他同樣出類拔萃，1922年畢業時得到的評語是“非常優秀”。他還加入了決斗兄弟會，費盡周折找到一位愿意認真對待他、接受他挑戰的劍手，結果希姆萊如愿以償地在臉上留下了傷疤。但他同時加入了卡爾的居民國防軍，后來又受到恩斯特·羅姆的影響，羅姆的軍事熱情感染了他。希姆萊當時投身的極右翼陣營將他引向了革命的反猶立場（revolutionary antisemitism），到1924年，他猛烈抨擊“黑色與紅色國際（black and red International）、猶太人與教宗至上論、共濟會與耶穌會、商業精神與懦弱的中產階級這一大窩禍患”。[[161]](#161_2)大腦門、腦后和兩鬢剃得很短、蓋式發型、圓框眼鏡、后縮型下巴、鉛筆胡，希姆萊的外貌酷似他父親當校長時的樣子，一點兒也不像狂熱的民族主義街頭斗士。幾個月后，在慕尼黑11月8—9日未遂暴動的起始階段，羅姆的帝國戰旗團曾短暫占領巴伐利亞戰爭部，當時加入戰旗團某分隊的希姆萊手中揮舞的是一面軍旗，而不是手槍。[[162]](#162_1)

暴動失敗后，希特勒入獄、被禁言，納粹黨陷入混亂；希姆萊則成功逃脫，未被逮捕，因此有機會成為納粹運動的后起之秀。他相當識時務地搭上了格雷戈爾·施特拉塞爾的順風車，先是擔任其秘書，后來出任兩個地區的黨部副書記，以及全國宣傳工作副主管。但他并不是施特拉塞爾的信徒，因為在此之前，希姆萊已經對希特勒心悅誠服，這并不是因為讀了《我的奮斗》（他在筆記里批評該書：“前幾章關于其青年時代的敘述，破綻迭出”），而是因為身兼數職的希姆萊在工作中得以親炙希特勒，其中當然包括聆聽希特勒的演說。青年希姆萊當時年僅25歲左右，正在暴動之后波濤洶涌的準軍事政治海洋中隨波逐流，是希特勒給了他主心骨，使他有了一個可崇拜的領袖、一個可追求的事業。希姆萊于1925年加入剛剛重組的納粹黨，自此越來越把納粹元首奉為英雄，對他無限崇拜；他把希特勒的畫像掛在辦公室的墻上，據說有時候甚至與畫像談話。[[163]](#163_1)

他于1926年結婚[†](#_226)，妻子比他大7歲，她在神秘學、藥草學、順勢療法等方面的非傳統觀念深深影響了他，他后來試過其中的一些，還強迫下屬接受。雖然婚姻未能讓希姆萊刻骨銘心，但這些觀念卻讓他銘記在心。他漸漸不再像少年時代那樣循規蹈矩地虔誠信仰天主教，轉而對“血與土”充滿熱情，加入了民族主義拓殖團體阿塔曼斯（Artamans），魯道夫·霍斯也是該團體的成員。在這里，希姆萊受到了醉心于“北歐”日耳曼人種論的里夏德·瓦爾特·達雷（Richard Walther Darré）的影響。達雷1895年生于阿根廷，在與南美不太相稱的英國溫布爾登（Wimbledon）求學，一戰期間在德國軍隊服役。他后來成為選擇性動物育種專家，這個專業促使他鉆研“血與土”政治學，盡管沒有馬上加入納粹黨。希姆萊吸收了達雷關于日耳曼人種之命運的定見：日耳曼血統優越于斯拉夫血統，應該保持日耳曼血統的純潔，純種的日耳曼農民階級對于確保日耳曼人種之延續具有關鍵作用。出于對農民階級的迷戀，希姆萊一度自己經營農場，但是管理不善，因為他花了太多時間在政治運動上，而且時機也不好，恰逢農業不景氣。[[164]](#164_1)

1929年1月6日，希特勒任命忠心耿耿的希姆萊執掌他的私人警衛隊——黨衛隊（Schutzstaffel），它很快就以其縮寫“SS”為人們所熟知。黨衛隊的前身是組建于1923年初的一支小分隊[‡](#_227)，充當希特勒的保鏢，并保護納粹黨總部。它于1925年重新組建，因為希特勒意識到，自己所需要的無條件忠誠，永遠不可能從羅姆領導的褐衫軍那里得到。黨衛隊最初的指揮官是尤利烏斯·施雷克（Julius Schreck），希特勒入獄之前，施雷克是褐衫軍“沖鋒隊”隊長。從一開始，黨衛隊就被構想為一支精銳隊伍，有別于褐衫軍這種包羅了三教九流的群眾性準軍事組織。在1920年代中期的黨內傾軋中，黨衛隊多次換帥，盡管歷任領導確實把黨衛隊打造成了一支紀律嚴明、緊密團結的精英團隊，但都沒能確保它獨立于權力越來越大的褐衫軍。他們未能辦成的事情，希姆萊成功地做到了。

希姆萊看不上原先招募來的粗鄙之輩，他按照自己的設想著手打造一支真正的精英團隊，請來了退役軍官和原先自由軍團的成員，前者包括波美拉尼亞的貴族埃里克·馮·登·巴赫—熱勒維斯基（Erich von dem Bach-Zelewski），后者包括弗里德里希·卡爾·馮·埃貝斯泰因男爵（Friedrich Karl, Baron von Eberstein）。希姆萊接任時黨衛隊只有290人，到1929年底增至1,000人，一年后增至近3,000人。他不顧褐衫軍領導層的反對，于1930年說服希特勒讓黨衛隊完全獨立，配發新制服，以黑衫取代褐衫，建立新的、等級森嚴的半軍事化結構。由于褐衫軍內部的不滿和焦躁情緒逐漸加劇，獨立行動的威脅也在增加，因此希特勒讓黨衛隊轉型為一種黨內警察。它變得愈加詭秘，不僅收集黨外敵人的情報，也開始收集褐衫軍領導層的機密。[[165]](#165_1)

有了黨衛隊，納粹運動的組織結構基本成型。到1920年代末，希特勒已經成為納粹運動中無可爭議的獨裁者，成為日益高漲的個人崇拜的對象，成全他的因素包括當時的形勢、他自己的演說能力與冷酷無情，以及極右翼集團對強人領袖的極度渴求。納粹運動內部依然存在矛盾，并且將在1934年之前的幾年里引人注目地浮出水面。領導層中依然有人隨時準備批評希特勒，一旦覺得有必要，就會采取與之不同的路線，比如施特拉塞爾和羅姆。但希特勒已經扶植起一群無條件忠于他的重要親信，比如戈培爾、戈林、赫斯、希姆萊、羅森貝格、席拉赫和施特萊歇爾。在這些人的領導下，并且得益于施特拉塞爾的組織才能，到1929年，納粹黨已成為一個復雜的、組織良好的政治實體，其號召力幾乎觸及每一個社會群體。它的宣傳手法很快就變得越來越老練；它的準軍事團體在街頭與共產黨的紅色陣線戰士同盟和社會民主黨的帝國國旗團展開較量；它內部的警察力量，即黨衛隊，隨時準備采取行動打擊黨內的異議者和抗命者。它已經采納、修改并且詳盡闡述了一種粗糙的、大部分非原創的，卻被狂熱信奉著的意識形態，其核心是極端的民族主義、滿腔仇恨的反猶主義和對魏瑪民主制度的蔑視。它下定決心，要憑借廣大選民的支持和兇蠻的街頭暴力取得政權，然后撕毀1919年的和平條約，重新武裝，重新征服失去的東部和西部領土，把東中歐和東歐拓殖為德意志民族的“生存空間”。

納粹運動的核心是崇尚暴力，這主要來源于自由軍團。在1929年之前，暴力天天在街頭上演。納粹黨蔑視法律，毫不掩飾自己相信的是強權即公理。納粹黨還摸索出一種辦法，在褐衫軍以及納粹運動的其他參與者實施暴力或者犯罪的時候，能夠讓黨的領導層規避法律責任：希特勒、戈培爾、大區長官等領導人在下命令實施暴力時，措辭要含糊，他們的下屬自然聽得懂弦外之音，會立即投入戰斗。這個招數很有效，它讓越來越多的德國中產階級乃至一些上流社會人士相信，對于褐衫軍的街頭喋血、酒館斗毆以及集會上的惹是生非，希特勒及其直屬下級并不真的負有責任，這個印象又因褐衫軍頭目的說辭而得以強化，他們一再堅稱自己是獨立行動的，與納粹黨上司無關。1929年，希特勒吸引到了一些人脈廣闊之士的支持、同情乃至某種程度的資助，特別是在巴伐利亞。納粹運動已拓展到全國范圍，爭取到大量選民的支持，尤其是德國北部和弗蘭肯新教教區那些備受經濟危機困擾的小農場主。

然而，這一切均無法掩蓋納粹黨在1929年秋依然明顯處于政壇邊緣的事實。它在國會中僅有幾個席位，只能與眾多邊緣型右翼組織展開競爭，其中一些比納粹黨規模更大、支持率更高，例如所謂的經濟黨（Economy Party）；但這些組織與民族黨和“鋼盔”等主流的右翼團體相比，又都相形見絀。不僅如此，社會民主黨、中央黨和民主黨雖然已不再擁有多數選民的支持，但這三個魏瑪共和國的主流政黨依然是執政黨，“大聯合政府”中還包括古斯塔夫·施特雷澤曼所屬的人民黨，施特雷澤曼長期擔任德國的外交部長，立場溫和，成就卓著。共和國似乎已安然渡過1920年代初的暴風雨——通貨膨脹、法國占領、武裝沖突、社會混亂，駛入了較為平靜的水域。如果某個極端主義政黨，比如納粹黨，想要贏得群眾的支持，就需要借助一場浩大的災難。1929年，紐約證券市場暴跌，經濟隨之驟然崩潰。它的機會來了。

[\*](#_222) 指保羅·拉加德，德國圣經學者和東方學家。他強烈支持反猶主義，反對基督教，支持種族達爾文主義，被認為是法西斯和納粹主義意識形態最有影響的支持者之一。——編注

[†](#_223) 希姆萊的結婚時間應在1928年。

[‡](#_224) 最初隸屬于沖鋒隊。

# 第四章 通往權力之路

## 第一節 大蕭條

### 一

“經過長時間漫無目標地從一座城市流浪到另一座城市，”一位21歲，來自埃森（Essen）的失業印刷工在1932年秋寫道，“我一路來到漢堡港。但大失所望！這里的情形更加悲慘，失業率比我預計的還要高，我原指望能在這里找到工作，但希望破滅了。我該怎么辦？這里沒有親戚，我可不想流落街頭。”當時越來越多的人流落在德國城鎮的大街小巷，據官方估算，人數在20萬至50萬之間。這位年輕人最終沒有淪落到與無家可歸者為伍的境地，他得到了由教會運作的一個義工項目的幫助。[[1]](#1_4)但多數人并無這樣的運氣。失業摧毀了人們的自尊心，損害了他們的地位，對成年男子尤其如此，因為在社會上，男人的地位、他人的認可乃至自我認同，主要都來自他們所從事的工作。1930年代初隨處可見的景象是，男人站在街角，脖子上掛著牌子：“找工作，什么工種都行”。當社會學家問小學生對此有什么看法時，孩子們通常回答說，失業者的社會地位降低了，

因為失業的時間越長，他們就變得越懶，越來越自卑，因為總是看到別人衣著體面的樣子。他們感到氣惱，因為他們也想那樣，于是走上犯罪道路……他們還想活下去！老年人往往完全失去了求生的欲望。[[2]](#2_4)

1932年12月，有人看到孩子們在玩“失業登記”的游戲。一位調查員請其中幾人寫下簡短的自述，孩子們寫的主要內容也是失業。“我爸爸已經失業三年多了，”有位14歲的女生寫道，“我們全家以前一直相信爸爸總有一天能再找到工作，可是現在就連我們這些小孩兒都不抱什么希望了。”[[3]](#3_4)

長期失業造成的影響因人而異。對于找工作，年輕人可能比中年人樂觀。失業時間越長，人就越沮喪。人們在1932年夏接受采訪時所顯示的態度，遠比18個月前的民意調查結果更加悲觀。打算結婚的人推遲了婚期，已婚夫妻推遲了生育計劃。小伙子們漫無目標地在街上閑逛、無精打采地待在家里，靠打牌、逛公園或者一圈又一圈沒完沒了地乘坐柏林的環線地鐵打發時間。[[4]](#4_4)在這種形勢下，做事總比不做事強，無所事事往往使人意志消沉。許多失業的成年男子，甚至少男少女，都在設法謀生，他們沿街叫賣、在街頭賣藝、做清潔工、在街頭擺攤或者從事收入微薄的諸多傳統零工中的任何一種。一群群兒童出沒在柏林時髦的夜總會，“照看”富人的汽車，這是收取保護費的一種原始形式，成年人也用另一種不那么無害的方式收保護費。非正式的遠足俱樂部和工人階級青年團體很容易變成所謂的“野人幫”，這些青年團伙在廢棄的大樓里碰頭，搜尋食物，以偷竊為生，與敵對團伙打架，經常與警察沖突。犯罪率并沒有像通脹期間那樣飆升，但在1929—1932年的柏林，因盜竊而被逮捕的人數增加了24%。不分男女的賣淫現象越來越明顯、越來越普遍，這既是魏瑪共和國性寬容氛圍的結果，也是其經濟崩潰的產物，賣淫的公開程度讓正派人士感到震驚。在社會底層，沿街叫賣和街頭擺攤變成了乞討。[[5]](#5_4)德國社會似乎陷入了苦難與犯罪的泥沼。在這種困境中，人們開始抓住政治的稻草：任何東西，無論多么極端，似乎都強于他們當時所置身的毫無希望的亂局。

這種局面是如何形成的？經濟改革于1923年遏制住了大通脹，隨之而來的是失業率居高不下。然而到1930年代初，經濟形勢極度惡化。德國經濟在通脹之后得以復蘇，主要依靠的是來自全球最大經濟體美國的巨額投資。德國的高利率吸引了資本的流入；但關鍵是，再投資主要采用短期貸款的形式。德國企業在促進生產的合理化和機械化的過程中，逐漸嚴重依賴這種資金，克虜伯和聯合鋼鐵公司等企業都借貸了巨額資金。美國企業直接在德國投資，福特汽車在柏林和科隆（Cologne）設有工廠，通用汽車于1929年買下歐寶汽車（Opel）在法蘭克福附近呂塞爾斯海姆市（Rüsselsheim）的工廠。德國各銀行用外國貸款為它們自己在德國企業的投資項目進行融資。[[6]](#6_4)這是德國工業和銀行業的內在不穩定因素，并在1920年代末引發了災難。

1928年，面對迫在眉睫的經濟衰退，主要工業國都開始對貨幣采取限制措施，美國逐漸減少在海外放貸。這些是保存黃金儲備的必要措施，在金本位時代，黃金儲備是金融穩定的基礎，因為各國的貨幣價值都與金價掛鉤，德國在貨幣穩定政策發揮作用以后也是如此。隨著各國紛紛拉起貨幣的吊橋以防止資金外流，德國工業開始陷入困境。1928—1929年，德國的工業生產幾乎沒有增長，那年冬天結束時，失業人數已逼近250萬。投資驟然放緩，有可能是因為各公司在工資和福利上的支出過多，但更可能僅僅是因為資金短缺。德國政府發現，很難靠發行債券籌到資金，因為投資者深知通脹對戰爭期間發行的債券產生過什么影響。國際市場幾乎無人相信德國政府有能力解決當時的經濟問題。事實很快證明，人們的不信任感是完全有道理的。[[7]](#7_4)

1929年10月24日“黑色星期四”，美國陷入商業危機的確切信號驟然引發了紐約證券交易所的恐慌性拋售。在有些人看來已被過高估值的股價開始暴跌。進入下一周，在10月29日的“黑色星期二”，恐慌性拋售再度發生，情形比上次糟糕得多，1,640萬股被賣出，這個紀錄在此后的40年里一直未被打破。[[8]](#8_4)交易者手忙腳亂、爭先恐后地趕在股價跌得更低之前拋售股票，于是紐約證券交易所大廳里亂作一團。股災突如其來的這幾天，其實僅僅是隨后三年里曠日持久、似乎不可阻擋的衰退的最明顯表現。《紐約時報》指數從1929年9月452的高點，跌至1932年7月的58點。10月29日，美國大型企業的市值蒸發掉100億美元，是美國當時全部流通貨幣量的兩倍，接近美國用于一戰的資金量。公司紛紛倒閉，美國的進口需求驟跌。隨著投資的消失，銀行業陷入危機。美國銀行眼見虧損日漸增加，開始收回短期貸款，而這些短期貸款正是德國企業界過去5年里的主要融資來源。[[9]](#9_4)

美國銀行從德國撤資，恰在德國最困難的時刻，確切地說是恰逢已呈頹勢的德國經濟需要強勁的刺激來幫助復蘇之時。由于失去了資金，德國銀行和企業試圖提取更多的短期貸款用于恢復平衡。這種情況發生得越快，經濟形勢就顯得越不穩定，也就有越多的國外和國內資產持有者開始向德國境外轉移資金。[[10]](#10_4)由于無法為生產融資，企業開始大幅減產。已處于停滯狀態的工業生產遂以驚人的速度一路下滑。到1932年，德國的工業產值比1929年水平下降了40%，其衰退的嚴重程度在歐洲各經濟體中只有奧地利和波蘭可與之匹敵。歐陸其他國家的降幅均不超過25%，英國為11%。由于資金撤出和企業紛紛破產，銀行開始陷入困境。1929—1930年，許多小銀行倒閉，隨后奧地利最大的兩家銀行宣告破產；1931年7月，德國各大銀行也開始面臨壓力。[[11]](#11_4)倒閉的企業成倍增加。德國與奧地利試圖訂立關稅同盟以建立一個更大的內部市場，但在國際干涉下落空，因為人人都明白它背后的政治動機——朝著建立《凡爾賽和約》所禁止的兩國政治同盟邁出一步。由于只能依靠國內資源，德國經濟陷入大蕭條，失業率幾乎呈指數增長。各大城市有數百萬人失業，可用于購買食品的錢越來越少，急劇加深了已經非常嚴重的農業危機，由于銀行收回貸款，許許多多靠貸款經營的農場主無法逃脫終止回贖權和破產的命運。農場和莊園的破產導致農業工人失去工作，失業潮蔓延到了城鎮和鄉村。[[12]](#12_4)

到1932年，德國大約有三分之一的工人登記為失業，西里西亞或魯爾等重工業區的失業率甚至更高。失業率之高前所未有，甚至高于實施貨幣穩定政策時的裁員階段。1928—1932年，在德國最大的工業中心柏林，失業人口從13.3萬增至60萬人；在貿易及海港城市漢堡，從3.2萬增至13.5萬人；在萊茵—魯爾區的工業城市多特蒙德（Dortmund），從1.2萬增至6.5萬人。工業界受到的打擊顯然最為嚴重；但白領工人也紛紛失業，到1932年，有50多萬白領失去工作。[[13]](#13_4)失業率增速駭人，大蕭條開始之后僅一年時間，到1930—1931年之間的冬季，失業人數已超過500萬；一年之后增至600萬。據報道，1932年初，失業者以及靠他們撫養的人總共將近1,300萬，約占德國總人口的五分之一。[[14]](#14_4)真實數據也許更高，因為失去工作的女性通常不去做失業登記。[[15]](#15_4)

這些驚人的數據僅道出了部分實情。首先，數百萬工人雖然保住了工作，但薪酬被降低，因為雇主縮短工時，開始實行短時工作制，以適應產品需求量的銳減。于是許多訓練有素的工人或學徒工不得不承接低薪的、無需專門技能的工作，因為他們所勝任的那些工作已經消失。這些人還算幸運，因為真正令人痛苦和絕望的是危機的曠日持久。它始于1929年10月，當時的失業率已經相當高，在隨后的三年里，危機毫無減輕的跡象。然而，幾年前實行的福利制度計劃救助的人數遠低于失業人口——最多只能救助80萬人，但1932年的失業人口已達600萬——而且所提供的救濟最多只持續了幾個月，而不是整整三年或者更長時間。民眾收入的驟降，導致政府稅收銳減，使得經濟形勢愈加惡化。許多地方政府也陷入困境，因為它們使用了美國貸款為本地的福利項目和其他項目融資，這些貸款此時也被要求退回。但在失業福利制度下，長期失業者的保險期滿之后，為他們提供資助的重擔首先以“危機救濟”的形式轉給中央政府，一段時間之后，又以“失業救濟”的形式移交給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不愿意采取不得人心的舉措填補所需的資金缺口；雇主認為自己的企業處于困境，無法提高保險分擔額；工會和工人不愿意看到福利被削減。問題似乎是無解的。承受痛苦的是那些失業者，他們的救濟金被一再削減，或者完全被終止。[[16]](#16_4)

### 二

隨著大蕭條的加劇，在德國城鎮的街頭、廣場和公園，可以看見成群的成年男子、結伙的少年懶洋洋地出沒其間，一副不好惹的樣子，讓那些不習慣這種景象的資產階級紳士淑女感到害怕，覺得暴力和犯罪隨時會發生。更可怕的是，德國共產黨企圖——通常能夠成功——鼓動這些失業者去實現該黨的政治目的。這是典型的失業者政黨。共產黨鼓動家們招募“野人幫”中的不良青年；在工人階級聚居區組織住戶拒繳房租，那些人反正也不大付得起房租；宣布柏林的威丁（Wedding）等無產者聚居區屬于“紅區”，以此震懾膽敢涉足那些地界的非共產黨員，如果知道來者與褐衫軍有牽連，有時還會毆打或者用槍威脅對方；把某些酒館食肆標記為自己的據點；把自己的信仰灌輸給在工人階級學校就讀的孩子們，并且使家長聯合會政治化，這引起了中產階級教師甚至左翼教師的不安。在共產黨看來，由于越來越多的人失去工作，階級斗爭也隨之從工作場所轉移到了大街小巷。保衛無產階級的堡壘，必要時采用暴力手段，已成為共產黨準軍事組織“紅色陣線戰士同盟”的當務之急。[[17]](#17_4)

共產黨人讓中產階級感到恐懼，不僅因為他們在政治上利用街頭失業者對社會造成了直接的威脅，還因為他們的人數在1930年代初期迅速上升。全國的黨員從1929年的11.7萬猛增至1932年的36萬，他們在選舉中顯示出的投票實力一次比一次強。到1932年，在德國西北沿海地區，包括漢堡及其鄰近的普魯士港口阿爾托納（Altona），有工作的黨員不到10%。1932年10月入黨的人里，大約四分之三沒有工作。[[18]](#18_4)共產黨組建“失業者委員會”，幾乎每天都組織游行、示威、“反饑餓游行”等街頭活動，這些活動往往在與警方的長時間沖突中結束。共產黨領導人越來越覺得這場經濟危機將會終結資本主義制度，因此不放過任何為政治增溫的機會。[[19]](#19_4)

這些發展動態推波助瀾，導致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之間的裂痕在共和國的最后幾年里日益加深。兩黨業已結下的深仇宿怨源于1918—1919年的一系列事件：受社會民主黨人、政府部長古斯塔夫·諾斯克驅策的自由軍團成員殺害了數位共產黨的主要領導人，其中最著名的是卡爾·李卜克內西和羅莎·盧森堡。每當共產黨舉辦紀念他們的活動，都會公開追憶他們的遇害情況。此時，宿仇之上又增加了失業這個制造分裂的因素，失業的共產黨員痛罵保住了工作的社會民主黨人和工會成員，而社會民主黨越來越擔心那些有暴力和騷亂傾向的人將蜂擁到共產黨旗下。社會民主黨工會領袖和雇主的做法又進一步加深了仇恨：前者習慣于甄別出共產黨員，以便雇主裁員；后者往往首先解雇未婚的年輕工人，其次才解雇年紀大的已婚者，在很多時候這也意味著共產黨員會失去工作。勞工運動最初是由社會民主黨發起的，普通共產黨員對這一事實感到心情矛盾，因此與黨的“老大哥”形成了一種愛恨交織的關系，共產黨一直渴望雙方為共同的事業攜手合作，但必須按照共產黨的主張行事。[[20]](#20_4)

共產黨的極端思想根深蒂固。尤其是激進的青年工人，他們感到被社會民主黨出賣了——在老一輩社會民主黨活動家的激勵下，他們曾期盼一場徹底的革命，但革命在快要實現時功虧一簣，他們的希望破滅了。共產黨是緊密團結的俄國式秘密組織，它與日俱增的影響力在那些最堅定的黨員中間形成了一種團結和不斷進取的精神。關于魏瑪共和國時期堅定的共產黨積極分子的生活，里夏德·克雷布斯（Richard Krebs）后來在回憶錄中做了生動的描述。他是一名水手，1904年生于不來梅的一個社會民主黨海員家庭。1918—1919年革命期間，正值青春期的克雷布斯在家鄉目睹了自由軍團進行鎮壓時的暴行。他在漢堡的食品騷亂中參與斗毆，并結交了一些碼頭上的共產黨員。與警察的沖突使克雷布斯更加仇恨他們以及他們的老板——在漢堡市主政的社會民主黨。他后來在回憶錄中描述，堅定的共產黨員參加街頭示威活動時，腰帶上別著一段段的鉛管，兜里裝著石頭，隨時準備砸向警察；騎警發起沖鋒時，紅色陣線戰士同盟的青年積極分子們把刀子插進馬腿，使馬匹受驚奔逃。這種沖突與暴力的環境，讓克雷布斯這類彪悍青年感到如魚得水，他于1923年5月加入共產黨，白天在碼頭向水手們發傳單，晚上去聽基礎政治課。[[21]](#21_4)

然而，他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理解相當膚淺：

我有階級意識，因為階級意識是家傳的。我為自己是一名工人而自豪，我鄙視資產階級。我對正統的紳士淑女報以嘲諷態度。我有一種強烈的、一邊倒的正義感，它使我瘋狂地仇恨那些我認為導致民眾受苦、壓迫民眾的人。警察是敵人。上帝是個謊言，是富人編造出來讓窮人甘受奴役的，只有懦夫才會寄希望于禱告。雇主都是披著人皮的狼，個個不懷好意、貪婪成性、不義不仁。我認為單打獨斗的人永遠無法取勝，大家必須聯合起來，共同戰斗，讓所有從事有益工作的人過上好日子。大家必須不遺余力地斗爭——只要能推進事業，不惜采取違法行動；絕不心慈手軟，直至革命取得勝利。[[22]](#22_4)

滿懷著這種狂熱的奉獻精神，克雷布斯在1923年10月的漢堡革命中擔任紅色陣線戰士同盟一支武裝小分隊的負責人，在那場流產的革命中，共產黨人突襲了一個警察局，筑起了街壘。[[23]](#23_4)起義失敗后，他自然覺得有必要逃離現場，繼續過他的海上生活，于是逃往荷蘭，轉赴比利時，與當地共產黨取得了聯系。因為會說英語，克雷布斯很快被一位蘇聯特工派往美國加利福尼亞州進行共產主義宣傳。這類特工活躍于共產黨的許多支部，但也許并不像克雷布斯后來所說的那么多。他受命去干掉一個被當地黨組織認定的叛徒，結果事敗被捕——他自稱是故意失手的，被囚禁在圣康坦（St. Quentin）監獄。1930年代初獲釋之后，克雷布斯成了共產國際——各國共產黨的國際組織，接受莫斯科的指令——海員分部的干事，由共產國際支付薪水，并開始擔任黨的交通員，把經費、傳單等許多物品從一個國家帶到另一個國家，后來又在德國各地運送物品。[[24]](#24_4)

里夏德·克雷布斯的回憶錄讀起來就像一部驚險小說，書中描述的共產黨是靠鋼鐵般的紀律和使命感凝聚在一起的，它的每一次行動都受命于來自“格別烏”[\*](#_231)（其前身是契卡）的特工，這些蘇聯秘密警察在幕后操縱著各國的共產黨組織。德國很多中產階級人士一想到共產國際在幕后操縱了許多國家的罷工、示威和起義，就感到不寒而栗，盡管這些活動幾乎無一成功。共產國際的地下組織，以及自卡爾·拉狄克（Karl Radek）[†](#_232)以來蘇聯特工在德國共產黨中所發揮的毋庸置疑的作用，無疑加重了德國資產階級的憂慮。但克雷布斯把共產國際的運作描寫得過于順暢了，實際上，罷工、勞工騷亂乃至斗毆和暴亂，往往是由“紅色陣線戰士”一時情緒失控引起的，而未必是由莫斯科及其特工預先策劃的。克雷布斯這樣的黨員并不多見。共產黨的黨員變更率僅在1932年就超過了50%，意味著數十萬失業者曾經入黨，至少當過一段時間的共產黨員，但也意味著該黨一度留不住人心，多數黨員通常入黨不到幾個月就退出了。克雷布斯這類資深黨員構成了立場堅定、嚴守紀律，但為數較少的積極分子核心，紅色陣線戰士同盟成為一支越來越職業化的力量。[[25]](#25_4)在這種環境下，語言的力量非常大。自從共產國際領導人于1928年在莫斯科宣布共產國際進入“第三階段”以來，共產黨的言辭變得遠比以往暴戾。此后，共產黨的惡毒語言主要針對社會民主黨。在它看來，每一屆德國政府都是“法西斯”政權。法西斯主義是資本主義在政治上的表達。社會民主黨人是“社會法西斯分子”，因為他們是資本主義制度的主要支持者，引導工人們放棄革命的使命感，而甘心接受魏瑪的“法西斯主義”政治制度。共產黨領導層中任何試圖質疑這一路線的人都會被撤銷黨內職務，任何有助于推翻“法西斯”政府及其社會民主黨支持者的事情都受到歡迎。[[26]](#26_4)

當時德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是漢堡工會的干部恩斯特·臺爾曼（Ernst Thälmann）。臺爾曼生于1886年，在應征入伍參加一戰、前往西線服役之前，曾做過各種短工，包括在魚粉廠打工、為洗衣店開車，因此他的工人階級資格是毋庸置疑的。臺爾曼于1903年加入社會民主黨，在戰爭年代受黨內左翼的吸引，于1918年革命期間投身政治活動，成為“革命工人談判代表”[‡](#_233)的一員，1919年成為獨立社會民主黨在漢堡的領導人，同年當選為市議會議員。獨立社會民主黨于1922年分裂時，他加入共產黨，成為該黨的全國中央委員會委員。在此期間，他依然是體力勞動者，從事拆卸廢船等重體力工作。臺爾曼肌肉發達、沒受過教育，是個天生的革命者，吸收了革命工人的共產主義理想。他沒什么文化，顯然拙于運用復雜的馬克思主義術語，但也因此贏得了無產階級聽眾的認同；他的演講充滿激情卻缺乏條理，可是聽眾反倒覺得這顯示了他的誠實與真摯。作為1920年代中晚期和1930年代初的共產黨領導人和職業政客，臺爾曼經常不得不系著領帶，但這也使他形成了一套演講的招牌動作：講至酣處，他會扯下領帶，在滿堂熱烈的掌聲中又變回一名質樸的工人。他毫不掩飾對軍事將領和企業老板的仇恨，以及對社會民主黨的不信任。

在莫斯科，斯大林出于打壓黨內對手的策略需要而翻云覆雨，共產國際所制定的路線往往也隨之變來變去，臺爾曼像許多普通共產黨員一樣對此亦步亦趨。他對革命的信仰堅定不移，因此對蘇聯這個世界上唯一的革命政權也堅信不疑。德共的其他領導人也許比臺爾曼更靈活、更無情、更聰明，例如柏林黨委書記瓦爾特·烏布利希（Walter Ulbricht），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以及莫斯科的共產國際，也許一直是德共的政策戰略的決定者；然而，臺爾曼憑借個人聲望與口才，成為德共不可或缺的骨干，在1925年和1932年兩度被共產黨推舉為候選人參加總統競選。因此，到1930年代初，他已成為德國最著名的也是中產階級和上流社會最害怕的政客之一。臺爾曼既不是傀儡，也算不上真正的領袖，但他個人始終兼具德共的毫不妥協與雄心壯志，推動德共朝著建立“蘇維埃德國”的目標前進。[[27]](#27_4)

因此在1930年代初，臺爾曼這類人領導下的共產黨，對于許多德國中產階級來說似乎成了迫在眉睫、規模空前的威脅。一場共產主義革命似乎隨時可能發生。就連維克托·克倫佩雷爾這樣清醒、聰明、保守的溫和派也會在1931年7月自問：“政府要倒臺了嗎？隨后上臺的會是希特勒還是共產黨？”[[28]](#28_4)然而從很多方面看，共產黨的實力都是一種錯覺。德共在意識形態上對社會民主黨的敵意，注定了它的不堪大任。基于極端主義立場，它譴責魏瑪共和國的歷任政府是“法西斯政權”，甚至包括由赫爾曼·米勒（Hermann Müller）領導的“大聯合政府”。這種對共和國的仇視，導致德共完全無視納粹主義對魏瑪政治制度的威脅。它對資本主義即將徹底崩潰的樂觀預測，在1932年的經濟絕境中似乎有幾分道理，但事后回過頭來看卻毫無根據。而且，一個主要由失業者組成的政黨不可避免地缺乏資源，黨員的貧困和易變也會削弱德共的實力。共產黨員手頭非常拮據，以至于共產黨的酒吧食肆在大蕭條期間不得不一家接一家地關門，或者轉給納粹黨。1929—1933年，德國的人均啤酒消費量下降了43%，在這種形勢下，資金較充足的褐衫軍取而代之。一位歷史學家所說的“半游擊戰”發生于德國各大城市比較貧困的區域，褐衫軍不斷以暴力手段殘酷打壓共產黨員，逐漸把他們打回貧民窟和廉租公寓區。在雙方的沖突中，中產階級普遍站在納粹黨人一邊，畢竟他們既沒有威脅要消滅資本主義，也沒有宣稱如果掌握政權就建立一個“蘇維埃德國”。[[29]](#29_4)

### 三

雖然失業現象主要發生在工人階級中間，但經濟困難也瓦解了其他社會群體的信心。例如，早在大蕭條開始之前，為了鞏固1923年之后貨幣穩定政策的成果，政府開始削減開支，引發了政府部門的裁員潮。1923年10月1日至1924年3月31日，82.6萬公務員中有13.5萬被裁員，其中多數屬于國有鐵路系統、郵政、電報和國營印刷機構，同期被辭退的還有6.1萬白領工人中的3萬人、70.6萬政府雇傭的體力勞動者中的23.2萬人。[[30]](#30_4)1929年之后又有一波減薪潮，1930年12月至1932年12月，公務員累計減薪19%至23%。各個層級都有許多公務員對工會代表沒有能力制止裁員減薪而感到失望，他們對政府的敵意是顯而易見的。有些人加入了納粹黨；另外許多人卻反感納粹黨，因為它曾公開威脅說一旦掌權就清洗公務員。盡管如此，裁員減薪依然導致公務員普遍對共和國感到憂慮和不抱希望。[[31]](#31_4)

其他許多中產階級職業人士也覺得自己的經濟和社會地位在魏瑪共和國治下受到了威脅。由于銀行和金融機構處境艱難，白領工人不是失去了工作，就是在擔心自己有可能失業。由于購買力下降，旅行社、飯館、零售商店、郵購公司等服務業雇主紛紛陷入困境。納粹黨此時已建立起精密的專業分支結構，見此情形，便開始拉攏專業人士和擁有資產的中產階級。這令那些繼續強調國家社會主義之“社會主義”一面的人深惡痛絕，比如奧托·施特拉塞爾（Otto Strasser），他是納粹黨組織部長格雷戈爾的弟弟，這些人認為希特勒背叛了他們的理想。奧托·施特拉塞爾及其出版社支持罷工等左翼事業，這激怒了希特勒，他于1930年4月召集黨內領導層開會，痛斥施特拉塞爾的觀點。為了消解奧托·施特拉塞爾的影響力，他任命戈培爾為黨的全國宣傳工作主管。然而，令戈培爾惱火的是，希特勒一再推遲采取決定性行動，寄希望于奧托·施特拉塞爾的宣傳機構還能在1930年6月的地區選舉中起些作用。直到選舉結束之后，加上施特拉塞爾出版了有損希特勒形象的、當年年初他與希特勒爭吵的實錄，希特勒才決心把奧托·施特拉塞爾及其支持者清除出黨。施特拉塞爾采取主動，于1930年7月4日退黨。這是一次嚴重的分裂。旁觀者凝神觀察納粹黨在黨內左翼大批退出后能否繼續生存下去。但戈培爾及其親信在魯爾區憑借社會主義口號恢復了納粹黨的活力，由此明顯扭轉了局勢。異見者的出走顯示，施特拉塞爾及其觀點在黨內支持者甚少，就連其兄格雷戈爾也與他斷絕了關系。奧托·施特拉塞爾淡出主流政壇，先是留在德國，后來流亡國外，余生都在幻想建立小型宗派組織，向志趣相投的小眾宣傳自己的觀點。[[32]](#32_4)

擺脫了“社會主義”最后的殘余之后，希特勒著手搭建更多橋梁用以爭取右翼保守派。1931年秋，他與民族黨結成所謂的“哈爾茨堡陣線”（Harzburg Front），于10月11日在巴特哈爾茨堡（Bad Harzburg）與胡根貝格發表聯合宣言，宣稱他們已經為共同統治普魯士州以及整個德國做好了準備。這標志著雙方自1929年首次聯手反對楊格計劃以來在合作上取得了重大進展，不過，納粹黨強調它將繼續保持獨立性，例如希特勒就拒絕檢閱“鋼盔”的分列式。同時，希特勒采取重要步驟，向企業家們解釋納粹黨對他們不構成威脅。他于1932年1月在杜塞爾多夫的工業俱樂部（Industry Club）向大約650位企業家發表演說，為了打動聽眾，他痛斥馬克思主義是德國的病源——他在這次演講中一次都沒有提到猶太人——他還強調自己堅信私有財產、努力工作和讓有能力有事業心的人得到應有回報的重要性。然而他還說，解決當下的經濟困境主要應該靠政治手段；能夠為經濟復興打下基礎的，是理想主義、愛國主義和民族團結，這些將由國家社會主義運動提供；國家社會主義運動的成員犧牲時間和金錢，甘冒生命危險，日日夜夜與共產主義威脅做斗爭。[[33]](#33_4)

在兩個半小時的演說中，希特勒的話極其籠統，根本沒有提出任何具體的經濟政策，卻暴露了他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經濟觀：斗爭是通往成功的道路。這無法給見多識廣的聽眾留下深刻印象，資深企業家們感到頗為失望。納粹黨后來宣稱希特勒最終贏得了大企業的支持，但并無確鑿證據證明這種說法。會后，希特勒和其他納粹黨人都沒有采取后續行動在這些工業巨頭中間募集資金。實際上，此次演講之后，部分納粹媒體繼續攻擊托拉斯和壟斷經營，而另一些納粹黨人則試圖通過主張工人權利贏得勞工群體的選票。共產黨的報紙以陰謀論的語言描述這次會議，說它表明納粹黨是大企業的走狗。納粹黨對此予以否認，特意印刷了演講的節選，證明希特勒并沒有依附于資本家。

這一切的結果是，企業界并沒有比以往更加樂于資助納粹黨。確實有一兩個企業家表示了熱情，例如弗里茨·蒂森（Fritz Thyssen）出資為赫爾曼·戈林和格雷戈爾·施特拉塞爾等納粹頭目的奢侈品位提供補貼。大體而言，此次演講安撫了大企業，時機一到，它們很容易就會轉而支持納粹黨。但1932年1月的演講依然是在為將來鋪路。當時納粹黨各項活動的資金，仍像從前一樣主要來源于黨員的自愿捐獻、集會的入場費、黨報和出版物的收入，以及小企業——而非大企業——的捐助。希特勒在向大企業的代表發表演說時明顯地忘記提及反猶主義，而反猶主義對小企業等群體的吸引力可能要大得多。[[34]](#34_4)不過，納粹黨此時在粗鄙的本來面目之外，又添了一副體面之相，逐漸在保守派和民族主義精英中間交到了一些朋友。隨著德國在大蕭條中越陷越深，越來越多的中產階級人士開始寄希望于生機勃勃的納粹黨能夠引領國家走出困境。一切將取決于魏瑪共和國脆弱的民主體制能否頂住壓力，取決于德國政府能否制定出正確的政策以阻止民主體制的全面崩潰。

[\*](#_228) 格別烏（GPU），“蘇聯國家政治保衛局”（1922—1923）的拉丁首字母縮寫。

[†](#_229) 卡爾·拉狄克（1885—1939），一戰前活躍于波蘭和德國的社會民主運動活動家，十月革命之后在蘇俄領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1918年底赴德參與德國共產黨的籌建。1920年在蘇俄擔任共產國際書記，主要負責德國事務。

[‡](#_230) 革命工人談判代表（revolutionary shop stewards），一戰期間由德國各行業的工人自由選舉出的勞資談判代表，他們反對德意志帝國的戰爭政策，并在1918—1919年德國革命期間發揮了作用。

## 第二節 民主制度的危機

### 一

大蕭條的第一個政治犧牲品，是由社會民主黨人赫爾曼·米勒領導的大聯合政府，它于1928年勝選后上臺，是共和國最穩定、執政時間最長的內閣之一。大聯合政府是一次罕見的嘗試，它力圖折中社會民主黨與不包括民族黨在內的“資產階級”政黨之間的意識形態和社會利益。促成它們聯合的主要是在民族黨和極右翼的激烈反對下確保楊格計劃獲得通過這個共同目標。楊格計劃于1929年底被批準后，這些政黨之間的紐帶基本上也就不復存在。1929年10月大蕭條開始之后，關于如何解決急劇惡化的失業問題，大聯合政府中的政黨無法達成共識。人民黨領袖古斯塔夫·施特雷澤曼于1929年10月去世，失去了這位有影響力的溫和派之后，人民黨因為社會民主黨拒絕削減失業救濟金而與之決裂，大聯合政府被迫于1930年3月27日解散。[[35]](#35_4)

大聯合政府的解散標志著魏瑪民主制度開始走向終結，盡管當時極少有人意識到這點。此后的各屆政府執政時再也沒得到過國會多數的支持。其實，那些在興登堡跟前說得上話的人把大聯合政府的倒臺看作通過行使總統專制權來建立獨裁政權的一個契機。在這方面特別有影響力的是德國軍方，其代表人物是威廉·格勒納將軍，他于1928年1月受命接替民主黨政客奧托·格斯勒出任國防部長，這標志著軍方已完全從政治控制中解放出來，而且權力得到了加強——軍方首腦有權不經內閣而直接向總統匯報。盡管《凡爾賽和約》限制了德軍的員額和裝備，但軍隊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德國最強大、最守紀律、裝備最充足的武裝力量。當包括政黨和立法機構在內的各種平民組織和文職機構紛紛解體時，軍隊依然團結一致。自卡普暴動失敗以來，軍隊在1920年代的多數時候一直保持低調，將注意力集中于非法擴充裝備和人員，然而在1930年代初的危機中，它看到了自己的機會。格勒納的政治顧問庫爾特·馮·施萊謝爾上校（后來晉升為將軍）等人認為，應該把握時機，將國家從議會制聯合政府的束縛中解放出來，進而重整軍備，重建德國的大國地位。德國越是陷入政治混亂和極端主義暴力局面，軍隊的地位就會變得越重要。格勒納在1930年秋就已經這樣告訴軍官們了：“在德國的政治進程中，一磚一瓦也已無法挪動，除非起決定性作用的軍方發話。”[[36]](#36_4)

軍方傾力影響政治進程，最初是為了防止軍費被削減，這個目的確實達到了，就在政府各機構的預算均遭大幅削減時，軍費絲毫未受影響。但軍方依然普遍漠視納粹黨。在普魯士君主制時代接受了嚴格傳統教育的資深軍官們普遍排斥極端民族主義政客的民粹主義宣傳。然而即使在這樣的群體中，也有一些人公開支持納粹黨，比如路德維希·貝克（Ludwig Beck）上校。[[37]](#37_4)而且，青年軍官非常容易受納粹宣傳的影響。早在1929年，許多初級軍官就已經與納粹黨人討論問題、辯論“民族革命”的前途了。格勒納和施萊謝爾領導下的軍方高層極力打壓這類趨勢。他們展開反宣傳活動，并下令逮捕領頭參與討論的三位軍官，于1930年以謀劃嚴重叛國行為的罪名對他們進行審判。審判激怒了其他青年軍官，甚至包括那些無意與納粹黨合作的軍官。其中一人寫道：軍隊領導層屈從于“十一月黨人”，被他們送上審判席的那些人只有一個動機，就是“對祖國無私的愛”。他接著寫道，百分之九十的軍官都是這樣認為的。[[38]](#38_4)

希特勒利用庭審的機會在證人席做了一場被廣泛傳播的演講，傳召他到庭作證的是其中一位被告的辯護人、納粹黨律師漢斯·弗蘭克。希特勒宣稱：納粹黨無意犯嚴重叛國罪，也無意從內部策反軍隊；納粹黨旨在通過合法手段上臺執政，而且他已將那些主張發動革命的人開除出黨，比如奧托·施特拉塞爾；納粹黨將在大選中贏得多數席位，并組建一個合法的政府。在旁聽席的一片喝彩聲中，他說，到那時，真正的叛國者，即1918年的“十一月罪人”，將被送上審判席接受懲罰；但是直到那時，納粹黨依然會遵守法律。法庭讓希特勒對其證詞的真實性起誓。據報道戈培爾說：“現在我們絕對合法了。”普茨·漢夫施丹格爾當時剛剛受命負責希特勒與外國媒體的關系，他設法使此次演講在世界各地得到廣泛報道。希特勒在三篇文章中概述了納粹黨的目標和方法，漢夫施丹格爾把精心刪改過的文本賣給了美國傳媒大亨威廉·蘭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每篇售價1,000帝國馬克。這筆錢使希特勒此后每次在首都逗留的時候，都能夠把柏林市中心的愷撒霍夫酒店（Kaiserhof Hotel）作為他的總部。在國內，希特勒的保證驅散了許多德國中產階級人士對于納粹黨意圖的恐懼。[[39]](#39_4)

法庭沒有被希特勒打動，申斥他濫用證人的身份，并判處那幾位青年軍官18個月徒刑，革除其中二人的軍籍。[[40]](#40_4)法官的保守立場基本上注定了法庭站到軍方一邊，然而判決并未遏制住青年軍官繼續與納粹黨暗送秋波。施萊謝爾試圖反駁納粹黨的觀點、抑制青年軍官的激進思想、在軍隊中恢復政治紀律，但他的努力收效甚微，主要原因在于他公開對軍官團承認自己認同納粹綱領中的“民族部分”，尤其認同“國家社會主義運動所帶來的反布爾什維主義、反叛國、反淫穢書刊等怒潮。在這方面，”他說，“國家社會主義運動無疑具有極其鼓舞人心的功效。”[[41]](#41_3)認同納粹黨意味著與之合作，但軍方高層過于傲慢自負，以至于他們依然認為可以任意驅策納粹黨，使之成為他們的軍事和政治附庸，就像他們在1920年代初驅策其他準軍事團體那樣。時間將會證明這個策略真是大錯特錯。

興登堡主要根據施萊謝爾等高級軍官的建議來任命接替米勒的總理人選，軍隊新取得的顯要政治地位由此可見一斑。軍方從一開始就不打算成立一個基于代議制的民主政府，而是要安置一個“專家內閣”，旨在通過由興登堡行使緊急狀態下的專制權而繞開國會。當然，專制權的適用范圍是有限的，許多法案，尤其是預算案，仍須由國會批準。為了讓新上任的政府看起來不像獨裁政權，他們采取的措施是延攬著名的國會政客進入新內閣，包括前總理、代表中央黨的約瑟夫·維爾特（Josef Wirth），代表民主黨（1930年7月更名為國家黨）的赫爾曼·迪特里希（Hermann Dietrich），代表民族黨的馬丁·席勒（Martin Schiele），代表人民黨的尤利烏斯·庫爾提烏斯（Julius Curtius）和代表經濟黨這個小型政黨的維克托·布雷特（Viktor Bredt）。但是不包括社會民主黨，興登堡及其幕僚不愿意把專制權委托給該黨。缺了社會民主黨，新政府不再由國會中的多數黨組成，然而這似乎已不重要。

后來的事實證明，新政府總理的任命是一個災難性的選擇。從表面上看，總統提名海因里希·布呂寧（Heinrich Brüning）為德國總理，是為了維護民主制度。布呂寧生于1885年，是國會中的中央黨議員領袖，其所代表的政黨曾經是魏瑪共和國議會民主制度的中堅力量。然而到他被任命時，中央黨已在新黨魁高級教士路德維希·卡斯的影響下轉向較為專制的立場，關注的范圍更加局限于保護天主教會的利益。而且，布呂寧本人充其量只是魏瑪民主制度可以同甘不能共苦的朋友。他曾當過軍官，對十一月革命感到震驚，終生是君主制度的堅定擁護者。布呂寧確實曾在回憶錄中表示，當上總理后，他的主要目標是恢復君主制度。但他這樣寫，也許是在回顧往事時對自己的政治生涯所做的連貫性描述，其實與許多政客一樣，主導著其政治生涯的盡是些短期的當務之急。[[42]](#42_3)盡管布呂寧在內心堅信回歸俾斯麥的體制將造福全體國民，但并沒有制定恢復君主制的具體計劃，更別提讓皇帝復位了。然而無論如何，他在本質上是專制的。[[43]](#43_3)布呂寧打算修改憲法，辦法是削減國會的權力，由自己身兼德國總理和普魯士部長會議主席兩職，從而解除社會民主黨對德國最大州的控制權。由于沒有得到興登堡的充分支持，布呂寧無法把這個設想付諸實施，但它仍在議事日程上，隨時可供取得興登堡支持的人使用。布呂寧還開始限制民主權利和公民自由。[[44]](#44_3)例如，他在1931年3月嚴令限制新聞自由，尤其限制媒體對其政策發表批評意見。到7月中旬，據自由派的《柏林日報》（Berliner Tageblatt）估算，全國每個月被禁的報紙多達上百版。到1932年，共產黨的《紅旗報》（The Red Flag）不到三天就會被禁一次。早在納粹上臺之前，新聞自由就已受到了嚴重損害。[[45]](#45_3)

所以，納粹黨當政期間對民主制度和公民自由不遺余力的破壞，其實在布呂寧執政時就已經開始了。有人認為，布呂寧在經濟危機期間飽受詬病的經濟政策，其設計初衷實際上部分是為了削弱工會和社會民主黨，它們是魏瑪民主制度得以維持的兩支主要力量。[[46]](#46_3)誠然，布呂寧不是獨裁者，他的就任也并不標志著魏瑪民主制度的終結。布呂寧在中央黨內能夠升到高位，必然精通政治算計和政治手腕、善于建立政治同盟。他是一位極有聲望的金融和稅務專家，在這些技術性相當強的領域里游刃有余，這兩個領域在1930年顯然需要掌舵人。但在1930年之后，布呂寧可操作的空間很快變得越來越小，主要是由于他災難性的政治誤判。就連其最堅定的維護者也從不認為他是個有魅力、鼓舞人心的領袖。布呂寧表情嚴肅、頗有城府、難以捉摸，總是不經充分磋商就做決斷，加上缺乏口才，因此無法贏得選民的廣泛支持，選民們越來越驚駭地看到，經濟混亂和政治暴力正在把國家拖入一場危機，其嚴重程度甚至遠超1923年那次。[[47]](#47_3)

### 二

布呂寧的主要任務是應對急劇惡化的經濟狀況，為此他選擇了激進的緊縮措施。首先是削減政府開支，因為政府的財政收入迅速減少，而靠貸款來支付政府債務的可能性基本上不存在。其次，雖然1923年大通脹之后，德國的貨幣通過與黃金價格掛鉤而一直保持穩定，但這絕不表示它穩定在了恰當水平。由于國際收支逆差導致儲備金外流，貨幣被過高估值，而幣值已達到的水平被認為是神圣不容更改的，因此唯一的對策是在國內降低物價和工資、提高利率。[[48]](#48_3)最后，盡管1930年夏的楊格計劃對賠款進行了重新安排，并實際上大幅降低了數額，但戰爭賠款依然是籠罩在德國經濟領域的陰云。布呂寧希望通過減少需求來降低德國國內的物價，從而使出口商品在國際市場上更有競爭力，此政策當然受到了出口制造商的歡迎，他們是布呂寧的鐵桿支持者。[[49]](#49_3)在全球市場需求已跌至前所未有的程度之時，這并不是一個非常切合實際的政策。

首先削減的是政府開支。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高潮是1931年6月5日和10月6日頒布的緊急總統令，要求以各種方式削減失業救濟，限定領取的期限，對越來越多例申請者展開經濟狀況調查。長期失業者于是眼睜睜看著自己的生活水平逐步下降：從領取失業保險，變成領取政府資助的危機補助，然后轉為領取地方政府的福利救濟，最后什么救濟都領不到。到1932年底，只有61.8萬人可以領取失業保險，123萬人領取危機補助，250萬人領取福利救濟，100多萬人因失業救濟期限已滿（此時各種救濟均設置了領取期限）而失去穩定的收入。[[50]](#50_3)無論布呂寧的目標多么遠大，民眾的日益貧困依然使得經濟形勢每況愈下。民眾連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必需品都買不起，當然談不上花費足以刺激工業和服務業走向復蘇的錢。此外，由于人們對通脹極度恐懼，因此即使不存在要求帝國馬克保值的國際協議（比如楊格計劃），貨幣貶值（刺激出口的捷徑）也有可能在政治上造成極大的危害。布呂寧無論如何也不會允許貨幣貶值，因為他想讓國際社會看到，戰爭賠款正在德國造成真切的不幸與痛苦。[[51]](#51_3)

然而在1931年夏，形勢變了。隨著資本外逃達到新高，經濟受到新一輪危機的沖擊，導致嚴重依賴外國貸款的達姆施塔特國民銀行（Darmstadt and National Bank，簡稱Danat Bank）于7月13日倒閉，產生引發更大范圍信貸崩潰的危險。[[52]](#52_3)用國外貸款幫助德國政府渡過難關的可能性顯然已蕩然無存：據估算，填補德國預算赤字所需的資金量，比美國的全部黃金儲備還要多。金本位制的嚴格要求使國際金融合作無法有效開展。布呂寧及其幕僚別無選擇，只能取消帝國馬克的可兌換屬性。政府原先一直不愿意走這一步，因為擔心引起通貨膨脹。于是，帝國馬克自此不再能夠兌換外幣。[[53]](#53_3)

因此金本位制對德國而言已毫無意義，這讓政府可以采取更加靈活的貨幣政策，擴大貨幣供應量，從而至少在理論上可以緩解政府的經濟困境，使政府能夠著手通過創造就業機會來刺激經濟。[[54]](#54_3)然而不幸的是，布呂寧不肯走出這一步，因為他擔心印出來的錢如果不與金價掛鉤，將會導致通貨膨脹。在德國通貨膨脹所產生的所有長期影響中，這種擔憂可能是最具災難性的。不過，布呂寧在有其他可行方案可用的情況下仍然長期堅持通貨緊縮政策，并非僅僅基于這個原因；關鍵的原因是，他還希望利用持續的高失業率來徹底瓦解魏瑪福利制度，削弱勞工的影響力，使之無力反對他當時正在醞釀的計劃——朝著獨裁、復辟的方向修改憲法。[[55]](#55_3)

銀行業的危機把另一張布呂寧不愿意用的牌交到了他手中。鑒于1931年春季和夏初外國資本從德國經濟體外逃，1931年6月20日的《胡佛延債宣言》（Hoover Moratorium）宣布暫停戰爭賠款的支付以及其他方式的國際資本流動。這解除了德國政府的另一個政治限制，使之有了自由活動的余地。在此之前，政府采取的幾乎每一個經濟政策，比如增稅或者用其他方式增加政府收入，都面臨被極右翼指責為用于支付令人痛恨的戰爭賠款的風險。此時，這個風險被解除了。但對布呂寧來說，這還不夠。他認為危機結束后，《延債宣言》可能被撤銷，戰爭賠款可能被要求繼續支付。[[56]](#56_3)因此，盡管出路已擺在那里，而且已經有人公開主張由政府出資創造就業機會來刺激需求，但布呂寧仍未采取任何措施。[[57]](#57_3)

布呂寧的通貨緊縮立場無法撼動。1931年的形勢使大蕭條比原先更加嚴重，而且沒有結束的跡象。布呂寧親口告訴民眾，他預計大蕭條將持續到1935年。不光是失業者和赤貧者，這個前景也令許多人深感震驚，簡直不敢去想。[[58]](#58_3)不久，布呂寧就得了個“饑餓總理”的綽號，因為他在12月8日又頒布了一項緊急法令，要求將工資降到1927年的水平，同時命令降低各種商品的價格。[[59]](#59_3)諷刺作家把他比作1920年代初的殺人狂弗里茨·哈爾曼。哈爾曼殺人之后碎尸的習慣曾被編成兒歌，時不時被拿來嚇唬小孩兒，如今在德國仍然有人會唱：

待會兒請睜大眼睛

看布呂寧到你跟前

帶著九號緊急法令

看不把你打成肉餅。[[60]](#60_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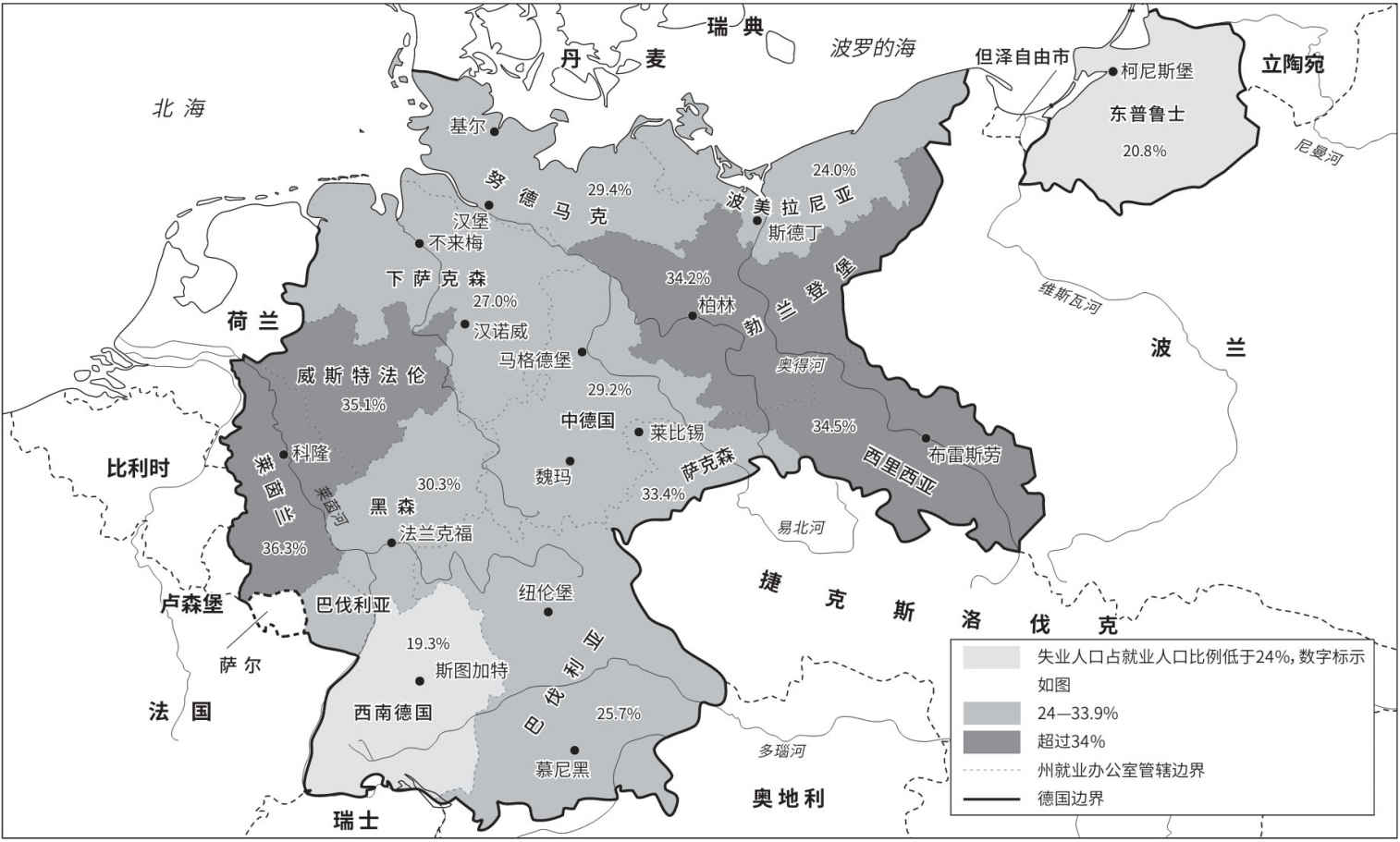
第九號緊急法令從未出現；然而，僅頒布了4個法令，布呂寧就已成為魏瑪共和國時期最不受歡迎的總理。[[61]](#61_3)

### 三

像許多傳統的保守派一樣，布呂寧想要抑制或削弱極右翼狂熱的激進思想，并且時常表現出試圖這樣做的勇氣。然而與他們一樣，他也低估了它的實力和影響力。布呂寧恪守他所認定的普魯士美德，即虔誠、客觀、超越黨派偏見以及無私為國，這主要源于1870年代俾斯麥抨擊天主教徒不忠于國家之后，中央黨所奉行的愛國傳統。基于這種人生態度，布呂寧長久地不信任黨派政治，本能地相信總統興登堡等普魯士政治偶像的政治可靠性，他的信任最終被證實完全是所托非人。[[62]](#62_3)而且，這并非布呂寧唯一的致命失誤。上任伊始，他就威脅說要動用憲法第25條賦予興登堡的權力要求重新進行國會選舉，以此逼迫主要對手社會民主黨就范。當社會民主黨與民族黨和共產黨聯手拒絕批準一項苛刻的財政緊縮預算時，布呂寧毫不猶豫地將威脅付諸行動，宣布解散國會。納粹黨在地方和地區選舉中曾贏得大量選票，而社會民主黨卻無視這個明顯的事實，以為選民還會繼續走老路，一心期待選舉的結果是有足夠的選民支持它的政綱。布呂寧及其左翼政治對手像許多德國人一樣，對于納粹黨的極端論調以及在街頭的恐嚇手段依然重視不起來，僅僅將其視為納粹黨必然淪于政治邊緣的證明。他們認為納粹黨不遵守約定俗成的政治規則，因此無望取得成功。[[63]](#63_3)

選戰呈白熱化，人們異常興奮。戈培爾和納粹黨組織全力以赴。在各大城市一場接一場舉行的、聽眾多達2萬人的演說中，希特勒怒斥魏瑪共和國的不公正、致命的內部分裂、層出不窮的派系內訌和黨派利益之爭、經濟凋敝、制造國恥。他疾呼，為了改變這一切，就要戰勝民主制度，回歸個人獨裁，徹底清洗掉1918年的革命者、1923年的奸商、支持楊格計劃的賣國賊，以及公務員中的社會民主黨食祿蟲（“革命寄生蟲”）。希特勒及其政黨用語義含糊但鏗鏘有力的措辭，向民眾承諾了一個團結而強大的德國、一場超越社會界限和社會矛盾的運動、一個全體德意志人攜手合作的種族社會、一個能夠重建德國的經濟實力和恢復德國應有的國際地位的新帝國。這番話深深打動了許多人，他們眷戀著俾斯麥所締造的帝國，夢想有一位新領袖能夠恢復德國已然失落的榮耀。這番話全面總結了許多人所認為的共和國的失誤，為人們表達對共和國的絕望提供了機會：投票給一個在各方面都反其道而行的政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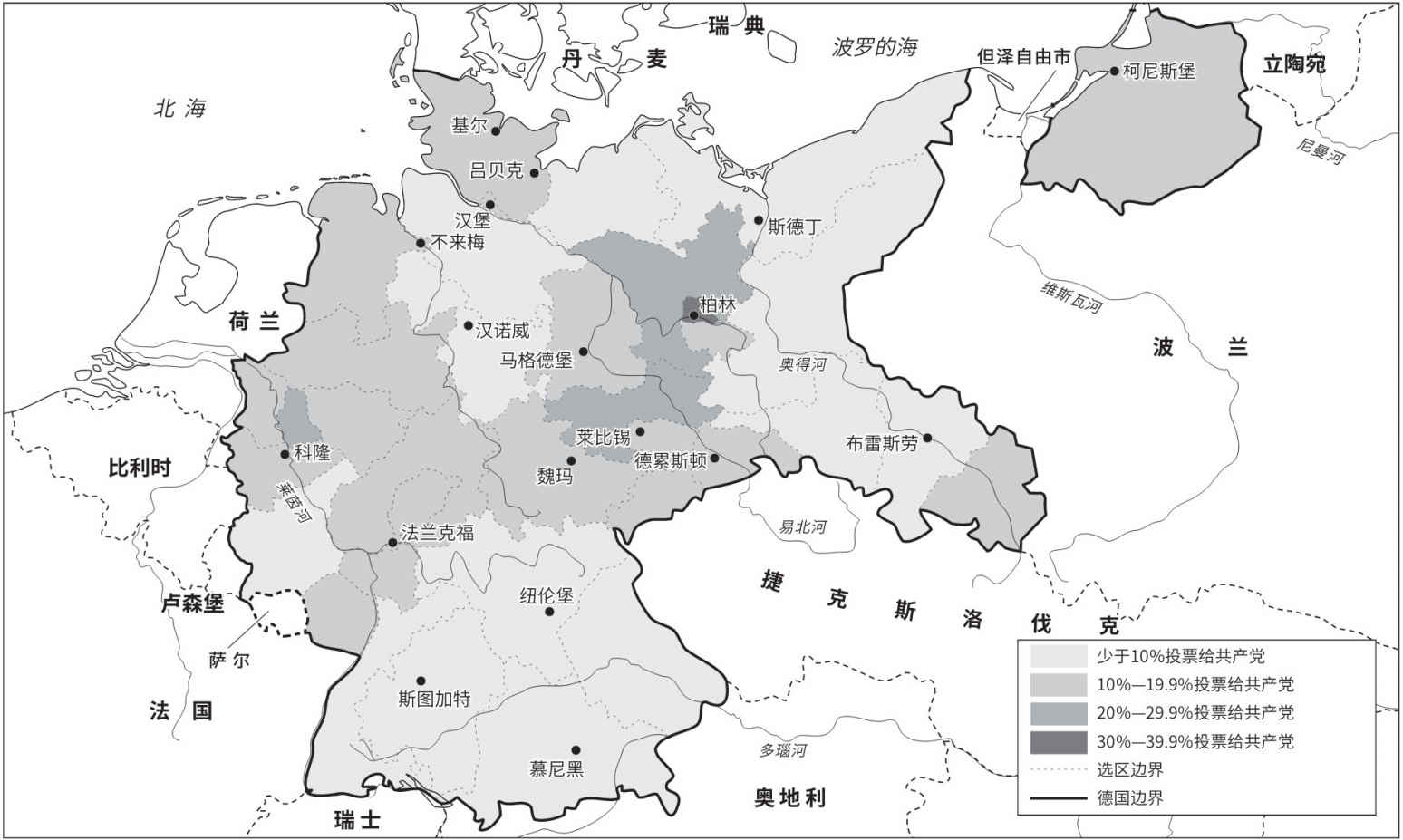
在這個整體層面之下，納粹黨的宣傳機器技巧嫻熟地將目標對準了德國選民中的特定群體，培訓競選班子如何針對不同的聽眾做不同的演講，在集會之前廣而告之，根據場合安排演講題目、挑選合適的演講者。有時，為納粹黨主要演講人站臺的，還有當地的納粹黨外人士和來自保守派背景的知名人士。納粹黨精密的分支機構深諳德國社會在大蕭條期間已逐漸分化成互相競爭的利益團體，于是針對特定的選民群體設計了專門的演講詞。反猶標語只用于對此感興趣的人群；如果打動不了對方，就棄用。納粹黨人根據收到的反饋調整宣傳策略，他們密切注意聽眾的反應，印制了各種各樣的海報和小冊子用以爭取各類選民。他們放映電影、舉行集會、唱歌、用銅管樂隊演奏、示威和游行。選戰由納粹黨的全國宣傳工作主管約瑟夫·戈培爾策劃。他設在慕尼黑的宣傳總部源源不斷地向地方黨支部和區黨部發出指令，經常為選戰提供新鮮的口號和材料。與共產黨相比，納粹黨使命感的強烈程度猶有過之，在這種使命感的驅使下，隨著選戰達到高潮，納粹黨持久而狂熱的行動力以及宣傳的密集程度，都超出了其他所有政黨。[[64]](#64_3)



地圖9　1932年的失業率

1930年9月國會選舉的結果幾乎讓每個人都感到震驚，產生的地震波從諸多方面對魏瑪共和國的政治制度造成了決定性打擊。作為布呂寧政府背后的選戰主力，中央黨對于選票從370萬增加到410萬確實還算滿意，由此它在國會中的席位從62席增加到了68席。布呂寧的主要對手社會民主黨失去10席，從153席降至143席，但仍是國會中的最大黨。就此而言，選舉對布呂寧的助益微乎其微。布呂寧原先可能希望以中間派和右翼政黨為基礎組建他的政府，但它們在競選中慘敗，民族黨從73席降至41席，人民黨從45席降至31席，經濟黨（新組建的中產階級特殊利益團體）從31席降至23席，國家黨從25席降至20席。也就是說，布呂寧首任內閣中的政黨總共失去53席，從236席降至183席。況且這些政黨也不是一致支持總理的：人民黨對于是否支持他產生了嚴重分歧；民族黨領導人阿爾弗雷德·胡根貝格強烈批評布呂寧政府，逼迫那些立場溫和、仍想給政府一個機會的議員退黨。1930年9月之后，民族黨中基本上已無人反對胡根貝格的政策——謀求與納粹黨合作，顛覆共和國，由立場更趨右翼的人物取代布呂寧出任總理。[[65]](#65_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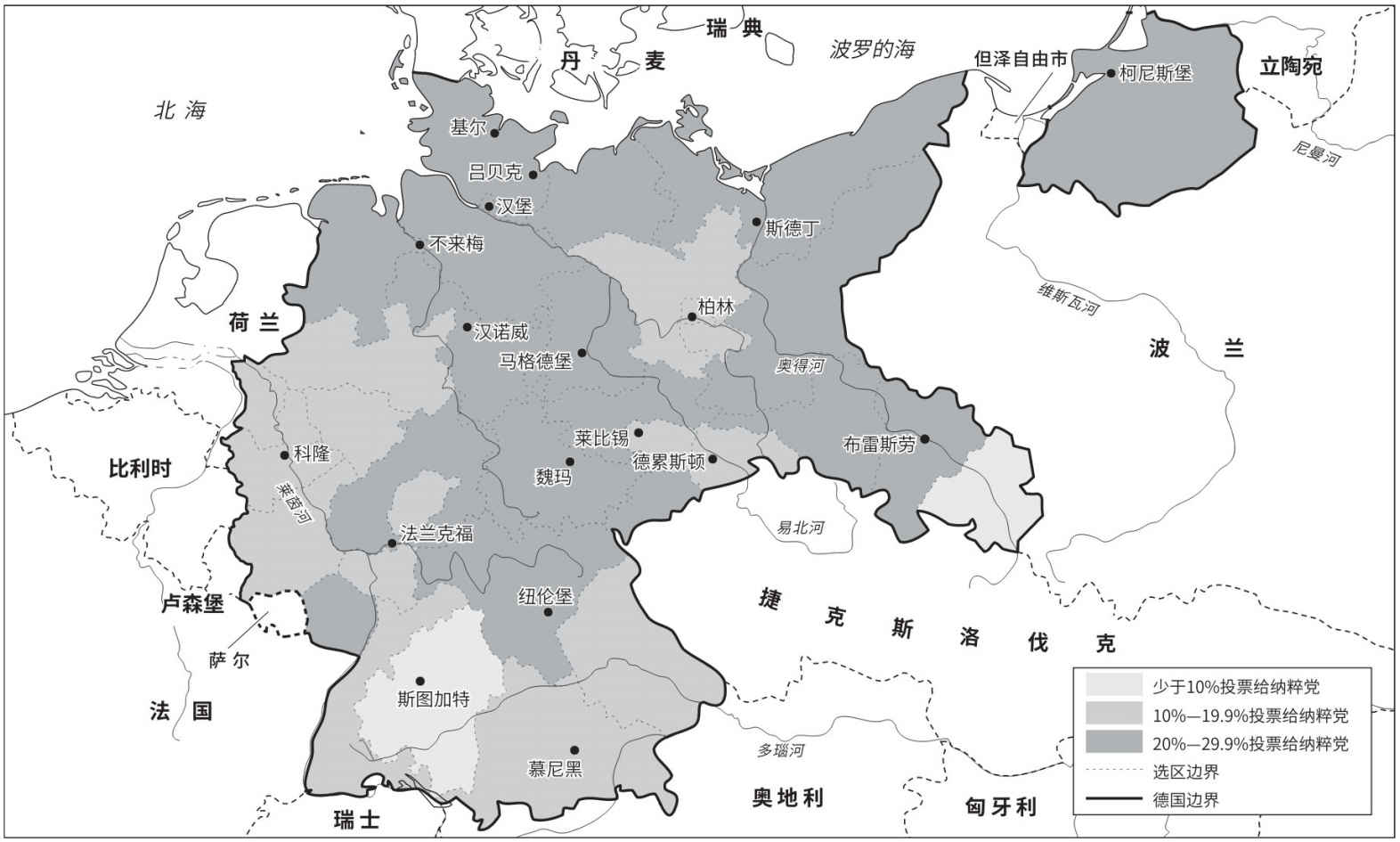
這表明，在1930年選舉中實力大增的，是那些有望持續不斷地反對布呂寧政府及其全部政策，并相信這樣做可以加速共和國之滅亡的政治力量。共產黨由于在失業者中間的支持率上升，議席從54席增加到77席。但最令人震驚的是納粹黨得票數的飆升。在1928年的國會選舉中，僅有80萬人支持納粹黨，因此該黨在國家的立法機構中僅得到12席。而在1930年9月，該黨獲得的選票增加到640萬張，所得議席達107席。約瑟夫·戈培爾在1930年9月15日的日記中得意地寫道：“了不起……不可思議的進步……我真沒想到。”[[66]](#66_3)支持納粹黨的報紙把選舉結果說成是“轟動世界的大事”，宣告德國歷史進入了新階段。只有共產黨不屑地說這是曇花一現（“接下來它只會走向衰亡”）。[[67]](#67_3)



地圖10　共產黨在1930年國會選舉中的得票率

但納粹黨的得勢反映了許多選民群體內心深深的憂慮。在北方的一些鄉村選區，納粹黨贏得了壓倒多數的選票：在威悉—埃姆斯（Weser-Ems）選區的維弗爾施泰德（Wiefelstede）得票率為68%，在杜塞爾多夫西選區的布呂嫩（Brünen）為57%，在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選區的石勒蘇益格為62%。[[68]](#68_3)在某種程度上，布呂寧本該預見到這個結果，因為在國會選舉和全國各地的市議會選舉中，納粹黨從1928年以來一直大有收獲。因此，布呂寧在1930年選舉中得償所愿的可能性，甚至在選戰開始之前就已微乎其微。不過，納粹黨在國會選舉中的勝利還是大大超出了所有人的預料。實際上，納粹黨在許多地方的勝績遠遠超出了其宣傳的影響力，該黨在北部新教地區的偏遠鄉村獲得25%至28%的選票，而納粹黨的組織基本上尚未滲透到這些地區。[[69]](#69_3)

如何解釋這種出人意料的勝利呢？納粹黨被視為——尤其是被各種馬克思主義者視為——中下階級的代表，但在這次競選中，它顯然突破了這個特定選民群體的界限，不僅成功贏得白領工人、店主、小企業主、農場主等諸如此類群體的支持，還爭取到了許多社會階層較高的選民，包括專業人士、商業和工業資產階級。[[70]](#70_3)1930年代初，越來越多原先不投票的人開始踴躍投票，導致政治氣氛過熱且日益升溫，從中獲益的主要是納粹黨。在1930年投票給納粹黨的選民中，大約有四分之一從未投過票。在初次投票的人當中，許多是年輕選民，在1914年之前幾年的生育高峰出生，但這些選民似乎并沒有比例失衡地投票給納粹黨。實際上，納粹黨對老一代人有著特別強烈的吸引力，這代人顯然認為民族黨的活力已不足以摧毀可惡的共和國。1928年民族黨支持者中的大約三分之一，民主黨和人民黨支持者中的四分之一，甚至社會民主黨支持者中的十分之一，都在1930年把選票投給了納粹黨。[[71]](#71_3)



地圖11　納粹黨在1930年國會選舉中的得票率

納粹黨在婦女中間特別有號召力。由于大量男性在一戰中陣亡，加之女性壽命比男性長，因此在1930年，女性選民遠遠多于男性選民，進而導致了一個重要的變化：婦女原先無意參加投票的傾向驟然減弱。例如，在科隆市，女性參加投票的比例從1924年的平均53%猛增至1930年的69%；在東普魯士的行政區拉格尼茨（Ragnitz），從62%增至73%。女性不再像以前那樣避開納粹黨這類激進政黨，盡管她們中的大多數依然支持中央黨。時人以及后來的一些史家對于女性投票給納粹黨的原因做了種種猜測，有人認為是由于女性在情感上非常容易受納粹宣傳的感染，也有人認為是由于女性對共和國未能實現男女平等感到幻滅。實際上，并無跡象表明女性投票給納粹黨的原因有別于男性，只是許多女性此時出來投票了，并且把選票投給了納粹黨。[[72]](#72_3)

無論選民是男還是女、是青年還是老人，納粹黨在位于易北河（Elbe）東部的德國北部新教教區特別有號召力，在南部和西部的天主教教區則影響力甚微。它對鄉村的選民具有吸引力，但程度不同于對城市工業地區的選民。在位于德國北部偏遠鄉村、信奉新教的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和奧爾登堡的某些地方，納粹黨贏得了50%以上的選票。然而與當代的一個流行觀點相反，納粹黨總體上在小城鎮不如在大城市有影響力。在宗教忠誠的作用下，新教選民支持納粹黨的可能性是天主教選民的兩倍，宗教忠誠的作用在鄉村地區重要得多，也許是因為神職人員在鄉村擁有較大的影響力，而在城市，無論其規模大小，世俗化均取得了較大進展。1930年，確實有些天主教徒投票給了納粹黨，但絕大多數依然忠實于中央黨，他們固守自己的文化圈子，隔絕極右翼的影響——極右翼當時公然以敵視民主制度、猶太人和現代世界的立場拉攏選民。[[73]](#73_3)

如我們所知，在1930年的選舉中，面對納粹黨的挑戰，社會民主黨與共產黨一樣，得票率略有恢復。但這并不意味著納粹黨完全沒有贏得工人階級的任何選票。德國是世界上最先進的工業國之一，近半數選民是靠工薪生活的體力勞動者及其配偶，而在魏瑪時期的歷次選舉中，兩個工人階級政黨加起來通常僅能獲得不到三分之一的選票，也就是說大量的工人及其配偶在歷次選舉中肯定把選票投給了其他政黨。這個人數眾多、成分多元的社會群體包括了許多天主教工人、小企業（通常是家長式管理的企業）的工人、國有企業（鐵路、郵政等）的體力勞動者，以及沒有加入工會的雇員（尤其是從事體力勞動的女工）。事實證明，新教地區的鄉村勞工與比例相對較小的體力工人特別容易被納粹黨打動，而在大莊園工作的工人往往繼續支持社會民主黨。實際上，納粹宣傳尤以工人階級為對象，借用社會民主黨的圖像和口號，既抨擊“反動派”，也抨擊“馬克思主義”，把納粹黨展現為德國社會主義傳統的繼承人。雖然僅從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那里挖來了一小部分選票，但納粹宣傳依然對原先并無固定立場的工人產生了強大影響，因此在1930年9月投票給納粹黨的選民中，大約27%是體力工人。[[74]](#74_3)

我們已經知道，工人階級構成了近半數選民，而納粹黨僅獲得18%的選票，因此這依然表明該黨對工人階級不像對其他社會階層那樣有影響力，絕大多數工人階級選民投票給了其他政黨。事實證明，在社會民主黨或共產黨根基深厚、工會化程度高、勞工運動文化生機勃勃并且受到廣泛支持的地方，社會主義團體的內聚力通常可以抵擋住納粹黨的影響力。[[75]](#75_3)換句話說，納粹黨爭取到的工人階級是傳統的左翼政黨沒能影響到的那部分。[[76]](#76_3)納粹黨的影響力基于社會和文化因素，而非經濟因素；因為失業者把選票投給了共產黨，而不是納粹黨。1930年9月依然有工作的工人對未來感到憂慮，假如不是被強大的勞工運動環境所隔絕，他們通常會轉投納粹黨，以保護自己免受迫在眉睫的、來自共產黨的威脅。[[77]](#77_3)

盡管納粹黨特別注重對工人進行宣傳，但出人意料地忽視了白領雇員，納粹黨襲擊過白領雇員工作的許多機構，包括金融機構和百貨商店，這很可能招致了白領雇員的厭惡。投票給社會民主黨的，不僅包括那些受雇于工會和其他勞工運動機構的人，還包括許多從事低薪工作的女職員，這些人因為出身于或者嫁入工人家庭而屬于工人階級的政治陣營，她們也像大部分男性白領工人一樣投票給社會民主黨。私營企業的白領工人也是受大蕭條影響最小的群體之一，因此像體力勞動者一樣，1930年投票給納粹黨的白領工人比例并不高，盡管這與當時的流行觀點相反。與此形成對照的是，公務員在納粹支持者中所占比例過高，這個現象或許反映了這樣的事實：政府裁員導致數十萬公務員失業，并且使更多人的收入減至熟練體力工人的水平或者更低。納粹黨對個體經營者有著更大的號召力，在信奉新教的鄉村地區尤其如此，當然，其中許多是小農場主。[[78]](#78_3)

納粹黨在1930年9月突然令人意外地站穩了腳跟，它表達了社會各階層的不滿，因此對德國的幾乎每個社會群體都有著或多或少的號召力。它甚至超過中央黨，成功地超越社會界限，以共同的意識形態為基礎，把極其不同的社會群體團結起來，其影響范圍主要在新教教徒占大多數的社區，但并不局限于此，這是其他德國政黨未曾做到的。自由派和保守派資產階級政黨已因通貨膨脹的影響而受到削弱，事實證明，在1929年底摧毀了德國的經濟災難面前，它們沒有能力留住支持者。中產階級選民依然反感納粹黨的暴力和極端思想，紛紛轉而支持右翼小派別，這樣做的人比在1924年和1928年還多，遂使這些小派別在國會中的議席從20席增加到55席；但也有數量可觀的中產階級于1930年9月蜂擁至納粹旗下，與包括農場主、各種工人、公務員、初次投票者（其中有許多是女性）以及高齡選民群體在內的其他社會群體一起，投票給納粹黨，使之選票大增，用這種方式強有力地表達了他們的不滿、憤恨和恐懼。[[79]](#79_3)

在1930年越來越令人絕望的境況中，納粹黨極力展現出堅強果敢、生機勃勃、精力充沛和青春洋溢的形象，完勝其他政黨的宣傳努力，共產黨稍屬例外。納粹黨圍繞希特勒建立起領袖崇拜，其他政黨也把各自的領袖展現為未來的俾斯麥式人物，二者屬于相似的努力，效果卻是前者遠勝后者。納粹黨實現這一切，憑借的是簡單而有沖擊力的口號和圖像、癲狂興奮的活動、游行、集會、示威、演講、海報、標語牌以及諸如此類的事物，這些凸顯了納粹黨所自詡的，它遠遠不僅是一個政黨，而是一場運動，勢不可擋，席卷著德國民眾奔向更加美好的未來。然而，納粹黨并沒有提出解決德國問題的具體方案，尤其是最迫切需要解決的經濟和社會問題。1930年，沉重地籠罩在中產階級正直之士心頭的憂慮，是公共秩序的混亂，納粹黨承諾要通過建立一個強硬的集權國家來結束這種混亂，但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公共秩序的混亂很大程度上正是納粹黨造成的。許多人顯然沒有意識到這點，反而歸咎于共產黨，認為身穿褐色制服的納粹沖鋒隊在街頭的暴力行為是正當的，或者至少是面對紅色陣線戰士同盟的暴力和挑釁行為時合乎情理的反應。

選民們在1930年并不是真的要從納粹黨那里尋求非常具體的東西，而是借此抗議魏瑪共和國的失誤。他們中的許多人，尤其是在鄉村地區、小城鎮、小作坊、文化上保守的家庭、高齡群體或者中產階級民族主義者政治陣營里的人，可能也在借此表達與共和國所代表的現代派文化和現代政治的格格不入。盡管納粹黨在許多方面同樣展現出了現代形象，但是納粹黨綱的含糊其辭，它新舊交織的象征意義，它兼收并蓄、常常自相矛盾的特性，都在很大程度上使人們能夠按照自己的愿望進行解讀，并且忽略那些也許令他們不安的東西。許多中產階級選民對納粹黨徒在街頭的暴力和罪惡行徑輕描淡寫，將其視為年輕人激情洋溢和精力過剩的產物。然而人們很快就會發現，納粹的暴行遠遠不止于此。[[80]](#80_3)

## 第三節 暴力的勝利

### 一

到1930年，年輕的褐衫軍積極分子霍斯特·韋塞爾已經惹得柏林的共產黨準軍事成員對他恨之入骨。韋塞爾是個理想主義者，聰明、受過良好教育，得到了約瑟夫·戈培爾的賞識，于1928年上半年被派往維也納，向組織完善的納粹青年運動學習。回到柏林之后，韋塞爾很快升至褐衫軍組織在腓特烈斯海恩（Friedrichshain）區的高層職位，領導一支“沖鋒隊”，即納粹黨的準軍事分支。他發動了一場特別激烈的挑釁性街頭運動，其中包括褐衫軍對當地共產黨總部的一次襲擊，導致4名共產黨工人重傷。共產黨黨報《紅旗報》在柏林的編輯海因茨·諾伊曼（Heinz Neumann）被稱為共產黨的戈培爾，他對此次襲擊的回應是向黨內干部發布一個新口號：“在哪里發現法西斯分子，就在哪里痛擊他！”[[81]](#81_3)

正是在這種氛圍中，韋塞爾的女房東，一位共產黨員遺孀，于1930年1月14日到當地一家酒館請人幫忙擺平她的房客，據她說，韋塞爾不但不肯支付同居女友的房租，還以暴力相威脅。這個說法是否屬實另當別論，因為有證據顯示，糾紛的真正起因是她想漲韋塞爾的房租。女房東并不是房主，而是租戶，她還擔心，如果韋塞爾的女友不搬出去，自己將失去對公寓的合法使用權，主要因為那位女友是妓女（她是否仍然接客，后來成為人們津津樂道的桃色話題）。這里的關鍵是女房東與共產黨有關系。盡管共產黨不贊成她在丈夫去世時堅持在教堂為他舉行葬禮，但還是決定幫她擺平房客。就在前一天，共產黨宣稱一位本地黨員在與褐衫軍交戰時被槍殺，房租糾紛為共產黨人提供了一個理想的報復機會。他們覺得韋塞爾可能有武器，于是派人到附近的酒館找來本地惡棍阿里·赫勒爾（Ali Höhler），由他充當打手去公寓討伐韋塞爾。誰都知道赫勒爾有槍，他不僅是鄰區紅色陣線戰士同盟支部的成員，還曾因輕罪、偽證罪和拉皮條被判過刑，是組織有序的柏林犯罪集團的成員，從他身上可以看出共產黨與犯罪之間的關聯，這種關聯很可能形成于該黨以德國各大城市的貧民區和“犯罪高發區”為根據地的時候。赫勒爾與共產黨員埃爾溫·呂克特（Erwin Rückert）一起爬上樓梯，來到韋塞爾的公寓，其他人站在外面放哨。當韋塞爾打開門時，赫勒爾開了槍。韋塞爾倒下，頭部受重傷，在醫院里撐了幾星期之后，于2月23日不治身亡。[[82]](#82_3)

共產黨匆忙發起一場宣傳戰，將韋塞爾描繪成皮條客，將赫勒爾的行為說成是黑社會糾紛引起的，與紅色陣線戰士同盟無關；與此同時，戈培爾也對此事大肆渲染，把韋塞爾塑造成一位政治烈士。他采訪了韋塞爾的母親，從她對兒子的描述中提煉出一個理想主義者的形象：他把女友從皮肉生涯中解救出來，并且滿懷豪情地投身于祖國的事業，最終犧牲了生命。戈培爾宣揚說，共產黨則相反，招募赫勒爾這樣的慣犯加入他們的隊伍，這恰恰顯示了該黨的本來面目。韋塞爾剛死不久，戈培爾就開始加緊對他進行全方位的神化，全國的納粹刊物上有無數的文章稱頌他是“為‘第三帝國’犧牲的烈士”。肅穆的送葬隊伍走在街上，如果不是警方限制了人數，隊伍還會壯大得多。據戈培爾說，多達3萬人在通往教堂的街道兩邊目送靈柩。紅色陣線戰士同盟喊口號、襲擾、企圖打斷葬禮，導致葬禮現場的外圍出現野蠻的暴力場面。在戈林、普魯士的奧古斯特·威廉親王（Prince August Wilhelm of Prussia）等各路貴賓的注視下，戈培爾在墓前盛贊韋塞爾，其措辭有意讓人們想起基督為世人做出的犧牲——“通過犧牲實現救贖”。他宣告：“你與德國同在，霍斯特·韋塞爾！”然后一支由沖鋒隊員組成的合唱隊演唱了韋塞爾數月前所作的幾首詩：

高舉旗幟！同志們緊密團結！

沖鋒隊員在進軍，腳步勇敢堅毅。

與我們同行、與我們并肩前進的靈魂，是那些

被紅色陣線和反動派射殺的同志！

把街道清空，讓褐色的隊伍通過，

把街道清空，讓沖鋒分隊的男子漢通過！

卐字旗上匯聚了萬眾希冀的目光。

自由的曙光和面包就在我們手中！

此時，決戰的號角終于吹響！

因為我們厲兵秣馬，已經萬事皆具！

希特勒的旗幟即將遍地飄揚。

我們受奴役的日子即將過去！[[83]](#83_3)

這首歌在黨內本來已經逐漸流行，此時戈培爾更是將其四處傳揚，預言它將很快在學生、工人、士兵的口中，在每個人的口中傳唱。他說對了。那年尚未結束，此歌即被發表，灌錄成唱片，正式成為納粹黨黨歌。1933年之后，它實際上成為第三帝國的戰歌，與歷史悠久的國歌《德意志之歌》（Deutschland, Deutschland über Alles）并用。[[84]](#84_3)由于納粹黨的宣傳，韋塞爾成了受到近乎宗教式崇拜的世俗偶像，在電影中受到贊美，在無數儀式、紀念館和朝圣地受到紀念。

此歌如此公開贊美野蠻的武力，卻能成為納粹黨的戰歌，充分說明暴力在納粹黨追求權力的過程中所起的核心作用。為了達到宣傳目的，戈培爾這類手腕高明的宣傳者不擇手段地對它加以利用，使暴力成為像韋塞爾這樣的普通褐衫軍青年的一種生活方式，正如暴力之于紅色陣線戰士同盟的年輕失業工人。其他歌曲則更加露骨，比如流行的《沖鋒縱隊之歌》（‘Song of the Storm Columns’），它是1928年以后褐衫軍在街上行進時高唱的歌曲：

我們是沖鋒縱隊，個個全力以赴，

我們是開路先鋒，人人英勇作戰。

辛勞中汗濕雙眉，腹無充饑之物！

粗糙黝黑的雙手，緊緊握住槍桿。

為了種族之戰，沖鋒隊枕戈待旦。

只有血洗猶太人，我們才得解放。

不再談判；談也沒用，毫無作用：

在阿道夫·希特勒身邊，我們英勇作戰。

阿道夫·希特勒萬歲！我們在前進。

我們以德意志革命的名義沖鋒陷陣。

躍上路障！只有死亡能夠打倒我們。

我們是獨裁元首希特勒的沖鋒縱隊。[[85]](#85_3)

這種攻擊欲在經常與敵方準軍事組織發生的街頭沖突中找到了發泄渠道。在共和國中期，從1924年開始，各方確實都有所收斂，政治暴力的規模不及1919年1月的起義、1920年魯爾區的內戰和1923年的多起沖突。不過，他們雖然收起了機關槍，卻換上了橡皮棍和指節金屬套。即使在相對穩定的1924—1929年，據稱仍有29名納粹積極分子被共產黨殺死，而共產黨方面則宣布有92名“工人”死于1924—1930年與“法西斯分子”的沖突。1924—1928年，據說有26名“鋼盔”成員在與共產黨的斗毆中倒下，有18名帝國國旗團成員死于各種政治暴力事件。[[86]](#86_3)這些只是敵對的準軍事團體之間不斷爭斗的最嚴重后果。此外，爭斗還造成了數千人受傷，其中許多人的傷情要比鼻青臉腫或傷筋動骨更嚴重。

傷亡數字在1930年急劇增加，納粹黨聲稱有17人死亡，1931年增至42人，1932年增至84人。1932年納粹黨還報道說，有近萬名基層黨員在與對手的沖突中受傷。共產黨報道說死于與納粹黨戰斗的黨員，1930年有44人，1931年有52人，1932年僅上半年就有75人。帝國國旗團在1929—1933年有50多人死于與納粹黨的街頭沖突。[[87]](#87_3)官方資料基本上證實了這些說法，國會的一份估算顯示，截至1931年3月，死亡人數不少于300，無人對此數據提出質疑。[[88]](#88_3)共產黨也在挑起街頭沖突中發揮了作用，它的投入程度不亞于納粹黨。例如，當紅色陣線戰士同盟一支百人小分隊的負責人、水手里夏德·克雷布斯受命前往不來梅，去干擾由赫爾曼·戈林發表演說的納粹黨集會時，他周到地給“每個人都配備了金屬棍或者指節金屬套”。克雷布斯起身發言，剛開口說話，戈林就下令把他扔出去。大廳里連成警戒線的褐衫軍沖入中心區，于是：

可怕的混亂隨之而來。金屬警棍、指節金屬套、棍棒、嵌著沉甸甸搭扣的皮帶、酒杯和酒瓶都被用作武器。玻璃碎片和椅子在聽眾的頭頂橫飛。雙方人馬掰下椅子腿當棒子用。女士們在混戰的沖撞和尖叫聲中嚇昏過去。打斗者在恐懼卻無助的觀眾中間左閃右躲，已有數十人頭破血流、衣衫撕裂。沖鋒隊員獅子般地戰斗著。他們有條不紊地把我們擠到主出口。樂隊奏響了一首軍樂。赫爾曼·戈林平靜地站在臺上，雙拳叉在腰上。[[89]](#89_3)

這種場面在1930年代初的德國全境到處上演。暴力在選舉期間尤為嚴重：1932年，在普魯士死于政治沖突的155人中，至少有105人死于6、7月選舉期間；在選戰開始后的7個星期里，據警方統計，有461起政治騷亂，400人受傷、82人死亡。[[90]](#90_3)抑制政治暴力的任務難以實現，因為斗得最狠的幾個政黨每隔一段時間就會達成協議，大赦一次政治犯，于是被釋放出獄的人又加入新一輪斗毆與殺戮。最后一次這樣的大赦于1933年1月20日生效。[[91]](#91_3)

### 二

面對這種迅速惡化的亂局，負責維持秩序的警方對魏瑪民主制度顯然不夠忠誠。與軍隊不同，警方在1918年之后不斷被分權。然而，柏林由社會民主黨主導的普魯士州政府未能抓住機會建立一支維護公共秩序的新力量，使之成為共和國執法機構的忠仆。警察不可避免地從退伍兵中招募而來，因為適齡人群的絕大部分都曾入伍參戰。新組建的警察力量由退伍的軍官、前專業軍士和自由軍團成員管理，他們從建制之初就定下了帶有軍事色彩的基調，對于維護新的政治秩序沒什么熱情。[[92]](#92_3)他們的后盾是政治警察。政治警察在普魯士有著悠久的傳統，就像在德國的其他州和其他歐洲國家一樣，它的主業是監控和偵查，有時也鎮壓社會主義者和革命者。[[93]](#93_3)與其他警察部門的警官一樣，政治警察部門的警官也認為自己超越政黨政治。他們像軍隊一樣，服務于抽象的概念“國家”或者帝國，而不是服務于新共和國的具體民主機構。因此不足為奇的是，政治警察的監視對象依然既包括極端政治團體，也包括社會民主黨，即普魯士州的執政黨，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政治警察的雇主。于是，主要在政治光譜中的左翼陣營搜尋顛覆分子的古老傳統得以延續下去。[[94]](#94_3)

警察和法官對社會民主黨人的案子表現出了特別明顯的偏見，例如，西里西亞的社會民主黨議員奧托·布赫維茨（Otto Buchwitz）后來曾悲憤地回憶沖鋒隊員自1931年12月以后是如何在他演講時搗亂的。褐衫軍在他的集會上占座位、高聲辱罵他，有一次還朝他開了一槍，驚嚇了聽眾，導致沖鋒隊員與帝國國旗團成員之間發生斗毆，雙方又互開了幾槍。納粹黨和社會民主黨都有不少人被送往醫院，大廳中的桌椅沒有一張完好無損。在這之后，布赫維茨早上出門上班時，8至10名納粹沖鋒隊員組成的團伙在其住宅外騷擾他；午餐后他返回辦公室時，20或更多的人圍堵他；下班回家時，又有一兩百人在路上滋擾，高唱一首專門為他寫的歌，歌詞是“左輪手槍一響，布赫維茨聽天由命！”納粹的示威者總是徘徊在他家門外，反復呼喊：“布赫維茨去死吧！”他報警尋求保護，但警方置之不理。不僅如此，當1932年他因國會解散而失去議員豁免權時，即被拘送法庭，罪名是在1931年12月的斗毆中非法持有武器，被判監禁三個月。參與斗毆的納粹黨徒無一受到起訴。獲釋后，布赫維茨的持槍申請遭到拒絕，但他還是一直隨身帶槍，如果褐衫軍靠得太近，他就張揚地拉開保險栓。他向普魯士內政部長、社會民主黨人卡爾·澤韋林訴苦，對方的答復是，他當初就不該卷入槍戰。有一件事讓布赫維茨更強烈地感覺遭到了社會民主黨領導層的背叛：他打算在一位被納粹黨槍殺的帝國國旗團成員的葬禮上發表演說，演說前，一大群共產黨基層積極分子出現在他面前，告訴他褐衫軍已制定了暗殺計劃，他們是來保護他的；警察和帝國國旗團卻都沒有出面。[[95]](#95_3)

在警方眼里，紅色陣線戰士同盟成員就是罪犯。這不僅是警方長期把犯罪與革命混為一談的結果，也反映了這樣一個事實：共產黨的據點往往設在貧民區，那里是有組織犯罪的中心區。對警方來說，紅色陣線戰士同盟成員是尋求物質利益的惡棍；對共產黨來說，警方是維護資本主義秩序的鐵拳，必須予以摧毀，他們經常把警察當作暴力攻擊乃至謀殺的目標。這意味著在與共產黨的沖突中，疲憊、緊張、恐懼的警員往往輕易地使用他們的配槍。1929年發生在柏林的曠日持久的斗毆以“血腥五月”（Blood-May）著稱，包括無辜路人在內的31人被殺，其中多數死于警察槍下；共產黨在工人階級聚居的威丁區舉行示威游行的過程中，有200多人受傷、1,000多人被捕。報道這些事件的報紙記者遭到警察的毆打，又招來了媒體更加嚴厲的抨擊，而警察們對此的反應是不加掩飾地表現出對民主政治秩序的蔑視，因為這種秩序無法保護他們免受傷害與侮辱。[[96]](#96_3)

共產黨不斷就警權問題發起論戰，社會民主黨也試圖抑制警權，導致警方與共和國漸行漸遠，加上受困于晉升的緩慢，許多年輕警察感覺職業前途受阻。[[97]](#97_3)與在其他國家一樣，指紋鑒定、照相術和法醫學作為效果驚人的輔助偵查新手段受到了高度重視，因此刑偵人員的職業化在德國取得長足發展。有些警察憑借個人才華成為著名偵探，比如柏林兇殺案偵緝隊隊長恩斯特·格納特（Ernst Gennat），而且警方在1920年代中期偵辦重案的破案率令人贊嘆。但報刊等新聞媒體卻對警方惡評如潮，因為他們未能在接連有人遇害之前及時抓住連環殺手，比如漢諾威的弗里茨·哈爾曼和杜塞爾多夫的彼得·屈滕。而警方則認為，泛濫成災的政治暴力和混亂的時局正在迫使他們把偵辦上述罪案的寶貴資源抽調出來。[[98]](#98_3)因此，警方開始認同納粹黨對魏瑪共和國的抨擊，也就不足為奇了。1935年的一份報告稱，有700名穿制服的警察在1933年之前成為納粹黨員，漢堡的240名警官中，有27人在1932年之前加入納粹黨。[[99]](#99_3)

盡管如此，總理布呂寧還是決定動用警察遏制左翼和右翼的政治暴力，因為街頭的混亂嚇得外國銀行不敢給德國發放貸款。[[100]](#100_3)1931年發生的兩起嚴重事件更加堅定了他的決心。4月，褐衫軍在德國東北部的負責人瓦爾特·施滕尼斯（Walther Stennes）與納粹黨總部發生糾紛，并且短暫地占領納粹黨在柏林的中央機關，痛毆了駐守在那里的黨衛隊，戈培爾被迫逃往慕尼黑。施滕尼斯譴責黨內大佬的奢侈作風，說他們背叛了社會主義原則。盡管施滕尼斯無疑清晰地表達了某些沖鋒隊員的感受，但真正支持他的人卻寥寥無幾。實際上，有跡象表明他暗中接受了布呂寧政府的資金，為的是在納粹黨內制造分裂。希特勒罷免了未能阻止這場亂子的褐衫軍負責人弗朗茨·普費弗·馮·薩洛蒙，從玻利維亞召回流亡的恩斯特·羅姆接管該組織，并強制每位褐衫軍成員向他宣誓效忠。施滕尼斯被開除，此事的連帶結果是，許多保守派商界人士和軍事將領開始認為，納粹運動已失去它的大部分顛覆力。[[101]](#101_3)然而，在沖鋒隊員不懈的行動力與納粹黨領導層的政治考量之間，依然存在著切實的矛盾，這些矛盾將在未來一再顯現。[[102]](#102_3)更嚴重的是，施滕尼斯的叛逆行動表明許多褐衫軍成員熱衷于訴諸大規模的革命暴力，神經緊張的德國政府并非沒有注意到這個問題。

1931年11月曝光的博克斯海姆文件（Boxheim documents）證實了人們的懷疑。這些由黑森州警方起獲的納粹文件顯示，沖鋒隊正在策劃一場暴動，然后實行食物配給制，廢除貨幣，強制所有人參加勞動，不服從命令者殺無赦。事實與警方的說法有些出入，因為博克斯海姆文件實際上僅僅具有地區性意義，它們是黑森州納粹黨的一位年輕官員維爾納·貝斯特（Werner Best）在上級不知情的情況下制定的，一旦共產黨企圖在黑森州發動起義，這些文件將用于指導納粹黨制定對策。希特勒迅速撇清自己與此事的關系，并且命令沖鋒隊的所有指揮官停止擬定此類應變計劃。由于缺乏明顯的證據以叛國罪起訴貝斯特，刑訴程序最終不了了之。[[103]](#103_3)但是破壞已經造成。在布呂寧的推動下，禁止穿政黨制服的總統令于12月7日頒布。為了表達對禁令的支持，布呂寧措辭強硬地攻擊納粹黨的不法行為。在談到希特勒一再承諾要通過合法途徑掌權時，布呂寧說：“如果某人聲稱要靠合法手段上臺，然后卻逾越法律的邊界，那就不是合法的。”[[104]](#104_3)

制服禁令收效甚微，因為褐衫軍依然游行，只不過換上了白襯衫，暴力行為在冬季繼續發生。關于共產黨即將舉行起義的謠言，加上來自施萊謝爾的壓力，使布呂寧暫時罷手；但是共產黨在漢堡、黑森和奧爾登堡的選舉失利，又在1932年春季使他相信，全面取締褐衫軍的時機到了。在其他政黨——尤其是社會民主黨——的強大壓力和憂心忡忡的軍方的支持下，布呂寧和格勒納將軍（布呂寧于1931年10月任命當時擔任國防部長的格勒納兼任內政部長）說服猶豫不決的興登堡于1932年4月13日頒布法令，宣布沖鋒隊為非法組織。警察突襲了褐衫軍在全國各地的辦事機構，沒收了軍事裝備和徽章。希特勒怒不可遏，但束手無策。盡管有禁令，然而沖鋒隊的隊伍仍在許多地區暗中發展壯大。例如在上西里西亞和下西里西亞，沖鋒隊的人數在1931年12月為17,500人，到翌年7月發展到不少于34,500人。取締褐衫軍僅稍稍起到了抑制政治暴力的作用，基層警察中的納粹黨同情者給了納粹黨準軍事組織相當大的自由度使其可以繼續運行。[[105]](#105_3)因此，認為禁令如果能夠持續執行一年或者更長時間，納粹黨及其準軍事組織基本上就會銷聲匿跡，這樣的說法是非常不著邊際的。[[106]](#106_3)

納粹黨在大選中取得突破性勝利之后，新形勢不僅使街頭暴力急劇升級，而且徹底改變了國會程序的性質。國會的議事秩序在1930年9月之前就已經相當吵鬧混亂，此時基本上失去了控制，107位身穿褐衫制服的納粹黨議員與77位紀律嚴明、組織完善的共產黨議員一起，不停地引發議事程序問題。他們大喊大叫，打斷對方的發言，時時刻刻展示他們對立法機構的全然蔑視。國會的權力以驚人的速度流失，幾乎每次會議都在騷亂中結束，召集議員開會變得似乎越來越沒有意義了。從1930年9月開始，議案的討論均以多數票否決而告終。國會議事規則得到修改之后，阻撓議事比原先困難了，于是極右翼和極左翼政黨在一次辯論中公然離席退出，國會意識到自身已無法正常運行，遂于1931年2月宣布休會6個月。議員們直到10月才重返國會。[[107]](#107_3)1920—1930年，國會平均每年開會100天。1930年10月至1931年3月，國會開會50天。此后直到1932年7月選舉，僅開會24天。從1932年7月至1933年2月的6個月內僅開了3天會。[[108]](#108_3)

因此，到1931年，決策已經不再真正由國會做出。政治權力旁落：落到了興登堡周圍的圈子，因為他有權簽署總統令、有權任命內閣；也落到了街頭，那里暴力繼續升級，國家所面臨的日益加劇的貧困、痛苦和無序，越來越迫切地需要采取行動。權力向這兩個方向的分流，極大地提高了軍隊的影響力。只有在這種環境中，軍隊最重要的政治代理人庫爾特·馮·施萊謝爾將軍才會成為隨后那場大戲的主角之一。施萊謝爾野心勃勃、思維敏捷、十分健談，而且過于熱衷通過政治陰謀牟取私利。他原先不甚知名，1929年突然顯赫起來，執掌了“軍政聯絡辦公室”（Ministerial Office）。這是一個為他而設的新機構，其功能是代表軍方處理與政府的關系。施萊謝爾是格勒納多年的密切合作者，而且是1920年代初的軍方首腦漢斯·馮·澤克特將軍的門徒，當時剛剛接管國防部的陸軍處。他通過掌管協調軍務與政務的各種機構積累了許多政治人脈。俄國共產黨內的異見人士列夫·托洛茨基將他描繪為“佩戴著將軍肩章的一個問號”，同時代的一位記者將他視為“穿軍裝的斯芬克斯”。然而，施萊謝爾的大多數目標和信念是足夠清晰的：像1932年的許多德國保守派一樣，他認為專制政權的合法性可以通過利用并馴化納粹黨的民眾力量而獲得。這樣，施萊謝爾為之代言并依然與之保持密切關系的德國軍方就可以在重整軍備的過程中達到自己的目的。[[109]](#109_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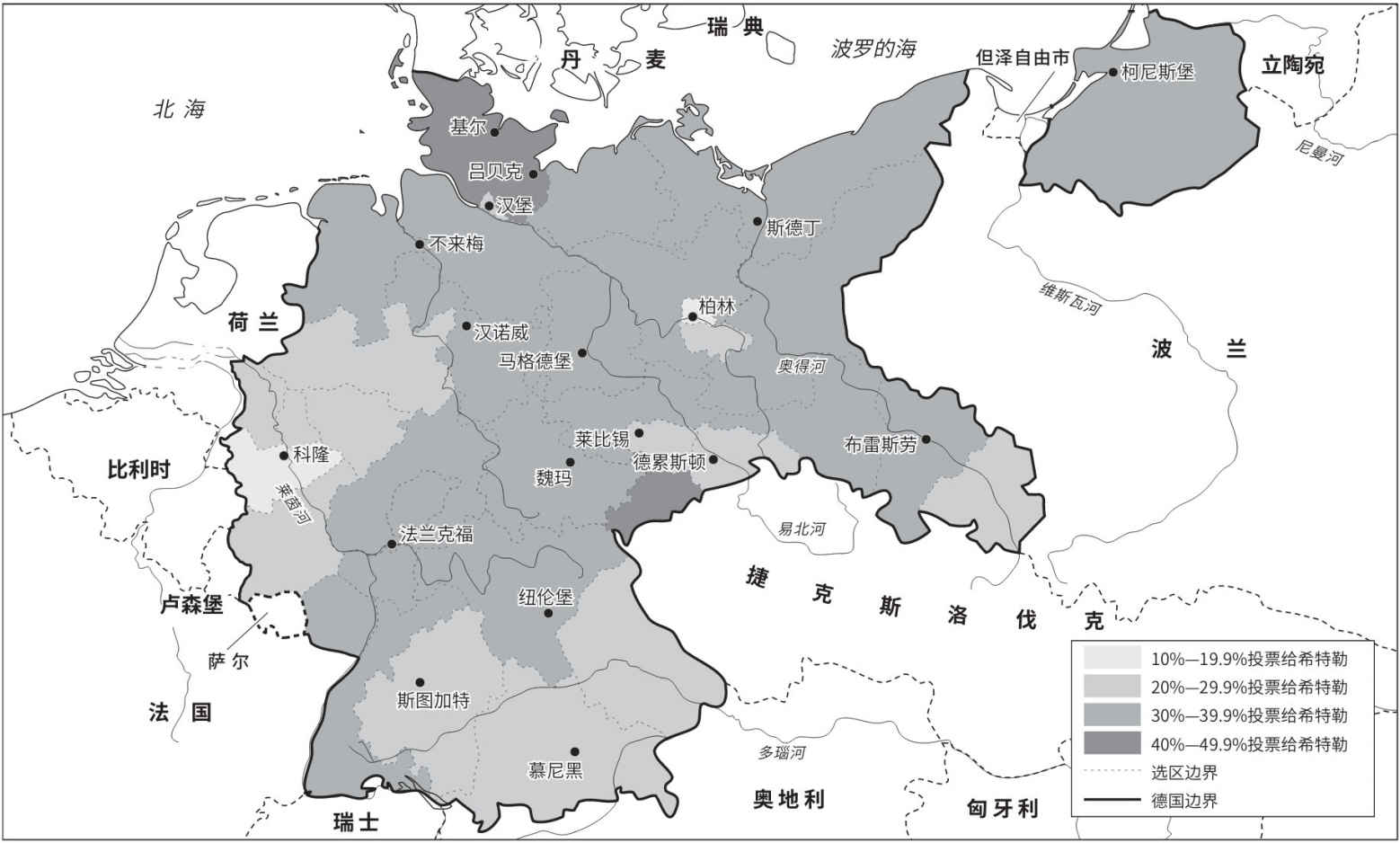
1930年9月的選舉之后，布呂寧政府與施萊謝爾和總統興登堡周圍的圈子越來越格格不入。共產黨和納粹黨揚言要對他暴力相向，民族黨試圖罷免他，極右翼邊緣團體為是否支持他而發生分歧，布呂寧別無選擇，只好依靠社會民主黨。社會民主黨依然是國會中的最大黨，其領導層由于對選舉結果深感震驚而承諾不再像從前那樣反對預算案。布呂寧的政策依賴于社會民主黨的默許，這導致他根本無法獲得興登堡圈子的認可。興登堡圈子由興登堡的兒子奧斯卡（Oskar）和國務秘書奧托·邁斯納（Otto Meissner）[\*](#_235)領導，他們認為布呂寧的做法是可恥的，是向左派妥協。[[110]](#110_3)總理布呂寧此時的當務之急主要是外交政策，他在中止戰爭賠款方面取得了一些進展——1931年6月20日的《胡佛延債宣言》宣布中止賠款，并在1932年7月的洛桑會議（Lausanne Conference）上正式生效，布呂寧為洛桑會議打下了主要基礎。盡管沒能實現德奧關稅同盟（Austro-German Customs Union）的建立，但他確實在日內瓦進行了成功的談判，使各國最終在1932年12月承認了德國在裁軍問題上的平等地位。然而，這一切都未能鞏固布呂寧的政治地位。執政數月之后，他仍未贏得民族黨的支持，仍然依賴于社會民主黨。這意味著無論是布呂寧，還是興登堡的圈子，如果打算把憲法的關鍵內容朝著專制的方向修改，必會遭到有效的阻撓，因為這是社會民主黨永遠不會同意的事情。在施萊謝爾這類人看來，把政府的群眾基礎從社會民主黨轉移到納粹黨，似乎越來越成為更優的選擇。[[111]](#111_3)

### 三

進入1932年，備受尊崇的保羅·馮·興登堡的7年總統任期行將結束。考慮到自己84歲的高齡，興登堡不愿意再參選，但他露出口風：如果不經選舉而直接延長他的任期，他是愿意留任的。自動延長興登堡總統任期的談判失敗了，因為納粹黨拒絕參加國會投票以決定是否對憲法進行必要的修改，除非同時罷免布呂寧，并且重新舉行大選。納粹黨顯然盼著在大選中成為更大的贏家。[[112]](#112_3)興登堡因此不得不屈尊再一次向選民展現自己，然而這次的形勢與他1925年第一次競選總統時截然不同。臺爾曼當然再次代表共產黨出面競選。但此時在右翼陣營中，興登堡遠遠落后；實際上，自1930年9月納粹黨在大選中取得壓倒性勝利之后，各個政治陣營全部向右翼偏轉。一旦宣布舉行大選，希特勒幾乎不可避免地會作為候選人出面參選。然而，他為此猶豫了幾個星期，擔心競爭不過這位民族主義偶像、坦嫩貝格戰役的英雄。而且從法律上來說，希特勒甚至不具備參選資格，因為他尚未取得德國公民身份。于是有人急忙為希特勒做了安排，他被任命為布倫瑞克（Braunschweig）的公務員，通過這個途徑自動賦予他德國公民身份，此身份在1932年2月26日他宣誓效忠（像所有公務員必須做的那樣，對著魏瑪憲法宣誓）時得到了確認。[[113]](#113_3)他的參選使大選變成右翼與左翼之間的競爭，希特勒無疑是右翼陣營的候選人，這讓興登堡出人意料地、不可思議地成了左翼陣營的候選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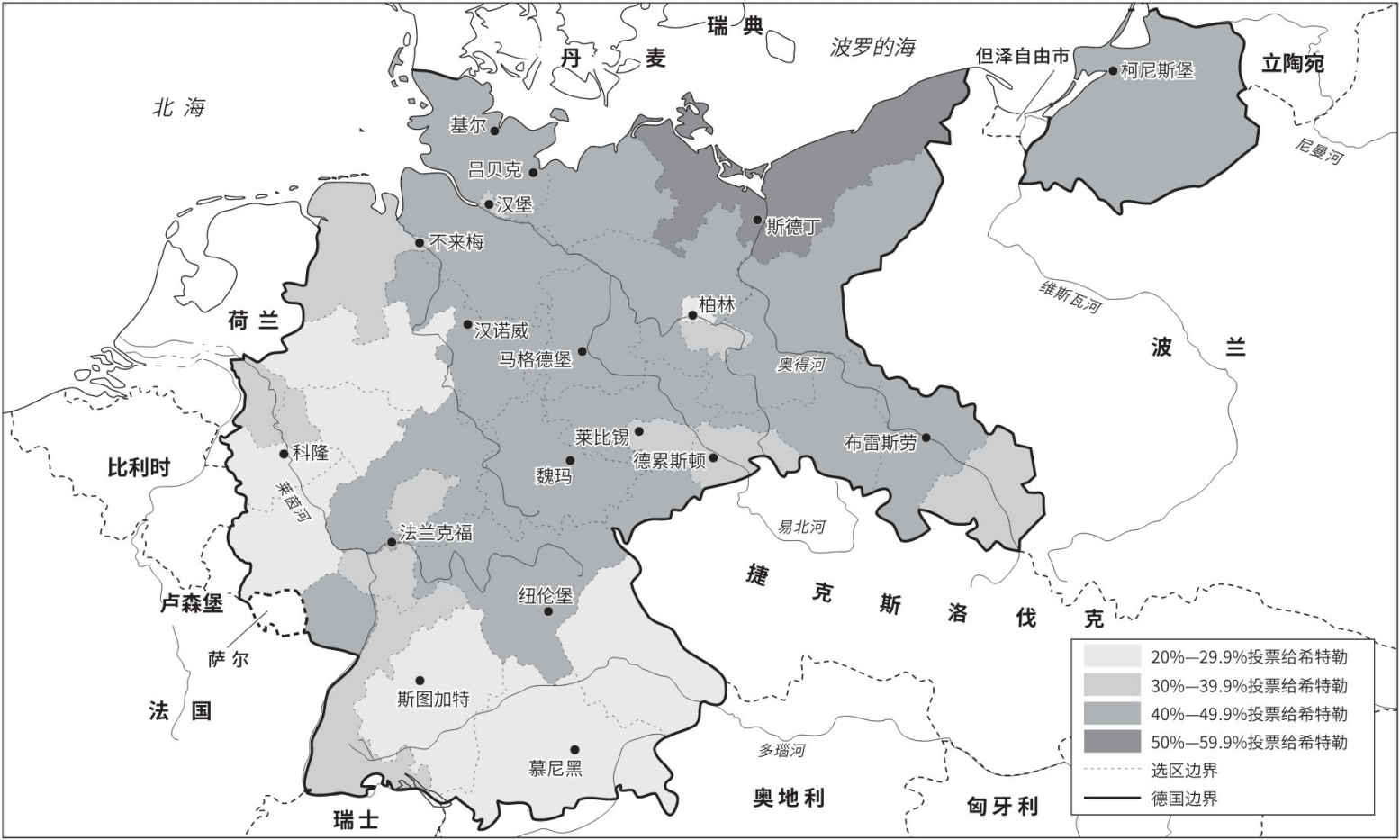
中央黨和自由派支持興登堡，但是特別令人驚訝的是社會民主黨對他的大力支持。這不僅因為該黨認為他是唯一可以阻止希特勒的人——這一點是該黨在整個選戰期間一再宣傳的，同時也有積極的原因。社會民主黨領導層渴望興登堡再次當選，因為他們認為他會讓布呂寧留任，這是恢復民主常態的最后機會。[[114]](#114_3)普魯士州部長會議主席、社會民主黨人奧托·布勞恩（Otto Braun）宣稱，興登堡是“沉著與忠貞的化身，體現了男子漢為全民族盡職盡責的忠誠與奉獻精神”，“他有著純潔的愿望和穩健的判斷力，他所做的工作為后人的建設打下了基礎”。[[115]](#115_3)正如這些令人驚訝的句子所顯示的那樣，社會民主黨此時已開始與政治現實脫節。布呂寧以防止形勢惡化的名義削減開支，社會民主黨對此忍耐了18個月，結果導致該黨被排擠到政壇的邊緣，失去了決策權。盡管社會民主黨人普遍感到幻滅、感到被出賣了，但他們那紀律嚴明的政黨機器仍然適時地將800多萬張選票投給了一個將要從上層瓦解共和國的人，為的是讓此人保住布呂寧的總理職位。興登堡實際上既不喜歡也不信任布呂寧，而且布呂寧的政策降低了民眾的生活標準，使社會民主黨所代表的那個群體中的人失去了工作。[[116]](#116_3)

納粹勝選的威脅是真真切切的。戈培爾的宣傳機器找到了既能打擊興登堡又不致侮辱他的措辭：他已經為國家做出巨大貢獻，現在到了該讓賢給年輕人的時候了，否則國家將繼續滑向經濟混亂和政治無政府狀態。納粹黨發動了一場大規模的競選活動，包括舉行公眾集會、示威游行和會議，輔之以海報和傳單，并且沒完沒了地在報刊上撰文說教。但這尚不足以成事。在第一輪投票中，希特勒僅贏得30%的選票。盡管社會民主黨和中央黨的選舉班子做出了種種努力，但興登堡仍未能順利獲得所需的絕對多數選票，僅得到49.6%的選票，勝選所需的票數近在咫尺，卻可望而不可即。左翼陣營的另一個人選是臺爾曼。在右翼陣營，興登堡的競爭者不僅有希特勒，還有“鋼盔”推出的候選人特奧多爾·杜斯特伯格，他在第一輪投票中獲得6.8%的選票。興登堡如果能得到這部分選票，勝選將會綽綽有余。[[117]](#117_3)



地圖12　1932年總統選舉，第一輪

為了備戰希特勒、興登堡和臺爾曼之間的決勝投票，納粹黨全力以赴。希特勒租了架飛機，從德國的一座城市飛往另一座城市，縱橫全國發表了46場演講。這個史無前例的、被稱為希特勒的“飛越德國”的舉動，產生了驚人的效果。努力得到了回報。臺爾曼的得票率降至微不足道的10%，而希特勒的得票率激增至37%，即1,300多萬張選票。興登堡得到除共產黨和納粹黨以外所有大黨的支持，得票率卻僅增至53%。當然，盡管第一輪投票有點兒不順利，但興登堡的再次當選是從一開始就可預見的。真正值得注意的是納粹黨的一路高歌猛進。希特勒沒有當選，但他的黨贏得了多于以往的選票，開始顯露出銳不可當之勢。[[118]](#118_3)1932年，在組織上和資金上都比1930年更有實力的納粹黨采取了美國式的總統競選策略，著重宣揚希特勒是德國全體人民的代表。納粹黨沒有將精力過多地集中在贏得工人階級選票上——1930年的選戰基本就敗在此處，而是側重于爭取中產階級的選票，這部分選票原先流向了從大政黨中分裂出來的小政黨，以及信奉新教的自由派和保守派政黨。經歷了失業率越來越高、經濟危機日益嚴重的18個月，這部分選民的立場趨于激進，因為他們對魏瑪共和國感到失望，而過去7年來在共和國主政的恰恰是興登堡。戈培爾的宣傳機器比以往更加精確地把目標受眾鎖定為幾個特定的選民群體，首先是女性群體。在信奉新教的鄉村地區，農村人口的不滿情緒已積聚到相當程度，以至于第二輪選舉時希特勒在波美拉尼亞、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和東漢諾威事實上已經戰勝了興登堡。[[119]](#119_3)納粹黨成為德國最受歡迎的政黨，這種新取得的地位又由于納粹黨翌年春天在州選舉中的獲勝而得到加強——在普魯士州的得票率為36.3%，巴伐利亞州32.5%，漢堡州31.2%，符騰堡州26.4%，最重要的是在薩克森—安哈爾特州（Saxony-Anhalt）贏得40.9%的選票，獲得了組建州政府的權力。希特勒再次搭乘飛機，短時間內接連發表25場演講。納粹的宣傳機器再次證明了自己的效率與活力。



地圖13　1932年總統選舉，第二輪

布呂寧試圖抑制納粹黨的崛起，他的努力顯然沒有產生任何作用。對興登堡總統的許多幕僚來說，改變策略的時機成熟了。雖然選舉獲勝，但興登堡對結果根本不滿意。他越來越把自己的地位等同于他曾服務過的、不經選舉產生的皇帝，受到如此強烈的反對，他自然十分惱火。布呂寧的主要罪過在于沒能說服民族黨人支持興登堡連任，當他們明確表示支持希特勒時，布呂寧的日子也就所剩無幾了。在許多人看來，高齡的陸軍元帥代表著普魯士的君主制傳統和新教保守主義傳統，雖然總理布呂寧不知疲倦地為他助選，但興登堡非常反感自己對社會民主黨和中央黨選票的依賴，因為這讓他看起來像是左翼和神職人員推出來的候選人，實際上他最終也的確如此。此外，軍方越來越無法容忍布呂寧的經濟政策對軍工業產生的破壞性影響，并且認為布呂寧取締褐衫軍的做法妨礙了軍方將他們收編為后備部隊，褐衫軍招募到的人數越多，收編他們的計劃就越有誘惑力。最后，興登堡的注意力被吸引到東部地區州政府所提出的一種溫和的土地改革措施上——拆分破產的田莊，作為小農場提供給失業者。興登堡是土地利益集團的代表，而且擁有自己的田莊，他被說服接受了這種帶有社會主義色彩的措施。[[120]](#120_3)當時，幕后陰謀盛行，施萊謝爾正在削弱格勒納的軍界地位，希特勒承諾接受新政府，前提是它解除對褐衫軍的禁令，并下令重新進行國會選舉。在這種環境下，布呂寧很快變得越來越孤立。當格勒納被迫于1932年5月11日辭職時，布呂寧的處境一目了然。興登堡的幕僚使用詭計繼續挖布呂寧的墻腳，除了辭職，布呂寧別無選擇，遂于1932年5月30日遞交辭呈。[[121]](#121_3)

### 四

興登堡任命的新總理是他的老友弗朗茨·馮·巴本（Franz von Papen）。巴本出身土地貴族，曾是普魯士州議會中一位默默無名、不太活躍的中央黨議員，在立場上甚至比布呂寧更加偏向右翼。一戰期間，擔任德國駐美大使館武官的巴本被驅逐出境，原因是從事間諜活動——用慣用的外交辭令說，就是“與身份不符的活動”——回國后進入德國總參謀部（German General Staff）。他娶了一位富有的企業家的女兒，在1920年代用妻子的嫁妝買下中央黨黨報《日耳曼尼亞報》（Germania）的大部分股份。巴本因此與魏瑪共和國的一些主要社會力量和政治力量建立了密切的聯系，包括土地貴族、外交部、軍方、企業家、天主教會和新聞界。事實上，施萊謝爾當初是把他作為軍方利益的支持者引薦給興登堡的。巴本甚至比布呂寧走得更遠，他是盛行于1930年代初整個歐洲的天主教政治獨裁主義的代言人之一。巴本與他所屬的中央黨長期存在分歧，在1925年總統大選中公開支持興登堡、反對中央黨候選人威廉·馬克思。中央黨與巴本劃清界限，巴本隨即交出黨員證，宣稱他所尋找的是這樣一種組織：“容納一切真正的民族主義力量，無論他們來自哪個陣營，他們的身份不是黨員，而是德意志人。”[[122]](#122_3)雙方就此徹底決裂。[[123]](#123_3)

這些事情顯然標志著德國議會民主制度的終結，事后回想起來也相當明顯。除了幾位至少在名義上是民族黨黨員外，新內閣中的多數成員都不隸屬于任何黨派。巴本和施萊謝爾等一干空想家認為自己創建的是超越黨派的“新政府”，但它其實與多黨執政的原則背道而馳，民選產生的各級議會所擁有的權力，甚至比布呂寧構想的弱勢議會的權力更加有限。他們設計的這種政府，靈感來自巴本的內政部長威廉·馮·蓋爾男爵（Wilhelm Freiherr von Gayl），他曾在1918年《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約》割讓給德國的土地上參與創建了一個專制的種族主義軍政府。[[124]](#124_3)蓋爾的提案包括，把選舉權限制在少數人手中，大幅削減議會的權力。[[125]](#125_3)巴本自我設定的任務，一是要倒轉歷史的車輪，他所要扭轉的，不僅是魏瑪民主制度，還包括法國大革命以來歐洲政壇所發生的一切；二是要重建古代社會的等級制度，以此取代現代社會的階級沖突。[[126]](#126_3)作為這種意圖的一個小而有力的象征，他在普魯士州的一些地方廢除使用斷頭臺執行死刑，因為斷頭臺是法國大革命的經典象征，在19世紀被普魯士州采用，而代之以傳統的普魯士工具——手持斧。[[127]](#127_3)同時，以一種更為立竿見影的方式，巴本政府開始把前任政府用以限制激進報刊的禁令擴展到民主派報紙，在幾個星期內兩次查禁社會民主黨黨報《前進報》等受歡迎的左翼自由派出版物，兩度取締《柏林人民報》（Berliner Volkszeitung）等受歡迎的左翼自由派報紙，這些做法使自由派評論者相信，新聞自由已被終結。[[128]](#128_3)

巴本的烏托邦式保守主義不足以應對1932年的政治現實。組成巴本內閣的人都資歷較淺，其中許多是無籍籍名的貴族，因此常被稱為“男爵內閣”。在布呂寧辭職之前，巴本與施萊謝爾在討論中一致認為，他們應該把納粹黨爭取過來，從而為新政府的反民主政策提供廣泛的民意基礎。他們征得興登堡的同意，解散了國會，下令重新選舉。這是希特勒一直要求的事情，他期待借此進一步增加納粹黨的得票數。選舉定在1932年7月底。此外，他們還答應希特勒的要求，解除了對褐衫軍的取締令。施萊謝爾認為，這樣做可以馴化納粹的極端主義，再加上其他手段，可以說服褐衫軍充當軍隊的后備力量，從而一勞永逸地規避《凡爾賽和約》對德國武裝力量所施加的限制。[[129]](#129_3)但事實證明這是又一個災難性的誤判。成群的沖鋒隊員以凱旋的姿態涌回街頭，斗毆、激戰、傷害和兇殺即使在從前一年4月開始的取締期間也從未絕跡，此時迅速達到了創紀錄的新水平。盡管如此，有一件事仍然引起輿論大嘩：1932年7月17日，數千名納粹沖鋒隊員進軍共產黨的大本營阿爾托納，那是普魯士州靠近漢堡邊界的一座工人階級十分活躍的城市，結果遭到數千名全副武裝的紅色陣線戰士同盟成員的暴力阻擊。里夏德·克雷布斯當時指揮著800名共產黨員水手和碼頭工人，隨時準備將納粹黨徒趕出碼頭區，據他后來匯報，紅色陣線戰士同盟成員奉命在街頭打擊沖鋒隊，他們把石頭、垃圾以及各種各樣的投擲物砸向路過的進軍者。據一些報道，共產黨的神槍手埋伏在房頂上，準備對下面的沖鋒隊員大開殺戒。不知是誰開了一槍，警察立即倉皇開火，能用的武器全用上了，驚慌的人群在彈雨中四散奔逃。共產黨與各色人等都被趕跑了，他們阻擋褐衫軍隊伍穿越其地盤的努力慘淡收場。[[130]](#130_3)18人死亡，上百人受傷。驗尸報告顯示，死者大多殞于警用手槍射出的子彈。德國的政治沖突此時在暴力中越陷越深，顯然已到了需要政府采取行動的程度。[[131]](#131_3)

然而，巴本不但沒有再次取締準軍事團體，反而利用阿爾托納的“血腥星期日”（Bloody Sunday）事件，解散了由社會民主黨人奧托·布勞恩和卡爾·澤韋林領導的普魯士州政府，理由是它已無力維護法律與秩序。這是對社會民主黨的關鍵一擊，巴本被扶上位正是為了實現此目的。巴本此舉有個差可比照的先例，即艾伯特在1923年解散了薩克森和圖林根的州政府，但巴本的目標是遠比這兩州重要得多的普魯士州，其面積占帝國國土的一半以上，居民人數比法國人口還多。在1932年紛爭頻仍的政局中，軍隊的核心地位得到了生動的展示：全副武裝的戰斗部隊開上柏林街頭，宣布整個首都進入軍事緊急狀態。社會民主黨控制的警察力量干脆被排擠出局，普魯士州政府每每試圖調用警察來抗衡軍方的武裝力量，無不以引發混亂而告終。警察人手太少，而且高層和中層警官要么對共和國感到失望、支持巴本，要么就已經被納粹黨爭取了過去。[[132]](#132_3)

如果巴本和施萊謝爾害怕的是工人暴動，那么他們就錯了。帝國國旗團的許多基層成員隨時準備拿起武器，他們已將機關槍、手槍和卡賓槍組裝就緒，以便在發生暴動而警察尚未趕到現場時保護社會民主黨總部，該黨以為警察會出面制止任何企圖顛覆共和國的行動，但事實證明他們想錯了。隨著帝國國旗團力量的壯大，其麾下的共和國護衛隊（Republican Defence Units）成員當時增至20萬以上，但遠遠低于褐衫軍與“鋼盔”加在一起的約75萬人，如果前者舉行暴動，后二者肯定會動員起來進行反擊。帝國國旗團缺乏訓練、準備不足，不可能是裝備精良的德國陸軍的對手，而裝備較好的共產黨肯定不會拿起武器保護社會民主黨。[[133]](#133_3)

在1932年7月的政局中，興登堡、軍方領導層和保守派都極力避免挑起德國內戰，帝國國旗團如果發動武裝起義，有可能會招致巴本的鎮壓或者總統的干涉。沒人知道會發生什么。抵抗的號角從未吹響。社會民主黨一向遵守法律，不許黨員武裝抵抗由政府首腦以及合法組建的政府所批準的、軍方所支持的、警方所不反對的行動。[[134]](#134_3)布勞恩和澤韋林所能選擇的，僅剩下口頭抗議和以違反憲法為由起訴巴本。州法院于1932年10月10日做出的裁決，至少部分地支持了布勞恩內閣，使它得以留在帝國參議院（即國會的上議院）代表普魯士州的利益，繼續做中央政府的肉中刺。[[135]](#135_3)同時，巴本被總統任命為帝國行政長官，負責普魯士州的政府事務，而循規蹈矩的公務員們在法律地位得到解決之前，一直在觀望、不做事。[[136]](#136_3)

巴本的政變給了魏瑪共和國致命一擊。它破壞了聯邦原則，為國家全面實行中央集權開辟了道路。此時無論發生什么，都不太可能完全恢復議會民主制度。1932年7月20日之后，現實的選項僅剩下納粹獨裁體制或者由軍方支持的保守派專制政權。社會民主黨人沒有對巴本政變進行絲毫認真的抵制，作為民主制度尚存的主要捍衛者，他們的消極表現產生了決定性影響：保守派和納粹黨據此斷定，民主制度的毀滅不會遇到任何認真的反抗。社會民主黨人在政變前已收到大量警報，但他們什么都沒有做。社會民主黨人之所以束手無策，不僅因為政變的后盾正是他們剛剛在總統選戰中支持過的保羅·馮·興登堡，還因為他們在1932年4月的普魯士州議會選舉中慘敗。納粹黨在普魯士州議會中的席位從9席增至162席，共產黨從48席增至57席，而社會民主黨失去了三分之一席位，從137席降至94席。此時，沒有哪個黨占有絕對多數席位，布勞恩和澤韋林領導的當屆政府以少數黨的身份繼續執政，其政治合法性也相應減弱。此外，在社會民主黨被迫忍受布呂寧大幅削減政府開支政策的幾個月里，其領導層普遍有一種無力感。工會沒有力量采取任何行動來反對政變，因為大量的失業導致總罷工不可能實現；數百萬絕望的失業者沒什么選擇的余地，肯定會接手罷工者的工作，工會知道這一點。因此，1920年挫敗卡普暴動的那種總罷工不可能再次發生。納粹黨徒歡欣鼓舞。“只需對赤色分子露出牙齒，他們就會服軟”，納粹黨宣傳首腦約瑟夫·戈培爾在7月20日的日記中寫道。他滿意地看到，社會民主黨和工會“連一個指頭也沒動”。不久之后他又寫道：“赤色分子錯過了有利時機。機會不會再來了。”[[137]](#137_3)

[\*](#_234) 奧托·邁斯納（1880—1953），整個魏瑪共和國時期和希特勒政府初期的德國國務秘書（1923—1937）。

## 第四節 致命的決策

###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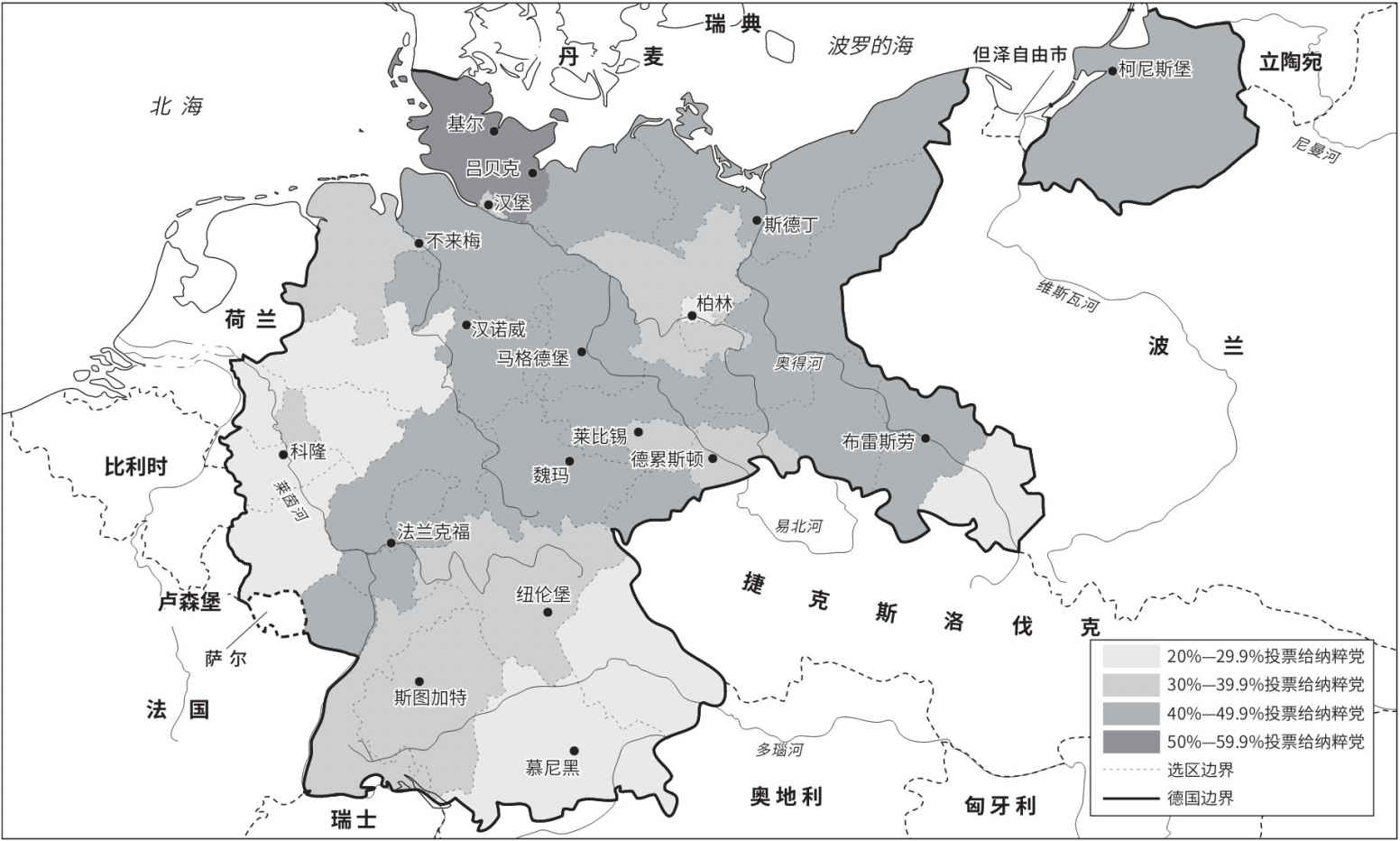
巴本政變發生在德國有史以來最瘋狂、最暴力的選舉期間，選戰的氣氛甚至比兩年前那次更不理性、更加狂暴。希特勒再次飛赴全國各地的一個又一個會場，在50多場大型集會上對著人山人海發表演說，譴責魏瑪共和國的分裂、恥辱和失敗，語意含糊但語氣堅定地承諾，將來要讓德國成為一個更加優秀、更加統一的國家。與此同時，共產黨鼓吹革命，宣稱資本主義秩序即將崩潰；社會民主黨號召選民奮起反抗法西斯的威脅；資產階級各政黨主張重新統一德國，這顯然是它們無力實現的。[[138]](#138_3)各政黨的宣傳風格越來越煽情，社會民主黨甚至也不例外，這生動地展示了議會政治的衰落。到處是越來越暴力的街頭沖突和示威活動，政治斗爭已淪為社會民主黨所稱的符號之戰，這樣稱呼并無絲毫批評之意。1931年選戰期間，社會民主黨聘請立場激進的俄國心理學家謝爾蓋·恰霍廷（Sergei Chakhotin）來助選，他是條件反射現象的發現者巴甫洛夫（Pavlov）[\*](#_239)的學生。這樣做是因為社會民主黨意識到僅訴諸理性還不夠，“我們必須訴諸情緒、心靈和感情，以便幫助理性取得勝利”。在實際操作過程中，理性卻被遠遠拋在了后面。在1932年7月的選舉中，社會民主黨要求各地黨組織確保黨員全部佩戴黨徽，相遇時舉起緊握的拳頭互致問候，在恰當的時機高呼口號“自由！”本著同樣的精神，共產黨長久以來一直使用錘子和鐮刀的標志以及各種各樣的口號和問候語。各政黨采用這種風格是為了使自己能夠與納粹黨在同等條件下競技，因為它們發現納粹黨之所以難以被打敗，在于它的卐字符、問候語“希特勒萬歲！”以及簡潔有力的口號。[[139]](#139_3)

為了展現出一種足以與納粹黨的感染力相抗衡的生機勃勃的形象，社會民主黨、帝國國旗團、工會，以及與社會主義者有關的許多其他工人階級組織，于1931年12月16日共同組建“鋼鐵前線”（Iron Front），以對抗“法西斯”威脅。這個新組織大量借用了共產黨和納粹黨開創的一套宣傳方法，冗長、乏味的演講被簡短、犀利的口號取代。勞工運動以往對于教育、理性和科學的強調，將讓位給新的重點，即通過街頭游行、穿制服的行軍和集體示威來激發群眾的情緒。社會民主黨的宣傳新風格甚至發展到設計出了一個用于抗衡卐字符和鐮刀錘子的符號：三支平行箭頭，表示鋼鐵前線的三大主力。這一切都對傳統的勞工運動幫助不大，因為其中的許多成員，尤其是那些在國會中占據領導地位的人，依然對這種展示其政策的新方法心存疑慮，或者確實無法適應它。新的宣傳風格使社會民主黨得以與納粹黨在同等條件下競技，但社會民主黨缺乏進行有效競爭所需的活力、朝氣和極端思想。符號、游行和制服沒有為鋼鐵前線招來新的支持者，因為控制著社會民主黨的依然是其僵化的組織機構。同時，該黨也未能減輕中產階級選民對于勞工運動的意圖所懷有的恐懼。[[140]](#140_3)

更能說明問題的，是1930年代初各政黨在選戰中使用的海報。幾乎所有海報都有一個共同特征：占據醒目位置的是一個巨大的、半裸的工人形象，它從1920年代末開始被用來象征德國人民，取代了謙遜得可笑的、戴著睡帽的小人物“德國米歇爾”（German Michel）[†](#_240)，也取代了那個不太常見的、歷史上作為德國化身的女性形象日耳曼妮婭（Germania）。納粹黨的海報畫著高大的工人屹立在一座標為“國際巨額融資”的銀行上方，用一臺印有卐字符的壓氣機對著它吹出巨大的氣流，摧毀它；社會民主黨的海報畫著高大的工人用胳膊肘擠開納粹黨人和共產黨人；中央黨的海報上是卡通形象的高大工人，衣著也許沒那么暴露，但還是卷起了袖子，強行從國會大廈趕走矮小的納粹黨人和共產黨人；人民黨畫的高大工人只圍了一塊遮羞布，在1932年7月把穿戴整齊的敵對派別的政客們全部掃到一邊，這與競選中實際發生的情況基本上剛好相反；甚至古板的民族黨也在海報中采用了高大的工人形象，但只是揮舞著從前俾斯麥帝國的黑白紅旗。[[141]](#141_3)在德國全境，選民們看到的都是這樣的暴力形象：高大的工人把他們的對手打爛、踢開、揪出國會，或者居高臨下逼視著衣冠楚楚的政客，政客們幾乎一律被畫成無用、吵鬧的侏儒。充滿陽剛氣的男子漢掃除掉吵鬧、低效、娘娘腔的政治派別，這種畫面的海報無論用意如何，其潛臺詞都是，議會政治已經到了該終結的時候；而準軍事團體之間日常的街頭沖突、競選活動中無處不在的制服，以及競選集會上不曾中斷的暴力與混亂，更是直截了當地表達了這個意思。

在宣傳領域，其他政黨都不是納粹黨的對手。戈培爾可能曾抱怨過“他們現在偷走了我們的方法”，但三支箭并沒有像人們所熟悉的卐字符那樣引起深切的共鳴。如果社會民主黨想尋找機會在納粹黨擅長的游戲中擊敗它，就應該早點兒開始。[[142]](#142_3)戈培爾在選戰中所攻擊的，不是巴本內閣的表現，而是魏瑪共和國的表現。因此，這一次納粹宣傳的主要對象是中央黨和社會民主黨的選民。鋪天蓋地的海報、標語、傳單、電影以及在大型露天集會上的演講，用預言災變的口吻描繪了一幅“赤色內戰的陰云籠罩德國”的危急圖景，告訴選民他們所面臨的嚴峻抉擇：要么支持叛國的、腐敗的舊勢力，要么支持國家新生走向輝煌未來。戈培爾及其宣傳團隊的目的是狂轟濫炸式地持續刺激選民的感官，他們向群眾進行公開宣傳，同時逐戶敲門發傳單，使宣傳的覆蓋率達到飽和。在人們找得到的每一塊公共空間，都有麥克風和揚聲器在高聲播放納粹演講。海報和雜志插圖以及街頭的大規模示威和游行所呈現的那些視覺形象，趕走了理性演講和口頭辯論，助長了易于吸收的、煽情的陳詞濫調，從而調動起各種各樣的情緒，包括仇恨心理和攻擊意識，以及對安全與救贖的渴求。褐衫軍游行時的縱隊、僵硬的敬禮方式和納粹領導層的軍人姿態，既給人以有序、可靠的感覺，也顯示了堅定的決心。橫幅和旗幟給人留下的印象是無盡的活力和理想主義精神。納粹黨在宣傳中使用攻擊性語言描述對手，而且沒完沒了地老調重彈，直至把他們的形象定格為“十一月罪人”、“赤色老板”、“猶太幕后操縱者”、“赤色殺人團伙”。然而，納粹黨考慮到需要打消中產階級的疑慮，于是在有些場合，海報中的高大工人被畫成了姿態溫和的樣子——不再粗野且富有攻擊性，而是穿著襯衫，把生產工具遞給失業者，而不是揮舞這些工具當作打倒對手的武器，以此表示納粹黨準備建立負責任的政府。[[143]](#143_3)

這種空前密集的競選宣傳很快帶來了納粹黨所期待的結果。1932年7月31日的國會選舉暴露了巴本策略的愚蠢。選舉不但沒有讓希特勒和納粹黨人變得順從一些，反倒使他們再次實力大增，得票數翻了一倍多，從640萬增至1,380萬張，成為截至當時為止國會中最大的黨，占230席，超出第二大黨社會民主黨將近100席。社會民主黨想方設法讓損失止于十幾席，把133位代表送進了新一屆國會。納粹黨1930年9月獲得的18.3%的得票率也翻了一倍多，達到37.4%。政壇持續不斷的兩極分化，還表現在共產黨議席的增加，此時它從77席增至89席。中央黨也爭取到了更多的選票，在新一屆國會中獲得75席，這是該黨歷來席位數最高的一次；而民族黨的議席則繼續流失，從41席降至37席，致使該黨地位下降，幾乎淪為邊緣型政黨。不過，最驚人的是中間派各政黨的全軍覆沒。人民黨原有的31席失去24席，經濟黨的23席失去21席，國家黨（前身為民主黨）的20席失去16席。從各政黨中分裂出來的各種極右翼派別，在1930年曾贏得中產階級的大力支持，此時也遭到慘敗，原先的55席僅剩9席。于是左翼與右翼在國會交鋒時，隔開他們的是影響力已降至微不足道的中間派：社會民主黨與共產黨加起來共有1,330萬張選票，與之相對的納粹黨有1,380萬張選票，其余政黨的得票數加起來僅有980萬。[[144]](#144_3)



地圖14　納粹黨在1932年7月國會選舉中的得票率

納粹黨在1932年7月的選舉中獲得成功的因素，與1930年9月時大致相同。在兩次投票之間的將近兩年時間里，社會、政治和經濟領域的危機急劇加深，使那些因素比在1930年9月時發揮了更加強大的影響力。選舉結果證實，納粹黨屬于心懷不滿者組成的彩虹聯盟[‡](#_241)，這一次，它對中產階級的號召力大大增強，中產階級顯然克服了兩年前所顯示出的猶豫心理，那次他們倒向了極右翼小派別，此次則幾乎全部加入納粹黨選民的行列。1930年9月國會選舉時支持小黨派的選民中，有二分之一在1932年7月轉投納粹黨；1930年投票給民族黨、人民黨和國家黨的選民中，有三分之一在1932年7月投票給納粹黨。原先不投票者中的五分之一（尤其是女性選民），此次把選票投給了納粹黨。原先投票給社會民主黨的選民中，甚至也有七分之一此次投票給納粹黨。納粹黨爭取到的選民中，有30%是從小黨派那里挖來的，其中包括許多在1924年和1928年投票給民族黨的選民。甚至有一些共產黨和天主教中央黨的選民也轉變了立場，但人數大致被那些轉投這兩黨的原納粹黨抵消了。納粹黨吸引的依然主要是新教教徒，天主教選民中僅有14%支持它，與之形成對照的是，非天主教選民中有40%支持它。1932年7月投票給納粹黨的選民中，有60%來自廣義上的中產階級，40%是賺取周薪的體力勞動者及其家眷，但是與從前一樣，這些絕大多數是出于各種各樣的原因而與勞工運動若即若離的人。納粹黨在各選區的得票數與失業率之間的負相關關系，仍像以前一樣明顯。納粹黨繼續受到所有對社會感到不滿的群體的支持，尤其是中產階級的大力支持；相對不太支持它的，是傳統的產業工人階級和天主教教區，尤其是在勞工運動或者天主教志愿者協會得到了強有力的經濟和制度支持的地區。[[145]](#145_3)

盡管1932年7月的選舉使納粹黨在國會里席位大增，但該黨的領導層依然感到有些失望。在他們看來，這個結果的關鍵之處不是納粹黨得票比在前一次國會選舉中更多，而是該黨在7月的選舉中并不比在同年3月的第二輪總統選舉以及4月的普魯士州議會選舉中表現得更好。因此，他們覺得納粹黨的得票數已達最后的峰值。特別是，盡管付出了巨大努力，但該黨在追求其首要目標，即拉走社會民主黨和中央黨的選票方面，僅取得了有限的成功。所以納粹黨沒有像1930年9月勝選時那樣歡欣鼓舞。戈培爾在日記中坦言自己的感受：“我們贏了一點點”，僅此而已。他的結論是：“照這樣，我們不會贏得絕對多數。”因此，選舉又為這種感覺平添了一種新的緊迫感，用戈培爾的話來說就是：“必須做點什么了。在野的時間結束了。現在就行動！”[[146]](#146_3)第二天他接著寫道，奪權的時刻到了，并記錄道，希特勒同意他的觀點。否則，如果納粹黨堅持通過議會道路掌權，那么其選舉實力的停滯狀態會讓人覺得它可能開始控制不住局面了。然而，希特勒拒絕進入由其他政黨領導的聯合政府，他確實有資格那樣做，因為他的黨此時掌握著有史以來德國國會中一黨所占的最多席位。因此，選舉剛結束，希特勒就堅持只能以總理身份進入政府。唯有坐上這個位置，他才可以在追隨者中間保持其領袖魅力的神秘感。與內閣中的從屬職位不同，總理職位還能給予希特勒有利的機會，利用歸他調遣的全部官方力量，把國家的政體由內閣制轉變為獨裁制。

### 二

1932年8月初發生的一件事，生動地展示了可以怎樣使用那些官方力量。巴本試圖控制局面，于7月29日下令禁止舉行公共政治集會。禁令所起到的作用，僅僅是剝奪了積極分子們釋放灼熱的政治激情的合法渠道，結果進一步刺激了街頭暴力。因此在8月9日，巴本又頒布一項緊急總統令，宣布對任何因憤怒或仇恨而在政治斗爭中殺死對手的人可以適用死刑。他頒布此令的意圖是將之主要施用于共產黨。然而在第二天凌晨，一群醉酒的褐衫軍帶著橡皮棍、手槍和折斷的臺球桿，闖入上西里西亞的村莊波滕帕（Potempa）的一個農場，襲擊了支持共產黨的村民康拉德·皮徂赫（Konrad Pietzuch）。褐衫軍用臺球桿抽他的臉，打得他失去知覺倒在地上，又用靴子狠踢他，最后用左輪手槍結果了他的性命。皮徂赫是波蘭人，因此使這件事既成為一起政治事件也是一起種族事件，而且其中幾個褐衫軍成員與他有私仇。這顯然是總統令的條款所界定的政治謀殺，其中5名褐衫軍成員被逮捕和審理，在附近的小鎮博伊滕（Beuthen）[§](#SS_17)被判處死刑。裁決剛一宣布，身穿褐衫的納粹沖鋒隊就在博伊滕的街上橫沖直撞，打砸猶太人的商店，搗毀自由派和左翼的報館。希特勒私下里和在公開場合都譴責“這個兇殘血腥的裁決”的不公正，赫爾曼·戈林給這幾位死刑犯發出公開的聲援信，“對施加于你們的恐怖判決感到無盡的痛苦和憤怒”。[[147]](#147_3)

希特勒、巴本和興登堡正在談判關于納粹黨加入政府的事宜，此時謀殺案成為其中的一個議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總統興登堡無論如何都不愿意接受希特勒當總理，因為任命一個由勝選政黨的黨魁來領導的內閣，看起來太像是回歸議會制度了。況且此時他還對波滕帕謀殺案感到震驚。興登堡在1932年8月13日居高臨下地告訴希特勒：“我毫不懷疑你對祖國的熱愛。”但接著又說，“對于可能發生的恐怖和暴力行為，比如沖鋒隊員所干的那種令人遺憾的事情，我會盡我所能從嚴處理。”巴本也不愿意讓希特勒領導內閣。談判破裂之后，希特勒宣布：

日耳曼種族的同志們！你們當中任何一位志在為民族的榮譽和自由而奮斗的人，都會理解我為什么要拒絕進入本屆政府。馮·巴本先生的法官最終也許將判處數千名國家社會主義黨人死刑。你們有沒有想到，他們可能還會把我的名字列入這個盲目挑釁的行動、這個向全體人民發出的挑戰？正人君子們被誤導了！馮·巴本先生，現在我知道你那沾滿血污的“客觀立場”指的是什么了！我希望一個民族主義的德國取得勝利，我希望消滅馬克思主義破壞者和腐敗分子。我不適合充當絞殺德國人民的民族主義自由戰士的劊子手。[[148]](#148_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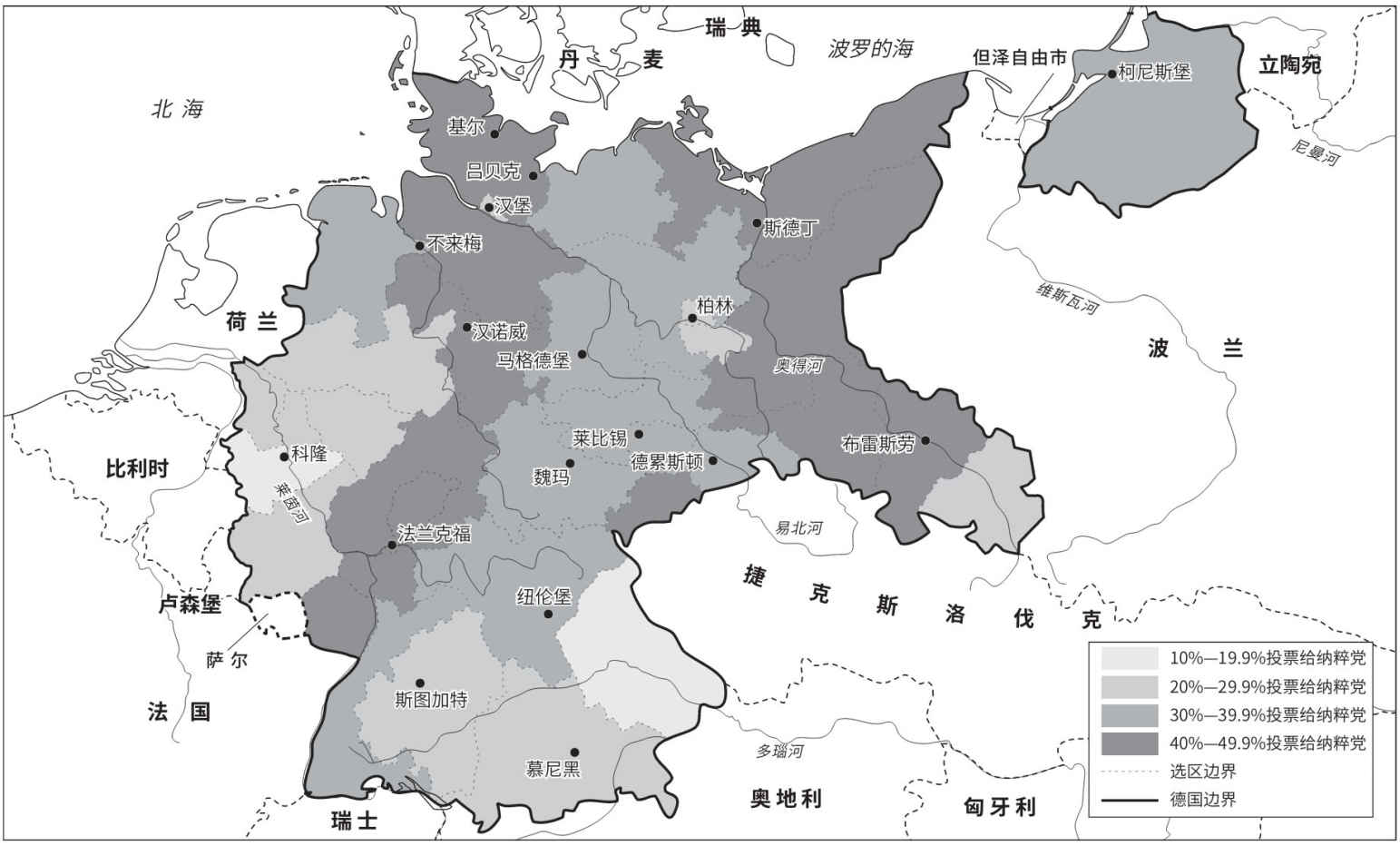
希特勒對沖鋒隊員的野蠻暴力的支持再清楚不過了。他的態度鎮住了巴本，巴本根本沒打算把總統令施用于納粹黨，于是在9月2日改判那幾位死刑犯為終身監禁，希望以此安撫納粹領袖。[[149]](#149_3)事件發生后不久，由于擔心再次被取締，希特勒命令褐衫軍休假兩星期。其實他的擔心是多余的。[[150]](#150_3)

然而，7月勝選之后嗅到權力味道的納粹黨對于黨魁未能入閣感到失望之極。與希特勒談判的破裂也使巴本和興登堡陷入麻煩：本屆政府的合法性難以得到民眾的認同。摧毀議會制度的時刻似乎已經來臨，但是他們要怎樣實現呢？在興登堡的支持下，巴本決定，一俟國會召開會議，就解散它。然后他就可以通過總統令的形式行使——確切地說是濫用——專制權，宣布不再進行選舉。但是，當國會終于在9月召開會議時，赫爾曼·戈林按照慣例，作為國會中第一大黨的代表主持會議。在亂哄哄的會場上，他故意不理睬巴本宣布解散國會的提議，而是同意討論共產黨的動議——對政府的不信任案。動議得到512位議員的支持，僅有42位投了反對票，5位棄權。投票結果使巴本廢除選舉的計劃落空了，這令他顏面掃地，也相當生動地顯示出他在國內缺乏支持。巴本政府別無選擇，只好遵照憲法，要求在11月進行新一屆國會的選舉。[[151]](#151_3)

巴本的策略激怒了希特勒，他在新的選戰中對政府發動了猛烈抨擊。希特勒宣稱，一個由貴族反動派組成的內閣，永遠無法得到像他本人這樣的人民之子的合作。納粹報刊吹噓說，“領袖”在德國各州的造勢活動又一次高奏凱歌。然而關于希特勒的演講聽眾云集、反響熱烈的吹噓之辭，掩蓋不住這樣的事實，至少瞞不過納粹領導層：希特勒這回發表演講的會議廳，許多都是半空的，這年搞的許多活動導致該黨已無財力維持上一次選舉時的那種宣傳力度。此外，希特勒抨擊巴本時所使用的民粹主義話語嚇壞了中產階級選民，他們覺得納粹黨的“社會主義”特性又出現了。在競選的準備階段，納粹黨與共產黨并肩參加了憤怒的柏林運輸工人舉行的一次罷工，這不但無助于改善納粹黨在柏林工人階級眼中的形象——盡管這一直是戈培爾的目標，而且引起了鄉村選民的反感，也遭到一些中產階級選民的排斥。納粹黨曾經令人耳目一新的宣傳方式，此時已經人人熟知。戈培爾的錦囊已經掏空，再也沒有能打動選民的妙計了。納粹領導層十分沮喪，聽天由命地等著在投票日那天看到選票嚴重流失。[[152]](#152_3)

路易絲·索爾米茨（Louise Solmitz）的日記傳神地表達了大多數信奉新教的中產階級人士的情緒。索爾米茨生于1899年，居住在漢堡，當過教師，嫁給了一位退伍軍官，長久以來一直是興登堡和胡根貝格的崇拜者，她以典型的新教教徒的心態，鄙夷地把布呂寧看作“小氣的耶穌會士”，還經常在日記中抱怨納粹的暴力行為。[[153]](#153_3)然而1932年4月，她到漢堡郊區的一次群眾集會上去聽希特勒演講，在現場氣氛和來自社會各界的群眾的感染下，在演講的鼓動下，她心潮澎湃。[[154]](#154_3)“令人深受感染的希特勒精神，”她寫道，“是德意志的精神，是正義的。”[[155]](#155_3)不久，她家所交往的中產階級友人全都支持希特勒了，在7月份，他們無疑都把選票投給了他。然而，國會開會時戈林對待國會的漫不經心態度，以及11月選戰期間納粹黨的左傾立場，都使他們心生反感。他們此時較為傾向于巴本，但對他并不十分熱情，因為巴本是天主教徒。她的一位退伍軍人老友說：“我兩次投票給希特勒，可是以后不會了。”另一位熟人說：“希特勒真糟糕，我不會再支持他了。”路易絲·索爾米茨認為，希特勒因為支持柏林運輸工人的罷工而損失了數千張選票。她悲觀地得出結論，希特勒所關心的并不是德國，而是權力。她問道：“希特勒向我們展示了一個我們愿意接受的未來，然后又拋棄了我們。他為什么要這樣做？”在11月，索爾米茨一家把選票投給了民族黨。[[156]](#156_3)

面對這種失望情緒，納粹黨在選舉中成績糟糕也就不足為奇了。11月選舉的投票率遠低于7月那次。計票結果顯示，納粹黨的選票大幅下降，從1,380萬張降至1,170萬張，議席從230席降至196席。納粹黨仍是遙遙領先的第一大黨，但它此時的席位少于兩個“馬克思主義”政黨席位數的總和。[[157]](#157_3)社會民主黨的《前進報》稱，“希特勒在走下坡路”。[[158]](#158_3)“我們遭受了挫折，”約瑟夫·戈培爾在日記中寫道。[[159]](#159_3)與之相反，政府在選舉中有所收獲。民族黨的議席從37席增至51席，人民黨從7席增至11席。投票給它們的選民中，有許多曾短暫地轉向納粹黨，此時重新支持他們。但這些數字依然少得可憐，差不多是兩黨在1924年全盛時期得票數的三分之一。國家黨（即原先的民主黨）運氣不佳，依然呈現頹勢，議席從4席降至2席。社會民主黨又失去了12席，降至121席，是1924年以來所獲得的最少席位數。另一方面，仍為第三大黨的共產黨進一步提高了地位，又贏得11席，總共占100席，落后于社會民主黨并不太遠。對許多德國中產階級人士來說，共產黨的表現高效得讓人害怕，他們擔心在不久的將來可能會發生共產主義革命。中央黨也略呈頹勢，從75席降至70席，有些選票流向了納粹黨；巴伐利亞人民黨，即從中央黨分裂出去的巴伐利亞派，也是如此。[[160]](#160_3)



地圖15　納粹黨在1932年11月國會選舉中的得票率

總體而言，國會甚至比從前更加難以控制。此時，100位共產黨議員與196位納粹黨議員在國會內交鋒，雙方都打算摧毀他們所痛恨和鄙視的議會制度。政府在選戰期間痛罵過它們，結果導致中央黨和社會民主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敵視巴本。巴本完全未能扳回9月12日在國會受到的羞辱。在新一屆國會中，他所面對的局面依然是絕大多數議員都反對他的內閣。巴本想要快刀斬亂麻——取締納粹黨和共產黨，并且動用軍隊實行總統專制政體，完全繞開國會。然而這個設想并不務實，因為此時他已失去軍方和高層軍官的信任，這是致命的不利因素。這年年初，軍方高層迫使威廉·格勒納將軍辭去國防部長之職，原因是認為他與魏瑪共和國及其機構折中妥協的做法已不再適應新形勢。他的繼任者是立場與軍方高層比較合拍的施萊謝爾。讓施萊謝爾氣憤的是，總理巴本竟敢自作主張制定建立專制政權的計劃，而沒有對那個當初大費周章扶他上臺的人——也就是施萊謝爾本人——言聽計從。況且巴本顯然未能實現施萊謝爾和軍方一直謀求的目標——拉攏主要由納粹黨和中央黨構成的國會多數派。因此，采取新方案的時候到了。施萊謝爾平靜地通知巴本，軍方不愿意冒爆發內戰的風險，將不再支持他。內閣表示同意；而且由于街頭暴力無法控制，也毫無辦法防止它繼續升級，于是巴本被迫宣布辭職。[[161]](#161_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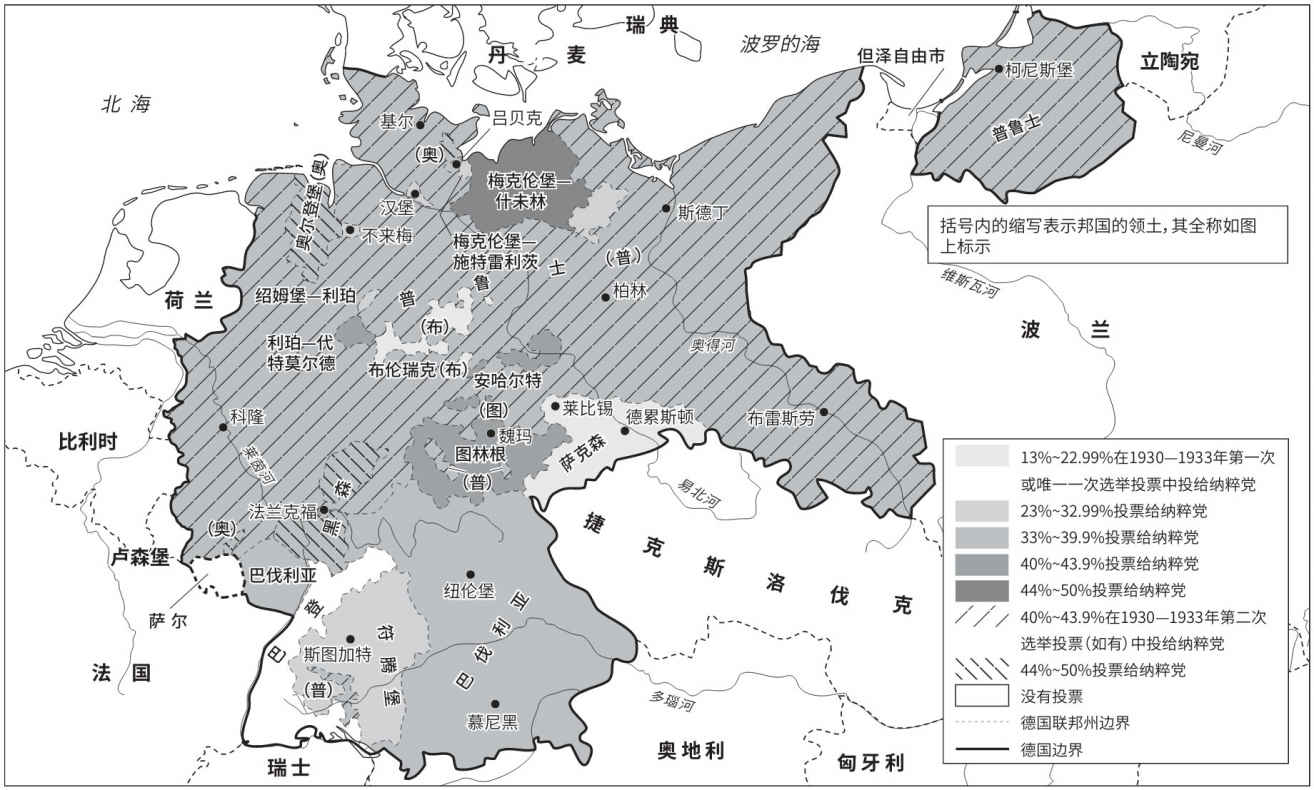
### 三

接下來是兩個星期的復雜談判，由興登堡及其親信主導。到此時，憲法實質上已恢復到俾斯麥帝國的憲法，規定政府由國家元首任命，無需征詢國會多數派或者各級立法機構的意見。國會作為一個政治要素被完全排擠到邊緣。實際上，它已被棄用，甚至無需它來批準法律的通過。但它依然可能引起麻煩，因為任何一屆政府在試圖朝著專制方向修改憲法時，如果得不到國會中多數派的支持，就不具備合法性，就要冒挑起內戰的重大風險。因此，尋求國會支持的努力仍在繼續。由于納粹黨不肯合作，施萊謝爾只好在12月3日親自出任總理，他的內閣從一開始就注定是前途暗淡的。興登堡喜歡并且信任巴本，認同巴本的許多觀點，因此憎恨把巴本搞下臺的施萊謝爾。中央黨和社會民主黨對施萊謝爾的恨意不如對巴本那樣強烈，施萊謝爾在上臺后的幾個星期里避免重復巴本的專制論調，從而贏得了喘息之機。他依然期待納粹黨能夠回心轉意。納粹黨已因11月選舉而開始走下坡路，對于以后何去何從產生了分歧。此外，12月初在圖林根州舉行的地方選舉中，納粹黨的得票率比在7月份全國選舉時的高峰暴跌了大約40%。而且一年來的奮力拉票，幾乎耗盡了該黨的財力。形勢似乎對施萊謝爾越來越有利。[[162]](#162_2)

希特勒拒絕加入聯合政府，除非由他擔任總理，這種做法此時在納粹黨內部引起了批評。帶頭批評的，是該黨的組織部長格雷戈爾·施特拉塞爾，他十分清楚納粹黨的險惡處境，越來越覺得希特勒削弱了過去幾年里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黨組織，于是開始一邊結交大企業，以便為黨募集資金，一邊拉攏工會，以便說服它們加入一個擁有廣泛基礎的全國聯盟。然而，以約瑟夫·戈培爾為首的施特拉塞爾在納粹領導層中的敵人意識到他的意圖后，開始暗中謀劃，指責他蓄意阻撓黨的奪權努力。[[163]](#163_2)施萊謝爾為了向希特勒施加壓力、推動他加入內閣，開始單獨與施特拉塞爾談判，討論希特勒在政府中可以擔任什么職務。在此緊要關頭，希特勒依然固執地認為，除非由他出任總理，否則納粹黨不應該加入任何一屆政府。施特拉塞爾與希特勒進行了一次艱難的會談，他徒勞地解釋了自己的觀點。再次遭到回絕之后，自尊心受到傷害的施特拉塞爾一氣之下于12月8日辭去黨內一切職務。

希特勒迅速采取行動防止納粹黨分裂，開除了前黨內二號人物施特拉塞爾的高調支持者，親自勸說那些搖擺不定的人。希特勒短時間內在全國做了旋風式巡回演講，說服一批又一批黨員干部相信他的立場是正確的，其方法是把施特拉塞爾定性為叛徒，頗像斯大林在大約同一時期的蘇聯把托洛茨基定性為叛徒的做法。分裂的危險是真實存在的，希特勒和戈培爾當然對此極其重視。但這是基于權術考量，而不是基于原則問題。施特拉塞爾與希特勒對于未來的構想并無不同，前者的思想立場與他的領袖非常相像。在1930年完全驅逐他的弟弟奧托時，他全力支持。奧托的觀點確實偏離了黨的主流，過于左傾。格雷戈爾·施特拉塞爾在1932年12月也沒有做出任何抗爭。假如他為自己的觀點宣傳，極有可能會帶走相當大一部分黨員，從而使該黨受到致命破壞。但他沒有這樣做。辭職后施特拉塞爾立即前往意大利度假，盡管并未真正被開除出黨，但他沒有再插手黨內事務，實際上退出了政治生活。希特勒自己兼任黨的組織部長，解散了施特拉塞爾為納粹黨建立的集權式管理結構，以防大權旁落。黨內危機過去了。希特勒和納粹黨領導層可以松口氣了。[[164]](#164_2)

施萊謝爾未能爭取到納粹黨，此事將被證明具有決定性的影響。誠然，從表面上看，他的前途在年初的時候似乎不算太糟。納粹黨在走下坡路，1月15日在小州利珀（Lippe）的地區選舉中贏得39.5%的選票，但是就連這次成功表現也沒有多少說服力，因為當地選民總數僅有10萬。大規模的宣傳努力和空前密集的造勢活動，依然未能使納粹黨的得票數比在1932年7月選舉時有所增加。希特勒和戈培爾把這個結果吹噓為一場勝利，借此振作納粹黨低落的士氣、堅定黨的決心，然而政壇的多數領軍人物對于內情相當清楚。[[165]](#165_2)在其他方面，納粹黨似乎也在衰落。例如在學生會的選舉中，該黨的得票率從1932年的48%降至1933年初的43%。[[166]](#166_1)同時，世界經濟形勢終于開始好轉，大蕭條似乎將要觸底回升，施萊謝爾看到了18個月前德國脫離金本位制所帶來的契機，正在籌劃能夠創造大量就業機會的項目，通過設立國家公共建設項目緩解失業。這對納粹黨來說不是個好兆頭，因為它的崛起和選舉優勢，主要是大蕭條的產物。納粹黨在地區選舉中的得票率也已到頂，這是盡人皆知的。



地圖16　地區選舉得票率，1931—1933年

然而納粹黨的衰落和經濟的復蘇，要等到至少幾個月甚至幾年后才有可能成為重要因素。施萊謝爾沒有幾個月或幾年的時間可用，他只有幾個星期。在興登堡及其幕僚，尤其是他的兒子奧斯卡、國務秘書邁斯納和前總理弗朗茨·馮·巴本看來，此時似乎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迫切地需要拉攏納粹黨入閣，以此控制它，納粹黨最近的損失和分裂似乎為他們提供了推進此事的有利時機。但如果納粹黨繼續走下坡路，那么在可預見的將來，隨著經濟復蘇，似乎有可能出現這種情況：老牌政黨恢復元氣，議會制政府回歸，內閣中甚至可能包括社會民主黨。阿爾弗雷德·胡根貝格同樣擔心出現這種局面。施萊謝爾的一些經濟計劃，包括可能實行鋼鐵企業國有化，以及在12月正式廢除巴本在9月份實行的削減工資和福利的措施，還引起了企業界人士的憂慮，他們的利益是巴本、興登堡和胡根貝格所重視的。施萊謝爾提議在東艾爾比亞（East Elbia）實行土地改革，把破產容克的土地分給農民，這導致擁有地產的興登堡與他更加疏遠。施萊謝爾自稱既不贊成資本主義也不贊成社會主義，保守勢力對此極其憂慮，他們開始圍繞興登堡結成同盟，以扳倒施萊謝爾為目標。[[167]](#167_1)

這些密謀者取得了“鋼盔”及其領導人弗朗茨·澤爾特和特奧多爾·杜斯特伯格的支持，他們計劃罷免施萊謝爾，換一個更合乎他們心意的人當總理。50多萬人的“鋼盔”是一支潛在的難以對付的戰斗力量。但它存在嚴重的內部分歧，其領導人澤爾特與杜斯特伯格之間劍拔弩張，而且長期以來，他們一直無法決定是應該與納粹黨還是與保守派共命運。他們承諾要“超越黨派”，本來是以此作為團結的口號，但這實際上卻一直是內部紛爭的根源。在此形勢下，“鋼盔”這個退伍兵組織中的許多資深人士迫切要求恢復福利活動、軍事訓練、派駐大量民兵“保衛”德國的東部邊界，其中有些要求得到了滿足。“鋼盔”認為自己首先是一支預備役部隊，必要時將被征召去擴充正規軍，由于《凡爾賽和約》的限制，正規軍的員額僅為“鋼盔”的五分之一。杜斯特伯格在總統選舉中的糟糕表現，讓許多人覺得他的明智選擇是退出政治戰場。其普魯士軍官的背景讓他不信任納粹黨人，認為他們過于粗俗、混亂，不值得共事。但杜斯特伯格自身地位不穩，因為有人透露說他有猶太人血統，這讓許多“鋼盔”成員大為震驚。因此，在1933年初以“鋼盔”的名義參與密謀罷免施萊謝爾的，是澤爾特。[[168]](#168_1)

盡管巴本積極參與了陰謀，但他本人顯然無意角逐總理之職，因為在此前的幾個月里，除了興登堡的親信，幾乎所有人都疏遠了他，國內的民眾也不支持他。手忙腳亂的談判最終達成了一個方案：任命希特勒為總理，由保守派內閣成員組成的多數派從旁監督。方案的實施似乎刻不容緩，因為有謠言說施萊謝爾正在與陸軍總司令庫爾特·馮·哈默施泰因（Kurt von Hammerstein）將軍合作，策劃一場反政變。施萊謝爾顯然想要建立一個極權的統合型國家，以總統令的形式宣布廢除國會，實行軍管，全面鎮壓納粹黨以及共產黨。“如果新政府沒有在11點之前組建起來，”巴本在1月30日告訴興登堡和“鋼盔”領導層，“軍隊就會出動。施萊謝爾和哈默施泰因領導的軍事獨裁即將來臨。”[[169]](#169_1)

謠言之所以迅速流傳，是因為政界都知道，施萊謝爾未能取得國會的支持，他別無選擇，只能請求總統授予他范圍廣泛的、實際上超越憲法的權力，用以化解危機。當他向興登堡提出這個請求時，高齡的總統及其親信把此事看作擺脫這個討厭的、不值得信任的陰謀家的機會，于是斷然拒絕。有些人料想，施萊謝爾遭到回絕后，將會和軍方一起，干脆靠自己的力量直接奪權。但施萊謝爾和軍方只考慮過假如巴本重新出任總理就發動政變，這僅僅是因為他們認為巴本的任命很可能會引發內戰。施萊謝爾亟欲避免發生這種情況，此時他把希特勒出任總理看作一個受軍方歡迎的解決方案。“如果希特勒打算在德國建立獨裁體制，”他自信地說，“那么軍方將是獨裁體制內部的獨裁集團。”[[170]](#170_1)由于總統拒絕授予他凌駕于憲法之上的統治權，施萊謝爾別無選擇，只好提出辭職。圍繞興登堡的圈子已經進行了一段時間的談判，打算任命希特勒接替施萊謝爾。最終，在1933年1月30日上午11點半左右，希特勒宣誓就任德國總理。在他所領導的政府中，巴本及其保守派同僚屬于多數派。實力大減的民族黨中的激進派加入政府，其中阿爾弗雷德·胡根貝格接管經濟部和糧食及農業部。已在巴本和施萊謝爾兩任政府中擔任外交部長的康斯坦丁·馮·諾伊拉特男爵（Konstantin Freiherr von Neurath）留任，盧茨·格拉夫·什未林·馮·克羅西克（Lutz Graf Schwerin von Krosigk）也留任財政部長，稍后，民族黨的弗朗茨·居特納留任司法部長。陸軍部由維爾納·馮·勃洛姆堡（Werner von Blomberg）接管。弗朗茨·澤爾特代表“鋼盔”執掌勞工部。

僅有兩個政府要職歸納粹黨，但這兩個都是關鍵職位，是希特勒在談判中所堅持的交換條件：內政部由威廉·弗里克（Wilhelm Frick）執掌，總理之職由希特勒擔任。赫爾曼·戈林被任命為帝國不管部部長（Reich Minister Without Portfolio）以及普魯士州內政部代理部長（Acting Prussian Minister of the Interior），這個職位使他得以直接控制德國大部分地區的警察。因此納粹黨人能夠全面操縱國內的法律與秩序，讓形勢朝著有利于他們的方向發展。只要他們行事有一點點技巧，就可以很快為褐衫軍掃清道路，使之能夠發動全新水平的暴力行動，在街頭打擊對手。弗朗茨·馮·巴本成了副總理，并且作為帝國行政長官繼續管理普魯士州，名義上是戈林的上司。希特勒和納粹黨徒粗俗、沒文化、缺乏執政經驗，他們的周圍盡是巴本的朋友，總統興登堡又對巴本言聽計從，因此巴本認為，控制他們必然易如反掌。當一位心存疑慮的同僚表示擔心時，巴本自負地對他說：“你錯了。我們已經把他收歸我們所用了。”[[171]](#171_1)巴本自信地告訴一位憂心忡忡的保守派熟人：“兩個月之內，我們就能把希特勒逼到墻角，逼得他只會尖叫。”[[172]](#172_1)

[\*](#_236) 伊萬·彼得羅維奇·巴甫洛夫（1849—1936），俄羅斯生理學家和心理學家。

[†](#_237) 德國米歇爾，代表德國普通人的形象，通常被描繪為戴睡帽、穿睡衣的隨和模樣。

[‡](#_238) 彩虹聯盟（rainbow coalition），由不同團體組成的政治同盟，通常包括小黨派和邊緣團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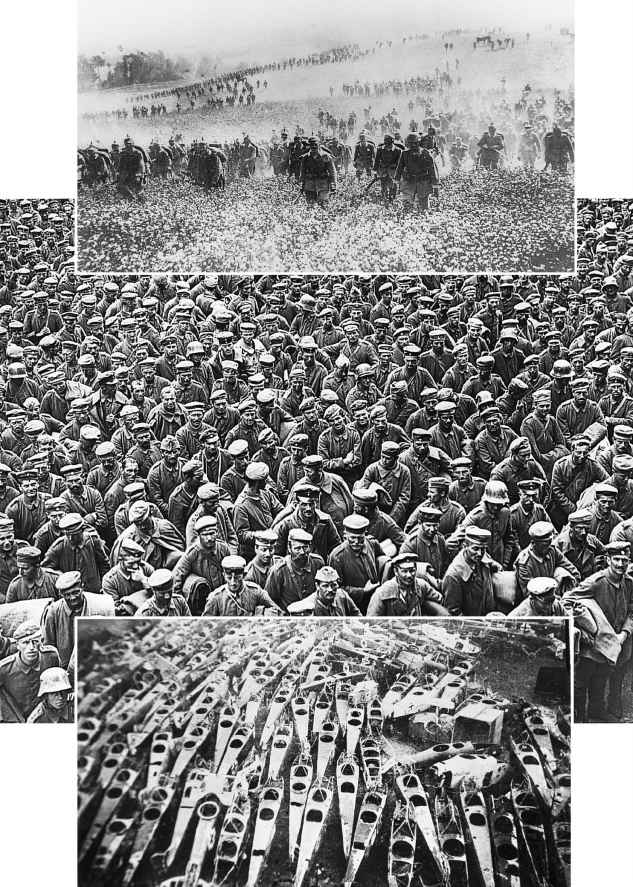
[§](#SS_16) 今波蘭貝托姆，曾是猶太人社區。——編注



1. 矗立在漢堡的俾斯麥紀念塔，揭幕于1906年，用仿中世紀的藝術風格表達了這樣的期許：德國將在一位新的民族領袖治下恢復往昔的榮耀。



2. 1887年寄自“法蘭克福唯一一家不許猶太人入住的飯店”的反猶明信片。這種態度是1880年代的新現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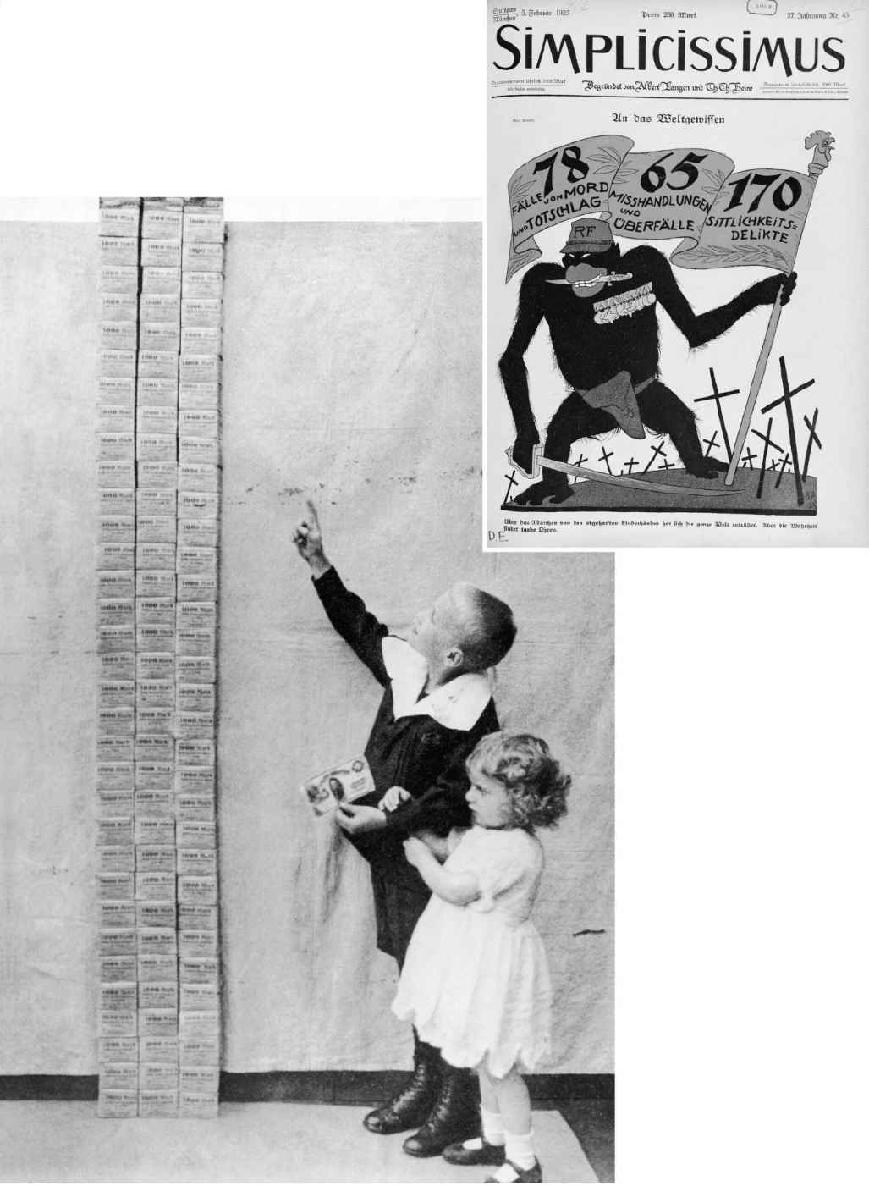
3.（上圖）勝利的希望：德軍于1914年在比利時境內滿懷信心地推進。  
4.（中圖）戰敗的現實：1918年8月在亞眠戰役（Battle of Amiens）中被協約國俘獲的德國戰俘。  
5.（下圖）必須付出的代價：因履行1919年《凡爾賽和約》而廢棄的德國戰斗機的骨架。



6. 陷入混亂：1919年1月“斯巴達克同盟暴動”期間柏林街頭的一場戰斗。



7. 右翼的報復：1919年5月血腥鎮壓慕尼黑蘇維埃（Munich Soviet）之后，擔任行刑隊隊長的一位自由軍團中尉拍攝的他手下的非正規軍與他們將要處決的“赤衛隊員”（Red Guardis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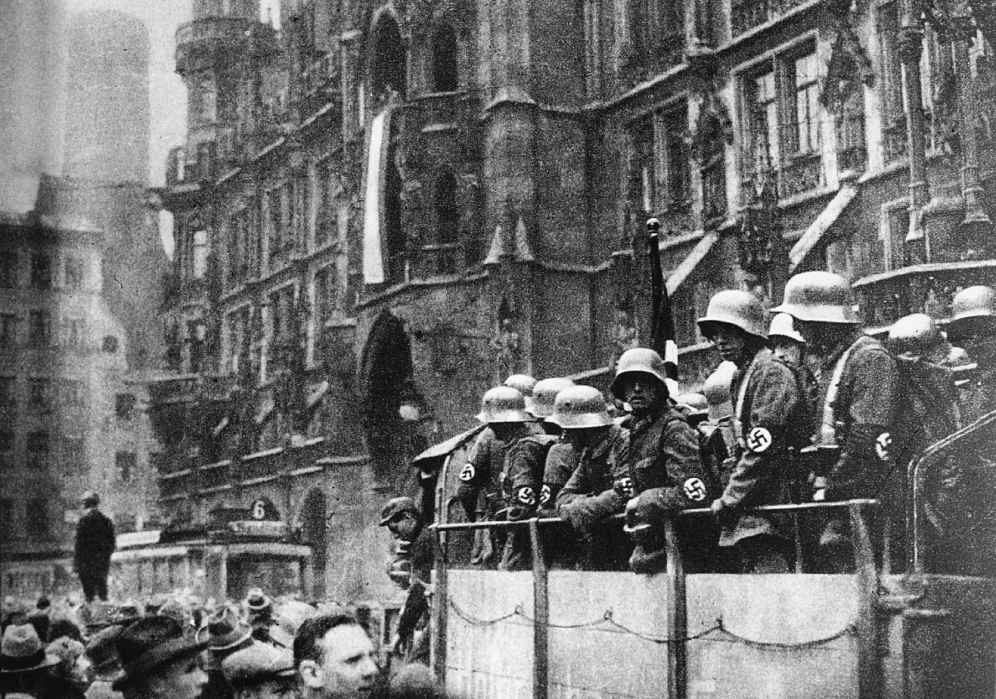
8. （上圖）德國一份諷刺雜志上的種族主義漫畫，醒目地列出1923年法國占領魯爾區期間據說法軍所犯兇殺、搶劫和性侵案件的數量。  
9. （下圖）1923年的惡性通貨膨脹：“這么多千元面額的馬克只值一美元！”



10. 1927年戰爭賠款的決算表：一份諷刺雜志說，《凡爾賽和約》強加給德國的財政負擔造成的經濟困難導致14,000名德國人自殺。



11. 咆哮的二十年代：畫家奧托·迪克斯對1927—1928年德國社會的痛苦觀感；退伍軍人被排擠到社會邊緣，而放蕩女子和她們的客人卻在爵士樂舞會上縱情享樂。



12. 啤酒館暴動：1923年11月，武裝的沖鋒隊員在慕尼黑市政廳外等待納粹黨接管權力，但他們空等了一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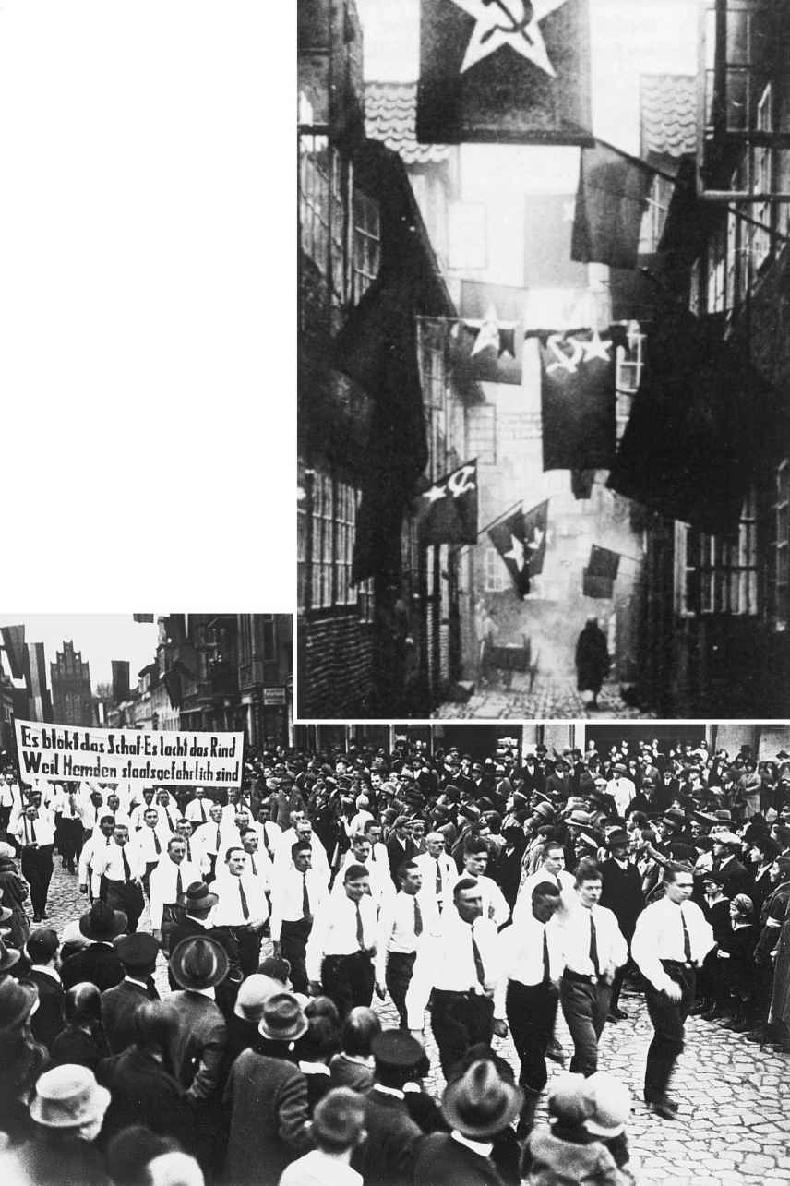
13. 1929年，希特勒與友人在慕尼黑的一家啤酒館休閑，他沒有喝酒。最左是格雷戈爾·施特拉塞爾。



14. 1926年希特勒在魏瑪領導的一次街頭游行，沖鋒隊在前面開路。他左方沒戴帽子的是魯道夫·赫斯，緊跟在他身后的是海因里希·希姆萊。



15. 入神的面孔：1930年在一次露天集會上聆聽演講的沖鋒隊員。



16. （上圖）共產主義威脅：就像1932年選戰期間在漢堡的這個貧民區一樣，犯罪、貧困和極左翼使命感往往結合在一起，令中產階級選民感到害怕。  
17. （下圖）布呂寧的制服禁令（1930年12月）徒勞無功：褐衫軍換上了白襯衫，效果依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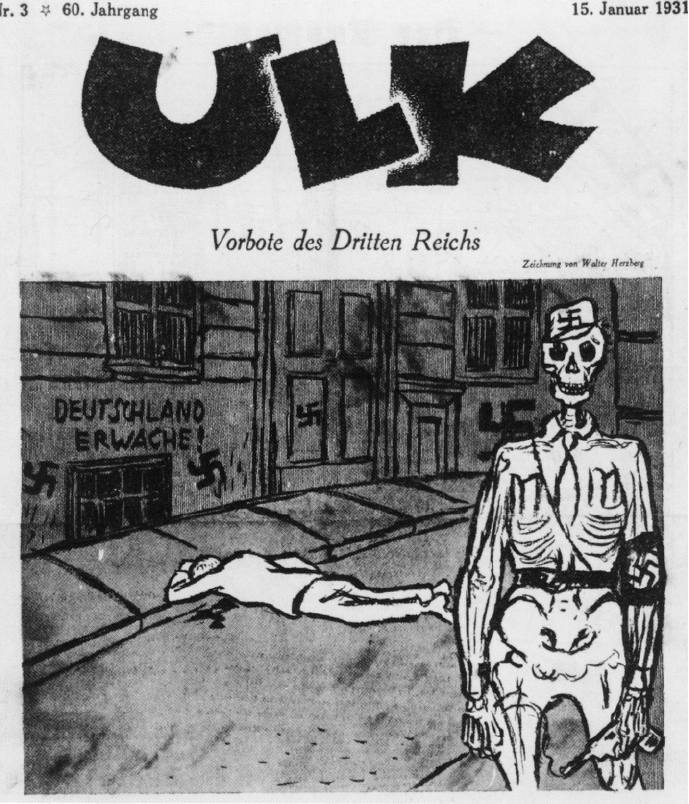
18. 1930年的一張和平主義海報提醒人們，“投票給右翼政黨，無異于投票支持發動戰爭”，納粹主義只會導致死亡與毀滅。并且詰問道：“德國人，你要再次被他抓在手心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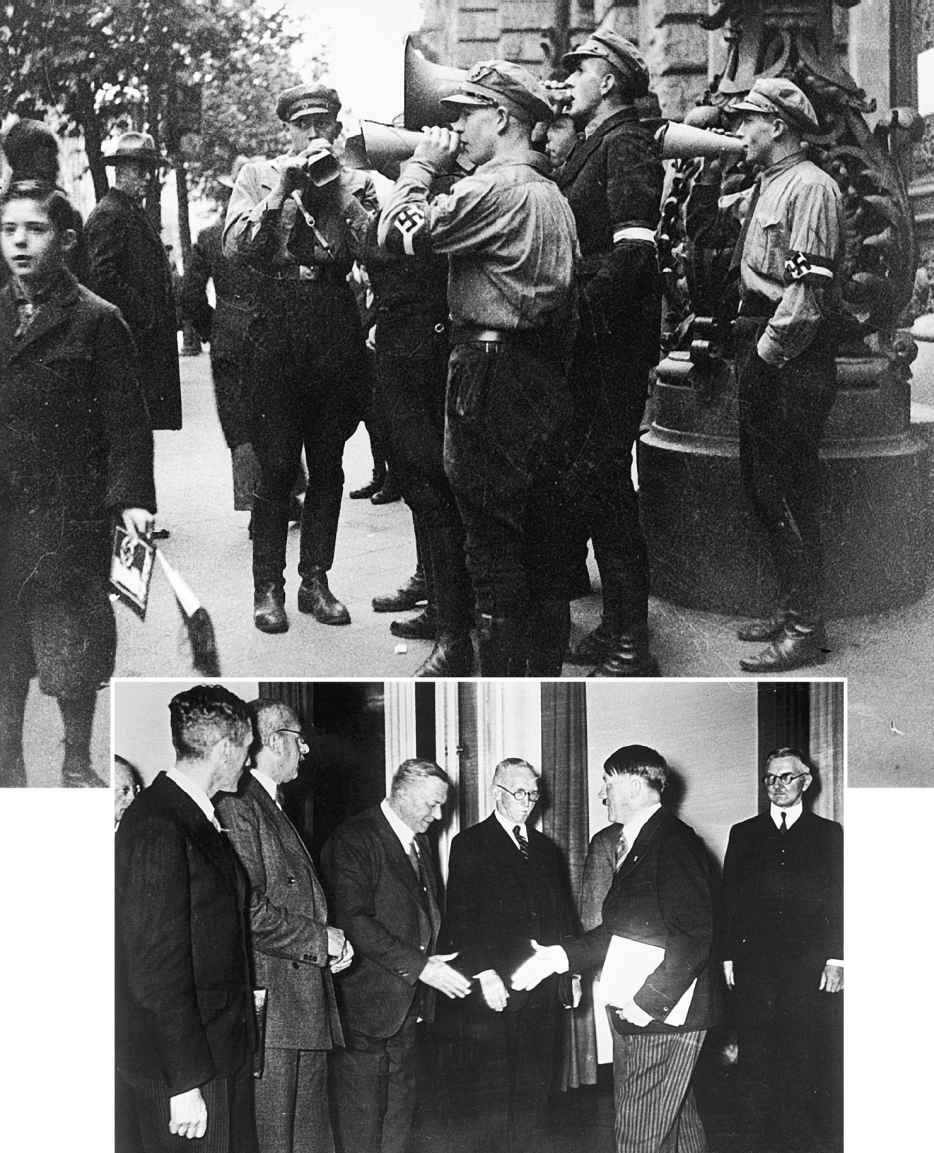
19. 暴力的視覺形象：納粹黨于1928年率先采用，其他政黨在后來的選舉中效仿。（a）“摧毀世界之敵，國際巨額融資銀行”——納粹黨的競選海報，1928年。（b）“終結這個制度！”——共產黨的競選海報，1932年。（c）“為名單1號掃清道路！”——社會民主黨的工人用胳膊肘擠開納粹黨人和共產黨人，1930年。（d）“反對內戰和通貨膨脹”——人民黨把對手打得落花流水，這例一廂情愿的形象出現于1932年。



20. 1930年9月擺在選民面前的選擇。各黨的目標是婦女、福利申請人、年輕人以及其他特定的社會群體。



21. “第三帝國的先兆”。1931年1月，一張社會民主黨的海報提醒人們警惕納粹的暴力活動。一個身穿褐衫制服的骷髏在墻上潦草地寫下“德國，醒來吧！”、畫上卐字符之后，用手槍殺死了一個對手，揚長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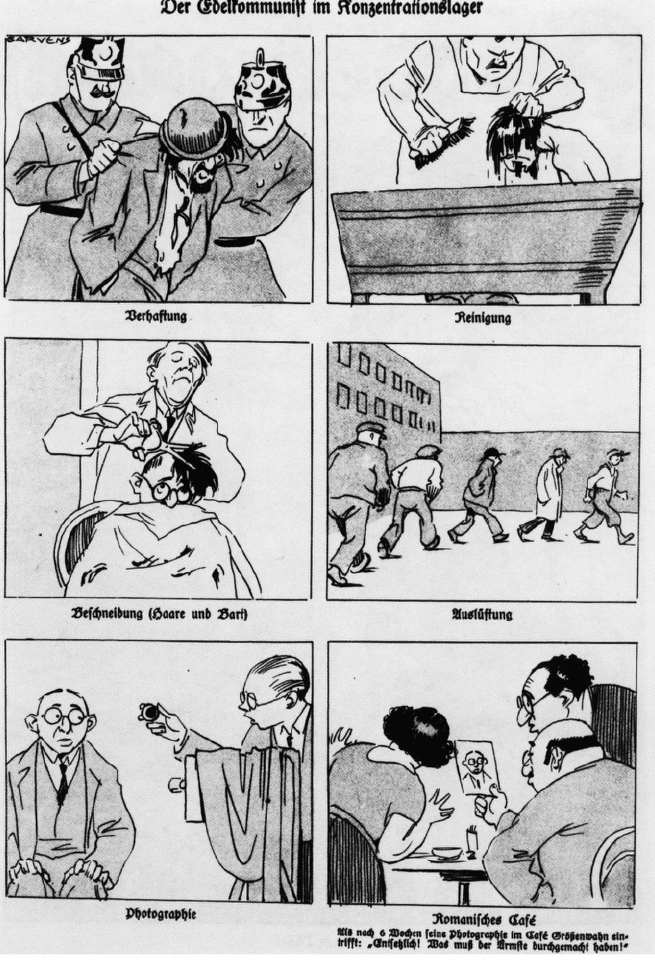
22. （上圖）淹沒對手的聲音：1933年3月選戰期間，納粹黨用擴音喇叭高喊“希特勒萬歲！”  
23. （下圖）納粹黨的體面樣子：1933年1月被任命為總理后不久，希特勒身穿正裝接見商界領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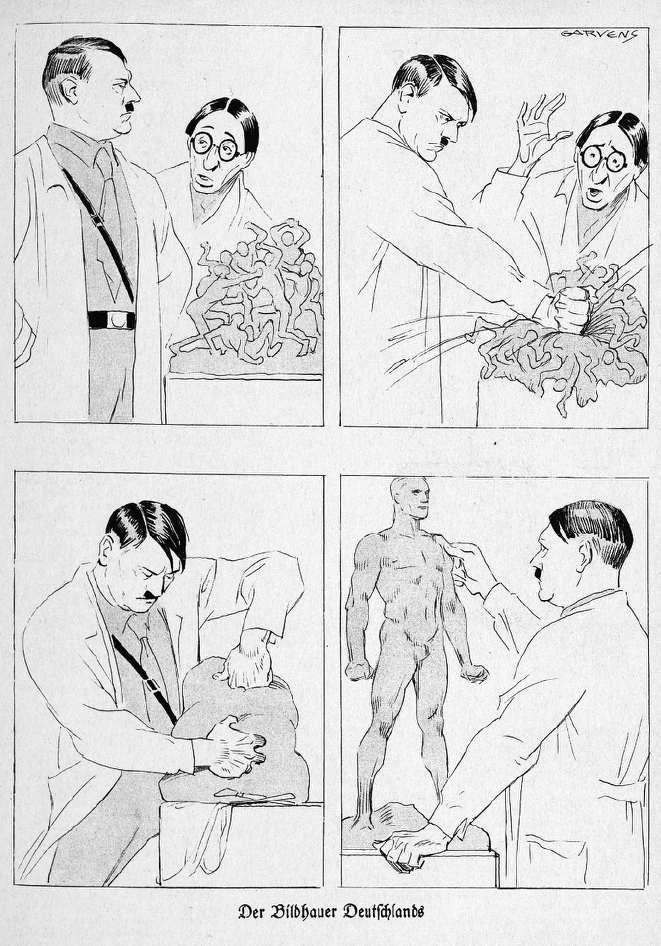
24. 街頭的現實：1933年春被沖鋒隊以“輔警”身份逮捕的共產黨人和社會民主黨人，等待他們的命運是進入褐衫軍的刑訊室。



25. 1933年的第一批集中營：到達奧拉寧堡集中營的社會民主黨人在登記。



26. 《集中營里高貴的共產黨員》：納粹黨對集中營進行廣泛宣傳，但試圖樹立正面形象。1933年5月14日這組漫畫所展現的是，“逮捕”之后是“洗澡”、“剪頭發和胡須”（“剪”在德文中與“割禮”是同一個詞）、放風和拍照。在現代派藝術家和種族主義作家經常出沒的柏林“羅馬咖啡館”和“自大狂咖啡館”，畫中的猶太常客痛惜他們的朋友在6個星期里的脫胎換骨：“這可憐的人肯定吃盡了苦頭！”



27. 希特勒的文化革命：“德國的雕塑家”用一群爭吵的侏儒塑造出一個新的德國巨人，它隨時準備主宰世界。



28. 流亡者：納粹的諷刺刊物《蕁麻》（The Nettle）把德國頂尖作家和知識分子的逃離描繪成德意志民族的勝利。托馬斯·曼奏響了手搖風琴，其他人（多數是猶太人）隨著他的樂曲偷偷溜走。這些被丑化的人包括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利翁·福伊希特萬格和卡爾·馬克思。“走了，就別想回來。”



29. “打倒非日耳曼精神”：納粹學生于1933年5月10日在柏林大學外焚燒猶太人和左翼人士的著作。



30. “日耳曼人！捍衛你們自己！不要買猶太人的東西！”1933年4月1日抵制行動期間，沖鋒隊員在一家猶太商店的櫥窗上貼標簽，顧客在旁觀。



31. 國家社會主義革命的連續性：一張1933年的明信片，畫面上連成一排的是普魯士的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到俾斯麥再到希特勒。

# 第五章 建立第三帝國

## 第一節 恐怖開始了

### 一

希特勒就任德國總理，絕非尋常的內閣更迭。這種不同尋常立刻在1933年1月30日的火炬游行中清晰顯示出來。游行是戈培爾組織褐衫軍、“鋼盔”和黨衛隊在柏林市內舉行的，從晚上7點開始，一直持續到下半夜。一家支持納粹黨的報紙無比激動地報道說，游行人數達70萬。[[1]](#1_5)這個數字相當荒誕，較為可信的是另一家報紙的報道，它以贊賞的口吻將游行描述為“一次令人難忘的經歷”，參加者包括1.8萬名褐衫軍和黨衛隊、3,000名“鋼盔”成員和4萬名穿便裝的平民，共計6.1萬人。第三個數據來自一個持敵對立場的信息源，據它估算，穿制服的游行者不超過2萬人。好奇的人群沿街駐足，觀看游行。準軍事組織成員走過時，許多人發出歡呼。這壯觀的景象在此后幾年里頻頻上演，被戈培爾編排得爐火純青。在柏林街頭觀看游行時，青年漢斯—約阿希姆·赫爾登布蘭德（Hans-Joachim Heldenbrand）所站的位置，剛好是褐衫軍換火炬的地方，他們在那里把忽明忽暗的火把換成剛點燃的新火把。他整晚看著那些換火把的人，漸漸注意到同一批面孔一次又一次出現在他面前。“瞧，”父親對他說，“看見這騙人的花招了吧。他們一圈又一圈不停地游行，讓人以為他們有十幾萬人。”[[2]](#2_5)

身穿制服的準軍事組織縱隊游行經過時，上了年紀的興登堡走到官邸二樓的窗前接受敬禮。為了展示民族黨和納粹黨在新政府中的相應地位，戈培爾安排褐衫軍走在隊伍的前頭，“鋼盔”跟在他們的后面。興登堡筆直地站了幾個小時之后，開始走神，心思游蕩回了一戰初期的輝煌歲月。他的一位隨從后來告訴英國作家約翰·惠勒—本內特（John Wheeler-Bennett）：

褐衫軍腳步凌亂地走過，后面跟著上過戰場、頭發灰白的“鋼盔”隊伍，他們步調一致、天生紀律嚴明。老元帥在窗前看著他們，如在夢中，站在身后的人見他扭過頭來，像從前那樣粗聲吼道：“魯登道夫，你的兵走得多神氣啊，還捉了這么多俘虜！”[[3]](#3_5)

不管是真糊涂還是裝糊涂，興登堡被民族黨報刊描述為這場歡慶活動的核心人物，這場游行被說成是“興登堡接受他的人民的致敬”。[[4]](#4_5)警方也參與其中，護衛并且實際上加入了這場大歡慶，他們用探照燈朝總統所站的窗前打了一束光，以便人人都看得見他向歡呼的游行者致意。[[5]](#5_5)到處是黑白紅旗。在廣播中，赫爾曼·戈林把人群比作聚在一起慶祝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民眾。他說：“這氣氛只有1914年8月時能與之相提并論，當時也是整個國家挺身捍衛它所擁有的一切。”“過去14年來的屈辱”被一掃而空，1914年的精神得以重振。[[6]](#6_5)這些看法每一位民族黨人都會同意。正如一家民族黨報紙所言，德國正在見證“第二次八月奇跡”。[[7]](#7_5)幾天后，在街頭的人群中觀看游行的路易絲·索爾米茨做了同樣的比較：“像1914年一樣，人人因為希特勒的緣故而互相擁抱，不飲而醉。”[[8]](#8_5)當時她或許沒有想起，1914年精神預示著戰爭：全民動員是發動武裝沖突的基礎，壓制國內異見是發動國際侵略的準備。而這正是納粹黨此時的目標，戈林的聲明已經做了暗示。從1月30日開始，德國社會將以最快的速度被置于永久備戰狀態。[[9]](#9_5)

戈培爾對慶祝活動感到歡欣鼓舞。盡管他在新內閣中尚無正式職務，但已經能夠組織國家廣播電臺進行現場解說。效果超出了他的預期：

盛大的慶典。萬眾歡騰……火炬來了。從7點開始。望不到盡頭。直到10點。到達皇宮。然后到達總理官邸。直到12點。沒有盡頭。上百萬民眾在行進。老人家向經過的游行隊伍還禮。希特勒站在隔壁房間的窗前。覺醒了！民眾自發地涌來。數不勝數。不斷有新的群眾加入。希特勒歡欣鼓舞。他的人民在向他歡呼……激情洋溢。準備競選。最后的選舉。我們將輕松取勝。[[10]](#10_5)

身穿制服的縱隊繼續游行，交替合唱著國歌和《霍斯特·韋塞爾之歌》（Horst Wessel Song），穿過勃蘭登堡門（Brandenburg Gate），從一座座政府大樓前走過。[[11]](#11_5)

許多人不由自主地參與了熱情洋溢的游行活動。隨后的幾個晚上，柏林以外的許多城鎮也上演了火炬游行。[[12]](#12_5)在柏林，1月31日下午，國家社會主義德意志學生同盟舉行了自己的游行，游行隊伍最后停在證券交易所（一家右翼報紙稱之為“德國猶太人的‘麥加’”）門前，學生們沖著從里面出來的股票經紀人大喊“猶大去死吧！”[[13]](#13_5)2月6日在漢堡觀看另一場火炬游行時，路易絲·索爾米茨“沉醉在熱烈的氣氛中，火炬的光正照在臉上，晃得我們什么也看不見，四周煙霧繚繞，我們宛如置身芬芳的香云之中”。像許多體面的資產階級家庭一樣，索爾米茨帶著孩子們去觀看這非凡的景象：“到目前為止，他們對政治的印象實在糟透了，所以現在應該讓他們對國族有一個真正深刻的印象，就像我們曾經那樣，并且銘記在心。他們也確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寫道，從晚上10點之后，

兩萬名褐衫軍如海浪般一個接一個涌過，在火炬的照耀下，他們的臉上熱情洋溢。“向我們的領袖，我們的總理阿道夫·希特勒，致以三倍的敬意！”他們高喊“共和國是狗屎”……我們旁邊有個三歲的男孩一次又一次舉起小手：“希特勒萬歲，希特勒男子漢萬歲！”有時人們還大喊“殺死猶太人”，高喊說要讓猶太人的血從他們的刀下噴涌而出。

“當時誰會把這些話當真呢？”她后來又在日記里寫道。[[14]](#14_5)

1月30日，少女梅利塔·馬施曼被保守派的父母帶去觀看火炬游行，那景象在多年之后依然歷歷在目，她記住的不僅是熱烈的氣氛，還有與游行相伴的暴力和攻擊性所顯露的威脅意味，包括

颯沓的腳步聲，黑壓壓一片的紅黑旗，搖曳映照在人們臉上的火炬之光，以及讓人一聽就熱血沸騰的歌曲旋律。

看了幾個小時，縱隊不斷走過。我們一次又一次在其中看到成群與我們年齡相仿的男孩和女孩……突然有人從游行隊伍中跳出來，襲擊了站在離我們僅幾步遠處的一個男人，也許因為他說了句有敵意的話。我看見他倒在地上，血順著臉頰流下來，我聽見他大聲喊叫。爸媽趕緊拉著我們離開斗毆現場，但我們還是看到了那個流著血的人。我好多天都忘不掉他的樣子。

這一幕在我心中激起的恐懼，還夾雜著一絲不易察覺的醉人的喜悅。“我們愿意為旗幟捐軀。”舉著火炬的人們唱道……對他們來說，旗幟生死攸關，我情不自禁地強烈渴望成為他們中的一員……我想逃離自己那幼稚、狹小的人生，我想歸屬某個偉大的、重要的事業。[[15]](#15_5)

在這些體面的中產階級看來，伴隨著游行的暴力似乎是偶發的，并非特別有威脅性。但對于另外一些人來說，希特勒的任命已經預示了災難。外國記者團從帝國新聞局（Reich Press Office）的窗戶觀察了游行隊伍經過，有人聽到一位記者說，他們正在觀看的游行，與11年前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奪權那次一樣，這是“德國版的進軍羅馬”。[[16]](#16_5)

尤其是共產黨人，他們知道希特勒政府很可能會強硬打壓他們的活動。1月30日晚間，右翼媒體已經在呼吁取締共產黨了，因為有人從夏洛滕堡（Charlottenburg）區的一座房子里朝手持火炬的沖鋒隊游行隊伍開槍，造成一位警察和一位褐衫軍成員死亡。[[17]](#17_5)《紅旗報》被取締，報紙被沒收，在施潘道（Spandau）區爆發的納粹黨與共產黨之間的一場槍戰中，警察逮捕了60多人。[[18]](#18_5)類似的沖突，雖然場面沒那么火爆，也發生在杜塞爾多夫、哈雷（Halle）、漢堡和曼海姆（Mannheim）市，在其他地方，警方立即禁止共產黨舉行任何示威活動。在阿爾托納、開姆尼茨（Chemnitz）、明謝貝格（Müncheberg）、慕尼黑和沃爾姆斯（Worms）市，以及柏林工人階級聚居的各個區，共產黨公開舉行反對新內閣的示威活動。據報道，有5,000名工人參加了在魏森費爾斯（Weissenfels）市反對新內閣的游行，其他城市也有類似的但規模較小的游行。[[19]](#19_5)其中最著名的一次是在符騰堡州的小鎮默辛根（Mössingen）舉行的總罷工，默辛根將近三分之一的選民在1932年的選舉中投票給了共產黨。在不足4,000人的總人口中，多達800人走上街頭反對新政府，這座小型工業中心的居民很快看清了現實：警察介入進來，開始逮捕那些被認定為頭目的人，最終逮捕了80多位參加者，其中71人后來被裁定犯有叛國罪。指揮這次警察行動的，是符騰堡州天主教保守派政府的部長會議主席歐根·博爾茨，他顯然害怕共產黨舉行全國暴動。在很多年后回顧這些活動時，一位參與者自豪地說，假如其他地方的人都以默辛根為榜樣，納粹黨就絕不可能成功。另一位參與者以同樣自豪的心情，帶著可以理解的夸張語氣說：“除了這里，其他地方毫無動靜。”[[20]](#20_5)

在許多城鎮，各個勞工政黨的基層黨員做了大量工作，準備合作應對納粹的威脅；但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都沒有為采取更大規模的抗議措施而進行任何協調。盡管共產黨確實立即敦促發動一場總罷工，但它明白，如果得不到工會和社會民主黨的合作，那么發生罷工的概率就等于零，而工會和社會民主黨是不愿意在這方面被人操縱的。在共產國際看來，希特勒內閣的任命，表明壟斷資本已經成功地拉攏了納粹黨，雙方將合謀瓦解無產階級的抵制行動，為法西斯獨裁政權的建立掃清道路。按照這種觀點，內閣的關鍵人物就是工業界和大地產商的代理人胡根貝格，而希特勒只不過是他的工具。[[21]](#21_5)許多左翼社會民主黨人都認同這個觀點，包括該黨最著名的國會議員之一庫爾特·舒馬赫（Kurt Schumacher）。共產黨還擔心，“法西斯獨裁政權”將意味著暴力鎮壓勞工運動、加重對工人的剝削、不顧后果地奔向“帝國主義戰爭”。[[22]](#22_5)到1933年2月1日，共產黨報刊已經在報道，“一波取締令將遍及全國”，“風暴將席卷德國”，“納粹恐怖匪幫”將屠殺工人、搗毀工會辦事處和共產黨機關。更多的恐怖行動必將來臨。[[23]](#23_5)

其他人則不太確定新內閣意味著什么。過去幾年里，那么多屆政府、那么多任總理來而復往，因此許多人顯然以為，新來者不會有什么不同，也會像前任一樣短命。就連滿懷熱情的路易絲·索爾米茨也在日記中寫道：

多棒的一屆內閣啊！！！我們在7月時做夢也想不到呢。希特勒、胡根貝格、澤爾特、巴本！！！他們每個人身上都承載著一大部分我對德國的期望。國家社會主義黨的活力、德意志民族黨的理性、不涉足政治的“鋼盔”以及我們不曾忘記的巴本。它美好得難以言表，我得趕緊在第一個不和諧音符奏響之前把這事記下來。[[24]](#24_5)

許多從報紙上讀到希特勒任命消息的人，肯定覺得褐衫軍的興高采烈太夸張了。新政府的主要特征無疑是保守派的人多勢眾，“鋼盔”參加游行就說明了這一點。一位駐柏林的捷克外交官在日記里寫道：“盡管以希特勒為首，但它既不是民族主義的，也不是革命的政府。它不是第三帝國，甚至連第二帝國半也算不上。”[[25]](#25_5)更不客氣的危言來自法國大使安德烈·弗朗索瓦—蓬塞（André François-Poncet）。這位敏銳的外交官指出，保守派理所當然期待希特勒同意他們的計劃，即“鎮壓左派，肅清官僚作風，普魯士與帝國實現民族同化，重組軍隊，恢復兵役制度”。他注意到，他們把希特勒扶上總理之位是為了讓他出丑，“他們自以為足智多謀，用引狼入羊圈的辦法來擺脫狼”。[[26]](#26_5)

### 二

弗朗茨·馮·巴本和他的朋友們以為希特勒已經就范，這種自鳴得意的感覺沒能持續多長時間。納粹黨僅據有三個內閣職位，但希特勒作為帝國總理所擁有的職權卻相當大。同樣重要的是，納粹黨執掌著帝國內政部和普魯士州內政部，這兩個職位具有掌控法律與秩序的廣泛權力。尤其是戈林在普魯士州的職位，使他有權掌控德國大部分領土上的警力。作為帝國行政長官，巴本也許名義上是戈林的上司，卻難以插手維持秩序等內務部的日常事務。而且，在軍方的要求下，維爾納·馮·勃洛姆堡將軍在希特勒就職的前一天被任命為國防部長，他對納粹黨的認同程度之深，是巴本和興登堡沒有意識到的。勃洛姆堡是個精力旺盛、容易沖動的人，一戰中作為制定作戰計劃的參謀人員而贏得了極高的聲譽，后來成為總參謀長。他是軍方安插在政府中的重要人物，但他也容易受強烈印象的影響。訪問蘇聯、視察德國在那里的軍事設施時，他對紅軍的印象極其深刻，以至于曾認真考慮要加入共產黨，完全無視這一決定的可怕政治含義。勃洛姆堡視野狹窄，僅局限于軍事，幾乎完全不懂政治，而任由希特勒那類人擺布。[[27]](#27_5)

勃洛姆堡禁止軍官加入納粹黨，小心地維護著軍隊的獨立地位。他對希特勒忠心耿耿，因此納粹黨似乎沒有必要從內部削弱軍方。不過，該黨必須確保軍方不會干涉它此時正打算在國內發起的暴力行動。希特勒在1933年2月3日向高級軍官發表的講話中，強調了他對軍方中立立場的尊重。他承諾要恢復義務兵役制、消滅馬克思主義、反對《凡爾賽和約》，從而贏得了軍方的支持。在場的軍官沒有反對他所提出的令人陶醉的長遠構想：入侵東歐，驅逐那里的數千萬斯拉夫原住民，使東歐“日耳曼化”。軍方的中立當然指的是它不加以干涉，希特勒特意叮囑軍官們，“國內斗爭與你們無關”。在力促軍方保持中立方面，希特勒又添了個幫手——在勃洛姆堡的提議下，瓦爾特·馮·賴歇瑙（Walther von Reichenau）上校被任命為勃洛姆堡的首席助手。賴歇瑙是位精力充沛、志向遠大、功勛卓著的參謀官，他也是希特勒的崇拜者，與希特勒私交甚好。賴歇瑙與勃洛姆堡很快合力孤立了陸軍總司令庫爾特·馮·哈默施泰因，哈默施泰因是位保守派貴族，從不掩飾對納粹黨的蔑視。1933年2月，哈默施泰因禁止軍官邀請政客參加社交活動，試圖用這個辦法使軍官與戈林等納粹頭目之間的聯系減至最少。提到戈林時，除了叫他的綽號“瘋子飛行員”，哈默施泰因總是優越感十足地用戈林加入納粹黨之前的實際軍銜稱他為“（退役的）上尉”。哈默施泰因是個真正的隱患，因為他直接向總統匯報。然而勃洛姆堡在短時間內就成功地限制了哈默施泰因，使他只能為軍事事務去見興登堡。1933年4月4日，勃洛姆堡成為新成立的帝國國防委員會（Reich Defence Council）委員，這個由希特勒擔任主席的政治機構實際上繞開軍方領導層，把軍事決策權交到了希特勒和一小群主要部長的手中。上述步驟有效地使哈默施泰因及其支持者失去了實權。不管怎樣，哈默施泰因過于心高氣傲、過于不合群，也是不會參與重大政治陰謀的。施萊謝爾此時已被安全地排擠出局，因此無論是哈默施泰因，還是軍方的其他領導人，在1933年上半年都沒有能力發動人們反對納粹黨。[[28]](#28_5)

有弗里克和戈林掌舵，加之軍方已被排擠到權力中心之外，因此納粹暴力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難以遏制。納粹黨隨即趁勢精心布局，發動了一場政治暴力和政治恐怖運動，其暴力與恐怖的程度前所未見。1月30日和31日沖鋒隊和黨衛隊的慶祝游行，已經展示了他們新增的信心以及在街頭壓制對手的實力。游行過程中還出現了暴力和反猶行為。隨后，這些行為的發生迅速翻倍。成群結伙的沖鋒隊員開始襲擊工會和共產黨的辦公場所以及著名左翼人士的住宅。2月4日頒布的一項法令使他們如虎添翼，該法令規定，對于那些武裝破壞和平或者從事叛國活動的人，可以拘留三個月。不言自明，該法令不會施用于希特勒的沖鋒隊員。[[29]](#29_5)

戈林于2月15日至17日以普魯士州內政部長的身份命令普魯士州警方，停止監視納粹黨以及隸屬于它的準軍事組織，并盡其所能為它們正在從事的活動提供支持，之后暴力強度大幅提高。2月22日，戈林又邁出一步，建立了一支由沖鋒隊、黨衛隊和“鋼盔”成員組成的“輔警”部隊，其中的“鋼盔”成員顯然指的是年輕團員而不是退伍兵。這給沖鋒隊員開了綠燈，使他們可以繼續橫沖直撞，絲毫不受本應維護法律與秩序的國家正規治安機構的真正干預。自巴本政變以來，警察中的社會民主黨人已被清除，就在警察跟蹤共產黨人、驅散他們的示威活動的同時，新建立的輔警部隊在警方的許可下，沖進共產黨和工會的辦公場所，銷毀文件、強行趕走工作人員。暴力升級，首當其沖的無疑是共產黨及其成員。他們在魏瑪共和國時期已經處于警察的嚴密監視之下。例如，普魯士州的社會民主黨政府于1930年代初聲稱，如果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舉行秘密會議，那么在會議開始后幾個小時內，政府就會收到密報。共產黨的各級組織都有警方密探活躍于其中。警方與紅色陣線戰士同盟沖突頻繁，其中有警員受傷，甚至是致命傷，導致警方展開各種偵查行動，包括搜查共產黨機關。1931—1932年抄獲的文件中包含共產黨干部和積極分子的地址簿，因此警方對該黨了如指掌。歷經無數次與共產黨的武裝沖突，警方已將其視若寇仇，遂在1月30日之后把有關共產黨的情報移交給新政府。納粹政府毫不猶豫地使用了這些情報。[[30]](#30_5)

納粹黨在1933年2月的后半個月里加大了鎮壓力度，社會民主黨和工會遭到幾乎與共產黨一樣的重創。共產黨一直被視為對公共秩序和私人財產的威脅，因此政府得以憑借中產階級選民的這種共識來鎮壓共產黨。共產黨在選民中的支持率不斷上升，1933年初獲得國會中的100個席位，這種勢頭令許多人驚恐萬分，擔心如果共產黨真的在德國取得政權，可能會復制俄羅斯在1918—1921年的暴力行徑。但社會民主黨的情況與之截然不同，畢竟這支政治力量多年來一直是魏瑪共和國的中流砥柱。社會民主黨在國會中占有121席，而納粹黨占196席；社會民主黨在多屆政府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多任德國總理和普魯士州部長會議主席，以及共和國的首任國家元首弗里德里希·艾伯特，都出自社會民主黨；社會民主黨長期擁有數百萬工人階級選民的支持，棄它轉投納粹黨或共產黨的人相對較少，而且它在不同時期都得到了許多德國人的支持，至少得到了他們的尊敬，盡管這種尊敬是勉強的、有條件的；社會民主黨的黨員人數在1930年達到100萬以上。[[31]](#31_5)

社會民主黨及其準軍事團體帝國國旗團的一些分隊準備采取行動，有的負責籌措武器彈藥，有的在1月30日和31日舉行了示威。社會民主黨和工會的領導人于1月31日在柏林召開會議，計劃發動一場全國總罷工。然而就在各地組織翹首以待之時，總部的領導層卻猶豫了，因為他們意識到，在國家深陷史上最嚴重的失業危機之際舉行罷工，將會困難重重。工會擔心，如果舉行罷工，納粹沖鋒隊將會占領工廠。況且社會民主黨如何能夠證明它用非法行動捍衛法律的做法具有正當性呢？1933年1月30日，該黨的黨報《前進報》發表聲明：“不同于本屆政府及其暴動威脅，社會民主黨以及整個鋼鐵前線在此鄭重承諾，他們將堅定不移地遵守憲法和法律，并且不會首先采取行動背離這一原則。”在隨后的幾個星期里，發生了幾起孤立的行動。數千名社會民主黨人于2月7日在柏林的怡然園（Pleasure Gardens）舉行了一次集會；在呂貝克市（Lübeck）一次短暫的全市總罷工之后，1.5萬工人于2月19日為當地社會民主黨領導人尤利烏斯·萊貝爾（Julius Leber）的獲釋舉行了慶祝活動。但是社會民主黨總部并沒有發布抵制納粹政府的總方針。[[32]](#32_5)

由政府主導、針對社會民主黨的恐怖行動一天比一天兇猛。到1933年2月初，在柏林的帝國內政部長、納粹黨人威廉·弗里克和普魯士州內政部長赫爾曼·戈林的施壓下，各級政府機構都已經開始查禁特定幾期社會民主黨的報紙。社會民主黨對此的反應是按照慣常的做法，在萊比錫的帝國法院提起訴訟，迫使弗里克和戈林允許這些報紙發行，這種策略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33]](#33_5)然而在2月里，成群結伙的褐衫軍開始驅散社會民主黨的集會、毆打演講人和聽眾。2月24日，社會民主黨人、曾任普魯士州內政部長的阿爾貝特·格熱辛斯基抱怨道：“我的好幾次集會都被沖散了，現場有很多人身受重傷被抬走。”黨的執行委員會做出的反應是，大幅減少集會次數以避免造成更多的人員傷亡。1月30日之前警方多多少少還為集會提供的那種保護，在2月份已經遵照內政部的命令完全取消。[[34]](#34_5)納粹沖鋒隊員此時可以毆打和殺害共產黨人和社會民主黨人而免于懲罰。1933年2月5日發生了一起特別令人震驚的事件，一名年輕的納粹黨人槍殺了社會民主黨的施塔斯富特市（Stassfurt）市長。幾天后，社會民主黨黨報《前進報》因為譴責沖鋒隊員在艾斯萊本（Eisleben）的巷戰中殺害了一位共產黨人，而被柏林警察局長下令停刊一星期。[[35]](#35_5)

1932年7月20日巴本政變后的幾個月內，工人發動起義的機會變得微乎其微。社會民主黨對布呂寧的消極支持以及對胡根貝格的積極支持，本來已在勞工運動中引發的那種無力感，此時又由于未能抵制巴本而越發強烈。在興登堡和澤爾特周圍的保守派的鼓勵下，警方和軍方對右翼與左翼準軍事組織之間的紛爭不再袖手旁觀，而是果斷地選擇支持前者。在這種形勢下，勞工運動如果發動武裝起義，無異于自殺。而且，盡管有各種各樣的局部行動方案，有基層談判以及在各個層級開展的正式和非正式手段，但社會民主黨與共產黨依然不準備聯手為捍衛民主制度做最后一次努力。即使它們這樣做了，在人數、武器和裝備方面，二者加在一起也根本無望與軍方、褐衫軍、“鋼盔”和黨衛隊相抗衡。假如試著發動起義，無疑會遭遇一年后維也納起義工人那樣的命運：1934年，為反對恩格爾伯特·陶爾斐斯建立“教權法西斯主義”獨裁政權的那場政變，維也納工人舉行了起義，但裝備精良、全副武裝的社會主義者在幾天之內就被奧地利軍隊擊潰。[[36]](#36_5)德國社會民主黨領導層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就是讓工人流血，更何況是與共產黨合作，他們有充分的理由認為，共產黨將無情地利用暴力局勢為它自己謀取利益。[[37]](#37_5)因此，在1933年初的幾個月里，社會民主黨刻板地堅持采取合法手段，盡量不采取任何可能激怒納粹黨的行動，以免招來更加暴烈的攻擊。

### 三

1933年2月，德國再次進入白熱化的選戰。各政黨展開激烈競逐，此次國會選舉是希特勒于1月30日接受總理職位時提出的條件之一。投票日定在3月5日。選戰期間，希特勒在很多場合宣稱，納粹運動的主要敵人是“馬克思主義”。“我絕不，絕不放棄消滅馬克思主義的任務……只能有一個勝利者：要么是馬克思主義，要么是德國人民！德意志將取得勝利！”這里所說的馬克思主義顯然指的是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在1933年初的氛圍中，希特勒的挑釁性語言無異于在鼓勵他的沖鋒隊員們濫用武力而無需顧及法律。然而，他的攻擊目標遠遠不止左翼，還威脅到了魏瑪民主制度的其他支持者，或者說是前支持者。他在1933年2月10日說，納粹運動“絕不姑息任何有罪于國家之人”。[[38]](#38_5)“我再說一遍，”希特勒于2月15日宣布，“我們將無情地與馬克思主義做斗爭，每一場與它結盟的運動都將隨它一起徹底失敗。”[[39]](#39_5)

這番威脅出自他專門為痛斥符騰堡州行政長官歐根·博爾茨而在斯圖加特發表的演說，因為博爾茨宣稱德國的新一屆政府是自由的敵人。希特勒抱怨道，納粹黨1920年代在符騰堡州遭到迫害時，當政的博爾茨不曾插手捍衛納粹黨的自由。希特勒接著說：

那些14年來不曾提及我們的自由的人，今天也沒有權利談論自由。作為總理，我只需用一部法律來保護這個民族國家，正如他們當年制定了一部法律來保護共和國。到時他們將會明白，并不是每一個被他們稱為自由的東西都配得上這個名字。[[40]](#40_5)

事實證明，與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一樣，中央黨并不太受納粹黨選舉優勢的影響，因此成了選戰中的又一個主要恐嚇目標。不久，中央黨就開始像社會民主黨一樣感受到政府恐怖行動的沖擊。2月中旬，中央黨已有20家報紙因批評新政府而被取締；許多地方的公共集會被當局禁止；一批公務員和行政人員開始遭到解雇或停職，據悉都是中央黨黨員，包括奧伯豪森市（Oberhausen）警察局局長和普魯士州內政部的一位部長級主任。海因里希·布呂寧為譴責這些解雇措施而發表的演說，引發了沖鋒隊員在威斯特法倫對中央黨的選舉集會發動暴力攻擊。2月22日在克雷費爾德（Krefeld）舉行的中央黨集會上，曾任帝國部長的亞當·施特格瓦爾德（Adam Stegerwald）遭到褐衫軍的痛毆。一家又一家地區級黨報遭到取締，有的報館被橫沖直撞的褐衫軍搗毀。各地黨的機關遭到突襲，大量競選海報被沒收，動手的不僅有沖鋒隊員，還有政治警察。面對這種形勢，主教們祈禱和平，而中央黨求諸憲法，并且號召選民投票支持恢復早已失去公信力的布呂寧政府——這是中央黨政治破產的一個可悲跡象。[[41]](#41_4)

希特勒表示他對這些事件感到憂慮，并且在中央黨對這些事件提出強烈抗議之后，于2月22日宣稱：“挑釁分子打著我黨的幌子，正在試圖敗壞國家社會主義運動的名聲，尤其是以擾亂和沖擊中央黨集會的方式。”他嚴肅地說，“我希望，全體國家社會主義黨人最大限度地遵守紀律，與這些圖謀保持距離。在3月5日必須打垮的敵人是馬克思主義！”但與此同時，希特勒還威脅說，如果中央黨在選舉中支持“馬克思主義”，那么就要“收拾中央黨”。加上他在不到兩星期之前對博爾茨的猛烈抨擊，足以肯定暴力行動仍會繼續。[[42]](#42_4)而且，就在褐衫軍展開暴力助選活動之際，希特勒和納粹頭目們不經意間表示，即將到來的選舉將是最后一次，無論結果如何，希特勒都不會辭去總理之職。1932年10月17日，希特勒在公開講話中宣布：“一旦掌握政權，我們就會緊抓不放，愿上帝保佑我們。我們絕不允許它從我們手中再被奪走。”[[43]](#43_4)他在1933年2月說，選舉的結果將不會影響他的施政計劃。“假如德國人民此刻拋棄了我們，我們也不會被嚇住。我們將繼續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防止德國走向衰落。”[[44]](#44_4)

在其他場合，希特勒比較謹慎但不足為信地宣布，他只需要4年時間來實施自己的政策，然后在1937年下一次國會選舉的時候，德國人民可以對本屆政府的優劣做出判斷。在一片狂熱吹捧的氛圍中，希特勒于2月10日在柏林體育宮（Berlin Sports Palace）向人山人海的聽眾發表長篇演說，概述了其施政計劃。此時全部的政府資源盡歸納粹黨調用，它用卐字旗和寫有反馬克思主義口號的橫幅裝飾大廳，用電臺向全國播送希特勒的講話。演講開始前，國歌的合唱聲、“萬歲！”的呼喊聲和熱烈的歡呼聲一浪高過一浪，在希特勒走上講臺時達到高潮。就像他在職業生涯中經常做的那樣，希特勒以緩慢、平靜的語調開始演講，為的是讓人山人海的聽眾凝神諦聽。他回顧了納粹黨史，歷數了魏瑪共和國自1919年以來的所謂罪行——通貨膨脹、農民階級的貧困、失業率的上升、國家的崩潰。他的政府將如何改變這危機重重的局面？他的回答完全回避了任何具體的承諾。他莊重地說，他不打算許下任何“廉價的諾言”；相反，他宣稱，其施政計劃是重建德國：不要外國援助，“遵循永遠正當的永恒法則”，依托人民和土地，而不是根據階級意識。他再一次提出了令人陶醉的構想——德國將在一個新社會里實現統一，這個社會將彌合過去14年來導致國家衰敗的階級分化和信仰分歧。他宣稱，將把工人從異端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中解放出來，引導他們回歸由全體日耳曼人組成的民族大家庭。這是一份“在生活的各個領域全面實現民族復興的計劃”。

在演講的尾聲，他向柏林體育宮內以及全國的聽眾發出了近乎宗教式的呼吁：

14年來，這些導致分裂、發動十一月革命的政黨一直在誘惑和虐待德國人民。14年來，他們破壞、滲透和瓦解了國家。鑒于以上事實，我今天站在國民面前提出以下懇求也就不能算是冒昧：德國人民，請給我們4年時間，然后再評判我們吧。德國人民，請給我們4年時間，我向你們保證，就像我們、就像我出任此職一樣，屆時我也可以離職而去。我擔任此職，不是為了賺取薪酬；我擔任此職，是為了你們！……因為我無法放棄對我的人民的忠誠，無法放棄對這個國家終將再度崛起的信心，無法放棄我對這個國家、對我的人民的愛，我所珍視的堅定信念是，在今天輕視我們的數百萬人，終將與我們站在一起，與我們一起贊頌那個我們歷盡艱辛共同締造的、來之不易的德意志新帝國——偉大、強盛、輝煌、公正的德意志新王國。阿門。[[45]](#45_4)

因此，希特勒對德國承諾的，首先是鎮壓共產黨，然后是鎮壓魏瑪的其他政黨，主要是社會民主黨和中央黨。除此之外并未做出什么具體承諾。但這被許多人視為美德。“我很高興希特勒缺乏計劃，”路易絲·索爾米茨在日記中寫道，“因為計劃要么是謊言、弱點，要么是給笨蛋設的陷阱。強者審時度勢、隨機應變，不會讓自己束手束腳的。”有位原先對納粹黨毫無興趣的熟人告訴她，自己投票給希特勒，恰恰因為他關心的不是計劃而是國家。[[46]](#46_4)希特勒宣稱他所需要的僅僅是4年時間，這個夸張的、煽情的要求旨在讓聽眾更加相信，他所行的是基督般自我犧牲的朝圣之旅。在隨后的幾天里，在其他演講場地，面對同樣熱情的聽眾，這些煽情的話語被一再重復。

希特勒的選戰得到了一個新的資金來源的支持，這實際上是工業界對納粹黨的首次贊助。2月11日，希特勒在柏林為國際汽車展揭幕，并宣布了一個雄心勃勃的修路和減稅計劃，以此為汽車制造商提供幫助。[[47]](#47_4)一大群工業界的領軍人物于2月20日在戈林的官邸開會，希特勒參加了會議，他重申，民主制度與商業利益格格不入，必須消滅馬克思主義，即將到來的選舉是這場較量的關鍵。他威脅說，如果本屆政府不能勝選，它將被迫動用武力去實現其目標。商界最不想要的就是內戰。傳達的信息很清楚：他們必須盡其所能確保聯合政府勝選——有些商界領袖顯然仍以為巴本和保守派是這個聯合政府的核心人物。希特勒離開會場后，戈林提醒聽眾說，即將到來的選舉將是最后一次，不僅是對此后的4年而言，可能也是對此后的百年而言。于是，那位在政界人脈廣闊、在1923—1924年主導了通脹后期的貨幣穩定政策的金融家亞爾馬·沙赫特宣布，商界將向政府的競選基金捐獻300萬帝國馬克。有些與會者雖然主張這筆錢中的一部分應該劃歸納粹黨在聯合政府中的保守派伙伴，但還是照樣付了款。[[48]](#48_4)新資金使納粹黨的競選實力有了真正的改觀，不像此前在11月份時那樣因缺乏資源而不得施展。這些資金使戈培爾得以啟動一場新型宣傳戰，把希特勒描繪成重建德國和擊潰馬克思主義威脅的人，讓每個人都能在街頭看到這種形象。各種新資源——尤其是廣播——被用來為納粹黨做宣傳，加之擁有比以往多得多的競選基金，戈培爾這次真的能夠對全體選民施加影響。[[49]](#49_4)

然而，納粹黨的選戰并不是通往權力得到認可的勝利進程。該黨清醒地意識到它的人氣已在1932年下半年漸漸退去，而共產黨的人氣卻在上升。在納粹黨的所有對手中，它最怕最恨的就是共產黨。在無數的巷戰和會場沖突中，共產黨人展現出他們在與褐衫軍對手較量時是能夠以拳還拳、以子彈還子彈的。因此，令納粹領導層頗為困惑的是，在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上臺直接引發的共產黨游行示威之后，共產黨遭到大規模暴力浪潮的沖擊，尤其是2月22日褐衫軍被編為輔警之后，納粹沖鋒隊乘機抓住權柄，把積壓的怒氣撒在了他們所痛恨的敵人身上，然而紅色陣線戰士同盟卻沒有表現出以暴力回擊的傾向。孤立的事件和斗毆繼續發生，紅色陣線戰士同盟在這種全國范圍的打擊面前雖沒有完全逆來順受，但見不到共產黨的暴力有升級的跡象，沒有任何跡象顯示共產黨政治局曾下令發動協同一致的反擊。

共產黨的相對按兵不動，主要反映了黨的領導層對新政府的判斷：它是行將就木的資本主義制度的垂死掙扎，拖不過幾個月就會崩潰。德國共產黨意識到自己有被取締的危險，于是做好充分的準備，以便長期在非法或者半合法狀態下生存，無疑還盡其所能地儲備了大量武器。而且他們知道，紅色陣線戰士同盟將不會得到隸屬于社會民主黨的準軍事團體帝國國旗團的支持，因為雙方在前些年一再發生沖突。共產黨一再要求與社會民主黨建立“統一戰線”，但這根本不可能實現，因為共產黨與這個它所稱的“社會法西斯黨”建立統一戰線的前提是，該黨必須完全放棄其政治獨立性，并且在實際上接受共產黨的領導。共產黨刻板地堅持其教條，認為希特勒政府的上臺表明大企業和“壟斷資本主義”的暫時勝利，預示著“德國的十月革命”即將來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甚至在1933年4月1日（這個節日正適合講下面的話）做出決議：

盡管法西斯分子實行恐怖統治，但德國革命的形勢將不可阻擋地好轉，群眾對法西斯主義的抵抗也將不可阻擋地高漲起來。法西斯獨裁統治的公然建立，徹底打破了群眾對民主制度的幻想，將群眾從社會民主黨的影響下解放出來，從而加速了德國走向無產階級革命的進程。[[50]](#50_4)

直到1933年6月，德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還宣布，希特勒政府不久就將在內部矛盾的壓力下崩潰，緊隨它而來的是布爾什維主義在德國的勝利。[[51]](#51_4)因此，導致共產黨按兵不動的，不僅是它的過分自信，還有它的致命錯覺，以為新形勢沒有對該黨構成無法抵擋的威脅。

但納粹黨領導層卻覺得形勢險惡，認為共產黨正在秘密策劃一場全國范圍的起義。1932年底和1933年初的德國政壇籠罩著對內戰的恐懼，它不會在一夜之間消失。畢竟，共產黨一直宣稱，法西斯政府的出現，預示著不可阻擋的無產階級革命即將到來，這場革命將以一個蘇維埃式德國取代資產階級民主制度。2月23日在柏林，大批警察突襲位于卡爾·李卜克內西故居的共產黨總部，然而，面對納粹黨的公然挑釁，在革命起義的計劃據說遭到泄露的情況下，共產黨仍然不肯做出反應。他們越是等待，納粹領導層就越緊張。確實會發生什么事情嗎？[[52]](#52_4)鑒賞家哈里·格拉夫·凱斯勒（Harry Graf Kessler）記錄了他那些交游廣闊的朋友中間的傳言：納粹黨正在策劃一場對希特勒的假暗殺，企圖以此作為血腥鎮壓敵人的借口。2月的最后一個星期也盛傳著類似的流言。緊張局勢越來越難以承受。不久，它將得到驚人的釋放。[[53]](#53_4)

## 第二節 國會縱火案

### 一

1931年2月，荷蘭青年建筑工人馬里納斯·范德呂伯（Marinus van der Lubbe）開始了穿越中歐的長途跋涉，想要前往蘇聯，那個他無限神往的國度。1909年1月13日，范德呂伯生于萊頓（Leiden），不久，他那酒鬼父親就遺棄了家人，他在赤貧的環境中長大，12歲時又失去了母親。母親死后，他成為石匠學徒，與勞工運動建立了聯系，參加了共產黨的青年運動。然而不久，他開始反感該黨嚴格的紀律守則和獨裁的組織結構，于1931年退黨，加入了一個激進的無政府工團主義組織，該組織把“用行動做宣傳”拔高為它的主要行動原則。由于工傷導致視力嚴重受損，他很難找到工作，因此赴俄途中主要在廉價客店和谷倉歇腳。然而，他只走到波蘭就開始折返，于1933年2月18日到達柏林。他覺得當地的政治形勢越來越讓人絕望，主流勞工政黨的消極被動令人費解。納粹黨已經能夠為所欲為，左翼陣營正受到無情鎮壓。他認為，被所有陣營拋棄的失業者是時候為自由和面包出手一搏了。自從成為無政府工團主義者以來，范德呂伯一直相信直接行動的力量，他決定抗議資產階級政府及其對勞工運動不斷升級的鎮壓。他在職業介紹所發現，失業者萬念俱灰，沒有能力發出自己的抗議。必須有人替他們發聲。[[54]](#54_4)

他選擇的抗議方式是縱火。范德呂伯認為，給政府機構或者它們的辦公大樓造成引人注目的破壞，就可以讓人們看到它們遠遠不是堅不可摧的，從而喚醒失業者自發地采取大規模行動。他曾因損壞財物而被萊頓的一家法庭裁定有罪，并且常常憑一時沖動而采取無計劃的抗議行動。實際上，這種傾向是他與荷蘭共產黨決裂的主要原因。此時他要在德國做同樣的事情，首先要破壞的是那些象征著政府對失業者的壓迫，以及在他看來象征著舊秩序的支配地位的建筑物。2月25日，范德呂伯企圖在柏林的新克爾恩區（Neukölln）焚毀一個福利辦事處，更野心勃勃的是，他還打算焚毀市政廳和從前的皇宮。三個行動都因立即被發現而受挫，連報紙都沒有報道。顯然，應該選擇更能產生戲劇效果的目標，而且需要好好準備一番。他認為造成自己以及許許多多失業青年生活得如此悲慘的，是資產階級政治秩序，并且認準了國會就是它的至高象征，于是他決定焚毀國會。[[55]](#55_4)

2月27日早晨，范德呂伯用他剩下的最后一點兒錢買了火柴和引火物。經過一番勘察，他確定了進入大樓的最佳辦法，然后一直等到夜幕降臨，在晚上9點左右趁機進入空蕩、黑暗的國會大廈。由于視力受損，他的感官已長期在黑暗中鍛煉得相當敏銳，他先是試圖點燃餐廳的家具，卻沒有成功，又摸索著進入議事廳，那里的窗簾很容易就被點燃了。木質嵌板很快燃燒起來，穹頂起到了煙囪的作用，形成向上的通風道，扇動火焰，因此火勢相當猛烈。與此同時，范德呂伯沖進大廈的其他房間，打算再點幾把火，最終被國會的工作人員制服并擒獲。他被逮捕時，大廈正熊熊燃燒，消防隊雖然立即趕到現場，卻束手無策，只能給主廳的廢墟噴水，盡其所能保住其余空間。

與燃燒著的大廈隔街相對的，是戈林的官邸，希特勒的密友普茨·漢夫施丹格爾暫時寄宿在此。管家把他叫醒，指著窗外讓他看大火。漢夫施丹格爾立即給戈培爾打電話。戈培爾起初還以為這個出名輕佻的公子哥在開玩笑，但普茨堅持說自己沒開玩笑。戈培爾核實之后，發現是真的。他立即通知了希特勒。[[56]](#56_4)納粹黨領導人希特勒、戈培爾和戈林在現場碰頭。第一批到場的高層人物之一、普魯士州政治警察總監（非納粹黨員）魯道夫·迪爾斯（Rudolf Diels）看到警員們已經在審問范德呂伯：

他上身赤裸，流著汗、沾著灰。他坐在他們面前，氣喘吁吁。他大口喘著氣，似乎剛完成了一個重大任務。在蒼白、消瘦的年輕面孔上，那雙火熱的眼睛里是一副狂野的勝利神態。當夜在警察總部，我好幾次坐在他對面，聽著他混亂的供述。我讀了他褲袋里裝的共產黨傳單，就是當時到處公開散發的那種東西……

馬里納斯·范德呂伯的供詞，讓我覺得這個小縱火犯絕對不需要幫手，他干這種瘋狂的勾當太在行了。誰說一根火柴不足以點燃議事廳中干冷的大塊易燃物——老式軟墊家具、厚重的窗簾和干燥的豪華木質嵌板？何況這個行家里手用了整整一背囊的縱火物呢。[[57]](#57_4)

隨后的調查發現了大量文件證據，證實了范德呂伯的供述：他是單獨行動的。[[58]](#58_4)

迪爾斯被召去向聚在議事廳樓上陽臺的納粹頭目匯報情況，他看到的是一幅可怕的歇斯底里景象。戰后回憶起這些戲劇性事件時，他繼續寫道：

希特勒雙手撐在陽臺的石質護墻上，一言不發地盯著紅色的火海。第一陣雷霆剛剛發過。我進去時，戈林朝我走來。在那個戲劇性的時刻，他的聲音充滿了不祥之感：“這是共產黨暴動的開始！現在他們要出擊了！一分鐘也不能浪費了！”

戈林沒能說下去。希特勒轉向聚在一起的人們。此時我看見他滿臉通紅，既是因為激動，也是因為受到積聚在穹頂的熱氣熏烤。他似乎快被氣炸了，我以前從沒見過他如此失態。他高喊：“現在再也不能心慈手軟了，要殺掉一切擋我們道的人。德國人民將不再知道什么是仁慈。共產黨的干部，一經發現，就地槍斃。必須在今夜絞死共產黨議員。與共產黨為伍者，一律逮捕。還要毫不留情地打擊社會民主黨和帝國國旗團！”

我匯報了初步審問馬里納斯·范德呂伯的結果——我認為他是個瘋子。但希特勒不信，他嘲笑我幼稚、輕信：“這件事確實是經過巧妙設計、長期準備的。這些罪犯干得非常漂亮，可是他們低估了我黨的同志們！對不對？這些下等人根本沒想到有多少人站在我們這邊。他們躲在老鼠洞里，聽不見群眾的歡呼，現在他們想從洞里出來啦。”他就這樣一路說下去。

我請戈林到一旁來，但他沒容我說話。“警察要立即進入最高級別的緊急狀態，要毫不留情地使用槍支，要采取重大軍事警戒狀態下的一切措施應對這種局勢。”[[59]](#59_4)

迪爾斯告訴一位下屬，那是一座“瘋人院”。但無論如何，采取行動鎮壓共產黨的時機到了。[[60]](#60_4)

國會縱火案發生幾個小時之后，一隊隊警察出動了，開著轎車和面包車按照名單搜捕共產黨員，把他們從床上拖走。名單是幾個月甚至幾年前擬定的，以便在取締共產黨時使用。共產黨在國會中有100名議員，還有數千名地區級立法機構的代表、官吏、組織者和積極分子。名單大部分已失效，但由于是未經計劃的突襲行動，因此捕獲了許多在其他情況下也許能夠逃掉的嫌疑犯，同時也有許多人因下落不明而漏網。總共4,000人被捕。戈林下令槍斃他們，但迪爾斯和警方悄悄地未予執行。[[61]](#61_4)當這場大規模行動正在進行之時，戈林的顧問路德維希·格勞爾特（Ludwig Grauert）介入進來。格勞爾特是西北德鋼鐵雇主協會的前主席，當時剛被任命為普魯士州內政部的警察局局長。就政治傾向而言，他屬于民族黨。格勞爾特建議頒布緊急法令，作為逮捕行動的法律依據，并且適用于處理共產黨以后的任何暴力行為。2月27日，在縱火案發生之前，保守派主要人物、司法部長弗朗茨·居特納就已經向內閣提交了一份法案，他與內閣中的其他保守派成員一樣，極力支持采取嚴厲措施遏制公共秩序的混亂，他們把混亂完全歸咎于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居特納的方案提議，嚴格限制公民自由權，以防共產黨發動總罷工；對于發出罷工等號召的人，將以嚴重叛國罪論處，可以判處死刑。[[62]](#62_4)但此時，這個提案已跟不上新形勢的發展。

納粹黨人、帝國內政部部長威廉·弗里克從居特納的草案中發現了機會，把他的權力范圍擴展到聯邦各州，并且新增了關鍵的第二條，允許內閣而不是總統進行干預，就像巴本1932年在普魯士州所做的那樣。此外，法令草案借鑒了1920年代初以來關于緊急狀態立法的內部討論，暫停實施魏瑪憲法的若干部分，尤其是那些約定了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和結社自由的條款。草案允許警察可以不經法院授權抓人，并且可以無限期地進行保護性羈押，這不同于以往那些為移交司法審理之前的羈押時間設定了嚴格限制的律令。這些措施以前曾多次被考慮過，并得到高級公務員的極力支持，但此時它們比以往的任何提案都走得更遠。法案在2月28日上午11點提交給內閣討論，希特勒提醒他的保守派同僚，聯合政府自組建以來一直致力于消滅共產黨：“就心理準備而言，直接交鋒的恰當時機已經到來。繼續等待是毫無意義的。”[[63]](#63_4)

希特勒明確表示，他打算采取雷霆手段，而不考慮法律細節。他說，與共產黨做斗爭，“一定不能依據法律條文”。他向內閣同僚們展示了縱火案在公眾引起的恐慌，以及取締德國第三大黨共產黨之后，納粹黨在即將到來的選舉中取得大勝的誘人前景。[[64]](#64_4)接著發言的戈林宣稱，有人看見范德呂伯進入國會大廈之前曾與恩斯特·托爾格勒（Ernst Torgler）等共產黨高層人物在一起。戈林說，共產黨計劃不僅要毀壞公共建筑，還要“在公共廚房投毒”，綁架政府部長們的妻兒。不久，他宣稱有詳細的證據顯示，共產黨已經儲備了炸藥，為的是針對發電廠、鐵路“以及一切至關重要的生活保障設施”開展破壞活動。[[65]](#65_4)

不顧巴本對第二條的反對，內閣同意把草案呈交興登堡。盡管法令把他的一大部分權力轉給了希特勒政府，興登堡還是在上面簽了字。法令立即生效，其中第一節廢止了魏瑪憲法的關鍵條款，并且規定：

因此，對個人自由的限制，對包括出版自由在內的言論自由權的限制，對集會和結社自由的限制，對通信、電報通訊和電話交談之隱私權的違反，搜查證的批準，沒收令的發布，以及對財產權的限制，除本法另有規定之外，均不受法律的約束。

第二節允許政府在公共秩序受到危害的情況下接管聯邦各州。這兩節一直有效，“直到另有通知為止”，它們為隨后幾個月里發生的一切提供了法律借口。[[66]](#66_4)至此，納粹黨可以名正言順地出手奪權了。

### 二

國會縱火法令在一連串密集的宣傳中發布，戈林和納粹領導層借此描繪了一幅嚴峻的畫面：“德國的布爾什維克革命”迫在眉睫，各種凌虐和暴行將隨之而來。宣傳產生了效果。像路易絲·索爾米茨這樣的普通中產階級公民，一想到德國在劫難逃的命運就不寒而栗，給他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戈林為證明共產黨的邪惡陰謀而提供的“如山鐵證”。[[67]](#67_4)來自全國各地納粹團體的200多封電報涌入司法部，要求立即槍斃或者在國會大廈前當眾絞死那些“下等人”，因為他們所制定的“邪惡的毀滅計劃使我們的祖國處于危險之中，有可能變成一片浸滿鮮血的廢墟”。許多群體都發出了“一個不剩地消滅這幫赤匪”的呼聲，有些地方的納粹當局表示，它們擔心如果不立即處決罪犯，公共秩序將出現混亂。[[68]](#68_4)戈培爾的宣傳為褐衫軍釋放被壓抑的對共產黨的怒火打開了閘門。此前，沖鋒隊認為自己既然已被編為輔警，因此實際上享有檢控豁免權，于是已經在四處施暴的過程中釋放了一些緊張情緒，但此時才是他們真正等待的時機。一位沖鋒隊員后來寫下了1933年2月28日之后的情形：

我們已準備就緒，我們知道敵人的意圖。我從手下的突擊隊勇士中選出最勇猛的隊員，組建了一支“機動小分隊”。我們夜夜枕戈待旦。誰會首先出擊呢？然后，時機到了。柏林燃起了烽火，全國到處是交火的信號。終于，命令下達了：“行動吧！”于是我們行動起來！這不僅僅關乎人類之間“你死我活”的較量，還關乎把淫蕩的笑容從布爾什維克黨人那丑陋兇殘的面孔上永遠清除掉，保護德國免遭放縱之徒血腥恐怖的侵擾。[[69]](#69_4)

然而，此時在全國范圍對敵人施以“血腥恐怖”的“放縱之徒”卻是褐衫軍。他們用暴力宣泄著長期積蓄的仇恨，他們的行動往往針對那些他們所熟識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共產黨員個人。他們沒有制定協作計劃，也沒有更大的野心，只滿足于對他們所畏懼和仇恨的人施以殘酷的暴力攻擊。[[70]](#70_4)

褐衫軍和警察也許已準備就緒，但在一些至關重要的方面，他們的共產黨對手卻沒有做好準備。共產黨領導層被2月27日至28日發生的事情打了個措手不及，還以為進入了又一輪相對溫和的鎮壓階段，就像1923年和1924年該黨成功地生存下來那次一樣。但這次的形勢非常不同，警察有窮兇極惡的褐衫軍為后盾。共產黨黨魁、曾為總統候選人的恩斯特·臺爾曼及其助手于3月3日在臺爾曼位于柏林夏洛滕堡的秘密總部被捕。共產黨在國會中的領袖恩斯特·托爾格勒于2月28日向警方自首，目的是駁斥政府關于他和共產黨領導層下令在國會大廈縱火的指控。在黨的領導層中，威廉·皮克（Wilhelm Pieck）和柏林支部的書記瓦爾特·烏布利希分別于春季和秋季離開德國。共產黨費盡心力想把政治局委員們偷渡出境，但其中許多人來不及逃跑就已被捕。在全國范圍，共產黨組織被破壞，辦公室被占據，積極分子被拘禁。沖鋒隊員總是搶走他們所能搜到的一切資金。他們闖入共產黨員的家，洗劫現金和貴重物品，而警察卻袖手旁觀。不久，被捕人數增加至最初預計的許多倍。截至3月15日，已有上萬名共產黨員遭到拘禁。官方記錄顯示，1933年3月和4月，僅在萊茵—魯爾區就有8,000名共產黨員被捕。黨的機關干部不得不承認他們被迫“撤退”，但堅稱那是一次“秩序井然的撤退”。事實上，皮克承認，在幾個月內，多數地方干部實際上已不再活躍，許多基層黨員被嚇得噤若寒蟬。[[71]](#71_4)

希特勒顯然擔心，如果他頒布法令把共產黨完全列為非法組織，可能會遭到暴力反擊。他倒寧愿把共產黨員個體當作策劃非法行動的罪犯，讓其承擔罪責。這樣做可以贏得大多數德國人的支持，他們會因此容忍乃至支持國會縱火案之后的逮捕潮，而不會擔心其他政黨隨之也被宣布為非法。就是出于這個原因，共產黨依然有資格參加1933年3月5日的競選，盡管它的大部分候選人都已遭到逮捕或者逃往國外；而81位當選的代表實際上也毫無可能坐到他們的議席上，因為警察一旦查明他們的下落就會立即予以逮捕。希特勒以及各部長允許共產黨提名候選人參加選舉，也是想以此削弱社會民主黨。如果不允許共產黨候選人參選，那么許多本打算投票給共產黨的選民可能就會轉投給社會民主黨。結果社會民主黨未能得到這個潛在的票源。甚至到了臨近3月底的時候，內閣依然認為不能正式簽發對共產黨的取締令。盡管如此，共產黨干部不但遭到了殺害、毆打或者被投入褐衫軍設立的臨時刑訊室和監獄，而且被大量移交普通刑事法庭提起公訴，特別是那些由警方逮捕的人。

具有黨員身份這件事本身并不違法，但警官、州檢察官和法官絕大多數都是保守派，他們長期把共產黨視為危險的、叛國的革命組織。做出這種判斷主要是基于魏瑪共和國初期的那些事件，包括共產黨在柏林發動的斯巴達克同盟暴動（Spartacist uprising）[\*](#_245)，以及慕尼黑的“紅色恐怖”和槍殺人質事件。紅色陣線戰士同盟的街頭暴力活動充分證實了他們的觀點。此時，許多人認為國會縱火案又為此添了一個證據。他們認為，共產黨放火燒了國會，因此共產黨員必然全都犯有叛國罪。有時甚至做出更加牽強附會的推理。比如，在有些案件中，法庭認為，由于共產黨已無力按照原先的計劃用議會斗爭的方式謀求修改德國憲法，因此它必將嘗試訴諸武力，既然武力奪權屬于叛國罪，那么該黨的成員必然全部犯有此罪。于是在1933年1月30日之后（之前也偶爾如此），法庭越來越頻繁地認定共產黨員從事的是叛國活動。除了名稱以外，共產黨在1933年2月28日之后實質上已成為非法組織，并在3月6日，即選舉結束翌日，被徹底取締。[[72]](#72_4)

在2月28日之后的幾天時間里，希特勒的沖鋒隊把共產黨逐出街頭，控制了各個城市。此時，他們趾高氣揚，以盛氣凌人的姿態炫耀著剛剛取得的主宰地位。普魯士州政治警察總監魯道夫·迪爾斯后來在報告中寫道，與黨形成對照的是，沖鋒隊已做好了奪權的準備。

它不需要統一的領導，“負責人”以身作則，但不發號施令。然而沖鋒隊的各突擊分隊有嚴密的計劃，準備對市內的共產黨地盤采取行動。在3月的那些日子里，每一位沖鋒隊員都“對敵人窮追不舍”，每個人都知道自己必須做什么。沖鋒隊員掃清了各區。他們不僅知道敵人住在哪里，而且早就發現了敵人的藏身處和開會地點……不僅共產黨，任何曾經發聲反對過納粹運動的人，都處在危險之中。[[73]](#73_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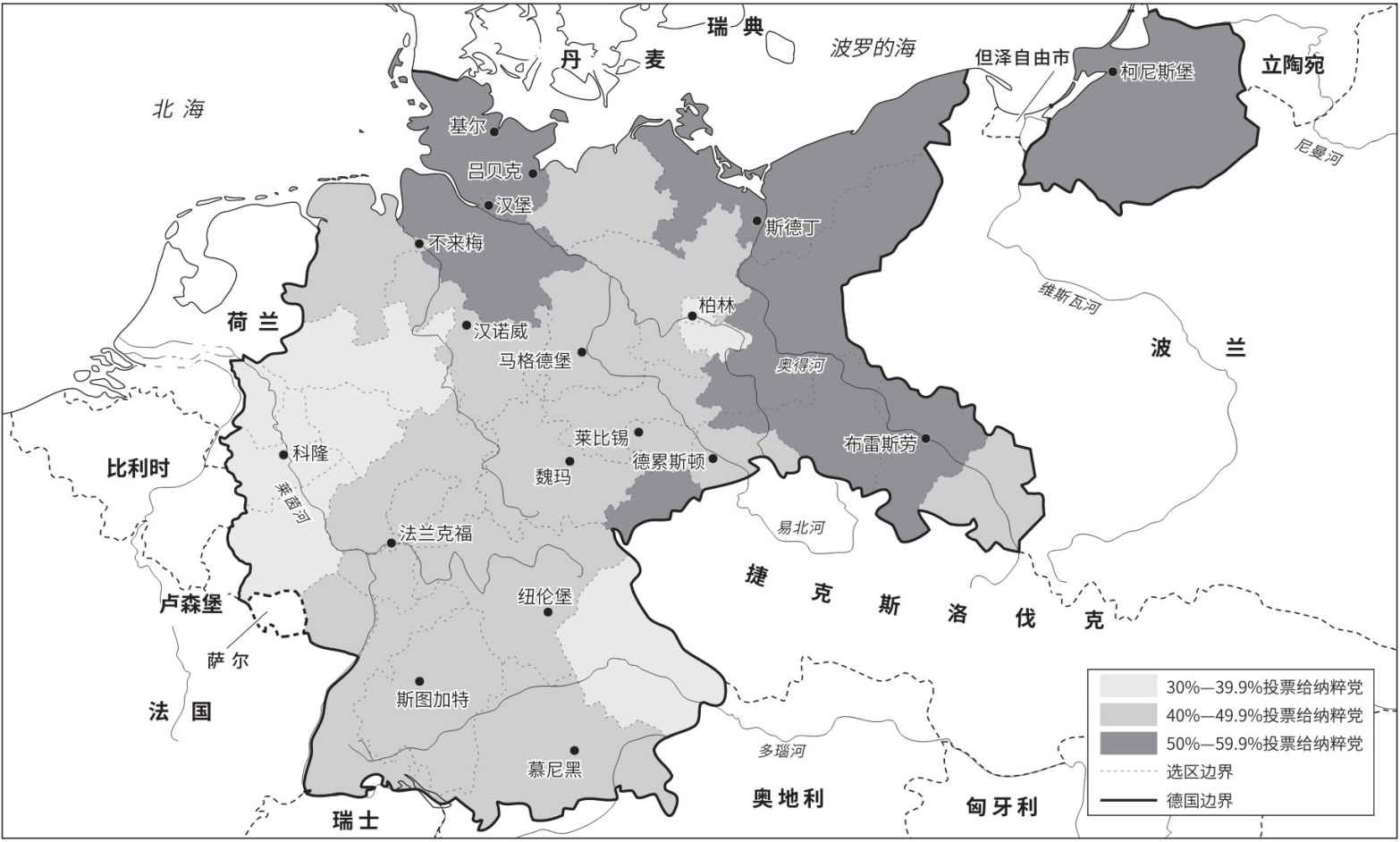
褐衫軍分隊從猶太人、社會民主黨和工會那里偷走轎車和皮卡車，也有神經緊張、希望得到保護的商界人士把車送給他們。他們在柏林的大街上呼嘯而過，舉著武器、打著橫幅，讓每個人看到現在是誰說了算。類似的景象在全國各地的城鎮都能看到。希特勒、戈培爾、戈林和其他納粹頭目沒有直接指揮這些行動，但這些行動不僅是他們發起的——方法是于2月22日將納粹沖鋒隊、黨衛隊和“鋼盔”編為輔警，而且得到了他們不那么含蓄的一致默許——方法是不斷重復使用暴力語言攻擊各類“馬克思主義者”。

納粹黨特有的傳達命令的方式再次發生作用，它形成于納粹黨經常受到警方的敵意對待，并且因暴力行為而屢遭刑事指控的時期：領導層在下達行動命令時，使用的是極端但不具體的措辭，納粹黨及其準軍事組織的基層成員用自己的語言理解那些話，并將其轉化為具體的暴力行動。一份納粹黨的內部文件后來寫道，點一下頭加眨一下眼，表示采取行動，這種方式在1920年代已成為慣例。此時，基層黨員已習慣于對領導人的命令心領神會，而不必等領導人發出確切的指令。文件接著寫道：“為了黨的利益，在許多情況下，確切地說是在下令舉行非法政治示威時，還有一個需要遵循的慣例，就是下達命令的人不把話全部說出來，而僅僅暗示他想達到的目的。”[[74]](#74_4)與1920年代不同的是，納粹領導層此時可以調用政府資源。總的來說，它能夠使幾乎清一色是保守民族主義者的公務員、警察、監獄管理人員和司法官員相信，強力鎮壓勞工運動是正當的，從而使這些人認為，在沖鋒隊員行動的時候，不僅應該讓路，還應該積極幫助他們執行破壞任務。這種決策和執行的模式后來在許多情況下一再重演，在納粹黨對猶太人的政策中表現得最為明顯。

### 三

納粹黨為1933年3月5日的國會選舉而展開的競選活動得到了全國媒體連篇累牘的報道。[[75]](#75_4)此時大企業和政府的資源全力支持納粹黨，導致選舉的整個性質為之改變。例如，在北方小城諾特海姆（Northeim），與全國各地的情形大體相似，選舉在明顯的恐怖氣氛中進行。當地警察被部署在火車站、橋梁等重要設施周邊，以此昭告人們，政府認為這些地方容易成為共產黨發動恐怖襲擊的目標。當地沖鋒隊于2月28日獲準可以攜帶上膛的槍支，并于3月1日被編為輔警，然后招搖地開始在街頭巡邏，查抄當地社會民主黨人和共產黨員的家，指控這兩種人準備屠殺誠實的市民。據納粹報紙報道，有個工人因為散發社會民主黨的競選傳單而被捕。該報宣布，禁止從事這種為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服務的活動。使主要反對黨噤聲之后，納粹黨在集市廣場（Market Square）和主干道架設起無線電揚聲器。3月1日至4日，希特勒的演講每天晚上響徹整個市中心。選舉日的前夜，600名沖鋒隊、黨衛隊、“鋼盔”和希特勒青年團的成員舉行穿越全城的火炬游行，最后停在城市公園，聆聽無線電轉播的希特勒演講，揚聲器傳出的低沉而有力的聲音，同步回響在市中心的另外4個主要公共場所。黑白紅旗和卐字旗裝點著大街，懸掛在店鋪和商店上。反對派的宣傳根本無跡可尋。投票日是個星期天，褐衫軍和黨衛隊以威懾的姿態在街道上巡邏、列隊行進，納粹黨和“鋼盔”安排汽車運送選民去投票站。這種恐怖、鎮壓與宣傳相結合的做法，同樣施行于全國各地大大小小的每一個社區。[[76]](#76_4)

國會選舉的結果顯示上述策略似乎發揮了作用。納粹黨與民族黨聯手，共獲得51.9%的選票。戈培爾在1933年3月5日的私人日記中得意地寫道：“不可思議的數字，我們好像得了最高票。”[[77]](#77_4)在弗蘭肯中部地區的某些選區，納粹黨的得票率超過80%；在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的幾個區，納粹黨贏得了幾乎全部的選票。然而納粹領導層白高興了一場，因為盡管到處施以暴力和恐嚇，但納粹黨本身僅爭取到43.9%的選票。共產黨無法開展競選活動，它的候選人不是藏起來就是已經被捕。盡管如此，它還是贏得了12.3%的選票，略少于上一次選舉的得票率，但降幅小于預期。社會民主黨的競選活動也普遍遭到恐嚇和阻撓，它獲得18.3%的選票，僅略低于1932年11月那次。中央黨盡管在南方的一些地區輸給了納粹黨，但差不多維持住了原有的支持率，獲得11.2%的選票。此時已成為小黨派的其他政黨的成績與1932年11月那次相似，僅略有變化。[[78]](#78_4)



地圖17　納粹黨在1933年3月國會選舉中的得票率

有1,700萬人投票給納粹黨，300萬人投給民族黨。但是選民人數將近4,500萬，其中近500萬投票給共產黨，700多萬投給社會民主黨，450萬投給中央黨，這證明，即使在半獨裁的條件下，納粹黨也根本未能贏得多數選民。[[79]](#79_4)實際上，自從1920年代末在選舉中嶄露頭角之后，它就一直未能在國會選舉以及州議會選舉中獨力贏得絕對多數票。而且，它在1933年3月與民族黨聯手贏得的多數票，遠遠不足以在國會取得修改憲法所需的三分之二議席。然而，選舉結果清晰地表明，有將近三分之二的選民支持魏瑪民主制度的公開敵人——納粹黨、民族黨和共產黨。還有很多選民投票給其他政黨，主要投給中央黨及其南方盟友巴伐利亞人民黨，它們對共和國的忠誠幾乎已消失殆盡，對選民的影響力也正在受到嚴重削弱。在1919年，有四分之三的選民支持魏瑪聯合政府中的政黨；僅用了短短14年，這個局面就被徹底扭轉了。[[80]](#80_4)

3月5日選舉之后，暴力升級到新的高度。例如在東普魯士的柯尼斯堡（Königsberg）[†](#_246)，沖鋒隊在選舉日當夜闖入社會民主黨在當地的總部，打砸里面的物品，把辦公室變成臨時刑訊室，在那里殘酷毆打共產黨議員瓦爾特·許茨（Walter Schütz），致其重傷身亡。工會辦事處遭到洗劫，打字機被偷走，家具被砸爛，現金被盜，文件被焚。[[81]](#81_4)在伍珀塔爾（Wuppertal），褐衫軍的一支小分隊把曾經加入過共產黨的工人海因里希·B.（Heinrich B.）從家中拖走，他的尸體第二天在一塊菜地里被找到。4月1日，在同一個區，8名沖鋒隊員埋伏在奧古斯特·K.（August K.）回家的路上，射殺了這位62歲的工人、當地共產黨樂隊的前指揮。[[82]](#82_4)社會民主黨人也遭到重創。3月9日，社會民主黨人、國會議員、科隆市的社會民主黨領導人威廉·紹爾曼（Wilhelm Sollmann）在家中遭到褐衫軍和黨衛隊的襲擊和毆打，被帶到當地的納粹黨總部折磨了兩個小時，還被灌下蓖麻油和尿液，直到警察現身，把他帶到監獄醫院包扎傷口。3月13日，布倫瑞克的褐衫軍開始逼迫市議會和州議會中的社會民主黨議員“自愿”放棄他們的席位，其中一位議員因拒絕辭職而被毆打致死。也是在這個時候，納粹開始突襲社會民主黨機關，搜尋現金和其他戰利品。開姆尼茨市的社會民主黨報紙主編格奧爾格·蘭德格拉夫（Georg Landgraf）于3月13日被槍殺，因為他拒絕向一伙褐衫軍透露黨的經費藏在哪里。對這些行為提出抗議，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十分困難的，因為所有社會民主黨報紙從3月初開始已被禁14天，禁令期滿時又延長14天，如此接續，直至永久停刊。[[83]](#83_4)

警察當中比較正直的警官沒有無視這些搶劫行為。例如，黑森州警察總監于1933年4月19日曉諭當地各警署和署長，譴責突襲期間非法沒收馬克思主義組織財產的行為，抄走的東西包括樂器、健身器材，甚至還有床，顯然都是為了供搶劫者私人使用。[[84]](#84_4)隨后，有人努力推動對這種狀況進行規范化管理，并設立適當的機構來管理被取締的政黨和工會的資產，主要因為這些資產中包括被取締之前用于資助失業黨員的資金；但是等到這個措施開始實施的時候，大量現金和財產已經散失，落入褐衫軍個人囊中。1933年5月26日，一部法律終于得以通過，指派聯邦各州接收（嚴格說來仍屬合法政黨的）共產黨的財產。[[85]](#85_4)在一片混亂當中，許多沖鋒隊員趁機大報私仇。例如，在伍珀塔爾市，弗里德里希·D.（Friedrich D.）凌晨4點被一群沖鋒隊員從家中的床上拖走，他的尸體在兩天后被找到。下令捕殺他的，是沖鋒隊頭目普珀（Puppe），因為他曾與普珀的妹妹相戀，而普珀一直在極力拆散他們。普珀并沒有因這種兇殘的泄憤行為而受到檢控。就連褐衫軍成員也未能幸免：納粹老黨員卡爾·W.（Karl W.）由于指責伍珀塔爾市褐衫軍頭目貪污和腐敗而遭到逮捕、痛毆和監禁，當時被報道的此類事件不止這一樁。在全國各地發生的類似事件，肯定是伍珀塔爾市的數百倍。[[86]](#86_4)

其時褐衫軍的人數日益增加，到1933年夏季已達200多萬。這場由他們發動的暴力運動，為聯邦各州按照巴本在上一年夏天接管普魯士州時所使用的方式來推行一體化提供了必要的條件。[[87]](#87_4)那次接管被州法院裁定為部分非法，被巴本所取代的、由社會民主黨主政的普魯士州政府，曾經運用聯邦議會這個代表各州的機構，較為成功地抵制了帝國政府的某些措施。希特勒內閣于1933年2月6日得以頒布緊急狀態令，結束了這種局面，然而聯邦議會在2月16日的會議上不承認聯邦議會中的普魯士州納粹代表的合法地位，將其法律地位留待州法院裁定。但聯邦議會同時還決定一直休會到法律地位明朗為止，在隨后的休會期間，褐衫軍和納粹黨的地方組織介入進來，從基層著手推動各州政府實行一體化。聯邦各州大多由少數派政府執政，這表明它們此前的提案幾乎全部在立法機構擱淺；由于得不到法定多數的支持，它們除了對納粹做出象征性的抵制，并無其他施展余地。在1933年3月6日至15日，納粹警官以及沖鋒隊和黨衛隊的各個“輔警”分隊把卐字旗插遍各地的政府大樓。這個具有強烈象征意味的舉動，得到了州政府中多數部長的容忍或贊同，他們被沖鋒隊的大隊人馬在各地政府大樓前同步舉行的示威活動嚇壞了。持反對意見的部長要么選擇了辭職，要么就是遭到褐衫軍分隊的軟禁。然后，帝國內政部長弗里克任命了各州的行政長官，由他們著手遣散現任的警察局局長，代之以納粹黨員，并且以納粹黨提名的人選取代經選舉產生的政府各部部長。只有在漢堡、符騰堡和黑森三個州，州議會在共產黨缺席、社會民主黨棄權的情況下，任命了新的聯合政府，這三個州政府中的部長均為納粹黨人和民族黨人。在這種氛圍中，各州于3月初舉行的選舉（最重要的是3月12日在普魯士州的選舉）多半毫無意義。[[88]](#88_4)

隸屬于社會民主黨“鋼鐵前線”的準軍事組織帝國國旗團陷于癱瘓，它的許多辦事處均已在2月份被警察占據。在3月初，也就是選舉剛剛結束時，各州政府開始發布取締令、逮捕社會民主黨的領導人，于是各支部紛紛自動解散，以避免遭到進一步的迫害。在這種形勢下，社會民主黨的許多領導人，比如奧托·布勞恩和阿爾貝特·格熱辛斯基，為躲避逮捕或更可怕的命運而逃往國外。[[89]](#89_4)帝國國旗團領導人卡爾·霍爾特曼（Karl Höltermann）已在5月2日離開。社會民主黨領導層試圖說服戈林撤銷對社會民主黨報紙的禁令，得到的答復是，禁令將繼續生效，直至境外的社會民主黨報紙停止“攻擊”帝國政府。社會民主黨領導人當真遍游歐洲各國，極力解釋該黨的處境，由此可見他們對納粹黨的手段依然缺乏認知。社會主義國際（Socialist International）做出的反應是，公開強烈譴責納粹恐怖（“德國的暴君正在日復一日犯下令人無語的丑陋罪行”），接著又呼吁與共產黨聯手采取行動。德國社會民主黨領導人奧托·韋爾斯（Otto Wels）立即辭去他在社會主義國際執委會的職務，徒勞地想以此安撫戈林。[[90]](#90_4)可想而知，這些戰術讓步根本未能使納粹政權放慢鎮壓左翼陣營的速度。[[91]](#91_4)

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加起來總共代表著將近三分之一的選民，但他們幾乎未做抵抗就瓦解了。納粹政府之所以能夠采取行動在全國范圍打擊他們，是因為國會縱火法令允許它為了便于行事可以推翻聯邦各州的最高當局，可援引的先例是巴本在上一年夏天罷免了普魯士州的社會民主黨少數派政府。更早時候，總統艾伯特曾在1923年對薩克森和圖林根兩州的左翼政府采取過同樣的行動。作為行動理由的所謂共產黨威脅，在1923年或者1933年都不是特別嚴重。在1933年，公共秩序的混亂為宣布緊急狀態提供了理由，而混亂絕大部分是納粹黨自己制造出來的。聯邦各州快速實現一體化的主要目的是克服原先各州政府的那種猶豫心理，從而像柏林的納粹領導層所要求的那樣運用緊急處置權全面剿滅左翼政黨。

### 四

這一系列事件在巴伐利亞造成的后果尤為險惡。主政該州的保守派政府追隨帝國政府，于2月28日下令禁止共產黨集會、查禁共產黨報刊，并且逮捕了那些它所認定的共產黨支部負責人。但這對納粹黨來說還不夠，因此在1933年3月9日，弗里克任命上巴伐利亞的納粹黨區委書記阿道夫·瓦格納（Adolf Wagner）為巴伐利亞州內政部的行政長官。更加不祥的是，慕尼黑的黨衛隊首腦海因里希·希姆萊也立即被任命為代理警察總監。他下令大規模搜捕反對者，不久又開始圍捕與政府為敵的非共產黨人。鎮壓的規模過于龐大，以至于州監獄和拘留所根本不夠用，必須找到關押巴伐利亞州政治敵人的新辦法。因此，希姆萊于3月20日對媒體宣布，將在慕尼黑郊外的達豪（Dachau）開設“一座政治犯集中營”。它將是德國的第一座集中營，并且為未來設立了一個不祥的先例。

納粹報紙第二天報道，設立集中營的目的，是監禁受到“保護性羈押”的“全部共產黨干部，必要時還包括帝國國旗團和社會民主黨的干部”。1933年3月22日，4輛警用卡車把大約200名囚犯從施塔德爾海姆和蘭茨貝格的州立監獄運送到郊外圍繞一座廢棄工廠而建的集中營。達豪鎮的居民聚在街道兩旁和工廠大門外，看著他們經過。集中營最初由一支警察分隊管理，在4月初移交給黨衛隊，其指揮官是出名粗暴的黨衛隊頭目希爾馬·瓦克勒（Hilmar Wäckerle）。瓦克勒在希姆萊的授意下，采用了一套暴力而恐怖的管理制度。4月11日，新上崗的黨衛隊看守把4名猶太囚犯帶到大門外當眾槍斃，聲稱他們企圖逃跑。其中一人沒有當場斃命，被送往慕尼黑的醫院，在那里不治身亡。死前他把當時集中營的管理狀況告訴了醫護人員，那些殘暴的細節實在駭人聽聞，于是他們叫來了檢察官。到5月底，有12名囚犯被謀殺或折磨致死。看守們腐敗、勒索、貪污成風、專橫霸道，囚犯們在一個沒有監管和規則的世界里遭受肆意的凌虐。[[92]](#92_4)

希姆萊的做法設立了一個被廣泛模仿的先例。不久，集中營開遍全國，擴充了褐衫軍在新近沒收的工會辦事處地下室設立的臨時監獄和刑訊室。它們的建立得到了廣泛宣傳，以確保人人都知道膽敢反對“民族革命”的人會得到什么下場。設立集中營來關押真正的或者所謂的國家之敵，當然不是原創的想法。英國人在布爾戰爭（Boer War）[‡](#_247)中曾用這種集中營關押敵方的平民，里面的條件通常非常惡劣，囚徒的死亡率很高。其后不久，在1904—1907年戰爭期間，德軍把14,000名赫雷羅族反叛者“集中”在位于西南非洲的營地里，殘酷地對待他們，據說每月有500人死于斯瓦科普蒙德（Swakopmund）和呂德里茨灣（Lüderitz Bay）的集中營。最終集中營的死亡率為45%，德國政府以消滅原住民人口中的“無生產力群體”為由推卸罪責。[[93]](#93_4)納粹黨人熟知這些先例，早在1921年，希特勒就已宣稱，他們將把德國猶太人關進英國人使用過的那種“集中營”。納粹黨原打算1923年11月如果能勝選并掌權，將頒布新憲法，其中的第十六節規定，“危險分子和吃閑飯的無用之人”將被送進“集體營”強制勞動，如有反抗，一律處死。在時間更近一些的1932年8月，納粹報紙刊登了一篇文章，宣稱如果納粹黨掌權，將“立即逮捕并審判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的所有干部……[而且]把嫌疑犯和精神煽動犯全部送進集中營”。1933年3月8日，帝國內政部長弗里克公開重申了這一警告。[[94]](#94_4)因此，達豪并不是面對監獄人滿為患的意外難題而即興想出的解決方案，而是納粹黨幾乎從成立之初就開始構思并長期籌劃的舉措。當地的、區域性的和全國性的報刊都對它做了廣泛宣傳和報道，以此嚴厲警告任何打算反抗納粹政權的人。[[95]](#95_4)

沖鋒隊和黨衛隊的集中營和拘留所在3、4月份時的生存條件，被恰當地描述為“無法無天的臨時施虐所”。[[96]](#96_4)沖鋒隊和黨衛隊的暴行，基本上不包含1970年代阿根廷、智利或希臘等軍事獨裁政權中秘密警察所使用的那種花樣翻新的酷刑，他們發泄在囚犯身上的，往往是不加遏制的憤怒。施虐的方式并不復雜，就是拳打腳踢以及用橡皮棍抽打。此時警察已擺脫了在魏瑪共和國治下所感受到的約束，他們在一些情況下也加入、旁觀或者利用褐衫軍輔警對囚犯進行刑訊逼供。工人共產黨員弗里德里希·施洛特貝克（Friedrich Schlotterbeck）于1933年被捕，后來記錄了他在警察總部是如何受一群黨衛隊成員審訊的。他們重拳擊打他的臉，用橡皮棍抽他，捆綁他，用木棒敲他的腦袋，在他倒地時用腳踢他，當他昏迷時用水潑他。在毆打稍微消停的時候，一名警官問了他許多問題，只是在有個黨衛隊被施洛特貝克激烈的肢體反抗激怒，掏出手槍威脅要槍斃他時，那位警官才進行了干預。他沒有招供，被帶回了牢房，渾身疼痛，身上滿是傷口和淤青，臉上淌著血，幾乎無法行走。施洛特貝克受到了看守的善待，但看守告訴他，為了防止他自殺，他們必須讓牢房的燈一直亮著，并且定時來查看。后來的十幾年他都是在監獄和集中營度過的。[[97]](#97_4)他的經歷在那些不肯屈服的、堅定的共產黨員當中并不特殊。

沖鋒隊員對落在他們手中的社會民主黨人并沒有稍加寬待，他們不分男女，對左翼議員一律痛毆。在許多被打的社會民主黨女黨員中，有一位是柏林克珀尼克區（Köpenick）的市議員瑪麗·揚科夫斯基（Marie Jankowski），她被逮捕，被人用橡皮棍毆打，被扇耳光，被迫在一份文書上簽字保證不再從政。[[98]](#98_4)上述行動全國都有發生，但分布不均，由于缺乏具體的統一調度，因此無法精確地估計它們的范圍。但現有的、正式登記的逮捕數據確切無疑地顯示，這場暴力活動的規模之大，前所未有。官方報告顯示，僅在普魯士州，3月和4月就至少有25,000人被捕，但此數據遺漏了柏林，而且沒有計入褐衫軍“胡亂”逮捕但未上報的人數。巴伐利亞州被逮捕的人數在4月底已達1萬左右，到6月底又翻了一番。而且，這些被捕者中有許多僅關了幾天或者幾星期就被釋放，例如在奧拉寧堡（Oranienburg）集中營，35%的人被囚一周至四周，在里面關押一年以上者不到0.4%。[[99]](#99_4)大體上說，1933年7月底全國被登記為受到保護性羈押的27,000人，與三四個月前遭到保護性羈押的不是同一批人，因此集中營囚禁過的人數遠高于這個數字。[[100]](#100_4)此外，納粹黨的對手社會民主黨和勁敵共產黨并沒有全部被送進集中營，還有數千人被關在各州的監獄和全國各地的拘留所。

鎮壓規模之大，可以根據共產黨領導層記錄的這份數據做出估算：截至1933年底，有13萬黨員遭到逮捕和監禁，2,500人被殺。這些數據或許有些夸大，但用來估算此次鎮壓對黨組織造成的破壞，還是可信的。例如在魯爾區，全部黨員將近一半被關押。普魯士警方的報告顯示，早在3月底就有大約2萬名共產黨員被捕、投入監獄。[[101]](#101_4)即使按照最保守的半官方估算，1933年在德國因政治原因遭到逮捕的總人數也超過了10萬，關押期間死亡者將近600人。[[102]](#102_4)暴力和兇殺已到了驚人的程度，是魏瑪共和國初期以后不曾有過的。

這次對納粹黨的對手進行的殘酷血腥的大規模攻擊，是由國會縱火法令正式批準的，但該法令的出發點是防范共產黨計劃發動的革命暴動，根本沒有提及社會民主黨。比共產黨準備發動一場暴動這種說法更加荒謬的，是認為社會民主黨贊同或者支持共產黨的暴動計劃。然而，許多德國中產階級人士顯然認為，政府暴力鎮壓“馬克思主義”及其一切變種是有正當理由的。多年來的打打殺殺和街頭沖突，讓人們對政治暴力習以為常，不再敏感。那些仍心存懷疑的人不會注意不到，警察以及由納粹沖鋒隊員充當的輔警在那幾個星期里對納粹黨的對手們做了些什么。他們中的許多人在說出自己的憂慮前肯定做過認真的思考。任何對混亂程度感到擔心的人，可能都被希特勒1933年3月10日的講話打消了顧慮：他公開譴責對外國人實施的暴力，把這種行為歸咎于滲透進沖鋒隊里的共產黨員，他還告誡沖鋒隊員停止“騷擾個人、攔截車輛和干擾商業”。

然而，希特勒接著告訴褐衫軍，務必“須臾不忘我們的口號，那就是消滅馬克思主義”。“民族起義將繼續有條不紊地開展，并且聽從上層的命令，”他說，只有“當這些命令遭到抵抗時”，褐衫軍才會采取行動以確保“這種抵抗立即被徹底粉碎”。這最后一句限定條件當然足以縱容暴力活動繼續上演，不但不見減弱，實際上反而升級了。[[103]](#103_4)一位民族黨領導人于3月10日抗議希特勒破壞法律秩序，3月19日巴本也打電話表達了同樣的意思，希特勒憤怒地指責他們企圖“阻止民族革命”。他說，1918年的“十一月罪人”以及那些在魏瑪時期企圖壓制納粹黨的人比以前更加卑劣了。他贊揚沖鋒隊員“紀律嚴明”，同時譴責“資產階級遇事軟弱怯懦，處理問題時戴著小羊皮手套，而不是亮出鐵拳”，并警告說，絕不允許任何人阻擋他“消滅并根除馬克思主義”。[[104]](#104_4)

早在國會縱火法令和1933年3月5日選舉之前，德國就已穩穩地踏上了通往獨裁體制的道路。但這兩件事無疑加速了獨裁進程，為它提供了雖然老套，但在法律和政治上看似正當的理由。勝選之后，希特勒于3月7日告訴內閣成員，他將進一步尋求以憲法修正案的形式取得法律認可，允許內閣繞開國會和總統，自行頒布法律。這個措施是有先例的，即魏瑪共和國治下的緊急狀態立法；但它顯然比任何一次先例都走得更遠。希特勒長久以來一直夢想采用這個辦法。[[105]](#105_4)這部《授權法》（Enabling Act）將終結魏瑪共和國備受仇視的民主制度，并將完成納粹黨于1933年1月30日開始的工作——建立一個“民族主義集中政府”。不久，戈培爾等納粹頭目將它改名為“民族主義起義政府”。在3月初，它簡化成了“民族主義革命”，以此強調參與行動的遠遠不僅是內閣政府。不久又改稱“國家社會主義革命”，終于使希特勒在聯合政府中的非納粹合作伙伴在政治上湮沒無聞。[[106]](#106_4)

[\*](#_242) 斯巴達克同盟暴動，即第一章第四節提到的卡爾·李卜克內西和羅莎·盧森堡于1919年初領導的暴動。斯巴達克同盟原為社會民主黨內的左翼派別，于1918年12月組建德國共產黨。

[†](#_243) 今俄羅斯加里寧格勒州首府加里寧格勒。——編注

[‡](#_244) 布爾戰爭，英國于1880—1881年和1899—1902年在非洲南部進行的兩場戰爭。

## 第三節 民主政體被摧毀

### 一

盡管巴本和希特勒在內閣中的其他盟友贊成警察鎮壓左翼人士，但兩個月前當他們同意希特勒成為德國總理時，他們所期待的根本不是革命的語言和無節制的街頭暴力，而是期望通過延攬納粹黨入閣來終止這一切。納粹黨為新當選的國會舉行了隆重的開幕典禮，以此安撫憂心忡忡的保守派和傳統人士，包括總統興登堡，畢竟他至少還擁有罷免希特勒、委任其他人的正式權力。由于被焚毀的國會大廈無法使用，典禮只好另選地方。希特勒及其保守派盟友同意將地點選在作為普魯士君主制象征的波茨坦駐軍教堂，日子選在1933年3月21日，正是俾斯麥建立第二帝國之后國會首次開會的紀念日。典禮被當作一次宣傳活動，由戈培爾進行了精心的、細致入微的策劃，用以展示舊帝國與新帝國的接合：總統興登堡身穿普魯士陸軍元帥軍服，站在皇帝的空御座旁邊，接受身穿長禮服的總理希特勒的鞠躬禮并與他握手；希特勒發表演講，值得注意的是其措辭的故作溫和，他贊揚了興登堡在將德國的命運托付給新生代的過程中所起的歷史作用。花圈被擺放在普魯士歷代君王的墓石上，然后由興登堡檢閱準軍事組織和軍隊的盛大分列式。

典禮所傳達的視覺形象比講話更加重要。出席儀式的希特勒像一位穿戴得一絲不茍的平民政治家，謙恭地承認普魯士軍事傳統的崇高地位。儀式上使用的旗幟是黑白紅的帝國國旗，它在3月12日已經正式取代了魏瑪共和國的黑紅金國旗。儀式上有普魯士軍事貴族，身穿他們那種略顯奇異、令人想起君主制傳統的軍服。儀式的地點選在新教教堂，含蓄地重申了新教與軍隊和君主具有同等的至高地位。儀式代表著舊德國的回歸，把玷污了民族記憶的魏瑪民主制度從歷史中清除出去。[[107]](#107_4)社會民主黨拒絕了出席儀式的邀請，這并不令人意外。更有象征意味的是，希特勒拒絕去波茨坦天主教教區的教堂做禮拜，理由是天主教教士禁止某些納粹頭目接受圣禮，他們依然忠于中央黨，并且以批評的態度看待納粹黨的無神論者做派。這顯然在警告教會，要識時務，跟納粹黨走。[[108]](#108_4)

兩天后，在被指定為臨時國會會址的克羅爾歌劇院，希特勒像其他納粹黨議員一樣身穿準軍事組織的褐衫制服，對國會發表了演說，現場氣氛與典禮那天截然不同。他站在一面巨大的卐字旗下，提出了籌劃已久的方案：授權總理起草法律時可以背離憲法、不經國會同意并且不征詢總統。這部《授權法》須在4年后展期；國會本身之存在、代表聯邦各州的上議院之存在，以及總統之地位，將不受影響。然而，它意味著魏瑪憲法將成為一紙空文，國會將完全被排除在立法程序之外。《授權法》的通過絕非毫無懸念，因為在120位當選的社會民主黨議員中，有94位依然能參加投票；那些缺席者，有的在獄中，有的在病中，有的因擔心生命受到威脅而回避了。希特勒知道，他絕不可能得到社會民主黨的支持。魏瑪憲法修正案的通過，不僅需要三分之二的法定人數，而且需要出席者中三分之二的多數票支持。赫爾曼·戈林作為國會的會議主持人，通過不計入共產黨議員把法定人數從432人減至378人，盡管共產黨議員全部是合法當選的。這是個專橫的決定，沒有任何法律依據。[[109]](#109_4)但即使采取了這種非法手段，納粹黨仍然需要中央黨的支持票來推動法案的通過。

在此之前，中央黨早已停止了對民主制度的支持。政治天主教運動是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歐洲的主要潮流，中央黨出于對布爾什維主義和革命的恐懼而順應了這一潮流，開始支持獨裁制度和專制政體。確實，將要在德國形成的，似乎并不是奧地利和西班牙建立的那種天主教政客很快會給予支持的“教權法西斯主義”政權。但天主教會在1929年通過與墨索里尼簽署政教協定而維護了它在意大利的地位，此時它有可能做出類似的安排，以維護其在德國的地位。自2月中旬以來，天主教徒及其政治代表、報紙、發言人和在各地的工作人員都面臨著不斷升級的恐怖威脅，因此中央黨焦急地尋求可以使教會生存下去的保證。此時，在神職人員前所未有的強烈影響下，在天主教高級教士路德維希·卡斯的領導下，中央黨與希特勒經過兩天的討論，得到了希特勒的保證：教會的權利將不會受到《授權法》的影響。海因里希·布呂寧及其親信幕僚于是打消了疑慮。作為天主教在南方的堡壘，聯邦各州盡管已被柏林政府委任的帝國行政長官接管，但將維持現狀，并保持司法獨立。事實證明，這些承諾，加上來自梵蒂岡的沉重壓力，足以贏得中央黨議員支持《授權法》。從長遠看來，該法案注定了中央黨的政治滅亡。[[110]](#110_4)

在一片濃重的暴力和恐嚇氣氛中，代表們到達了克羅爾歌劇院。社會民主黨人威廉·赫格納（Wilhelm Hoegner）回憶道：

迎接我們的是反復的狂喊聲：“我們要《授權法》！”胸前別著卐字徽章的小伙子放肆地上下打量我們，幾乎是在夾道圍攻，讓我們難以通行。他們大聲辱罵我們，比如“中央黨豬玀”、“馬克思主義母豬”。克羅爾歌劇院里到處是荷槍實彈的沖鋒隊和黨衛隊……議事廳掛著卐字旗和類似的裝飾物……我們這些社會民主黨議員在最左側的位子落座后，沖鋒隊和黨衛隊的人在出口和我們身后沿墻站定，呈半圓狀圍住我們。他們的態度讓我們覺得來者不善。[[111]](#111_4)

希特勒演講的開篇像往常一樣，抨擊1918年的“十一月罪人”，吹噓自己消除了共產主義的威脅。他再次承諾要保護教會的利益，尤其是在學校的利益，這是魏瑪共和國時期引發爭端的主要問題。然而，他的結束語無疑是在威脅，假如法案被否決，就要進行暴力鎮壓。他宣稱：“民族主義起義的政府已下定決心、做好迎戰準備，一旦法案被否決，就宣布進行抵抗。先生們，希望你們此刻在和平與戰爭之間做出自己的抉擇。”這番話對搖擺不定的中央黨議員產生了效果，比如海因里希·布呂寧，他決定對法案投贊成票。曾任德國總理的中央黨領導人約瑟夫·維爾特私下里對社會民主黨人說：“他們擔心如果法案被否決，將會爆發納粹革命，進入血腥的無政府狀態。”[[112]](#112_4)

在這種威脅面前，社會民主黨人決定，黨主席奧托·韋爾斯在發言表示反對時，應該使用溫和的，甚至是安撫的語氣。他們擔心如果不這樣，那些兇相畢露、在大廳里沿墻站成一圈的褐衫軍就會槍殺或痛毆他，或者在他走出去的時候逮捕他。但韋爾斯不得不說的話已足以激動人心，他為魏瑪共和國取得的成就辯護，說它實現了機會均等和社會福利，使德國重返國際社會。“我們可以失去自由和生命，但不能失去榮譽。”韋爾斯并不是在夸大其詞，已有多位杰出的社會民主黨人被納粹殺害，他本人發言時馬甲口袋里就裝著氰化物膠囊，準備如果演講后遭到褐衫軍逮捕和折磨就吞下去。他激動得聲音哽咽，以對未來發出的呼吁作結：

在這個歷史時刻，我們德國社會民主黨人莊嚴宣布，我們忠于人道與公正、自由與社會主義這些基本原則。沒有任何授權法能夠授權你們消滅這些永恒的、堅不可摧的理念。《反社會黨人法》沒能消滅社會民主黨人，社會民主運動同樣能夠從最近的迫害中汲取新的力量。我們向被迫害和被殘酷壓迫的人致敬。他們的堅定與忠誠值得敬佩。他們堅守信念的勇氣、他們堅定的信心，保證了德國將擁有一個更加光明的未來。

韋爾斯的結束語在大廳中引起了騷動，納粹黨議員刺耳的嘲笑聲淹沒了從社會民主黨議員座席傳來的掌聲。

希特勒的反應是不屑一顧。社會民主黨在開會前已把演講稿交給媒體，希特勒的手下弄到了副本，以便總理據此準備如何回應。希特勒知道自己不需要他們的票數，在身穿制服的納粹議員雷鳴般的掌聲中，他說：“你們還以為自己的星星能夠重新升起呢！先生們，德國之星即將升起，而你們的即將隕落……德國應該獲得自由，但不是通過你們！”在其他政黨的黨魁做了簡短發言之后，議員進行投票，有444票贊成、94票反對。曾經自視甚高的德國自由派，此時通過他們的政治代表——德意志國家黨對法案投了贊成票。只有社會民主黨投了反對票。絕大多數議員投的贊成票已經足以使法案獲得通過，因此就算全部120名社會民主黨議員和全部81名共產黨議員都出席會議，使投票總人數達到647而不是566，并且這201人全部投反對票，也無濟于事。[[113]](#113_4)

《授權法》既已生效，國會就可以真正棄用了。自此，希特勒及其內閣行使專制權，要么把總統興登堡當作橡皮圖章使用，要么像《授權法》所允許的那樣干脆繞開他。沒人相信4年后《授權法》有效期屆滿之時國會將否決它的展期，實際上國會也不曾否決過。與國會縱火法令一樣，《授權法》本來是臨時的緊急狀態法，在魏瑪時期曾出現過幾個有限度的先例，此時卻成為永久取消公民權和民主自由權的法律依據，或者說是偽法律依據。《授權法》在1937年和1939年兩次展期，于1943年成為永久性法令。褐衫軍的街頭恐怖已經無處不在，足以讓人相當清醒地判斷出即將發生什么。韋爾斯準確地預測，德國很快將成為一黨專政的國家。[[114]](#114_4)

### 二

共產黨在2月28日之后實際上已不再礙事，《授權法》也已生效，希特勒政府遂將注意力轉向社會民主黨和工會。社會民主黨和工會本來已經普遍面臨逮捕、毆打、恐嚇甚至殺戮，他們的辦公場所被占領，報紙被取締；此時納粹黨又將全部怒火轉向了他們，他們已無招架之力。能夠與工會實現合作，是社會民主黨在1920年擊潰卡普暴動的關鍵因素；但在1933年春，這個能力已不復存在。勞工運動的左右兩翼在1933年1月團結起來，共同反對任命希特勒為總理；在隨后的兩個月里，它們遭遇了相似的暴力和鎮壓，越來越多的工會辦事處被沖鋒隊團伙占領和搗毀。據工會統計，截至3月25日，全國有45個城鎮的工會辦事處遭到褐衫軍、黨衛隊或者警察分隊的占領。這種壓力不僅對尚存的工會（其功能是代表工人與雇主談判工資和工作條件）構成了最直接的威脅，而且迅速加深了工會與社會民主黨之間的裂痕。

對社會民主黨的政治鎮壓以及邊緣化很快變得更加明顯，于是特奧多爾·萊帕特（Theodor Leipart）領導下的工會開始疏遠社會民主黨并尋求新政權的接納，試圖以此自保。3月21日，工會領導層宣布，工會無意在政壇發揮作用，而且“無論哪種體制的政府”執政，工會都將履行自己的社會功能。[[115]](#115_4)納粹黨人當然知道他們在工會會員中的支持者寥寥無幾。納粹黨的“工廠車間組織”[[116]](#116_4)不受歡迎，1933年初的幾個月里，它在各個勞資聯合委員會舉行的絕大多數選舉中，僅獲得不到10%的選票。只在極少數地方，比如克虜伯兵工廠、化工廠、某些鋼鐵廠或者魯爾煤礦，它的支持率較高，這表明在工業界的某些主要行業，一些工人已經開始歸順新政權。[[117]](#117_4)然而，絕大多數的選舉結果引起了納粹黨的警覺，于是強制那些尚存的勞資聯合委員會無限期暫停選舉。

盡管對這種專橫干涉民主權利的做法感到憤怒，但工會領導人特奧多爾·萊帕特及其指定的繼任者威廉·洛伊施納（Wilhelm Leuschner）仍在千方百計保全工會組織。他們相信納粹黨正在認真制定他們呼吁了多年的創造就業崗位的計劃，這個信念激勵著他們努力尋求折中之策。4月28日，他們與基督教和自由派的工會簽署了一份協議，這是為了把所有工會組織全部聯合成一個全國性組織而邁出的第一步。協議的開篇寫道：“民族主義革命已經建立了一個新政府。這個政府志在把全體德意志民族整合為一個國家，并施展它的威力。”工會顯然認為它們將在這個進程中發揮積極作用，而且希望獨立地發揮作用。為了表達這種意愿，它們一致支持戈培爾公開宣布五一節首次成為公共假日。傳統上，這一天通常舉行大規模的示威活動，公開展示勞工運動的力量。這是勞工運動長久以來的愿望。工會同意將這一天命名為“全國勞工日”。這個做法再次表明，新政權統合了看似大相徑庭的民族主義傳統與社會主義傳統。[[118]](#118_4)

在五一節當天，工會的辦事處掛滿了舊帝國的黑白紅國旗，這背離了勞工運動的傳統，肯定令許多老工人覺得可恥和沮喪。紡織工會主席卡爾·施拉德爾（Karl Schrader）在柏林加入了舉著卐字旗的游行隊伍，他不是唯一這樣做的工會干部。實際上，極少有人參加共產黨在不同地點以閃電般的速度舉行的“飛速”反示威活動，也極少有人參加社會民主黨人在他們自己的秘密集會場所里鎖上大門悄悄舉行的五一紀念活動；卻有數十萬人，乃至數百萬人，加入了由演奏著《霍斯特·韋塞爾之歌》和愛國歌曲的沖鋒隊銅管樂隊開路的隊伍，在大街上游行。他們涌向寬闊的露天會場，在那里聆聽演講和民族主義“工人詩人”作品的朗誦。黃昏時分，電臺傳出希特勒低沉的聲音，他向所有德國工人保證，失業很快將成為歷史。[[119]](#119_4)

柏林的滕珀爾霍夫機場（Tempelhof field）人山人海，上百萬集會者按軍隊的風格被編成12個巨大的方陣，置身于納粹旗幟的海洋之中，三面巨大的納粹旗幟被探照燈照亮。夜幕降臨之后，煙花表演達到高潮，幽暗中閃現出熠熠生輝的巨大卐字，照亮了天空。媒體大張旗鼓地慶祝新政權贏得了工人的支持，宣稱此次工人階級的盛會堪與10天前在波茨坦為上層人士舉行的慶典相媲美。[[120]](#120_4)然而，出席盛會的群眾并非全部出于自愿，氣氛也并非全然熱情洋溢。許多工人，尤其是政府雇員，受到威脅說如果不參加就會被解雇，柏林的數千名企業員工上班時被沒收了考勤卡，并被告知只能在滕珀爾霍夫機場取回卡片。暴力迫在眉睫，恐嚇無處不在，這種大環境也發揮了相應的作用，促使工會領袖正式同意參加。[[121]](#121_4)

然而，假如工會領導層以為做出這樣的妥協就可以保住他們的組織，那么等待他們的將是當頭一棒。納粹黨在4月初就已開始暗中準備接管整個工會運動。戈培爾在4月17日的日記中寫道：

在5月1日，我們應該把五一節辦成一場盛會，用以展示德國人民的意志。在5月2日，工會的辦事處將被占領。工會也要被納入一體化進程。可能會有幾天的吵鬧，但隨后那些辦事處將屬于我們。我們絕不能再留任何余地。我們僅僅是在幫助工人們從寄生蟲般的工會領導那里獲得解放，這些領導人的所作所為只是使工人們至今生活艱難。一旦我們控制了工會，其他政黨和組織將無法堅持很長時間。[[122]](#122_4)

1933年5月2日，褐衫軍和黨衛隊氣勢洶洶地闖入社會民主黨所領導的工會在全國各地的每個辦事處，接管所有工會報紙和期刊，占領工會銀行的所有支行。萊帕特等工會領導人被逮捕，送往集中營予以“保護性羈押”，其中許多人在一兩個星期后獲釋，其間在那里遭到痛毆和野蠻的羞辱。5月2日發生了一起特別恐怖的事件，沖鋒隊在杜伊斯堡市（Duisburg）工會辦公樓的地下室把4名工會干部毆打致死。工會運動的管理機構及其資產全部落入“國家社會主義工廠車間組織”手中。5月4日，基督教工會以及其他所有工會機構主動無條件地接受希特勒的領導。戈培爾在日記中預期的“吵鬧”從未出現。曾經聲勢浩大的工會運動幾乎在一夜之間消失無蹤。[[123]](#123_4)戈培爾在5月3日的日記中吹噓：“革命在繼續。”他滿意地記錄了大規模逮捕“大人物”的行動，自詡道：“我們是德國的主人翁。”[[124]](#124_4)

就算社會民主黨決定垂死一搏，它也已經無力號召工會前來支持，對此頗有把握的政府遂進入取締社會民主黨的收官階段。5月10日，政府通過法庭命令的方式沒收該黨的資產和財物，柏林的國家總檢察長給出的理由是萊帕特等人被認為貪污了工會資金，這一指控實際上毫無根據。韋爾斯已安排把黨的資金和檔案轉移到國外，但納粹黨依然斬獲甚豐。這種措施使社會民主黨根基盡失，無法重建其組織或者恢復其報刊等出版物。作為一場政治運動，它實際上已被終結。[[125]](#125_4)然而令人難以置信的是，這一切根本不妨礙社會民主黨5月17日在國會支持政府。那天希特勒提交給立法機構一份措辭中立的決議，主張德國在國際裁軍談判中擁有平等地位。這份聲明除了主張德國的權利以外并無實際意義，其目的僅僅是為幾個月來飽受全世界抨擊的希特勒政權在國外贏得些許好評，該政權實際上根本無意參與任何裁軍進程。盡管如此，保羅·勒貝（Paul Löbe）領導下的社會民主黨議員認為，如果他們抵制這次會議，就會被說成不愛國，因此能出席的都出席了會議并且參與了國會的表決。在國歌聲中，在納粹黨徒高喊的“萬歲！”聲中，希特勒裝模作樣地發表了措辭溫和中立的演說，隨后，國會一致通過了決議。赫爾曼·戈林顯然大為滿意，他以會議主持人的身份宣布，在德國的國際命運岌岌可危之際，全世界見證了德國人民的團結一心。社會民主黨議員的行為引起了黨內人士尤其是當時流亡在外的領導人的憤怒，他們譴責這種行為，認為它否定了3月23日對《授權法》投下的令人自豪的反對票。領導那次投反對票的奧托·韋爾斯收回了遞交給社會主義國際的辭呈。流亡領導人將社會民主黨總部遷至布拉格（Prague）。社會民主黨在國會中的領軍人物人之一、激烈反對為納粹黨站臺的女議員托妮·普菲爾夫（Toni Pfülf）深感恥辱和絕望，因為社會民主黨議員們未能意識到他們被納粹黨利用作納粹宣傳戰的幫手。她拒絕出席5月17日的會議，并于1933年6月10日自殺。勒貝被逮捕，韋爾斯逃往國外。[[126]](#126_4)

社會民主黨在布拉格的新領導層與留在德國的干部和議員之間的裂痕迅速加深。然而政府宣稱，它看不出該黨的兩個陣營之間有什么區別，那些潛逃到布拉格的是從境外抹黑德國的叛國者，那些沒逃的是慫恿和協助他們的叛國者。1933年6月21日，內政部長威廉·弗里克命令德國全境各州政府，遵照國會縱火法令取締社會民主黨，社會民主黨議員均不得繼續在任何立法機構任職，社會民主黨的所有會議和出版物均被禁止，該黨黨員不得擔任公職或者公務員。1933年6月23日，戈培爾在日記中得意揚揚地寫道，社會民主黨已經被“解散了。太棒了！專政的實現已經不必再等多久”。[[127]](#127_4)

社會民主黨也不必再等多久，就會明白專政意味著什么。弗里克6月21日的法令發布后，全國有3,000多名社會民主黨干部被逮捕，受到凌虐，被施以酷刑，被投入監獄或集中營。在柏林市郊的克珀尼克區，沖鋒隊在一座房子遇到武裝抵抗后，圍捕了500名社會民主黨人，連續多日毆打、折磨他們，殺害了91人。即使按照褐衫軍的標準，這場協同突襲行動也是野蠻的，不久即被稱為“克珀尼克血腥一星期”。報復行動專門針對1918—1919年革命期間任何與慕尼黑左翼陣營有關的人。庫爾特·艾斯納的前秘書、時任代特莫爾德市（Detmold）社會民主黨黨報編輯的費利克斯·費申巴赫已在3月11日被捕，與多數社會民主黨領導人一起被關押在利珀。8月8日，沖鋒隊的一支分隊用轎車把他帶出州監獄，表面上是要轉往達豪。但在路上，他們強令押運的警察下車，然后駛入一片樹林，在那里拖著費申巴赫走了幾步，然后射殺了他。納粹報紙后來報道說，費申巴赫在“企圖逃跑時被擊斃”。[[128]](#128_4)沒什么爭議的人物也成了目標。梅克倫堡—什未林州（Mecklenburg-Schwerin）前部長會議主席、社會民主黨人約翰內斯·施特林（Johannes Stelling）被帶到褐衫軍軍營，遭到痛毆，在半昏迷狀態下被扔到街頭，又讓另一伙褐衫軍碰見，被他們用轎車帶走，折磨致死。施特林的尸體連同沉重的石塊被縫進一只袋子扔進了河里，后來與同夜遇害的另外12位社會民主黨和帝國國旗團干部的尸體一起被打撈上來。[[129]](#129_4)

這種對社會民主黨施行的野蠻鎮壓遍及全國各地。特別臭名昭著的是在布雷斯勞市南郊的杜垓（Dürrgoy）臨時集中營，它由當地褐衫軍頭目埃德蒙·海內斯（Edmund Heines）于4月28日開設。這位集中營指揮官以前曾是自由軍團的領導人以及一個極右翼暗殺隊的成員，在魏瑪共和國時期曾被裁定犯有謀殺罪。他的階下囚包括曾任社會民主黨布雷斯勞地區行政負責人、布雷斯勞前市長的赫爾曼·呂德曼（Hermann Lüdemann），以及布雷斯勞市社會民主黨黨報的前編輯。囚犯不斷遭受毆打和酷刑。海內斯定期舉行通宵的消防演習，等囚犯回營時又命人毆打他們。海內斯給呂德曼穿上小丑服裝，帶到布雷斯勞市游街示眾，看熱鬧的沖鋒隊員一路嘲笑、辱罵他。海內斯還曾從施潘道監獄劫走了關押在那里的、與他有私仇的國會中社會民主黨前主席保羅·勒貝。在勒貝的妻子和朋友們的施壓下，釋放勒貝的命令很快下達，但他拒絕離開，表示要與他的社會民主黨獄友患難與共。[[130]](#130_4)

社會民主黨在7月14日同共產黨一樣被正式取締。遭到如此殘酷的鎮壓，它在此之前實際上已經形同消亡。事后回想，它的生存機會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迅速喪失殆盡。在此過程中起決定作用的是它沒有對1932年7月20日的巴本政變進行有效的抵抗。如果說它曾經有過可以挺身捍衛民主制度的時機，那就是巴本政變。然而憑借后見之明來譴責它的不作為是有失輕率的。1932年夏幾乎沒人能意識到，外行的、在許多方面相當荒唐的弗朗茨·馮·巴本政府，在執政僅6個月之后就會讓位給這樣一個政權：它的極端殘酷、它的完全無視法律，已到了讓正派而守法的社會民主黨人難以理解的程度。從許多方面看，勞工運動的領導層在1932年7月希望避免暴力，是完全值得稱贊的；他們并不知道，這一決定將為后來更為嚴重的暴力行動大開方便之門。

在政府執法機構的協助和軍隊的默許下，納粹黨鎮壓了勞工運動，從而掃除了建立一黨專政國家的最大障礙。勞工運動已被馴服；工會已被搗毀；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在1932年11月的選舉，即最后一次完全自由的國會選舉中的選票加在一起遠遠勝過納粹黨，如今這兩黨已在一場暴力狂歡中被摧毀。然而還有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保留了下來，其成員和選民在整個魏瑪時期大多忠實于他們的原則和政治代表，它就是中央黨，其力量不僅僅源于政治傳統和文化傳承，主要還來源于它對天主教會及其信徒的認同。對待中央黨，不能像把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逐出政治舞臺那樣肆無忌憚地施行暴力，而是需要更巧妙的戰術。1933年5月，希特勒和納粹黨領導層開始將這些戰術付諸行動。

### 三

克萊門斯·奧古斯特·馮·加倫伯爵（Clemens August Count von Galen）是一位傳統型天主教牧師，1878年生于威斯特法倫的貴族之家，成長于貴族階層虔誠信仰天主教的氛圍中，受到了來自親戚的影響，比如他的叔公、社會天主教主義奠基人之一馮·克特勒主教（Bishop von Ketteler）。在家里的13個孩子中，克萊門斯·奧古斯特排行第11，他似乎命中注定要當牧師。俾斯麥1870年代試圖壓制天主教會的做法，喚醒了他父母的政治意識，他們教導他，良知，尤其是宗教良知，比服從權威更重要。此外父母還教育他要謙遜、簡樸。由于經濟拮據，他們過著斯巴達式的清苦生活，住在一座多數房間沒有自來水、室內衛生間和供暖設備的城堡里。加倫的早期教育部分來自家庭，部分來自一所耶穌會學院，之后他進入一所公立學校，修習大學預科。從因斯布魯克大學（University of Innsbruck）神學院畢業后，他于1904年成為牧師。1906—1929年，他在柏林擔任教區牧師，市內絕大多數人口是新教教徒，還有一個強大的、多由無神論者構成的工人階級。加倫身高6英尺7英寸[\*](#_251)，他的超拔風范不只表現于此，他禁欲苦修、善于與窮人溝通，這為他贏得了良好的聲譽。在他的人生態度里，貴族義務占據很大的分量。[[131]](#131_4)

來自這樣的背景，毋庸置疑加倫的政治立場是屬于右翼的。他支持1914—1918年德國的戰爭行為，并且自愿上前線做隨軍牧師，但未能如愿。他憎恨1918年革命，因為它推翻了一種神授的國家秩序。他對“背后一刀”導致德國戰敗的說法深信不疑，反對中央黨當初支持魏瑪民主制度，并且參與協商為一場新的、更加右傾的天主教政治運動鋪路，但此事半途而廢，中央黨在其中只發揮了溫和的影響力。加倫痛斥魏瑪憲法“不敬神”，附和了紅衣主教米夏埃爾·福爾哈貝爾（Cardinal Michael Faulhaber）的譴責——魏瑪憲法的世俗基礎是“褻瀆神明”。與其他許多牧師一樣，福爾哈貝爾熱情接受納粹領袖所做的承諾：在1933年恢復政府中強大的基督教基礎。其實，希特勒以及多數納粹頭目都意識到了信仰基督教的人口分布之廣、忠誠度之深，因此不想在鎮壓中央黨這類政黨的過程中激怒基督教徒。于是在1933年最初的幾個月里，他們小心翼翼地反復宣稱新政府將恪守基督信仰。他們宣布，“民族主義革命”旨在終結魏瑪左派的唯物主義無神論，轉而傳播一種“積極的基督教”，它超越教派，與德意志精神相適應。[[132]](#132_4)

與加倫一樣，天主教牧師們普遍視無神論的共產主義為一個主要威脅，為天主教會在國內的地位感到擔憂；但他們也有更多世俗考慮。魏瑪共和國時期，在州政府、中央政府和高級公務員崗位上任職的天主教界人士達到了史無前例的數量。為謀求簽署那份承諾保留上述既得地位的政教協定，德國的主教們表示不再反對納粹運動，并在5月發表了支持希特勒政權的集體聲明。他們開始壓制仍然公開批評納粹運動的各地牧師。那些信奉天主教卻由于主教們禁止在教堂內穿制服而無法參加彌撒的褐衫軍和納粹黨，開始出現在沒有這種禁律的新教禮拜儀式上，導致數量驚人的教眾脫離天主教，轉信與之對立的新教。紅衣主教貝爾特拉姆（Cardinal Bertram）說服大主教們撤銷了禁令。[[133]](#133_4)不久，消極的容忍變成了積極的支持。許多牧師參加了5月1日舉行的紀念“全國勞工日”的公共典禮。1933年6月1日富爾達主教會議（Fulda Bishops' Conference）發表了一份牧函[†](#_252)，歡迎“民族的覺醒”以及納粹黨新近所強調的強大政府權威，盡管它同時也表達了對這兩個問題的擔憂：納粹黨對種族問題的強調，以及天主教的世俗機構面臨的迫在眉睫的威脅。教區主教代理人施泰因曼（Vicar-General Steinmann）舉手行納粹禮的樣子被拍攝了下來，他宣稱希特勒是上帝派來領導德國人民的。[[134]](#134_4)天主教學生組織發表聲明，效忠新政權（這是“在我們的文化中恢復基督信仰的唯一辦法……我們的領袖阿道夫·希特勒萬歲”）。天主教報紙紛紛停刊或者自動變成納粹的宣傳喉舌。[[135]](#135_4)

在這種局面的形成過程中，中央黨黨魁卡斯教長繼續延長在梵蒂岡的訪問，以便協助起草政教協定。很快人們就清楚地看出，他愿意犧牲中央黨以換取政府在協定上簽字。5月初，他以身體欠佳為由辭去了黨魁職務，接替他的是前總理海因里希·布呂寧。布呂寧立即成為黨內崇拜的對象，這是對圍繞希特勒而建立的那種個人崇拜的拙劣模仿。中央黨報紙當時稱布呂寧為“領袖”，宣稱他的天主教“侍從”將“服從”他的決定。[[136]](#136_4)中央黨的議員和官員全部自動辭職，給予布呂寧充分的權力來重新任命他們或者指派接任者。這其中包括國會議員，他們是由于在黨的候選人名單中排名靠前而當選的，也就是說布呂寧確實可以隨心所欲地用排名靠后的人取代他們。因此中央黨當時實際上已不再認為國會應通過選舉產生，轉而認為應采用任命的方式。布呂寧宣布全面改革黨的組織結構，同時進一步靠攏納粹政權，他說服該黨的議員投票贊成政府于1933年5月17日提出的外交政策，并親自協助希特勒起草了向立法機構遞交該提案時所發表的措辭格外溫和的演說。布呂寧的妥協意愿并沒有使政治警察停止竊聽他的電話、私拆他的信件，這是他在6月中旬告訴英國大使霍勒斯·朗博爾德爵士（Sir Horace Rumbold）的。據朗博爾德說，布呂寧當時認為只有復辟君主制才能挽救危局，實際上他多年來一直持此觀點。

這位前總理似乎并不知道該黨的黨員正在面臨怎樣程度的鎮壓。黨報正在遭到取締或者沒收；黨的地方級和地區級機構正在一個接一個被關閉；黨在各州的部長已經全部被免職；盡管赫爾曼·戈林一再做出保證，但中央黨的公務員依然面臨被解聘的威脅。該黨20萬黨員中退黨的人數越來越多。從5月開始，天主教的政界領袖、律師、在俗機構的活動家、記者和作家也遭到逮捕，特別是其中那些曾經發表文章批評納粹黨或政府的人。1933年6月26日，擔任巴伐利亞州警察總監的希姆萊下令，應該予以“保護性羈押”的，不僅包括國會和州議會中的全體巴伐利亞人民黨（中央黨的親密盟友）議員，還包括一切“曾經特別積極地參與政黨政治的人”。[[137]](#137_4)6月19日，符騰堡州政府的部長會議主席、中央黨的保守派領導人之一歐根·博爾茨遭到逮捕和痛毆；高級公務員被停職，比如海倫妮·韋伯（Helene Weber），她同時還是中央黨的國會議員；天主教的工會組織被迫自動解散。這些僅僅是新一輪逮捕、毆打和解聘事件中最著名、曝光率最高的事例。各地的天主教在俗機構一個接一個面臨關閉或者加入納粹黨的壓力，這引起了教會主教團的普遍關注。巴本和戈培爾越來越強烈地公開要求中央黨解散，與此同時，6月底巴本親自參加在羅馬進行的談判，談判達成協議：政教協定一經簽署，中央黨應立即解散。[[138]](#138_4)

經巴本和卡斯同意，政教協定的最終文本于7月1日商定，并在一周后簽字，內容包括禁止牧師從事政治活動。國會和州議會里的中央黨議員開始放棄自己的議席或者轉讓給納粹黨，正如柏林和法蘭克福等城市的市議員所做的那樣。此時就連布呂寧也終于讀懂了墻上的字跡[‡](#_253)。中央黨于7月5日正式自行解散，同時指示國會、州議會和市議會里的中央黨議員去與他們的納粹黨同事接洽，以便轉投、效忠納粹黨。中央黨領導層宣稱，黨員此時有了機會，可以“毫無保留地”加入由希特勒領導的民族陣線。據尚存的中央黨報刊描述，這個結局并非迫于外部壓力，而是在國家政體的歷史性轉型過程中把天主教教區置于新德國的后盾地位這個內部發展的必然結果。中央黨的管理層不僅指示各級黨組織全部自行解散，而且提醒說，它正在與政治警察合作執行解散程序。并不出人意料的是，納粹黨更愿意說服中央黨議員放棄議席，而不肯讓他們如愿加入納粹黨議員的陣容。[[139]](#139_4)

中央黨僅在1930年代初與勞工運動聯手對納粹黨的選舉做過一次有效抵抗。這兩股政治勢力的凝聚力和紀律性，是它們在俾斯麥治下所受迫害（以及其他因素）的產物。但當社會民主黨以及后來共產黨所經歷的鎮壓使它們進入永久的在野和孤立狀態時，天主教對此的反應卻是把重新融入民族共同體設定為幾乎高于一切的目標。主要的天主教政客，比如巴本以及居于次席的布呂寧和博爾茨，缺乏魏瑪共和國初期威廉·馬克思和馬蒂亞斯·埃茨貝爾格那類人特有的對民主制度的使命感。面對布爾什維克的威脅，歐洲各國的教會正在全面轉向反對議會民主制度。在這種形勢下，幾乎每位天主教政治領袖都覺得，解散中央黨只是一個小小的犧牲，它可以換取新政權做出有約束力的承諾，讓天主教會繼續享有自治權，讓天主教徒全面參與德國新秩序的建立。這些承諾到底具有怎樣的約束力，天主教人士不久就會知曉。

在此期間，1933年10月28日，克萊門斯·奧古斯特·馮·加倫伯爵被祝圣為天主教的明斯特主教（Bishop of Münster），這是簽署政教協定之后舉行的首次授圣職典禮。加倫在對會眾致辭時表示，他認為自己的職責是說出真相，宣講“正義與非正義、善行與惡行之間的區別”。就職之前，他拜訪了普魯士部長會議主席赫爾曼·戈林，并遵照政教協定的條款，向戈林宣誓效忠政府。作為回禮，在明斯特的祝圣典禮上，當地納粹黨和褐衫軍支部書記以下的干部魚貫從他面前走過，伸出手臂向他致以“德意志式敬禮”。佩戴卐字徽章的沖鋒隊和黨衛隊縱隊排列在道路兩邊，迎接主教一行，并于當晚舉行火炬游行，從加倫的府邸前走過。納粹運動與天主教運動的和解似乎至少暫時地完成了。[[140]](#140_4)

### 四

瓦解共產黨、社會民主黨和中央黨，是納粹黨建立一黨專政過程中最困難的部分，因為三黨所代表的選民加在一起，遠超納粹黨在自由選舉中所贏得的選民數。與三黨所造成的困難相比，除掉其他政黨則比較容易，它們多數已失去曾經擁有的幾乎每張選票和每個議席，逐一剪除它們的時機已經成熟。其中國家黨（前身為民主黨）是唯一一個曾進入魏瑪聯合政府、從一開始就支持共和國的政黨。1933年初，它在國會中的議席減至2席。面對變局，國家黨束手無策，可憐地懇求其他政黨庇護它的議員。國家黨繼續高調反對納粹黨，但同時也主張明顯朝著獨裁方向修改憲法。它在1933年3月的選舉中未能提高支持率，但通過將其候選人列入支持率比它高得多的社會民主黨的候選人名單，國家黨的議席從2席增加到了5席。雖然持強烈的保留態度，但是包括后來成為聯邦德國總統的特奧多爾·豪斯（Theodor Heuss）在內的國家黨議員們，在1933年3月23日投票時一致同意通過《授權法》，因為他們都被希特勒發出的“假如法案被否決就大開殺戒”的威脅嚇壞了。他們自己肯定知道，他們的投票實際上無足輕重。國家黨在議會中的領袖奧托·努施克（Otto Nuschke）開始用“祝福德意志自由”簽署公函，并敦促承認政府的合法性。國家黨的一個主要組成是公務員，他們為保住工作而全體脫離國家黨，加入了納粹黨。自從該黨在1930年的選舉中被排擠到邊緣，就一再出現關于國家黨是否值得繼續存在的討論。褐衫軍對所剩無幾的公開效忠國家黨的國會議員、官員和市議員發動了新一輪的恐怖戰。隨后，政府剝奪了國家黨議員在國會中的席位，理由是他們在3月的選舉中被列入了社會民主黨的候選人名單，因此屬于社會民主黨人。在這之后，黨的領導層終于屈服，于1933年6月28日宣布國家黨正式解散。[[141]](#141_4)

在魏瑪共和國的多數時間里領導著人民黨的古斯塔夫·施特雷澤曼于1929年去世之后，人民黨急遽右轉，于1931年開始擺脫它的自由派——“自由派”此時被定義為布呂寧政府的支持者，這是衡量當時政治派別右轉幅度有多大的又一個尺度——并號召包括納粹黨在內的所有民族主義力量建立一個廣泛的聯合政府。然而，人民黨失去的選票越多，它就越深地陷入了派系紛爭的分裂亂局。1932年7月之后，人民黨在國會中僅剩7席，被遠遠排擠到政治邊緣。當時的黨魁、律師愛德華·丁格爾代（Eduard Dingeldey）認為，明智的做法是與民族黨聯手，在1932年11月提交一份共同的候選人名單。此舉使余下的自由派脫離了人民黨，卻沒有為該黨帶來真正的收益。這顯示出人民黨有進一步解體的可能，對此跡象感到擔心的丁格爾代在下一次選舉時放棄了與民族黨的協議，結果人民黨在1933年3月僅贏得2個席位。這是德國民族自由黨引以為豪的傳統中僅存的碩果，該黨曾在1870年代主導帝國國會，憑借一系列自由派色彩的立法，極大地緩和了俾斯麥帝國的嚴酷形象。在丁格爾代因重病而暫別政壇的兩個月里，留在人民黨中的黨員，尤其是那些害怕丟掉工作的公務員，開始大批退黨，其他黨員則在代理黨魁的領導下，主張人民黨自動解散，正式與納粹黨合并。丁格爾代成功阻止此事后，黨內右翼遂辭職而去。他求見希特勒或戈林，結果均被斷然拒絕。由于擔心黨內尚存的干部和議員在恐嚇的大環境中遭遇不測，丁格爾代于7月4日宣布解散人民黨。作為回報，他在三天后得到希特勒的接見，納粹元首向他保證，人民黨的前黨員絕不會因從前的政治背景而受到歧視。不用說，這并不妨礙納粹黨逼迫全國各級議會中的原人民黨議員辭職，也不妨礙它以反對國家社會主義運動為由解雇原人民黨公務員。丁格爾代對這些行為提出的抗議被輕蔑地置之不理。[[142]](#142_4)

在選舉方面，阿爾弗雷德·胡根貝格領導下的民族黨并不比這兩個自由派政黨更成功。它的選票在1930年代初幾乎全部流向了納粹黨。但它自以為是納粹黨的主要合作伙伴，對待納粹黨總有些屈尊俯就之態。希特勒內閣標志著議會制度的終結和專制制度的開始，民族黨領導層對此欣然接受。胡根貝格在1933年3月5日的選舉中不遺余力地造勢拉票，旨在為民族黨與納粹黨贏得絕對多數選票，以便為這種轉型的正當性提供民意基礎。然而，民族黨領導層尷尬地意識到，這種轉型使他們落入岌岌可危之境。他們告誡納粹黨不要搞“社會主義”，呼吁組建一個“無黨派的”政府。當然，納粹黨在選戰期間小心地維持著誠心與民族黨聯合的假象。民族黨的報紙無一被取締，民族黨的集會無一受到沖擊，民族黨的政客無一被捕。但大規模的鎮壓和選戰中的暴力完全是為納粹黨贏得選票而實施的。3月5日，納粹黨得到了回報，它在國會中的議席從196席增至288席。與之相比，民族黨的境況并無顯著改善，從51席增至52席，這些席位及其所代表的8%選票，足以使兩黨聯盟的得票率超過50%。但選舉的結果清晰地顯示了聯盟的兩個伙伴是多么不平等。在街頭，民族黨的準軍事組織“斗爭同盟”根本無法與實力強大的褐衫軍和黨衛隊競爭。而且民族黨未能贏得政治立場似乎與它一致的大型準軍事組織“鋼盔”的無條件忠誠。

3月的選舉結果從根本上改變了兩黨的關系。此時共產黨已被逐出立法機構，納粹黨不再需要民族黨以取得絕對多數，盡管它尚未掌控修改憲法所需的三分之二票數。希特勒和戈林冷酷地攤牌了，讓胡根貝格明白他們才是發號施令的人。《授權法》顯然參考了俾斯麥帝國的法統，因而獲得民族黨中致力于恢復舊法統的保守派黨員的認同，所以國會在波茨坦正式開會之前，他們就支持民族黨推動《授權法》的通過。然而《授權法》剛一通過，希特勒就迫不及待地宣布，他認為君主制已經失敗，根本不可能予以恢復。此時，納粹黨終于開始向民族黨施加其他政黨從2月中旬以來所經受的那種壓力。3月29日，民族黨在國會中的領袖恩斯特·奧伯福倫（Ernst Oberfohren）的辦公室遭到搜查，次日住宅被抄檢。納粹黨透露說，搜出的文件顯示奧伯福倫是那些攻擊胡根貝格的匿名信的作者。這足以說服民族黨黨魁胡根貝格放棄抗議的打算。奧伯福倫還一直以懷疑的態度密切關注國會被焚的細節，表明他贊同共產黨的觀點，認為縱火案是由納粹黨策劃的。住宅被搜查引起了奧伯福倫的警覺，他立即辭去議員之職。同時，民族黨的其他高層人士也開始面臨壓力。帝國就業局局長金特·格雷克（Gunther Gerecke）被控貪污。帝國土地聯盟（Reich Land League）向來與民族黨關系密切，該組織的領導人被解職，理由是非法投機玉米市場。關于公開承認自己是民族黨黨員的公務員遭到解職的報道也紛至沓來。[[143]](#143_4)

民族黨在1月30日進入聯合政府，自視為納粹黨的老搭檔，以為納粹是個不成熟、沒經驗的政黨，可以輕易控制。兩個月后，這一切完全改變了。民族黨人在私下里表示，擔心全面爆發的納粹革命將帶來毀滅性后果，同時無助地承認，雖然民族黨在形式上仍是聯合政府中的成員，卻沒有能力阻止政府對該黨黨員采取非法行動。在這種情況下，去適應民主時期之后的新秩序，對他們來說似乎是明智之選。胡根貝格設法改組了黨的機構，把“領袖原則”作為各級黨組織的基本原則。隨后，民族黨的正式名稱由德意志民族人民黨改為德意志民族陣線（German-Nationalist Front），以此表示他們認為政黨已成為歷史。然而這些改變只是使胡根貝格喪失了最后殘存的民主合法性，使他的處境甚至比以前還要孤立無援。柏林和全國各地的納粹黨紛紛公開批評那些被胡根貝格視為受他保護的機構和組織，對它們施加壓力，同時散布流言說胡根貝格拖了“民族革命”的后腿。

納粹黨的各支部機關開始宣稱，時任普魯士州農業部長的胡根貝格已不再擁有農民的信任。有謠言說，他打算辭去在普魯士州擔任的各種職務。對于這些詆毀，胡根貝格的反應是以退出內閣相威脅，他認為這樣做將導致《授權法》失效，因為該法僅適用于它所稱的“現任政府”。然而，一位有影響力的納粹支持者、憲法理論家卡爾·施米特（Carl Schmitt）已經指出，《授權法》中的“現任政府”并非特指該法獲得通過時在職的部長群體，而是指政黨政治制度終結之后形成的“完全不同類型的政府”。因此，任何一位部長的辭職，將不會影響“現任政府”的性質以及《授權法》的有效性；“現任政府”的性質，應取決于其首腦。[[144]](#144_4)胡根貝格的威脅落空了，這又一次證明了在納粹的壓力面前運用法律說理是徒勞的。同時，納粹越來越直截了當地對胡根貝格的支持者進行暴力威脅。5月7日，已被納粹黨逼迫離職的恩斯特·奧伯福倫死于非命。據官方說，他是開槍自殺的，但在納粹的冷血恐嚇四處彌漫之際，許多人當然不相信這種說法。不斷有消息說，各地的民族黨干部遭到逮捕，民族黨的一些集會被取締。民族黨受到越來越大的壓力，要求解散它的準軍事“戰斗團體”。這些團體多數是學生和青年組織，在“民族起義”之后，當時其力量已增至10萬人，已強大到足以成為納粹黨的心頭之患。

1933年5月30日，一些民族黨領導人與希特勒會見，抱怨說讓他們交出自治權的壓力越來越大。回應他們的是一陣“歇斯底里的暴怒”，納粹黨魁大叫道，如果民族黨的準軍事組織不自動解散，他就讓“沖鋒隊開火，接連喋血三日……直到對方片甲不留”。這足以動搖民族黨業已衰弱的抵抗決心。因此在6月中旬，希特勒親自下令解散民族黨的學生組織和青年組織，沒收它們的資產。與這些組織有關的民族黨領導人遭到逮捕和審訊，其中包括普魯士州政府的州務秘書赫伯特·馮·俾斯麥（Herbert von Bismarck）。據稱有證據顯示這些組織遭到了所謂馬克思主義分子的滲透，對此，俾斯麥供稱他不知道事情已經壞到了什么地步。

此時，民族黨領導人，比如極右翼天主教歷史學家馬丁·施潘（Martin Spahn），宣稱他們無法服務于兩個領袖，然后紛紛轉投納粹黨。民族黨“領袖”胡根貝格在內閣中所受的羞辱日益明顯。在一次國際經濟會議上，他事先未與內閣協商就公開要求收回德國的非洲殖民地，導致政府也公開反對他的觀點，讓他在全世界面前難堪。6月23日，他在內閣中的非納粹黨保守派同僚巴本、諾伊拉特、什未林·馮·克羅西克和沙赫特與希特勒一起，共同譴責他的做法。6月26日，胡根貝格原計劃在民族黨政治集會上發表的演說被警方取締。同日，胡根貝格虛張聲勢地向興登堡遞交了辭呈，痛訴自己經常受到阻撓而無法履行部長職責，還經常遭到納粹媒體的公開抨擊。

胡根貝格當然不是真的想退出政府，但耄耋之年的總統根本沒有遂他所愿。興登堡沒有按照常理駁回辭呈、與希特勒進行交涉，而是什么都沒做。胡根貝格與希特勒會面，試圖心平氣和地化解僵局，希特勒卻強勢地提出，要想讓他駁回胡根貝格的辭呈，就必須解散德意志民族陣線，否則，“數千名”民族黨公務員和政府雇員將被解職。然而這個選項是虛假的，因為希特勒從未打算允許胡根貝格——內閣中最后一位持有獨立政見的、享有聲望的成員——收回辭呈。希特勒得意地向內閣報告了胡根貝格離職的消息之后，德意志民族陣線的其他領導人與希特勒會面，締結了一個“友好協定”，同意民族黨“自行解散”。[[145]](#145_4)民族黨作為希特勒在聯合政府中形式上的盟友，其所同意的條件表面上不像其他政黨所接受的那么苛刻；但在實際操作中，納粹黨強迫每一位立場與它相左的國會議員或者州議員和市議員辭職，例如赫伯特·馮·俾斯麥，而只接受那些該黨認定將會不加質疑地服從命令的人。“協定”保證民族黨公務員將不會因他們的黨派政治背景而受迫害，但希特勒政府并未視之為具有約束力的條款。“友好協定”無異于低聲下氣的投降。

各政黨已被解散，教會已被馴服，工會已被取締，軍隊保持中立，此時還有一個需要解決的主要政治玩家：“鋼盔”，由退伍兵組成的極端民族主義準軍事團體。經過曠日持久的談判，“鋼盔”的領導人弗朗茨·澤爾特于1933年4月26日加入納粹黨，“鋼盔”奉希特勒為政治領袖；希特勒則保證“鋼盔”可以作為戰爭退伍兵的自治組織繼續存在。那些反對這一行動的人，比如“鋼盔”的聯席領導人特奧多爾·杜斯特伯格，則立即遭到開除。“鋼盔”的人員迅速擴充至大約100萬之多，其中包括來自帝國國旗團等新近被取締的各種組織中的戰爭退伍兵，從而進一步沖淡了“鋼盔”的政治使命感，招來了納粹黨的批評。作為輔警，“鋼盔”在此前的幾個月里支持了納粹沖鋒隊的行動，但它既未全力投入，也未試圖對沖鋒隊加以約束。“鋼盔”有著與軍隊頗為相似的地位，它實際上自視為一支經驗豐富、訓練有素的武裝預備役部隊。其領導人弗朗茨·澤爾特是內閣成員，事實證明他完全沒有能力抵擋希特勒和戈林的脅迫。到5月份，“鋼盔”已徹底中立化，不再作為一支政治力量而發揮作用。[[146]](#146_4)

于是希特勒在5月底采取了下一個步驟，有幾分屬實地指控“鋼盔”里有大量滲透進來的前共產黨員和社會民主黨人，這些人是在為他們已被取締的準軍事團體尋找替代品。“鋼盔”被迫并入沖鋒隊，但同時保留了些許往日的自治權，這足以打消他們的抗拒心理。對于多數“鋼盔”成員來說，其領導人弗朗茨·澤爾特在內閣中占有一席之地，似乎保證了他們在重要事務上依然具有影響力。“鋼盔”依然發揮著預備役部隊和退伍兵福利協會的功能。直至1935年，已更名為國家社會主義德意志前線戰士同盟（National Socialist German Front-Fighters' League）的“鋼盔”仍擁有50萬成員。“鋼盔”摧毀魏瑪民主制度、恢復民族主義專制體制的目標顯然已經實現，它還能有什么理由拒絕并入恩斯特·羅姆的褐衫軍呢？這次合并一度造成了組織混亂，但它有效地剝奪了民族黨調動人員在街頭反抗橫沖直撞的沖鋒隊員的最后一絲機會。[[147]](#147_4)

準軍事團體就這樣像各政黨一樣被有效取締了。到1933年夏，一黨專政的建立已基本完成。實現絕對權力的潛在障礙只剩興登堡這個無關緊要的老糊涂了，他的獨立意志似乎已蕩然無存，《授權法》的條款已經使他有職無權。軍隊已同意袖手旁觀。企業界也已就范。1933年6月28日，約瑟夫·戈培爾已經在慶祝納粹黨消滅了政黨、工會和準軍事組織，代之以納粹黨及其附屬組織的權力壟斷：“通往專政之路。我們的革命具有一種不可思議的活力。”[[148]](#148_4)

[\*](#_248) 約2米高。——編注

[†](#_249) 牧函（pastoral letter），主教寫給其教區內神職人員或教徒的公開信。

[‡](#_250) 墻上的字跡（writing on the wall），語出《圣經·但以理書》5:5，指災禍將臨的兇兆。

## 第四節 德國的一體化進程

### 一

1933年5月6日上午，在柏林市時髦的蒂爾加滕區，一隊貨車停在了馬格努斯·希施費爾德博士的性科學研究所門外。柏林體育學校（Berlin School for Physical Education）的學生從車上跳了下來，他們是國家社會主義德意志學生同盟成員。他們列成軍事編隊，然后，其中幾人拿出大號和小號開始演奏愛國樂曲，其余的人列隊進入大樓。他們顯然來意不善。希施費爾德的研究所在柏林很有名，不僅由于它為同性戀和墮胎的合法化等事業而斗爭，開辦了受歡迎的性教育晚間課程，也由于它全面收集了性學領域的圖書和手稿，這些藏書是所長希施費爾德自19世紀末以來逐漸積累起來的。到1933年，研究所的藏書在1.2萬至2萬冊之間（各種估算互有出入），還收藏有數量更多的性學圖片。[[149]](#149_4)1933年5月6日闖入研究所的納粹學生接下來所做的事情是：把紅墨水潑到書籍和手稿上；把鑲著鏡框的照片當球踢，留下一地碎玻璃；搜查壁櫥和抽屜，把里面的東西扔到地上。4天后，來了更多貨車。這一次，沖鋒隊員把書籍和手稿摞滿一只只筐子，運到歌劇院廣場（Opera Square），堆成巨大的一堆，點火焚燒。2萬冊被焚的圖書中據說約有一半來自希施費爾德的圖書館。火堆燒至黃昏時，學生們把研究所所長的半身雕像抬到廣場，扔進火中。聽聞65歲的希施費爾德正在國外養病，沖鋒隊員們說道：“但愿他不等我們動手就咽氣，那就不勞我們絞死他或者揍死他了。”[[150]](#150_4)

希施費爾德明智地沒有返回德國。就在納粹報紙以勝利的口吻報道“打倒一家毒藥店的有力行動”，宣布“德國學生對猶太人馬格努斯·希施費爾德經營的性科學研究所進行了煙熏消毒”的時候，這位令人尊敬的性改革者和同性戀權利捍衛者留在了法國，于1935年5月14日67歲生日那天在法國猝逝。[[151]](#151_4)其研究所的毀滅，僅僅是納粹黨在全國范圍對猶太人所實施的攻擊行動的一部分，盡管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部分。據納粹黨人描述，他們這樣做是在抗擊猶太運動對德國家庭的顛覆。性交與繁衍緊密相關，至少對于獲得準許的種族繁衍而言如此。納粹黨認為，活躍于魏瑪時期、相互錯綜關聯的爭取性自由、改革墮胎法、同性戀合法化、公開提供避孕指導等各種壓力團體造成了德國出生率的不斷下降，于是在保守派和天主教會的支持下，采取行動搗毀了這些團體的所有分支機構。性法律改革者被迫流亡，比如弗洛伊德派心理學家威廉·賴希（Wilhelm Reich）和倡導改革墮胎法的海倫妮·斯托克爾，他們的機構和診所都被納粹黨關閉或者接管。同時，警察突襲了他們從前默許的知名同性戀集會場所，并在漢堡逮捕了數百名港口區的妓女，頗為怪異的是，其執法依據的是國會縱火法令“保護人民和國家”。這些突襲行動即使不說明其他問題，至少顯示了國會縱火法令幾乎可以用來為政府采取的任何種類的鎮壓行動提供法律依據。上述行動令人質疑的合法性問題在1933年5月26日得到了解決，那天內閣修改了1927年通過的、開明的《性傳播疾病防治法》（Law against 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s）。修正案不僅將1927年正式合法化的賣淫行為重新入罪，而且重新在法律上禁止從事與墮胎和墮胎藥有關的宣傳和教育。[[152]](#152_4)納粹黨在短時間內全面瓦解了性法律改革運動，并且把對于性行為的法律限制從既有的懲罰同性戀關系的法律，擴展到懲罰不以提高生育率為直接目標的許多其他種類的性活動。

對性解放的攻擊在魏瑪共和國的最后幾年里已有征兆。1929—1932年發生了關于墮胎法改革的大規模公開論戰，論戰由共產黨發起，反映了許多夫婦在赤貧和失業的處境中有避免生孩子的需要。聲勢浩大的示威、集會、請愿、電影、報紙宣傳戰以及類似的活動都把人們的注意力吸引到了非法墮胎和對避孕的無知等問題上，警方取締了性法律改革者舉辦的許多集會。1933年3月1日頒布的一項關于健康保險的新法令，為關閉全國各地由政府資助的健康咨詢診所提供了法律依據，在隨后的數星期里，一伙伙褐衫軍執行了關閉任務。醫護人員被趕到大街上，其中許多人，尤其是猶太人，被迫流亡。納粹黨人認為，由魏瑪政府創立的整個社會醫療體系旨在一面阻撓強者繁殖，一面扶助弱者的家庭。他們主張放棄社會衛生觀，代之以種族衛生觀。[[153]](#153_4)這與某些優生學家自19世紀末以降的主張一樣：執行防止弱者生子的計劃，從而大幅度減少他們給社會帶來的負擔。

大蕭條期間，這些觀點迅速在醫生、社會工作者和福利管理人員中間獲得了更加廣泛的認同。在魏瑪共和國遠未結束的時候，專家們就已抓住金融危機提供的機會，提出減輕福利制度加諸經濟的難以承受的負擔，最好的辦法是強制貧困階層接受絕育手術，以此防止他們繁殖。這樣的話，用不了幾年，需要資助的赤貧家庭就會減少；不久，德國境內的酒鬼、“懶漢”、智障者、有犯罪傾向者和身體殘疾者也將大幅度減少（當然，這是基于并不可信的假設，即上述生存狀況本質上都全部由遺傳決定），然后福利機構就能夠把越來越少的資源直接用于值得幫助的窮人。新教的慈善機構受宿命論和原罪說的影響，普遍贊同這些觀點；而天主教的慈善機構受教宗于1930年發布的一份通諭的激勵，強烈反對這些觀點，教宗在通諭中嚴厲地訓示道，婚姻和性交的唯一目的是繁衍，所有人都被賦予了不朽的靈魂。由于許多家庭不再有能力照顧生病或殘疾的家人，一家又一家精神病院從1930年開始迅速滿員，與此同時，精神病院的預算被當地或者地區級政府機構大幅削減。這種情況導致優生措施更加受人青睞，甚至對思想開明的改革者也產生了吸引力。1932年，普魯士州衛生委員會（Prussian Health Council）開會討論一部允許自愿優生絕育的新法律。它的起草人是優生學家弗里茨·倫茨，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他就開始考慮這種政策了。該法律把優生絕育的建議權和執行權授予福利官員和醫療人員，他們的話是窮人、臥病在床者和殘障人士難以反駁的。[[154]](#154_4)

這只是范圍廣泛得多的鎮壓行動的冰山一角，鎮壓的是正派人士眼中的各種社會偏常行為。在經濟危機最嚴重的時候，不少于1,000萬人接受了某種形式的社會救濟。由于民主派各政黨已被取締，市議會和州議會已被接管，變成了當地納粹頭目的啦啦隊，報紙已被剝奪自由調查權，不再有能力調查人們所關心的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因此福利機構像警察一樣，不受任何種類的輿論監督和約束。社會工作者和福利管理人員早就傾向于把福利申請人視為吃白食者和懶漢，此時在納粹掌控的各級政府機構新任命的高級官員的鼓勵下，他們可以隨心所欲地表達偏見。1924年通過的法規允許政府發放有附帶條件的福利，即受助人同意“在適當情況下”參加集體勞動項目中的工作。1933年之前，這些法規就已在有限范圍內實行。有3,500人在1930年杜伊斯堡的強制勞動項目中工作；不來梅自1929年起，就已把這種就業形式作為接受福利的條件。但在1930年代初經濟形勢最嚴峻的時候，福利項目僅涵蓋了一小部分失業者，例如1932年在漢堡，20萬失業者中僅有6,000人得到了福利救濟。然而從1933年初的幾個月開始，參加集體勞動的人數迅速增加。這種工作并不是字面意義上的就業，比如，它不代繳醫療保險或者養老保險，實際上甚至沒有薪酬，從事這種勞動的人的全部所得就是救濟金，有時外加一點兒交通補助或者一頓免費午餐。[[155]](#155_4)

這種工作據稱是自愿的，屬于類似教會的各種福利協會等慈善機構各自發起、運營的項目，但在1933年3月之后，自愿的成分很快跡近消失。大規模失業的緊迫問題首先是通過強迫手段處理的。其中一種有代表性的方案是1933年3月的“農場援助”（Farm Aid）計劃，它沿用魏瑪共和國時期已啟動的鄉村經濟幫扶項目，挑選失業的城鎮青年到田間勞動，以換取食宿和象征性的工資。這同樣不是字面確切含義上的就業，然而到1933年8月，這個項目使失業登記的人數減少了14.5萬，其中3.3萬是女性。從1931年開始，負責幫助漢堡無家可歸者的當地行政人員就一直宣稱，這些項目使赤貧者生活不如意，迫使他們到別的地方尋求救濟。這種態度在1933年很快變得更加普遍。在漢堡警局收容所臨時過夜的人次從1930年的40.3萬人降至1933年的29.9萬，多半就是這種威懾政策的結果。官員們于是提出，應該把流浪者和“懶漢”送進集中營。普魯士州內政部于1933年6月1日發布法令，禁止在公共場所乞討。貧困與赤貧在1933年之前就已被視為污點，此時又開始被歸入犯罪。[[156]](#156_4)

擺脫了民主監督的約束之后，警方于1933年5、6月對黑社會組織指環聯盟在柏林的各家俱樂部和會所發動了一系列大規模突襲，這是打擊職業罪犯之戰的一部分。共產黨及其支持者的活動中心也被警方視為犯罪團伙的地盤，對此類場所的打擊只有在紅色陣線戰士同盟被剿滅之后才可能發生，而且也構成了對當地居民的進一步威懾。由于納粹黨認為犯罪，尤其是有組織的犯罪，主要是由猶太人主導的，因此不足為奇的是，警方在1933年6月9日還突襲了柏林“糧倉區”（Scheunenviertel）的50個場所，眾所周知這個區不僅貧困，而且有高比例的猶太人口。不用說，其中的關聯幾乎完全出自納粹黨徒的臆想。[[157]](#157_4)指環聯盟被無情摧毀，其成員未經審判就遭到預防性羈押，其俱樂部和酒吧被關閉。[[158]](#158_4)

這些人中有許多最終將被移送刑罰機構，而迅速增多的小偷小摸問題已經給刑罰體系造成了壓力，導致各州的監獄實行更加嚴厲、更有威懾力的管理措施。在魏瑪共和國末期，刑事管理人員和刑法專家主張對慣犯實施無限期監禁或者防范性拘禁，據說這種人的遺傳性退化導致他們不具備自我提升的能力。防范性拘禁越來越被認為是擺脫慣犯給社會造成的負擔的長久之計。據犯罪學家或監獄長估計，1920年代末，州監獄所有囚犯中的十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都可歸入此類別。防范性拘禁被寫入1925—1929年擬訂的新刑法提案的終稿。該法案盡管在魏瑪時期各政黨沒完沒了的辯論中被擱置，但在刑罰機構和司法體系中得到了普遍的贊同，因此顯然不會被輕易放棄。[[159]](#159_4)不少專家主張，應該強制有遺傳缺陷的人接受絕育手術。[[160]](#160_4)魏瑪福利政府為了應對當時的危機，已開始考慮改用專制的解決方案，即嚴重侵犯公民的人身權，損害其身體的完整。這些方案不久將被第三帝國采用，而且實施時手段之酷烈是魏瑪治下的人絕難想象的。更直接的影響是，政府財政支出的削減，迫使刑罰和福利機構的管理人員以日益嚴苛的標準甄別值得生存者與不值得生存者，因為各種政府機構的條件已相當糟糕，以至于越來越難以使它們所管理的每個人都保持健康和存活。[[161]](#161_4)

### 二

鎮壓行動針對的不僅是政治上的可疑分子、偏常人士和邊緣人，它波及了德國社會的每個階層。推動整個進程向前發展的，是由沖鋒隊、黨衛隊和警方在1933年上半年發動的大規模暴力行動。遭到痛毆、酷刑和經常性羞辱的囚犯，涉及除納粹黨以外的一切社會階層和政治陣營，經過了適當刪改的相關報道不斷出現在報紙上。恐怖行動針對的遠遠不是特定的、普遍不受歡迎的少數人，而是無遠弗屆地波及每一位公開表達異議的人，包括偏常人士、流浪者以及一切不符合傳統規范的人。[[162]](#162_3)到處對國民實施的恐嚇，為1933年2—7月間在德國全境推行的一個進程提供了必要前提，此進程被納粹黨稱為“一體化”（co-ordination），用它的德文“Gleichschaltung”[\*](#_256)來表達更加傳神，這個比喻借用自電學術語，意思是全部開關被置于同一個電路上，也就是說，只需按動中心位置的一個主開關就能啟動全部開關。政治生活、社會生活和社團生活的幾乎每個方面都受到了影響，從國家到鄉村的每個層級無所不包。

納粹黨對聯邦各州的接管，是這個進程的關鍵環節。同樣重要的是公務員的“一體化”，它從1933年2月開始執行，以強大的壓力迫使中央黨臣服。在希特勒被任命后的幾星期里，許多部都任命了新的國務秘書（公務員的最高職位），包括帝國總理府的漢斯—海因里希·拉默斯（Hans-Heinrich Lammers）。在普魯士州，赫爾曼·戈林于2月中旬更換了12位警察局局長，強化了巴本在1932年7月之后實施清洗的效果。從3月開始，沖鋒隊的暴力手段很快迫使政治上不合時宜的市政府官員和市長離職——到5月底，有500位市政府高級公務員和70位市長離職。法律廢止了聯邦各州的自治權，并且為每個州配備了一位由柏林任命的帝國行政長官，其中除一位以外，全部是納粹黨的支部書記。這意味著在4月的第一個星期之后，“一體化”——換句話說就是，在每個層級實現公務員的納粹化——的障礙所剩無幾。在各州政府被趕下臺的同時，各地納粹黨徒在沖鋒隊和黨衛隊的武裝行動隊支持下，占領市政廳，以恐嚇手段逼迫市長和市議員辭職，代之以他們自己提名的人。健康保險機構、就業中心、村委會、醫院、法院等一切國立和公立機構，都遭到同樣的對待，高級職員被迫辭職或者加入納粹黨，如果拒絕，就會遭到毆打、被投入監獄。[[163]](#163_3)

這種大規模清洗的法律依據，來自4月7日頒布的所謂《恢復專業公務員法》（Law for the Restoration of the Professional Civil Service），它是新政權的基本法之一，其名稱所具有的含義，既是在召喚保守派公務員的團體意識，也較為直白地批評了魏瑪政府，尤其是普魯士州政府，把并非專業公務員的、堅定的民主派人士安插進高級公務員崗位的做法。新法令的首要目的，是使各地區的褐衫軍和納粹黨強行解聘公務員和高級職員的行動合法化并聽命于中央。該法規定，辭退1918年11月9日之后任命的未受過專業培訓的高級職員，辭退“非雅利安裔”公務員（于4月11日被界定為，祖父母和外祖父母中有一個或者一個以上為“非雅利安裔”，即猶太裔；6月30日，與非雅利安裔結婚的公務員也被包括在內），并且辭退那些以往所從事的政治活動不能保證其政治可靠性的人。該法的文本稱，政治可靠性指的是行事以民族主義政府的利益為出發點。只有1914—1918年戰爭期間在職的公務員除外。[[164]](#164_3)

赫爾曼·戈林在1933年4月25日解釋該法的正當性時，批評了公務員中那些“見風使舵的人”：

眾所周知，澤韋林的擁護者在他的部門里所占比例高達60%。令他深感厭惡的景象是，法律剛剛頒布沒幾天，卐字徽章就雨后春筍般出現在他們的衣服上，法律頒布4天后，咔嗒一聲并攏腳跟、手臂高舉的敬禮就已在走廊里蔚然成風。[[165]](#165_3)

許多公務員確實為保住工作而急忙成為納粹黨員，加入了改換門庭者的大軍，這群人很快得了個“三月亡魂”（March Fallen）的諢號，此稱謂原指1848年革命期間于3月騷亂中喪生的民主派人士。1933年1月30日至5月1日，有160萬人加入納粹黨，遠超既有的黨員人數，這種倉促的歸附幾乎前所未有地展現了德國民眾受機會主義和急于自保意識驅動的程度。1933年夏，在科布倫茨—特里爾（Koblenz-Trier）和科隆—亞琛（Cologne-Aachen）等天主教地區，多達80%的納粹黨員是前幾個月才剛剛加入的。實際上，希特勒已開始擔心，這種大規模的入黨潮正在改變黨的性質，因為其中有過多的資產階級人士。但至少在短時期內，這意味著絕大多數公務員效忠于新政權。[[166]](#166_2)實際上，因實施《恢復專業公務員法》而被解雇的高級公務員，在普魯士州約占12.5%，在其他州約占4.5%。此外還有條款規定，為了精簡行政機構，可以對公務員予以降職或者強制退休；受此影響的人員比例大致同上。受該法影響的人總共占全部專業公務員的1%至2%。辭退和降職措施不僅從種族和政治上施行了一體化，還產生了減少政府開支的附加效果，這遠非無心偶得的收獲。同時，1933年7月17日，戈林發布一項法令，把任命普魯士州的高級公務員、大學教授和司法官員的權力掌握在自己手中。[[167]](#167_2)

在人數龐大、成分多元的政府雇員群體中，尤為重要的是法官和檢察官，因為存在一個明顯的威脅：納粹的暴力、恐嚇和殺戮將會與法律交鋒。納粹政權視司法制度為政治工具，大量刑事訴訟案的起訴方實際上是那些不認同納粹司法觀的律師，但大多數法官和律師顯然根本不想惹麻煩。1933年在普魯士州，盡管1月30日希特勒被任命為總理時，公職律師中極少有納粹黨員，然而在大約4.5萬名法官、州檢察官和司法官員中，僅有約300人因政治原因被解職或者調往其他崗位；加上以種族理由被解職的猶太律師和法官（無論其政治立場是什么），共計586人。在德國的其他州，司法界的辭退率同樣很小。司法界不曾認真反對過納粹的暴力、恐嚇和殺戮。集體抗議幾乎成為根本不可能發生的事情，因為法官、律師和公證人的行業協會，都被迫與國家社會主義律師同盟（League of National Socialist Lawyers）一起并入德意志法律陣線（Front of German Law），陣線由漢斯·弗蘭克領導，他于4月22日被任命為帝國行政長官，負責“各州司法制度之一體化，以及法律秩序之恢復”。德意志法官同盟（German Judges' League）已打消了疑慮，因為希特勒在3月23日的演講中提到“法官不可罷免”，而且司法部承諾要提高法官的薪酬和地位。不久，律師們爭先恐后地加入納粹黨，因為各州的司法部長已挑明，如果不加入納粹黨，那么他們的升遷和職業前途都將受到損害。[[168]](#168_2)自此至1934年初，主要受迫于各地沖鋒隊的壓力，有2,250宗和420宗分別以沖鋒隊員和黨衛隊成員為被告的訴訟案被擱置或撤銷。[[169]](#169_2)

上述措施屬于1933年春季和夏初在德國各地對社會機構實行的大規模清洗的組成部分。經濟界的各種壓力團體和協會很快歸附納粹黨。盡管農業在名義上歸希特勒的盟友阿爾弗雷德·胡根貝格掌管，但發號施令的卻是納粹黨的農民組織負責人瓦爾特·達雷。早在胡根貝格最終被迫辭去內閣中的職務之前，達雷就迫使各種農業利益團體合并為單一的納粹組織。面對這種強行一體化的做法，許多團體和機構的反應是盡量爭取主動。在企業界，雇主協會和壓力團體——比如德意志企業協會——吸收納粹黨人進入董事會、宣布效忠政府，而且與企業界的其他壓力團體合并組建統一的德意志企業界工團（Reich Corporation of German Industry）。企業家們試圖通過這種主動的轉變，使業界的各種團體避免徹底受制于新政權。納粹黨的干部奧托·瓦格納（Otto Wagener）一度曾強占德意志工業協會（Reich Association of German Industry）的總部，顯然意在關閉它。該協會主動實現一體化之后，威廉·開普勒（Wilhelm Keppler）取代瓦格納，成為希特勒的經濟問題專員。開普勒長期充當納粹黨與大企業之間的掮客，與瓦格納不同的是，他得到了雙方的信任。

企業界為保住地位，又在1933年6月1日采取了另一個步驟，業界精英和重要企業共同設立阿道夫·希特勒德國經濟界捐贈基金（Adolf Hitler Donation of the German Economy），旨在以此建立一種企業家定期按比例向納粹黨捐贈資金的制度，從而終止各地沖鋒隊和納粹黨組織經常性地，有時還使用恐嚇勒索的手段，從企業榨取錢財的做法。在隨后的12個月里，該基金向納粹黨金庫劃入了3,000萬帝國馬克，但它未能實現其首要目標，因為它的設立根本無法阻止納粹黨和沖鋒隊的小頭目繼續從地區級企業勒索小額金錢。然而大企業對此并不十分擔心。希特勒于3月23日特意安撫大企業的代表說，他不會干涉他們的資產和利潤，也不會縱容1920年代初納粹黨在戈特弗里德·費德爾影響下所玩弄的任何一種古怪的貨幣實驗。[[170]](#170_2)工會已被鏟除，社會主義已不足為慮，新的武器和彈藥合同也即將簽署，因此大企業可以滿意地認為，它對新政權所做的讓步已基本上得到了回報。

主動實行一體化是各種協會和機構都擁有的一個選項，假如它們能夠足夠快地共同行動的話。然而，那些以比較安全、不受打擾的狀態存在了幾十年的機構，在變局面前往往彷徨困惑、產生分歧、跟不上形勢。一個典型例子是德意志婦女聯合會（Federation of German Women's Associations），它是由溫和的德國女性主義者組成的傘狀組織，相當于多年來盛行于其他國家的婦女組織全國婦女理事會（National Councils of Women）的德國版。德意志婦女聯合會創建于大約40年前，是一個龐大而精密的組織，由許多種類的婦女協會聯合而成，其中包括各種專業協會，例如女教師協會。聯合會的絕大多數成員為中產階級，在1932年之前，她們可能大多投票給納粹黨，后來因納粹的崛起而產生了嚴重分歧，有些資深成員想要打擊那些她們所見到的在納粹運動中取得巨大成功、“沉醉在勝利之中的男性”，其他成員則主張聯合會保持歷來在政黨政治上的中立立場。就在聯合會成員沒完沒了地討論之際，納粹黨把她們的問題解決了。

1933年4月27日，聯合會在巴登省的分會收到納粹黨婦女組織在該省的領導人格特魯德·朔爾茨—克林克（Gertrud Scholtz-Klink）發來的一封短箋，通知說聯合會被解散了。聯合會總部領導層寫信給帝國內政部長，有些困惑地詢問如此強硬的舉動有什么法律依據，同時向他保證，巴登分會絕不會威脅公共安全。納粹婦女陣線（Nazi Women's Front）的全國領導人莉迪婭·戈特謝弗斯基（Lydia Gottschewski）有些漫不經心地宣稱，解散巴登分會是根據革命的法律，并且附上一份文件讓聯合會主席簽字，請她無條件地將聯合會獻給阿道夫·希特勒，驅逐所有猶太會員，選拔納粹女黨員擔任高層職位，以及在5月16日之前加入納粹婦女陣線。聯合會徒勞地向戈特謝弗斯基指出，它支持“民族革命”，贊同政府提議的優生措施，并且希望在第三帝國中發揮自己的作用。眼見自己麾下的許多協會都已歸附各種納粹機構，經投票表決，聯合會于5月15日正式全部自行解散，因為它的章程使之不可能歸屬其他組織。[[171]](#171_2)

### 三

納粹黨推行的德國社會“一體化”進程并沒有止于政黨、政府機構、地方政府、專業界以及經濟壓力團體。再次以德國的北方小城諾特海姆為例，也許足以清晰地展示一體化進程所波及的范圍有多廣。在諾特海姆，長期主政的是自由派和保守派組成的聯合政府，社會民主運動根基深厚，反對黨是共產黨的一個很小的分支。當地的納粹黨人已設法操縱了3月12日的市議會選舉，用“民族團結候選人名單”（National Unity List）將其他政黨排擠出局。該市的納粹黨領導人恩斯特·吉爾曼（Ernst Girmann）承諾要終結社會民主黨的腐敗、終結議會制度。盡管如此，社會民主黨在地方選舉中仍保持了原有的優勢，納粹黨雖然接管了市議會，卻未能比他們在1932年7月選舉時做得更好。新一屆市議會舉行公共會議時，穿著制服的褐衫軍沿墻站立，黨衛隊協助警察執勤，會議不時被“希特勒萬歲！”的呼喊聲打斷，現場的恐嚇態勢簡直與國會通過《授權法》時的氣氛如出一轍。4位社會民主黨市議員被禁止履行職能，不能坐進任何委員會的代表席，不能發言。當他們離開會場時，沖鋒隊一字排開，朝著從面前走過的4人吐唾沫。其中兩位隨后很快辭職，另兩位于6月份離職。

最后一位社會民主黨議員辭職后，諾特海姆市議會純粹成了吉爾曼的獨角戲，會場沒有任何討論，議員們鴉雀無聲地聽吉爾曼宣布他要采取的措施。此時，根據1933年4月7日頒布的《公務員法》[†](#_257)，大約有45位市政府雇員（多數是社會民主黨人）被從煤氣廠、啤酒廠、游泳館、健康保險局等當地政府機構解聘，其中包括會計和行政人員，他們占市政府雇員的約四分之一。市長是保守派，從1903年開始一直在職，事實證明，把他排擠出局并不容易，因為面對勸他辭職的各種游說和嚴重騷擾，他始終不為所動。最后，趁他休假的時候，已經納粹化了的市議會投票通過了對他的不信任案，宣布由當地的納粹黨領導人恩斯特·吉爾曼接替他擔任市長。

此時，諾特海姆市的共產黨領導人以及許多社會民主黨人已被逮捕，本地人閱讀的主要地區級報紙開始刊登關于達豪集中營，以及離諾特海姆近得多的莫林根（Moringen）集中營的報道，截至4月底，后者關押了300多名囚犯，其中主要是共產黨人，此外還有許多來自其他政治團體的人士。看守集中營的黨衛隊中，至少有20多位是諾特海姆附近的當地人，許多囚犯在集中營內短期關押后即被釋放，因此當地人肯定熟知里面的情形。該市的報紙從前擁護自由派，此時經常報道公民因傳播謠言、詆毀國家社會主義等微不足道的罪名而遭到逮捕和監禁的消息。人們知道，提出的反對意見越嚴肅，招致的鎮壓就會越嚴厲。政府的反對者還會遭到其他方式的對待：活躍的社會民主黨人被解雇、抄家，或者因拒絕行納粹式敬禮而遭到毆打；有人向房東施加壓力，要求把他們趕出家門。在褐衫軍的指使下，當地社會民主黨領袖開的商店遭遇抵制，經常性的瑣屑滋擾自此成了他的厄運；當地勞工運動的其他前重要人物盡管戒除了全部政治活動，也未能逃脫這樣的厄運。

以上就是在諾特海姆小城，以及在其他數千座小鎮、村莊和城市發生的“一體化”進程背后所隱含的（有時是直截了當的）威脅。此進程開始于1933年3月，在4、5月間迅速加快步伐。與幾乎所有的小城鎮一樣，諾特海姆也擁有豐富的社團生活，其中許多社團與政治無甚關聯，有些則與政治有關。當地納粹黨使用各種手段將一切社團置于它的控制之下。俱樂部和協會有些被關閉或合并，其他則被納粹黨接管。諾特海姆是全國鐵路網的一個重要樞紐，甚至在希特勒成為總理之前，當地鐵路站場高管層中的納粹黨人就已經施加壓力，要求那里的鐵路工人加入國家社會主義工廠車間組織。然而納粹黨在對付其他工人時卻進展不大，直至褐衫軍于5月4日接管了工會的各個辦事處、全面取締工會。此時，吉爾曼堅決要求，各俱樂部和協會的執行委員會的多數成員必須由納粹黨員或“鋼盔”成員組成。各專業協會被合并入新成立的國家社會主義醫師聯盟（National Socialist Physicians' League）、國家社會主義教師聯盟（National Socialist Teachers' League）以及類似團體，相關人士都知道，如果他們想保住工作就必須加入。會員眾多、資金充足的當地消費者協會被置于納粹黨的控制之下，盡管納粹黨先前抨擊它是破壞獨立的本地企業的“赤色”機構，但它對當地經濟過于重要，因此不能關閉。戰爭傷殘人士俱樂部被合并入國家社會主義戰爭受害者協會（National Socialist War Victims' Association），童子軍和青年德意志騎士團被合并入希特勒青年團。

在不可抗拒的納粹化進程所形成的壓力面前，諾特海姆的志愿團體做出了各式各樣的反應。歌唱俱樂部多數自行解散，盡管工人合唱團設法先行調整，切斷了與德意志工人歌唱同盟（German Workers' Singing League）的聯系。上層人士的歌唱俱樂部“五線譜沙龍”（Song Stave）得以保留，因為它更換了執行委員會，并且在改變會員資格之前咨詢了當地的納粹黨。在德國的許多地方，射擊是生活中的一項重要內容。諾特海姆市的各個射擊協會推選吉爾曼為總會長。吉爾曼告誡這些協會，一定要推廣尚武精神，而不能像從前那樣僅以娛樂為目的。于是各射擊協會開始懸掛卐字旗，唱《霍斯特·韋塞爾之歌》，向公眾開放一些射擊比賽以反駁吉爾曼對他們社會排斥性的指責，并且憑借這些做法得以繼續生存。當地的體育俱樂部，從游泳協會到足球俱樂部和體操協會，在一片指責聲中被迫全部加入納粹黨領導下的諾特海姆體育俱樂部（Northeim Sports Club）。當地的某些社團領袖搶占先機，采取行動預防納粹黨沒收他們的資金。“美化俱樂部”（Beautification Club）是個資金充裕的協會，致力于改善諾特海姆市的公園和森林，在自行解散之前，它投入全部資金在該市近郊建造了一座狩獵小屋。此外，當地的幾個同業公會接到通知，必須在5月2日之前重新選出各自的理事會，于是它們安排了大型酒會和豪華宴會，為的是花光資金，因為它們確信這些資金很快就會落入納粹黨手中。[[172]](#172_2)

“一體化”進程在1933年春夏發生于德國全境的每個層級——每座城市、鄉鎮和村莊。僅存的社交生活發生于小客棧或者私宅里。除非在各種納粹組織里相聚，人們變得彼此隔絕。社會先是被簡化成一群不知姓名、無法區分的大眾，然后被重構為一個新的組織，在這個組織里，任何事情都是以納粹主義的名義進行的。公開的異議和抵制都成了不可能之事，甚至討論和計劃發表異議也不再可行，除非暗中進行。當然，一體化實際上仍是目標而不是現實。該進程的執行并不完美，在形式上遵從新秩序，例如在俱樂部、協會或者專業組織的名稱中加上“國家社會主義”，絕不意味著其成員真正承諾信仰這種主義。盡管如此，德國社會一體化進程的深度和廣度依然是驚人的。而且其目標并不是僅僅消除反對黨的發展空間；新政權讓整個德國歸附納粹黨，是為了便于按照國家社會主義的原則進行思想灌輸和再教育。

幾年后反思這個進程時，律師雷蒙德·普雷策爾自問，曾經在1933年3月5日投票反對納粹黨的那56%德國人是怎么了。他想知道，這個多數派怎會如此迅速地屈服？為什么德國幾乎每個社會團體、政治組織和經濟機構，都如此輕易地落入納粹黨手中？他的結論是，“最簡單的原因是恐懼，如果你深入觀察，就會發現導致人們屈服的最根本原因，幾乎總是恐懼。與暴徒同流合污是為了免于挨揍。還有一個不那么明顯的原因，就是沉醉在萬眾一心氛圍中的亢奮感，即從眾心理”。他還認為，許多人覺得他們的政治領袖，從布勞恩和澤韋林到胡根貝格和興登堡，因軟弱而背叛了他們，所以他們加入納粹黨屬于一種任性的報復行為。令有些人印象深刻的是，納粹黨所預言的一切，似乎都將實現。“還有些人（尤其是知識分子）相信，他們加入納粹黨，可以改變納粹黨的面貌，甚至可以立即扭轉它前進的方向。不過，許多人緊跟潮流，當然是為了加入他們所認為的勝利者一方。”在大蕭條的環境中，時世艱難，工作難尋，人們依賴著每日上班下班的刻板生活，把它當作唯一的安全模式：不跟著納粹黨走，就意味著拿自己的生計和前途冒險；進行反抗，則意味著拿自己的生命冒險。[[173]](#173_1)

[\*](#_254) 意思是“同步”。

[†](#_255) 即《恢復專業公務員法》。

# 第六章 希特勒的文化革命

## 第一節 不和諧音符

### 一

1933年3月7日，國會選舉的兩天之后，一伙60人的褐衫軍闖入德累斯頓州森珀歌劇院（Dresden State Opera），著名指揮家弗里茨·布施（Fritz Busch）正在那里排練威爾第（Verdi）的歌劇《弄臣》（Rigoletto）。他們大喊大叫、對指揮家起哄、騷擾排練，逼得布施停止了排練。沖鋒隊頭目走上舞臺，宣布解雇布施。沖鋒隊曾買下其音樂會的幾乎全場票，而當他登上指揮臺時，他們鬧哄哄地大喊“打倒布施！”他們制造的噪音過于強烈，布施被迫退場。這些意外事件促使新近納粹化了的薩克森州政府決定解聘布施。他在樂壇聲望極高，但德累斯頓的行政人員卻覺得他是個討厭鬼。布施既不是猶太人，也不特別支持現代派、無調性音樂以及20世紀初音樂中被納粹黨所厭惡的其他事物，而且他并不是社會民主黨人，實際上他的政治立場屬于右翼。布施之所以不受薩克森州納粹黨人的青睞，是因為作為大蕭條期間的經濟措施之一，他們曾計劃削減該州的文化預算，但遭到布施的極力反對。納粹黨在德累斯頓掌權之后，指責他聘用了過多猶太歌唱家、花費了過多時間在德累斯頓以外的地方、索取了過多的薪酬。[[1]](#1_6)布施出走阿根廷，一去不返，1936年成為阿根廷公民。[[2]](#2_6)

布施的音樂會和排練受到騷擾，為各地的政府官員禁演音樂會和歌劇提供了借口，理由是它們有可能引起公共秩序的混亂。當然，混亂是由納粹黨自己挑起的，它清晰地展示了自下而上的路徑是如何與自上而下的路徑相配合，推動納粹黨攫取權力的。音樂是一體化進程中一個特別重要的目標。幾個世紀以來，中歐的古典派和浪漫派作曲家向世界輸送了音樂保留曲目的主干。柏林愛樂樂團（Berlin Philharmonic）等偉大的交響樂團享有世界級的聲譽。在拜羅伊特上演的瓦格納音樂劇在世界音樂文化中占據著獨特的位置。每座城市、每個小鎮或者較大的村莊都有自己的音樂俱樂部與合唱團，還有業余作曲的傳統。業余作曲不僅是中產階級生活的重要內容，也是工人階級文化活動的重要內容。納粹黨認為，這種偉大傳統正在遭受魏瑪共和國的現代派音樂的侵蝕，而且它并不是唯一有這種感覺的右翼政黨，該黨以自己慣常的粗魯做派把這歸咎于“猶太人的顛覆活動”。現在正是他們撥亂反正的時機。

萊比錫布商大廈管弦樂隊（Leipzig Gewandhaus orchestra）的首席指揮布魯諾·瓦爾特（Bruno Walter）是猶太人，但與布施一樣，他根本不是現代派音樂的倡導者。3月16日，瓦爾特去音樂廳排練時，發現大門已被薩克森州的行政長官下令封鎖，理由是無法保證音樂家們的安全。由于4天后要在柏林舉行音樂會，瓦爾特申請警方保護，但戈培爾下令拒絕了他的請求。戈培爾明確表示，音樂會要由非猶太裔指揮家執棒才可以上演。柏林愛樂樂團的首席指揮威廉·富特文格勒（Wilhelm Furtwängler）拒絕取代瓦爾特；后來，作曲家理查德·施特勞斯同意登臺指揮這場音樂會，納粹媒體對此歡慶喧囂了一陣。不久，瓦爾特從萊比錫辭職，移居奧地利。納粹媒體極力把他說成共產黨的同情者，但很多人都看得出，瓦爾特受到大肆攻擊的真正原因只有一個：種族問題。[[3]](#3_6)

在德國的一流指揮家中，奧托·克倫佩雷爾（Otto Klemperer）最接近納粹所丑化的猶太裔音樂家形象。奧托是文學教授和日記作者維克托·克倫佩雷爾的堂弟，他不僅是猶太人，而且作為前衛的克羅爾歌劇院1927—1930年的總監（具有諷刺意味的是，1933年2月27—28日的大火之后，國會就改在這座歌劇院開會），他倡導激進作品，是斯特拉文斯基（Stravinsky）等現代派作曲家的著名支持者。2月12日，克倫佩雷爾在柏林指揮了瓦格納的歌劇《唐懷瑟》（Tannhäuser），這場演出飽受爭議，被納粹的樂評媒體斥為“冒牌的瓦格納”和對作曲家遺響的褻瀆。到3月初，激憤的輿論迫使此作品的演出被取消。不久，克倫佩雷爾的音樂會均被取消，理由照舊似是而非：如果他出現在指揮臺上，那么公共安全將無法得到保障。克倫佩雷爾試圖自救，堅稱“他完全贊同德國當前的發展進程”，但他很快意識到厄運難逃，遂于4月4日離開德國。[[4]](#4_6)不久，根據《恢復專業公務員法》解聘的人不僅包括猶太裔指揮家，比如杜塞爾多夫的雅舍·霍倫施泰因（Jascha Horenstein），還包括歌唱家，以及歌劇院和交響樂團的管理人員。國立音樂學院的猶太教授也被遣散，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作曲家阿諾爾德·勛伯格和弗朗茨·施雷克（Franz Schreker），二人都在柏林的普魯士藝術學院（Prussian Academy of Arts）執教。猶太樂評人和音樂理論家被開除公職、逐出德國報界，其中最著名的是阿爾弗雷德·愛因斯坦，他也許是其所處時代最杰出的樂評家。[[5]](#5_6)

猶太裔音樂家的合同此時在全國各地都被終止了。例如，漢堡愛樂協會（Hamburg Philharmonic Society）于1933年4月6日宣布：“去年12月底擬定的獨奏人選當然要修改，以確保沒有猶太藝術家參加演出。扎比內·卡爾特（Sabine Kalter）女士和魯道夫·塞金（Rudolf Serkin）先生將由日耳曼裔藝術家取代。”[[6]](#6_6)1933年6月，猶太裔音樂會經紀人被禁止從業。各種音樂協會，乃至工人階級采礦村鎮里的男聲合唱團和各大城市寧靜郊區的音樂鑒賞協會，都被納粹黨接管，其中的猶太會員均被驅逐。與上述措施同步出現的，是音樂媒體上的一連串宣傳稿，攻擊馬勒（Mahler）和門德爾松（Mendelssohn）等作曲家的所謂“非日耳曼”表現，并且夸口要恢復真正的日耳曼音樂文化。政府更是直截了當，干脆把公認的前衛作曲家及其作品從保留曲目中剔除。庫爾特·魏爾長期創作與共產黨作家貝爾托特·布萊希特的劇作有關的音樂，他的《銀海》（The Silver Sea）于2月22日在漢堡上演，因遭到抗議示威而被迫取消，此后不久，其音樂作品被全部禁演。對納粹黨而言，魏爾的猶太人身份只會讓他成為更明顯的靶子，他最終也移居國外。一起移居國外的左翼作曲家還有漢斯·艾斯勒（Hanns Eisler），他是布萊希特的另一位音樂合作者，也是無調性音樂作曲家阿諾爾德·勛伯格的學生。[[7]](#7_6)

設法留在德國樂壇的猶太音樂家寥寥無幾，其中一位是指揮家萊奧·布勒希（Leo Blech），他是柏林國家歌劇院（Berlin State Opera）頗受愛戴的靈魂人物，1933年6月由他執棒的瓦格納歌劇《眾神的黃昏》贏得了觀眾的起立鼓掌。歌劇院經理海因茨·蒂特延（Heinz Tietjen）設法說服戈林同意他留任，直至布勒希于1938年移居瑞典。對于另一些杰出的猶太裔音樂家來說，離開是比較容易的事情，因為他們并非德國公民，而且名氣大到足以在全世界的任何地方謀生，比如在德國生活了很多年的小提琴家弗里茨·克萊斯勒（Fritz Kreisler）和鋼琴家阿圖爾·施納貝爾（Artur Schnabel）。與他們有所不同，歌劇天后洛特·萊曼（Lotte Lehmann）是德國公民，并非猶太人，但她的丈夫是猶太裔，萊曼尖銳地批評戈林對柏林國家歌劇院事務的干涉，并且移居紐約以抗議希特勒政府的政策。其他那些平凡的交響樂團演奏員、教師和管理人員之類，則沒有這種選擇的機會。[[8]](#8_6)

### 二

當時影響著音樂生活的一體化進程，正如它對德國社會和文化的其他幾乎每個領域所做的那樣，并不僅僅旨在清除納粹主義之外的其他思想，以及監視和控制德國社會的幾乎每個方面。在沖鋒隊摧毀納粹黨對手的同時，希特勒和戈培爾采取措施爭取消極支持者，使之成為“國家社會主義革命”的積極參與者，并且引導立場搖擺和心存疑慮的人轉向樂于合作的心態。戈培爾在1933年3月15日的新聞發布會上說，新政府

知道自己的背后站著52%的國民，支持它威懾另外48%的人，但它不會就此滿足；相反，它把爭取另外48%的人視為自己的下一個任務……使他們勉強與政府妥協、轉向中立立場是不夠的，我們還要做他們的思想工作，直到他們衷心愛戴我們……[[9]](#9_6)

戈培爾這番話的有趣之處在于，不但承認有將近一半的國民遭到了恐嚇，而且宣布政府志在贏得3月5日選舉中沒有投票給聯合政府的那些選民的衷心擁戴。它將進行一場堪與1914年的大規模軍事動員相媲美的“思想動員”。為了開展這場動員，希特勒政府啟用了它獨創的機構“國民教育與宣傳部”（Reich Ministry for Popular Enlightenment and Propaganda），這是根據3月13日的一項特別法令而設立的，部長之職連同在內閣中的一個席位被授予約瑟夫·戈培爾。戈培爾是納粹黨柏林黨支部的書記，希特勒頗為欣賞他在當地進行的不擇手段、充滿創意的宣傳戰，尤其是以聯合政府于3月5日獲勝而告終的那場選戰期間戈培爾的作為。[[10]](#10_6)

新部是頂著內閣中保守派的反對而建立的，反對者包括阿爾弗雷德·胡根貝格，他不信任戈培爾的“社會主義”激進思想。[[11]](#11_6)戈培爾在此前幾年的宣傳戰中，沒少謾罵“反動派”和民族黨人，比如胡根貝格。不僅如此，戈培爾曾親口承認，“宣傳”是個“飽受毀謗、不堪回味”的詞。它通常被當作罵人的話使用。因此，用這個詞作為新部的名稱，可謂大膽之舉。戈培爾把“宣傳”定義為一門藝術，以此為它正名，說它不是撒謊或歪曲的藝術，而是傾聽和溝通的藝術——傾聽“人民的心聲”，“用人民群眾聽得懂的語言與他們溝通”。[[12]](#12_6)然而“國民教育與宣傳部”的權限范圍卻沒有得到明確界定。1932年初，當首次討論設立這樣一個部的時候，希特勒曾打算由它掌管教育和文化領域；但到它成立的時候，教育仍舊按傳統方式單獨歸屬一個部，教育部自1933年1月30日開始由伯恩哈德·魯斯特（Bernhard Rust）執掌。[[13]](#13_6)盡管如此，“國民教育與宣傳部”的首要目標，正如希特勒于1933年3月23日所說，是集中控制文化和思想領域的所有方面。他宣布：“政府將發起一場有計劃有步驟的運動，以恢復國民的身心健康。整個教育系統、戲劇、電影、文學、報刊和廣播，將全部用作實現這個目標的手段，它們將得到治理，用于留存永恒的價值，這些價值是我國人民天性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14]](#14_6)

當然了，那些價值指的是什么，要由政府來界定。納粹黨人的行為是基于這樣的前提：他們，只有他們，在希特勒的指引下，懂得并理解德意志心靈的內涵。納粹黨認為，數百萬不肯支持它的選民——正如我們所知，即使是在1933年3月5日的半民主選舉中，這些人也屬于大多數——受到了“猶太的”布爾什維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猶太人”掌控的報刊和媒體、魏瑪文化中的“猶太”藝術和娛樂活動以及其他類似的非德意志力量的誘惑，這些力量使他們疏離了自己內在的德意志心靈。因此，宣傳部的任務是引導德意志民族恢復它真正的天性。戈培爾宣稱，德國人民必須從此“思想一致、行動一致，全心全意為政府服務”。[[15]](#15_6)為了實現目標，使用任何手段都是合理的，贊同此原則的納粹頭目遠不止戈培爾一人：

我們此時并不是在設立一個自行其是、自我標榜的宣傳部，而是把這個宣傳部作為實現目標的工具。如果用這個工具實現了目標，那它就是好工具……宣傳部只有一個目標，就是動員全體國民一致支持民族革命的理念。假如目標剛剛實現，我的方法就被棄用，那根本無所謂，因為宣傳部那時已經通過艱苦奮斗實現了它的目標。[[16]](#16_6)

戈培爾接著說道，必須采用現有的最現代的方法。“決不允許帝國落后于技術，帝國必須緊跟技術。只有最新的事物才足夠優秀。”[[17]](#17_6)

為了實現這些雄心壯志，戈培爾為宣傳部配備的人員都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納粹黨員，他們不必費神對付文職部門中根深蒂固的保守主義作風，這種作風盛行于許多最高級別的國家機關。他們絕大多數是1933年以前的黨員，宣傳部350名官員中有近百人佩戴著納粹黨的金色榮譽勛章。他們的平均年齡不超過30歲，其中許多人在宣傳部中的職務與他們在納粹黨的宣傳機關中的職務相同或相似，這兩個機構均由戈培爾掌管。3月22日，他們被安置進一座富麗堂皇的總部——威廉廣場（Wilhelmsplatz）上的利奧波德宮（Leopold Palace）。它建于1737年，19世紀初由普魯士的著名建筑師卡爾·弗里德里希·申克爾（Karl Friedrich Schinkel）重新修繕。但是精致的灰泥墻面和石膏裝飾圖案在戈培爾看來不夠現代，不合乎他的品位，于是要求刮掉它們。對新部長來說，等待批準再動工實在太耗時間，于是他走了條捷徑，并把過程寫在了1933年3月13日的日記里：

即使是改造和裝修我自己的辦公室，也要處處受阻，我干脆不再廢話，從沖鋒隊找來一些建筑工人，讓他們連夜把石膏裝飾圖案和木質裝飾帶拆掉，書架上塵封已久的文件被扔下樓梯，發出一聲轟響。只有彌漫的濁塵留了下來，見證著官僚排場的消失。

遷入不久，該部設立了不同的部門，分管各領域宣傳事務，包括廣播、報刊、電影、戲劇和“國民教育”，并在1933年6月30日獲得希特勒的全面授權，宣布它不僅負責上述領域，還負責代表整個政府處理一切公共關系，包括與國外媒體的關系。這讓戈培爾有恃無恐，可以不去理會其他政府部門因為宣傳部侵入它們的勢力范圍而提出的異議。這正是戈培爾在此后的歲月里從事宣傳時不止一次需要動用的權力，這些宣傳活動被他冠冕堂皇地稱為“國民的思想動員”。[[18]](#18_6)

納粹黨的許多機關和議員宣稱，文化布爾什維主義遍布于魏瑪共和國的藝術界、音樂界和文學界。納粹文化政策的最直接目標就是清除“文化布爾什維主義”，納粹當局執行此政策的方式，為德國一體化進程無所不至的廣度和深度提供了更多的例證（如果我們需要更多例證的話），此進程馴服了社團、知識界和文化界，它們的一致服從是第三帝國得以建立的基礎。正如在生活的其他領域一樣，文化界的一體化進程包括：徹底把猶太人清除出文化機構，迅猛地鎮壓共產黨人、社會民主黨人、左翼人士、自由派以及任何有獨立思想的人。當務之急是把猶太人逐出文化生活，因為納粹黨斷言，創造了無調性音樂和抽象畫之類的現代派藝術形式，以此侵蝕德意志文化價值的，正是猶太人。當然，這種關聯與真相實際上遙不可及。德國現代派文化的維護者并不是猶太人，許多猶太人在文化上其實與德國的其他中產階級人士一樣保守。但在1933年上半年強權政治肆虐的時候，沒人理會這個事實。對于剛剛上臺、得到民族黨人支持的納粹政府來說，“文化布爾什維主義”是魏瑪共和國最危險，也是最引人注目的創造物之一。正如希特勒在《我的奮斗》中所寫：“藝術布爾什維主義是布爾什維主義作為一個整體唯一可能的文化形式和思想表達。”這種文化表達的主要形式是立體主義和達達主義，希特勒把它們與另外一些藝術形式統統歸入抽象派。這些可怕的東西越早被真正的德意志文化取代越好。因此，國家社會主義革命的目標，不僅是要消滅反對派，也是要改造德意志文化。[[19]](#19_6)

### 三

大清洗及其引發的出走潮，例如可以從納粹上臺最初幾星期的德國樂壇觀察到的情形，并非無人評論。1933年4月1日，駐美國的一群音樂家給希特勒本人拍發了抗議電報。納粹政府以其特有的方式做出回應：德國國家電臺立即禁播電報簽名者的作品、音樂會和唱片，包括指揮家謝爾蓋·庫塞維斯基（Serge Koussevitsky）、弗里茨·萊納（Fritz Reiner）和阿爾圖羅·托斯卡尼尼（Arturo Toscanini）。[[20]](#20_6)德國國內批評大清洗的人之中，最著名的是威廉·富特文格勒。從許多方面看，富特文格勒都是一位保守派，例如他認為，猶太人不應在文化界被委以重任，多數猶太音樂家并非由衷熱愛德國音樂，猶太記者應該被逐出新聞界。他曾寫道，非日耳曼人從未寫出過一部真正的交響樂。他不信任民主制度，不信任他所謂的魏瑪共和國時期“猶太—布爾什維克的成功”。[[21]](#21_6)因此，他在原則上并不反對納粹黨的上臺，也根本不覺得受到了它的威脅。富特文格勒享有極高的國際聲譽，1920年代一直擔任維也納愛樂樂團（Vienna Philharmonic）的指揮，并且兩度在紐約愛樂樂團（New York Philharmonic）擔任客座指揮，均大獲成功。他魅力十足，以至于有記錄顯示，他在職業生涯中至少有13個私生子。富特文格勒傲慢、自信，是又一位嚴重低估了納粹黨的保守派。[[22]](#22_6)

不同于其他交響樂團，富特文格勒的柏林愛樂樂團并非國有團體，因此不受制于4月7日頒布的、強制解聘猶太裔政府雇員的法律。1933年4月11日，富特文格勒在一家自由派報紙上發表致戈培爾的公開信，聲明他不打算終止柏林愛樂樂團里猶太演奏員的合同。在這封反對納粹黨政策的信中，富特文格勒的措辭除了顯示出他的自信和勇氣，也顯示出他與納粹黨在觀點上的重合程度：

與猶太人做斗爭，如果主要是針對那些無根的、骨子里具有破壞性的藝術家，那些用媚俗的作品、缺乏真情實感的炫技以及諸如此類的東西達到某種效果的人，那倒無妨。與他們及其所體現的精神——這種精神偶爾也有日耳曼裔的代表人物——做斗爭，無論怎樣堅決地、一以貫之地執行都不過分。但這種斗爭如果是針對真正的藝術家，則無益于文化生活……因此必須明言，像瓦爾特、克倫佩雷爾和賴因哈特等等那樣的人物，將來必定也能夠在德國發出自己的聲音。

他對戈培爾說，解雇那么多優秀的猶太音樂家，無益于“恢復我們的民族尊嚴，而恢復民族尊嚴正是全體國民此時滿懷感激與喜悅翹首以待的”。[[23]](#23_6)富特文格勒以天神般的傲然之態繼續我行我素，不理睬納粹報刊的輿論戰，它們鼓噪著要求他所在的柏林愛樂樂團解雇猶太音樂家，包括首席音樂家西蒙·戈德伯格（Szymon Goldberg）和首席大提琴家約瑟夫·舒斯特（Joseph Schuster）。[[24]](#24_6)

戈培爾是個相當精明的政客，因此不會怒氣沖沖地回應富特文格勒的公開抗議。在公開回復指揮大師的長信里，他首先歡迎富特文格勒對希特勒政府“恢復民族尊嚴”的行動所持的積極立場。但他提醒富特文格勒，德國音樂應該成為這個進程的一部分，為藝術而藝術已經不合時宜。戈培爾承認，藝術家和音樂家當然必須追求最高品質，但也必須“有責任感、技藝精湛、貼近人民、富于戰斗精神”。他歪曲富特文格勒的話來表達自己的意圖，戈培爾說他同意樂壇不應再出現“實驗性作品”，而指揮家在公開信里根本沒說這話，然后他又提醒富特文格勒：

不過，現在也正是反對藝術實驗的恰當時機，因為德國的藝術生活幾乎完全被一伙遠離人民、非我族類的實驗癖控制著，他們玷污了德國藝術的聲譽，讓它在全世界面前受到損害。

“日耳曼”音樂家促成了這場藝術畸變，此事在戈培爾看來顯示了猶太的影響力已滲透到多么深遠的程度。戈培爾歡迎富特文格勒作為盟友參與這場清除猶太影響力的斗爭，像他這樣的真正藝術家在第三帝國將永遠有發言權。至于富特文格勒怒而為之鳴不平的那些被噤聲的音樂家，帝國宣傳部長把他們的被解聘看作微不足道的瑣事而置之不理，同時又狡猾地推卸對此事的責任：

有人抱怨說，瓦爾特、克倫佩雷爾和賴因哈特之類的人物在各地被迫取消音樂會，在我看來，這種抱怨在此時似乎格外不妥，因為在過去14年里，真正的日耳曼藝術家已經被迫完全陷入沉默，最近幾星期里的事件僅僅是對這一事實的自然反應，而不是我們授意的。[[25]](#25_6)

這些“真正的日耳曼藝術家”是誰，他沒有說，實際上他也說不出來，因為他所聲稱的全屬捏造。然而戈培爾明白，如果他魯莽行事，可能會損害德國在國際樂壇的聲譽，因此讓指揮大師及其樂團就范，他靠的不是公開交鋒，而是背地里的手段。經濟蕭條使柏林愛樂樂團失去了來自州政府和市政府的大部分補貼。帝國政府設法讓樂團再也得不到補貼，直至它瀕于破產。于是富特文格勒直接向希特勒本人求助，后者對德國最偉大的交響樂團面臨倒閉的危險表示憤慨，下令帝國政府接管它。因此，從1933年10月26日開始，柏林愛樂樂團不再是獨立團體，占據天時與地利的戈培爾及其宣傳部最終出手收服了它。[[26]](#26_6)

### 四

造就納粹黨所認為的真正的日耳曼音樂文化，還涉及消除外來文化的影響，比如爵士樂，它被納粹黨視為劣等種族文化的產物，即非裔美國人文化的產物。種族主義語言是納粹主義的第二特性，它在這個語境中特別富于攻擊性和挑釁性。納粹樂評人譴責“黑鬼音樂”是性挑逗的、道德敗壞的、原始的、野蠻的、非日耳曼的、純屬顛覆性的，盡管有些樂評人更喜歡委婉地強調爵士樂起源于非洲，但這強化了納粹黨到處傳播的“美國人在退化”的觀點。新近流行的薩克斯管那令人神魂顛倒的曲調也成了被批評的對象，可是當薩克斯管的銷量因此而開始下降時，德國的樂器制造商機敏地回應說，薩克斯管的發明者阿道夫·薩克斯（Adolphe Sax）是德國人（實際上他是比利時人），并且指出，備受尊敬的作曲家理查德·施特勞斯曾在他的幾部作品中使用過它。歐文·柏林（Irving Berlin）和喬治·格什溫（George Gershwin）等猶太作曲家在爵士樂世界的卓越表現，為納粹黨從種族角度惡語辱罵增加了新一層內容。[[27]](#27_6)

德國的爵士樂、搖擺樂和伴舞樂隊確實有許多演奏員是外國人，他們在1933年的敵視氛圍中離開德國。盡管納粹黨激烈地口誅筆伐，但爵士樂其實極難界定，只需稍微靈活地調整一下樂曲節奏，演奏者的舉止適當地老派一點兒，那么在整個1930年代，爵士樂和搖擺樂的音樂人其實不難在德國的無數俱樂部、酒吧、舞廳和飯店繼續演奏下去。在柏林的時髦夜總會，比如羅克西（Roxy）、雕鸮（Uhu）、白鸚（Kakadu）或者西羅（Ciro），保鏢們把納粹黨派來的那些衣著永遠寒酸的密探拒之門外，以便時髦的客人們可以安然地在里面踏著最新的爵士樂和改良過的爵士樂曲繼續搖擺。如果有密探被放行，門房只需按一下暗鈴，舞臺上的樂手們就會在密探到達舞池之前迅速變換樂曲。

魏瑪時期的社交場所就這樣在1933年如常運轉，除了迫于大蕭條期間的經濟緊縮政策已做出的改變之外，基本上一切照舊。多數猶太樂手甚至得以繼續在俱樂部里演奏至1933年秋，有些在此后又設法堅持了一段時間。在柏林著名的菲米娜（Femina）酒吧，搖擺樂隊在夜間繼續為上千的舞客伴奏，225張桌子上都配了電話，并附有德文和英文的使用指南，以便落單的人給舞廳中坐在其他位置的潛在舞伴打電話。音樂的格調也許不是很高，但如果剝奪人們每天——或者每夜——的樂趣，即使納粹黨有能力那么干，結果也可能會適得其反。[[28]](#28_6)只有在歌手公然表達政治立場的地方，比如柏林著名的卡巴萊表演場所，才當真會有沖鋒隊進來強行驅逐大批猶太裔表演者，禁止那些屬于共產黨、社會民主黨、自由派或者左翼游說團體的歌手和喜劇演員表演或者把他們趕走。其他演員則主動把政治內容從自己的表演中剔除。納粹黨知道卡巴萊很受歡迎，而且意識到不宜剝奪人們的全部娛樂，因此試圖鼓勵“積極的卡巴萊”——笑話全部以納粹黨的敵人為嘲諷對象。據說，著名的卡巴萊演員克萊爾·瓦爾多夫（Claire Waldoff）非常大膽，竟至唱歌諷刺戈林，她和著其節目開始曲《赫爾曼》（‘Hermann’）的旋律唱道：“左一串勛章，右一串勛章/他的肚腩越來越肥/他是普魯士的主人——/赫爾曼乃是他的大名！”不久，只要她唱起原版的《赫爾曼》，聽眾就會會心地咧嘴而笑，因為他們想起了那幾句戲謔的填詞。但瓦爾多夫實際上并沒有創作過那幾句歌詞，這個笑話完全是一廂情愿的杜撰。無法掩蓋的事實是，到1933年年中的時候，納粹黨已經使卡巴萊精華盡失。[[29]](#29_6)有些人對此無法忍受。在柏林著名的卡德蔻（Kadeko）俱樂部主持“眾星諧謔卡巴萊”節目、善于拿政治話題插科打諢的保羅·尼古勞斯（Paul Nikolaus）逃往瑞士的盧塞恩（Lucerne），于1933年3月30日在那里自殺。“僅此一回，不開玩笑，”他寫道，“我要自殺了。為什么？如果回德國，我準會在那里自殺。現在我不能在那里工作，也不想在那里工作，但不幸的是我愛我的祖國。我不愿意活在這種時代。”[[30]](#30_6)

## 第二節 藝術的凈化

### 一

1933年上半年，反猶主義、反自由主義和反馬克思主義的寒風，夾雜著一股沉悶的、反“墮落”的衛道氣息，也在德國文化的其他領域呼嘯而過。事實證明，電影業相對容易控制，因為不同于卡巴萊或俱樂部的圈子，電影業由為數不多的幾家大公司組成，從制作和發行一部電影所需要的高額成本來看，這也許是必然的結果。與在其他行業一樣，那些見風使舵的人無需別人調教，很快就在壓力面前放低了身段。早在1933年3月，影業巨頭UFA制作公司（其老板阿爾弗雷德·胡根貝格當時仍是希特勒內閣的成員）就開始全面執行解雇猶太裔員工、與猶太裔演員斷絕關系的政策。不久，納粹黨把德國影院業主協會（German Cinema Owners' Association）納入一體化進程。已加入工會的電影工作者全體成為納粹黨員，7月14日，戈培爾設立帝國電影協會（Reich Film Chamber），負責監管整個電影行業。通過這些機構，納粹頭目，尤其是戈培爾——他本人就是一位充滿熱情的電影鑒賞家，掌控了演員、導演、攝影師和幕后工作人員的聘任權。盡管4月7日法律的適用范圍實際上并不包括電影界，但猶太人依然漸漸被逐出電影業的每個行當。演員和導演如果所持政治立場為政府所不容，就會遭到排擠。[[31]](#31_6)

在新的審查和管制條件下，少數電影界人士更愿意到好萊塢那種自由環境中尋找機會。找到機會的人包括導演弗里茨·朗，他拍攝過一系列大獲成功的電影，比如《兇手M》、《大都會》（Metropolis）和《尼伯龍根》（The Nibelungen），后者一直是希特勒最愛看的史詩片。朗的電影《馬布斯博士的遺囑》（The Testament of Dr. Mabuse）間接諷刺了納粹黨，原計劃在1933年春上映，但在首映日將至之際被禁。步他后塵流亡國外的是比利·懷爾德（Billy Wilder），他出國前所拍的通俗愛情片，極少流露出他在好萊塢拍攝的《雙重賠償》（Double Indemnity）和《失去的周末》（The Lost Weekend）等電影中所展現的大膽。在隨后的幾十年里，兩人都創作了一些屬于好萊塢最成功電影之列的作品。另有一些電影導演移居巴黎，包括生于捷克的G.W. 帕布斯特（G. W. Pabst），他執導了魏瑪時期的經典影片《潘多拉的盒子》以及貝爾托特·布萊希特和庫爾特·魏爾的《三分錢歌劇》的電影版；還有馬克斯·奧菲爾斯（Max Ophüls），他1902年生于德國，原名馬克斯·奧本海默（Max Oppenheimer）。然而早在納粹上臺之前，有些德國導演和電影明星就已經受到好萊塢魅力的吸引。例如，瑪琳·黛德麗于1930年離開德國，主要是為了賺錢，而與政治無關。極少數人出國的直接原因是第三帝國的到來，其中包括出生于匈牙利的彼得·洛（Peter Lorre），他曾在弗里茨·朗執導的《兇手M》中扮演狡詐、難以自控、專殺兒童的兇手。納粹后來在宣傳中極力暗示兇手是猶太人，而朗的影片中根本沒有這樣的影射。[[32]](#32_6)盡管這些流亡者受到了應有的關注，但是與此同時，蓬勃發展的德國電影業中的絕大多數從業者留了下來。在《電影周刊》（Film Week）于1932年根據影迷來信而選出的75位德國最受歡迎的電影明星中，僅有13位移居國外，但其中有3位居于前5名——莉莉安·哈維（Lilian Harvey）和克特·馮·納吉（Kaethe von Nagy）都在1939年出國，吉塔·阿爾帕（Gitta Alpar）于1933年離開。名單中排名稍微靠后的明星中，布里吉特·黑爾姆（Brigitte Helm）于1936年離開，康拉德·維德（Conrad Veidt）于1934年離開。其中只有阿爾帕和1933年出國的另一位明星伊麗莎白·貝格納（Elisabeth Bergner）是猶太人；75位明星中有35人在1944—1945年仍在德國影壇工作。[[33]](#33_6)

在1920年代末和1930年代初，尤其是有聲電影出現之后，電影院越來越受歡迎。但在電視時代之前，最普及、發展最快的現代大眾傳媒是廣播。不同于電影業，廣播網屬于公共事業，51%的股份屬于全國性的帝國廣播公司（Reich Radio Company），另外49%的股份屬于9家地方電臺。行使控制權的是兩名帝國廣播專員，其中一位在郵電與通訊部（Ministry of Posts and Communications），另一位在內政部，同時還設有一系列地方專員。戈培爾深諳廣播的力量。在1933年2—3月的選戰期間，他曾成功地阻止了除納粹黨和民族黨以外的所有政黨通過電臺傳播政見。不久，他設法撤掉兩位現任帝國廣播專員，換上了自己任命的人，并于1933年6月30日獲得希特勒簽發的法令，授權宣傳部掌控一切廣播事務。

戈培爾隨即對廣播機構強行實施大清洗，1933年上半年在各個層級裁員270人，占全體員工的13%。猶太人、自由派、社會民主黨人以及新政權不需要的其他人等均被解雇，其中許多人簽的是短期合同，這使清洗進程更加順利。那些支持原先的自由廣播體制的電臺經理和記者，包括德國電臺的創始人漢斯·布雷多（Hans Bredow），都被控徇私舞弊而遭逮捕，被送往奧拉寧堡集中營，然后經過幾個月的準備，在一場1934—1935年的大型審判秀上被定罪。但是多數人愿意在新政權治下繼續從業。漢斯·弗里切（Hans Fritsche）等人的留任確保了電臺的連續性。弗里切1920年代曾在胡根貝格的傳媒帝國擔任廣播新聞處處長，此時在納粹政權治下擔任德意志無線電服務局（German Wireless Service）局長，主管新聞廣播。與許多人一樣，弗里切為保住職位而采取的行動是加入納粹黨，他的入黨時間是1933年5月1日。截至當時，多數廣播電臺都已有效地實現了一體化，播放的納粹宣傳節目越來越多。社會民主黨播音員約亨·克萊珀（Jochen Klepper）的妻子是猶太人，他在3月30日曾抱怨道：“電臺如今簡直像納粹兵營，到處是制服，黨員編隊的制服。”僅僅過了兩個月，他也被解雇。[[34]](#34_6)

### 二

戈培爾在1933年3月25日的演講中宣稱，電臺是“最現代、最重要的大眾傳播工具，它的影響力無遠弗屆”。他說，長遠看來，電臺甚至可能取代報紙。然而在當時，報紙仍是傳播新聞和觀點的最重要載體，它給納粹黨的一體化和監管政策設置的障礙，遠比電影業和廣播界所設置的障礙更加難以對付。德國的日報比英國、法國和意大利的加起來還多，各種類型的雜志和期刊則更多。在全國、地區和地方諸層級，均有獨立的報紙和期刊，從極左到極右的各種政治觀點都能得到呈現。納粹黨試圖建立一個成功的、屬于自己的報界帝國，但它的努力并不十分成功。政治報紙在魏瑪共和國晚期式微，印刷文字似乎逐漸退居次席，轉由口頭話語領銜，為納粹事業爭取追隨者。[[35]](#35_6)

在這種情況下，戈培爾別無選擇，只能循序漸進。取締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的黨報相當容易，兩黨發行的報紙在1933年初的幾個月里一再遭到查禁，等到兩黨被逐出政壇，其報紙即被全面取締。但要想取締其余的報刊，就必須從多方面著手。直接動用武力和警察措施是迫使報界就范的一種方法。與中央黨和自由派的出版物一樣，保守派的各種日報也容易招致周期性查禁，例如《慕尼黑最新資訊》（Münchner Neueste Nachrichten）。天主教的《弗蘭肯報》（Fränkische Presse）是巴伐利亞人民黨的機關報，它被迫于1933年3月27日在頭版發表聲明，為多年來刊登了關于希特勒和納粹黨的謊言而道歉。這種壓力輕而易舉地使大型新聞機構相信，他們必須去適應新氣候。德意志報業協會（Reich Association of the German Press）是記者的工會，它于1933年4月30日主動實行了一體化，許多類似團體也是這樣做的。它推選戈培爾的同事奧托·迪特里希（Otto Dietrich）為協會的主席，并承諾未來將強制所有記者成為會員，同時僅接納在種族上和政治上可靠的人。[[36]](#36_6)1933年6月28日，德意志報業公會（German Newspaper Publishers' Association）步其后塵，任命納粹黨的出版人馬克斯·阿曼為公會主席，并投票把納粹黨人選入理事會，取代那些在政治上已不合時宜的理事。[[37]](#37_6)至此，新聞界已在恐嚇的壓力下選擇了屈服。不是納粹黨員的記者只能用含蓄的暗示和影射來表達自己的觀點，讀者只能從字里行間揣摩他們的意思。戈培爾一改魏瑪共和國時期政府定期公開舉行記者招待會的做法，轉而召開秘密會議，由宣傳部向挑選出來的記者傳達關于新聞報道內容的詳細指示，有時竟然提供了文稿，讓他們全文刊發或者在此基礎上撰寫報道。1933年3月15日，戈培爾在他首次正式召集的記者招待會上告訴與會者：“你們不但要知道正在發生什么，還要知道政府對此的觀點，以及你們怎樣才能把政府的意思最有效地傳達給人民。”[[38]](#38_6)毋庸贅述，記者不可以傳達除此之外的其他觀點。

與此同時，納粹黨忙于盡快逮捕新聞界人士中的共產黨員以及和平主義者。逮捕始于1933年2月28日凌晨。卡爾·馮·奧西茨基是第一批遭到羈押的人之一，他編輯的《世界舞臺》是一份立場明確的知識分子雜志，基本上持左翼的和平主義新聞觀。奧西茨基聲名遠揚，不僅因為他在1933年以前對納粹黨所做的尖銳批評，也因為他發表文章曝光了飛機業非法重整軍備的秘密項目，這篇文章導致他在1932年5月那場轟動一時的庭審后被判監禁。1933年他再次被捕，國外的作家展開了一場聲勢浩大的聲援活動，但未能使他獲釋。瘦弱的奧西茨基被關押在位于松嫩堡（Sonnenburg）、由褐衫軍管理的臨時勞改營，被迫承擔繁重的體力勞動，包括挖坑，看守告訴他那是他自己的墳墓。奧西茨基1889年生于漢堡，盡管有那樣的姓氏，但他并不是猶太人、波蘭人或俄國人，而是在各方面都屬于納粹黨所定義的日耳曼人。沖鋒隊員不管這些，時常對他拳腳相加，還大罵他是“猶太豬”、“波蘭豬”。一向體弱的奧西茨基差點兒在1933年4月12日死于心臟病。獲釋的囚犯悄悄告訴奧西茨基的朋友們，4月12日之后他已徹底垮掉。[[39]](#39_6)

奧西茨基的境況僅比另一位1920年代的激進作家埃里希·米薩姆稍微好一點兒，米薩姆是無政府主義詩人和劇作家，早在魏瑪共和國治下，他就曾因在1919年加入慕尼黑的“咖啡館無政府主義者政權”而坐過一段時間牢。米薩姆是褐衫軍特別痛恨的對象，因為他不僅是激進作家，還是革命者和猶太人。國會縱火案之后，米薩姆被逮捕，受到沒完沒了的凌辱和虐待，因為不肯唱《霍斯特·韋塞爾之歌》，他被奧拉寧堡集中營的黨衛隊看守打得血肉模糊，不久之后被發現吊死在集中營的廁所里。[[40]](#40_6)米薩姆以前在慕尼黑那個短命的革命政府里的同事、無政府主義者以及和平主義者恩斯特·托勒（也是猶太作家）同樣因參與革命行動而坐過牢。他在1920年代創作的一系列抨擊德國社會之不公不義的現實劇，使他一直受到公眾的關注，其中包括一部諷刺希特勒的、劇名帶有諷刺意味的《解放了的沃坦》（Wotan Unbound）。1933年2月底托勒碰巧在瑞士，國會縱火案之后的大規模逮捕行動使他打消了回國的念頭。他長期巡回演講，譴責納粹政權，但流亡生活的艱辛動蕩使他無法繼續寫作，由于對一場新的世界大戰即將來臨感到絕望，他于1939年在紐約自殺。[[41]](#41_5)

有些人則能夠較好地適應德國以外的文學世界，其中最著名的是共產黨員詩人和劇作家貝爾托特·布萊希特，他于1933年離開德國，轉道瑞士前往丹麥，最后在美國好萊塢找到工作。最成功的流亡者之一，是《西線無戰事》的作者、小說家埃里希·瑪麗亞·雷馬克。納粹黨極力暗示說他有個法國姓氏，但他實際上是德國裔（納粹黨還聲稱他是猶太人，并且毫無根據地斷言其姓氏“Remarque”的最初寫法是“Remark”，然后反向拼寫這個詞，把他的姓氏寫成“Kramer”[\*](#_259)）。雷馬克在流亡中繼續寫作，靠出售自己許多作品的電影版權過著相當優渥的生活，以至于1930年代后期在好萊塢等地給人們留下了闊綽花花公子的印象，他與一大串好萊塢女演員的緋聞頻頻被曝光。[[42]](#42_5)更著名的流亡者是小說家托馬斯·曼，其長篇小說《布登勃洛克一家》（Buddenbrooks）和《魔山》（Magic Mountain），以及《死于威尼斯》（Death in Venice）等中篇小說，確立了他作為世界文學巨匠的地位，并為他贏得了1929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曼成為文學界中支持魏瑪民主制度的主要人物之一，他不停地在德國和世界各地巡回演講，闡述維持民主制度的必要性。他沒有直接受到納粹黨的暴力威脅和監禁，但是在1933年2月之后，他不理睬納粹政權的回國邀請，留在了瑞士。同年6月他寫道：“我無法想象生活在當今的德國是怎樣的境況。”幾個月后，曼在一陣訾罵聲中被普魯士藝術學院開除，同時被開除的還有詩人兼小說家麗卡達·胡赫（Ricarda Huch）等其他民主派作家。此事愈加堅定了他的信念，他告訴一位友人：“指責我離棄了德國，在我個人看來是用詞不當。我是被驅逐的。被公開謾罵，被外國征服者奪走了我的祖國，因為我是比他們成熟、比他們有良知的德國人。”[[43]](#43_5)

托馬斯·曼的哥哥海因里希遭到了納粹政權更加嚴厲的對待，他是辛辣諷刺德國資產階級習慣的《稻草人》（Man of Straw）和《藍天使》等小說的作者。海因里希由于在大量的演說和隨筆中公開批評納粹黨而觸怒當局，于1933年被撤銷普魯士藝術學院文學系主任的職務，遂移居法國。繼海因里希之后，小說家阿爾弗雷德·德布林也于1933年8月赴法，他是現代主義文學的主將，代表作是以戰后歲月里德國首都的社會底層和黑社會為背景的小說《柏林亞歷山大廣場》。德布林既是猶太人又是前社會民主黨人，實際上已被納粹黨封殺。同樣的命運也降臨到另一位著名小說家利翁·福伊希特萬格（Lion Feuchtwanger）身上，他也是猶太人，其小說《成功》（Success）和《奧本海姆一家》（The Oppenheims）分別出版于1930年和1933年，尖銳地批評了德國社會和政治的保守和反猶思潮。福伊希特萬格在美國加州訪問期間得知其作品被禁，就沒有回國。小說家阿諾爾德·茨威格（Arnold Zweig）于1933年逃往捷克斯洛伐克，再轉赴巴勒斯坦（Palestine）。他也因為是猶太人而被納粹政權封殺，其作品無法再在德國出版。[[44]](#44_5)

在納粹政權迅速加強審查與監控的形勢下，1933年之后留在德國的作家沒幾個能繼續創作出有水準的作品。就連保守派作家也以各種方式與政權保持距離。詩人斯特凡·格奧爾格（Stefan George）的周圍聚集了一群追隨者，他們致力于復興“秘密的德意志”，以此滌蕩魏瑪時期的實利主義。喬治在“精神上支持”1933年的“新式全民運動”，但拒絕加入任何納粹化了的文學團體和文化組織。他的信徒中有幾位是猶太人。喬治于1933年12月去世。另一位著名的極端保守派作家、曾在1920年代與納粹黨關系密切的恩斯特·容格爾則很長壽，實際上他一直活到20世紀結束之際，超過100歲。他深受希特勒敬仰，因為他在描寫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小說《鋼鐵風暴》中美化了戰士的生活。容格爾發現第三帝國的恐怖主義根本不合自己的口味，于是退隱到后來被很多人稱為“內心移民”的狀態。與選擇這條道路的其他作家一樣，他創作的小說不再有明顯的當代背景——許多作家偏愛把背景設在中世紀——盡管這些作品有時小心翼翼地表達幾句對恐怖政策或專制體制的籠統批評，但只要不直截了當地抨擊納粹政權，它們仍然可以出版、發行，并且得到評論。[[45]](#45_5)

熱情支持新政權的一流作家相當稀少，其中有原先不關心政治的表現主義作家戈特弗里德·貝恩（Gottfried Benn）。到1933年底，留在德國的有才華、有聲望的作家寥寥無幾，1912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劇作家格哈特·豪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或許是個特例。然而在希特勒成為總理時，豪普特曼已年過七旬，早已過了他的創作巔峰。處于巔峰期時的豪普特曼因其打動人心、展現了貧困與剝削的劇作而享有盛名。其時他繼續寫作，用行納粹禮以及唱《霍斯特·韋塞爾之歌》的方式，極力公開表達擁護之意。但他沒有成為納粹黨員，他的自然主義劇作經常因為所謂的消極態度而遭到納粹黨的抨擊。有位匈牙利作家于1938年在拉帕洛（Rapallo）與他見面時，聽他發了一大串關于希特勒的牢騷。豪普特曼憤懣地說，希特勒毀了德國，不久還會毀滅世界。匈牙利人問他，既然如此為什么不離開德國。“因為我是個懦夫，你明白嗎？”豪普特曼惱怒地大聲說，“我是個懦夫，你明白嗎？我是個懦夫。”[[46]](#46_5)

### 三

隨著一流作家的大量流失，藝術家和畫家也在大批出走。與此同時，藝術界出現了席卷德國音樂界的那種迫害潮。然而在藝術界，希特勒對現代派藝術所顯示出的強烈反感，更是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希特勒認為自己本質上是個藝術家，他在《我的奮斗》中說，現代派藝術是猶太顛覆分子的產品，是“瘋子和退化者長出的病態贅疣”。他的觀點得到了阿爾弗雷德·羅森貝格的認同，后者堅定不移地站在傳統派立場上看待繪畫和雕塑的本質與功能。德國音樂在1920年代不復像18和19世紀時那樣主導著國際樂壇，而德國繪畫由于得到印象派、抽象派等現代主義運動的解放，在20世紀的前30年里經歷了令人矚目的復興，成為所有藝術門類中最出色、在國際上最成功的一種，甚至超過文學。這正是以阿爾弗雷德·羅森貝格為先鋒的納粹黨人當時著力要破壞的，他們遵循的準則是1920年制定的納粹黨綱領第二十五條：“我們要求對藝術與文學中可能導致國家分裂的一切傾向提起法律訴訟。”[[47]](#47_5)

喬治·格羅茲、埃米爾·諾爾德、馬克斯·貝克曼、保羅·克利、恩斯特·路德維希·基希納、奧托·迪克斯（Otto Dix）等許多畫家的作品長期飽受爭議，保守派和納粹黨都討厭他們的畫作。格羅茲因為把宗教圖案用于政治諷刺畫而引起公憤，他在納粹掌權之前就曾因政治諷刺畫兩度遭到（不成功的）起訴，被控以褻瀆上帝罪。[[48]](#48_5)7月，阿爾弗雷德·羅森貝格痛斥埃米爾·諾爾德的畫作是“黑人式的、褻瀆上帝的、原始的”，并把恩斯特·巴拉赫（Ernst Barlach）紀念馬格德堡戰役（Magdeburg war）的畫作斥為對亡者的侮辱。照羅森貝格的說法，巴拉赫把陣亡者畫成了“半個白癡”。奧托·迪克斯毫不妥協地呈現一戰期間戰壕里恐怖景象的畫作，遭到了超級愛國的納粹黨人同樣尖刻的批評。任何不是明顯具象、原樣描摹的作品都容易引發惡評。用納粹黨的話來說，藝術與其他任何事物一樣，必須源自人民的心靈，因此“每個身心健康的沖鋒隊員”都有能力像藝術評論家那樣，對藝術的價值做出公正的評判。[[49]](#49_5)不僅德國藝術家，外國藝術家也遭到了措辭激烈的攻擊。德國的美術館和博物館多年來購買了許多法國印象派和后印象派繪畫，民族主義者認為，買這些畫的錢本該更明智地用于促進德國藝術的發展，尤其是考慮到魏瑪共和國時期法國人在萊茵蘭和魯爾區的所作所為。[[50]](#50_5)

有些人，例如共產黨員格羅茲，早在1933年1月30日之前就看出了不祥之兆，于是離開德國。[[51]](#51_5)納粹黨控制的圖林根州政府自1930年起執行的政策顯然是對未來之事的一種預警：它把克利、諾爾德、奧斯卡·柯克西卡（Oskar Kokoschka）等畫家的作品從位于魏瑪的州立博物館撤下，并且在關閉位于德紹的包豪斯之前不久，下令損毀奧斯卡·施萊默畫在學校樓梯井上的濕壁畫。這一切應該已經清楚地表明，納粹積極分子可能會對藝術界的現代派發動猛烈攻擊。但事情似乎尚有回旋余地，因為表現主義受到了納粹黨內某些人的推崇，包括柏林的納粹學生會，它在1933年7月主辦的一場德國藝術展中，竟然展出了巴拉赫、奧古斯特·馬克、弗朗茲·馬爾克、諾爾德、克里斯蒂安·羅爾夫斯（Christian Rohlfs）和卡爾·施密特—羅特魯夫（Karl Schmidt-Rottluff）等人的作品。三天后，展覽被當地的納粹黨頭目強行關閉。希特勒特別反感諾爾德的作品，偏愛天主教藝術的戈培爾卻對其頗為欣賞。希特勒1933年夏視察位于柏林的宣傳部新大樓時，赫然看到墻上掛著“不堪的”諾爾德畫作，下令立即把它們摘掉。諾爾德被普魯士藝術學院開除，他對此非常氣憤，因為基本上自納粹黨1920年成立以來他就一直是黨員。1933年一年間，各地納粹黨頭目解雇了27個美術館和博物館的館長，代之以黨的忠誠分子，這些人立即把現代派作品從展位撤下，甚至在有些地方，現代派繪畫被作為“文化布爾什維主義圖像”單獨陳列于“藝術糟粕廳”。[[52]](#52_5)其他美術館和博物館的館長及員工已經隨風轉舵，有的加入納粹黨，有的與黨的政策保持一致。[[53]](#53_5)

像在文化生活的其他領域一樣，清洗猶太藝術家（無論是現代派還是傳統派）的步伐在1933年春迅速加快。普魯士藝術學院的“一體化”進程始于德國的一流印象派畫家、藝術學院前院長、86歲的馬克思·利伯曼（Max Liebermann）被迫辭去院士和名譽院長之職。利伯曼發表聲明，說他一向認為藝術與政治無關，此觀點招致納粹媒體對他的強烈譴責。當被問及在如此高齡面對這些指責有什么感覺時，藝術家答道：“人不能咽下那么多，否則會嘔吐的。”兩年后，當這位曾在國內享有盛譽的畫家去世時，只有三位非猶太裔藝術家出席了他的葬禮。其中之一的凱綏·珂勒惠支（Käthe Kollwitz）以對貧困筆力強勁但并無明顯政治意味的描繪著稱，她已被迫從普魯士藝術學院辭職。雕塑家恩斯特·巴拉赫繼續擔任藝術學院院士直至1937年，并且留在了德國，盡管其作品像施密特—羅特魯夫的一樣被禁。[[54]](#54_5)

保羅·克利由于他那被蔑稱為“黑人式”的藝術而成為納粹黨文化論戰最喜歡的靶子。他在杜塞爾多夫的教授職務被解除，旋即返回自己的祖國瑞士。但是其他非猶太裔的現代派藝術家決定觀望事態的發展，寄希望于希特勒和羅森貝格的反現代派政策能夠被政權中比較同情現代派的人物否決，比如戈培爾。原先駐法蘭克福的馬克斯·貝克曼竟在1933年遷往柏林，希望能影響政策朝著于他有利的方向發展。與上述許多藝術家一樣，貝克曼也蜚聲國際，但他從未像格羅茲或迪克斯那樣創作過直接含有政治意味的作品，甚至未曾顯現出康定斯基或克利那樣的抽象派傾向。然而貝克曼的畫作還是被從柏林國家美術館（Berlin National Gallery）的墻上摘掉，他本人于1933年4月15日被解除了在法蘭克福的教職。在貝克曼徘徊觀望自己的最終命運時，同情他的藝術品交易商設法幫他私下繼續謀生。與貝克曼形成對照的是，基希納同意從藝術學院辭職，但他指出，自己不是猶太人，也從未積極參與政治活動。不僅奧斯卡·施萊默，就連抽象畫的開創者、居住在德國長達幾十年的俄羅斯人瓦西里·康定斯基，也認為對現代派藝術的攻擊不會持續很長時間，因此決定留在德國，等待事態平息。[[55]](#55_5)

與普魯士同步，類似的清洗也發生在德國的其他地方。奧托·迪克斯被德累斯頓藝術學院（Dresden Art Academy）解聘，但私下仍在繼續工作，盡管他的畫作已被從美術館和博物館撤下。建筑師密斯·凡·德·羅拒絕辭去藝術學院院士之職，結果被開除。密斯·凡·德·羅曾試圖在柏林的一座廢棄工廠重建包豪斯，但動工不久即于1933年4月遭到警察的突襲并被關閉。他徒勞地聲辯，包豪斯是一所不帶任何政治色彩的學院。包豪斯的創始人瓦爾特·格羅皮烏斯申辯說，作為一戰老兵和愛國人士，他的目的僅僅是重建真正的、有生命力的、德意志的建筑與設計文化。包豪斯并無政治意圖，更不是反納粹的宣言。然而在當時的德國，藝術絕非與政治無關的，因為魏瑪時期激進的現代派運動，從達達主義到包豪斯，都傳播了這樣的觀點：藝術是改造世界的工具，納粹黨人只是利用這個文化—政治態勢來實現他們自己的目標。此外，把希望寄托在約瑟夫·戈培爾身上，始終是件冒險的事情。這些藝術家指望戈培爾會及時為他們辯護，但他們的期待終將以最驚人的方式化為泡影。[[56]](#56_5)

### 四

據估計，大約有2,000位德國藝術界的活躍人物在1933年之后移居國外。[[57]](#57_5)其中包括許多當時在國際上聲譽卓著的頂尖藝術家和作家。戈培爾后來決定剝奪他們的德國公民權，但他們的處境并未因此而有所改善。對許多這樣的流亡者來說，無國籍意味著異常的艱辛，因為難以從一個國家過境到另一個國家，找工作時也會遇到各種麻煩。由于沒有身份文件，官方往往不承認他們的存在。納粹政權公布了一系列名單，正式剝奪這些人的德國公民權，宣布他們的護照和身份文件作廢，1933年8月23日公布的首批作家包括利翁·福伊希特萬格、海因里希·曼、恩斯特·托勒和庫爾特·圖霍爾斯基；不久又公布三份名單，包括了大部分其余的著名流亡者。托馬斯·曼不僅被剝奪公民權，還被撤銷了波恩大學授予的榮譽學位。他致校長的公開抗議信很快贏得流亡者們的崇敬。[[58]](#58_5)德國的文化生活蒙受了巨大損失，享有國際聲望的作家、藝術家和畫家幾乎無人留在國內。頂尖的指揮家和音樂家全部被迫流亡，一些德國最有才華的電影導演也出走國外。在流亡中，有些人成就輝煌，有些人則不然；但每個流亡者都知道，文化和藝術在第三帝國治下所面臨的困境，將比他們中的多數人在國外所遭遇的任何困難都嚴峻得多。

有一部新劇生動地展示了等待著那些1933年之后留在德國的藝術和文化愛好者的是什么。此劇是應希特勒的要求而獻給他的，于1933年4月20日希特勒生日那天在柏林的國家劇院首演，希特勒和戈培爾等納粹頭目觀看了演出。在舞臺上擔綱主演的包括：不久將成為第三帝國時期德國電影界臺柱子之一的法伊特·哈蘭（Veit Harlan）；還有當紅男演員阿爾貝特·巴塞曼（Albert Bassermann），他出演此劇僅僅是因為對戈培爾本人的邀請感到盛情難卻；以及赫爾曼·戈林所愛慕的年輕女演員埃米·松內曼（Emmy Sonnemann），她不久后成為戈林的第二任妻子。這出愛國劇結束時，觀眾沒有鼓掌，而是全體起立，齊唱《霍斯特·韋塞爾之歌》，唱畢才開始鼓掌，全體演員在掌聲中一再行納粹禮，只有巴塞曼例外，他以傳統的謝幕方式把雙臂交叉在胸前向觀眾鞠躬。巴塞曼出身名門，是自由派政治家的子弟，與新政權格格不入。他娶了猶太女演員埃爾澤·席夫（Else Schiff），于1934年攜妻移居美國。此劇是《施拉格特》（Schlageter），劇本改編自1920年代初下萊茵區民族主義者起義反抗法國占領者的故事。作者是一戰老兵、表現主義劇作家漢斯·約斯特（Hanns Johst），他在1920年代晚期逐漸趨向納粹黨的立場。他的表現主義手法可見于終場時別出心裁的一幕：行刑隊從舞臺深處向被綁著的施拉格特射擊，槍管發出的光線從他的心臟處穿過，徑直投向觀眾席，使觀眾與施拉格特一起成為法國鎮壓的受害者，以此喚起觀眾對該劇關于流血與犧牲的納粹主題的認同感。[[59]](#59_5)

此劇很快爆得大名，其原因與首映禮上納粹黨的浮華排場無關。由于它得到了高調的宣傳，因此人們普遍認為它代表了納粹黨對文化的態度。無論是去觀看此劇還是從報刊上閱讀關于它的文章，人們普遍注意到，主要人物之一、由法伊特·哈蘭扮演的弗里德里希·蒂曼（Friedrich Thiemann）拒絕接受一切知識和文化的觀念和概念，他在與學生施拉格特爭論的幾幕戲中說，為了民族的利益，知識和文化應該被鮮血、種族和犧牲取代。蒂曼在其中一幕爭論戲里說：“一聽到‘文化’這個詞，我就拉開勃朗寧手槍的保險栓！”[[60]](#60_5)對許多有教養的德國人來說，這似乎概括了納粹黨對藝術的態度。這句臺詞迅速傳開，完全脫離了它原來的語境。不久，這句臺詞就在轉述過程中被說成出自這位或那位納粹頭目（主要是赫爾曼·戈林）之口，并且被簡化為更加朗朗上口、改頭換面但一再被引用的表述：“一聽到文化這個詞，我就掏槍！”[[61]](#61_5)

[\*](#_258) Kramer，德文意思是小商販，斤斤計較的人。

## 第三節 “打倒非日耳曼精神”

### 一

馬丁·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是魏瑪共和國最后幾年里德國最著名的哲學家，為他贏得巨大聲望、使之被奉為思想家的，主要是1927年出版的巨著《存在與時間》（Being and Time），這部專著闡述了哲學的基本問題，比如存在的意義與人性。此書深奧難懂，行文之晦澀常常令人生厭，它運用埃德蒙德·胡塞爾（Edmund Husserl）的現象學方法來解釋困擾著古希臘以還的哲學家的問題，胡塞爾是他的老師和弗賴堡大學哲學系的前任系主任。此書一出即被譽為經典。在后來的歲月里，海德格爾的思想對法國的存在主義哲學家及其追隨者產生了重大影響。但此書的悲觀氣質更為直接地表明，海德格爾已逐漸從天主教思想中解放出來（他1889年生于天主教家庭），轉向一種更受新教思維方式影響的思考模式。尤其到魏瑪共和國末期，海德格爾逐漸相信有必要重建德國人的生活與思想，開啟精神團結與民族救贖的新時代。到1930年代初，海德格爾開始認為自己已在國家社會主義里找到了他所尋覓的答案。[[62]](#62_5)

海德格爾在1932年已暗中與弗賴堡的國家社會主義德意志學生同盟的領軍人物建立了聯系。他毫無大學管理經驗，但在納粹黨掌權之后，教授中的一小群納粹黨員認為校長職位非他莫屬；海德格爾的學術聲望和政治信仰，也使他成為取代預定于1933年4月就任校長之職的自由派教授威廉·馮·默倫多夫（Wilhelm von Möllendorff）的合適人選。海德格爾渴望得到這個職位，遂與剛剛納粹化了的巴登教育部接洽；而默倫多夫則迫于本地和地區級報紙對他進行的人身攻擊而選擇退出。納粹教授們推舉了海德格爾，在大學內外共同施壓之下，他獲得了幾乎全體教授的支持票，于1933年4月21日正式當選為校長。實際上，在弗賴堡大學的93位教授中，有12位猶太人，他們是僅有的不支持海德格爾的教授陣容，但他們無法參加投票，因為巴登地區的帝國行政長官、納粹黨支部書記羅伯特·瓦格納（Robert Wagner）援引4月7日頒布的法律，已將他們作為“非雅利安人”予以停職。[[63]](#63_5)

5月27日，海德格爾發表校長入職演說。他對匯聚一堂的教授和身穿褐衫的納粹要員宣告：“‘學術自由’將不再是德國大學生活的準則，因為這不是真正的自由，因為它只起消極作用。它意味著缺乏關懷、觀點武斷、主觀傾向性明顯、行事首鼠兩端。”他說，時代要求大學在德意志民族中尋找精神支柱，在德意志民族此時正履行的歷史使命中發揮自己的作用。德國學生正在做開路先鋒。海德格爾的演講充斥著“領袖原則”的新式語言，開篇頭一句就對聽眾說他接任了“這所大學的精神領袖”，并且借用封建用語“侍從”指代學生和教師，這與納粹頭目當時在勞資關系方面的普遍做法如出一轍。從新校長使用的上述概念可以清晰地看出，學術自由（無論它的定義是什么）確實已成往事。[[64]](#64_5)為了用有象征意義的方式強調這一點，在典禮結束時，與會的教授和來賓齊唱《霍斯特·韋塞爾之歌》，典禮節目單背面印著歌詞，并且提示唱到第四段時應該舉起右手，唱畢應高喊“勝利萬歲”（Sieg Heil!）。[[65]](#65_5)

海德格爾不久就著手把弗賴堡大學納入一體化進程。他已于5月1日“勞動節”那天在媒體的大力宣傳中正式加入納粹黨，此時又在大學管理中采用領袖原則，繞開或者壓制大學里那些按照民主代議制運作的團體，并且參與起草巴登地區的一部新法律，該法規定校長為不經選舉產生、不限任期的大學“領袖”。不久，他知會巴登教育部：“我們現在必須投入全部力量征服智識階層和學術界，使之支持國家政治的新精神。這場交鋒將不會輕松。勝利萬歲！”[[66]](#66_5)海德格爾用不實的指控向州政府告發了同事、化學家赫爾曼·施陶丁格（Hermann Staudinger），并協助政治警察調查他，不過警察最終沒有采信這些指控，而且施陶丁格申辯說自己的工作對國家具有重要意義，遂得以留任。海德格爾還樂于執行解聘大學教師中猶太人的規定，僅要求對兩位國際知名的學者網開一面：一位是語文學家愛德華·弗倫克爾（Eduard Fraenkel），但他還是被解雇了；另一位是化學教授格奧爾格·馮·海韋西（Georg von Hevesy），他擁有廣闊的國際人脈，是洛克菲勒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巨額研究資金的接受人，他得以留任，直至翌年移居丹麥。那些被迫與大學斷絕關系的猶太人包括海德格爾的助手維爾納·布羅克（Werner Brock）和導師埃德蒙德·胡塞爾，有人說海德格爾親自下令禁止弗賴堡大學圖書館保存胡塞爾的著作，但這個一再被轉述的故事并無根據。胡塞爾是一位愛國的民族主義者，其子在一戰中陣亡，他認為自己與海德格爾之間有私誼，因此對自己受到的待遇深感失望。他在5月4日寫道：“唯有未來可以對此做出評判：在1933年，何處是真正的德國，誰是真正的德國人——是那些贊同如今大行其道的、或多或少帶有唯物主義虛無感的種族偏見的人，還是那些心地純良、思想純正的德國人，即德國偉大先賢的傳人，他們尊敬并傳承著先賢的傳統。”[[67]](#67_5)胡塞爾于1938年去世時，海德格爾沒有參加葬禮。[[68]](#68_5)

海德格爾加入了四處蔓延、迅速升溫的希特勒崇拜，他告訴學生們：“元首，唯有元首本人，才是現在與未來的德國現實，以及德國的法律。請記住：從今以后，遇事要有決斷力，行動要有責任感。希特勒萬歲！”[[69]](#69_5)他的雄心甚至膨脹到試圖與志趣相投的其他大學校長合作，從而成為全國大學體系中的領軍人物。在1933年6月30日的演講中，他抱怨“民族革命”尚未觸及多數大學，鼓勵海德堡大學的納粹學生發動一場激烈的運動，驅逐校長、保守派歷史學家維利·安德烈亞斯（Willy Andreas）。在一個星期后的7月8日，安德烈亞斯被納粹黨人選威廉·格羅（Wilhelm Groh）取代。[[70]](#70_5)但海德格爾毫無政治經驗，很快陷入大學里司空見慣的關于聘任事務的糾葛，不敵巴登教育部官僚的手段，遭到了褐衫學生的嘲笑，他們認為海德格爾不過是個空想家而已。

在柏林有報道顯示，到1934年初，海德格爾已確立了其“國家社會主義哲學家”的地位。但在納粹思想家看來，海德格爾的哲學過于抽象難懂，似乎用處不大。他在同事中間擁有廣泛的影響力，是因為他倡導重新關注知識與真理的基本價值，進而主動把德國的大學生活與國民生活重新聯結起來。這一切聽起來非常宏大。盡管他的介入受到了許多納粹黨徒的歡迎，但細究起來，他的想法與納粹黨的目標似乎并不真正合拍。難怪他的敵人能夠爭取到阿爾弗雷德·羅森貝格的支持，羅森貝格本人的志向就是成為國家社會主義哲學家。校園政治的瑣屑在海德格爾看來，可悲地顯示出大學里所缺失的正是他希望彌漫于校園的那種新精神，他對這種瑣屑越來越厭倦，加之無緣發揮國家級作用，海德格爾遂于1934年4月辭職，但他繼續支持第三帝國，始終拒絕反思自己在1933—1934年的所作所為，直至1976年去世仍不肯為此道歉。[[71]](#71_5)

### 二

納粹領導層在各大學行事較為便利，因為不同于有些國家，德國的院校全部由國家出資，大學教師都是公務員。因此他們直接受1933年4月7日法律的影響，該法律規定開除政治上不可靠的政府雇員。到1933—1934學年開始時，編制內的7,758名大學教師中共有1,145人被解聘，占總人數的15%，其中包括313位教授。在柏林和法蘭克福，解聘比例達到近三分之一。截至1934年，5,000名大學教師中約有1,600人被迫離職。被解職的教師多數是出于政治原因，大約三分之一是由于被歸類為猶太人而被解聘。[[72]](#72_5)學術界出現了移民潮，15.5%的大學物理教師移居國外，在哥廷根大學（Göttingen University），辭職或者被辭退的物理學家和數學家人數之多，已到了嚴重影響教學的程度。[[73]](#73_5)而且，離職者通常比留任者優秀；針對大學中生物學家所做的一項研究顯示，根據1945—1954年的科學論文引用標準指數，45位活到二戰后的離職者人均被引用130次，而292位幸存的留任者的相應數據僅為42次。[[74]](#74_5)

世界知名的科學家，如果本人或妻子有猶太血統，或者公開批評納粹黨，都被逐出了德國的大學和研究所，包括20位曾經的或者后來的諾貝爾獎得主，其中有阿爾伯特·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古斯塔夫·赫茲（Gustav Hertz）、埃爾溫·薛定諤（Erwin Schrödinger）、馬克斯·玻恩（Max Born）、弗里茨·哈伯（Fritz Haber）和漢斯·克雷布斯（Hans Krebs）。愛因斯坦已在柏林工作20年，他的相對論為現代物理學帶來了突破性進展。1933年1、2月份在美國訪問期間，他從遙遠的異國譴責了國會縱火案之后納粹黨的殘暴行徑。作為報復，納粹政府沒收了他的財產，同時，教育部要求普魯士科學院（P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驅逐他。愛因斯坦在被逐之前主動辭職，招致一場公開叫罵，科學院指責他在國外散布關于暴行的傳言。他再度赴美，余生在普林斯頓大學度過。[[75]](#75_5)愛因斯坦于5月30日寫信給他的同事、同樣流亡國外的馬克斯·玻恩說：“我想你是知道的，我對德國人從來沒有特別的好評（就道德和政治層面而言）；但我必須承認，他們的殘忍和怯懦程度還是讓我吃驚不小。”[[76]](#76_5)

化學家弗里茨·哈伯不具備愛因斯坦那種和平主義和國際主義的秉性，實際上，他是1914—1918年研發毒氣作為戰爭工具的主要負責人。他雖是猶太人，但因其在戰爭中的貢獻而免于被解聘。然而，許多猶太裔同事被他供職的研究所解雇，促使哈伯于1933年4月30日辭職，并公開聲明說他不需要別人來告訴他應該選擇與誰合作以及不該與誰合作。哈伯離開德國前往劍橋大學，在那里過得并不如意，于翌年去世。[[77]](#77_5)上述這類知名人物的流失，在德國科學界令許多人深感憂慮。非猶太裔的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于5月當面向希特勒提出了抗議，他也是著名科學家，當時已成為德國首要科研機構威廉皇帝學會（Kaiser Wilhelm Society）的主席。普朗克后來回憶道，希特勒對他大談了一番猶太人全是一丘之貉的道理：“猶太人全是共產黨，這些人是我的敵人……猶太人都愛抱團。不管在哪兒，只要有一個猶太人，各類猶太人就會立即聚攏過來。”[[78]](#78_5)

有些猶太裔科學家與哈伯一樣，按照一戰猶太老兵的特殊待遇本可以留任，但他們公開抗議其他猶太裔科學家所受的待遇并且選擇辭職，其中包括諾貝爾獎得主、哥廷根大學的實驗物理學家詹姆斯·弗蘭克（James Franck），他在一封由42位大學同事（其中僅有一位來自物理學與數學領域）簽署的集體抗議信上簽了名，為此被指控從事破壞活動，無奈之下離開德國赴美工作。海德堡大學醫學系對猶太同事遭到解雇的反應備受矚目，因為它實在非同凡響：在1933年4月5日發表的致巴登教育部的正式聲明中，系主任里夏德·西貝克（Richard Siebeck）指出猶太人對于醫學所做的貢獻，批評了無視大學的自主權和責任感的“沖動型暴力措施”。[[79]](#79_5)西貝克及其醫學系同仁的例子基本上后無來者。那些留任的非猶太裔科學家中的大多數，以馬克斯·普朗克為首，盡力在科學研究上保持正直和政治中立，只在口頭上敷衍納粹政權。普朗克開始安排在威廉皇帝學會的會議上行納粹禮、向希特勒致敬，以此規避進一步的清洗。物理學家維爾納·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因在量子力學領域取得的進展而獲得諾貝爾獎，他認為重要的是留在德國，以保持科學價值的完整。然而不久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們是在進行一場注定失敗的戰斗。[[80]](#80_5)

多數德國教授留住了職位，其中絕大多數在政治立場上屬于保守派，他們大致認同希特勒的合作伙伴民族黨的觀點，即認為魏瑪民主制度是一場災難，早就應該恢復舊帝國的統治集團和等級結構了。但許多人超越了此立場，積極擁護國家社會主義政府，尤其是人文和社會科學領域的教師。3月3日，約300位大學教師聯名發表呼吁書，號召選民支持納粹黨；5月，不少于700位大學教師在一份呼吁書上簽名，支持希特勒和國家社會主義政府。海德堡大學的社會學家阿諾爾德·貝格施特雷瑟（Arnold Bergsträsser）闡釋了納粹政權把國家與社會合二為一的正當性，說這種方式可以克服民主制度顯而易見的缺陷。法律系的律師瓦爾特·耶利內克（Walter Jellinek）為1933年的“革命”辯護，說它反對的是自由派，而不是民主派，并且指出，公民只有服從政府，才可能獲得完整的人類尊嚴。作為德意志人民黨黨員、強烈反對魏瑪共和國的右翼人士，耶利內克認為政府的反猶措施是必要的，因為學術界已人滿為患。他還認為（這預先道出了后來的史家觀點），希特勒的權力將由于帝國內部其他權力中心的存在而受到限制。這在其他方面或許是事實，但在對待猶太人的政策上卻并非如此。耶利內克本人就是猶太裔，他恰恰是在自己所熱烈擁護的民族主義革命進程中被依法解除了教職。同系的其他教授提出，法律應該表達人民的心聲，法官應該根據納粹思想做出裁決。德語教授宣稱，納粹革命為德語學習賦予了愛國的新意義。他譴責“猶太思維”和“猶太文學”損害了德國的“生存意志”。[[81]](#81_5)

很快，剛剛納粹化了的各地教育部不僅針對聘任事務，也針對教學與研究制定了政治標準。帝國教育部長伯恩哈德·魯斯特把這方面的權力統統把持在自己手中。巴伐利亞州文化部長1933年在慕尼黑對匯聚一堂的教授們說：“從今以后，需要你們做出判斷的，不是某事真實與否，而是它符不符合國家社會主義革命的利益。”[[82]](#82_5)納粹頭目既不關心傳統的教學與研究自由，也不關心傳統的大學價值。實際上，他們對科學本身并不關心。法本公司董事會主席、諾貝爾獎得主、化學家卡爾·博施（Carl Bosch）于1933年夏面見希特勒，當他抱怨驅逐猶太裔教授的做法損害了德國的科學利益時，遭到了無禮的對待。博施說，物理學領域的解聘比例特別高，占被逐大學教師的26%，其中包括11位諾貝爾獎得主，化學領域亦然，比例高達13%，這嚴重削弱了德國科學界的實力。希特勒粗魯地打斷了老科學家，說自己對此毫不知情，況且德國根本用不著物理學和化學也能在未來的百年里繼續取得進步，然后按鈴喚來副官，對他說博施要告辭了。[[83]](#83_5)

### 三

在大學里推動一體化進程的主要是學生。學生們組織輿論戰，在本地報紙上抨擊不合時宜的教授，成群結伙地在他們的課堂上搗亂，帶領沖鋒隊小分隊搜查和突襲他們的住宅。還有一個招數用來反襯某些教授在政治上的不可靠，就是安排客座講座時邀請政治正確的人物，比如海德格爾，他保準會對納粹政權表示熱烈擁護，而別人不見得每次都有這樣的表現。在海德堡大學，有位納粹積極分子指揮沖鋒隊在物理學家瓦爾特·博特（Walter Bothe）的研究所樓頂、他辦公室的正上方長時間地走隊列，以此干擾他的工作。[[84]](#84_5)在一所又一所大學里，受人尊敬的校長和資深行政人員遭到排擠，取而代之的往往是平庸人物。這些人之所以上位，僅僅因為他們是納粹黨員而且受到納粹學生組織的支持。其中的典型人物是恩斯特·克里克（Ernst Krieck），他是堅信男性至上論的納粹理論家，于1933年成為法蘭克福大學的校長。在突然升遷之前，他一直在法蘭克福市一所師范大學講授教學法，是個無足輕重的教授。[[85]](#85_5)在達姆施塔特工業大學（Darmstadt Technical University），兼職講師卡爾·利澤爾（Karl Lieser）于1933年初入黨，因在5月份向黑森州教育部檢舉許多同事而激怒了他在建筑系的同事們；大學理事會對這種行徑感到憤慨，取消了利澤爾的教師資格，請求教育部開除他，并且暫時關閉大學以示抗議。然而第二天，學生們重新打開學校大門，占領了教學樓，與此同時，教育部任命達姆施塔特市市長為代理校長。教授們在這種壓力下屈服了。利澤爾復職，1934年成為教授，并于1938年升任校長。德國各大學都發生了類似事情，這些事件標志著教授群體驟然失去了傳統的權力。萊比錫的納粹學生領袖愛德華·克勒姆特（Eduard Klemt）宣布：“大學已經在咱們手里啦，可以按我們的意思辦事了。”[[86]](#86_5)

各地的學生會沒有滿足于推進教授群體的納粹化，他們還要求正式參與教授的選聘事務，要求在紀律委員會中取得代表資格。然而事實證明，這一步越界了，相當愚蠢，因為學生團體參與此類事務有悖于大學的領導原則。到1933年夏，納粹化了的教育部和大學當局開始壓制學生的騷亂：禁止學生把令他們反感的書籍移出圖書館并銷毀；阻止了全國學生會在每座大學城搭建一個頸手枷的計劃，學生們原打算把“非日耳曼”教授的出版物釘在頸手枷上。1933年上半年里的大規模干擾和暴力行為幾乎使大學生活陷入癱瘓，但在此期間并無學生因政治性騷亂行為而真正受到紀律處分。不過，當局的態度此時已經明朗：普魯士教育部宣布，學生會有責任“讓每位成員遵守秩序和紀律”。[[87]](#87_5)然而，學生們在此之前對知識自由和學術自主權進行的暴戾打擊已經震驚世人、惡名遠播，現在只要人們反思納粹主義，就會想起此事。

1933年5月10日，德國學生在全國的19座大學城組織了一場“打倒非日耳曼精神的行動”。他們編制了一份“非日耳曼”圖書清單，把那些書從他們所能找到的各種圖書館里搜出來，堆在公共廣場上點火焚燒。約瑟夫·戈培爾應學生們之邀參加了柏林的焚書行動，他稱之為一場“有力的、偉大的、有象征意義的行動”，并告訴學生們，他們“把以往的邪惡精神付之一炬，做得好”。[[88]](#88_5)書籍被一本接一本扔進知識的火葬柴堆，同時伴著諸如此類的口號：“維護民族共同體和理想主義世界觀，打倒階級斗爭論和唯物主義——燒掉馬克思、考茨基（Kautsky）；維護家庭和國家的紀律與道德，打倒頹廢墮落和道德腐朽——燒掉海因里希·曼、恩斯特·格萊澤（Ernst Glaeser）、埃里希·克斯特納（Erich Kästner）。”弗洛伊德的著作被焚，是因為“貶損地夸大了人的動物性”；通俗歷史學家和傳記作家埃米爾·路德維希（Emil Ludwig）的作品被焚，是因為“貶低”了德國歷史上的“偉大人物”；激進的和平主義記者庫爾特·圖霍爾斯基和卡爾·馮·奧西茨基的著作被焚，是因為“傲慢和自負”。焚書清單中的一個類型專門留給了埃里希·瑪麗亞·雷馬克，他的批判小說《西線無戰事》被付之一炬的理由，是為了“維護關于戰備意識的國民教育，打倒那些背叛了一戰將士的文學作品”。除了上述排比句口號所列的作品，還有許多書也被焚燒。為配合這場行動，全國學生組織發表了“12篇打倒非日耳曼精神的論文”，要求推行審查制度、清洗圖書館，并且宣布：“我們的對手是猶太人以及一切服從于他們的人。”[[89]](#89_5)

作為這場行動的前奏，3月12日，沖鋒隊洗劫了位于海德堡市中心的工會圖書館，搬出圖書，在門外的一個小火堆中焚燒。這場焚燒馬克思主義書籍、打倒馬克思主義思想的行動基本上是自發的，并無直接后果和后續行動。然而與之相比，5月10日的焚書行動在規模上則大得多，準備工作也全面得多。學生們從4月中旬開始仔細搜索各家圖書館和書店，為這場焚書做足了準備。行動期間，學生們脅迫各家書店在櫥窗上張貼海報宣傳此事，有些書商勇敢地予以拒絕，但許多書商則屈從了。海德堡市的焚書發生于5月17日，在沖鋒隊、黨衛隊和“鋼盔”以及學生決斗隊成員的配合下，學生們舉著燃燒的火把，把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的徽章和書籍一起扔進火中，一邊高唱《霍斯特·韋塞爾之歌》和國歌。在現場演講的人把焚書行動描述為對“非日耳曼精神”的一次痛擊。代表“非日耳曼精神”的作家包括統計學家埃米爾·尤利烏斯·貢貝爾，他曾統計了魏瑪時期右翼陣營所犯的謀殺案，1932年夏被迫放棄在大學的教席。魏瑪共和國曾經接納了這種“猶太顛覆”精神，現在它終于被打發進了歷史。[[90]](#90_5)

這一切標志著數星期前由宣傳部在各地發動的“打倒非日耳曼精神”行動達到了高潮。[[91]](#91_5)像第三帝國史上經常發生的那樣，表面上自發的行動，實際上是統一協調的，但這次的協調者不是戈培爾，而是全國學生會。為了便于行動，負責清洗柏林公共圖書館的納粹干部提供了一份焚書清單，全國學生會的總部擬定并下達了行動時使用的口號。納粹學生組織用這種辦法，確保了在所有大學城開展的焚書行動采取大致相似的方式。[[92]](#92_5)而且在全國各地，有學生帶頭的地方，其他人就跟著干。例如，在小鎮新伊森堡（Neu-Isenburg）1933年的夏至慶祝活動上，一大群人在消防站背后的空地上圍觀高高堆起的“馬克思主義”文學作品被焚燒，當地的女子體操俱樂部成員繞著火堆跳舞，當地的納粹黨支部書記發表演說，然后聚集的群眾高唱《霍斯特·韋塞爾之歌》。焚書行動的參與者絕不限于高校學生。[[93]](#93_5)



地圖18　1933年的德國大學

納粹的焚書行動刻意模仿了一次先例。1817年10月18日，圖林根的瓦爾特堡（Wartburg）舉行了宗教改革300周年慶典，紀念馬丁·路德發表抨擊天主教會的論文、揭開宗教改革的序幕。在當天慶典的尾聲，持激進民族主義立場的學生們把權威的象征以及《拿破侖法典》（Code Napoléon）等“非德意志的”書籍投入火堆，象征著執行火刑。這次行動也許為德國民族主義者的一系列示威活動提供了先例，但其實與后來模仿它的1933年行動基本上沒有共同之處，因為瓦爾特堡紀念活動主要關心的是表達對波蘭的支持、聲援德國的新聞自由——梅特涅親王創立的警察制度所實行的大規模新聞審查限制了報界的自由。不過，1933年5月10日，在剛剛納粹化了的大學當局的鼓勵或縱容下，當烈焰在德國歷史悠久的學府騰空而起的時候，肯定有不少人想起了詩人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一個世紀前對瓦爾特堡事件的評論：“在焚書的那個地方，最終也將有人被焚。”[[94]](#94_5)

### 四

1933年初的幾個月里，在納粹以暴力、恐嚇和野蠻手段打擊公民社會的過程中，有一個特殊的小群體遭受到特別強烈的仇視和敵意：德國猶太人。這既不是因為他們像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那樣屬于納粹黨的勁敵，也不是因為需要脅迫他們像其他政治組織和社會團體一樣，融入納粹迅速建立一黨獨裁政權的進程。納粹對猶太人的攻擊有著相當不同尋常的特點。把猶太人逐出普魯士藝術學院等重要的文化機構、大型交響樂團、藝術學校和博物館，觸目驚心地顯示出，納粹把猶太群體視為外來的非日耳曼精神的主要淵藪，把驅逐猶太人視為一場可以使德國恢復“日耳曼民族性”的文化革命的組成部分。“反猶主義”與“猶太人在德國社會的真正作用和地位”之間，一向僅有非常牽強和間接的關系，多數猶太人過著無可指摘、循規蹈矩的生活，總體而言在政治上頗為保守。但是納粹黨剛剛上臺，猶太人就開始感受到沖鋒隊傾瀉而出的積恨。實際上，褐衫軍早在1932年秋就對猶太人的商店和企業、猶太會堂等場所實施了一系列炸彈襲擊。希特勒被任命為總理之后的數星期里，沖鋒隊闖入猶太會堂，褻瀆宗教用具；砸碎猶太商店的櫥窗；隨意羞辱猶太人，剃掉他們的胡子，或者效仿意大利法西斯分子發明的懲罰措施，強迫他們喝下大量蓖麻油。[[95]](#95_5)3月5日選舉之后，暴力達到了新水平。選帝侯大街（Kurfürstendamm）是柏林的時尚購物街，許多納粹黨徒視之為猶太人喜歡聚集的區域。選舉后第二天，褐衫軍團伙沿著這條街橫沖直撞，搜尋猶太人，毆打他們。在布雷斯勞，一伙沖鋒隊員綁架了劇院的猶太裔導演，用橡皮棍和狗鞭打得他差點兒喪生。在東普魯士的柯尼斯堡，一座猶太會堂被焚燒，一位猶太商人被劫持、狂毆，后來重傷而死。成群結伙的沖鋒隊員在許多地方涂抹、封鎖猶太人的商店。[[96]](#96_5)

在布雷斯勞，沖鋒隊員于3月11日襲擊了法院大樓的猶太裔法官和律師。各法庭休庭三天，等到重新開庭時，迫于褐衫軍的壓力，法院院長裁定，僅允許此前在布雷斯勞執業的364名猶太裔律師中的17人進入法院大樓。沖鋒隊員在德國全境沖擊法庭，把正在庭審的猶太裔法官和律師拖走，毆打他們，不許他們再出庭。這些行動造成的擾亂，連希特勒也覺得過于嚴重，他在3月10日要求停止這種“個人行為”，以免擾亂公務或者損害經濟。關于這個問題，他已收到包括帝國銀行在內的重要商業機構的投訴。希特勒還親自強令萊比錫的納粹黨頭目取消了以揪出猶太裔律師為目標的突襲帝國法院計劃。[[97]](#97_5)但帝國法院以下的各級法院就是另一碼事了，他未加干預。納粹報刊繼續發表瘋狂的煽動文章，要求清洗司法界的猶太裔專業人士，支持此事的請愿書潮水般涌向帝國司法部，它們來自“民族主義”律師團體。事實是，盡管對猶太商店和企業的襲擊使希特勒在聯合政府中的民族黨伙伴感到不安，然而對猶太律師的攻擊卻基本上沒有引起不安。在司法界，極少有人抵制這種攻擊行為，或者說無人抵制，就連不贊成這種做法的人也不曾抵制。見習法官雷蒙德·普雷策爾正坐在柏林法院的資料室里，褐衫軍沖進了大樓，高聲驅逐所有猶太人。“有個褐衫軍走到我的桌前，”他后來回憶道，“‘你是雅利安人嗎？’我來不及多想，應聲說：‘是。’他湊上來端詳我的鼻子，然后走開了。血涌上我的面頰，我感到了恥辱和挫敗，剛才太遲鈍了……用那樣的回答換取留下來安靜查閱文件的權利，真丟臉！”[[98]](#98_5)

希特勒的干預僅僅使一系列暴力事件暫時有所減少，卻根本未能全面制止。剛過兩個星期，它們又開始了。1933年3月25日，來自外地的30名沖鋒隊員闖入西南部的下施泰滕（Niederstetten）的猶太人住宅，把里面的成年男子拉到市政廳，用幾乎不加控制的殘暴手段毆打他們；同日上午，在附近的小鎮克雷格林根（Creglingen），類似的事件導致18位遭到毆打的猶太裔男子中的2人死亡。在威斯巴登（Wiesbaden），成群結伙的青年砸碎猶太商店的櫥窗。下巴伐利亞的地方官在3月30日匯報：

本月15日清晨，快6點的時候，一輛卡車載著幾個身穿深色制服的人出現在猶太商人奧托·澤爾茨（Otto Selz）位于施特勞賓（Straubing）的住宅前。還穿著睡衣的澤爾茨被帶出家門，塞進卡車綁走。大約9點半，澤爾茨在蘭茨胡特區的翁格（Weng）附近的樹林里被發現，已被擊斃……幾個村民說，看見卡車上的人當中有一些佩戴著紅色卐字袖標。[[99]](#99_5)

希特勒的干預表明，這些事件并不是任何已成型計劃的組成部分，而是表達了各級納粹黨徒內心對猶太人的仇恨、憤怒以及暴力傾向。沖鋒隊的暴虐，在此之前主要是針對帝國國旗團和紅色陣線戰士同盟，但此時因納粹黨的勝選而得到全方位釋放。既不受制于警方的干涉，也不受司法檢控的真正威懾，于是納粹黨徒在襲擊猶太人的行動中盡情泄憤。雖然納粹領導層希望控制住暴力，但他們的實際做法卻是在不斷推波助瀾——他們不但把反猶情緒宣之于口，還讓由尤利烏斯·施特萊歇爾的《沖鋒報》領銜的納粹報刊持續刊登反猶文章。[[100]](#100_5)據一份顯然不完全的估計，截至1933年6月底，納粹沖鋒隊已殺害43名猶太人。[[101]](#101_5)

這些事件在境外并非無人關注。外國報紙駐柏林的記者報道說，看見被打得失去知覺的猶太人躺在柏林的街上，鮮血順著他們的臉頰流下來。批評性報道出現在英國、法國和美國的報刊上。[[102]](#102_5)3月26日，保守派外交部長馮·諾伊拉特對美國記者路易斯·P. 洛克納（Louis P. Lochner）說，境外的“暴行宣傳”讓人想起關于德軍1914年所犯暴行的比利時傳言，它很可能是一場用假消息攻擊德國政府的協同行動的組成部分；而革命注定要伴隨著“某些越軌行為”。與諾伊拉特不同，希特勒本人公開把這些報道描述為“猶太人用暴行故事進行的誹謗”。同日在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與戈培爾、希姆萊和施特萊歇爾開會時，希特勒決定把基層黨員的反猶干勁引導為一場協同行動。3月28日，他下令各級黨組織做好準備，在4月1日對猶太人的商店和企業實施一場抵制行動。這場行動在第二天獲得了內閣的批準。[[103]](#103_5)抵制行動遠非出于一時沖動而對國外“暴行宣傳”的一次迅速回應，而是納粹黨內人士，尤其是那些最敵視“猶太”大企業（例如百貨商店和金融機構）的人籌劃已久的。納粹頭目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認為，歐洲的猶太人與美國的猶太人之間有著一致的利益，甚至陰謀的勾結，但這種關聯實際上并不存在。在用于發表的日記中，戈培爾寫道，有必要讓猶太人知道，“我們決心已定，絕不罷手”。[[104]](#104_5)

納粹上述說法的不屬實，在這件事情上得到了展示：猶太教德國公民中央協會拍電報給紐約的美國猶太人委員會，要求它取消“敵視德國的示威活動”，結果遭到斷然拒絕，盡管美國的猶太群體對此存在意見分歧。美國許多城市在3月27日舉行抗議集會，隨后開展了抵制德國貨的運動，此運動在4月1日之后的幾個月里取得了越來越大的成功。[[105]](#105_5)這反倒使戈培爾越發認為應該“以最強硬的態度”抵制猶太人的商店和企業。“如果外國停止詆毀，那么我們的抵制行動就會停止，”他繼續寫道，“否則，殊死的斗爭將會展開。現在，德國的猶太人必須對他們在全世界的同種族同志們施加影響，以免他們在這里吃苦頭。”戈培爾于4月1日驅車穿越柏林，巡視抵制行動的進展，他說自己滿意極了：“猶太商店全部關閉。沖鋒隊哨兵站在店門前。公眾表示一致支持。一派嚴守紀律的景象，堪為楷模。壯觀的場面！”使場面更加壯觀的，是下午“15萬柏林工人”反對“外國詆毀”的大規模示威活動，以及傍晚10萬希特勒青年團團員的分列式。戈培爾滿意地寫道：“群情激憤，不可名狀……抵制是德國在道義上的一次偉大勝利。”他確實覺得獲得了大勝，以至于第二天就得意地寫道：“外國逐漸恢復了理智。”[[106]](#106_5)

幾個月后當戈培爾的這部分日記發表時，讀到它的德國人卻明白這是從納粹的視角對4月1日的局面所做的樂觀描述。當然，沖鋒隊員非常活躍，他們到處張貼醒目的海報告訴人們：“不要在猶太人的小店和百貨商店買東西！”命令人們不要找猶太裔律師和醫生，并且告訴人們這樣做的所謂理由：“猶太人正在國外詆毀我們。”一輛輛卡車上貼著類似的海報、滿載著沖鋒隊員在街道上飛駛而過，黨衛隊和“鋼盔”小分隊氣勢洶洶地站在猶太零售商店的門外，要求每一位進店購物的人出示身份證件。許多非猶太商店張貼海報，宣明自己是“得到認可的日耳曼裔基督徒的商號”，這樣做僅僅是為了避免誤會。納粹領導層已經向沖鋒隊做了重要指示：這場針對猶太人的行動將由中央統一協調，沖鋒隊不得擅自施行暴力。4月1日執行抵制任務的大多數沖鋒隊員確實避免了嚴重擾亂治安，其行為保持在威脅和恐嚇的級別。那天，商店本身似乎極少受到真正的物理破壞，但許多地方的褐衫軍在商店櫥窗上涂抹了標語，有幾個地方的褐衫軍忍不住砸碎玻璃窗、搶劫商品、逮捕反對者，或者揪出猶太店主，押著他們游街，在他們體力不支而倒下時又毆打他們。[[107]](#107_5)

人們聚集在被抵制的商店門外圍觀。但與納粹報刊的報道相反，人們并沒有表現出對猶太人的憤怒，而是大多保持消極和沉默。在一些地方，包括慕尼黑的兩家百貨商店，市民甚至舉行了反對抵制的小型示威活動，其中有些人佩戴著納粹黨徽，他們試圖穿過門口的褐衫軍哨兵。在漢諾威，下定決心的購物者試圖強行進入猶太商店。但在多數地方，基本上沒人能夠進入。至少就此而言，抵制行動是成功的。另一方面，有些小鎮根本沒有實行抵制。每個地方都有許多猶太店主干脆停業，以避免不愉快的事情。事先收到抵制行動的通知后，許多人急忙在前一天跑到猶太商店買東西，這讓納粹報刊大為光火。抵制行動的前一晚，有人在電影院聽見一位年輕士兵和他的女友爭論該怎么做。他說：“確實不該買猶太人的東西。”她回答：“不過他們的東西實在太便宜了。”他答：“可是質量不怎么樣，用不了多長時間。”“才不是呢，”她反駁道，“他們的東西和基督徒店里的東西一樣好，用的時間也一樣長，而且他們的東西要便宜得多。”[[108]](#108_5)

只有小商店和小企業遭到了抵制；最大的猶太企業多年來一直是納粹黨徒的首要謾罵對象，此次沒有成為抵制的目標，是因為它們對國民經濟具有重要作用，還因為它們是大雇主，假如抵制行動對它們的經濟地位造成嚴重影響，它們將被迫裁員。僅蒂茨連鎖百貨商店就有14,000名雇員。出版業巨頭烏爾施泰因公司中的納粹雇員組織指出，盡管該公司免于遭受抵制，但它的出版物大量被禁，導致“全國的好同志”有許多遭到解雇，納粹政權的政策對經濟造成的危害由此可見一斑。[[109]](#109_5)這一切說明，抵制行動遠沒有戈培爾所宣稱的那么令人矚目。異乎尋常的是，抵制行動基本上沒有遭到公眾的反對，但公眾對它基本上也沒什么熱情，這種現象此后多年不止一次地再現于政府推行各種反猶措施的時候。希特勒意識到了抵制行動對經濟和政府的海外聲譽造成的負面影響，私下里也承認它并未取得很大的成功，因此盡管美國報紙在隨后的數星期甚至數月里依然刊登有關納粹黨暴力反猶的“暴行報道”，但希特勒和納粹黨悄然放棄了繼續在全國范圍進行抵制的想法。不過，抵制的觀念在納粹運動中扎了根。在隨后的數月里，許多地方性報紙一再呼吁讀者不要光顧猶太人的商店，而各地的納粹黨積極分子則經常在猶太人的經營場所外設置“哨兵”，并且組織寫信運動，指責和警告那些膽敢走進猶太商店的顧客。[[110]](#110_5)

### 五

抵制行動的一個主要目的是讓基層的納粹黨員知道，反猶政策必須由中央統一協調，而且在執行時要像希特勒多年前所寫的那樣，用“理性的”方式，而不是通過自發的集體殺戮行動和暴力行為。抵制行動為納粹黨的對猶政策鋪平了道路，從此可以采取合法或半合法的方式去實現黨章中的內容：猶太人不能成為德國公民，因此顯然不能享有全部的公民權。1933年4月7日，抵制行動一個星期之后，《恢復專業公務員法》把猶太人加進了作為解聘對象的共產黨員以及其他在政治上不可靠的政府雇員之列。“非雅利安裔”公務員在4月11日公布的實施細則中被界定為，祖父母和外祖父母中有一個或一個以上“非雅利安人，尤其是猶太人”的公務員。這些人將被辭退，但在興登堡毫不含糊的堅持下，退伍兵、其父或其子陣亡者，以及一戰前在軍中服役者沒有被列為解聘對象。納粹黨員、帝國內政部長威廉·弗里克曾在1925年提出過類似的法案，當時他還是個無籍籍名的國會議員。在他的推動下，該法律以典型的納粹風格，把各地區和地方級的政府機構已實施了幾個星期的解聘猶太裔政府雇員的措施納入了協調一致的進程。同時由司法部擬定了適用于猶太裔律師的類似條款，并寫入同日通過的另一部法律。4月25日頒布的《解決德國院校人滿為患狀況法》規定，所有中小學和大學的猶太裔學生限額為5%，每年入學的猶太裔新生限額為1.5%，從而大幅度降低了有資格進入專業領域從業的猶太裔德國人的數量。豁免條件意味著許多猶太人能夠繼續工作——例如，全部717名猶太裔的法官和州檢察官中的336人，以及全部4,585名猶太裔律師中的3,167人。[[111]](#111_5)根據1933年7月14日頒布的一部法律，魏瑪共和國時期移民到德國的東歐猶太人失去了公民資格，1932年弗朗茨·馮·巴本的政府曾考慮過采用這種措施。這一系列不同以往的措施，意味著猶太人自1871年以來在德國享有的公民平等權的終結。[[112]](#112_5)

那些留任的猶太人在工作中所感受到的，是持續不斷且日甚一日的懷疑和敵視氣氛。上述法令引發了一波告密潮，有的出于政治動機，有的出于個人動機，許多律師、公務員和政府雇員被迫開始核實祖先的血統，有的甚至不得不接受醫學檢查，以此鑒別他們所謂的人種特征。各部部長和各文官部門的首長極度敵視他們所轄機構中留任的每一位猶太人。保守派，比如普魯士州內政部的州務秘書赫伯特·馮·俾斯麥，與他們的納粹同事一樣，熱情支持反猶措施。畢竟自1890年代初開始，限制猶太人公民權的措施一直是保守黨（后來的民族黨）黨綱中的內容。但保守派覺得反猶政策不應過于極端，希特勒適當采納了這些人的意見，例如，他于4月7日否決了禁止猶太裔醫生執業的提案，并且盡量確保清洗不致對商業和經濟造成不利影響。不過，對于希特勒這個時期排猶政策的基本要義，他的民族黨同事依然非常支持。[[113]](#113_5)

有政府帶頭的地方，其他機構就會跟著做。各層級在整個一體化進程中的主要工作，是把猶太人逐出剛剛在此進程中實現了納粹化的機構，例如，德意志拳擊協會（German Boxing Association）于1933年4月4日把猶太裔拳擊手除名，德意志體操聯合會（German Gymnastics League）于5月24日實現了“雅利安化”。市政當局開始禁止猶太人使用公共設施，比如運動場地。[[114]](#114_5)在德國北方小城諾特海姆，1932年僅有120位執業的猶太人，1933年4月1日的抵制行動似乎并不盡心，只持續了幾個小時，而且根本沒有施用于有些企業。這里與許多地方一樣，當地的猶太居民已被普遍接納，人們覺得納粹的反猶主義是抽象的言論，并不適用于他們所認識的具體的猶太人。此時，抵制行動突然間讓社會各界認識到了現實的嚴峻程度。諾特海姆當地的猶太裔醫生收入開始減少，因為病人逐漸離他而去；當地各種自發組成的協會，不僅包括射擊俱樂部，甚至還包括老兵俱樂部，都減少了猶太裔會員，通常是由于“缺席”，因為當地的猶太人很快就不再愿意參加城里的社團生活，許多人在被逐之前已主動退出。每一位繼續高調地光顧猶太商店的老社會民主黨人都看到，有不少本地沖鋒隊員在店里賒賬購物、拒絕支付賬單。在德國各級政治頭目、報紙和媒體持續不斷的反猶宣傳中，到1933年夏末，諾特海姆的猶太人實際上已被排除在社交生活之外。諾特海姆所發生的一切事情，也發生在德國的其他地方。[[115]](#115_5)

有些猶太人認為反猶浪潮不久就會過去，于是理性視之，或者盡量忽視它。然而許多人則處于震驚與絕望狀態。政治暴力的普遍程度與1933年1月30日之前相同，但此時的政治暴力得到了政府的正式批準，而且矛頭公開對準德國的猶太人口，開創了一種在很多人看來是全新的局面。結果恰如納粹黨所愿，猶太人開始離開德國、移居國外，僅1933年就有3.7萬人離開。德國的猶太人口從1月份的52.5萬減至6月底的不到50萬，而這僅僅是登記的猶太教信徒的降幅，隨后數年里將有更多人步其后塵。但也有很多人決定留下來，尤其是上了年紀的人。[[116]](#116_5)對老一輩人來說，在國外找工作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困難的，主要是因為多數國家依然深陷經濟蕭條之中，因此他們更愿意留在自己一直當作家鄉的德國碰運氣。還有些人心存幻想，以為等到納粹政權穩定下來，形勢就會好轉——沖鋒隊青年的狂野之氣屆時自然會被馴服，國家社會主義革命的越軌行為很快就會結束。

有一位猶太裔公民卻不抱這樣的幻想，他就是維克托·克倫佩雷爾。3月5日選舉之前，他已在日記中表達過對“右翼恐怖”的不滿，但與后來的情形相比，當時的恐怖還是相對有限的。他覺得自己無法同意那些為民族黨辯護、支持取締共產黨的友人，令克倫佩雷爾沮喪的是朋友們看不清希特勒內閣“權力分配的真相”。他在3月10寫道，選舉之前的恐怖僅僅是“溫和的序幕”。暴力和宣傳讓他想起了1918年革命，只不過這一次是在卐字標志下進行的。他已經在琢磨自己什么時候會失去大學教職。一星期后他寫道：“1918年的戰敗并不像當前的形勢這樣讓我深感沮喪。日復一日赤裸裸的暴力、對法律的踐踏、最可怕的偽善、野蠻的心態，就像發布法令一樣不加掩飾地呈現在人們面前，實在讓人震驚。”3月30日，抵制行動的兩天前，他絕望地寫道，氣氛

就像中世紀或沙皇俄國最黑暗時期的一次集體殺戮的前夕……我們是人質……“我們”是受到威脅的猶太群體。實際上，我感到的羞恥多于害怕。為德國感到羞恥。我確實一直覺得自己是個德國人，而且我一直以為20世紀的中歐不同于14世紀的羅馬尼亞。錯！

克倫佩雷爾認同民族黨除了反猶主義以外的多數觀點，他與許多保守的猶太裔德國人一樣，堅持認為自己的身份首先是德國人。他的忠誠將在未來的歲月里經受嚴峻的考驗。

克倫佩雷爾在1933年3月20日寫道，德國將不會被希特勒政府拯救，它似乎將迅速駛向一場災難。他接著寫道：“除此之外，我相信，德國將永遠無法洗刷掉與納粹同流合污的恥辱。”他記錄了一個又一個猶太裔友人和熟人的被解雇。讓克倫佩雷爾感到內疚的是，他由于1914—1918年在前線作戰而得以根據4月7日的法律留任。人們的自私、無助和懦弱令他灰心，更不堪的是他所在的大學里學生們的公開反猶活動和謾罵式反猶標語牌。他的妻子在病中，神經脆弱，令他擔心的還有自己的心臟問題。克倫佩雷爾之所以能支撐下去，既是因為他在德累斯頓郊外的多爾茲肯（Döltzschen）買了一小塊地，準備蓋座新房子，以此安頓自己和妻子以及他的學術寫作，也是因為他對人類不可遏止的同情心和對知識的好奇心。6月份的時候，克倫佩雷爾開始私下編寫一部納粹術語詞典。他在1933年6月30日收錄了第一個詞條：保護性羈押。[[117]](#117_5)

## 第四節 一場“摧毀舊秩序的革命”？

### 一

1933年初的幾個月里納粹對猶太人的攻擊，是把他們清除出德國社會的一個長期進程中的第一步。到1933年夏，此進程已進展順利。它是希特勒的文化革命的核心，在納粹黨人看來，它也是更廣義的德國文化轉型的關鍵，這個文化轉型將從德國精神中剔除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自由主義、和平主義、保守主義、藝術實驗、性自由等諸多“外來的”影響。所有這些影響都被納粹黨歸因于猶太人的有害影響，盡管大量證據顯示事實剛好相反。把猶太人逐出經濟界、媒體行業、政府雇員群體和專業領域，于是成為這樣一個進程的根本內容：拯救和凈化日耳曼人種，使德國做好準備為它在1918年所受的羞辱實施報復。當希特勒和戈培爾在那年夏天談論“國家社會主義革命”時，他們指的首先是無情鎮壓所有“非日耳曼”事物的一場文化和精神革命。

但同時，實現這種轉型的非凡速度，說明它與此前不久的形勢具有緊密的關聯。此前的1933年1月30日至7月14日期間，納粹黨把由希特勒擔任總理、由非納粹黨的保守派主導的聯合政府，轉變為一黨專權的政府，甚至保守派在內閣中也不再擁有獨立的代表資格；納粹黨把教會和軍隊以外的所有社會機構納入一體化進程，使之成為一個由納粹黨領導的、尚處于初級階段的龐大體系；納粹黨實行全方位的清洗，把每一個反對他們的人逐出了包括文化和藝術、大學和教育系統在內的德國社會中幾乎每一個領域；納粹黨已開始把猶太人排擠到社會邊緣，或者迫使其移居國外；納粹黨還開始頒布各種法律和政策，這些法律和政策將在未來的歲月里決定德國和德國人民的命運，以及更多國家和人民的命運。有些人以為，1933年1月30日就職的聯合政府會像此前的歷屆聯合政府一樣在幾個月內倒臺。還有些人認定納粹黨是轉瞬即逝的現象，很快就會與扶植它上臺的資本主義制度一起退出世界歷史的舞臺。事實證明這些人都錯了。第三帝國在1933年夏成型，而且顯然將繼續存在。那么，這場革命是如何發生的？為什么納粹黨在攫取權力的過程中沒有遇到有效的抵制？

第三帝國的到來基本上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結束于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任命為總理。這不是“奪權”。實際上，納粹黨人不使用這個詞描述希特勒的任命，因為它帶有非法政變的意味。在這個階段，納粹黨依然謹慎地把上臺稱作“接掌政權”，把聯合政府稱為“民族振興的政府”，或者（更普遍地）稱之為“民族起義的政府”，使用哪個稱呼，取決于該黨是想強調內閣的合法性來自總統的任命，還是想強調其合法性來自所謂的民眾支持。[[118]](#118_5)納粹黨知道，希特勒的任命是奪權過程的開始，而不是結束。然而，假如任命沒有發生，納粹黨很可能會隨著經濟的逐漸恢復而不斷衰落。假如施萊謝爾在政治上不那么無能，他或許會建立起一個準軍事政權，借由總統興登堡行使專制權，然后等到年近九旬的興登堡壽終去世時，由他直接統治，還可能會修改憲法，在新憲法中勉強賦予國會一點兒地位。那么到1932年下半年，某種類型的軍政府就是納粹獨裁體制唯一可行的替代方案。從議會民主制度滑向一個沒有政黨或立法機構平等和全面參與執政的獨裁政府，在布呂寧治下就已經開始了。巴本有意識地大幅度加速了這個進程。巴本下臺之后，此進程并未逆轉。德國出現了國會和政黨都沒有機會去填補的權力真空。政治權力從憲法規定的合法機構流失，一端流向街頭，另一端流向總統興登堡周圍由政客和將軍們組成的政治陰謀小集團，在兩端之間留下了廣闊的真空地帶，這個地帶是正常社會中民主政治發生的地方。希特勒被總統周圍的小集團扶上總理之位；但是假如納粹黨與共產黨的街頭活動沒有引發暴力和混亂，他們不會覺得有必要扶他上臺。[[119]](#119_5)

在這種形勢下，只有武力可能成功。只有兩個機構擁有足夠的武力，只有兩個機構能夠運用武力而不至于引起民眾更加暴力的反擊，那就是軍隊和納粹黨。軍事獨裁的政權極有可能會在1933年之后的歲月里壓制諸多公民自由權；啟動重整軍備的項目；拒絕履行《凡爾賽和約》；吞并奧地利；入侵波蘭，以便收復但澤以及切斷東普魯士與德國其他部分的波蘭走廊（Polish Corridor）。這個政權也很可能在德國恢復實力之后，進一步在國際上發動侵略戰爭，引發與英國和法國，或與蘇聯的戰爭，或者與英法蘇同時開戰。而且幾乎可以肯定，這個政權會對猶太人實施嚴厲的限制措施。但是總的來說，德國的軍事獨裁政權不太可能會執行種族滅絕計劃，即在奧斯維辛和特雷布林卡（Treblinka）集中營的毒氣室達到高潮的那種大屠殺。[[120]](#120_5)

許多人擔心，軍事政變有可能導致納粹黨和共產黨的暴力抵抗。恢復秩序有可能引發大規模流血事件，或許會導致內戰。軍方和納粹黨都極力避免這種情形。雙方都知道，如果它們各自奪權，成功的把握都不大，至少可以這樣說。因此，合作幾乎是大勢所趨，唯一的問題是最終將采取什么形式合作。在全歐洲，保守派精英、軍隊，以及激進的法西斯群眾運動或民粹運動都面臨著同樣的困境。它們采取了各種各樣的解決方式，結果在有些國家是軍方占上風，比如西班牙；在另一些國家是法西斯運動占上風，比如意大利。1920年代和1930年代在許多國家中，民主制度被獨裁體制取代。考慮到已經發生在意大利、波蘭、拉脫維亞（Latvia）、愛沙尼亞、立陶宛、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葡萄牙、南斯拉夫等國家的情況，或者考慮到以截然不同于上述國家的方式發生在蘇聯的事情，1933年發生在德國的情況也就顯得不那么異乎尋常了。民主制度不久亦將在其他國家被摧毀，例如奧地利和西班牙。在這些國家，政治暴力、騷亂和暗殺是一戰結束后各個時期里的常見之事。例如，在奧地利，1927年維也納的嚴重騷亂以焚毀司法宮（Palace of Justice）而告終；在南斯拉夫，馬其頓暗殺隊使政界遭到重創；在波蘭，與新生的蘇聯之間的一場大戰造成了政治體制和經濟的崩潰，并為畢蘇斯基將軍（General Pilsudski）的軍事獨裁開辟了道路。對于那些激發納粹黨行動力的反猶信念和陰謀理論，各國的右翼獨裁者即使不是全部認同，也認同其中的大部分。經歷過1919年猶太裔共產黨員庫恩·貝拉領導的短命的革命政權之后，霍爾蒂·米克洛什海軍上將領導的匈牙利政府對猶太人的仇恨不遜于德國的極右翼。波蘭1930年代的軍政府對境內龐大的猶太人口實施了嚴格的限制措施。在當時的歐洲背景下觀察，1920年代和1930年代初的政治暴力、議會民主制度的瓦解、公民自由權的喪失，都不會讓一位冷靜的觀察者覺得特別不同尋常。后來在第三帝國史上所發生的一切事情，也不是希特勒被任命為總理的必然結果，在其中起作用的，一如既往，還有機緣和偶發事件。[[121]](#121_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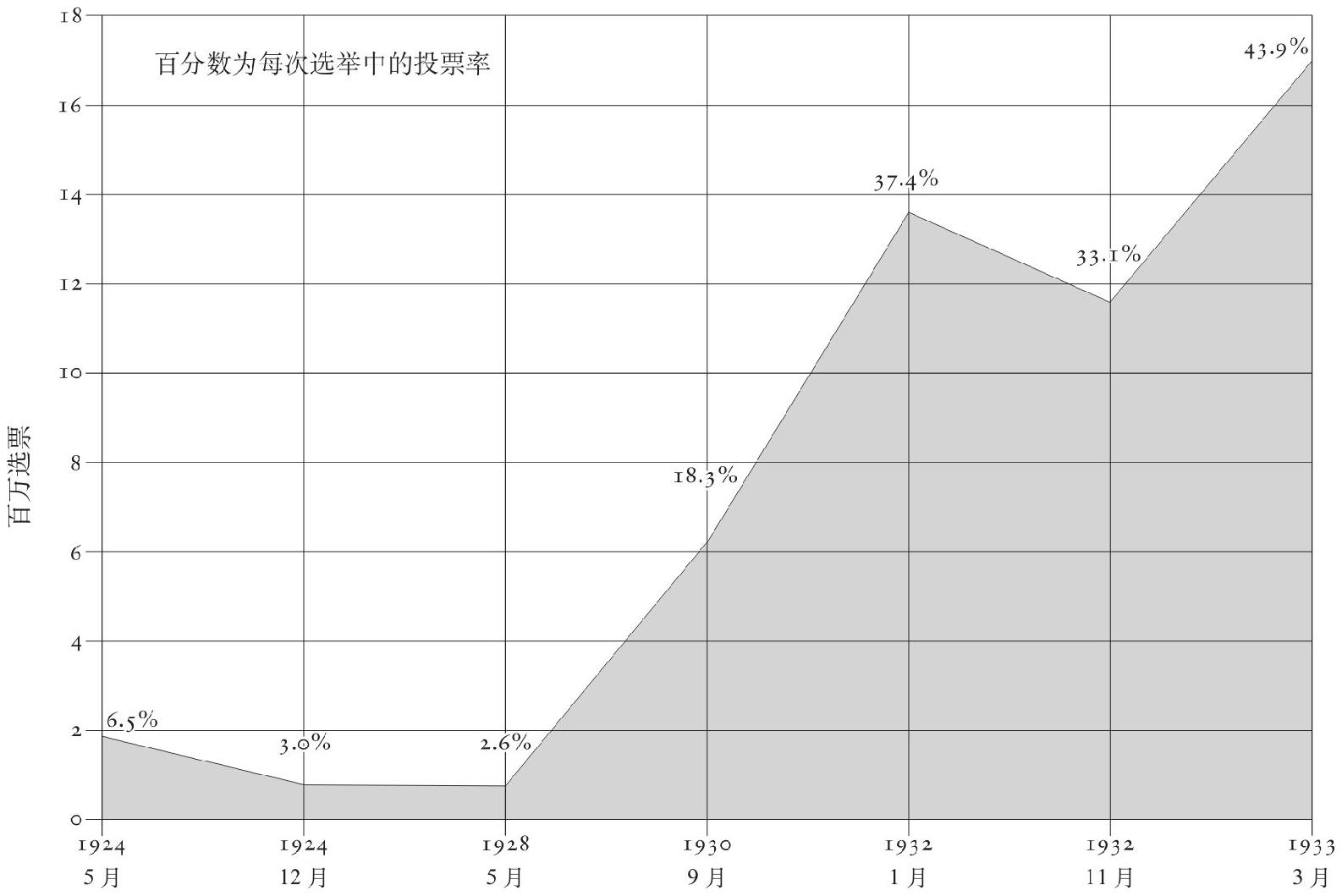
然而，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在德國上臺所造成的后果，遠比民主制度在歐洲其他國家崩潰所造成的后果嚴重得多。《凡爾賽和約》的安全條款根本未能改變的事實是，德國依然是歐洲最強大、最先進和人口最多的國家。民族主義者關于領土擴張與征服的夢想，同樣存在于其他獨裁國家，比如波蘭和匈牙利。不過，即使它們實現了夢想，也只可能具有地區性意義。而發生在德國的事情，很可能比發生在小國（比如奧地利）或者貧國（比如波蘭）具有更廣泛的影響，其影響有可能是世界性的，因為德國國土遼闊、實力強大。這就是1933年前六個半月里發生的事情之所以如此意義重大的原因。

這些事情是如何以及為何發生的？首先，假如希特勒不是德國最大政黨的黨魁，沒人會認為值得把他硬塞進總理的位置。當然，納粹黨從未在自由選舉中贏得多數票：在1932年7月國會選舉中獲得的37.4%，是它表現最佳時所能爭取到的全部選票。然而按照任何民主標準，這都屬于高票，高于其他國家的許多民選政府在歷次選舉中之所得。納粹黨成功的根源，在于德國的政治制度沒有產生出一個聯合了天主教徒以及新教徒中的右翼人士的、能夠獨立發展的全國性保守派政黨；在于德國自由主義歷來的弱點；在于幾乎所有德國人對戰敗和《凡爾賽和約》之苛刻條款的痛恨；在于魏瑪時期社會的和文化的現代主義以及1923年的惡性通貨膨脹使許多中產階級人士產生的恐懼與迷惘。魏瑪共和國的缺乏法統，導致它自始至終幾乎不曾得到國會中多數議員的支持，加之前述諸因素，使人們更加懷念舊帝國以及俾斯麥那樣的專制領袖人物。“1914年精神”和“前線一代”的傳奇，激發了人們對于國家統一的強烈渴望，以及對于多黨制和政治談判中沒完沒了的折中妥協的不耐煩，在那些因為年紀太小而無法參戰的人當中，這種渴望與不耐煩尤為強烈。戰爭的后遺癥還包括毀滅性的大規模政治暴力，許多非暴力的正派人士逐漸適應了它，對它的容忍程度已到了在一個有效地發揮著功能的議會民主制度中難以想象的地步。

然而，在諸多因素之中，有幾個至為關鍵。第一個是大蕭條的影響，它導致選民趨于激進，摧毀或嚴重損害了比較溫和的政黨，使政治體制在“馬克思主義”政黨與“資產階級”陣營之間趨于兩極分化，后者全部迅速倒向極右翼。日甚一日的共產主義威脅令資產階級選民心生恐懼，促使政治天主教運動背離民主政治而轉向獨裁政治，恰如它在歐洲其他國家的表現。企業倒閉和財務危機讓許多工業巨頭和農業領袖相信，必須限制甚至摧毀工會的力量。大蕭條的政治影響極度放大了原先惡性通脹的災難性影響，給人的感覺是共和國除了制造經濟危機之外似乎無所作為。即使沒有大蕭條，德國第一個民主體制的前途似乎也是暗淡的，而史上最嚴重的經濟衰退更是將它推到了無力回天的境地。此外，大規模的失業瓦解了德國曾經強大的勞工運動，作為民主制度的堅定捍衛者，勞工運動最近一次發揮作用是在1920年，當時它設法擊敗了右翼的卡普暴動，盡管叛亂者得到了軍方的縱容。內部分裂、士氣低落，而且被剝奪了大規模政治罷工這個主要武器，導致德國的勞工運動陷入被動局面，一方面虛弱地支持海因里希·布呂寧的獨裁政權，另一方面自我毀滅地與“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為敵。

第二個關鍵因素是納粹運動本身。它的理念顯然對選民具有廣泛的號召力，至少沒有聳人聽聞到讓選民反感的程度；它的行動力有望徹底治愈共和國的病癥；它的領袖阿道夫·希特勒是個魅力超凡的人物，能夠言辭激烈地譴責不受歡迎的共和國，以此爭取到大量選民的支持，并且在恰當的時機采取恰當的行動，最終把這些支持兌換成政府要職。希特勒拒絕進入聯合政府，表示絕不擔任內閣中除總理以外的其他職務，他的下屬格雷戈爾·施特拉塞爾等人對此感到失望之極，但后來的事實證明希特勒的決定是正確的。假如擔任不得人心的巴本或者同樣不受歡迎的施萊謝爾的副手，那么他的聲譽可能會嚴重受損，他作為領袖而散發出的個人魅力可能也需要多加收斂。納粹黨屬于抗議型政黨，拿不出什么建設性的規劃，幾乎沒有解決德國問題的務實方案。但是它的極端思想大量吸收了德國既有的流行觀念和偏見，根據形勢以及它想要拉攏的具體群體的性質而做了修改，有時做了掩飾，讓許多人覺得非常值得去投票支持它。在這些人看來，非常時刻需要非常措施；在更多的人，尤其是中產階級人士看來，納粹黨徒粗俗、沒受過什么教育，此特點似乎足以保證希特勒的那些斯文、受過良好教育的合作伙伴日后能夠控制住他，能夠遏制住隨著納粹運動的崛起而出現的街頭暴力，他們認為這種街頭暴力非常可悲，但無疑是暫時的。

在1933年1月30日把希特勒送上總理之位的第三個關鍵因素是，納粹黨與保守派，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與自由派之間，存在大量重合的思想觀念。1930年代初在幾乎所有比社會民主黨右傾的德國政黨中間流行的觀點，與納粹黨的觀點有許多共同之處。對于新教選民中自由派和保守派政黨的大批支持者來說，既然這些政黨的思想與納粹黨的如此相像，他們當然愿意（至少暫時地）拋棄它們，轉而選擇看起來更有效率的納粹黨。天主教選民以及代表他們的中央黨，也已不再忠于民主制度。此外，甚至有相當大數量的天主教徒和工人，至少是那些出于各種原因而不再像他們的許多教友和工友那樣謹守自己所屬的文化和政治圈子的人，也轉向了納粹主義。只有利用既有的、往往根深蒂固的社會和政治價值觀來引發人們的共鳴，納粹黨才可能如此迅速地崛起，成為德國最大的政黨。但同時，納粹的宣傳盡管積極而巧妙，卻未能把那些由于意識形態的原因而無意投票給希特勒的人爭取過來。由于長期資金不足，在1933年使用廣播之前，納粹黨的宣傳工作無法全面開展，而要依靠各地那些總是混亂無序的積極分子團體的志愿工作，所以戈培爾1930—1932年的宣傳攻勢僅僅是促使人們投票給納粹黨的諸多影響因素之一。確實，正如在信奉新教的北部鄉村地區一樣，在納粹宣傳機器根本沒有觸及的地方往往也有選民投票給它。納粹黨贏得選票主要靠的是其抗議者的姿態。1928年之后，希特勒、戈培爾和納粹黨領導層無疑意識到了這一點，于是不再強調該黨僅有的具體政策中的大部分，而將精力集中于語義含糊的煽情，所強調的不外乎這些：納粹黨富于青春與活力，它決心摧毀魏瑪共和國、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它相信只有通過社會各階級的團結才能夠使德國獲得新生。納粹黨在1920年代大張旗鼓宣傳的反猶主義已退居末席，在1930年代初納粹黨的勝選中基本上沒有發揮作用。更加重要的是該黨在街頭樹立的形象，沖鋒隊員組成的縱隊在街上行進，使納粹黨平添了一種紀律嚴明、精力充沛、堅決果斷的整體形象，這正是戈培爾致力于展現的。[[122]](#122_5)



圖表1　納粹黨在國會選舉中的成績，1924—1933年

因此，納粹宣傳爭取到的主要是這樣的人：有的已經傾向于認同納粹黨自稱所代表的價值，有的僅僅把納粹黨視為推行這些價值時比資產階級政黨更有效、更有力的工具。許多歷史學家提出，它們本質上屬于工業化以前或者前現代的價值。然而，此論點是基于把民主政治簡單地等同于現代性。那些成群去投票支持希特勒的選民，那些把自己的晚間時光用于毆打共產黨員、社會民主黨人和猶太人的沖鋒隊員，那些把休閑時間花在集會和示威上的納粹黨積極分子——他們犧牲自己的時間，沒有一個是為了恢復已經逝去的往昔。相反，激勵著他們的是一個模糊但具有強烈吸引力的未來圖景：階級對立和政黨之爭將得到解決；由討厭的巴本所代表的那種貴族特權將被廢除；技術、通訊傳媒以及一切現代發明將被用于“人民”的事業；代表著復興的德國的最高權威，將不是傳統的世襲君主或者根基深厚的社會精英，而是一位魅力超凡的領袖，他出身寒微，一戰中作為下士在軍中服役，始終念念不忘自己作為人民之子的平民身份。納粹黨人宣稱，他們將鏟除外國和異族加諸德意志民族的層層污垢，使德國擺脫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猶太式”自由主義、文化布爾什維主義、女性主義、性自由、世界主義、英國和法國于1919年施加的經濟負擔和強權政治負擔、“西方的”民主政治以及諸多其他東西；他們將展現真正的德國——它不是歷史上某個特定時期的德國或者某種特定政體的德國，而是一個神話般的德國，它將恢復曾經在魏瑪共和國治下失落了的永恒的民族之魂。這種構想并不是僅僅追懷往昔，或者展望未來，而是二者兼顧。

把希特勒推上權位的保守派相當認同這個構想。他們的確眷戀往昔，渴望復辟霍亨索倫王朝和俾斯麥帝國，但復辟的方式須是清除掉曾經對民主制度所做的妥協，他們認為這些妥協是不明智的。他們對未來的構想是，人人各安其位，尤其要讓工人階級安分守己、絕不參政。但這種構想確實同樣不能被視為工業化以前的或者前現代的。深深認同它的，首先是許多不遺余力瓦解魏瑪共和國的大企業家，還有許多技術型新式軍官，他們志在以《凡爾賽和約》禁止德國使用的那種先進的武器裝備發動一場現代戰爭。任何時代、任何地方的保守派都差不多，他們像希特勒一樣擅于利用和重整舊制以適應自己當前的目標。不能把他們歸納為“工業化以前的”社會群體，他們中的許多人既傳統又現代，例如尋找新市場的資產階級容克地主，以及小零售商和白領工人，這些人的謀生手段在工業化以前尚未出現。[[123]](#123_5)正是構想中的這些共同之處，使巴本、施萊謝爾和興登堡等人相信，拉攏納粹黨進入聯合政府是值得的，因為聯合政府的目標是在魏瑪共和國的廢墟上建立一個獨裁政府，納粹黨的群眾運動有助于合法化他們的統治。

德國民主制度的夭折，不但屬于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歲月里歐洲大勢的組成部分，而且在德國歷史中有著非常獨特的根源，其思想資源來自一種非常獨特的德國傳統。德國的民族主義、泛日耳曼構想（通過征服戰爭完成俾斯麥的未竟事業，把德意志民族全部整合為一個單一的國家）、雅利安種族優越論和猶太威脅論、優生規劃和種族衛生的觀念、軍事理想（全社會穿制服、整齊劃一、服從命令并且隨時準備戰斗）——這一切以及1933年實現的諸多構想，都借用了1875年以還流播于德國的觀念。其中有些來源于國外，或者得到了外國重要思想家的認同，包括戈比諾的種族主義、舍納勒爾的反教權主義、蘭茨·馮·利本菲爾斯的異教徒幻想、許多國家中達爾文信徒的偽科學人口政策等等。然而它們在德國卻混合成了一種獨特的毒物，又因德國作為歐陸最先進和最強大國家的卓越地位而使它的毒性益發猛烈。在希特勒被任命為總理之后，歐洲其他國家以及全世界將會逐漸明白，它的毒性究竟可以猛烈到什么程度。

### 二

盡管納粹黨在選舉中取得了成功，但希特勒的上臺無疑是幕后政治密謀的結果。“德國人”并沒有選希特勒當總理，也沒有行使自由和民主的權利授權他建立一黨獨裁的政府。然而有些人認為，魏瑪共和國是自我毀滅的，而不是被它的敵人所毀滅：是一樁政治自殺案，而不是政治謀殺案。[[124]](#124_5)共和國在1930—1933年那場最嚴重危機中的脆弱表現，基本上有目共睹；共和政體的缺乏法統，又導致人們過于輕易地拋棄它，而考慮用其他政治方案來解決德國的弊病，但這些弊病并不是僅僅由共和國本身造成的。整個過程的關鍵之處是，民主制度的敵人利用民主的憲法和民主的政治文化來達到他們自己的目的。約瑟夫·戈培爾對此毫不隱諱地予以公開嘲笑：

愚蠢的民主制度。民主制度最可笑之處，是為它的死敵提供了毀滅它的資源。受到指控的納粹黨領導人成了議員，于是獲得了議員豁免權、津貼和免費車票。他們因此免于警察的干涉，可以說出普通公民不能說的話，此外他們的活動經費還是他們的敵人支付的。民主制度的愚蠢可以讓人撈到豐厚的資本。納粹黨員馬上抓住機會，而且從中得到了無窮的樂趣。[[125]](#125_5)

不可否認，納粹黨人無比蔑視民主制度。但民主制度的本質決定了民主政府至少意愿最低限度地遵守民主的政治規則。處于毀滅威脅之下的民主體制面臨的困境是，在堅持保留民主的細節從而聽任那種威脅占上風，與限制民主權利從而違背民主的原則之間無法抉擇。納粹黨知道這一點，并且在第三帝國成型期的第二階段，即1933年2—7月，對此加以充分利用。

1923年11月啤酒館暴動失敗之后，希特勒一直宣稱他將通過合法途徑掌權。確實，他在法庭上宣誓后就是這樣說的。1932年之后他知道，走暴力政變的道路，乃至效仿以“進軍羅馬”相要挾的方式，在德國都行不通，前者指1917年的俄國十月革命，后者在1922年把墨索里尼推上了意大利總理之位。因此，希特勒及其伙伴每次都為他們的行動找一塊合乎法律條文的遮羞布。他們總是盡可能避免讓對手有社會民主黨那樣的可乘之機。社會民主黨曾經通過法庭抗擊巴本1932年7月的普魯士政變，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法律成功，盡管事實證明該黨的法庭訴訟在政治上毫無作用。正是為了避免這種先例再發生，希特勒格外重視國會縱火法令和《授權法》；戈林在普魯士把褐衫軍和黨衛隊編為輔警，而不是隨便讓他們繼續橫沖直撞，行動時一點兒合法的掩護也沒有；納粹政權在執行第一批政策時，堅持由國會通過法律授權或者由總統令予以批準。“合法革命”的策略奏效了。希特勒一再保證說要采取合法行動，這使他在聯合政府中的盟友以及對手都以為可以用合法手段與納粹黨打交道。納粹黨人的行動有了合法的掩護，于是公務員可以按照他們的要求起草法令和法律，比如在1933年4月7日的《公務員法》中，他們甚至打破行政部門所應遵循的中立準則，要求解除猶太裔和政治上不可靠的公務員的職務。在公務員、政府雇員等許多人士看來，納粹黨在1933年1月底至7月底之間攫取權力的各種措施似乎是無法抵制的，因為它們表面上完全獲得了合法授權。

但它們其實并不合法。納粹黨攫取權力過程中的每個措施，都違反了法律。首先，它們與已經通過的那些法律的精神實質相抵觸。尤其是魏瑪憲法第四十八條，它授權總統在危急時刻以總統令的形式行使專制權，這純屬臨時措施，根本不能作為長期行使專制權的依據；納粹黨卻使它成為永久緊急狀態的法律依據。緊急狀態在技術上一直持續到1945年，這期間的危急情況更多時候是出于臆想，而不是真實狀況。第四十八條也不能作為法律依據，用以實行1933年2月28日通過的那些具有廣泛影響的措施。總統艾伯特在共和國初期任意援引、廣泛運用第四十八條，確實相當不幸；更加不幸的是，總理布呂寧、巴本和施萊謝爾在1930年代初的危機中變本加厲地依賴它。然而即便如此，與2月28日納粹政府命令對公民自由權實行的嚴厲限制相比，他們的做法就顯得無足輕重了。此外，總理本來無權使用被總統當作橡皮圖章的專制權；但希特勒通過1933年1月與興登堡的談判，得到了它的使用權。[[126]](#126_5)《授權法》以及隨后中止自由選舉的措施，更加明顯地違背了憲法精神。然而中止自由選舉的可能性算不上什么秘密，因為納粹領導層在選戰期間就已經明言，3月5日的選舉將是未來歲月里的最后一次。

納粹黨不僅違背了魏瑪憲法的精神，還在法律的技術細節上違反了憲法。1933年2月6日頒布的法令授權戈林控制普魯士州，這顯然違背了州法院對“被解散的普魯士州社會民主黨少數派政府訴巴本”一案所做的裁決。《授權法》在法律上是無效的，因為國會的會議主持人戈林在投票時沒有把民選的共產黨議員計入法定人數。雖然把他們計算在內并不妨礙《授權法》獲得三分之二的多數票，但是拒絕承認他們在國會的代表權則屬于違法行為。此外，批準《授權法》的是聯邦議會，即代表聯邦各州的國會上議院，這屬于不合規的做法，因為當時各州政府已被暴力推翻，所以不具備合法的建制，即無法真正被聯邦議會所代表。[[127]](#127_5)這些不僅僅是技術細節上的違法，但它們遠遠比不上納粹沖鋒隊員在街頭犯下的大規模的、持續的、完全非法的暴力行徑，這些暴行開始于2月中旬，其猛烈程度在國會縱火案之后達到新的水平，并在3—6月席卷全國。許多施暴者的輔警身份根本不能合法化他們所犯的罪行。畢竟，給某人穿上警服，不等于發給他一張執照，可以去殺人、洗劫辦公室、沒收資金，或者去逮捕、毆打、折磨他人，不經審判就把他人囚禁于倉促設立的集中營。[[128]](#128_5)

實際上，即使在納粹黨上臺之后，德國的司法機關也完全明白納粹暴力的非法性質。帝國司法部想方設法讓1933年上半年的大規模逮捕按照正式的法律程序辦理，但它的干預根本不被理睬。州檢察官在1933年全年提起公訴的案子中，不乏以犯下暴力罪行、謀殺了對手的褐衫軍和黨衛隊成員為被告的，同年8月設立的一個特別檢控辦公室專門負責協調這類案子的審理。1933年12月，巴伐利亞州檢察官試圖調查達豪集中營三名囚犯被折磨致死案，當他遭到斷然拒絕后，巴伐利亞州司法部長宣布將不遺余力追查此事。帝國內政部長在1934年1月抱怨說，保護性羈押被濫用于許多案件。直到1934年4月才通過了一套法規，詳細規定誰有權逮捕和“保護性羈押”他人，以及被羈押者應該受到什么待遇。同年，州檢察官對薩克森州霍恩斯泰因（Hohnstein）集中營23名虐待囚犯的沖鋒隊員和政治警察提起公訴，包括集中營指揮官。帝國司法部長居特納強調說：“施虐者所顯露的野蠻和殘忍，與德國人的情感根本格格不入。”[[129]](#129_5)

那些試圖對犯下虐囚和暴力罪的納粹沖鋒隊員提起公訴的人之中，有很多人本身就是全力投入的納粹黨員。例如，試圖對1933年達豪集中營虐囚案提起公訴的巴伐利亞州司法部長，竟然是后來在二戰期間出任波蘭總督、以殘忍著稱的漢斯·弗蘭克。這些公訴案全部由于上層的干涉而不了了之，干涉來自希姆萊或者根本就來自希特勒本人。[[130]](#130_5)對“民族起義”中犯罪者的大赦令早在1933年3月21日就已被批準，它撤銷了7,000多宗公訴案。[[131]](#131_5)整個1933年和1934年，每個人（尤其是納粹黨徒）都知道，穿褐衫的沖鋒隊員和穿黑色制服的黨衛隊行動隊對納粹黨的敵人所實施的野蠻毆打、酷刑、虐待、毀壞財物和各種暴力，乃至殺戮，是對德國法律的公然違犯。但這種暴力是1933年2月之后納粹攫取權力過程中不可或缺的核心部分，它在沒有加入納粹黨或者其附屬組織的德國人中間引起的普遍的、最終無所不在的恐懼感，是恐嚇希特勒的對手、促使希特勒那些有時不那么聽話的盟友就范的關鍵因素。[[132]](#132_5)

最后，希特勒和納粹領導層無疑對這些非法行為負有主要責任。希特勒曾在很多場合明確表達了對法律和魏瑪憲法的蔑視。“我們進入法律機構，并將以這種方式使我們的黨成為決定性因素，”希特勒在審理1930年軍官案的萊比錫法庭上說，“不過，一旦擁有了憲法授予的權力，我們將把政府塑造成我們認為合適的樣子。”[[133]](#133_5)國會縱火案發生之后，他立即對內閣說，在追查涉嫌犯案的共產黨員時，重要的是不能太拘泥于法律條文。希特勒在1933年初幾個月里的全部言論、全部姿態，等于在不斷鼓動納粹黨徒采取暴力行動打擊對手。他呼吁遵守紀律的時候，幾乎總是連帶著用籠統的言辭攻擊納粹黨的對手，基層沖鋒隊員把他的話當作繼續毫不收斂地使用暴力的許可證。大規模的協同行動，比如5月2日占領工會辦公機構的行動，讓普通褐衫軍成員相信，如果他們在其他場合以同樣的斗志主動出擊，是不會遇到太多麻煩的。事實也的確如此。[[134]](#134_5)

最關鍵的是，希特勒以及各級納粹黨徒都非常清楚地知道他們是在犯法。他們對法律以及正常司法程序的蔑視是顯而易見的，而且在無數場合展露無遺。強權即公理。法律僅僅是權力的表達。用一位納粹記者的話來說，起決定作用的不是“充滿謊言的、虛偽的”德國司法和刑罰制度，而是“權力的法則，它已融入我們民族的血統紐帶和軍事團結……它本身既不體現法律也不體現正義。在奪取權力的斗爭中成功地作為‘法則’發揮作用的東西必須予以保護，這也是為了保存取得勝利的實力”。[[135]](#135_5)

### 三

納粹黨人在1933年上半年里攫取權力的手段所具有的非法性質，使這個過程實際上成了一場推翻既有政治體制的革命，他們設計出“國家社會主義革命”的豪言壯語，其實主要是作為非法行動的含蓄理由。但它是哪種革命呢？保守派行政人員赫爾曼·勞施寧（Hermann Rauschning）最初曾在納粹政府中工作，但在1930年代后期成為它最激烈、最執著的批評者之一，他把“國家社會主義革命”形容為一場“虛無主義者的革命”，是“沒有方向的革命，僅僅是為了革命而革命”。它摧毀一切社會秩序、一切自由權利、一切禮儀教養；它恰如勞施寧著作的英文版書名所稱，是一場“摧毀舊秩序的革命”，僅此而已。[[136]](#136_5)在該書的尾聲，他號召恢復真正的保守派價值，然而在通篇充滿激情的抨擊中，除了把“革命”當作語言的棒子，用來痛斥納粹黨推翻了他所珍視的秩序之外，勞施寧并沒有提出更多見解。其他的革命，無論勞施寧怎么看，所做的不僅僅是摧毀舊秩序。那么與它們相比，納粹革命所做的是什么呢？

表面上，國家社會主義革命根本不是一場真正的革命。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和1917年的俄國革命用暴力推翻了舊秩序，代之以革命者所認為的全新秩序。與它們不同，納粹黨卻一如既往地想要新舊兼顧，既使用革命的豪言壯語，又聲稱自己的上臺是通過合法途徑、符合既有政治體制的。納粹黨沒有采取什么具體的措施廢除魏瑪共和國的重要機構，或者另設機構取代它們，就此而言，1934年廢除總統職位是個罕見的舉動。納粹黨倒更愿意讓它們逐漸衰萎，比如，國會在1933年之后極少開會，即使開會也只是聽希特勒演講，內閣后來同樣自動停止開會。[[137]](#137_5)另一方面，保守派精英曾經希望在納粹黨的協助下發動一場真正的反革命，最終恢復威廉帝國，或者建立與之非常相像的體制，有沒有皇帝在位都可以，但這個愿望也沒能實現。無論1933年出現的是什么局面，都不會是保守派的復辟。奪權過程的暴力本質，使納粹黨的上臺明顯帶有革命的味道。納粹黨的“革命”說辭在1933年6月之后基本上已無人質疑。那么，只能從表面看待它嗎？[[138]](#138_5)

有些作者認為，納粹主義有一條歷史線索可循，可直接追溯至1789年法國大革命，到1793—1794年雅各賓派的“恐怖統治”，再到盧梭的“公意”（General Will）理論中隱含的人民專制（popular dictatorship）理念，即決策最初由人民做出，但決定之后就不允許反對。[[139]](#139_5)法國大革命確實非同凡響，因為它預演了隨后兩個世紀里占據歐洲歷史舞臺的幾種主要意識形態——從共產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到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但國家社會主義不在其中。實際上納粹黨人認為，他們清除了法國大革命的全部影響，并且讓歷史的車輪倒轉，至少是在政治意義上，大跨度退到中世紀初期。納粹黨的人民概念指的是人種，而不是民權。法國大革命催生出的意識形態將全部被清除。在世界歷史上，國家社會主義革命將是對法國大革命的否定，而不是它的實現。[[140]](#140_5)

如果真有一場國家社會主義革命，那么納粹黨人對它有什么設想？與法國或俄國革命做類比，似乎同樣行不通。1789年法國的革命者擁有一套清晰的理論，他們將根據這套理論、以代議制的形式實行人民主權（sovereignty of the people）；而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者的目標是推翻資產階級和傳統的精英階層，實行無產階級專政。與它們不同，納粹黨人沒有重塑社會秩序的明確計劃，實際上他們并沒有為他們想要徹底變革的社會形態做出全面的設計。希特勒本人所認為的革命，似乎是實權和權威職位的一場人事變動。1933年7月6日向納粹黨高層干部發表講話時，他暗示說，革命的核心任務在于消滅政黨、民主體制和獨立組織。希特勒似乎把“奪權”視為國家社會主義“革命”的實質，他使用這兩個詞的時候基本上可以互相替換：

奪權需要洞察力。奪權本身是容易的，只有當改造過的人類適應新的體制時，奪取的權力才能夠保住……現在的偉大任務是重新取得革命的控制權。有的革命首戰即成，有的革命在首戰成功之后又繼續革命，歷史證明，前者的成功率高于后者。革命絕不能成為永久狀態，第一場革命并不必然要接著第二場，第二場也不必然要接著第三場。我們已經爭取到了這么大的勝利，需要很長時間來消化它……下一步必須是進化式的發展，現有的環境必須加以改善……[[141]](#141_5)

因此，盡管希特勒要求從文化和精神上改造德國人，使他們適應新的帝國體制，但他基本上認為這必須通過演進的方式而不是革命的方式來實現。他繼續說：

目前的國家體制是反常的。它執政的出發點既不是經濟的需要，也不是人民生活的需要……我們接管了現有政體。問題是我們愿不愿意保留它……我們的任務是，保留和改造現有體制中有用的部分，也就是說，好的部分可以保留下來，無用的部分就裁撤。[[142]](#142_5)

個體德國人的文化轉向，屬于納粹黨構想中最革命的方面，它的實現，依上文類推，也可以通過保留或恢復納粹黨心目中往昔德國文化中好的方面，清除掉被他們視為異族侵入物的東西完成。

就連自稱在進行“第二場革命”的沖鋒隊員也對任何一種系統性的革命轉型毫無概念，希特勒在上文的講話中明確批評了他們的“第二場革命”。1934年對基層納粹黨徒進行的一次意見調查顯示，在魏瑪共和國時期就已入黨的大多數基層積極分子所期待的，是納粹政權能夠實現國家的復興，一名黨員把這種復興描述為“全面重整公共生活的秩序”，在此過程中，希特勒將“把滲透進最高領導層、伙同其他罪犯把我們的祖國搞得形同廢墟的外國人和異族清洗出德國”。這些人所理解的國家復興，主要指的是恢復德國的國際地位，廢除《凡爾賽和約》及其條款，（很可能通過戰爭）恢復德國在歐洲的霸權。[[143]](#143_5)因此，廣義而言這些人并不是革命者；他們對德國內部轉型的認識，僅限于清洗猶太人和“馬克思主義者”，此外則知之甚少或者一無所知。褐衫軍不懈的行動力將在未來的歲月里給第三帝國造成嚴重問題。在1933年下半年和1934年上半年，常常用來為他們的行為做借口的是，“革命”必須繼續。然而沖鋒隊員對于革命的認識，終歸不外乎繼續鬧事和斗毆，他們在攫取權力的過程中已經習慣了這種做法。

對于納粹黨的較高層級，尤其是領導層來說，連續性與變革同樣重要。1933年3月的選舉之后，國會的盛大開幕典禮在波茨坦的駐軍教堂舉行，引人注目地展示了社會舊秩序和政治舊秩序的象征，包括給流亡的皇帝保留的御座，以及在普魯士歷代君王墓石上擺放的花圈。典禮有力地表明，納粹主義排斥革命的基本原則，象征性地把自身與德國過去的主流傳統聯系在一起。這或許不是事情的全貌，但它不僅僅是一場宣傳活動或者一次對希特勒的保守派盟友的虛禮安撫。而且，在希特勒成為總理之后的幾個星期、幾個月里，那么多人轉投納粹主義旗下，或者至少是容忍而不是反對它，這個事實不能簡單地歸因于機會主義。用機會主義來解釋，也許適用于一個普通的政權，但不適用于納粹這種如此明顯地帶有激進特征的政權；那么多人如此迅速、如此熱情地擁護新政權，有力地說明德國社會中絕大多數教養良好的精英人士，無論此前堅守怎樣的政治立場，此時都已傾向于接受納粹主義所依托的許多原則。[[144]](#144_5)納粹黨不僅攫取了政治權力，還在第三帝國最初幾個月里取得了思想和文化的話語權。之所以出現這個結果，不僅因為納粹黨人陳述自己的思想時，常常使用含糊而多變的言辭向全體人民做出各種承諾，還因為納粹黨直接用于吸引公眾的那些原則和信念，有許多從19世紀晚期開始就已在德國的知識精英中間傳播。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秉持這些原則和信念的不是處境艱難的少數革命派，而是主要的社會組織和政治機構。對這些原則和信念予以部分或者全部排斥的，是共產黨人和社會民主黨人，他們把自己視為革命者，大多數德國人也普遍這樣看待他們。

歷史上所有大革命都對傳統持否定態度，乃至于像法國大革命在1789年所做的那樣，以“元年”開始新的紀年，或者借用托洛茨基在1917年俄國革命中的名言，把以前的世紀全部丟進“歷史的垃圾箱”。[[145]](#145_5)這種基要主義（fundamentalism）也可見于極右翼，例如舍納勒爾打算用德意志民族主義者的紀年取代基督教的紀年，但舍納勒爾把元年設定在遙遠的古代。而對于納粹黨及其支持者來說，“第三帝國”這個名稱，本身就強有力地表示它繼承了想象中的偉大傳統，即查理曼的第一帝國和俾斯麥的第二帝國所代表的傳統。因此，正如希特勒于1934年7月13日所說，德國歷史的自然發展進程曾被魏瑪共和國強加的反常措施所打斷，而國家社會主義革命恢復了此進程：

對我們來說，毀滅德意志第二帝國的那場革命只不過是一次驚人的分娩動作，它召喚著第三帝國的形成。我們打算重新締造一個能讓每位德國人熱愛并依戀的國家，建立一個令每位國民敬仰的政府，制定與德國人民的道德準則相稱的法律，任命一位人人心悅誠服的領袖。

對我們來說，革命不是一種永久的狀態。當一個民族的自然發展進程被一步暴力之棋將死的時候，可以用一場暴力的行動去釋放被人為打斷的進化潮流，讓自然發展再次自由演進。[[146]](#146_5)

這里所說的革命，同樣可以等同于奪取政權和建立獨裁政府。至于獲得權力之后如何運用它，就未必符合那場革命的定義了。多數的革命最終（即使只是暫時地）都歸于獨夫專制政權；但是除了國家社會主義革命之外，歷次革命在發動的時候實際上都不曾明確打算建立專制政權，例如布爾什維克革命所要建立的，也是由政治先鋒領導的無產階級集體專政。[[147]](#147_5)

納粹創造的是一個革命與復辟的綜合體。納粹黨人想要的，并不是像革命者在1789年的巴黎或者在1917年的彼得格勒（Petrograd）所宣講的那樣，徹底推翻社會制度。納粹黨建立的制度在本質上屬于另外一種東西。盡管他們言辭激烈地主張人人平等，但相對而言，納粹黨人最終并不關心社會的不平等。他們最在乎的，是種族、文化和意識形態。在未來的歲月里，他們將創立一套全新的制度，力圖通過這種制度重塑德國人的精神與性格。在藝術和文化生活的清洗完成之后，將由那些留下來的德國作家、音樂家和知識分子滿懷激情地用自己的才華創造德意志新文化。出于政治上的權宜考量，納粹黨此時基本上未曾對根基深厚的基督教會表露過敵意，但基督教會受保護的日子過不了多久就將結束。納粹黨即將著手建造一個種族烏托邦，烏托邦中的那個純種的英雄民族將會盡快、盡可能全面地做好準備，迎接對優越的日耳曼人種的終極考驗：一場打垮并消滅敵人、建立歐洲新秩序、最終統治世界的戰爭。到1933年夏，場地已經為建立那種前所未有的獨裁制度而清空。第三帝國誕生了。在下一階段，它將急速沖向精力充沛、日益偏執的成年期。

# 注釋

## 序言

[1.](#_1) Michael Ruck, Bibliographie zum Nationalsozialismus (2 vols., Darmstadt, 2000 [1995]).

[2.](#_2) Norbert Frei, National Socialist Rule in Germany: The Führer State 1933-1945 (Oxford, 1993 [1987]); Ludolf Herbst, Das 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land 1933-1945 (Frankfurt am Main, 1996)。在其他多種簡史著作中，Hans-Ulrich Thamer, Verführung und Gewalt: Deutschland 1933-1945 (Berlin, 1986)是一部曉暢的綜述；Jost Dülffer, Nazi Germany 1933-1945: Faith and Annihilation (London, 1996 [1992])，和Bernd-Jürgen Wendt, Deutschland 1933-1945: Das Dritte Reich. Handbuch zur Geschichte (Hanover, 1995)均為實用而且條理清晰的簡述。

[3.](#_3) Detlev J. K. Peukert, Volksgenossen und Gemeinschaftsfremde - Anpassung, Ausmerze, Aufbegehren unter dem Nationalsozialismus (Cologne, 1982)；英文版是Inside Nazi Germany: Conformity, Opposition and Racism in Everyday Life (London, 1989)。

[4.](#_4)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 (eds.), Nazism 1919-1945 (4 vols., Exeter, 1983-98 [1974]).

[5.](#_5_1) William L. Shirer,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 A History of Nazi Germany (New York, 1960)；Klaus Epstein的評論發表于Review of Politics, 23 (1961), 130-45。

[6.](#_6) Karl Dietrich Bracher, The German Dictatorship: The Origins, Structure, and Consequences of National Socialism (New York, 1970 [1969]).

[7.](#_7) Ian Kershaw, Hitler, I: 1889-1936: Hubris (London, 1998)；同一作者的Hitler, II: 1936-1945: Nemesis (London, 2000)。

[8.](#_8) Michael Burleigh, The Third Reich: A New History (London, 2000).

[9.](#_9) 我在此處所說的，是Orlando Figes, A People's Tragedy: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891-1924 (London, 1996)，或者Margaret Macmillan, Peacemakers: The Paris Conference of 1919 and its Attempt to End War (London, 2001)這樣的著作。

[10.](#_10) 首推Martin Broszat的Der Staat Hitlers: Grundlegung und Entwicklung seiner inneren Verfassung (Munich, 1969)，最具代表性的作品還有Hans Mommsen那些值得一讀再讀的精彩文章，收錄于他的Der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die deutsche Gesellschaft: Ausgewählte Aufsätze (Reinbek, 1991)和From Weimar to Auschwitz: Essays in German History (Princeton, 1991)。

[11.](#_11) 這沿用了我在Death in Hamburg: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the Cholera Years 1830-1910 (Oxford, 1987)和Rituals of Retribution: Capital Punishment in Germany 1600-1987 (Oxford, 1996)中使用的寫作方法，并且有所進益。

[12.](#_12) Karl Marx,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1852), in Lewis Feuer (ed.), Marx and Engels: Basic Writings on Politics and Philosophy (New York, 1959), 360.

[13.](#_13) L. P. Hartley, The Go-Between (London, 1953)，序言。

[14.](#_14) 參見Richard J. Evans, ‘History, Memory, and the Law: The Historian as Expert Witness’, History and Theory, 41 (2002) 277-96；以及Henry Rousso, The Haunting Past: History, Memory, and Justice in Contemporary France (Philadelphia, 2002 [1998])。

[15.](#_15) Ian Kershaw, Popular Opinion and Political Dissent in the Third Reich: Bavaria 1933-1945 (Oxford, 1983), vii.

[16.](#_16_1) Konrad Heiden, Geschichte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Die Karriere einer Idee (Berlin, 1932)；以及同一作者的Adolf Hitler: Das Zeitalter der Verantwortungslosigkeit. Eine Biographie (Zurich, 1936); Ernst Fraenkel, The Dual State (New York, 1941)；Franz Neumann, Behemoth: The Structure and Practice of National Socialism (New York, 1942)。

[17.](#_17_1) Friedrich Meinecke, Die deutsche Katastrophe (Wiesbaden, 1946)，此書已有文字古怪生硬的英譯本出版，即Sidney B. Fay所譯的The German Catastrophe: Reflections and Recollections (Cambridge, Mass., 1950)。激烈批評者的觀點參見Imanuel Geiss,‘Kritischer Rückblick auf Friedrich Meinecke’，以及同作者的Studien über Geschichte und Geschichts-wissenschaft (Frankfurt am Main, 1972)第89-107頁。支持者的觀點參見Wolfgang Wippermann, ‘Friedrich Meineckes “Die deutsche Katastrophe”: Ein versuch zur deutschen Vergangenheitsbewaltigung’，收錄于Michael Erbe編輯的Friedrich Meinecke heute: Bericht über ein Gedenk-Colloquium zuseinem 25. Todestag am 5. und 6. April 1979 (Berlin, 1981), 101-21。

[18.](#_18) 這是置于Karl Dietrich Bracher的經典著作Stufen der Machtergreifung開篇處的一系列問題，此書是Karl Dietrich Bracher等人合著的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Machtergreifung: Studien zur Errichtung des totalitdren Herrschaftssystems in Deutschland 1933/34 (Frankfurt am Main, 1974 [1960]), vol I, 17-8。

[19.](#_19) 關于納粹主義和第三帝國的史學著作，有許多精彩的論述，其中簡短評述首推Jane Caplan, ‘The Historiography of National Socialism’，收錄于Michael Bentley編輯的Companion to Historiography (London, 1997), 545-90；詳細研究首推Ian Kershaw, The Nazi Dictatorship: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of Interpretation (4th edn., London, 2000 [1985])。

[20.](#_20) Mark Mazower, Dark Continent: Europe's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1998).

[21.](#_21) Pierre Ayçoberry, The Nazi Question: An Essay on the Interpretations of National Socialism (1922-1975) (New York, 1981 [1979])是把馬克思主義者所做的各種闡釋置于闡釋者所處時代的政治語境中進行研究的一部佳作。

[22.](#_22) 東德方面的著述，參見Andreas Dorpalen的論述，German History in Marxist Perspective: The East German Approach (Detroit, 1988)。附有明晰評論的代表作選輯是Georg G. Iggers編輯的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Transformation: New Orientations in Recent East German History (Oxford, 1992)。研究第三帝國的最精深、最縝密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之一是Tim Mason，其著作首推Nazism, Fascism and the Working Class: Essays by Tim Mason (ed. Jane Caplan, Cambridge, 1995)和Social Policy in the Third Reich: The Working Class and the ‘National Community’ (ed. Jane Caplan, Providence, RI, 1993 [1977])。

[23.](#_23) Shirer, The Rise and Fall; Alan J. P. Taylor, The Course of German History (London, 1945); Edmond Vermeil, German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1956).

[24.](#_24) Ayçoberry, The Nazi Question, 3-15.

[25.](#_25_1) Rohan d'Olier Butler, The Roots of National Socialism 1783-1933 (London, 1941)是這類戰時宣傳的典范；另一部是Fossey J. C. Hearnshaw, Germany the Aggressor throughout the Ages (London, 1940)。同時代人對此做出聰明反駁的一部著作是Harold Laski, The Germans - are they Human? (London, 1941)。

[26.](#_26) 對這些問題的綜述，見Richard J. Evans, Rethinking German History: Nineteenth-Century German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Third Reich (London, 1987)，尤其是第1-54頁。John C. G. Rohl編輯的From Bismarck to Hitler: The Problem of Continuity in German History (London, 1970)是一部出色的文件精選集，并附有評論。我在大學本科期間對這些爭議的了解，來自John L. Snell 編輯的The Nazi Revolution - Germany's Guilt or Germany's Fate? (Boston, 1959)，這是一部實用的文摘簡編。

[27.](#_27) 這句話甚至適用于被第三帝國驅逐的德國人的著作中那些較為精深的作品，比如Hans Kohnd的著作，尤其是The Mind of Germany: The Education of a Nation (London, 1961)，以及Peter Viereck, Metapolitics: From the Romantics to Hitler (New York, 1941)。

[28.](#_28_1) Keith Bullivant, ‘Thomas Mann and Politics in the Weimar Republic’，輯錄于該作者編輯的Culture and Society in the Weimar Republic (Manchester, 1977)第14-38頁；Taylor, The Course, 92-3。

[29.](#_29) Gerhard Ritter, ‘The Historical Foundations of the Rise of National-Socialism’，收錄于Maurice Beaumont等人合著的The Third Reich: A Study Published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Philosophy and Humanistic Studies with the Assistance of UNESCO (New York, 1955), 381-416；同作者的Europa und die deutsche Frage: Betracht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liche Eigenart des deutschen Staatsgedankens (Munich, 1948)；Christoph Cornelissen, Gerhard Ritt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im 20. Jahrhundert (Düsseldorf, 2001)；Ritter早在1937年就提出過此論點，當時論證時較少使用負面語詞（出處同前，524-30）。各種其他觀點參見Hans Kohn編輯的German History: Some New German Views (Boston, 1954)。德國歷史學家Ludwig Dehio早先曾試圖打破這種模式，但只取得了部分成功，其著作Germany and World Politics (London, 1959 [1955]) 依然強調國際因素是首要因素。

[30.](#_30) 見Karl Dietrich Bracher, Die totalitäre Erfahrung (Munich, 1987)和Leonard Shapiro, Totalitarianism (London, 1972)。在論述此問題的其他著作中，Carl J. Friedrich and Zbigniew K. Brzezinski, 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 (New York, 1963)是一部經典的基本理論闡述，評論此書者甚眾；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1958)是一部開創性的哲學文本。

[31.](#_31) Eckard Jesse編輯的Totalitarismus im 20. Jahrhundert (Baden-Baden, 1996)以及Alfons Söllner編輯的Totalitarismus: Eine Ideengeschichte des 20. Jahrhunderts (Berlin, 1997)。

[32.](#_32) 進行這樣類比的著作，首推Ian Kershaw與Moshe Lewin合編的，匯集了豐碩研究成果的Stalinism and Nazism: Dictatorships in Comparison (Cambridge, 1997)；材料翔實的清晰論述參見Kershaw，The Nazi Dictatorship, 20-46。

[33.](#_33) Jürgen Steinle, ‘Hitler als “Betriebsunfall in der Geschichte”’, Geschichte in Wissenschaft und Unterricht, 45 (1994), 288-302頁對此觀點進行了分析。

[34.](#_34) Karl Dietrich Bracher, Die Auflösung der Weimarer Republik: Eine Studie zum Problem des Machtverfalls in der Demokratie (3rd edn., Villingen, 1960 [1955]); idem, et al.,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Machtergreifung.

[35.](#_35) Broszat, Der Staat Hitlers；Broszat等人編輯的Bayern in der NS-Zeit (6 vols., Munich, 1977-83); Peukert, Inside Nazi Germany；對研究進展所做的有益評論，參見Norbert Frei 所著簡史的最新德文版Der Führerstaat: Nationalsozialistische Herrschaft 1933 bis 1945 (Munich, 2001 [1987]), 282-304。最近有些論者試圖否定Broszat著作的權威性，理由是他與同時代的德國歷史學家一樣，年少時都曾加入希特勒青年團，而且與許多人一同被編入納粹黨的名冊（盡管他本人并不知情）。但這些論者無法令人信服，主要因為他們所討論的，并不是Broszat作為史學家而書寫的實際內容（Nicolas Berg, Der Holocaust und die westdeutschen Historiker: Erforschung und Erinnerung［Cologne, 2003］，尤其是第613-15頁）。

[36.](#_36) 這方面的研究著作和作品集包括，Robert Gellately與Nathan Stoltzfus合編的Social Outsiders in Nazi Germany (Princeton, 2001); Michael Burleigh and Wolfgang Wippermann, The Racial State: Germany 1933-1945 (Cambridge, 1991); Henry Friedlander, The Origins of Nazi Genocide: From Euthanasia to the Final Solution (Chapel Hill, NC, 1995); Wolfgang Ayass, ‘Asoziale’ im Nationalsozialismus (Stuttgart, 1995); Peter Longerich, Politik der Vernichtung: Eine Gesamtdarstellung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Judenverfolgung (Munich, 1998); Ulrich Herbert, Hitler's Foreign Workers: Enforced Foreign Labor in Germany under the Third Reich (Cambridge, 1997 [1985])。

[37.](#_37) Richard J. Evans, In Hitler's Shadow: West German Historians and the Attempt to Escape from the Nazi Past (New York, 1989)；同一作者的Rituals。

[38.](#_38) Richard J. Evans, Telling Lies About Hitler: The Holocaust, History, and the David Irving Trial (London, 2002).

[39.](#_39) Peter Longerich, Der ungeschriebene Befehl: Hitler und der Weg zur ‘Endlösung’ (Munich, 2001), 9-20.

[40.](#_40) Victor Klemperer, LTI: Notizbuch eines Philologen (Leipzig, 1985 [1946]).

## 第一章　歷史遺產

[1.](#_1_1) 研究俾斯麥帝國與第三帝國之間連續性的專著包括，Hans-Ulrich Wehler, Deut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III: Von der ‘Deutschen Doppelrevolution’ bis zum Beginn des Ersten Weltkrieges 1849-1914 (Munich, 1995)，以及Heinrich August Winkler, Der lange Weg nach Westen, I: Deutsche Geschichte vom Ende des Alten Reiches bis zum Untergang der Weimarer Republik (Munich, 2000)。

[2.](#_2_1) Friedrich Meinecke, ‘Bismarck und das neue Deutschland’，輯錄于該作者所著的Preussen und Deutschland im 19. und 20. Jahrhundert (Munich, 1918), 510-31，此語被譯成英文并引用于Edgar Feuchtwanger, Bismarck (London, 2002), 7。

[3.](#_3_1) Elizabeth Knowles (ed.),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Quotations (5th edn., Oxford, 1999), 116.

[4.](#_4_1) 未注明出處地引用于Alan J. P. Taylor, Bismarck: The Man and the Statesman (London, 1955), 115。

[5.](#_5_2) 關于這一時期以及此后的時期，清晰的概述見David Blackbourn, The Fontana History of Germany 1780-1918: The Long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1997)；詳細論述見James J. Sheehan, German History 1770-1866 (Oxford, 1989)；更詳細的論述見Thomas Nipperdey, Germany from Napoleon to Bismarck (Princeton, 1986 [1983])，極其詳細的論述見Hans-Ulrich Wehler, Deut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II: Von der Reformära bis zur industriellen und politischen ‘Deutschen Doppelrevolution’ 1815-1845/49 (Munich, 1987)。

[6.](#_6_1) Taylor, The Course, 69.

[7.](#_7_1) 對此問題的討論，主要參見Geoff Eley, From Unification to Nazism: Reinterpreting the German Past (London, 1986), 254-82; David Blackbourn and Geoff Eley, The Peculiarities of German History: Bourgeois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Nineteenth -Century Germany (Oxford, 1984); Evans, Rethinking German History, 93-122; Richard J. Evans (ed.)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Wilhelmine Germany (London, 1978)；Jürgen Kocka, ‘German History Before Hitler: The Debate about the German Sonderweg’,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23 (1988), 3-16；Robert G. Moeller, ‘The Kaiserreich Recast?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Modern German Historiography’,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17 (1984), 655-83。

[8.](#_8_1) 俾斯麥的傳記，佳作頗多，最好的兩種敘述體傳記是Ernst Engelberg, Bismarck (2 vols., Berlin, 1985 and 1990)以及Otto Pflanze, Bismarck (3 vols., Princeton, 1990)。

[9.](#_9_1) Heinrich August Winkler, Der lange Weg nach Westen, II: Deutsche Geschichte vom ‘Dritten Reich’ bis zur Wiedervereinigung (Munich, 2000), 645-8.

[10.](#_10_1) Heinrich August Winkler, The Long Shadow of the Reich: Weighing up German History（2001年倫敦德國歷史研究所年度講座；London，2002）。Lothar Kettenacker, ‘Der Mythos vom Reich’，收錄于Karl H. Bohrer (ed.) Mythos und Moderne (Frankfurt am Main, 1983), 262-89。

[11.](#_11_1) Karl Marx, ‘Randglossen zum Programm der deutschen Arbeiterpartei’ (Kritik des Gothaer Programms, 1875), in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Ausgewählte Schriften (2 vols., East Berlin, 1968), II. 11-28, at 25.

[12.](#_12_1) Otto Büsch, Militärsystem und Sozialleben im alten Preussen 1713-1807: Die Anfänge der sozialen Militarisierung der preussisch-deutschen Gesellschaft (Berlin, 1962).

[13.](#_13_1) Horst Kohl (ed.), Die politischen Reden des Fürsten Bismarck (14 vols., Stuttgart, 1892-1905), II. 29-30.

[14.](#_14_1) Lothar Gall, Bismarck: The White Revolutionary (2 vols., London, 1986 [1980])，是研究俾斯麥的一部出類拔萃的分析型著作。

[15.](#_15_1) 關于募兵史，見Ute Frevert, Die kasernierte Nation: Militärdienst und Zivilgesellschaft in Deutschland (Munich, 2001)；把德國的軍國主義置于更加廣闊的背景中論述的著作有Volker R. Berghahn, Militarism: The History of an International Debate 1861-1979 (Cambridge, 1984 [1981])，同一作者編輯的Militarismus (Cologne, 1975), Martin Kitchen, A Military History of Germany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Day (London, 1975)以及Gordon A. Craig的經典著作The Politics of the Prussian Army 1640-1945 (New York, 1964 [1955])；不循常軌的觀點見Geoff Eley, ‘Army, State and Civil Society: Revisiting the Problem of German Militarism’，收錄于同一作者的著作From Unification to Nazism, 85-109。

[16.](#_16_2) Martin Kitchen, The German Officer Corps 1890-1914 (Oxford, 1968); Karl Demeter, Das deutsche Offizierkorps in Gesellschaft und Staat 1650-1945 (Frankfurt am Main, 1962)。關于“政變的永久威脅”，見Volker R. Berghahn, Germany and the Approach of War in 1914 (London, 1973), 13-15。

[17.](#_17_2) Richard J. Evans, Rethinking German History, 248-90; idem, Rereading German History: From Unification to Reunification 1800-1996 (London, 1997), 65-86.

[18.](#_18_1) Ute Frevert, ‘Bourgeois Honour: Middle-class Duellists in Germany from the Late Eighteenth to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in David Blackbourn and Richard J. Evans (eds.), The German Bourgeoisie: Essays on the Social History of the German Middle Class from the Late Eighteenth to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1991), 255-92；eadem, Ehrenmänner: Das Duell in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 (Munich, 1991).

[19.](#_19_1) Eley, From Unification to Nazism, 85-109; Wehler, Deut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III. 873-85.

[20.](#_20_1) Michael Geyer, ‘Die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Militärs von 1860-1956: Ein Bericht über die Forschungslage (1945-1975)’, in Hans-Ulrich Wehler (ed.), Die moderne deutsche Geschichte in der internationalen Forscbung 1945-1975 (Gottingen, 1978), 256-86; Helmut Bley, Namibia under German Rule (Hamburg, 1996 [1968]).

[21.](#_21_1) Gesine Krüger, Kriegshewältigung und Gescbicbtsbeivusstsein: Realität, Deutung und Verarbeitung des deutschen Kolonialkrieges in Namibia 1904 bis 1907 (Gottingen, 1999); Tilman Dedering, “‘A Certain Rigorous Treatment of all Parts of the Nation”: The Annihilation of the Herero in German Southwest Africa 1904’, in Mark Levene and Penny Roberts (eds.), The Massacre in History (New York, 1999), 205-12.

[22.](#_22_1) David Schoenbaum, Zabern 1913: Consensus Politics in Imperial Germany (London, 1982); Nicholas Stargardt, The German Idea of Militarism 1866-1914 (Cambridge, 1994); Wehler, Deutsche Gesellscbaftsgeschichte III. 1125-9.

[23.](#_23_1) Ulrich von Hassell, Die Hassell-Tagebiscber 1938-1944 (ed. Friedrich Freiherr Hiller von Gaertringen, Berlin, 1989), 436.

[24.](#_24_1) Wolfgang J. Mommsen, Das Ringen um den nationalen Staat: Die Gründung und der innere Ausbau des Deutschen Reiches unter Otto von Bismarck 1850- 1890 (Berlin, 1993), 439-40; David Blackbourn, Marpingen: Apparitions of the Virgin Mary in Bismarckian Germany (Oxford, 1993).

[25.](#_25_2) Vernon Lidtke, The Outlawed Party: Social Democracy in Germany, 1878-1890 (Princeton, 1966); Evans, Rituals, 351-72.

[26.](#_26_1) 在許多講述社會民主黨演化史的著作中，Susanne Miller and Heinrich Potthoff, A History of German Social Democracy: From 1848 to the Present (Leamington Spa, 1986 [1983])以當今的德國社會民主黨的視角撰寫，是一部實用的介紹性文本；Detlef Lehnert, Sozialdemokratie zwischen Protestbewegung und Regierungspartei 1848-1983 (Frankfurt am Main, 1983)是一部簡史佳作；Stefan Berger, Social Democracy and the Working Class in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century Germany (London, 2000)是較新的研究著作。

[27.](#_27_1) Alex Hall, Scandal, Sensation and Social Democracy: The SPD Press and Wilhelmine Germany 1890-1914 (Cambridge, 1977); Klaus Saul, ‘Der Staat und die “Mächte des Umsturzes”: Ein Beitrag zu den Methoden antisozialistischer Repression und Agitation vom Scheitern des Sozialistengesetzes bis zur Jahrhundertwende’, Archiv für Sozialgeschichte, 12 (1972), 293-350; Alex Hall, ‘By Other Means: The Legal Struggle against the SPD in Wilhelmine Germany 1890-1900’, Historical Journal, 17 (1974), 365-86.

[28.](#_28_2) 清晰明了的簡要概述可參閱Gerhard A. Ritter, Die deutschen Parteien 1830-1914: Parteien und Gesellschaft im konstitutionellen Regierungssystem (Gottingen, 1985)；論述這個題目的經典文章是M. Rainer Lepsius, ‘Parteisystem und Sozialstruktur: Zum Problem der Demokratisierung der deutschen Gesellschaft’，收錄于Gerhard A. Ritter (ed.) Die deutschen Parteien vor 1918 (Cologne, 1973), 56-80。

[29.](#_29_1) Gerhard A. Ritter, Wahigeschichtliches Arbeitsbuch: Materialien zur Statistik des Kaiserreichs 1871-1918 (Munich, 1980), 42.

[30.](#_30_1) Stanley Suval, Electoral Politics in Wilhelmine Germany (Chapel Hill, NC, 1985); Margaret L. Anderson, Practicing Democracy: Elections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Imperial Germany (Princeton, 2000).

[31.](#_31_1) Kurt Koszyk, Deutsche Presse im 19. Jahrhundert: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Presse, II (Berlin, 1966).

[32.](#_32_1) Richard J. Evans (ed.), Kneipengespräche im Kaiserreich: Die Stimmungsberichte der Hamburger Politischen Polizei 1892-1914 (Reinbek, 1989).

[33.](#_33_1) 簡論參見Wehler, Deut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III, 961-5；詳論參見William W. Hagen, Germans, Poles, and Jews: The Nationality Conflict in the Prussian East, 1772-1914 (Chicago, 1980)。

[34.](#_34_1) Evans (ed.), Kneipengespräche, 361-83.

[35.](#_35_1) Volker R. Berghahn, Der Tirpitz-Plan: Genesis und Verfall einer innenpolitischen Krisenstrategie unter Wilhelm II. (Düsseldorf, 1971).

[36.](#_36_1) 關于威廉二世的性格和影響力，有一部明晰的評論性新著Christopher Clark, Kaiser Wilhelm II (London, 2000)。

[37.](#_37_1) Geoffrey Hosking, Russia: People and Empire 1552-1917 (London, 1997).

[38.](#_38_1) George L. Mosse, The Nationalization of the Masses: Political Symbolism and Mass Movements in Germany from the Napoleonic Wars through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 1975).

[39.](#_39_1) Alan Milward and Samuel B. Saul,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ies of Continental Europe 1850-1914 (London, 1977), 19-20.

[40.](#_40_1) 綜述參見Hubert Kiesewetter, Industrielle Revolution in Deutschland 1815-1914 (Frankfurt am Main, 1989)。

[41.](#_41_1) Volker Ullrich, Die nervöse Grossmacht 1871-1918: Aufstieg und Untergang des deutscben Kaiserreichs (Frankfurt am Main, 1997); Joachim Radkau, Das Zeitalter der Nervosität: Deutschland zwischen Bismarck und Hitler (Munich, 1998).

[42.](#_42_1) August Nitschke et al., Jahrhundertwende: Der Aufbruch in die Moderne 1880-1930 (2 vols., Reinbek, 1990).

[43.](#_43_1) 這些論點見Blackbourn and Eley, The Peculiarities。

[44.](#_44_1) Peter Pulzer, The Rise of Political Anti-Semitism in Germany and Austria (New York, 1964), 112-13; Rosemarie Leuschen-Seppel, Sozialdemokratie und Antisemitismus im Kaiserreich: Die Auseinandersetzung der Partei mit den konservativen und volkischen Strömungen des Antisemitismus 1871-1914 (Bonn, 1978), 140-42; Richard S. Levy, The Downfall of the Anti-Semitic Political Parties in Imperial Germany (New Haven, 1975)。另見Paul W.的開創性著作Massing, Rehearsal for Destruction (New York, 1949)。

[45.](#_45_1) 我在此處采用了Marion Kaplan關于同化（完全失去原有的文化身份）與文化適應（在多元文化環境中形成雙重文化身份）之間的區分，參見Marion A. Kaplan, ‘The Acculturation, Assimil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Jews in Imperial Germany’, Year Book of the Leo Baeck Institute, 27 (1982)第3-35頁。

[46.](#_46_1) Till van Rahden, Juden und andere Breslauer: Die Beziehungen zwischen Juden, Protestanten und Katholiken in einer deutschen Grossstadt von 1860 bis 1925 (Göttingen, 2000), 147-9; Peter J.G. Pulzer, Jews and the German State: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a Minority, 1848-1933 (Oxford, 1992), 6-7; Shulamit Volkov, Die Juden in Deutschland 1780-1918 (Munich, 1994); Usiel O. Schmelz, ‘Die demographische Entwicklung der Juden in Deutschland von der Mitte des 19. Jahrhunderts ‘bis 1933’, Bulletin des Leo Baeck Instituts, 83 (1989), 15-62, at 39-41; Jacob Toury, Soziale und politische Geschichte der Juden in Deutschland 1847-1871: Zwischen Revolution, Reaktion und Emanzipation (Düsseldorf, 1977), 60; Monika Richarz, Jüdisches Leben in Deutschland, II: Selbstzeugnisse zur Sozialgeschichte im Kaiserreich (Stuttgart, 1979), 16-17; Anthony Kauders, German Politics and the Jews: Düsseldorf and Nuremberg 1910-1933 (Oxford, 1996), 26; Kerstin Meiring, Die christlich-judische Mischehe in Deutschland, 1840-1933 (Hamburg, 1998).

[47.](#_47_1) Pulzer, Jews, 106-20.

[48.](#_48_1) Dietz Bering, The Stigma of Names: Antisemitism in German Daily Life, 1812-1933 (Cambridge, 1992. [1987]).

[49.](#_49_1) Pulzer, Jews, 5, II.

[50.](#_50_1) Niall Ferguson, The World's Banker: The History of the House of Rothschild (London, 1998); Fritz Stern, Gold and Iron: Bismarck, Bleichröder and the Building of the German Empire (New York, 1977).

[51.](#_51_1) Robert Gellately,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Despair: Shopkeepers and German Politics, 1890-1914 (London, 1974), 42-3; Richarz, Jüdisches Leben, II. 17, 23-35.

[52.](#_52_1) 出處同上，第31-4頁。

[53.](#_53_1) Peter Pulzer, ‘Jews and Nation-Building in Germany 1815-1918’, Year Book of the Leo Baeck Institute, 41 (1996), 199-214.

[54.](#_54_1) 此處主要參考了Werner E. Mosse, Jews in. the German Economy: The German-Jewish Economic Élite 1820-1935 (Oxford, 1987)，以及同一作者的The German-Jewish Economic Élite 1820-1935: A Socio-Cultural Profile (Oxford, 1989)，兩書不僅是精深的學術著作，也是作者對他本人所屬社會群體之成就的深情贊頌。

[55.](#_55_1) Pulzer, The Rise, 94-101, 113; Shulamit Volkov, Jüdisches Leben und Antisemitismus im 19. und 20. Jahrhundert (Munich, 1990).

[56.](#_56_1) 關于伯克爾與反猶運動，更全面的介紹參見David Peal, ‘Antisemitism by Other Means? The Rural Cooperative Movement in Late 19th Century Germany’，收錄于Herbert A. Strauss (ed.) Hostages of Modernization: Studies on Modern Antisemitism 1870-1933/39: Germany - Great Britain - France (Berlin, 1993), 128-49；James N. Retallack, Notables of the Right: The Conservative Party and Political Mobilization in Germany, 1876-1918 (London, 1988)，尤其是第91-9頁；Hans-Jürgen Puhle, Agrarische Interessenpolitik und preussischer Konservatismus im wilhelminischen Reich 1893-1914: Ein Beitrag zur Analyse des Nationalismus in Deutschland am Beispiel des Bundes der Landwirte und der Deutscb-Konservativen Partei (Hanover, 1967)，尤其是第111-40頁。

[57.](#_57_1) Pulzer, The Rise, 53-5, 116; Wehler, Deut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III. 924-34; Thomas Nipperdey, Deutsche Geschichte 1866-1918, II: Machtstaat vor der Demokratie (Munich, 1992), 289-311.

[58.](#_58_1) Jacob Katz, From Prejudice to Destruction: Anti-Semitism, 1700-1933 (Cambridge, Mass. 1980)，是一部經典的綜述。關于德國的天主教反猶思想, 參見Olaf Blaschke, Katholizismus und Antisemitismus im Deutschen Kaiserreich (Gottingen, 1997); Helmut Walser Smith, ‘The Learned and the Popular Discourse of Anti-Semitism in the Catholic Milieu in the Kaiserreich’,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27 (1994), 315-28. Werner Jochmann, Gesellschaftskrise und Judenfeindschaft in Deutschland 1870-1945 (Hamburg, 1988), 其中有一章精彩的導論，見第30-98頁。James F. Harris, The People Speak! Anti-Semitism and Emancip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Bavaria (Ann Arbor, 1994)一書過于輕率地忽略了社會經濟因素；反猶主義史的寫作不應淪為不做論證的信口演說。

[59.](#_59_1) Wilhelm Marr, Vom jüdischen Kriegsschauplatz: Eine Streitschrift (Berne, 1879), 19，引用于Pulzer, The Rise, 50；另見Marr的小冊子Der Sieg des judenthums über das Germanenthum vom nicht konfessionelien Standpunkt aus betrachtet (Berlin, 1873)。

[60.](#_60_1) Moshe Zimmermann, Wilhelm Marr: The Patriarch of Anti-Semitism (New York, 1986), 89, 150-51, 154; Daniela Kasischke-Wurm, Antisemitismus im Spiegel der Hamburger Presse während des Kaiserreichs (1884-1914) (Hamburg, 1997) 240-46.

[61.](#_61_1) 出處同上，第77頁。

[62.](#_62_1) Wehler, Deut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III. 925-9.

[63.](#_63_1) Evans (ed.), Kneipengespräche, 317.

[64.](#_64_1) 出處同上，第313-21頁。

[65.](#_65_1) Leuschen-Seppel, Sozialdemokratie，尤其是第36, 96, 100, 153, 171頁；Evans (ed.) Kneipengesprdche, 302-6, 318-19。這些觀點是為了回應Daniel J. Goldhagen, Hitler's Willing Executioners: Ordinary Germans and the Holocaust (New York, 1996)中的一概而論，這些觀點的更詳細論述可參閱Evans, Rereading, 119-44。

[66.](#_66_1) Stefan Scheil, Die Entwicklung des politischen Antisemitismus in Deutschland zwischen 1881 und 1912: Eine wahlgeschichtliche Untersuchung (Berlin, 1999).

[67.](#_67_1) 尤見于Harris, The People Speak!，以及Helmut Walser Smith, The Butcher's Tale: Murder and Anti-Semitism in a German Town (New York, 2002)（此書有出色的細節描寫，但夸大了普魯士偏遠的東部小鎮一宗“殺生祭祀”控告案的重要性）。另見Christoph Nonn, Eine Stadt sucht einen Mörder: Gerücht, Gewalt und Antisemitismus im Kaiserreich (Göttingen, 2002)。關于反猶報刊對早先的一宗殺生祭祀控告案的反應，參見Kasischke-Wurm, Antisemitismus, 175-82。

[68.](#_68_1) 證據見David Kertzer, Unholy War: The Vatican's Role in the Rise of Modern Anti-Semitism (London, 2001)，但作者對于這些材料之重要性的斷言過于一概而論。天主教反猶思想在德國的普及是毋庸置疑的，從社會和文化角度對此所做的研究參見Blaschke, Katholizismus und Antisemitismus; Michael Langer, Zwischen Vorurteil und Aggression: Zum Judenbild in der deutschspraehigen katholischen Volksbildung des 19. Jahrhunderts (Freiburg, 1994); Walter Zwi Bacharach, Anti-Jewish Prejudices in German-Catholic Sermons (Lewiston, Pa., 1993); David Blackbourn, ‘Roman Catholics, the Centre Party and Anti-Semitism in Imperial Germany’, in Paul Kennedy and Anthony Nicholls (eds.) Nationalist and Racialist Movements in Britain and Germany before 1914 (London, 1981), 106-29；關于國際范圍的天主教反猶思想，見Olaf Blaschke and Aram Mattioli (eds.) Katholischer Antisemitismus im 19. Jahrhundert: Ursachen und Traditionen im internationalen Vergleich (Zurich, 2000)。關于天主教教區的農民抗議與反猶運動，參見Ian Farr, ‘Populism in the Countryside: The Peasant Leagues in Bavaria in the 1890s’, in Evans (ed.) Society and Politics, 136-59。

[69.](#_69_1) 可參閱Norbert Kampe, Studenten und ‘Judenfrage’ im deutschen Kaiserreich: Die Entstehung einer akademischen Trägerschicht des Antisemitismus (Göttingen, 1988)。

[70.](#_70_1) Stephen Wilson, Ideology and Experience: Antisemitism in France at the Time of the Dreyfus Affair (New York, 1982 [1980]); John D. Klier and Shlomo Lambroza (eds.), Pogroms: Anti-Jewish Violence in Modern Russian History (Cambridge, 1992).

[71.](#_71_1) David Blackbourn, Populists and Patricians: Essays in Modern German History (London, 1987), 217-45 (‘The Politics of Demagogy in Imperial Germany’).

[72.](#_72_1) Julius Langbehn, Rembrandt als Erzieher (38th edn., Leipzig, 1891 [1890]), 292；同一作者的Der Rembrandtdeutsche: Von einem Wahrheitsfreund (Dresden, 1892), 184，全部引用于Pulzer, The Rise, 242；另見Fritz Stern, 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Despair: A Study in the Rise of the German Ideology (New York, 1961)。

[73.](#_73_1) 萊辛這部發表于1779年的劇作主張宗教寬容，尤其是對猶太人。引語出自Cosima Wagner, Die Tagebücher (ed. Martin Gregor-Dellin and Dietrich Mack, Munich, 1977), II. 852（1881年12月18日）；159, 309; Jacob Katz, The Darker Side of Genius: Richard Wagner's AntiSemitism (Hanover, 1986)對這個有爭議的題目做了理性的梳理。

[74.](#_74) George L. Mosse, The Crisis of German Ideology: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the Third Reich (London, 1964), 88-107; Annette Hein, ‘Es ist viel “Hitler” in Wagner’: Rassismus undantisemitische Deutschtumsideologie in den ‘Bayreuther Blättern’ (1878-1938) (Tübingen, 1996).

[75.](#_75) Winfried Schüler, Der Bayreuther Kreis von seiner Entstehung bis zum Ausgang der wilhelminischen Ära (Münster, 1971); Andrea Mork, Richard Wagner als politischer Schriftsteller: Weltanschauung und Wirkungsgeschichte (Frankfurt am Main, 1990); 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 Die Grundlagen des XIX. Jahrhunderts (2 vols., Munich, 1899); Geoffrey G. Field, Evangelist of Race: The Germanic Vision of 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 (New York, 1981).

[76.](#_76) Ludwig Woltmann, Politische Anthropologie (ed. Otto Reche, Leipzig, 1936 [1900]), 16-17, 267，引用于Mosse, The Crisis, 100-2。

[77.](#_77) Woodruff D. Smith,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Nazi Imperialism (New York, 1986), 83-111；另見Karl Lange, ‘Der Terminus “Lebensraum” in Hitlers Mein Kampf’,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hereinafter VfZ) 13 (1965), 426-37。

[78.](#_78_1) Paul Crook, Darwinism, War and History: The Debate Over the Biology of War from the ‘Origin of Species’ to the First World War (Cambridge, 1994)，尤其是第30, 83頁；Imanuel Geiss (ed.) July 1914: The Outbreak of the First World War. Selected Documents (London, 1967)第22頁；Holger Afflerbach, Falkenhayn: Politisches Denken und Handeln im Kaiserreich (Munich, 1994)；參見Evans, Rereading, 119-44，綜述了德國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歷史和史學著作。

[79.](#_79) 綜述參見Paul Weindling, Health, Race and German Politics between National Unification and Nazism 1870-1945 (Cambridge, 1989)，以及Peter Weingart et al., Rasse, Blut und Gene: Geschichte der Eugenik und Rassenhygiene in Deutschland (Frankfurt am Main, 1992-[1988])。

[80.](#_80) Sheila F. Weiss, Race Hygiene and National Efficiency: The Eugenics of Wilhelm Schallmayer (Berkeley, 1987); Evans, Rituals, 438; Roger Chickering, Imperial Germany and a World Without War: The Peace Movement and German Society, 1892-1914 (Princeton, 1975), 125-9.

[81.](#_81) Jeremy Noakes, ‘Nazism and Eugenics: The Background to the Nazi Sterilization Law of 14 July 1933’, in Roger Bullen (eds.) Ideas into Politics: Aspects of European History 1880-1950 (London, 1984), 75-94，是一篇具有開創意義的文章，至今依然是了解這些思想家的必要指南。

[82.](#_82) Karl Heinz Roth, ‘Schein-Alternativen im Gesundheitswesen: Alfred Grotjahn (1869-1931) - Integrationsfigur etablierter Sozialmedizin und nationalsozialistischer “Rassenhygiene”’, in Karl Heinz Roth (ed.) Erfassung zur Vernichtung: Von der Sozialhygiene zum ‘Gesetz über Sterbehilfe’ (Berlin, 1984), 31-56；綜述參見Sheila Weiss, ‘The Race Hygiene Movement in Germany’, in Mark B. Adams (ed.) The Wellborn Science: Eugenics in Germany, France, Brazil, and Russia (New York, 1990), 8-68。

[83.](#_83) 他的真名是阿道夫·蘭茨（Adolf Lanz），但為了顯得血統高貴而自稱約爾格·蘭茨·馮·利本菲爾斯。Hans-Walter Schmuhl, Rassenhygiene, Nationalsozialismus, Euthanasie: Von der Verhütung zur Vernichtung ‘lebensunwerten Lebens’, 1890-1945 (Göttingen, 1987); Wilfried Daim, Der Mann, der Hitler die Ideen gab: Die sektiererischen Grundlagen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Vienna, 1985 [1958])。

[84.](#_84) Weiss, ‘The Race Hygiene Movement’, 9-11.

[85.](#_85_1) Max Weber, ‘Der Nationalstaat und die Volkswirtschaftpolitik’，收錄于該作者編輯的Gesammelte politische Schriften (ed. J. Winckelmann, 3rd edn., Tübingen, 1971), 23。

[86.](#_86) Richard Hinton Thomas, Nietzsche in German Politics and Society 1890-1918 (Manchester, 1983)，尤其是第80-95頁。把尼采的作品置于這種大背景中進行評論的新著，參見Bernhard H. F. Taureck, Nietzsche und der Faschismus: Ein Politikum (Leipzig, 2000)。

[87.](#_87) Steven E. Aschheim, The Nietzsche Legacy in Germany 1890-1990 (Berkeley, 1992).

[88.](#_88) Mosse, The Crisis, 204-7; Walter Laqueur, Young Germany: A History of the German Youth Movement (London, 1962); Jürgen Reulecke, ‘Ich möchte einer werden so wie die...’ Männerbünde im 20. Jahrhundert (Frankfurt am Main, 2001); Daim, Der Mann, 71-2.

[89.](#_89) Alastair Thompson, Left Liberals, the State, and Popular Politics in Wilhelmine Germany (Oxford, 2000).

[90.](#_90) Stefan Breuer, Ordnungen der Ungleichheit- die deutsche Rechte im Widerstreit ihrer Ideen 1871-1945 (Darmstadt, 2001)，是一部專題論著，強調了納粹主義到來之前出現的一種有效綜合體的失敗（第370-76頁）。

[91.](#_91_1) Andrew G. Whiteside, The Socialism of Fools: Georg von Schönerer and Austrian Pan-Germanism (Berkeley, 1975), esp. 73.

[92.](#_92_1) John W. Boyer, Political Radicalism in Late Imperial Vienna: Origins of the Christian Social Movement, 1848-1897 (Chicago, 1981).

[93.](#_93_1) Pulzer, The Rise, 207.

[94.](#_94_1) Brigitte Hamann, Hitler's Vienna: A Dictator's Apprenticeship (Oxford, 2000)第236-53頁，全面論述了舍納勒爾以及同時代的其他維也納空想家。

[95.](#_95_1) Carlile A. Macartney, The Habsburg Empire 1790-1918 (London, 1968), 632-5, 653-7, 666, 680, 799; Pulzer, The Rise, 149-60, 170-74, 206-9; Carl E. Schorske, Finde-Siecle Vienna: Politics and Culture (New York, 1980), 116-180; Massing, Rehearsal, 241; Hellmuth von Gerlach, Von rechts nach links (Hildesheim, 1978 [1937]), 112-14; Andrew G. Whiteside, Austrian National Socialism before 1918 (The Hague, 1962).

[96.](#_96_1) Woodruff D. Smith, The German Colonial Empire (Chapel Hill, NC, 1978); Fritz Ferdinand Müller, Deutschland-Zanzibar-Ostafrika: Geschichte einer deutschen Kolonialeroberung 1884-1890 (Berlin, 1990 [1959]).

[97.](#_97_1) Gerhard Weidenfeller, VDA: Verein für das Deutschtum im Ausland: Allgemeiner Deutscher Schulverein (1881-1918).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Nationalismus und Imperialismus im Kaiserreich (Berne, 1976).

[98.](#_98_1) Geoff Eley, Reshaping the German Right: Radical Nationalism and Political Change after Bismarck (London, 1980), 366; Roger Chickering, We Men Who Feel Most German: A Cultural Study of the Pan-German League 1886-1914 (London, 1984), 24-73; Wilhelm Deist, Flottenpolitik und Flottenpropaganda: Das Nachrichtenbüro des Reichsmarineamts 1897-1914 (Stuttgart, 1976)；Richard Owen, ‘Military-Industrial Relations: Krupp and the Imperial Navy Office', in Evans (ed.), Society and Politics, 71-89; Marilyn Shevin Coetzee, The German Army League: Popular Nationalism in Wilhelmine Germany (New York, 1990); Richard W. Tims, Germanizing Prussian Poland: The H-K-T Society and the Struggle for the Eastern Marches in the German Empire 1894-1919 (New York, 1941); Adam Galos et al., Die Hakatisten: Der Deutsche Ostmarkenverein 1894-1934 (Berlin, 1966).

[99.](#_99_1) Chickering, We Men, 128, 268-71; Coetzee, The German Army League, 19-23; Ute Planert, Antifeminismus im Kaiserreich: Diskurs, soziale Formation und politische Mentalität (Göttingen, 1998), 118-76.

[100.](#_100_1) Chickering, We Men, 102-21.

[101.](#_101_1) 出處同上，第284-6頁；Wehler, Deut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III. 1071-81；文摘的英譯版收錄于Roderick Stackelberg and Sally A. Winkle (eds.) The Nazi Germany Sourcebook: An Anthology of Texts (London, 2002), 20-26。

[102.](#_102_1) Chickering, We Men, 74-97, 284-6.

[103.](#_103_1) 出處同上，第122-32頁；以及Klaus Bergmann, Agrarromantik und Grossstadtfeindschaft (Meisenheim, 1970)。

[104.](#_104) Chickering, We Men, 253-91; Eley, Reshaping, 316-34; Dirk Stegmann, Die Erben Bismarcks: Parteien und Verbände in der Spätphase des Wilhelminischen Deutschlands: Sammlungspolitik 1897-1914 (Cologne, 1970), 352-48; Fritz Fischer, War of Illusions: German Politics from 1911 to 1914 (London, 1975 [1969]).

[105.](#_105) Iris Hamel, Völkischer Verband und nationale Gewerkschaft: Der Deutschnationale Handlungsgehilfenverband, 1893-1933 (Frankfurt am Main, 1967); Planert, Antifeminismus, 71-9.

[106.](#_106) 備忘錄的摘要以及皇帝的回復，參見Röhl, From Bismarck to Hitler, 49-52；以及Stackelberg and Winkle (eds.) The Nazi Germany Sourcebook, 29-30。

[107.](#_107) Hartmut Pogge-von Strandmann, ‘Staatsstreichpläne, Alldeutsche und Bethmann Hollweg’，收錄于該作者與Imanuel Geiss合著的Die Erforderlichkeit des Unmöglichen: Deutschland am Vorabend des ersten Weltkrieges (Frankfurt am Main, 1965), 7-45；貝特曼和皇帝的答復文本在第32-9頁；皇帝與張伯倫之間關系的文件證明，參見Röhl, From Bismarck to Hitler, 41-8。

[108.](#_108) Hew Strachan, The First World War, I: To Arms (Oxford, 2001)，第1005-14頁精彩地梳理了時人對于戰爭可能持續多長時間的各種觀點。

[109.](#_109_1) Martin Kitchen, The Silent Dictatorship: The Politics of the German High Command under Hindenburg and Ludendorff, 1916-1918 (London, 1976)。新著綜論中的最佳作品是Roger Chickering, Imperial Germany and the Great War, 1914-1918 (Cambridge, 1998)。

[110.](#_110_1) 在海量的著作中, Figes, A People's Tragedy是新作品中的最佳論著。

[111.](#_111_1) Robert Service, Lenin: A Political Life (3 vols., London, 1985-95)是公認的傳記佳作；探討列寧挑動德國革命的種種努力，最佳切入點是蘇聯密使卡爾·拉德克的活動，參見Marie-Luise Goldbach, Karl Radek und die deutsch-sowjetischen Beziehungen 1918-1923 (Bonn, 1973)，以及Warren Lerner, Karl Radek: The Last Internationalist (Stanford, Calif., 1970)。

[112.](#_112_1) Heinrich August Winkler, Von der Revolution zur Stabilisierung: Arbeiter und Arbeiterbewegung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1918 bis 1924 (Bonn, 1984), esp. 114-34, 468-552.

[113.](#_113_1) Arno J. Mayer, Politics and Diplomacy of Peacemaking: Containment and Counterrevolution at Versailles 1918-1919 (2nd edn., New York, 1969 [1967])是綜論；Oszkár Jászi,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in Hungary (London, 1924)是時人對事件的描述。

[114.](#_114) Berliner Tageblatt, I August 1918，引用于David Welch, Germany, Propaganda and Total War, 1914-1918: The Sins of Omission (London, 2000), 241。另見Aribert Reimann, Der grosse Krieg der Sprachen: Untersuchungen zur historischen Semantik in Deutschland und England zur Zeit des Ersten Weltkriegs (Essen, 2000)。

[115.](#_115) 參見Chickering, Imperial Germany, 178-91，是簡史新著中的最佳作品。

[116.](#_116) Welch, Germany, 241-2; Wilhelm Deist, ‘Censorship and Propaganda in Germany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 in Jean-Jacques Becker and Stéphane Audoin-Rouzeau (eds.), Les Sociétés européennes et la guerre de 1914-1918 (Paris, 1990), 199-210; Alice Goldfarb Marquis, ‘Words as Weapons: Propaganda in Britain and Germany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13 (1978), 467-98.

[117.](#_117_1) Fritz Fischer, Germany's Aims in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 1967 [1961])，見全書各處。

[118.](#_118_1) Bullitt Lowry, Armistice 1918 (Kent, Ohio, 1996); Hugh Cecil and Peter Liddle (eds.), At the Eleventh Hour: Reflections, Hopes and Anxieties at the Closing of the Great War, 1918 (Barnsley, 1998).

[119.](#_119_1) Stenographischer Bericht über die öffentlichen Verhandlungen des 15. Untersucbungsausschusses der verfassungsgebenden Nationalversammlung, II (Berlin, 1920), 700-1 (18 November 1919)。另見Erich Ludendorff, Kriegfuhrung und Politik (Berlin, 1922)，以及Paul von Hindenburg, Aus meinem Leben (Leipzig, 1920), 403；綜述參見Friedrich Freiherr Hiller von Gaertringen, ‘“Dolchstoss-Diskussion” und “Dolchstosslegende” im Wandel von vier Jahrzehnten’, and Waldemar Besson與Friedrich Freiherr Hiller von Gaertringen (eds.) Geschichtsund Gegenwartsbewusstsein (Göttingen, 1963), 122-60。另見新著Jeffrey Verhey, The Spirit of 1914: Militarism, Myth and Mobilization in Germany (Cambridge, 2000), 219-23，以及Chickering, Imperial Germany, 189-91。

[120.](#_120_1) William II, My Memoirs 1878-1918 (London, 1922), 282-3。綜述參見Wilhelm Deist, ‘The Military Collapse of the German Empire: The Reality Behind the Stab-in-the-Back Myth’, War in History, 3 (1996), 186-207。

[121.](#_121_1) Friedrich Ebert, Schriften, Aufzeichnungen, Reden (2 vols., Dresden, 1936), II. 127；艾伯特接著還將戰敗歸咎于“敵人在人員與物資上的優勢”（第127頁）。

[122.](#_122_1) Gerhard A. Ritter and. Susanne Miller (eds.), Die deutsche Revolution 1918- 1919 - Dokumente (Frankfurt am Main, 1968)是一部出色的文件選輯；Francis L. Carsten, Revolution in Central Europe 1918-1919 (London, 1972)是一部實錄佳作。

[123.](#_123_1) 參考了大量文獻，見Harold Temperley (ed.) A History of the Peace Conference of Paris (6 vols., London, 1920-24)，以及Manfred F. Boemeke等人合編的紀念戰爭結束80周年學術論文集The Treaty of Versailles: A Reassessment after 75 Years (Washington, DC, 1998)。

[124.](#_124_1) Mayer, Politics and Diplomacy.

[125.](#_125_1) Arthur S. Link (ed.)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69 vols., Princeton, 1984), XL. 534-9；綜述參見Lloyd E. Ambrosius, Wilsonian Statecraft: Theory and Practice of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during World War I (Wilmington, Del., 1991), Thomas J. Knock, To End All Wars: Woodrow Wilson and the Quest for a New World Order (New York, 1992)，以及Arthur Walworth, Wilson and his Peacemakers: American Diplomacy at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 1919 (New York, 1986)。

[126.](#_126_1) Winkler, Von der Revolution, 94-5; Carsten, Revolution, 271-98.

[127.](#_127_1) John Horne and Alan Kramer, German Atrocities 1914: A History of Denial (London, 2001), 345-55, 446-50; Gerd Hankel, Die Leipziger Prozesse: Deutsche Kriegsverbrechen und ihre strafrechtliche Verfolgung nach dem Ersten Weltkrieg (Hamburg, 2003).

[128.](#_128_1) Bruce Kent, The Spoils of War: The Politics, Economics and Diplomacy of Reparations 1918-1932 (Oxford, 1989).

[129.](#_129) Alan Sharp, The Versailles Settlement: Peacekeeping in Paris, 1919 (London, 1991).

[130.](#_130) Fischer, Germany's Aims，見全書各處。

[131.](#_131) 對《和約》所做的理性辯護，參見Macmillan, Peacemakers。

[132.](#_132) 阿貝爾證言（Abel Testimony, 下文簡稱AT）第114頁，引用于Peter H. Merkl, Political Violence under the Swastika: 581 Early Nazis (Princeton, 1975), 191。

[133.](#_133) AT 334，出處同上，第192-3頁。

[134.](#_134) AT 248，出處同上，第194-5頁。

[135.](#_135) 參見經典專著Fischer, Germany's Aims，此書至今依然是研究這個題目的權威之作。

[136.](#_136) Eley, Reshaping, 333, 339-42; Dirk Stegmann, ‘Zwischen Repression und Manipulation: Konservative Machteliten und Arbeiter- und Angestelltenbewegung 1910-1918: Ein Beitrag zur Vorgeschichte der DAP/NSDAP’, Archiv für Sozialgeschichte, 12 (1972), 351-432.

[137.](#_137) Heinz Hagenlücke, Die deutsche Vaterlandspartei: Die nationale Rechte am Ende des Kaiserreiches (Düsseldorf, 1997); Verhey, The Spirit of 1914, 178-85; Mosse, The Crisis, 218-26.

[138.](#_138) Ernst Jünger, In Stahlgewittern: Aus dem Tagebuch eines Stosstruppführers (Hanover, 1920)。新的英文版是Ernst Jünger, Storm of Steel (London, 2003)。

[139.](#_139) Richard Bessel, Germany after the First World War (Oxford, 1993), 256-61.

[140.](#_140) Theodore Abel, Why Hitler Came to Power (Cambridge, Mass., 1986 [1938]), 21，引自Frankfurter Zeitung, 27 November 1918。

[141.](#_141) 引用于Abel, Why Hitler, 24，證言4.3.4，以及2.3.2。

[142.](#_142) 出處同上，第26頁，引用證言4.1.2。

[143.](#_143) AT 199, in Merkl, Political Violence, 167.

[144.](#_144) 證言2.8.5, in Abel, Why Hitler, 2.7-8。

[145.](#_145) Christoph Jahr, Gewöhnliche Soldaten: Desertion und Deserteure im deutschen und britischen Heer 1914-1918 (Göttingen, 1998); Benjamin Ziemann, ‘Fahnenflucht im deutschen Heer 1914-1918’, Militärgeschichtliche Mitteilungen, 55 (1996), 93-130.

[146.](#_146) Wolfgang Kruse, ‘Krieg und Klassenheer: Zur Revolutionierung der deutschen Armee im Ersten Weltkrieg’,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22 (1996), 530-61.

[147.](#_147) Merkl, Political Violence, 152-72.

[148.](#_148) Robert W. Whalen, Bitter Wounds: German Victims of the Great War, 1914-1939 (Ithaca, NY, 1984); Deborah Cohen, The War Come Home: Disabled Veterans in Britain and Germany, 1914-1918 (Berkeley, 2001); Bessel, Germany, 274-9.

[149.](#_149_1) Volker R. Berghahn, Der Stahlhelm: Bund der Frontsoldaten 1918-1935 (Dusseldorf, 1966), 13-26, 105-6, 286; Stahlhelm und Staat (8 May 1927)，節錄并英譯，in Anton Kaes et al. (eds.) The Weimar Republic Sourcebook (Berkeley, 1994), 339-40。

[150.](#_150) Bessel, Germany, 283-84；另見Ulrich Heinemann, Die verdrängte Niederlage: Politische Öffentlichkeit und Kriegsschuldfrage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Göttingen, 1983)。

[151.](#_151_1) Frevert, Die kasernierte Nation; Geoff Eley, ‘Army, State and Civil Society’，收錄于該作者的From Unification to Nazism, 85-109；綜述參見Berghahn (ed.) Militarismus。

[152.](#_152) Evans, Kneipengespräche, 31-2, 339.

[153.](#_153) Bessel, Germany, 256-70.

[154.](#_154) Sebastian Haffner, Defying Hitler: A Memoir (London, 2002), 10-15.

[155.](#_155) Michael Wildt, Generation des Unbedingten: Das Führungskorps des Reichssicherbeitshauptamtes (Hamburg, 2002), 41-52.

[156.](#_156_1) Berghahn, Der Stahlhelm, esp. 65-6; Karl Rohe, Das Reichsbanner Schwarz Rot Gold: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und Struktur der politischen Kampfverbände zur Zeit der Weimarer Republik (Dusseldorf, 1966); Kurt G. P. Schuster, Der Rote Frontkdmpferbund 1924-1929: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und Organisationsstruktur eines politischen Kampfbundes (Dusseldorf, 1975).

[157.](#_157) James M. Diehl, Paramilitary Politics in Weimar Germany (Bloomington, Ind., 1977)，對各種準軍事團體進行了清晰的梳理。另見Martin Sabrow, Der Rathenaumord: Rekonstruktion einer Verschwörung gegen die Republik von Weimar (Munich, 1994)，對各種武裝的陰謀團體進行了精彩的分析。

[158.](#_158) Erhard Lucas, Märzrevolution im Ruhrgebiet (3 vols., Frankfurt am Main, 1970-78)，是典型的帶有政治立場的歷史著作；George Eliasberg, Der Ruhrkrieg von 1920 (Bonn, 1974)，是比較冷靜、不夠詳細的記錄，同情社會民主黨內的溫和派。

[159.](#_159) 參見對此文獻進行研究的經典著作Klaus Theweleit, Male Fantasies (2 vols., Cambridge, 1987 and 1989 [1978])；有些保留意見，參見Evans, Rereading, 115-18。

[160.](#_160) 對于自由軍團的研究，Robert G. L. Waite, Vanguard of Nazism. The Free Corps Movement in Postwar Germany 1918-1923 (Harvard, 1952)至今依然是英文著作中的最好作品。另見Hagen Schulze, Freikorps und Republik 1918-1920 (Boppard, 1969), and Emil J. Gumbel, Verschwörer: Zur Geschichte und Soziologie der deutschen nationalistischen Geheimbünde 1918-1924 (Heidelberg, 1979 [1924])。

[161.](#_161) Volker Ullrich, Der ruhelose Rebell: Karl Plättner 1893-1945. Eine Biographie (Munich, 2000)；以及Manfred Gebhardt, Max Hoelz: Wege und Irrwege eines Revolutionärs (Berlin, 1983)。

## 第二章　民主之殤

[1.](#_1_2) 引用于Winkler, Von der Revolution, 39；另見Dieter Dowe與Peter-Christian Witt合著、具有參考價值的研究成果Friedrich Ebert 1871-1925: Vom Arbeiterführer zum Reichspräsidenten (Bonn, 1987)，以及Walter Mühlhausen, Friedrich Ebert: Sein Leben, sein Werk, seine Zeit (Heidelberg, 1999)中的展品目錄。資料豐富的艾伯特傳記Georg Kotowski, Friedrich Ebert: Eine politische Biographie, I: Der Aufstieg eines deutschen Arbeiterführers 1871 bis 1917 (Wiesbaden, 1963)后續各卷仍未完成。

[2.](#_2_2) Anthony J. Nicholls, Weimar and the Rise of Hitler (4th edn., London, 2000 [1968])對這些事情作了可靠的、簡明扼要的梳理。此書與政治史新著Hans Mommsen, The Rise and Fall of Weimar Democracy (Chapel Hill, NC, 1996 [1989])和Heinrich August Winkler, Weimar 1918-1933: Die Geschichte der ersten deutschen Demokratie (Munich, 1993)，都是出色的作品。

[3.](#_3_2) 關于此論點，參見Theodor Eschenburg, Die improvisierte Demokratie (Munich, 1963)。依然值得閱讀的其他經典研究著作包括，具有濃厚經驗主義色彩、從自由派視角書寫的Erich Eyck, A History of the Weimar Republic (2. vols., Cambridge, 1962-4 [1953-6])，以及社會主義者Arthur Rosenberg所著的兩卷本The Birth of the German Republic (Oxford, 1931 [1930])和A History of the German Republic (London, 1936 [1935])，都充滿了令人興奮、引發爭議的論點，尤其是關于威廉二世時期到魏瑪共和國的連續性問題。

[4.](#_4_2) Heinrich Hannover and Elisabeth Hannover-Drück, Politische Justiz 1918-1933 (Frankfurt am Main, 1966), 76-7, 89.

[5.](#_5_3) 對魏瑪憲法第四十八條的不同看法，參見Nicholls, Weimar, 36-7；Detlev J. K. Peukert, The Weimar Republic: The Crisis of Classical Modernity (London, 1991 [1987]), 37-40；以及Harald Boldt, ‘Der Artikel 48 der Weimarer Reichsverfassung: Sein historischer Hintergrund und seine politische Funktion’, in Michael Stürmer (ed.) Die Weimarer Republik: Belagerte Civitas (Königstein im Taunus, 1980), 288-309。全面論述魏瑪憲法的權威著作是Ernst Rudolf Huber, Deutsche Verfassungsgeschichte seit 1789, V-VII (Stuttgart, 1978-84)；另見Reinhard Rürup, ‘Entstehung und Grundlagen der Weimarer Verfassung’, in Eberhard Kolb (ed.) Vom Kaiserreich zur Weimarer Republik (Cologne, 1972), 218-43。艾伯特對第四十八條的濫用已經受到了同時代人的批評，參見Gerhard Schulz, ‘Artikel 48 in politisch-historischer Sicht’, in Ernst Fraenkel (ed.) Der Staatsnotstand (Berlin, 1965), 39-71。試圖對艾伯特行使第四十八條進行辯護的文章是Ludwig Richter, ‘Das präsidiale Notverordnungsrecht in den ersten Jahren der Weimarer Republik: Friedrich Ebert und die Anwendung des Artikels 48 der Weimarer Reichsverfassung’, in Eberhard Kolb (ed.) Friedrich Ebert als Reichspräsident: Amtsführung und Amtsverständnis (Munich, 1997), 207-58。

[6.](#_6_2) Dowe and Witt, Friedrich Ebert, 155-7.

[7.](#_7_2) Werner Birkenfeld, ‘Der Rufmord am Reichsprasidenten: Zu Grenzformen des politischen Kampfes gegen die frühe Weimarer Republik 1919-1925’, Archiv für Sozialgeschichte, 15 (1965), 453-500.

[8.](#_8_2) Heinrich August Winkler, Der Schein der Normalität: Arbeiter und Arbeiterbewegung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1924 bis 1930 (Bonn, 1985), 231-4.

[9.](#_9_2) Victor Klemperer, Leben sammeln, nicht fragen wozu und warum, II: Tagebücher 1925-1932 (Berlin, 1996), 56 (14 May 1925).

[10.](#_10_2) John W. Wheeler-Bennett, Hindenburg: The Wooden Titan (London, 1936), 250-51。Wheeler-Bennett的描述聰明非凡、材料翔實，是基于他與興登堡的隨行人員以及當時德國高層的許多保守派政客所做的長談，他來自英國上流社會，在德國北部經營著一個種馬場，與這些人私交甚好。另見Walter Hubatsch, Hindenburg und der Staat: Aus den Papieren des Generalfeldmarschalls und Reichspräsidenten von 1878 bis 1934 (Göttingen, 1966)。

[11.](#_11_2) Andreas Dorpalen, Hindenburg and the Weimar Republic (Princeton, 1964)，此書描述的興登堡是個不關心政治的人物，由于強烈個人魅力而被推上政壇，而他本人并不情愿。

[12.](#_12_2) Nicholls, Weimar, 39-40; Jürgen Falter, Hitlers Wähler (Munich, 1991), 130-35.

[13.](#_13_2) 參見經典文章Gerhard A. Ritter, ‘Kontinuität und Umformung des deutschen Parteiensystems 1918-1920’, in Eberhard Kolb (ed.) Vom Kaiserreich zur Weimarer Republic (Cologne, 1972), 218-43。

[14.](#_14_2) Vernon L. Lidtke, The Alternative Culture: Socialist Labor in Imperial Germany (New York, 1985).

[15.](#_15_2) Horstwalter Heitzer, Der Volksverein für das katholische Deutschland im Kaiserreich 1890-1918 (Mainz, 1979); Gotthard Klein, Der Volksverein für das katholische Deutschland 1890-1933: Geschichte, Bedeutung, Untergang (Paderborn, 1996); Dirk Muller, Arbeiter, Katholizismus, Staat: Der Volksverein für das katholische Deutschland und die katholischen Arbeiterorganisatione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Bonn, 1996); Doris Kaufmann, Katholisches Milieu in Münster 1928-1933 (Düsseldorf, 1984).

[16.](#_16_3) Wilhelm L. Guttsman, Workers' Culture in Weimar Germany: Between Tradition and Commitment (Oxford, 1990).

[17.](#_17_3) Lynn Abrams, Workers' Culture in Imperial Germany: Leisure and Recreation in the Rhineland and Westphalia (London, 1992).

[18.](#_18_2) Bracher et al.,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Machtergreifung, I. 41, 58-9，引用了馬克斯·韋伯預言的大意。

[19.](#_19_2) Bracher, Die Auflösung, 21-7, 64-95.

[20.](#_20_2) 見Huber, Deutsche Verfassungsgeschichte, VI. 133，以及Eberhard Kolb, The Weimar Republic (London, 1988), 150-51的論述。對比例代表制的批評，主要參見Eberhard Schanbacher, Parlamentarische Wahlen und Wahlsystem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Wahlgesetxgebung und Wahlreform im Reich und in den Ländern (Düsseldorf, 1982)。Falter, Hitlers Wähler, 126-35中一些有見地的推測總的來說支持了否定意見。

[21.](#_21_2) Christoph Gusy, Die Weimarer Reichsverfassung (Tübingen, 1997), 97-8.

[22.](#_22_2) 參見Hagen Schulze, Weimar: Deutschland 1917-1933 (Berlin, 1982) 所附的實用名單。

[23.](#_23_2) 可參閱Klaus Reimer, Rheinlandfrage und Rheinlandbewegung (1918-1933):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r regionalistischen Bewegung in Deutschland (Frankfurt am Main, 1979)。

[24.](#_24_2) Nicholls, Weimar第33-6頁夸大了可能引發的問題。關于普魯士州，參見Hagen Schulze, Otto Braun oder Preussens demokratische Sendung (Frankfurt am Main, 1977), Dietrich Orlow, Weimar Prussia 1918-1925: The Unlikely Rock of Democracy (Pittsburgh, 1986)，以及Hans-Peter Ehni, Bollwerk Preussen? Preussen-Regierung, Reich-Länder-Problem und Sozialdemokratie 1928-1932 (Bonn, 1975)。

[25.](#_25_3) 詳情參見Alfred Milatz, Wähler und Wahle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Bonn, 1965)以及Jürgen Falter et al., Wahlen und Abstimmunge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Materialen zum Wahlverhalten 1919-1933 (Munich, 1986)。

[26.](#_26_2) 參見Schulze, Weimar所附名單。

[27.](#_27_2) Winkler, Von der Revolution；同一作者的Der Schein；同一作者的Der Weg in die Katastrophe: Arbeiter und Arbeiterbewegung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1930 his 1933 (Bonn, 1987)是一部全面而詳盡的論著，同情社會民主黨。強烈的批評立場參見Bracher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Machtergreifung, I. 58-9；以及Richard N. Hunt, German Social Democracy 1918-1933 (New Haven, 1964)，尤其是第241-59頁，強調該黨越來越顯示出“中年人”的怯懦。

[28.](#_28_3) Larry Eugene Jones, German Liberalism and the Dissolution of the Weimar Party System, 1918-1933 (Chapel Hill, NC, 1988), 67-80.

[29.](#_29_2) Erich Matthias and Rudolf Morsey, ‘Die Deutsche Staatspartei’, in Matthias and Morsey (eds.), Das Ende der Parteien 1933: Darstellungen und Dokumente (Düsseldorf, 1960), 29-97, at 31-54; Werner Schneider, Die Deutsche Demokratische Partei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1924-1930 (Munich, 1978); Diehl, Paramilitary Politics, 269-76; Jones, German Liberalism, 369-74; Klaus Hornung, Der Jungdeutsche Orden (Düsseldorf, 1958).

[30.](#_30_2) Detlef Junker, Die Deutsche Zentrumspartei und Hitler: Ein Beitrag zur Problematik des politischen Katholizismus in Deutschland (Stuttgart, 1969); Rudolf Morsey, Der Untergang des politischen Katholizismus: Die Zentrumspartei zwischen christlichem Selbstverständnis und ‘Nationaler Erhebung’ 193 2/33 (Stuttgart, 1977); Karsten Ruppert, Im Dienst am Staat von Weimar: Das Zentrum als regierende Partei in der Weimarer Demokratie 1923-1930 (Düsseldorf, 1992)。關于巴伐利亞人民黨，參見Klaus Schönhoven, Die Bayerische Volkspartei 1924-1932 (Düsseldorf, 1972)。關于歐洲大勢，參見Eric Hobsbawm, Age of Extremes: The Short Twentieth Century 1914-1991 (London, 1994), 114-15。

[31.](#_31_2) Rudolf Morsey, ‘Die Deutsche Zentrumspartei’, in Matthias and Morsey (eds.) Das Ende, 279-453，引語在第290-91頁。

[32.](#_32_2) Max Miller, Eugen Bolz (Stuttgart, 1951), 357-8，引用于Morsey, ‘Die Deutsche Zentrumspartei’, 292；另見Joachim Sailer, Eugen Bolz und die Krise des politischen Katholizismus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Tübingen, 1994)。

[33.](#_33_2) John Cornwell, Hitler's Pope: The Secret History of Pius XII (London, 1999)，尤其是第96-7, 116-17, 120-51頁；著重參考了Klaus Scholder, The Churches and the Third Reich (2 vols., London, 1987-8 [1977, 1985])；關于來自梵蒂岡的壓力，參見Morsey, ‘Die Deutsche Zentrumspartei’, 301。

[34.](#_34_2) Werner Angress, Stillborn Revolution: The Communist Bid for Power in Germany, 1921-1923 (Princeton, 1963); Ben Fowkes, Communism in Germany under the Weimar Republic (London, 1984), 148, 161; Eric D. Weitz, Creating German Communism, 1890-1990; From Popular Protests to Socialist State (Princeton, 1997), 100-31；主要參見Hermann Weber, Die Wandlung des deutschen Kommunismus: Die Stalinisierung der KPD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2. vols., Frankfurt am Main, 1969)。

[35.](#_35_2) Evans, Rituals, 507-9, 574，此書是可參閱的眾多資料中的一種。

[36.](#_36_2) Maximilian Milller-Jabusch (ed.) Handbuch des öffentlichen Lebens (Leipzig, 1931), 442-5，摘錄并譯成英文，in Kaes et al. (eds.) The Weimar Republic Sourcebook, 348-52；綜述參見Mommsen, The Rise and Fall, 253-60。

[37.](#_37_2) Bracher, Die Auflösung, 309-30；Friedrich Freiherr Hiller von Gaertringen, ‘Die Deutschnationale Volkspartei’, in Matthias and Morsey (eds.), Das Ende, 541-652, at 543-9.

[38.](#_38_2) Henry Ashby Turner, Jr., Gustav Stresemann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Weimar Republic (Princeton, 1965 [1963]), 250-51; Jonathan Wright, Gustav Stresemann: Weimar's Greatest Statesman (Oxford, 2002).

[39.](#_39_2) Broszat, Der Staat Hitlers, 19-20.

[40.](#_40_2) Diehl, Paramilitary Politics, 209-43; Berghahn, Der Stahlhelm, 103-30.

[41.](#_41_2) Francis L. Carsten, The Reichswehr and Politics 1918-1933 (Oxford, 1966), 3-48; Wolfram Wette, Gustav Noske: Eine politische Biographie (Düsseldorf, 1987), 399-459.

[42.](#_42_2) Carsten, The Reichswehr, 106-7; Johannes Erger, Der Kapp-Lüttwitz-Putsch: Ein Beitrag zur deutschen Innenpolitik 1919/20 (Düsseldorf, 1967); Erwin Könnemann et al. (eds.), Arbeiterklasse siegtüber Kapp und Lüttwitz (2 vols., Berlin, 1971).

[43.](#_43_2) 引用于Carsten, The Reichswehr, 401。

[44.](#_44_2) Thilo Vogelsang (ed.), ‘Neue Dokumente zur Geschichte der Reichswehr, 1930-1933’, VfZ 2 (1954), 397-436.

[45.](#_45_2) Friedrich von Rabenau, Seeckt-aus seinem Leben 1918-1936 (Leipzig, 1940), 359-61，和Otto-Ernst Schüddekopf, Das Heer und die Republik - Quellen zur Politik der Reichswehrführung 1918 bis 1933 (Hanover, 1955), 179-81。另見John W. Wheeler-Bennett的研究舊作The Nemesis of Power: The German Army in Politics 1918-1945 (London, 1953)，其中內容大多已經過時，對軍方持強烈批評立場；以及Harold J. Gordon, The Reichswehr and the German Republic 1919-26 (Princeton, 1957), 同情澤克特。基本細節參見Rainer Wohlfeil, ‘Heer und Republik’, in Hans Meier-Welcker and Wolfgang von Groote (eds.) Handbuch zur deutschen Militargeschichte 1648-1939, VI (Frankfurt am Main, 1970), 11-304。

[46.](#_46_2) Carsten, The Reichswehr, 276; Ernst Willi Hansen, Reichswehr und Industrie: Rüstungswirtschaftliche Zusammenarbeit und wirtschaftliche Mobilmachungsvorbereitungen 1923-1932 (Boppard, 1978); Manfred Zeidler, Reichswehr und Rote Armee 1920-1933: Wege und Stationen einer ungewöhnlichen Zusammenarbeit (Munich, 1993)；綜述參見Michael Geyer, Aufrüstung oder Sicherheit: Reichswehr in der Krise der Machtpolitik, 1924-1936 (Wiesbaden, 1980)，以及Karl Nuss, Militär und Wiederaufrüstung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Zur politischen Rolle und Entwicklung der Reichswehr (Berlin, 1977)。

[47.](#_47_2) Carsten, The Reichswehr, 159-60, 168-9, 226.

[48.](#_48_2) Michael Geyer, ‘Professionals and Junkers: German Rearmament and Politics in the Weimar Republic’, in Richard Bessel and Edgar Feuchtwanger (eds.), Social Change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Weimar Germany (London, 1981), 77-133.

[49.](#_49_2) 參見Craig的經典研究著作The Politics of the Prussian Army, 382-467。

[50.](#_50_2) Eberhard Kolb, ‘Die Reichsbahn vom Dawes-Plan bis zum Ende der Weimarer Republik’, in Lothar Gall and Manfred Pohl (eds.), Die Eisenbahn in Deutschland: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r Gegenwart (Munich, 1999), 109-64, at 149-50.

[51.](#_51_2) Jane Caplan, Government without Administration: State and Civil Service in Weimar and Nazi Germany (Oxford, 1988), 8-18, 60-61.

[52.](#_52_2) Gerhart Fieberg (ed.), Im Namen des deutschen Volkes: justiz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Cologne, 1989), 8.

[53.](#_53_2) Bracher, Die Auflösung, 162-72.

[54.](#_54_2) Caplan, Government, 30-36.

[55.](#_55_2) 出處同上，第33-57頁；Wolfgang Runge, Politik und Beamtentum im Parteienstaat: Die Demokratisierung der politischen Beamten in Preussen zwischen 1918 und 1933 (Stuttgart, 1965); Anthony J. Nicholls, ‘Die höhere Beamtenschaft in der Weimarer Zeit: Betrachtungen zu Problemen ihrer Haltung und ihrer Fortbildung’, in Lothar Albertin and Werner Link (eds.) Politische Parteien auf dem Weg zur parlamentarischen Demokratie in Deutschland: Entwicklungslinien bis zur Gegenwart (Düsseldorf, 1981), 195-207；Hans Fenske, ‘Monarchisches Beamtentum und demokratischer Rechtsstaat: Zum Problem der Bürokratie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in Demokratie und Verwaltung: 25 Jahre Hochschule für Verwaltung Speyer (Berlin, 1972), 117-36；Rudolf Morsey, ‘Beamtenschaft und Verwaltung zwischen Republik und “Neuem Staat”’, in Karl Dietrich Erdmann and Hagen Schulze (eds.) Weimar: Selbstpreisgabe einer Demokratie (Düsseldorf, 1980), 151-68；Eberhard Pikart, ‘Preussische Beamtenpolitik 1918-1933’, VfZ 6(1958), 119-37。

[56.](#_56_2) Broszat, Der Staat Hitlers, 17-9.

[57.](#_57_2) AT 28, in Merkl, Political Violence, 513.

[58.](#_58_2) Rainer Fattmann, Bildungsbürger in der Defensive: Die akademische Beamtenschaft und der ‘Reichsbund der höheren Beamte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Göttingen, 2001).

[59.](#_59_2) Fischer, Germany's Aims至今依然是一部權威著作，全面論述了德國發動戰爭的經濟目標，兼論其他目標，但僅簡要述及戰爭的起因。

[60.](#_60_2) 戰爭期間以及剛結束時的通貨膨脹過程，詳盡記錄在史學名著Gerald D. Feldman, The Great Disorder: Politics, Economic, and Society in the German Inflation, 1914-1924 (New York, 1993)的前150頁，整個通脹期間的匯率見第5頁的表1。Feldman的書已取代了經典著作Constantino Bresciani-Turroni, The Economics of Inflation: A Study of Currency Depreciation in Post-war Germany (London, 1937)和Karsten Laursen and Jürgen Pedersen, The German Inflation 1918-1923 (Amsterdam, 1964)的權威地位。Theo Balderston, Economics and Politics in the Weimar Republic (London, 2002)第34-60頁做了簡明扼要的論述。Stephen B. Webb, Hyperinflation and Stabilization in Weimar Germany (Oxford, 1989)把通脹與戰爭賠款聯系起來。

[61.](#_61_2) Feldman, The Great Disorder第5頁（圖表1），全面論述參見第1至8章，其中有許多引文和例證；另見Kent, The Spoils of War, 45-6, 142-58。

[62.](#_62_2) Feldman, The Great Disorder, 837-9；更悲觀的描述參見Niall Ferguson, Paper and Iron: Hamburg Business and German Politics in the Era of Inflation, 1897-1927 (Oxford, 1995)，尤其是第408-19頁。

[63.](#_63_2) Feldman, The Great Disorder第5頁（圖表1）。關于占領魯爾區，參見Conan Fischer, The Ruhr Crisis 1923-1924 (Oxford, 2003); Hermann J. Rupieper, The Cuno Government and Reparations 1922-1923: Politics and Economics (The Hague, 1979)；以及Klaus Schwabe編輯的Die Ruhrkrise 1923: Wendepunkt der internationalen Beziehungen nach dem Ersten Weltkrieg (Paderborn, 1985)。

[64.](#_64_2) Berliner Morgenpost, 251（1923年10月21日），‘Zahlen-Wahnsinn, von Bruno H. Bürgel’。

[65.](#_65_2) Norman Angell, The Story of Money (New York, 1930), 332; Haffner, Defying Hitler, 49-50.

[66.](#_66_2) Fritz Blaich, Der schwarze Freitag: Inflation und Wirtschaftskrise (Munich, 1985), 14, 31.

[67.](#_67_2) 出自Wirtschaftskurve, 2 (1923), I, 29和4 (1923)，21關于育有一子的中等收入之家的花銷，引用于Carl-Ludwig Holtfrerich, The German Inflation 1914-1923: Causes and Effects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New York, 1986 [1980]), 261。

[68.](#_68_2) Berliner Morgenpost, 220（1923年9月15日），‘Zurückgehaltene Ware: Weil der “morgige Preis” noch nicht bekannt ist’。

[69.](#_69_2) Feldman, The Great Disorder, 704-6.

[70.](#_70_2) Holtfrerich, The German Inflation, 262-3.

[71.](#_71_2) Klemperer, Leben sammeln, I. 239（1920年2月26日）。

[72.](#_72_2) 出處同上，第257頁（1920年3月28日）。

[73.](#_73_2) 出處同上，第262頁(1920年4月1日）。

[74.](#_74_1) 出處同上，第697頁（1923年5月27日），第700-1頁（1923年6月1和2日）。關于投機狂潮，另見Haffner, Defying Hitler, 46-7。

[75.](#_75_1) Klemperer, Leben sammeln, I. 717（1923年7月24日），729（1923年8月3日）。

[76.](#_76_1) 出處同上，第740頁（1923年8月27/28日）。

[77.](#_77_1) 出處同上，第752頁（1923年10月9日）。

[78.](#_78_2) 出處同上，第751頁（1923年10月9日）。

[79.](#_79_1) 出處同上，第757頁（1923年11月2日）。

[80.](#_80_1) 出處同上，第758頁（1923年11月7日和16日）。

[81.](#_81_1) Berliner Morgenpost, 213（1923年9月7日）：‘Nur noch dreissig Strassenbahn-Linien’。

[82.](#_82_1) Kent, The Spoils of War, 245-8.

[83.](#_83_1) Feldman, The Great Disorder, 741-7.

[84.](#_84_1) 出處同上，第778-93頁。

[85.](#_85_2) 出處同上，第754-835頁。

[86.](#_86_1) Derek H. Aldcroft, From Versailles to Wall Street 1919-1929 (London, 1977), 125-55.

[87.](#_87_1) Feldman, The Great Disorder, 854-88.

[88.](#_88_1) Klemperer, Leben sammeln, I. 761（1923年12月4日），763（1923年12月20日）。

[89.](#_89_1) Nikolaus Wachsmann, Hitler's Prisons: Legal Terror in Nazi Germany (New Haven, 2004)，第2章。

[90.](#_90_1) Michael Grüttner, ‘Working-Class Crime and the Labour Movement: Pilfering in the Hamburg Docks, 1888-1923’, in Richard J. Evans (ed.), The German Working Class 1888-1933: The Politics of Everyday Life (London, 1982), 54-79.

[91.](#_91_2) Hans Ostwald, Sittengeschichte der Inflation: Ein Kulturdokument aus den Jahren des Marksturzes (Berlin, 1931)尤其是第30-31頁。

[92.](#_92_2) Martin Geyer, Verkehrte Welt: Revolution, Inflation, und Moderne. München 1914-1924 (Göttingen, 1998)，見全書各處。

[93.](#_93_2) Bernd Widdig, Culture and Inflation in Weimar Germany (Berkeley, 2001), 113-33.

[94.](#_94_2) Geyer, Verkehrte Welt第243-318頁；各種研究論文參見Gerald D. Feldman (ed.) Die Nachwirkungen der Inflation auf die deutsche Geschichte 1924-1933 (Munich, 1985)。

[95.](#_95_2) Charles Medalen, ‘State Monopoly Capitalism in Germany: The Hibernia Affair’, Past and Present, 78 (February 1978)，第82-112頁精彩地論述了這種干預所引發的一次沖突。

[96.](#_96_2) Henry Ashby Turner, Jr., German Big Business and the Rise of Hitler (New York, 1985), 3-18; Gerald D. Feldman, Army, Industry and Labor in Germany, 1914-1918 (Princeton, 1966)；同一作者的‘The Origins of the Stinnes-Legien Agreement: A Documentation’, Internationale Wissenschaftliche Korrespondenz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Arbeiterbewegung, 19/20 (1973), 45-104。

[97.](#_97_2) Harold James, The German Slump: Politics and Economics, 1924-1936 (Oxford, 1986), 125-30概述了關于通脹期間企業投資的性質和規模的辯論。

[98.](#_98_2) Peter Hayes, Industry and Ideology: I.G. Farben in the Nazi Era (Cambridge, 1987), 16-17; Gerald D. Feldman, Hugo Stinnes: Biographie eines Industriellen 1870-1924 (Munich, 1998).

[99.](#_99_2) Mary Nolan, Visions of Modernity: American Business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Germany (New York, 1994).

[100.](#_100_2) Peukert, The Weimar Republic, 112-17.

[101.](#_101_2) Robert Brady, The Rationalization Movement in Germany: A Study in the Evolution of Economic Planning (Berkeley, 1933); James, The German Slump, 146-61.

[102.](#_102_2) Feldman, The Great Disorder, 343-44; Harold James, ‘Economic Reasons for the Collapse of the Weimar Republic’, in Ian Kershaw (ed.), Weimar: Why did German Democracy Fail? (London, 1990), 30-57, at 33-4；另見Dieter Hertz-Eichenröde, Wirtschaftskrise und Arbeitsbeschaffung: Konjunkturpolitik 1925/26 und die Grundlagen der Krisenpolitik Brünings (Frankfurt am Main, 1982); Fritz Blaich, Die Wirtschaftskrise 1925/26 und die Reichsregierung: Von der Erwerbslosenfürsorge zur Konjunkturpolitik (Kallmünz, 1977)；以及Klaus-Dieter Krohn, Stabilisierung und ökonomische Interessen: Die Finanzpolitik des deutschen Reiches 1923-1927 (Düsseldorf, 1974)。

[103.](#_103_2) Bernd Weisbrod, Schwerindustie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Interessenpolitik zwischen Stabtlisierung und Krise (Wuppertal, 1978), 415-56; James, The German Slump, 162-223.

[104.](#_104_1) Richard Bessel, ‘Why did the Weimar Republic Collapse?’, in Kershaw (ed.), Weimar, 120-52, at 136; Bernd Weisbrod, ‘The Crisis of German Unemployment Insurance in 1928/29 and its Political Repercussions’, in Wolfgang J. Mommsen (ed.), The Emergence of the Welfare State in Britain and Germany, 1850-1950 (London, 1981), 188-204; Richard J. Evans, ‘Introduction: The Experience of Mass Unemployment in the Weimar Republic', in Richard J. Evans and Dick Geary (eds.), The German Unemployed: Experiences and Consequences of Mass Unemployment from the Weimar Republic to the Third Reich (London, 1987), 1-22, at 5-6; Merith Niehuss, ‘From Welfare Provision to Social Insurance: The Unemployed in Augsburg 1918-27’, in Evans and Geary (eds.), The German Unemployed, 44-72.

[105.](#_105_1) Turner, German Big Business, 19-46; Weisbrod, Schwerindustrie；另見簡述J. Adam Tooze, ‘Big Business and the Continuities of German History, 1900-1945’, in Panikos Panayi (ed.) Weimar and Nazi Germany: Continuities and Discontinuities (London, 2001), 173-98。

[106.](#_106_1) 關于巴爾馬特丑聞，參見Bernhard Fulda, ‘Press and Politics in Berlin, 1924-1930’ (Cambridge Ph.D. dissertation, 2003), 63-71, 87-117。

[107.](#_107_1) Dick Geary, ‘Employers, Workers,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Weimar Republic’, in Kershaw (ed.), Weimar, 92-119.

[108.](#_108_1) Karl Rohe, Wahlen und Wählertraditionen in Deutschland (Frankfurt am Main, 1992), 124.

[109.](#_109_2) Falter, Hitlers Wähler, 327-8; Kurt Koszyk, Deutsche Presse 1914-1945: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Presse, III (Berlin, 1972).

[110.](#_110_2) Babette Gross, Willi Münzenberg: Eine politische Biographie (Stuttgart, 1967).

[111.](#_111_2) Erich Schairer, ‘Alfred Hugenberg’, Mit anderen Augen: Jahrbuch der deutschen Sonntagszeitung (1929), 18-21，被譯成英文并引用于Kaes et al. (eds.) The Weimar Republic Sourcebook第72-4頁；Dankwart Guratzsch, Macht durch Organisation: Die Grundlegung des Hugenbergschen Presseimperiums (Düsseldorf, 1974), 192-3, 244, 248。

[112.](#_112_2) Fulda, ‘Press and Politics’, 圖表I。

[113.](#_113_2) Modris Eksteins, The Limits of Reason: The German Democratic Press and the Collapse of Weimar Democracy (Oxford, 1975), 129-30, 249-50.

[114.](#_114_1) Fulda, ‘Press and Politics’, 圖表I和第1章做了綜述。

[115.](#_115_1) Falter, Hitlers Wähler, 325-39.

[116.](#_116_1) Oswald Spengler, Der Untergang des Aberedlandes: Umrisse einer Morphologie der Weltgeschichte, I: Gestalt und Wirklichkeit (Vienna, 1918), 73-5.

[117.](#_117_2) Arthur Moeller van den Bruck, Das Dritte Reich (3rd edn., Hamburg, 1931 [Berlin, 1923])，尤其是第300，320頁；Gary D. Stark, Entrepreneurs of Ideology: Neo-Conservative Publishers in Germany, 1890-1933 (Chapel Hill, NC 1981); Agnes Stansfield, ‘Das Dritte Reich: A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Third Kingdom” in German Literature from Herder to Hegel’, Modern Language Review, 34(1934), 156-72。默勒·凡登布魯克最初把他的保守派革命烏托邦稱為“第三條道路”，參見Mosse, The Crisis, 281。

[118.](#_118_2) Edgar Jung, ‘Deutschland und die konservative Revolution’, in Deutsche über Deutschland (Munich, 1932), 369-82，摘錄并譯成英文, in Kaes (eds.) The Weimar Republic Sourcebook, 352-4。

[119.](#_119_2) Jünger, In Stahlgewittern；另見Nikolaus Wachsmann, ‘Marching under the Swastika? Ernst Jünger and National Socialism, 1918-33’,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33 (1998), 573-89。

[120.](#_120_2) Theweleit, Male Fantasies.

[121.](#_121_2) 研究這些以及其他各派與之類似的思想的經典著作是Kurt Sontheimer, Antidemokratisches Denke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Munich, 1978 [1962])。

[122.](#_122_2) James M. Ritchie, German Literature under National Socialism (London, 1983), 10-11；另見Peter Zimmermann, ‘Literatur im Dritten Reich’, in Jan Berg (es.) Sozial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von 1918 bis zur Gegenwart (Frankfurt am Main, 1981), 361-416；尤其是Jost Hermand and Frank Trommler, Die Kultur der Weimarer Republik (Munich, 1978), 128-92。

[123.](#_123_2) 清晰的概述參見Nitschke et al. (eds.) Jahrhundertwende；關于威廉時期的“道德焦慮”，參見Richard J. Evans, Tales from the German Underworld: Crime and Punishmen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1998), 166-212；Gary Stark, ‘Pornography, Society and the Law in Imperial Germany’,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14 (1981), 200-20; Bram Dijkstra, Idols of Perversity: Fantasies of Female Evil in Fin-de-Siècle Culture (New York, 1986); Robin Lenman, ‘Art, Society and the Law in Wilhelmine Germany: The Lex Heinze’, Oxford German Studies, 8 (1973), 86-113; Matthew Jefferies, Imperial Culture in Germany, 1871-1918 (London, 2003)；關于魏瑪文化，參見Peukert, The Weimar Republic, 164-77。

[124.](#_124_2) Hermand and Trommler, Die Kultur, 193-260.

[125.](#_125_2) Karen Koehler, ‘The Bauhaus, 1919-1928: Gropius in Exile and the Museum of Modern Art, N. Y., 1938’, in Richard A. Etlin (ed), Art, Culture and Media under the Third Reich (Chicago, 2002), 287-315, at 288-92; Barbara Miller Lane, Architecture and Politics in Germany, 1918-1945 (Cambridge, Mass., 1968), 70-78; Shearer West, The Visual Arts in Germany 1890-1936: Utopia and Despair (Manchester, 2000), 143-55; Hans Wingler, The Bauhaus - Weimar, Dessau, Berlin, Chicago 1919-1944 (Cambridge, Mass., 1978); Frank Whitford, The Bauhaus (London, 1984).

[126.](#_126_2) Gerald D. Feldman, ‘Right-Wing Politics and the Film Industry: Emil Georg Strauss, Alfred Hugenberg, and the UFA, 1917-1933’, in Christian Jansen et al. (eds.), Von der Aufgabe der Freiheit: Politische Verantwortung und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im 19. und 20. Jahrhundert: Festschrift für Hans Mommsen zum 5. November 1995 (Berlin, 1995), 219-30; Siegfried Kracauer, From Caligari to Hitler: A Psychological History of the German Film (Princeton, 1947), 214-16.

[127.](#_127_2) Andrew Kelly, Filming 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 - ‘Brutal Cutting, Stupid Censors, Bigoted Politicos’ (London, 1998), 再版為平裝本時書名改作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 The Story of a Film (London, 2002)。關于魏瑪文化的全面論述，參見經典論文集Peter Gay, Weimar Culture: The Outsider as Insider (London, 1969)。Walter Laqueur, Weimar: A Cultural, History 1918-1933 (London, 1974)精彩地論述了保守的多數派以及前衛的少數派；另見Hermand and Trommler, Die Kultur，350-437關于視覺藝術的研究。

[128.](#_128_2) Erik Levi, Music in the Third Reich (London, 1994), T-13; Hermand and Trommler, Die Kultur, 279-350.

[129.](#_129_1) Michael H. Kater, Different Drummers: Jazz in the Culture of Nazi Germany (New York, 1992.), 3-28; Peter Jelavich, Berlin Cabaret (Cambridge, Mass., 1993), 202.

[130.](#_130_1) Peukert, The Weimar Republic, 178-90.

[131.](#_131_1) AT 43, in Merkl, Political Violence, 173.

[132.](#_132_1) Abrams, Workers' Culture，尤其是第7章。

[133.](#_133_1) Richard J. Evans, The Feminist Movement in Germany 1894-1933 (London, 1976), 122, 141; Rudolph Binion, Frau Lou: Nietzsche's Wayward Disciple (Princeton, 1968), 447.

[134.](#_134_1) James D. Steakley, The Homosexual Emancipation Movement in Germany (New York, 1975); John C. Fout, ‘Sexual Politics in Wilhelmine Germany: The Male Gender Crisis, Moral Purity, and Homophobia’,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2 (1992), 388-421.

[135.](#_135_1) 見Renate Bridenthal與Claudia Koonz合寫的開創性文章‘Beyond Kinder, Küche, Kirche: Weimar Women in Politics and Work’, in Renate Bridenthal et al. (eds.) When Biology Became Destiny: Women in Weimar and Nazi Germany (New York, 1984), 33-65。

[136.](#_136_1) Planert, Antifeminismus.

[137.](#_137_1) Evans, The Feminist Movement, 145-201; Klaus Höhnig, Der Bund Deutscher Frauenvereine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1919-1923 (Egelsbach, 1995).

[138.](#_138_1) Atina Grossmann, Reforming Sex: The German Movement for Birth Control and Abortion Reform 1920-1950 (New York, 1995), 16; Steakley, The Homosexual Emancipation Movement; Fout, ‘Sexual Politics’; Charlotte Wolff, Magnus Hirschfeld: A Portrait of a Pioneer in Sexology (London, 1986).

[139.](#_139_1) James Woycke, Birth Control in Germany 1871-1933 (London, 1988), 113-16, 121, 147-8; Grossmann, Reforming Sex; Cornelie Usborne, The Politics of the Body in Weimar Germany: Women's Reproductive Rights and Duties (London, 1991).

[140.](#_140_1) Clifford Kirkpatrick, Nazi Germany: Its Women and Family Life (New York, 1938), 36; Elizabeth Harvey, ‘Serving the Volk, Saving the Nation: Women in the Youth Movement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Weimar Germany’, in Larry Eugene Jones and James Retallack (eds.), Elections, Mass Politics, and Social Change in Modern Germany: New Perspectives (New York, 1992), 201-22; Irene Stoehr, ‘Neue Frau und alte Bewegung? Zum Generationskonflikt in der Frauenbewegung der Weimarer Republik’, in Jutta Dalhoff et al. (eds.), Frauenmacht in der Geschichte (Düsseldorf, 1986), 390-400; Atina Grossmann, “‘Girikultur” or Thoroughly Rationalized Female: A New Woman in Weimar Germany’, in Judith Friedlander et al. (eds.), Women in Culture and Politics: A Century of Change (Bloomington, Ind., 1986), 62-80.

[141.](#_141_1) Raffael Scheck, Mothers of the Nation: Right-Wing Women in German Politics, 1918-1923 (New York, 2004); Höhnig, Der Bund; Ute Planert (ed.), Nation, Politik und Geschlecht: Frauenbewegungen und Nationalismus in der Moderne (Frankfurt am Main, 2000).

[142.](#_142_1) 個人證言參見Merkl, Political Violence, 230-89；另見Peter D. Stachura, The German Youth Movement, 1900-1945: An Interpretative and Documentary History (London, 1981)，反駁了早期的經典論著Laqueur, Young Germany, Howard Becker, German Youth: Bond or Free? (New York, 1946)以及Mosse, The Crisis, 171-89所強調的青年運動具有初級法西斯的性質。新文章見Jürgen Reulecke, ‘“Hat die Jugendbewegung den Nationalsozialismus vorbereitet?” Zum Umgang mit einer falschen Frage’, in Wolfgang R. Krabbe (ed.) Politische Jugend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Bochum, 1993), 222-43。

[143.](#_143_1) Klemperer, Leben sammeln, II. 56 (14 May 1925).

[144.](#_144_1) AT 144, 173, Merkl, Political Violence第290-310頁，尤其是第303-4頁；另見Margret Kraul, Das deutsche Gymnasium 1780-1980 (Frankfurt am Main, 1984)第127-56頁的清晰概述；Folkert Meyer, Schule der Untertanen: Lehrer und Politik in Preussen 1848-1900 (Hamburg, 1976)極力否認學校的政治影響力；Mosse, The Crisis第149-70頁強調民族主義的影響力。糾正Meyer偏頗之處的好文章，參見Marjorie Lamberti,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and the Struggle against Social Democracy in Wilhelmine Germany’, History of Education Quarterly, 12 (1992), 74-97；同一作者的State, Society and the Elementary School in Imperial Germany (New York, 1989)。

[145.](#_145_1) Konrad H. Jarausch, Deutsche Studenten 1800-1970 (Frankfurt am Main, 1984)，尤其是第117-22頁；Michael S. Steinberg, Sabers and Brown Shirts: The German Students' Path to National Socialism, 1918-1935 (Chicago, 1977)；Geoffrey J. Giles, Students and National Socialism in Germany (Princeton, 1985)研究了漢堡大學。AStA, Allgemeiner Studenten-Ausschuss的字面意思是“學生聯合會”；就功能而言，這些機構相當于英語國家的學生會。

[146.](#_146_1) Michael H. Kater, Studentenschaft und Rechtsradikalismus in Deutschland 1918-1933: Eine sozialgeschichtliche Studie zur Bildungskrise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Hamburg, 1975)；同一作者的‘The Work Student: A Socio-Economic Phenomenon of Early Weimar German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10 (1975), 71-94；Wildt, Generation des Unbedingten, 72-80.

[147.](#_147_1) 出處同上，第81-142頁。

[148.](#_148_1) Ulrich Herbert, Best: Biographische Studien über Radikalismus, Weltanschauung und Vernunft 1903-1989 (Bonn, 1996), 42-68.

[149.](#_149_2) AT 96, in Merkl, Political Violence, 236（加黑的字句原文為斜體字）。

[150.](#_150_1) Maria Tatar, Lustmord: Sexual Murder in Weimar Germany (Princeton, 1995)（但此書的許多內容并不令人信服，我對它的評論參見German History, 14 [1996], 414-15）；傳統的論述參見Birgit Kreutzahler, Das Bild des Verbrechers in Romanen der Weimarer Republik: Eine Untersuchung vor dem Hintergrund anderer gesellschaftlicher Verbrecherbilder und gesellschaftlicher Grundzüge der Weimarer Republik (Frankfurt am Main, 1987); Kracauer, From Caligari; Evans, Rituals, 531-6。

[151.](#_151_2) Patrick Wagner, Volksgemeinschaft ohne Verbrecher: Konzeptionen und Praxis der Kriminalpolizei in der Zeit der Weimarer Republik und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Hamburg, 1996), 26-76, 153-79.

[152.](#_152_1) Evans, Rituals, 487-610.

[153.](#_153_1) Fieberg (ed.), Im Namen, 10-22.

[154.](#_154_1) Johannes Leeb, in Deutsche Richterzeitung, 1921, col. 1301, in Fieberg (ed.) Im Name, 24-7。

[155.](#_155_1) Hans Hattenhauer, ‘Wandlungen des Richterleitbildes im 19. und 20. Jahrhundert’, in Ralf Dreier and Wolfgang Sellert (eds.), Recht und Justiz im ‘Dritten Reich’ (Frankfurt am Main, 1989), 9-33, at 13-16; Henning Grunwald, ‘Political Lawyers in the Weimar Republic’ (Ph.D. dissertation, Cambridge, 2002).

[156.](#_156_2) Fieberg (ed.), Im Namen, 24-7.

[157.](#_157_1) Emil J. Gumbel, Vier Jahre politischer Mord (Berlin, 1924), 73-5，數據被制表后收錄于Fieberg (ed.) Im Namen, 29-35。

[158.](#_158_1) 一些新著從較為有利于魏瑪時期法官的視角進行了論述，但無法完全令人信服，這些作品包括，Irmela Nahel, Fememorde und Fememordproxesse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Cologne, 1991)以及Marcus Böttger, Der Hochverrat in der hochstrichterlichen Rechtsprechung der Weimarer Republik: Ein Fall politischer Instrumentalisierung von Strafgesetzen? (Frankfurt am Main, 1998)。

[159.](#_159_1) Hannover and Hannover-Drück, Politische Justiz, 182-91; Kurt R. Grossmann, Ossietzky: Ein deutscher Patriot (Munich, 1963), 195-219; Elke Suhr, Carl von Ossietzky: Eine Biographie (Cologne, 1988), 162-8.

[160.](#_160_1) Hermann Schüler, Auf der Flucht erschossen: Felix Fechenbach 1894-1933. Eine Biographie (Cologne, 1981), 171-92.

[161.](#_161_1) Ilse Staff, Justiz im Dritten Reich: Eine Dokumentation (2nd edn., Frankfurt am Main, 1978 [1964]), 22-4.

[162.](#_162_1) Gotthard Jasper, Der Schutz der Republik (Tübingen, 1963).

[163.](#_163_1) Evans, Rituals, 503-6.

[164.](#_164_1) Ingo Müller, Hitler's Justice: The Courts of the Third Reich (London, 1991 [1987]), 10-24.

[165.](#_165_1) Hannover and Hannover-Drück, Politische Justiz, 77.

[166.](#_166_1) Ralph Angermund, Deutsche Richterschaft 1918-1945: Krisenerfahrung, Illusion, Politische Rechtsprechung (Frankfurt am Main, 1990), 33-4.

[167.](#_167_1) Wehler, Deut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III. 907-15, 1086-90; Thomas Nipperdey, Deutsche Geschichte 1866-1918, I: Arbeitswelt und Burgergeist (Munich, 1990)第335-73頁；專著包括Volker Hentschel,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Sozialpolitik (1880-1980) (Frankfurt am Main, 1983); Gerhard A. Ritter, Soxialversicherung in Deutschland und England: Entstehung und Grundzuge im Vergleich (Munich, 1983)；開創性研究參見Karl Erich Born, Staat und Sozialpolitik seit Bismarcks Sturz 1890-1914: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r innenpolitischen Entwicklung des deutschen Reiches 1880-1914 (Wiesbaden, 1957)。

[168.](#_168_1) David F. Crew, Germans on Welfare: From Weimar to Hitler (New York, 1998), 16-31.

[169.](#_169_1) 魏瑪憲法第119-22，151-65條(in Huber, Deutsche Verfassungsgeschichte, V-VII)。

[170.](#_170_1) Ludwig Preller, Sozialpolitik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Düsseldorf, 1978 [1949])至今依然是經典的必備指南；重要的研究新著有Detlev J. K. Peukert, Grenzen der Sozialdisziplinierung: Aufstieg und Krise der deutschen Jugendfürsorge 1878 bis 1932 (Cologne, 1986); Young-Sun Hong, Welfare, Modernity, and the Weimar State, 1919-1933 (Princeton, 1998)，以及Crew, Germans on Welfare。

[171.](#_171_1) Otto Riebicke, Was brachte der Weltkrieg? Tatsachen und Zahlen aus dem deutschen Ringen 1914-18 (Berlin, 1936), 97-112.

[172.](#_172_1) Whalen, Bitter Wounds, 156, 168.

[173.](#_173_1) Caplan, Government, 51, 60; Bessel, ‘Why did the Weimar Republic Collapse?’, 120-34, at 123-5.

[174.](#_174_1) 當前德國的信息保護法禁止引用個人的全名。

[175.](#_175_1) 全部細節參見Crew, Germans on Welfare, 107-15。

[176.](#_176_1) 出處同上，尤其是第204-8頁。

[177.](#_177_1) 關于這些觀點的傳播，參見Richard F. Wetzell, Inventing the Criminal: A History of German Criminology 1880-1945 (Chapel Hill, NC, 2000)，尤其是第107-78頁；Wachsmann, Hitler's Prisons, part I; Regina Schulte, Sperrbezirke: Tugendhaftigkeit und Prostitution in der burgerlichen Welt (Frankfurt am Main, 1979), 174-204; Schmuhl, Rassenhygiene, 31, 94; Evans, Rituals, 526-36。

[178.](#_178_1) Wagner, Volksgemeinschaft, 97-101.

[179.](#_179_1) 引用于Evans, Rituals, 526-7。

[180.](#_180_1) Nikolaus Wachsmann et al., ‘“Die soziale Prognose wird damit sehr trube ...”: Theodor Viernstein und die Kriminalbiologische Sammelstelle in Bayern’, in Michael Farin (ed.), Polizeireport München 1799-1999 (Munich, 1999), 250-87.

[181.](#_181_1) Karl Binding and Alfred Hoche, Die Freigabe der Vernichtung lebensunwerten Lebens: Ihr Mass und ihre Form (Leipzig, 1920); Michael Burleigh, Death and Deliverance: ‘Euthanasia’, in Germany 1900-1945 (Cambridge, 1994), 11-42; Hong, Welfare, 29-276.

[182.](#_182_1) Victor Klemperer, Curriculum Vitae: Erinnerungen 1881-1918 (2 vols., Berlin, 1996 [1989]).

[183.](#_183) Klemperer, Leben sammeln, I. 8（1918年11月23日）以及9（1918年11月24日）。

[184.](#_184) 出處同上，97（1919年4月12日），109-10（1919年5月6日）。

[185.](#_185) 參見維克托·克倫佩雷爾日記Victor Klemperer, I Shall Bear Witness: The Diaries of Victor Klemperer 1933-1941 (London, 1998), IXXXI，正文前由Martin Chalmers撰寫的作者小傳。

[186.](#_186) Klemperer, Leben sammeln, 1. 600（1922年6月29日）。

[187.](#_187) 出處同上，II. 第377頁（1927年9月10日）。

[188.](#_188) 出處同上，第571頁（1929年9月3日）。

[189.](#_189) 出處同上，第312頁（1926年12月26日）。

[190.](#_190) 出處同上，I. 第187頁(1919年9月27日）。

[191.](#_191) 出處同上，第245頁（1920年3月14日）。

[192.](#_192) 出處同上，第248頁（1920年3月14日）。

[193.](#_193) 出處同上，第433-4頁（1921年4月20日）。

[194.](#_194) 出處同上，II. 第49頁（1925年4月27日）。

[195.](#_195) 出處同上，第758頁（1932年8月7日）。

[196.](#_196) Martin Liepach, Das Wahlverhalten der jüdischen Bevölkerung: Zur politischen Orientierung der Jude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Tübingen, 1996)，尤其是第211-310頁；綜述參見Wolfgang Benz (ed.) Jüdisches Lebe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Tübingen, 1998), 271-80；以及Donald L. Niewyk, The Jews in Weimar Germany (Baton Rouge, La., 1980), 11-43頁。

[197.](#_197) Klaus Schwabe, ‘Die deutsche Politik und die Juden im Ersten Weltkrieg’, in Hans Otto Horch (ed.), Judentum, Antisemitismus und europäische Kultur (Tubingen, 1988), 255-66; Egmont Zechlin, Die deutsche Politik und die Juden im Ersten Weltkrieg (Gottingen, 1969)，尤其是第527-41頁；Saul Friedlander, ‘Die politischen Veränderungen der Kriegszeit und ihre Auswirkungen auf die Judenfrage’, in Werner E. Mosse (ed.), Deutsches Judentum in Krieg und Revolution 1916-1923 (Tübingen, 1971), 27-65。綜述參見Jochmann, Gesellschaftskrise, 99- 170 (‘Die Ausbreitung des Antisemitismus in Deutschland 1914-1923’), 171-94 (‘Der Antisemitismus und seine Bedeutung fur den Untergang der Weimarer Republik’)。

[198.](#_198) Stark, Entrepreneurs, 141, 208-9.

[199.](#_199) Jack Wertheimer, Unwelcome Strangers: East European Jews in Imperial Germany (New York, 1987)圖表4；Wolfgang J. Mommsen, Bürgerstolz und Weltmachtstreben: Deutschland unter Wilhelm II. 1890 bis 1918 (Berlin, 1995), 434-40; Steven Aschheim, Brothers and Strangers: The East European Jew in German and German Jewish Consciousness 1800-1923 (Madison, 1982)。

[200.](#_200) Vossische Zeitung，1923年11月6日，被摘錄并譯成英文, in Peukert, The Weimar Republic, 160（英譯已校訂）；另見David Clay Large, “‘Out with the Ostjuden”: The Scheunenviertel Riots in Berlin, November 1923’, in Werner Bergmann et al. (eds.) Exclusionary Violence: Antisemitic Riots in Modern Germany (Ann Arbor, 2002), 123-40，以及Dirk Walter, Antisemitische Kriminalität und Gewalt: Judenfeindschaft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Bonn, 1999)，尤其是第151-4頁。

[201.](#_201) Peter Pulzer, ‘Der Anfang vom Ende’, in Arnold Paucker (ed.), Die Juden im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Deutschland 1933-1944 (Tübingen, 1986), 3-15; Trude Maurer, Ostjuden in Deutschland, 1918-1933 (Hamburg, 1986).

[202.](#_202) Kauders, German Politics, 182-91；關于新教的立場，參見Kurt Nowak and Gérard Raulet (eds.) Protestantismus und Antisemitismus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Frankfurt am Main, 1994)。綜述參見Heinrich August Winkler, ‘Die deutsche Gesellschaft der Weimarer Republik und der Antisemitismus’, in Bernd Martin and Ernst Schulin (eds.) Die Juden als Minderheit in der Geschichte (Munich, 1981), 271-89，以及Jochmann, Gesellschaftskrise, 99-170。關于地方性反猶活動研究，參見Stefanie Schüler-Springorum, Die jüdische Minderheit in Königsberg, Preussen 1871-1945 (Göttingen, 1996)。

## 第三章　納粹主義的興起

[1.](#_1_3) Peter Jelavich, Munich and Theatrical Modernism: Politics, Playwriting, and Performance 1890-1914 (Cambridge, Mass., 1985)是記錄當時慕尼黑戲劇的一部佳作。

[2.](#_2_3) 對艾斯納的戲劇性描述，參考了大量非正統的當代材料，見Richard M. Watt, The Kings Depart: The German Revolution and the Treaty of Versailles 1918-19 (London, 1973 [1968]), 312-30, 354-81。另見Franz Schade, Kurt Eisner und die bayerische Sozialdemokratie (Hanover, 1961)以及Peter Kritzer, Die bayerische Sozialdemokratie und die bayerische Politik in den Jahren 1918-1923 (Munich, 1969)。傳記新作參見Bernhard Grau, Kurt Eisner 1867-1919: Eine Biographie (Munich, 2001)。

[3.](#_3_3) Allan Mitchell, Revolution in Bavaria 1918/1919: The Eisner Regime and the Soviet Republic (Princeton, 1965), 171-2; Freya Eisner, Kurt Eisner: Die Politik der libertären Sozialismus (Frankfurt am Main, 1979), 175-80.

[4.](#_4_3) 這些以及后續事件參見Mitchell, Revolution；另見Winkler, Von der Revolution, 184-90，以及Heinrich Hillmayr, Roter und weisser Terror in Bayern nach 1918: Erscheinungsformen und Folgen der Gewaltätigkeiten im Verlauf der revolutionären Ereignisse nach dem Ende des Ersten Weltkrieges (Munich, 1974)。

[5.](#_5_4) Watt, The Kings Depart, 312-30, 354-81；David Clay Large, Where Ghosts Walked: Munich's Road to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 1997), 76-92是另一種生動的描述。Friedrich Hitzer, Anton Graf Arco: Das Attentat auf Kurt Eisner und die Schüsse im Landtag (Munich, 1988)講述了刺客的故事，是該書作者撰寫一部電影劇本時所作的研究。關于霍夫曼，參見Diethard Hennig, Johannes Hoffmann: Sozialdemokrat und Bayerischer Ministerpräsident: Biographie (Munich, 1990)。

[6.](#_6_3) 引用于Watt, The Kings Depart, 364; Hans Beyer, Von der Novemberrevolution zur Räterepublik in München (Berlin, 1957)（引用了大量檔案材料的東德著作），尤其是第77-8頁。

[7.](#_7_3) Watt, The Kings Depart, 366-8.

[8.](#_8_3) Large, Where Ghosts Walked, 70.

[9.](#_9_3) Carsten, Revolution, 218-23; Hannover and Hannover-Driick, Politischejustiz, 53-75.

[10.](#_10_3) Anthony Nicholls, ‘Hitler and the Bavarian Background to National Socialism’, in Anthony Nicholls and Erich Matthias (eds.), German Democracy and the Triumph of Hitler: Essays on Recent German History (London, 1971), 129-59.

[11.](#_11_3) 關于希特勒在1918至1919年的活動，詳見Kershaw, Hitler, I. 116-21，以及Anton Joachimsthaler, Hitlers Weg begann in München 1913-1923 (Munich, 2000 [1989]), 177-319。

[12.](#_12_3) Kershaw, Hitler, I. 3-13，審慎地把事實與傳聞、闡釋與揣測區分開，用事實闡釋了希特勒早年的經歷。

[13.](#_13_3) Carl E. Schorske, ‘The Ringstrasse, its Critics, and the Birth of Urban Modernism’，收錄于該作者的Fin-de-Siècle Vienna, 24-115。

[14.](#_14_3) August Kubizek, Adolf Hitler: Mein jugendfreund (Graz, 1953)提供了許多細節；不過可參閱Franz Jetzinger, Hitler's Youth (London, 1958 [1956]), 167-74對前書提出的批評。

[15.](#_15_3) 見Kershaw, Hitler, I.，尤其是第49-69頁，以及Joachimsthaler, Hitlers Weg, 45-9。希特勒說自己一戰前在維也納期間成為極端的政治反猶主義者，是因為曾與猶太人發生過沖突，特別是“東歐猶太人”，即來自加利西亞（Galicia）的移民；但由于希特勒1919年之前的經歷缺乏可信的佐證，因此他的自陳引發了激烈的辯論。希特勒自己的版本似乎言過其實；同樣無法令人信服的是最近有些論者認為他根本不是反猶主義者。

[16.](#_16_4) Adolf Hitler, Mein Kampf (trans. Ralph Manheim, introd. D.C. Watt, London, 1969 [1925/6]), 39-41.

[17.](#_17_4) 出處同上，第71, 88, 95頁。

[18.](#_18_3) Kershaw, Hitler, I. 81-7；Joachimsthaler, Hitlers Weg, 77-97。希特勒自己的敘述參見Mein Kampf, 116-17。關于施瓦賓格區的波希米亞式生活，參見Where Ghosts Walked, 3-42。

[19.](#_19_3) Hitler, Mein Kampf, 148-9.

[20.](#_20_3) Kershaw, Hitler, I. 87-101.

[21.](#_21_3) Hitler, Mein Kampf, 11-169.

[22.](#_22_3) Geyer, Verkehrte Welt, 278-318.

[23.](#_23_3) 希特勒1919年9月16日致阿道夫·吉姆利希（Adolf Gemlich）的信, in Eberhard Jäckel and Axel Kuhn (eds.) Hitler: Sämtliche Aufzeichnungen 1905-1924 (Stuttgart, 1980), 88-90; Ernst Deuerlein, ‘Hitlers Eintritt in die Politik und die Reichswehr’, VfZ 7 (1959), 203-5。

[24.](#_24_3) ‘Anton Drexlers Politisches Erwachen’ (1919), in Albrecht Tyrell (ed.) Führer befiehl...: Selbstzeugnisse aus der ‘Kampfzeit’ der NSDAP (Düsseldorf, 1969), 20-22。

[25.](#_25_4) Tyrell (ed.) Führer befieh, 22; Kershaw, Hitler, I. 126-8, 131-9；Ernst Deuerlein (ed.) Der Aufstieg der NSDAP in Augenzeugenberichten (Munich, 1974), 56-61。Joachimsthaler, Hitlers Weg, 198-319頁從關于希特勒此時期人生經歷的傳聞中篩選出事實，并對后來的辯論進行了評鑒；Albrecht Tyrell, Vom ‘Trommler’ zum ‘Führer’: Der Wandel von Hitlers Selbstverständnis zwischen 1919 und 1924 und die Entwicklungder NSDAP (Munich, 1975)根據翔實的材料講述了希特勒的早期政治生涯。另見Werner Maser, Die Frühgeschichte der NSDAP: Hitlers Weg bis 1924 (Frankfurt am Main, 1965)。關于圖勒學會，參見Reginald H. Phelps, ‘“Before Hitler Came”: Thule Society and Germanen Orden’,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35 (1963), 245-61。

[26.](#_26_3) Uwe Lohalm, Völkischer Radikalismus: Die Geschichte des Deutscbvolkischen Schutz- und Trutzbundes, 1919-1923 (Hamburg, 1970).

[27.](#_27_3) Tyrell, Vom Trommler, 72-89; Georg Franz-Willing, Ursprung der Hitlerbewegung 1919-1922 (Preussisch Oldendorf, 1974 [1962]), 38-109.

[28.](#_28_4) Broszat, Der Staat Hitlers, 43-5.

[29.](#_29_3) Hitler, Mein Kampf, 620-21（英譯已校改）。

[30.](#_30_3) Reginald H. Phelps, ‘Hitler als Parteiredner im Jahre 1920’, VfZ 11 (1963), 274-330；類似內容見于Jäckel and Kuhn (eds.) Hitler, 115, 132, 166, 198, 252, 455, 656。

[31.](#_31_3) “傻瓜的社會主義”最初的說法是“蠢貨的社會主義”，通常被認為出自一戰前的社會民主黨領導人奧古斯特·倍倍爾，但有可能源自奧地利的民主人士費迪南德·克羅納維特爾（Ferdinand Kronawetter）（Pulzer, The Rise, 269以及注釋）。1890年代在德國的社會民主黨中間成為常用語，參見Francis L. Carsten, August Bebel und die Organisation der Massen (Berlin, 1991), 165。

[32.](#_32_3) Franz-Willing, Ursprung, 120-27; Broszat, Der Staat Hitlers, 39.

[33.](#_33_3) Ernst Nolte, Three Faces of Fascism: Action Française, Italian Fascism, National Socialism (New York, 1969 [1963])，后來又用與此不同的、更有爭議的方式在Der europdische Bürgerkrieg 1917-1945: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Bolschewismus (Frankfurt am Main, 1987)中論述了納粹主義首先反對的是布爾什維主義。

[34.](#_34_3) Hitler, Mein Kampf, 289.

[35.](#_35_3) 全部引用于Longerich, Der ungeschriebene Befehl, 32-4。

[36.](#_36_3) Bruno Thoss, Der Ludendorff-Kreis: 1919-1923. München als Zentrum der mitteleuropäische Gegenrevolution zwischen Revolution und Hitler-Putsch (Munich, 1978)提供了詳盡的細節。

[37.](#_37_3) Wolf Rüdiger Hess (ed.) Rudolf Hess: Briefe 1908-1933 (Munich, 1987), 251（赫斯于1920年3月24日寫給父母的信）。

[38.](#_38_3) Joachim C. Fest, The Face of the Third Reich (London, 1979 [1970]), 283-314是對赫斯性格的精妙概述；Smith,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223-40; Lange, ‘Der Terminus “Lebensraum”’, 426-37; Hans Grimm, Volk ohne Raum (Munich, 1926); Dietrich Orlow, ‘Rudolf Hess: Deputy Führer’, in Ronald Smelser and Rainer Zitelmann (eds.) The Nazi Elite (London, 1993 [1989]), 74-84。Hans-Adolf Jacobsen, Karl Haushofer: Leben und Werk (2 vols., Boppard, 1979)再版了豪斯霍費爾的許多作品；Frank Ebeling, Geopolitik: Karl Haushofer und seine Raumwissenschaft 1919-1945 (Berlin, 1994) 研究了豪斯霍費爾的理論。

[39.](#_39_3) Margarete Plewnia, Auf dem Weg zu Hitler: Der völkische Publizist Dietrich Eckart (Bremen, 1970); Tyrell, Vom Trommler, 190-94；Alfred Rosenberg (ed.), Dietrich Eckart. Ein Vermächtnis (4th edn., Munich, 1937 [1928]) 附有埃卡特的詩文集。

[40.](#_40_3) Alfred Rosenberg, Selected Writings (ed. Robert Pois, London, 1970); Fest, The Face, 247-58；Walter Laqueur, Russia and Germany: A Century of Conflict (London, 1965), 55-61, 116-17, 148-53；Adolf Hitler, Hitler's Table Talk 1941- 1944: His Private Conversations (London, 1973 [1953]), 422-6；Norman Cohn, Warrant for Genocide: The Myth of the Jewish World-Conspiracy and the 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 (London, 1967)，尤其是第187-237頁；Reinhard Bollmus, ‘Alfred Rosenberg: National Socialism's “Chief Ideologue”’, in Smelser and Zitelman (eds.) The Nazi Elite, 183-93；Robert Cecil, The Myth of the Master Race: Alfred Rosenberg and Nazi Ideology (London, 1972)。另見綜述Thomas Klepsch, Nationalsozialistische Ideologie: Eine Beschreibung ihrer Struktur vor 1933 (Münster, 1990)，以及Barbara Miller Lane與Leila J. Rupp合作選編的各種納粹理論家著作的文摘Nazi Ideology before 1933: A Documentation (Manchester, 1978)是一部相當出色的合集。

[41.](#_41_3) Hans Frank, Im Angesicht des Galgens: Deutung Hitlers und seiner Zeit auf Grund eigner Erlebisse und Erkenntnisse (2nd edn., Neuhaus, 1955 [1953])，未標明頁碼地引用于Fest, The Face, 330，以及出處同上的第38-42頁，引用于Kershaw, Hitler, I. 148; Christoph Klessmann, ‘Hans Frank: Party Jurist and Governor-General in Poland’, in Smelser and Zitelmann (eds.) The Nazi Elite, 39-47。

[42.](#_42_3) 引自Deuerlein (ed.) Der Aufstieg, 108-12。

[43.](#_43_3) Dietrich Orlow, The History of the Nazi Party, I: 1919-1933 (Newton Abbot, 1971 [1969]), 11-37.

[44.](#_44_3) Kershaw, Hitler, I. 160-65; Deuerlein (ed.), Der Aufstieg, 135-41.

[45.](#_45_3) Kershaw, Hitler, I. 175-80; Deuerlein (ed.), Der Aufstieg, 142-61.

[46.](#_46_3) Deuerlein (ed.), Der Aufstieg, 145-6.

[47.](#_47_3) Franz-Willing, Ursprung, 127.

[48.](#_48_3) Hannover and Hannover-Drück, Politiscbe Justiz, 105-44.

[49.](#_49_3) Kershaw, Hitler, I. 170-73; Peter Longerich, Die braunen Bataillone: Geschichte der SA (Munich, 1989), 9-32.

[50.](#_50_3) Conan Fischer, ‘Ernst Julius Röhm: Chief of Staff of the SA and Indispensable Outsider’, in Smelser and Zitelmann (eds.), The Nazi Elite, 173-82.

[51.](#_51_3) Ernst Röhm, Die Geschichte eines Hochverräters (Munich, 1928), 9, 365-6; Fest, The Face, 206, 518-19 (n. 9).

[52.](#_52_3) Röhm, Die Geschichte, 363.

[53.](#_53_3) 這個時期納粹運動中日益升級的暴力活動參見Deuerlein (ed.) Der Aufstieg, 142-83；關于羅姆與希特勒之間不和睦的關系，詳見Fischer, ‘Ernst Julius Rohm’。

[54.](#_54_3) Kershaw, Hitler, I. 180-85.

[55.](#_55_3) Adrian Lyttelton, The Seizure of Power: Fascism in Italy 1919-1929 (London, 1973)依然是經典著作；Denis Mack Smith, Mussolini (London, 1981)是一部犀利的傳記；Richard J. B. Bosworth, Mussolini (London, 2002)是近期出版的傳記佳作；Franz-Willing, Ursprung, 126-7介紹了納粹黨各種禮節的起源。關于聯系與影響，參見Klaus-Peter Hoepke, Die deutsche Rechte und der italienische Faschismus: Ein Beitrag zum Selbstverständnis und zur Politik von Gruppen und Verbänden der deutschen Rechten (Düsseldorf, 1968)，尤其是第186-94和292-5頁。

[56.](#_56_3) 在有爭議的海量文獻中，Stanley G. Payne, A History of Fascism 1914-1945 (London, 1995)是最出色的綜述，Kevin Passmore, Fasc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2002)是最實用的簡述。Roger Griffin, International Fascism - Theories, Causes and the New Consensus (London, 1998)是有影響力的理論闡釋；Kershaw, The Nazi Dictatorship, 26-46，作者一如既往地給出了嚴謹、審慎的史家論述。

[57.](#_57_3) AT 567, 199, in Merkl, Political Violence, 196-7.

[58.](#_58_3) AT 206, 379，出處同上；從獨特角度對施拉格特案所做的論述，參見Karl Radek, ‘Leo Schlageter: The Wanderer in the Void’, in Kaes et al. (eds.) The Weimar Republic Sourcebook, 312-14（最初的德文版為‘Leo Schlageter: Der Wanderer ins Nichts’, Die Rote Fahne, 144［1923年6月26日］）。Fischer, The Ruhr Crisis, 84-181詳述“消極抵抗”行動，強調其草根屬性；Waite, Vanguard, 235-8敘述施拉格特的自由軍團背景；關于德國軍方在幕后組織的破壞運動，參見Gerd Krüger, ‘“Ein Fanal des Widerstandes im Ruhrgebiet”: Das “Unternehmen Wesel” in der Osternacht des Jahres 1923. Hingergründe eines angeblichen “Husarenstreiches”’, Mitteilungsblatt des Instituts für soziale Bewegungen, 4 (2000), 95-140。

[59.](#_59_3) Sander L. Gilman, On Blackness without Blacks: Essays on the Image of the Black in Germany (Boston, 1982).

[60.](#_60_3) AT 183, in Merkl, Political Violence, 193.

[61.](#_61_3) Gisela Lebeltzer, ‘Der “Schwarze Schmach”: Vorurteile—Propaganda – Mythos’,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11 (1985), 37-58; Keith Nelson, ‘“The Black Horror on the Rhine”: Race as a Factor in Post-World War I Diplomacy’,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42 (1970), 606-27; Sally Marks, ‘Black Watch on the Rhine: A Study in Propaganda, Prejudice and Prurience’, European Studies Review, 13 (1983), 297-334。關于他們最終的命運，參見Reiner Pommerin, ‘Sterilisierung der Rheinlandbastarde’: Das Schicksal einer farbigen deutschen Minderbeit 1918 - 1937 (Düsseldorf, 1979)。

[62.](#_62_3) Richard J. Evans, ‘Hans von Hentig and the Politics of German Criminology’, in Angelika Ebbinghaus and Karl Heinz Roth (eds.), Grenzgänge: Deutsche Geschichte des 20. Jahrhunderts im Spiegel von Publizistik, Rechtsprecbung und historischer Forschung (Lüneburg, 1999), 238-64.

[63.](#_63_3) Kershaw, Hitler, I. 185-91; Georg Franz-Willing, Krisenjahr der Hitlerbewegung 1923 (Preussisch Oldendorf, 1975); Helmuth Auerbach, ‘Hitlers politische Lehrjahre und die Miinchner Gesellschaft 1919-1923’, VfZ 25 (1977), 1-45; Franz-Willing, Ursprung, 266-99; Ernst Hanfstaengl, Zwischen Weissem und Braunem Haus: Memoiren eines politischen Aussenseiters (Munich, 1970).

[64.](#_64_3) 希特勒的觀點可參見Hitler, Hitler's Table Talk第154-6頁。精彩的論述參見Robin Lenman, ‘Julius Streicher and the Origins of the NSDAP in Nuremberg, 1918-1923’, in Nichollsa and Matthias (eds.) German Democracy, 161-74（對施特萊歇爾之詩的評價來源于此）。對紐倫堡市褐衫軍的研究，參見Eric G. Reich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A in Nürnberg, 1922-34 (Cambridge, 1986)。

[65.](#_65_3) Anthony Nicholls, ‘Hitler and the Bavarian Background to National Socialism’, in Anthony Nicholls and Matthias (eds.), German Democracy, 111.

[66.](#_66_3) Franz-Willing, Krisenjahr第295-318頁；關于魯登道夫的活動，參見同作者的Putsch und Verbotszeit der Hitlerbewegung November 1923-Februar 1925 (Preussisch Oldendorf, 1977), 9-65。

[67.](#_67_3) Fest, The Face, 113-29; Richard Overy, Goering: The ‘Iron Man’ (London, 1984); Alfred Kube, ‘Hermann Goering: Second Man in the Third Reich’, in Smelser and Zitelmann (eds.) The Nazi Elite, 61-73，把戈林歸類于“晚期帝國主義”保守派；另見同作者的Pour le mérite und Hakenkreuz: Hermann Goering im Dritten Reich (2nd edn., Munich, 1987 [1986])第4-21頁；Stefan Martens, Hermann Goering: ‘Erster Paladin des Führers’ und ‘Zweiter Mann im Reich’ (Paderborn, 1985), 15-19；Werner Maser, Hermann Göring: Hitlers janusköpfiger Paladin: Die politische Biographie (Berlin, 2000), 13-55。

[68.](#_68_3) Franz-Willing, Krisenjahr詳細敘述了納粹黨在1923年的發展。Harold J. Gordon, Hitler and the Beer Hall Putsch (Princeton, 1972)詳盡梳理了啤酒館暴動的政治背景，尤其參見第25-184頁(part I: ‘The Contenders in the Struggle for Power’)。相關的文件記錄，參見Ernst Deuerlein (ed.) Der Hitler-Putsch: Bayerische Dokumente zum 8./9. November 1923 (Stuttgart, 1962), 153-308；簡述參見Deuerlein (ed.) Der Aufstieg, 184-202。

[69.](#_69_3) Karl Alexander von Müller在庭審希特勒時的目擊者證詞，引用于Deuerlein (ed.) Der Aufstieg, 192-6。

[70.](#_70_3) 有許多著作述及暴動過程，參見Kershaw, Hitler, I. 205-12；Gordon, Hitler and the Beer Hall Putsch, 270-409；Franz-Willing, Putsch und Verbotszeit, 66-141；Deuerlein (ed.) Der Hitler-Putsch，尤其是第308-417, 487-515頁；精選出的文件譯成英文，in Noakes and Pridham (eds.) Nazism, I. 26-34。關于戈林，參見Maser, Hermann Göring, 58-78。

[71.](#_71_3) Bernd Steger, ‘Der Hitlerprozess und Bayerns Verhältnis zum Reich 1923/24’, VfZ 23 (1977), 441-66.

[72.](#_72_3) 全部庭審記錄和判決，參見Deuerlein (ed.) Der Aufstieg, 203-230; Lothar Gruchman and Reinhard Weber (eds.) Der Hitler-Prozess 1924: Wortlaut der Hauptverhandlung vor dem Volksgericht München 1 (2 vols., Munich, 1997, 1999)。另見Otto Gritschneider, Bewährungsfrist für den Terroristen Adolf H.: Der Hitler-Putsch und die bayerische Justiz (Munich, 1990)，以及同作者的Der Hitler-Prozess und sein Richter Georg Neithardt: Skandalurteil von 1924 ebnet Hitler den Weg (Munich, 2001)。

[73.](#_73_3) 引用于Tyrell, Führer befiehl, 67，譯成英文并收錄于Noakes and Pridham (eds.) Nazism, I. 34-5（英譯已稍做校改）；希特勒的全部法庭陳述收錄于Jäckel and Kuhn (eds.) Hitler, 1061-216；以及Deuerlein (ed.) Der Aufstieg, 203-28。

[74.](#_74_2) 參見Kershaw, Hitler, I. 240-53關于希特勒寫作該書的源起和過程。

[75.](#_75_2) Hitler, Mein Kampf, 307.

[76.](#_76_2) 出處同上，第597-99頁。Eberhard Jäckel, Hitler's Weltanschauung: A Blueprint for Power (Middletown, Conn., 1972 [1969])論證了這些觀點在希特勒“世界觀”的中心地位。

[77.](#_77_2) Adolf Hitler, Hitler's Secret Book (New York, 1961); Martin Broszat, ‘Betrachtungen zu “Hitlers Zweitem Buch”’, VfZ 9 (1981), 417-29.

[78.](#_78_3) Werner Maser, Hitlers Mein Kampf: Geschichte, Auszüge, Kommentare (Munich, 1966)敘述了《我的奮斗》一書的細節、寫作過程以及命運；Hermann Hammer, ‘Die deutschen Ausgaben von Hitlers “Mein Kampf”’, VfZ 4 (1956), 161-78敘述了該書的出版史。在經典傳記Hitler: A Study in Tyranny (London, 1953)中，作者Alan Bullock認為希特勒是權欲旺盛的機會主義者，其目標缺乏一致性；首次論述這種一致性問題的是Hugh Trevor-Roper, ‘The Mind of Adolf Hitler’，此文是Hitler, Hitler's Table Talk的導言，第vii-xxxv頁。Geoffrey Stoakes, Hitler and the Quest for. World Dominion (Leamington Spa, 1987)分析了希特勒異想天開的對外政策及其隱含的目標。

[79.](#_79_2) Longerich, Der ungescbriebene Befehl, 37-9.

[80.](#_80_2) Kershaw, Hitler, I. 218-19, 223-4, 250-53; Broszat, Der Staat Hitlers, 13-16.

[81.](#_81_2) Kershaw, Hitler, I. 224-34。希特勒被判刑和監禁之后，納粹黨的詳細情況，參見Franz-Willing, Putsch und Verbotszeit, 162-185。

[82.](#_82_2) Donald Cameron Watt, ‘Die bayerischen Bemühungen um Ausweisung Hitlers 1924’, VfZ 6 (1958), 270-80。綜述參見David Jablonsky, The Nazi Party in Dissolution: Hitler and the Verbotszeit 1923-1925 (London, 1989)，以及Deuerlein (ed.) Der Aufstieg, 231-54。

[83.](#_83_2) Deuerlein (ed), Der Aufstieg, 245.

[84.](#_84_2) Fest, The Face, 215; Longerich, Die braunen Battaillone, 51-2.

[85.](#_85_3) Kershaw, Hitler, I. 257-70.

[86.](#_86_2) Udo Kissenkoetter, ‘Gregor Strasser: Nazi Party Organizer or Weimar Politician?’, in Smelser and Zitelmann (eds.), The Nazi Elite, 224-34.

[87.](#_87_2) 格雷戈爾·施特拉塞爾于1925年7月8日致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的信，in Oswald Spengler, Spengler Letters 1913-1936 (ed. Arthur Helps, London, 1966), 184。

[88.](#_88_2) Orlow, The History of the Nazi Party, I. 66-7；另見綜述Udo Kissenkoetter, Gregor Strasser und die NSDAP (Stuttgart, 1978); Peter D. Stachura, Gregor Strasser and the Rise of Nazism (London, 1983)；以及Klepsch, Nationalsozialistische Ideologie, 143-50。

[89.](#_89_2) Elke Fröhlich, ‘Joseph Goebbels: The Propagandist’, in Smelser and Zitelmann (eds.) The Nazi Elite, 48-61；Ralf Georg Reuth, Goebbels: Eine Biographie (Munich, 1995), 11-75；以及Michel Kai, Vom Poeten zum Demagogen: Die schriftstellerischen Versuche Joseph Goebbels' (Cologne, 1999)。Joachim C. Fest, ‘Joseph Goebbels: Eine Porträtskizze’, VfZ 43 (1995), 565-80根據戈培爾的日記，精辟地重新分析了他的性格。戈培爾日記的文本，參見Elke Fröhlich, ‘Joseph Goebbels und sein Tagebuch: Zu den handschriftlichen Aufzeichnungen von 1924 bis 1941’, VfZ 35 (1987)第489-522頁。Bernd Sösemann, ‘Die Tagesaufzeichnungen des Joseph Goebbels und ihre unzulänglichen Veröffentlichungen’, Publizistik, 37 (1992), 213-44的批評沒有說服力；Fröhlich轉錄戈培爾日記的初衷，并不是作為嚴格的學術版本，而僅僅是為了便于歷史研究者查閱此日記。

[90.](#_90_2) Hugh Trevor-Roper, The Last Days of Hitler (London, 1947), 67（同樣引自Speer）；Fröhlich, ‘Joseph Goebbels’, 48。

[91.](#_91_3) Elke 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 Sämtliche Fragmente, part I: Aufzeichnungen 1924-1941, I: 27. 6. 1924-31. 12. 1930 (Munich, 1987), 48 (23 July 1924).

[92.](#_92_3) 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I/I. 134-5 (14 October 1925).

[93.](#_93_3) 出處同上，第140-41頁 (1925年11月6日）；綜述參見Reuth, Goebbels, 76-147。

[94.](#_94_3) 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I/I. 161-2 (15 February 1926).

[95.](#_95_3) Kershaw, Hitler, I. 270-77; Reuth, Goebbels, 76-107; Helmut Heiber (ed.), The Early Goebbels Diaries: The Journals of Josef Goebbels from 1925-1926 (London, 1962), 66-7.

[96.](#_96_3) 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I/I. 171-3 (13 April 1926) and 174-5 (19 April 1926).

[97.](#_97_3) Kershaw, Hitler, I. 277-9；Deuerlein (ed.) Der Aufstieg, 255-302。用“Gau”替代“區”這個詞，有意讓人想起中世紀初期的日耳曼諸部落。

[98.](#_98_3) Kershaw, Hitler, I. 278-9; Orlow, The History of the Nazi Party, I. 69-75.

[99.](#_99_3) Noakes and Pridham (eds.) Nazism, I. 36-56；以及Erwin Barth, Joseph Goebbels und die Formierung des Führer-Mythos 1917 bis 1934 (Erlangen, 1999)。

[100.](#_100_3) 關于戈培爾在柏林的活動，見Reuth, Goebbels, 108-268。

[101.](#_101_3) 引語出處同上，第114頁。

[102.](#_102_3) 胡佛研究所縮微檔案，馬克斯·阿曼于1925年10月27日致古斯塔夫·賽菲爾特的信（Hoover Institution, Stanford, California: NSDAP Hauptarchiv microfilm reel 6 Akte 141: letter from Max Amann to Gustav Seifert）。

[103.](#_103_3) Noakes and Pridham (eds.), Nazism, I. 58.

[104.](#_104_2) Gerhard Schulz, Zwischen Demokratie und Diktatur: Verfassungspolitik und Reichsreform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3 vols., Berlin, 1963-92), II: Deutschland am Vorabend der Grossen Krise (Berlin, 1987), 149-307; Robert G. Moeller, ‘Winners as Losers in the German Inflation: Peasant Protest over the Controlled Economy’, in Gerald D. Feldman et al. (eds.), The German Inflation: A Preliminary Balance (Berlin, 1982), 255-88.

[105.](#_105_2) Shelley Baranowski, The Sanctity of Rural Life: Nobility, Protestantism and Nazism in Weimar Prussia (New York, 1995), 120-23.

[106.](#_106_2) John E. Farquharson, The Plough and the Swastika: The NSDAP and Agriculture in Germany, 1928-1945 (London, 1976), 3-12, 25-33; Dieter Hertz-Eichenrode, Politik und Landwirtschaft in Ostpreussen 1919-1930: Untersuchung eines Strukturproblems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Opladen, 1969), 88-9, 329-37.

[107.](#_107_2) Dieter Gessner, Agrardepression und Präsidialregierungen in Deutschland 1930-1933: Probleme des Agrarkapitalismus am Ende der Weimarer Republik (Düsseldorf, 1977), 191-4；同一作者的Agrarverbände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Wirtschaftliche und soziale Voraussetzungen agrarkonservativer Politik vor 1933 (Düsseldorf, 1976), 234-63。

[108.](#_108_2) Rudolf Rietzler, ‘Kampf in der Nordmark’: Das Aufkommen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in Schleswig-Holstein (1919-1928) (Neumünster, 1982)；Frank Bajohr (ed.), Norddeutschland im Nationalsozialismus (Hamburg, 1993)；以及區域研究的經典之作Jeremy Noakes, The Nazi Party in Lower Saxony 1921-1933 (Oxford, 1971)，尤其是第104-7頁。

[109.](#_109_3) Noakes and Pridham (eds.), Nazism, I. 15, 61.

[110.](#_110_3) 出處同上，第15, 61頁，引自Gottfried Feder, Das Programm der NSDAP und seine weltanschaulichen Grundgedanken (Munich, 1934), 15-18。

[111.](#_111_3) Rudolf Heberle, Landbevölkerung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Eine soziologische Untersuchung der politischen Willensbildung in Schleswig-Holstein 1918 bis 1932 (Stuttgart, 1963), 160-71；另見同作者的From Democracy to Nazism: A Regional Case Study on Political Parties in Germany (New York, 1970 [1945])，是關于選舉的社會學早期經典著作。關于拉攏各類農場主組成統一的壓力團體，參見Jens Flemming, Landwirtschaftliche Interessen und Demokratie: Ländliche Gesellschaft, Agrarverbände und Staat 1890-1925 (Bonn, 1978), 323-7。

[112.](#_112_3) Claus-Christian W. Szejnmann, Nazism in Central Germany: The Brownshirts in ‘Red’ Saxony (New York, 1999), 50-51; Falter et al., Wahlen, 98.

[113.](#_113_3) Geoffrey Pridham, Hitler's Rise to Power: The Nazi Movement in Bavaria 1923-1933 (London, 1973), 84-6.

[114.](#_114_2) Orlow, The History of the Nazi Party, I. 173-5（有點兒夸大了納粹黨選舉策略的連貫性）；Winkler, Weimar, 344-56。

[115.](#_115_2) 引自Tyrell, Vom Trommler, 163-73；同一作者編輯的Führer befiehl, 129-30, 163-4；Kershaw, Hitler, I. 294。

[116.](#_116_2) Orlow, The History of the Nazi Party, I. 167-71.

[117.](#_117_3) 出處同上，第171-3頁。

[118.](#_118_3) Claudia Koonz, Mothers in the Fatherland: Women, the Family, and Nazi Politics (London, 1987), 72-80.

[119.](#_119_3) Jill Stephenson, The Nazi Organisation of Women (London, 1981), 23-74.

[120.](#_120_3) Peter D. Stachura, Nazi Youth in the Weimar Republic (Santa Barbara, Calif., 1975); Laqueur, Young Germany, 193; Arno Klönne, Jugend im Dritten Reich: Dokumente und Analysen (Cologne, 1982); Hans-Christian Brandenburg, Die Geschichte der HJ. Wege und Irrwege einer Generation (Cologne, 1968); Stachura, The German Youth Movement.

[121.](#_121_3) Daniel Horn, ‘The National Socialist Schülerbund and the Hitler Youth, 1929-1933’,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11 (1978), 355-75; Martin Klaus, Mädchen in der Hitlerjugend: Die Erziehung zur ‘deutschen Frau’ (Cologne, 1980).

[122.](#_122_3) Baldur von Schirach, Die Feier der neuen Front (Munich, 1929)。見Michael Wortmann, ‘Baldur von Schirach: Student Leader, Hitler Youth Leader, Gauleiter in Vienna’, in Smelser and Zitelmann (eds.) The Nazi Elite, 202-11。

[123.](#_123_3) 見Arthur D. Brenner, Emil J. Gumbel: Weimar German Pacifist and Professor (Boston, 2001)；引自Deutsche Republik, 2 July 1932, in Steven P. Remy, The Heidelberg Myth: The Nazification and Denazification of a German University (Cambridge, Mass., 2002), 11。

[124.](#_124_3) Geoffrey J. Giles, ‘The Rise of the National Socialist Students’ Association and the Failure of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Third Reich’, in Peter D. Stachura (ed.), The Shaping of the Nazi State (London, 1978), 160-85; Wortmann, ‘Baldur von Schirach’, 204-5; Kater, Studentenschaft und Rechtsradikalismus; Anselm Faust,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Studentenbund: Studenten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Düsseldorf, 1973); Giles, Students; Steinberg, Sabers and Brown Shirts; Michael Grüttner, Studenten im Dritten Reich (Paderborn, 1995), 19-42, 60.

[125.](#_125_3) Hans-Gerhard Schumann,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Gewerkschaftsbewegung: Die Vernichtung der deutschen Gewerkschaften und der Aufbau der ‘Deutschen Arbeitsfront’ (Hanover, 1958).

[126.](#_126_3) Merkl, Political Violence, 120, 208, 217, 220, 239, 244, 306, 372-3, 427, 515-16.

[127.](#_127_3) Hamel, Völkischer Verband.

[128.](#_128_3) AT 271, in Merkl, Political Violence, 516.

[129.](#_129_2) Orlow, The History of the Nazi Party, I. 271-6.

[130.](#_130_2) Merkl, Political Violence 在導言中評估了這些稿子的可信度，并進行了數量分析；Abel, Why Hitler在導言和第4-9頁中，評估了“行為模式”的可信度。另有一份與之相似的分析，目標文本是1933年以前加入納粹黨的黨員寫于1936—1937年的自述，見Christoph Schmidt, ‘Zu den Motiven “alter Kämpfer” in der NSDAP’, in Detlev Peukert and Jürgen Reulecke (eds.) Die Reihen fast geschlossen: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s Alltags unterm Nationalsozialismus (Wuppertal, 1981), 21-44。

[131.](#_131_2) Merkl, Political Violence, 446-7.

[132.](#_132_2) AT 140，出處同上，第551頁。

[133.](#_133_2) 出處同上，第453, 457, 505-9頁；關于這個時期納粹宣傳的作用，參見Richard Bessel, ‘The Rise of the NSDAP and the Myth of Nazi Propaganda’, Wiener Library Bulletin, 33 (1980)，Ian Kershaw, ‘Ideology, Propaganda, and the Rise of the Nazi Party’, in Peter D. Stachura (ed.)The Nazi Machtergreifung, 1933 (London, 1983), 162-81；主要參見Gerhard Paul, Aufstand der Bilder: Die NS-Propaganda vor 1933 (Bonn, 1990)。

[134.](#_134_2) Merkl, Political Violence, 313-63, 383-4.

[135.](#_135_2) Rudolf Höss, Commandant of Auschwitz (London, 1959 [1951]), 42-61.

[136.](#_136_2) 出處同上，第61-3頁。

[137.](#_137_2) Jochen von Lang, ‘Martin Bormann: Hitler's Secretary’, in Smelser and Zitelmann (eds.), The Nazi Elite, 7-17; Fest, The Face, 191-206.

[138.](#_138_2) Waite, Vanguard創造了“納粹先鋒”這個詞語；Merkl, Political Violence過于輕易地否定了它。

[139.](#_139_2) AT 493, in Merkl, Political Violence, 375.

[140.](#_140_2) AT 382，出處同上，第440頁。

[141.](#_141_2) AT 434和464，出處同上，第444-5頁。

[142.](#_142_2) AT 31，出處同上，第544-5頁。

[143.](#_143_2) AT 520，出處同上，第420頁。

[144.](#_144_2) AT 415，出處同上，第400頁。

[145.](#_145_2) AT 59，出處同上，第654頁。

[146.](#_146_2) AT 548，出處同上，第416頁。

[147.](#_147_2) AT 8, 31, 32，出處同上，第486-7頁。

[148.](#_148_2) AT 22，出處同上，第602頁；火車槍戰的文獻記錄見Martin Broszat, ‘Die Anfänge der Berliner NSDAP 1926/27’, VfZ 8 (1960), 85-118，主要在第115-18頁。

[149.](#_149_3) Merkl, Political Violence, 617.

[150.](#_150_2) Giles, ‘The Rise’, 163.

[151.](#_151_3) Merkl, Political Violence, 699.

[152.](#_152_2) Max Domarus (ed.) Hitler: Speeches and Proclamations 1932-1945: The Chronicle of a Dictatorship (4 vols., London, 1990- [1962-3]), I. 114（在杜塞爾多夫市工業俱樂部的演說）。

[153.](#_153_2) Turner, German Big Business, 114-24。關于共產黨，參見Weber, Die Wandlung, I. 294-318。

[154.](#_154_2) AT 38, in Merkl, Political Violence, 539.

[155.](#_155_2) AT 416和326，出處同上，第540頁。

[156.](#_156_3) AT 4，出處同上，第571頁。

[157.](#_157_2) Melita Maschmann, Account Rendered: A Dossier on my Former Self (London, 1964), 174-5.

[158.](#_158_2) Thomas Krause, Hamburg wird braun: Der Aufstieg der NSDAP 1921-1933 (Hamburg, 1987)第102-7頁令人信服地評論了Michael Kater, The Nazi Party: A Social Profile of Members and Leaders, 1919-1945 (Oxford, 1983), 32-8。1935年的普查列出了每位黨員的入黨日期，因此可以計算出此前任意日期的黨員人數。

[159.](#_159_2) Detlef Mühlberger, ‘A Social Profile of the Saxon NSDAP Membership before 1933’, in Szejnmann, Nazism, 211-19；綜述參見Broszat, Der Staat Hitlers, 49-53；Detlef Mühlberger, Hitler's Followers: 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the Nazi Movement (London, 1991)；以及Peter Manstein, Die Mitglieder und Wähler der NSDAP 1919-1933: Untersuchungen zu ihrer schichtmässigen Zusammensetzung (Frankfurt am Main, 1990 [1987])。

[160.](#_160_2) Josef Ackermann, ‘Heinrich Himmler: Reichsführer-SS’, in Smelser and Zitelmann (eds.) The Nazi Elite, 98-112；Alfred Andersch, Der Vater eines Mörders: Eine Schulgeschichte (Zurich, 1980) 寫的是希姆萊的父親；Bradley F. Smith, Heinrich Himmler 1900-1926: A Nazi in the Making (Stanford, Calif., 1971)是了解希姆萊早年生活的基礎讀物。

[161.](#_161_2) 引用于Ackermann, ‘Heinrich Himmler’, 103；另見Josef Ackermann, Himmler als Ideologe (Göttingen, 1970)。

[162.](#_162_2) Heinz Höhne, The Order of the Death's Head: The Story of Hitler's SS (Stanford, Calif., 1971 [1969]), 26-39.

[163.](#_163_2) Fest, The Face, 171-90，然而像許多寫希姆萊的作者一樣，他也站在過于高高在上的視角。Fest認為，無論希姆萊另有怎樣的面目，但他既不是墻頭草，也不是小資產階級，更不是平庸之輩。Höhne, The Order, 26-8對希姆萊的生動描述基本上屬于后見之明。

[164.](#_164_2) 出處同上，第40-46頁；關于達雷,另見Gustavo Corni, ‘Richard Walther Darré: The Blood and Soil Ideologue’, in Smelser and Zitelmann (eds.) The Nazi Elite, 18-27；以及Horst Gies, R. Walther Darré und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Bauernpolitik 1930 bis 1933 (Frankfurt am Main, 1966)。

[165.](#_165_2) Höhne, The Order, 46-69; Hans Buchheim,‘The SS - Instrument of Domination’, in Helmut Krausnick et al., (eds.), Anatomy of the SS State (London, 1968), 127-203, at 140-43.

## 第四章　通往權力之路

[1.](#_1_4) 引用于Elizabeth Harvey, ‘Youth Unemployment and the State: Public Policies towards Unemployed Youth in Hamburg during the World Economic Crisis’, in Evans and Geary (eds.) The German Unemployed, 142-70，引文在第161頁；另見Wolfgang Ayass, ‘Vagrants and Beggars in Hitler's Reich’, in Richard J. Evans (ed.) The German Underworld: Deviants and Outcasts in German History (London, 1988), 210-237，引文在第210頁。

[2.](#_2_4) Gertrud Staewen-Ordermann, Menschen der Unordnung: Die proletarische Wirklichkeit im Arbeitsschicksal der ungelernten Grossstadtjugend (Berlin, 1933), 86，引用于Detlev J. K. Peukert, Jugend zwischen Krieg und Krise: Lebenswelten von Arbeiterjunge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Cologne, 1987), 184；同一作者的英文版論文 ‘The Lost Generation: Youth Unemployment at the End of the Weimar Republic’, in Evans and Geary (eds.) The German Unemployed, 172-93，引文在185頁。

[3.](#_3_4) Ruth Weiland, Die Kinder der Arbeitslosen (Eberswalde-Berlin, 1933), 40-42，引用于Peukert, Jugend, 184。

[4.](#_4_4) Staewen-Ordemann, Menschen der Unordnung, 92，引用于Peukert, ‘The Lost Generation’, 182。

[5.](#_5_5) Peukert, Jugend, 251-84; Eve Rosenhaft, ‘The Unemployed in the Neighbourhood: Social Dislocation and Political Mobilisation in Germany 1929-33’, in Evans and Geary (eds.), The German Unemployed, 194-227, esp. 209-11; eadem, ‘Organising the“Lumpenproletariat”: Cliques and Communists in Berlin during the Weimar Republic’, in Richard J. Evans (ed.), The German Working Class 1888-1933: The Politics of Everyday Life (London, 1982), 174-219; eadem, ‘Links gleich rechts? Militante Strassengewalt um 1930’, in Thomas Lindenberger and Alf Lüdtke (eds.), Physische Gewalt: 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r Neuzeit (Frankfurt am Main, 1995), 239-75; Hellmut Lessing and Manfred Liebel, Wilde Cliquen: Szenen einer anderen Arbeiterbewegung (Bensheim, 1981).

[6.](#_6_4) James, The German Slump, 132-46.

[7.](#_7_4) 關于大蕭條的全面論述，參見Patricia Clavin, The Great Depression in Europe, 1929-1939 (London, 2000)，強調了國際合作的失敗。

[8.](#_8_4) Charles P. Kindleberger,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 (Berkeley, 1987 [1973]), 104-6.

[9.](#_9_4) 參見Piers Brendon, The Dark Valley: A Panorama of the 1930s (London, 2000), 62-5的生動描述。

[10.](#_10_4) Charles H. Feinstein et al., The European Economy between the Wars (Oxford, 1997), 95-9; Theo Balderston, The Origins and Course of the German Economic Crisis, 1923-1932 (Berlin, 1993); Balderston, Economics, 77-99強調各國對經濟缺乏信心。

[11.](#_11_4) Feinstein et al., The European Economy, 104-9; Brendan Brown, Monetary Chaos in Europe: The End of an Era (London, 1988).

[12.](#_12_4) 綜述參見Dieter Gessner, Agrardepression und Präsidialregierungen，以及Farquharson, The Plough and the Swastika, 1-12。

[13.](#_13_4) Dietmar Petzina, ‘The Extent and Causes of Unemployment in the Weimar Republic’, in Peter D. Stachura (ed.) Unemployment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 in Weimar Germany (London, 1986), 29-48，尤其是第35頁的圖表2.3，參考了Dietmar Petzina等人合編的非常實用的社會史手冊Sozialgeschichtliches Arbeitsbuch, III: Materialien zur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Reiches 1914-1945 (Munich, 1978)。

[14.](#_14_4) 詳見Preller, Sozialpolitik, 440。

[15.](#_15_4) Helgard Kramer, ‘Frankfurt's Working Women: Scapegoats or Winners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in Evans and Geary (eds.), The German Unemployed, 108-41, esp. 112-14.

[16.](#_16_5) Preller, Sozialpolitik, 374, 420-21.

[17.](#_17_5) Rosenhaft, ‘The Unemployed in the Neighbourhood’是生動的描述；更全面的描述參見同一作者的Beating the Fascists? The German Communists and Political Violence 1929-1933 (Cambridge, 1983)，以及Klaus-Michael Mallmann, Kommuniste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Sozialgeschichte einer revolutionären Bewegung (Darmstadt, 1996), 252-61。關于Mallmann 著作的辯論，參見Andreas Wirsching, ‘“Stalinisierung” oder entideologisierte “Nischengesellschaft”? Alte Einsichten und neue Thesen zum Charakter der KPD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VfZ 45 (1997), 449-66，以及Klaus-Michael Mallmann, ‘Gehorsame Parteisoldaten oder eigensinnige Akteure? Die Weimarer Kommunisten in der Kontroverse - eine Erwiderung’, VfZ 47 (1999), 401-15。

[18.](#_18_4) Anthony McElligott, ‘Mobilising the Unemployed: The KPD and the Unemployed Workers’ Movement in Hamburg-Altona during the Weimar Republic’, in Evans and Geary (eds.), The German Unemployed, 228-60; Michael Schneider, Unterm Hakenkreuz: Arbeiter und Arbeiterbewegung 1933 bis 1939 (Bonn, 1999), 47-52.

[19.](#_19_4) 綜述參見Anthony McElligott, Contested City: Municipal Politics and the Rise of Nazism in Altona, 1917-1937 (Ann Arbor, 1998)。

[20.](#_20_4) Mallmann, Kommunisten, 261-83, 381-94.

[21.](#_21_4) Jan Valtin（里夏德·克雷布斯的筆名），Out of the Night (London, 1941), 3-36。關于這部著名暢銷書中事實與虛構的交織，參見Michael Rohrwasser, Der Stalinismus und die Renegaten: Die Literatur der Exkommunisten (Stuttgart, 1991)，尤其可參閱Dieter Nelles, ‘Jan Valtins “Tagebuch der Holle” -Legende und Wirklichkeit eines Schlüsselromans der Totalitarismustheorie’, 1999；Zeitschrift für Sozialgeschichte des 20. und 21. Jahrhunderts, 9 (1994), 11-45。克雷布斯的這部書（“社會主義經典著作”）由托洛茨基派的一個團體于1988年在倫敦重新出版，Lynn Walsh等人寫了一篇精彩的后記，其中包含作者的生活與工作的寶貴細節（第659-74頁）。另見新近出版的研究論著Ernst von Waldenfels, Der Spion, der aus Deutschland kam: Das geheime Leben des Seemanns Richard Krebs (Berlin, 2003)。

[22.](#_22_4) Valtin, Out of the Night (1941 edn.), 36-7.

[23.](#_23_4) 出處同上，第64-78頁。

[24.](#_24_4) 出處同上，第79-328頁。

[25.](#_25_5) Dick Geary, ‘Unemployment and Working-Class Solidarity: The German Experience 1929-33’, in Evans and Geary (eds.), The German Unemployed, 261-80.

[26.](#_26_4) Weber, Die Wandlung, 243-7; Fowkes, Communism, 145-70; Weitz, Creating German Communism, 284-6.

[27.](#_27_4) Hannes Heer, Ernst Thälmann in Selbstzeugnissen und Bilddokumenten (Reinbek, 1975); Willi Bredel, Ernst Thälmann: Beitrag zu einem politischen Lebensbild (Berlin, 1948); Irma Thälmann, Erinnerungen an meinen Vater (Berlin, 1955).

[28.](#_28_5) Klemperer, Leben sammeln, II. 721 (1931年7月16日）。

[29.](#_29_4) McElligott, Contested City, 163.

[30.](#_30_4) Caplan, Government, 54（圖表2）。

[31.](#_31_4) 出處同上，第100-30頁。

[32.](#_32_4) Kershaw, Hitler, I. 325-9; Günter Bartsch, Zwischen drei Stühlen: Otto Strasser. Eine Biographie (Koblenz, 1990); Patrick Moreau, Nationalsozialismus von ‘links’: Die ‘Kampfgemeinschaft Revolutionärer Nationalsozialisten’ und die ‘Schwarze Front’ Otto Strassers 1930-1935 (Stuttgart, 1984).

[33.](#_33_4) Domarus, Hitler, I. 88-114.

[34.](#_34_4) Turner, German Big Business, 191-219.

[35.](#_35_4) 詳細的敘述，參見Bracher, Die Auflösung, 287-389；Dorpalen, Hindenburg, 163-78; Wheeler-Bennett, Hindenburg, 336-49; Winkler, Der Schein, 726-823。

[36.](#_36_4) Bracher, Die Auflösung, 229-84全面論述了軍方在經濟危機中的政策；另見Bracher et al.,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Machtergreifung, III. 1-55；Carsten, The Reichswehr, 309-63；格勒納的話引自Thilo Vogelsang, Reichswehr, Staat und NSDAP: Beiträge zur deutschen Geschichte 1930-1932 (Stuttgart, 1962), 95。

[37.](#_37_4) Carsten, The Reichswehr, 310-11.

[38.](#_38_4) 出處同上，第318-21頁；Broszat, Der Staat Hitlers, 25。

[39.](#_39_4) Kershaw, Hitler, I. 337-8；Peter Bucher, Der Reichswehrprozess: Der Hochverrat der Ulmer Reichswehroffiziere 1929-30 (Boppard, 1967)，尤其是第237-80頁；Deuerlein, Der Aufstieg, 328-42; Reuth, Goebbels, 176。

[40.](#_40_4) Bucher, Der Reichswehrprozess 提供了全面的細節。

[41.](#_41_4) Carsten, The Reichswehr, 323.

[42.](#_42_4) Heinrich Brüning, Memoiren 1918-1934 (ed. Claire Nix and Theoderich Kampmann, Stuttgart, 1970)；William L. Patch, Jr., Heinrich Brüning and the Dissolution of the Weimar Republic (Cambridge, 1998)，尤其是第1-13頁；對上述回憶錄之可信度的不同評估，參見Hans Mommsen, ‘Betrachtungen zu den Memoiren Heinrich Brünings’, Jahrbuch für die Geschichte Mittel- und Ostdeutschlands, 22 (1973), 270-80；Ernest Hamburger, ‘Betrachtungen über Heinrich Brünings Memoiren’, Internationale Wissenschaftliche Korrespondenz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Arbeiterbewegung, 8 (1972), 18-39；Arnold Brecht, ‘Gedanken über Brünings Memoiren’, Politische Vierteljahresschrift, 12 (1971), 607-40。

[43.](#_43_4) Patch, Heinrich Brüning是基于對翔實資料的仔細研究為布呂寧所做的辯護，在這方面是Werner Conze對Bracher觀點所做反駁的最新闡發；參見Conze評論Bracher, Die Auflösung (1st edition), in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183 (1957), 378-82；對布呂寧持批評態度的是Bracher, Die Auflösung, 303-528，以及同一作者的‘Brünings unpolitische Politik und die Auflösung der Weimarer Republik’, VfZ 19 (1971), 113-23。關于1930年之重要性的持平之論，參見Hans Mommsen, ‘Das Jahr 1930 als Zäsur in der deutschen Entwicklung der Zwischenkriegszeit’, in Lothar Ehrlich and Jürgen John (eds.) Weimar 1930: Politik und Kultur im Vorfeld der NS-Diktatur (Cologne, 1998)。Hans Mommsen, The Rise and Fall, 291-5對布呂寧的性格做了犀利的評點。Astrid Luise Mannes, Heinrich Brüning: Leben, Wirken, Schicksal (Munich, 1999)是一部優秀的傳記新著；Herbert Hömig, Brüning: Kanzler in der Krise der Republik. Eine Weimarer Biographie (Paderborn, 2000)是力求以不偏不倚的立場研究布呂寧政治生涯的一部重要學術著作。

[44.](#_44_4) Brüning, Memoiren, 247-8.

[45.](#_45_4) Fulda, ‘Press and Politics’, 234-42.

[46.](#_46_4) Bernd Weisbrod, ‘Industrial Crisis Strategy in the Great Depression’, in Jürgen Freiherr von Krudener (ed.), Economic Crisis and Political Collapse: The Weimar Republic, 1924-1933 (New York, 1990), 45-62; Peter-Christian Witt, ‘Finanzpolitik als Verfassungs- und Gesellschaftspolitik: Überlegungen zur Finanzpolitik des Deutschen Reiches in den Jahren 1930 bis 1932’,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8 (1982), 387-414.

[47.](#_47_4) Hömig, Bruning, 211-24.

[48.](#_48_4) Aldcroft, From Versailles, 156-86.

[49.](#_49_4) Kent, The Spoils of War, 322-72; Hömig, Brüning, 235-57, 270-83.

[50.](#_50_4) Preller, Sozialpolitik, 165, 440-48.

[51.](#_51_4) Kindleberger,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59-76.

[52.](#_52_4) James, The German Slump, 283-323.

[53.](#_53_4) Hömig, Brüning, 345-77.

[54.](#_54_4) Barry Eichengreen, Golden Fetters: The Gold Standard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 1919-1939 (Oxford, 1992), 270-78, 286.

[55.](#_55_4) 關于修改憲法的計劃，參見大部頭研究著作Schulz, Zwischen Demokratie und Diktatur。

[56.](#_56_4) Kent, The Spoils of War, 342-3; Patch, Heinrich Brüning, 162-4.

[57.](#_57_4) Werner Jochmann, ‘Brünings Deflationspolitik und der Untergang der Weimarer Republik’, in Dirk Stegmann et al., (eds.), Industrielle Gesellschaft und politisches System: Beiträge zur politischen Sozialgeschichte. Festschrift für Fritz Fischer zum siebzigsten Geburtstag (Bonn, 1978), 97-112.

[58.](#_58_4) Carl-Ludwig Holtfrerich, ‘Economic Policy Options and the End of the Weimar Republic’, in Kershaw (ed.) Weimar, 58-91，尤其是第65-72頁。論述這個題目的經典論文，是引發密集論辯的‘Zwangslagen und Handlungsspielräume in der grossen Wirtschaftskrise der frühen dreissiger Jahre: Zur Revision des überlieferten Geschichtsbildes’, 由Knut Borchardt發表于1979年，后編入Knut Borchardt, Wachstum, Krisen, Handlungsspielräume der Wirtschaftspolitik (Göttingen, 1982), 165-82，以及同作者的Perspectives on Modern German Economic History and Policy (Cambridge, 1991)。

[59.](#_59_4) Kindleberger,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74; Patch, Heinrich Brüning, 111-15, 156-64, 193, 206-13.

[60.](#_60_4) Deutsches Volkslied-Archiv, Freiburg-im-Breisgau, Gr. II (引用于Evans, Rituals, 531 n. 14)。

[61.](#_61_4) 關于布呂寧在總理任期的最后階段發布的緊急法令和經濟政策，參見Hömig, Brünin, 429-68。

[62.](#_62_4) Patch, Heinrich Brüning, 13, 243-4.

[63.](#_63_4) Nicholls, Weimar, 179; Winkler, Der Weg, 178-202.

[64.](#_64_4) Wolfgang Michalka and Gottfried Niedhart, Die ungeliebte Republik; Dokumente zur Innen- und Aussenpolitik Weimars 1918-1933 (Munich, 1980), 62, 262, 283-4; Noakes and Pridham (eds.), Nazism, I. 70-81; Paul, Aufstand, 90-95.

[65.](#_65_4) Hiller von Gaertringen, ‘Die Deutschnationale Volkspartei’, in Matthias and Morsey (eds.), Das Ende, 549-54.

[66.](#_66_4) 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I/I. 603 (15 September 1930).

[67.](#_67_4) 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 and Die Rote Fahne, 1930年9月16日，引用于Falter, Hitlers Wähler, 32。

[68.](#_68_4) 出處同上，第33頁。

[69.](#_69_4) Paul, Aufstand, 90-94; Richard Bessel, Political Violence and the Rise of Nazism: The Storm Troopers in Eastern Germany 1925-1934 (London, 1984), 22-3.

[70.](#_70_4) 這是Richard F. Hamilton, Who Voted for Hitler? (Princeton, 1981)的主要論題。Krause, Hamburg wird braun，176-7精辟地指出了Hamilton的以全概偏；Hamilton注意到平均收入高的地區與納粹黨得票率高的地區之間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卻沒有注意到這些也是猶太富人所占人口比例較高的地區，而他們不太可能投票給納粹黨；納粹黨在這些地區的選票更有可能來自小企業主、店主、白領工人之類的群體。

[71.](#_71_4) Falter, Hitlers Wähler, 99, 110, 151-4.

[72.](#_72_4) 出處同上，第136-46頁；Richard J. Evans, ‘German Women and the Triumph of Hitler’,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48 (1976), 123-75; Helen L. Boak, ‘“Our Last Hope”: Women's Votes for Hitler - A Reappraisal’, German Studies Review, 12 (1989), 289-310; Gerhard Schulz (ed.), Ploetz Weimarer Republik: Eine Nation in Umbruch (Freiburg, 1987), 166。

[73.](#_73_4) Falter, Hitlers Wähler, 154-93。另見Rohe, Wahlen, 140-63關于“保守派和自由派精英合法性的喪失”的有趣論述。

[74.](#_74_3) Paul, Aufstand, 93-4.

[75.](#_75_3) Falter, Hitlers Wähler, 194-230; Falter et al., Wahlen, 44.

[76.](#_76_3) Jürgen Falter,‘How Likely were Workers to Vote for the NSDAP?’, in Conan Fischer (ed.), The Rise of National Socialism and the Working Classes in Weimar Germany (Oxford, 1996), 9-45; Szejnmann, Nazism, 219-29.

[77.](#_77_3) Dick Geary, ‘Nazis and Workers before 1933’,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History, 48 (2002), 40-51是一份優秀的指南，簡明扼要地梳理了有爭議的文獻，附有延伸閱讀的書目。

[78.](#_78_4) Falter, Hitlers Wähler, 230-66; Hans Speier, German White-Collar Workers and the Rise of Hitler (New Haven, 1986).

[79.](#_79_3) Thomas Childers, The Nazi Voter: The Social Foundations of Fascism in Germany, 1919-1933 (Chapel Hill, NC, 1981), 262-9.

[80.](#_80_3) 有些論者試圖把納粹黨的成功解釋為各種社會群體從經濟角度對納粹黨綱做出的合理反應，但這種解釋忽略了關鍵因素（William Brustein, The Logic of Evil: The Social Origins of the Nazi Party, 1925-1933 [New Haven, 1996]）。

[81.](#_81_3) Rosenhaft, Beating the Fascists?, 60-64.

[82.](#_82_3) 出處同上，第22-3頁（根據后來的公訴卷宗）；Reuth, Goebbels, 157-62；Thomas Oertel, Horst Wessel: Untersuchung einer Legende (Cologne, 1988); Bernhard Fulda, ‘Horst Wessel: Media, Myth and Memory’（未出版的論文，提交給2003年11月的劍橋大學歐洲現代史研討會）；另見‘Ein politischer Totschlag’, Berliner Tageblatt, 447 (1930年9月23日）。

[83.](#_83_3) ‘Tyrell, Führer befiehl, 296-7（根據警方關于1929年11月慕尼黑一次褐衫軍集會的報告，第三首詩的第三行與本書所用版本稍有不同。第四首詩與第一首詩重復，本書未引用）。

[84.](#_84_3) Reuth, Goebbels, 162 and 643 n. 109.

[85.](#_85_4) Tyrell, Führer befiehl, 288-9.

[86.](#_86_3) Rosenhaft, Beating the Fascists?, 6，報告數據見于Adolf Ehrt, Bewaffneter Aufstand! Enthüllungen über den kommunistischen Umsturzversuch am Vorabend der nationalen Revolution (Berlin, 1933), 166; Die Rote Fahne, 21 November 1931；Nationalsozialistischer Deutscher Frontkämpferbund (ed.), Der NSDFB (Stahlhelm): Geschichte, Wesen und Aufgabe des Frontsoldatenbundes (Berlin, 1935), 58-61；Rohe, Das Reichsbanner, 342；綜述參見Diehl, Paramilitary Politics全書各處。

[87.](#_87_3) Rosenhaft, Beating the Fascists?, 6，數據來源同上；Rohe, Das Reichsbanner, 342。

[88.](#_88_3) Stenographische Berichte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s deutschen Reichstags, 445 (1932), 1602-4.

[89.](#_89_3) Valtin, Out of the Night, 218.

[90.](#_90_3) Rosenhaft, Beating the Fascists?, 8; Diehl, Paramilitary Politics, 287.

[91.](#_91_4) 關于1933年1月20日大赦在一座德國城市產生的影響，參見William S. Allen, The Nazi Seizure of Power: The Experience of a Single German Town, 1922-1945 (New York, 1984 [1965]), 146-7。

[92.](#_92_4) Peter Lessmann, Die preussische Schutzpolizei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Streifendienst und Strassenkampf (Düsseldorf, 1989); Eric D. Kohler, ‘The Crisis in the Prussian Schutzpolizei 1930-32’, in George L. Mosse (ed.), Police Forces in History (London, 1975), 131-50; Hsi-Huey Liang, The Berlin Police Force in the Weimar Republic (Berkeley, 1970); Siegfried Zalka, Polizeigeschichte: Die Exekutive im Lichte der historischen Konfliktforschung. Untersuchungen über die Theorie und Praxis der preussischen Schutzpolizei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zur Verhinderung und Bekämpfung innerer Unruben (Lübeck, 1979); Jürgen Siggemann, Die kasernierte Polizei und das Problem der inneren Sicherheit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Eine Studie zum Auf- und Ausbau des innerstaatlichen Sicherheitssystems in Deutschland 1918/19-1933 (Frankfurt am Main, 1980); Johannes Buder, Die Reorganisation der preussischen Polizei 1918/1923 (Frankfurt am Main, 1986); Johannes Schwarz, Die bayerische Polizei und ihre historische Funktion bei der Aufrechterhaltung der öffentlichen Sicherheit in Bayern von 1919 bis 1933 (Munich, 1977)。另見前漢堡治安隊隊長所作的有趣但不完全可信的記錄Lothar Danner, Ordnungspolizei Hamburg: Betrachtungen zu ihrer Geschichte 1918-1933 (Hamburg, 1958)。

[93.](#_93_4) 實用的簡述參見Robert Gellately, The Gestapo and German Society: Enforcing Racial Policy 1933-1945 (Oxford, 1990), 22-6；詳述參見Robert J. Goldstein, Political Repress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London, 1983)。

[94.](#_94_4) Christoph Graf, Politische Polizei zwischen Demokratie und Diktatur (Berlin, 1983).

[95.](#_95_4) Otto Buchwitz, 50 Jahre Funktionär der deutschen Arbeiterbewegung (Stuttgart, 1949), 129-36.

[96.](#_96_4) Thomas Kurz, ‘Blutmai’: Sozialdemokraten und Kommunisten im Brennpunkt der Berliner Ereignisse von 1929 (Bonn, 1988); Chris Bowlby, ‘Blutmai 1929: Police, Parties and Proletarians in a Berlin Confrontation’, Historical Journal, 29 (1986), 137-58；背景參見Eve Rosenhaft, ‘Working-Class Life and Working-Class Politics: Communists, Nazis, and the State in the Battle for the Streets, Berlin, 1928-1932’, in Richard Bessel and Edgar J. Feuchtwanger (eds.) Social Change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Weimar Germany (London, 1981), 207-40。

[97.](#_97_4) George C. Browder, Hitler's Enforcers: The Gestapo and the SS Security Service in the Nazi Revolution (New York, 1996), 23-8.

[98.](#_98_4) Richard Bessel, ‘Militarisierung und Modernisierung: Polizeiliches Handel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in Alf Lüdtke (ed.), ‘Sicherheit’ und ‘Wohlfahrt’: Polizei, Gesellschaft und Herrschaft im 19. und 20. Jahrhundert (Frankfurt am Main, 1992), 323-43; Theodor Lessing, Haarmann: Die Gescbichte eines Werwolfs. Und andere Kriminalreportagen (ed. Rainer Marwedel, Frankfurt am Main, 1989); Evans, Rituals, 530-35, 591-610.

[99.](#_99_4) Browder, Hitler's Enforcers, 28-9; Danner, Ordnungspolizei, 223.

[100.](#_100_4) Eichengreen, Golden Fetters, 286; Hömig, Brüning, 525-36.

[101.](#_101_4) Patch, Heinrich Brüning, 148-9; Bessel, Political Violence, 54-66.

[102.](#_102_4) Höhne, The Order, 51-62.

[103.](#_103_4) Herbert, Best, 111-19; Patch, Heinrich Brüning, 225-7.

[104.](#_104_3) 出處同上，第228-9頁。

[105.](#_105_3) 出處同上，第249-51頁；Bessel, Political Violence第29-31頁。

[106.](#_106_3) Patch, Heinrich Brüning, 251.

[107.](#_107_3) Bracher, Die Auflösung, 377-88.

[108.](#_108_3) Thomas Mergel, Parlamentarische Kultur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Politische Kommunikation, symbolische Politik und Öffentlichkeit im Reichstag (Düsseldorf, 2002), 179-81.

[109.](#_109_4) Carsten, The Reichswehr, 259-63, 296-308。關于施萊謝爾性格的簡述，參見Henry Ashby Turner, Jr., Hitler's Thirty Days to Power: January 1933 (London, 1996), 7, 19-21。關于施萊謝爾與格勒納之間關系的精辟分析，參見Theodor Eschenburg, ‘Die Rolle der Persönlichkeit in der Krise der Weimarer Republik: Hindenburg Brüning, Groener, Schleicher’, VfZ 9 (1961), 1-29，尤其是第7-13頁。那種認為施萊謝爾實際上是希望通過加強政府行政部門來維護民主制度的弔詭之論，很像有些歷史學家論證布呂寧時所采用的方式，參見Wolfram Pyta, ‘Konstitutionelle Demokratie statt monarchischer Restauration: Die verfassungspolitische Konzeption Schleichers in der Weimarer Staatskrise’, VfZ 47 (1999), 417-41。

[110.](#_110_4) Rohe, Das Reichsbanner, 360-65.

[111.](#_111_4) Carsten, The Reichswehr, 333.

[112.](#_112_4) Otto Meissner, Staatssekretär unter Ebert - Hindenburg - Hitler: Der Schicksalsweg des deutschen Volkes von 1918-1945 wie ich ihn erlebte (Hamburg, 1950), 215-17.

[113.](#_113_4) Rudolf Morsey, ‘Hitler als Braunschweiger Reigierungsrat’, VfZ 8 (1960), 419-48.

[114.](#_114_3) Donna Harsch, German Social Democracy and the Rise of Nazism (Chapel Hill, NC, 1993), 179.

[115.](#_115_3) Vorwärts，1932年3月10日，引用于Winkler, Der Weg, 514。

[116.](#_116_3) Harsch, German Social Democracy, 180，引自Carlo Mierendorff, ‘Der Hindenburgsieg 1932’, 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 4 April 1932, 297；另見Erich Matthias, ‘Hindenburg zwischen den Fronten 1932’, VfZ 8 (1960), 75-84。

[117.](#_117_4) Winkler, Der Weg, 519；另見Alfred Milatz, ‘Das Ende der Parteien im Spiegel der Wahlen 1930 bis 1933’, in Matthias and Morsey (eds.) Das Ende, 743-93, at 761-6。

[118.](#_118_4) Falter, et al., Wahlen, 46; Broszat, Der Staat Hitlers, 44-5.

[119.](#_119_4) Paul, Aufstand, 98.

[120.](#_120_4) Bracher, Die Auflösung, 511-17清晰地厘清了后來關于這一點的爭議。

[121.](#_121_4) Gordon A. Craig, ‘Briefe Schleichers an Groener’, Die Welt als Geschichte, 11 (1951), 122-30; Reginald H. Phelps, ‘Aus den Groener Dokumenten’, Deutsche Rundschau, 76 (1950), 1019, and 77 (1951), 26-9; Hömig, Brüning, 537-89.

[122.](#_122_4) 巴本退出中央黨的辭呈，見Georg Schreiber, Brüning, Hitler, Schleicher: Das Zentrum in der Opposition (Cologne, 1932), 17-19，引用于Bracher, Die Auflösung, 536；評論參見Bracher, Die Auflösung, 656頁，以及Morsey, ‘Die Deutsche Zentrumspartei’, in Matthias and Morsey (eds.) Das Ende, 306-14。對巴本的負面評價，參見Joachim Petzold, Franz von Papen: Ein deutsches Verhängnis (Munich, 1995)，對巴本回憶錄的評論，參見Theodor Eschenburg, ‘Franz von Papen’, VfZ 1 (1953), 153-69。

[123.](#_123_4) Fest, The Face, 229-33; Richard W. Rolfs, The Sorcerer's Apprentice: The Life of Franz von Papen (Lanham, Md., 1996).

[124.](#_124_4) Vejas Gabriel Liulevicius, War Land on the Eastern Front: Culture, National Identity and German Occupation in World War I (Cambridge, 2000).

[125.](#_125_4) Bracher, Die Auflösung, 536-54頁犀利地分析了巴本的“新政府”構想。

[126.](#_126_4) 巴本的話，引用于Walter Schotte, Der neue Staat (Berlin, 1932), 110-24。

[127.](#_127_4) Evans, Rituals, 613-44.

[128.](#_128_4) Fulda, ‘Press and Politics’，第4章。

[129.](#_129_3) Edward W. Bennett, German Rearmament and the West, 1932-1933 (Princeton, 1979), 63-4, 69.

[130.](#_130_3) Valtin, Out of the Night, 309-11，但總是夸大紅色陣線戰士同盟的殺戮意圖和準備程度。

[131.](#_131_3) McElligott, Contested City, 192-5; Leon Schirmann, Altonaer Blutsonntag 17. Juli 1932: Dichtung und Wahrheit (Hamburg, 1994).

[132.](#_132_3) Lessmann, Die preussische Schutzpolizei, 349-70.

[133.](#_133_3) Rohe, Das Reichsbanner, 431-5.

[134.](#_134_3) Matthias, ‘Die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in Matthias and Morsey (eds.), Das Ende, 141-5.

[135.](#_135_3) Bracher, Die Auflösung, 559-600; Schulze, Otto Braun, 745-86; Huber, Deutsche Verfassungsgeschichte VII. 1015-25 and 1192-7; Matthias, ‘Die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in Matthias and Morsey (eds.), Das Ende, 119-50; Schulz, Zwischen Demokratie und Diktatur, III. 920-33; Broszat, Der Staat Hitlers, 89.

[136.](#_136_3) 可參閱Evans, Rituals, 614-15。綜述參見Winkler, Der Weg第646-81頁，以及Rudolf Morsey, ‘Zur Geschichte des “Preussenschlags” am 20. Juli 1932’, VfZ 9 (1961)第436-9頁。

[137.](#_137_3) Joseph Goebbels, Vom Kaiserhof zur Reichskanzlei: Eine historische Darstellung in Tagebuchblättern (vom 1. Januar 1932 bis zum 1. Mai 1933) (Munich, 1937 [1934]), 131-5；關于普魯士州議會選舉，參見Winkler, Der Weg, 542-53。

[138.](#_138_3) Noakes and Pridham (eds.), Nazism, 1. 102-3; Martin Broszat, Hitler and the Collapse of Weimar Germany (Oxford, 1987 [1984]), 82-91; Winkler, Der Weg, 681-98.

[139.](#_139_3) Matthias, ‘Die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in Matthias and Morsey (eds.), Das Ende, 222-4 (document no. 11: Rundschreiben des Gauvorstandes Hannover des Reichsbanners, 5 July 1932); Winkler, Der Weg, 515; Harsch, German Social Democracy, 177-80; Richard Albrecht, ‘Symbolkampf in Deutschland 1932: Sergej Tschachotin und der “Symbolkrieg” der drei Pfeile gegen den Nationalsozialismus als Episode im Abwehrkampf der Arbeiterbewegung gegen den Faschismus in Deutschland’, Internationale Wissenschaftliche Korrespondenz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Arbeiterbewegung, 22 (1986), 498-533.

[140.](#_140_3) Winkler, Der Weg, 514-16.

[141.](#_141_3) Simon Taylor, Germany 1918-1933; Revolution, Counter-Revolution and the Rise of Hitler (London, 1983), 112-16; Hans Bohrmann (ed.), Politische Plakate (Dortmund, 1984), 247-62.

[142.](#_142_3) Paul, Aufstand, 178（引自戈培爾1933年7月31日的演講）。

[143.](#_143_3) 出處同上，第133-76, 223-47, 253-66頁。

[144.](#_144_3) 關于1932年7月選舉，參見Winkler, Der Weg, 681-92；概述見Jürgen W. Falter, ‘Die Wähler der NSDAP 1928-1933: Sozialstruktur und parteipolitische Herkunft’, in Wolfgang Michalka (ed.)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Machtergreifung (Paderborn, 1984), 47-59。

[145.](#_145_3) Falter, Hitlers Wähler, 110-13, 369-71。關于納粹黨對工人（尤其是那些仍然有工作的人）的號召力，參見Szejnmann, Nazism, 219-31。

[146.](#_146_3) 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I/II. 211-12 (1 August 1932).

[147.](#_147_3) Hannover and Hannover-Drück, Politische Justiz, 301-10，引語在第306頁；Paul Kluke, ‘Der Fall Potempa’, VfZ 5 (1957), 279-97；Richard Bessel, ‘The Potempa Murder’,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10 (1977), 241-54。總統令并沒有開列適用于死刑的新罪名；殺人（無論出于什么動機）在《刑法》的相關條款中已有明確規定。因此這項總統令只不過是個宣傳舉動。

[148.](#_148_3) Hannover and Hannover-Drück, Politische Justiz, 308.

[149.](#_149_4) 出處同上，第310頁；Karl-Heinz Minuth (ed.) Akten der Reichskanzlei: Weimarer Republik. Das Kabinett von Papen, I. Juni bis 3. December 1932 (Boppard, 1989), 146, 491-5。關于巴本擁有減刑的司法權力，極端令人懷疑，因為減刑的權力歸合法任命的普魯士州政府首腦，所以巴本行使減刑權的說法在法律上是有爭議的。此案的幾個兇手于1933年3月被釋放出監獄（Evans, Rituals, 615-18, 627-8）。

[150.](#_150_3) Hitler: Reden, Schriften, Anordnungen. Februar 1925 bis Januar 1933 (5 vols., Institut fur Zeitgeschichte, Munich, 1992-8), V/I: Von der Reichsprdsidentenwahl bis zur Machtergreifung, April 1932 - Januar 1933, 304-9.

[151.](#_151_4) Turner, Hitler's Thirty Days, 14-15，以及Winkler, Weimar, 510-24。

[152.](#_152_3) Christian Striefler, Kampf um die Macht: Kommunisten und Nationalsozialisten am Ende der Weimarer Republik (Berlin, 1993)，尤其是第177-86頁；Deuerlein (ed.) Der Aufstieg, 402-4。另見Paul, Aufstand, 104-8。

[153.](#_153_3) Werner Jochmann (ed.),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Revolution: Ursprung und Geschichte der NSDAP in Hamburg 1922-1933 (Frankfurt am Main, 1963), 400, 402, 405, 413-14.

[154.](#_154_3) 出處同上，第405頁。

[155.](#_155_3) 出處同上，第406頁。

[156.](#_156_4) 出處同上，第414, 416, 417頁。

[157.](#_157_3) Falter, Hitlers Wähler, 34-8, 103-7.

[158.](#_158_3) Vorwärts, 1932年11月13日，引用于Falter, Hitlers Wähler, 37。

[159.](#_159_3) 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I/II., 272（1932年11月6日）。

[160.](#_160_3) Falter, Hitlers Wähler, 37-8, 106-7.

[161.](#_161_3) Bracher, Die Auflösung, 644-62; Nicholls, Weimar, 163-6.

[162.](#_162_3) 文獻資料參見Thilo Vogelsang, ‘Zur Politik Schleichers gegenüber der NSDAP 1932’, VfZ 6 (1958), 86-118。

[163.](#_163_3) 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I/II., 276-88（1932年12月1日）。

[164.](#_164_3) Bracher, Die Auflösung, 662-85; Stachura, Gregor Strasser; Kershaw, Hitler, I. 396-403; Noakes and Pridham (eds.), Nazism, 110-15; Orlow, The History of the Nazi Party, I. 291-6；Turner, Hitler's Thirty Days, 23-8, 84-6糾正了前面的幾種記錄。

[165.](#_165_3) Turner, Hitler's Thirty Days, 61-6; Paul, Aufstand, 109-10.

[166.](#_166_2) Grüttner, Studenten, 53-5.

[167.](#_167_2) Noakes and Pridham, Nazism, I. 109-11.

[168.](#_168_2) Berghahn, Der Stahlhelm, 187-246.

[169.](#_169_2) Theodor Duesterberg, Der Stahlhelm und Hitler (Wolfenbüttel, 1949), 39，引用于Turner, Hitler's Thirty Days, 154；另見Berghahn, Der Stahlhelm, 246-50。

[170.](#_170_2) Meissner, Staatssekretär, 247。另見Bracher, Die Auflösung, 707-32；Noakes and Pridham (eds.) Nazism, I. 116-20。

[171.](#_171_2) Lutz, Graf Schwerin von Krosigk, Es geschah in Deutschland: Menschenbilder unseres Jahrhunderts (Tübingen, 1951), 147.

[172.](#_172_2) Ewald von Kleist-Schmenzin, ‘Die letzte Möglichkeit’, Politische Studien, 10 (1959), 89-92, at 92.

## 第五章　建立第三帝國

[1.](#_1_5) Deutsche Zeitung, 27a（早間版，1933年2月1日，頭版第2欄）。新聞報道選輯，參見Wieland Eschenhagen (ed.) Die ‘Machtergreifung’: Tagebuch einer Wende nach Presseberichten vom 1. Januar bis 6. März 1933 (Darmstadt, 1982)。

[2.](#_2_5) Berliner Illustrierte Nachtausgabe, 26（1933年1月31日），第2版第4欄；B.Z. am Mittag 26 (Erste Beilage，1933年1月31日），第3版第3欄的圖片說明；Peter Fritzsche, Germans into Nazis (Cambridge, Mass., 1998), 139-43; Hans-Joachim Hildenbrand, ‘Der Betrug mit dem Fackelzug’, in Rolf Italiander (ed.), Wir erlebten das Ende der Weimarer Republik: Zeitgenossen berichten (Düsseldorf, 1982), 165。

[3.](#_3_5) Wheeler-Bennett, Hindenburg, 435。不用說，魯登道夫根本不在場。

[4.](#_4_5) 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 51（早間版，1933年1月31日）頭版。

[5.](#_5_6) Berliner Börsen-Zeitung, 51（早間版，1933年1月31日）頭版第2欄。

[6.](#_6_5) 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 51（早間版，1933年1月31日）頭版第3欄。

[7.](#_7_5) Deutsche Zeitung, 27a（早間版，1933年2月1日）頭版頭條。

[8.](#_8_5) 引用于Jochmann (ed.)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Revolution, 429; Fritzsche, German, 141。

[9.](#_9_5) Herbst, Das 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land, 59-60.

[10.](#_10_5) 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I/II., 357-9（1933年1月31日）。

[11.](#_11_5) Deutsche Zeitung, 26a（早間版，1933年1月31日）標題頁第1-2欄。

[12.](#_12_5) 兩個例子，參見Bernd Burkhardt, Eine Stadt wird braun: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Machtergreifung in der Provinz. Eine Fallstudie (Hamburg, 1980) 在米爾阿克（Mühlacker）的小鎮施瓦比安（Swabian）；Allen, The Nazi Seizure of Power第153-4頁在北方小鎮諾特海姆。

[13.](#_13_5) Deutsche Zeitung, 26b（晚間版，1933年1月31日）頭版第3欄；Vossische Zeitung, 52（晚間版，1933年1月31日）第3版第1欄。

[14.](#_14_5) Jochmann,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Revolution, 423.

[15.](#_15_5) Maschmann, Account Rendered, 11-12，(英譯已校改)。

[16.](#_16_6) 引用于Deutsche Zeitung, 27a（早間版，1933年2月1日）頭版第1欄。

[17.](#_17_6) Deutsche Zeitung, 26b（晚間版，1933年1月31日）第3版第2欄：‘Wieder zwei Todesopfer der roten Mordbestien’。

[18.](#_18_5) Berliner Börsen-Zeitung, 52（晚間版，1933年1月31日）第2版第2-3欄。

[19.](#_19_5) Welt am Abend, 26（1933年1月31日），1-2。

[20.](#_20_5) Hans-Joachim Althaus et al., ‘Da ist nirgends nichts gewesen ausser hier’: Das ‘rote Mössingen’ im Generalstreik gegen Hitler. Geschichte eines schwäbischen Arbeiterdorfes (Berlin, 1982).

[21.](#_21_5) Allan Merson, Communist Resistance in Nazi Germany (London, 1985), 25-8; Winkler, Der Weg, 867-75.

[22.](#_22_5) Josef and Ruth Becker (eds.), Hitlers Machtergreifung: Dokumente vom Machtantritt Hitlers 30. Januar 1933 bis zur Besiegelung des Einparteienstaates 14. Juli 1933 (2nd edn., Munich, 1992 [1983]),45.

[23.](#_23_5) Die Welt am Abend, 27（1933年2月1日）頭版頭條；Die Rote Fahne, 27（1933年2月1日）頭版頭條。

[24.](#_24_5) Jochmann,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Revolution, 421.

[25.](#_25_6) Camill Hoffmann，1933年1月30日的日記，引用于Johann Wilhelm Brügel 與Norbert Frei合編的‘Berliner Tagebuch, 1932-1934: Aufzeichnungen des tschechoslowakischen Diplomaten Camill Hoffmann’, VfZ 36 (1988), 131-83頁，引語在第159頁。

[26.](#_26_5)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ed.) Documents Diplomatiques Français, 1932-1939, ser. 1, vol. II (Paris, 1966)第552頁，弗朗索瓦—蓬塞1933年2月1日致邦庫爾（Boncour）的信。這是Gotthard Jasper, Die gescheiterte Zähmung: Wege zur Machtergreifung Hitlers 1930-1934 (Frankfurt am Main, 1986)的中心論題，尤其是第126-71頁。有一句經常被引用的魯登道夫當時的“預言”，說希特勒將把德國拖進深淵（例如Kershaw, Hitler, I. 427），這是漢斯·弗蘭克后來杜撰的：參見Fritz Tobias, ‘Ludendorff, Hindenburg, Hitler: Das Phantasieprodukt des Ludendorff-Briefes vom 30. Januar 1933’, in Uwe Backes et al. (eds.) Die Schatten der Vergangenheit: Impulse zur Historisierung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Frankfurt am Main, 1990), 319-43，以及Lothar Gruchmann, ‘Ludendorffs “prophetischer” Brief an Hindenburg vom Januar/Februar 1933’, VfZ 47 (1999), 559-62。

[27.](#_27_5) Robert J. O'Neill, The German Army and the Nazi Party 1933-1939 (London, 1966), 34-5.

[28.](#_28_6) Klaus-Jürgen Müller, The Army,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Germany 1933-1945: Studies in the Army's Relation to Nazism (Manchester, 1987), 29-44。O'Neill, The German Army, 35-45；Wolfgang Sauer, Die Mobilmachung der Gewalt (vol. III of Bracher et al.,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Machtergreifung), 41-84；Andreas Wirsching, ‘“Man kann nur Boden germanisieren”: Eine neue Quelle zu Hitlers Rede vor den Spitzen der Reichswehr am 3. Februar 1933’, VfZ 49 (2001), 516-50。這篇文章引述的希特勒1933年2月3日對軍官講話的完整版，最近在莫斯科的前克格勃檔案館被發現，可能是哈默施泰因的女兒提供的，她是共產黨的同情者。關于希特勒稍早時候所做的與之類似的一套承諾，參見Thilo Vogelsang, ‘Hitlers Brief an Reichenau vom 4. Dezember 1932’, VfZ 7 (1959), 429-37。

[29.](#_29_5) Martin Broszat, ‘The Concentration Camps 1933-1945’, in Helmut Krausnick et al., (eds.), Anatomy of the SS State (London, 1968 [1965]), 397-504, at 400-401; Bessel, Political Violence, 98-9.

[30.](#_30_5) Siegfried Bahne, ‘Die Kommunis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in Matthias and Morsey (eds.), Das Ende, 655-739, at 690; Berghahn, Der Stahlhelm, 252.

[31.](#_31_5) Matthias, ‘Die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in Matthias and Morsey (eds.), Das Ende, 101-278, at 101-50.

[32.](#_32_5) Winkler, Der Weg, 867-875。《前進報》的引語出處同前，第867頁。

[33.](#_33_5) Broszat, Der Staat Hitlers, 94.

[34.](#_34_5) 格熱辛斯基于1933年2月24日致Klupsch等人的信，參見Matthias, ‘Die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中的第25份文件，文章收錄于Matthias and Morsey (eds.) Das Ende, 234-5。

[35.](#_35_5) Winkler, Der Weg, 876-8.

[36.](#_36_5) Martin Kitchen, The Coming of Austrian Fascism (London, 1980), 202-81; Francis L. Carsten, Fascist Movements in Austria: From Schönerer to Hitler (London, 1977), 249-70.

[37.](#_37_5) Winkler, Der Weg, 868.

[38.](#_38_5) Domarus, Hitler, I. 247.

[39.](#_39_5) 出處同上，第254頁。

[40.](#_40_5) 出處同上，第253頁。

[41.](#_41_5) Morsey, ‘Die Deutsche Zentrumspartei’, in Matthias and Morsey (eds.), Das Ende, 339-54; Broszat, Der Staat Hitlers, 95.

[42.](#_42_5) Domarus, Hitler, I. 256; Broszat, Der Staat Hitlers, 249.

[43.](#_43_5) Domarus, Hitler, I. 170.

[44.](#_44_5) 出處同上，第249頁（1933年2月10日）。

[45.](#_45_5) 出處同上，第247-50頁。

[46.](#_46_5) Jochmann (ed.),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Revolution, 431.

[47.](#_47_5) Domarus, Hitler, I. 250-51.

[48.](#_48_5) Turner, German Big Business, 330-32.

[49.](#_49_5) Paul, Aufstand, 111-13.

[50.](#_50_5) Printed in Bahne, ‘Die Kommunis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in Matthias and Morsey (eds.), Das Ende, document 3, 728-31, at 731.

[51.](#_51_5) 出處同上，第686-96頁。

[52.](#_52_5) Hans Mommsen, ‘Van der Lubbes Weg in den Reichstag - der Ablauf der Ereignisse’, in Uwe Backes et al., Reichstagsbrand: Aufklärung einer historischen Legende (Munich, 1986), 33-57, at 42-7.

[53.](#_53_5) Harry Graf Kessler, Tagebücher 1918-1937 (ed. Wolfgang Pfeiffer-Belli, Frankfurt am Main, 1961), 707-9.

[54.](#_54_5) Horst Karasek, Der Brandstifter: Lehr- und Wanderjahre des Maurergesellen Marinus van der Lubbe, der 1933 auszog, den Reichstag anzuzünden (Berlin, 1980); Martin Schouten, Marinus van der Lubbe (1909-1934): Eine Biographie (Frankfurt, 1999 [1986])；以及Fritz Tobias, The Reichstag Fire: Legend and Truth (London, 1962)。

[55.](#_55_5) Mommsen, ‘Van der Lubbes Weg’, 33-42.

[56.](#_56_5) 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part I, vol. II, p. 383.

[57.](#_57_5) Rudolf Diels, Lucifer ante Portas: Es spricht der erste Chef der Gestapo (Stuttgart, 1950), 192-3.

[58.](#_58_5) Mommsen, ‘Van der Lubbes Weg’; Karasek, Der Brandstifter; Tobias, The Reichstag Fire。后來，共產黨試圖證明納粹黨在幕后策劃了縱火案，但范德呂伯的口供和相關文件的真實性似乎無懈可擊。而且，在用于證明納粹涉案的文件證據中，發現了大量偽造和篡改的內容。關于舉證納粹應為縱火案負責的材料，參見德國法西斯運動受害者世界委員會（World Committee for the Victims of German Fascism，主席為愛因斯坦）編輯的The Brown Book of the Hitler Terror and the Burning of the Reichstag (London, 1933), 54-142; Walther Hofer and Alexander Bahar (eds.) Der Reichstagsbrand: Eine wissenschaftliche Dokumentation (Freiburg im Breisgau, 1992 [1972, 1978])；指出該書不足之處的是Backes et al., Reichstagsbrand; Karl-Heinz Janssen, ‘Geschichte aus der Dunkelkammer: Kabalen um dem Reichstagsbrand. Eine unvermeidliche Enthüllung’, Die Zeit, 38 (14 September 1979), 45-8; 39 (21 September 1979), 20-24; 40 (28 September 1979), 49-52; 41 (5 October 1979), 57-60；Tobias, The Reichstag Fire，尤其是第59-78頁，以及Hans Mommsen, ‘Der Reichstagsbrand und seine politischen Folgen’, VfZ 12 (1964), 351-413。最近有一篇文章認為納粹黨策劃了縱火案，其立論是基于以前各種論文中對于緊急處置權與國會縱火法令之間相似性的夸大：見Alexander Bahar and Wilfried Kugel, ‘Der Reichstagsbrand: Neue Aktenfunde entlarven die NS-Täter’, 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43 (1995), 823-32，以及Jurgen Schmadeke et al., ‘Der Reichstagsbrand im neuen Licht’,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269 (1999), 603-51。Tobias和Mommsen關于范德呂伯是單獨行動的結論，至今依然未被撼動。

[59.](#_59_5) Diels, Lucifer, 193-5.

[60.](#_60_5) 出處同上，第180-2頁。戈培爾顯然已銷毀2月最后幾天的日記原稿，此事引起那些支持納粹黨縱火論者的懷疑。在篡改過的版本、以“Vom Kaiserhof zur Reichskanzlei”為題發表的日記中，他說出事的那個夜晚，“元首一刻也不曾失去鎮靜，令人敬佩”（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I/II., 383）。

[61.](#_61_5) Diels, Lucifer, 193-5.

[62.](#_62_5) Karl-Heinz Minuth (ed.), Akten der Reichskanzlei: Die Regierung Hitler, I: 1933-1934 (2 vols., Boppard, 1983), I. 123; Ulrich Kolbe, ‘Zum Urteil über die “Reichstagsbrand-Notverordnung” vom 2.8. 2. 1933’, Geschichte in Wissenschaft und Unterricht, 16 (1965), 359-70; Broszat, Der Staat Hitlers, 92。關于居特納，參見Lothar Gruchmann, Justiz im Dritten Reich 1933-1940: Anpassung und Unterwerfung in der Ära Gürtner (Munich, 1988), 70-83。

[63.](#_63_5) Minuth (ed.), Die Regierung Hitler 1933-1934, I. 128-31; Kolbe, ‘Zum Urteil’, 359-70.

[64.](#_64_5) Minuth (ed.), Die Regierung Hitler 1933-1934, I. 128-31; Broszat, ‘The Concentration Camps’, 400-402.

[65.](#_65_5) Minuth (ed.), Die Regierung Hitler 1933-1934, I. 131.

[66.](#_66_5) 引用于Noakes and Pridham (eds.) Nazism, I. 142。近期的分析文章，參見Thomas Reithel and Irene Strenge, ‘Die Reichstagsbrandverordnung: Grundlegung der Diktatur mit den Instrumenten des Weimarer Ausnahmezustandes’, VfZ 48 (2000), 413-60。

[67.](#_67_5) Jochmann (ed.),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Revolution, 427.

[68.](#_68_5) Evans, Rituals, 618-24.

[69.](#_69_5) AT 31, Merkl, Political Violence, 545（已重新英譯）。“突擊隊”是沖鋒隊的基本組織單位。

[70.](#_70_5) Mason, Social Policy, 73-87.

[71.](#_71_5) Bahne, ‘Die Kommunistische Partei’, in Matthias and Morsey (eds.), Das Ende, 693-4, 699-700; Winkler, Der Weg, 876-89; Weber, Die Wandlung, 246; World Committee (ed.), The Brown Book, 184; Broszat, Der Staat Hitlers, 101-2。

[72.](#_72_5) Merson, Communist Resistance, 57; Detlev J. K. Peukert, Die KPD im Widerstand: Verfolgung und Untergrundarbeit an Rhein und Ruhr, 1933 bis 1945 (Wuppertal, 1980), 75-8。另見Horst Duhnke, Die KPD von 1933 bis 1945 (Cologne, 1972), 101-9；同作者的Die KPD und das Ende von Weimar: Das Scheitern einer Politik 1932-1935 (Frankfurt am Main, 1976), 34-42。

[73.](#_73_5) Diels, Lucifer, 222。另見Hans Bernd Gisevius, To the Bitter End (London, 1948)。

[74.](#_74_4) ‘Bericht des Obersten Parteigerichts an den Ministerpräsidenten Generalfeldmarschall Goring, 13. 2. 1939’, document ND 3063-PS in Der Prozess gegen die Hauptkriegsverbrecber vor dem Internationalen Militärgerichtshof, Nürnberg (Nuremberg, 1949), XXIII. 20-29, at 26.

[75.](#_75_4) Paul, Aufstand, 111-13.

[76.](#_76_4) Allen, The Nazi Seizure of Power, 156-61.

[77.](#_77_4) 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I/II. 387 (5 March 1933).

[78.](#_78_5) Allen, The Nazi Seizure of Power, 160是地方選情的一個典型例子。

[79.](#_79_4) Falter et al., Wahlen, 41, 44; Falter, Hitlers Wähler, 38-9.

[80.](#_80_4) 出處同上，第40頁；關于天主教會，參見Oded Heilbronner, Catholicism, Political Culture and the Countryside: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Nazi Party in South Germany (Ann Arbor, 1998), 239。

[81.](#_81_4) Bessel, Political Violence, 101-2.

[82.](#_82_4) Ulrich Klein, ‘SA-Terror und Bevölkerung in Wuppertal 1933/34’, in Detlev Peukert and Jürgen Reulecke (eds.), Die Reihen fast geschlossen: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s Alltags unterm Nationalsozialismus (Wuppertal, 1981), 45-64, at 51.

[83.](#_83_4) Winkler, Der Weg, 890-91; World Committee (ed.), The Brown Book, 204-5; Schneider, Unterm Hakenkreuz, 56-73.

[84.](#_84_4) Dieter Rebentisch and Angelika Raab (eds.), Neu-Isenburg zwischen Anpassung und Widerstand; Dokumente über Lebensbedingungen und politisches Verhalten 1933-1934 (Neu-Isenburg, 1978), 79.

[85.](#_85_5) Gerlinde Grahn, ‘Die Enteignung des Vermögens der Arbeiterbewegung und der politischen Emigration 1933 bis 1945’, 1999: Zeitschrift fiir Sozialgeschichte des 20. und 21. Jahrhunderts, 12 (1997), 13-38; Broszat, Der Staat Hitlers, 118.

[86.](#_86_4) Klein, ‘SA-Terror’, 51-3.

[87.](#_87_4) Broszat, Der Staat Hitlers, 256.

[88.](#_88_4) 出處同上，第136-8頁。

[89.](#_89_4) Winkler, Der Weg, 888-93, 898-900.

[90.](#_90_4) 出處同上，第916-18頁。

[91.](#_91_5) 出處同上，第929-32頁；Broszat, Der Staat Hitlers, 118-19。

[92.](#_92_5) Harold Marcuse, Legacies of Dachau: The Uses and Abuses of a Concentration Camp, 1933-2001 (Cambridge, 2001), 21-3; Hans-Günter Richardi, Schule der Gewalt: Das Konzentrationslager Dachau, 1933-1934 (Munich, 1983), 48-87，以及Johannes Tuchel, Organisationsgeschichte und Funktion der ‘Inspektion der Konzentrationslager’ 1933-1938 (Boppard, 1991), 121-58.

[93.](#_93_5) Bley, Namibia under German Rule, 151, 198; Krüger, Kriegsbewältigung, 138-44; Joachim Zeller, ‘“Wie Vieh wurden Hunderte zu Getriebenen und wie Vieh begraben”: Fotodokumente aus dem deutschen Konzentrationslager in Swakopmund/Namibia 1904-1908’, 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49 (2001), 226-43.

[94.](#_94_5) Marcuse, Legacies of Dachau, 21-2；Tuchel, Organisationsgeschichte, 35-7；Andrej Kaminski, Konzentrationslager 1896 bis heute: Eine Analyse (Stuttgart, 1982), 34-38。關于希特勒或者希姆萊借鑒了蘇俄的勞改營形式，并無令人信服的證據（參見Evans, In Hitler's Shadow, 24-46）。

[95.](#_95_5) 關于集中營屬于即興方案的觀點，參見Broszat, ‘The Concentration Camps’, 400-6。

[96.](#_96_5) Bessel, Political Violence, 117.

[97.](#_97_5) Friedrich Schlotterbeck, The Darker the Night, the Brighter the Stars: A German Worker Remembers (1933-1945) (London, 1947), 22-36。關于納粹暴力的更多資料，參見Lindenberger and Lüdtke (eds.) Physische Gewalt，以及Bernd Weisbrod, ‘Gewalt in der Politik: Zur politischen Kultur in Deutschland zwischen den beiden Weltkriegen’, Geschichte in Wissenschaft und Unterricht, 43 (1992), 391-404。

[98.](#_98_5) 大量案例詳見德國法西斯運動受害者世界委員會編輯的The Brown Book, 216-18；揚科夫斯基的案例在第210-11頁。另見Diels, Lucifer, 222。

[99.](#_99_5) Günter Morsch, ‘Oranienburg – Sachsenhausen, Sachsenhausen – Oranienburg’, in Ulrich Herbert (eds.),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Konzentrationslager: Entwicklung und Struktur (2 vols., Göttingen, 1998), 111-34, at 119.

[100.](#_100_5) Tuchel, Organisationsgeschichte, 103; Karin Orth, Das System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Konzentrationslager (Hamburg, 1999), 23-6.

[101.](#_101_5) Bahne, ‘Die Kommunis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in Matthias and Morsey (eds.), Das Ende, 693-4, 699-700; Winkler, Der Weg, 876-89; Broszat, ‘The Concentration Camps’, 406-7; Broszat et al. (eds.), Bayern, I. 24-41.

[102.](#_102_5) Fieberg (ed.) Im Name, 68；德國法西斯運動受害者世界委員會編輯的The Brown Book，332列出了截至6月的500例殺戮案。

[103.](#_103_5) Domarus, Hitler, I. 263；Mason, Social Policy，76認為希特勒真的擔心出現混亂局面；他還寫道，納粹領導層一直知曉暴力事件的性質和發生范圍。

[104.](#_104_4) Broszat, Der Staat Hitlers, III.

[105.](#_105_4) Rudolf Morsey (ed.), Das ‘Ermächtigungsgesetz’ vom 24. März 1933: Quellen zur Geschichte und Interpretation des ‘Gesetzes zur Bebebung der Not von Volk und Reich’ (Düsseldorf, 1992)，以及Michael Frehse, Ermächtigungsgesetzgebung im Deutschen Reich 1914-1933 (Pfaffenweiler, 1985), 145。

[106.](#_106_4) Matthias and Morsey (eds.), Das Ende, xiii.

[107.](#_107_4) Klaus-Jürgen Müller, ‘Der Tag von Potsdam und das Verhältnis der preussischdeutschen Militär-Elite zum Nationalsozialismus’, in Bernhard Kröner (ed.), Potsdam – Stadt, Armee, Residenz in der preussisch-deutschen Militärgeschichte (Frankfurt am Main, 1993), 435-49; Fro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II. 395-7 (22 March 1933); Werner Freitag, ‘Nationale Mythen und kirchliches Heil: Der “Tag von Potsdam”’, Westfällische Forschungen, 41 (1991), 379-430。希特勒的演講見Domarus, Hitler, I. 272-4。

[108.](#_108_4) 出處同上，第270頁。

[109.](#_109_5) Bracher, Stufen, 213-36; Hans Schneider, ‘Das Ermächtigungsgesetz vom 24. März 1933’, VfZ I (1953), 197-221, esp. 207-8.

[110.](#_110_5) Junker, Die Deutsche Zentrumspartei, 171-89; Morsey, ‘Die Deutsche Zentrumspartei’, in Matthias and Morsey (eds.), Das Ende, 281-453; Josef Becker, ‘Zentrum und Ermächtigungsgesetz 1933: Dokumentation’ VfZ 9 (1961), 195-210; Rudolf Morsey, ‘Hitlers Verhandlungen mit der Zentrumsführung am 31. Januar 1933’, VfZ 9 (1961), 182-94.

[111.](#_111_5) Wilhelm Hoegner, Der schwierige Aussenseiter: Erinnerungen eines Abgeordneten, Emigranten und Ministerpräsidenten (Munich, 1959), 92.

[112.](#_112_5) Becker, ‘Zentrum und Ermächtigungsgesetz 1933’; Konrad Repgen, ‘Zur vatikanischen Strategie beim Reichskonkordat’, VfZ 31 (1983), 506-35; Brüning, Memoiren, 655-57; Domarus, Hitler, I. 275-85.

[113.](#_113_5) Winkler, Der Weg, 901-6; Hans J. L. Adolph, Otto Wels und die Politik der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ie 1934-1939: Einepolitische Biographie (Berlin, 1971), 262-4; Willy Brandt, Erinnerungen (Frankfurt am Main, 1989), 96; Hoegner, Der Schwierige Aussenseiter, 93.

[114.](#_114_4) Broszat, Der Staat Hitlers, 117 and n。把《授權法》置于魏瑪共和國之授權法立法程序的語境中進行論述，參見Jörg Biesemann, Das Ermächtigungsgesetz als Grundlage der Gesetzgebung im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Deutschland: Ein Beitrag zur Stellung des Gesetzes in der Verfassungsgeschichte 1919- 1945 (Münster, 1992. [1985])。

[115.](#_115_4) Matthias, ‘Die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in Matthias and Morsey (eds.) Das Ende, 176-80；Winkler, Der Weg, 867-98; Schumann,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Gewerkschaftsbewegung; Hannes Heer, Burgfrieden oder Klassenkampf: Zur Politik der sozialdemokratischen Gewerkschaften 1930-1933 (Neuwied, 1971)，對工會領導層頗多批評；Bernd Martin, ‘Die deutschen Gewerkschaften und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Machtübernahme’, Geschichte in Wissenschaft und Unterricht, 36 (1985), 605-31; Henryk Skzrypczak, ‘Das Ende der Gewerkschaften’, in Wolfgang Michalka (ed.)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Machtergreifung (Paderborn, 1984), 97-110。

[116.](#_116_4) 國家社會主義工廠車間組織的德文是Nationalsozialistische Betriebszellenorganisation。

[117.](#_117_5) Winkler, Der Weg, 898-909; Gunther Mai,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Betriebszellen-Organisation: Zum Verhältnis von Arbeiterschaft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VfZ 31 (1983), 573-613.

[118.](#_118_5) Schneider, Unterm Hakenkreuz, 76-106，引語出自第89頁；Winkler, Der Weg, 898-909; Herbst, Das 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land, 68-70。

[119.](#_119_5) Wieland Elfferding, ‘Von der proletarischen Masse zum Kriegsvolk: Massenaufmarsch und Öffentlichkeit im deutschen Faschismus am Beispiel des I. Mai 1933’, in Neue Gesellschaft für bildende Kunst (ed.), Inszenierung der Macht: Ästhetische Faszination im Faschismus (Berlin, 1987), 17-50.

[120.](#_120_5) Peter Jahn (ed.), Die Gewerkschaften in der Endphase der Republik 1930-1933 (Cologne, 1988), 888-92, 897-8, 916.

[121.](#_121_5) Dieter Fricke, Kleine Geschichte des Ersten Mai: Die Maifeier in der deutschen und internationalen Arbeiterbewegung (Berlin, 1980), 224-9; Fritzsche, Germans, 215-35.

[122.](#_122_5) Goebbels, Vom Kaiserhof, 299，以及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I/II., 408（1933年4月17日）。

[123.](#_123_5) Winkler, Der Weg, 909-29; Michael Schneider, A Brief History of the German Trade Unions (Bonn, 1991 [1989]), 204-10.

[124.](#_124_5) 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I/II. 416 (3 May 1933).

[125.](#_125_5) Winkler, Der Weg, 929-32; Grahn, ‘Die Enteignung’; Beate Dapper and Hans-Peter Rouette, ‘Zum Ermittelungsverfahren gegen Leipart und Genossen wegen Untreue vom 9. Mai 1933’, Internationale Wissenschaftliche Korrespondenz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Arbeiterbewegung, 20 (1984), 509-35; Schneider, Unterm Hakenkreuz, 107-17.

[126.](#_126_5) Winkler, Der Weg, 931-40; Matthias, ‘Die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in Matthias and Morsey (ed.), Die Ende, 168-75, 166-75；關于普菲爾夫的自殺，見第254頁 n. 6；Broszat, Der Staat Hitlers, 120。

[127.](#_127_5) Fröhlich (ed.) Die Tagehücher I/II. 437（1933年6月23日）。

[128.](#_128_5) Schüler, Auf der Flucht erschossen, 241-8.

[129.](#_129_4) 詳見Max Klinger（Curt Geyer的筆名）, Volk in Ketten (Karlsbad, 1934)，尤其是第96-7頁；Winkler, Der Weg, 943-7；Franz Osterroth and Dieter Schuster, Chronik der deutscben Sozialdemokratie (Hanover, 1963), 381頁；文件參見Erich Matthias, ‘Der Untergang der Sozialdemokratie 1933’, VfZ 4 (1956), 179-116，評論在第250-86頁；關于柏林市及其郊區的情況，參見Reinhard Rürup (ed.) Topographie des Terrors: Gestapo, SS und Reichssicherheitshauptamt auf dem ‘PrinzAlbert-Gelände’: Eine Dokumentation (Berlin, 1987)，以及Hans-Norbert Burkert et al., ‘Machtergreifung’ Berlin 1933: Stätten der Geschichte Berlins in Zusammenarbeit mit dem Pädagogischen Zentrum Berlin (Berlin, 1982), 20-94。

[130.](#_130_4) Bessel, Political Violence, 41, 117-118; Paul Lobe, Der Weg war lang: Lebenserinnerungen von Paul Löbe (Berlin, 1954 [1950]), 221-9.

[131.](#_131_4) Beth A. Griech-Polelle, Bishop von Galen: German Catholicism and National Socialism (New Haven, 2002), 9-18.

[132.](#_132_4) 出處同上，第31-2頁；Richard Steigmann-Gall, The Holy Reich: Nazi Conceptions of Christianity, 1919-1945 (New York, 2003), 51-85。

[133.](#_133_4) Hans Müller (ed.), Katholische Kirche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Dokumente 1930-1935 (Munich, 1963), 79.

[134.](#_134_4) Thomas Fandel, ‘Konfessionalismus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in Olaf Blaschke (ed.), Konfessionen im Konflikt: Deutschland zwischen 1800 und 1970: Ein zweites konfessionelles Zeitalter (Göttingen, 2002), 199-334, at 314-15; Günther Lewy, The Catholic Church and Nazi Germany (New York, 1964), 94-112.

[135.](#_135_4) Müller, Katholische Kirche, 168；更全面的論述，參見Scholder, The Churches。

[136.](#_136_4) Morsey, ‘Die Deutsche Zentrumspartei’, in Matthias and Morsey (eds.), Das Ende, 383-6，引自Kölnische Volkszeitung on 12 May 1933。

[137.](#_137_4) Broszat, ‘The Concentration Camps’, 409-11.

[138.](#_138_4) Lewy, The Catholic Church, 45-79.

[139.](#_139_4) Morsey, ‘Die Deutsche Zentrumspartei’, in Matthias and Morsey (eds.), Das Ende, 387-411; Lewy, The Catholic Church, 7-93.

[140.](#_140_4) Griech-Polelle, Bishop von Galen, 45-6, 137-9.

[141.](#_141_4) Morsey, ‘Die Deutsche Staatspartei’, in Matthias and Morsey (eds.) Das Ende, 55-72；Jones, German Liberalism, 462-75（還有關于人民黨的情況）。

[142.](#_142_4) Hans Booms, ‘Die Deutsche Volkspartei’, in Matthias and Morsey (eds.), Das Ende, 521-39.

[143.](#_143_4) Hiller von Gaertringen, ‘Die Deutschnationale Volkspartei’, in Matthias and Morsey (eds.) Das Ende, 576-99; Larry Eugene Jones, ‘“The Greatest Stupidity of My Life”: Alfred Hugenberg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Hitler Cabinet’,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27 (1992), 63-87；胡根貝格的辭呈以及其他文件，參見Anton Ritthaler, ‘Eine Etappe auf Hitlers Weg zur ungeteilten Macht: Hugenbergs Riicktritt als Reichsminister’, VfZ 8 (1960), 193-219。

[144.](#_144_4) Hiller von Gaertringen, ‘Die Deutschnationale Volkspartei’, in Matthias and Morsey (eds.), Das Ende, 599-603.

[145.](#_145_4) 出處同上，第607-15頁。

[146.](#_146_4) Berghahn, Der Stahlhelm, 253-70; Broszat, Der Staat Hitlers, 121.

[147.](#_147_4) Hiller von Gaertringen, ‘Die Deutschnationale Volkspartei’, in Matthias and Morsey (eds.), Das Ende, 603-7; Bessel, Political Violence, 120-21; Berghahn, Der Stahlhelm, 268-74, 286.

[148.](#_148_4) 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I/II. 440 (28 June 1933).

[149.](#_149_5) Hans-Georg Stümke, Homosexuelle in Deutschland: Eine politische Geschichte (Munich, 1989).

[150.](#_150_4) 目擊者的敘述，收錄于Hans-Georg Stümke and Rudi Finkler, Rosa Winkel, Rosa Listen: Homosexuelle und ‘Gesundes Volksempfinden’ von Auschwitz bis heute (Hamburg, 1981), 163-66，被譯成英文并引用于Burleigh and Wippermann, The Racial State第189-90頁，另見Burkhard Jellonek, Homosexuelle unter dem Hakenkreuz: Verfolgung von Homosexuellen im Dritten Reich (Paderborn, 1990)。個人證言，收錄于Richard Plant, The Pink Triangle: The Nazi War against Homosexuals (Edinburgh, 1987)。

[151.](#_151_5) Wolff, Magnus Hirschfeld, 414.

[152.](#_152_4) Grossmann, Reforming Sex, 149-50; Gaby Zürn, ‘“Von der Herbertstrasse nach Auschwitz”’, in Angelika Ebbinghaus (ed.), Opfer und Täterinnen: Frauenbiographien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Nördlingen, 1987), 91-101, at 93; Annette F. Timm, ‘The Ambivalent Outsider: Prostitution, Promiscuity, and VD Control in Nazi Berlin’, in Gellately and Stoltzfus (eds.), Social Outsiders, 192-211; Christl Wickert, Helene Stöcker 1869-1943: Frauenrechtlerin, Sexualreformerin und Pazifistin. Eine Biographie (Bonn, 1991), 135-40；綜述參見Gabriele Czarnowski, Das kontrollierte Paar: Ehe- und Sexualpolitik im Nationalsozialismus (Weinheim, 1991)。

[153.](#_153_4) Grossmann, Reforming Sex, 136-61.

[154.](#_154_4) Hong, Welfare, 261-5；Burleigh, Death and Deliverance, 11-42；Jochen-Christoph Kaiser et al. (eds.) Eugenik, Sterilisation, ‘Euthanasie’: Politische Biologie in Deutschland 1893-1945 (Berlin, 1992), 100-102；同一作者的Sozialer Protestantismus im 20. Jahrbundert: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 Inneren Mission 1914-1945 (Munich, 1989)。

[155.](#_155_4) Ayass, ‘Asoziale’ im Nationalsozialismus, 57-60.

[156.](#_156_5) Elizabeth Harvey, Youth Welfare and the State in Weimar Germany (Oxford, 1993), 274-8; Ayass, ‘Asoziale’ in Nazionalsozialismus, 13-23，同一作者的‘Vagrants and Beggars’, 211-17；另見Marcus Gräser, Der blockierte Wohlfahrtsstaat: Unterschichtjugend und Jugendfürsorge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Göttingen, 1995), 216-30。

[157.](#_157_4) Wagner, Volksgemeinschaft, 193-213.

[158.](#_158_4) Patrick Wagner, Hitlers Kriminalisten: Die deutsche Kriminalpolixei und der Nationalsozialismus (Munich, 2002), 57-8.

[159.](#_159_4) Nikolaus Wachsmann, ‘From Indefinite Confinement to Extermination: “Habitual Criminals” in the Third Reich’, in Gellately and Stoltzfus (eds.) Social Outsider, 165-91；Wachsmann, Hitler's Prisons第2章。

[160.](#_160_4) Robert N. Proctor, Racial Hygiene: Medicine under the Nazis (Cambridge, Mass., 1988), 101.

[161.](#_161_4) Crew, Germans on Welfare, 208-12.

[162.](#_162_4) Broszat, ‘The Concentration Camps’, 409-11.

[163.](#_163_4) Caplan, Government, 139-41.

[164.](#_164_4) Noakes and Pridham (eds.), Nazism, II. 26-31.

[165.](#_165_4) 引用于Hans Mommsen, Beamtentum im Dritten Reich: Mit ausgewählten Quellen zu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Beamtenpolitik (Stuttgart, 1966), 162。

[166.](#_166_3) Broszat, Der Staat Hitlers, 254；Jürgen W. Falter, ‘“Die Märzgefallenen” von 1933: Neue Forschungsergebnisse zum sozialen Wandel innerhalb der NSDAPMITGLIEDSCHAFT während der Machtergreifungsphase’,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24 (1998), 595-616, at 616.

[167.](#_167_3) Caplan, Government, 143-7; Bracher, Stufen, 244.

[168.](#_168_3) Bracher, Stufen, 245-6; Fieberg (ed.), Im Namen, 87-94; Lothar Gruchmann, ‘Die Überleitung der Justizverwaltung auf das Reich 1933-1935’, in Vom Reichsjustizamt zum Bundesministerium der Justiz; Festschrift zum hundertjährigen Gründungstag des Reichsjustizamts (Cologne, 1977) and Horst Göppinger, Juristen jüdischer Abstammung im ‘Dritten Reich’: Entrechtung und Verfolgung (Munich, 1990 [1963]), 183-373.

[169.](#_169_3) Fieberg (ed.), Im Namen, 76-9, 272; Lothar Gruchmann, ‘Die Überteitung’, in Vom Reichsjustizamt zum Bundesministerium der Justiz, 119-60.

[170.](#_170_3) Bracher, Stufen, 264-7; Hayes, Industry and Ideology, 85-9.

[171.](#_171_3) Evans, The Feminist Movement, 255-60.

[172.](#_172_3) Allen, The Nazi Seizure of Power, 218-32.

[173.](#_173_2) Haffner, Defying Hitler, 111, 114.

## 第六章　希特勒的文化革命

[1.](#_1_6) Josef Wulf, Musik im Dritten Reich: Eine Dokumentation (Gütersloh, 1963), 31; Fritz Busch, Aus dem Leben eines Musikers (Zurich, 1949), 188-209; Levi, Music, 42-3; World Committee (ed.), The Brown Book, 180.

[2.](#_2_6) Michael H. Kater, The Twisted Muse: Musicians and their Music in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 1997), 120-24更正了布施回憶錄中的敘述。關于納粹黨在薩克森州的奪權，參見Szejnmann, Nazism, 33-4。

[3.](#_3_6) Gerhard Splitt, Richard Strauss 1933-1935: Aesthetik und Musikpolitik zu Beginn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Herrschaft (Pfaffenweiler, 1987), 42-59; Bruno Walter, Theme and Variations: An Autobiography (New York, 1966), 295-300; Brigitte Hamann, Winifred Wagner oder Hitlers Bayreuth (Munich, 2002), 117-56.

[4.](#_4_6) Peter Heyworth, Otto Klemperer: His Life and Times, I: 1885-1933 (Cambridge, 1983), 413, 415.

[5.](#_5_7) Levi, Music, 44-5；Christopher Hailey, Franz Schreker, 1878-1934: A Cultural Biography (Cambridge, 1993), 273, 288；由于不斷受到反猶騷擾，施雷克已于1932年辭去柏林音樂學院總監的職務。

[6.](#_6_6) Wulf, Musik，28轉載的漢堡愛樂協會1933年4月6日致德意志文化斗爭同盟柏林分部（Kampfbund für deutsche Kultur, Gruppe Berlin）的信。

[7.](#_7_6) Levi, Music, 39-41, 86, 107；參見綜述Reinhold Brinkmann and Christoph Wolff (eds.) Driven into Paradise: The Musical Migration from Germany to the United States (Berkeley, 1999)。

[8.](#_8_6) Kater, The Twisted Muse, 89-91, 120；另見Michael Meyer, The Politics of Music in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 1991), 19-26。

[9.](#_9_6) David Welch, The Third Reich: Politics and Propaganda (2nd edn., London, 2002 [1993]), 172-82, at 173-4.

[10.](#_10_6) Minuth (ed.) Die Regierung Hitler, I. 193-5。見Wolfram Werner, ‘Zur Geschichte des Reichsministeriums für Volksaufklärung und Propaganda und zur Überlieferung’，收錄于同作者編輯的Findbücher zu Beständen des Bundesarchivs, XV: Reichsministerium für Volksaufklärung und Propaganda (Koblenz, 1979)。

[11.](#_11_6) 關于戈培爾被普遍視為“社會主義者”，可參閱Jochmann (ed.)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Revolution, 407-8。

[12.](#_12_6) 1933年3月15日演講，引用于Welch, The Third Reich, 174-5；1932年關于設立宣傳部的討論，參見Fro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I/II. 113-14, 393（1933年3月15日）。

[13.](#_13_6) Frohlich, ‘Joseph Goebbels’, in Smelser and Zitelmann (eds.), The Nazi Elite, 55.

[14.](#_14_6) Völkischer Beobachter，1933年3月23日，譯成英文并引用于Welch, The Third Reich, 22-3。

[15.](#_15_6) 引用于Reuth, Goebbels, 269。

[16.](#_16_7) 引用于Welch, The Third Reich, 175。

[17.](#_17_7) 引用于同上，第176頁。

[18.](#_18_6) Reuth, Goebbels, 271; Fro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I/II. 388（1933年3月6日），393（1933年3月13日），395-7（1933年3月22日）；Ansgar Diller, Rundfunkpolitik im Dritten Reich (Munich, 1980), 89; Zbynek A.B. Zeman, Nazi Propaganda (2nd edn., Oxford, 1973 [1964]), 40。關于宣傳部的組織結構，參見Welch, The Third Reich, 29-31。

[19.](#_19_6) West, The Visual Arts, 183-4，引語也出自此處。

[20.](#_20_6) Levi, Music, 246 n.5.

[21.](#_21_6) Fred K. Prieberg, Trial of Strength: Wilhelm Furtwängler and the Third Reich (London, 1991), 166-9引用了已出版和未出版的通信和備忘錄。關于富特文格勒對各種問題的看法，參見Michael Tanner (ed.) Wilhelm Furtwängler, Notebooks 1924-1945 (London, 1989)。

[22.](#_22_6) 關于富特文格勒的人生與觀點，參見Prieberg, Trial of Strength全書各處；對此書的保留意見，參見Evans, Rereading, 187-93。

[23.](#_23_6) 這番交流轉載于Wulf, Musik, 81-2。馬克斯·賴因哈特（Max Reinhardt）是著名的戲劇導演。

[24.](#_24_6) Levi, Music, 199-201.

[25.](#_25_7) Berliner Lokal-Anzeiger，1933年4月11日，轉載于Wulf, Musik, 82-3。

[26.](#_26_6) Levi, Music, 198-202; Peter Cossé, ‘Die Geschichte’, in Paul Badde et al. (eds.), Das Berliner Philharmonische Orchester (Stuttgart, 1987), 10-17.

[27.](#_27_6) Kater, Different Drummers, 29-33.

[28.](#_28_7) 出處同上，第47-110頁。

[29.](#_29_6) Jelavich, Berlin Cabaret, 228-258；《赫爾曼》在第229頁。

[30.](#_30_6) Volker Kühn (ed.), Deutschlands Erwachen: Kabarett unterm Hakenkreuz 1933-1945 (Weinheim, 1989), 335；綜述參見Christian Goeschel, ‘Methodische Überlegungen zur Geschichte der Selbsttötung im Nationalsozialismus’, in Hans Medick (ed.) Selbsttötung als kulturelle Praxis (Berlin, 2004)。

[31.](#_31_6) Josef Wulf, Theater und Film im Dritten Reich: Eine Dokumentation (Gütersloh, 1964), 265-306.

[32.](#_32_6) David Thomson, The New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Film (4th edn., 2002 [1975])。瑪琳·黛德麗的一些傳記以及她的自傳稱，她出于政治原因而離開德國，并且希特勒曾親自介入勸她回國。對于這種說法，大可存疑。

[33.](#_33_6) David Welch, ‘Propaganda and the German Cinema 1933-1945’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London University, 1979), appendix I.

[34.](#_34_6) Birgit Bernard, ‘“Gleichschaltung” im Westdeutschen Rundfunk 1933/34’, in Dieter Breuer and Gertrude Cepl-Kaufmann (eds.), Moderne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im Rheinland (Paderborn, 1997), 301-10; Jochen Klepper, Unter dem Schatten deiner Fliigel: Aus den Tagebüchern der Jahre 1932-1942 (Stuttgart, 1956), 46, 65; Josef Wulf, Presse und Funk im Dritten Reich: Eine Dokumentation (Gütersloh, 1964), 277-9, 280-84.

[35.](#_35_6) Fulda, ‘Press and Politics’, 231-3, 241-2.

[36.](#_36_6) Welch, The Third Reich, 46頁；法律文本參見Wulf, Presse und Funk, 72-3頁。

[37.](#_37_6) 出處同上，第19-38頁。

[38.](#_38_6) Welch, The Third Reich, 43-8.

[39.](#_39_6) Grossmann, Ossietzky, 224-74.

[40.](#_40_6) 出處同上，第267頁；Chris Hirte, Erich Mühsam: ‘Ihr seht mich nicht feige’. Biografie (Berlin, 1985), 431-50。關于他死于謀殺還是自殺，說法不一；前者的可能性似乎更大。

[41.](#_41_6) Dieter Distl, Ernst Toller: Eine politische Biographie (Schrobenhausen, 1993), 146-78.

[42.](#_42_6) Kelly, All Quiet, 39-56.

[43.](#_43_6) Inge Jens (ed.) Thomas Mann an Ernst Bertram: Briefe aus den Jahren 1910-1955 (Pfullingen, 1960), 178（1933年11月18日信件）以及Robert Faesi (ed.) Thomas Mann-Robert Faesi: Briefwechsel (Zurich, 1962), 23（托馬斯·曼1933年6月28日致Faesi的信）；Klaus Harpprecht, Thomas Mann: Eine Biographie (Reinbek, 1995), 707-50；Kurt Sontheimer, ‘Thomas Mann als politischer Schriftsteller’, VfZ 6 (1958), 1-44；Josef Wulf, Literatur und Dichtung im Dritten Reich : Eine Dokumentation (Gütersloh, 1963), 24。

[44.](#_44_6) Ritchie, German Literature, 187-99；Wulf, Literatur，見全書各處。

[45.](#_45_6) Robert E. Norton, Secret Germany: Stefan George and His Circle (Ithaca, NY, 2002) 目前是關于斯特凡·格奧爾格的權威傳記。恩斯特·容格爾傳記，參見Paul Noack, Ernst Junger: Eine Biographie (Berlin, 1998), 121-51。

[46.](#_46_6) 引用于Wulf, Literatur, 132；另見Ritchie, German Literature, 9-10, 48-9, 111-32。

[47.](#_47_6) Frederic Spotts, Hitler and the Power of Aesthetics (London, 2002), 152；引語及其上下文，參見West, The Visual Arts, 183-4；Hitler, Mein Kampf, 235。

[48.](#_48_6) Rosamunde Neugebauer, ‘“Christus mit der Gasmaske” von George Grosz, oder: Wieviel Satire konnten Kirche und Staat in Deutschland um 1930 ertragen?’, in Maria Rüger (ed.), Kunst und Kunstkritik der dreissiger Jahre : Standpunkte zu künstlerischen und ästhetischen Prozessen und Kontroversen (Dresden, 1990), 156-65.

[49.](#_49_6) Josef Wulf, Die Bildenden Künste im Dritten Reich: Eine Dokumentation (Gütersloh, 1963), 49-51.

[50.](#_50_6) Peter Adam, Arts of the Third Reich (London, 1992), 59.

[51.](#_51_6) Jonathan Petropoulos, The Faustian Bargain: The Art World in Nazi Germany (London, 2000), 217頁。另見Brandon Taylor and Wilfried van der Will (eds.) The Nazification of Art: Art, Design, Music, Architecture and Film in the Third Reich (Winchester, 1990)。

[52.](#_52_6) Spotts, Hitler, 153-5.

[53.](#_53_6) Petropoulos, The Faustian Bargain, 14-16.

[54.](#_54_6) Adam, Arts, 49-50; Wulf, Die Bildenden Künste, 36; Günter Busch, Max Liebermann: Maler, Zeichner, Graphiker (Frankfurt am Main, 1986), 146; Peter Paret, An Artist against the Third Reich: Ernst Barlach 1933-1938 (Cambridge, 2003), 77-92。利伯曼的葬禮是在政治警察的嚴密監視下舉行的（Petropoulos, The Faustian Bargain, 217）。

[55.](#_55_6) Sean Rainbird (ed.), Max Beckmann (London, 2003), 157-64, 273-4; Adam, Arts, 53; Petropoulos, The Faustian Bargain, 216-21.

[56.](#_56_6) Wulf, Die Bildenden Künste, 39-45; Koehler, ‘The Bauhaus’, 292-3; Igor Golomstock, Totalitarian Art in the Soviet Union, Third Reich, Fascist Italy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ondon, 1990), 21; West, The Visual Arts, 83-133.

[57.](#_57_6) Ritchie, German Literature, 187.

[58.](#_58_6) 出處同上，第189頁；Harpprecht, Thomas Mann, 722-50。

[59.](#_59_6) Ritchie, German Literature，第58-61頁；Lothar Gall, Bürgertum in Deutschland (Berlin, 1989)第466頁是關于巴塞曼及其家庭的綜述。約斯特很快被任命為劇院的聯合導演。參見Boguslaw Drewniak, Das Theater im NSStaat: Szenarium deutscher Zeitgeschichte 1933-1945 (Düsseldorf, 1983), 46-7；綜論參見Glen W. Gadberry (ed.) Theatre in the Third Reich, the Prewar Years: Essays on Theatre in Nazi Germany (Westport, Conn., 1995)以及John London (ed.) Theatre under the Nazis (Manchester, 2000)。

[60.](#_60_6) Ritchie, German Literature, 58-61; ‘Wenn ich Kultur höre, entsichere ich meinen Browning’ (Wulf, Literatur, 113).

[61.](#_61_6) Knowles (ed.)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Quotations, 418，引語在第17頁；德國法西斯運動受害者世界委員會編輯的The Brown Book, 160-93首次詳細記錄了“毀滅文化的戰爭”。

[62.](#_62_6) Hugo Ott, Martin Heidegger: A Political Life (London, 1993), 13-139.

[63.](#_63_6) 出處同上，第140-48頁。

[64.](#_64_6) Martin Heidegger, Die Selbstbehauptung der deutschen Universität: Rede, gehalten bei der feierlichen Übernahme des Rektorats der Universität Freiburg i. Br. am 27.5.1933 (Breslau, 1934), 5, 7,14-15. 22.

[65.](#_65_6) Hans Sluga, Heidegger's Crisis: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in Nazi Germany (Cambridge, Mass., 1993), 1-4; Guido Schneeberger, Nachlese zu Heidegger: Dokumente zu seinem Leben und Denken (Berne, 1962), 49-57。另見傳記Rüdíger Safranski, Ein Meister aus Deutschland: Heidegger und seine Zeit (Munich, 1994)。

[66.](#_66_6) Ott, Martin Heidegger, 169, 198-9.

[67.](#_67_6) 出處同上，第185頁。

[68.](#_68_6) 所有學科中僅有一位教授參加了胡塞爾的葬禮，即歷史學家格哈德·里特爾（Gerhard Ritter）。參見Cornelissen, Gerhard Ritter, 239。

[69.](#_69_6) Ott, Martin Heidegger，引語在第164頁；作者在第165-6頁討論了海德格爾的現代崇拜者們極力為其觀點開脫的詭辯之辭。Bernd Martin (ed.) Martin Heidegger und das ‘Dritte Reich’ Ein Kompendium (Darmstadt, 1989)是一部有參考價值的研究論文集。

[70.](#_70_6) Remy, The Heidelberg Myth, 14.

[71.](#_71_6) Ott, Martin Heidegger, 235-351.

[72.](#_72_6) Noakes and Pridham (eds.) Nazism II. 249-250；兩部關于當地大學情況的研究佳作，見Uwe Dietrich Adam, Hochschule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Die Universität Tühingen im Dritten Reich (Tübingen, 1977)，以及Notker Hammerstein, Die Johann Wolfgang Goethe-Universität: Von der Stiftungsuniversität zur staatlichen Hochschule (2 vols., Neuwied, 1989) I. 171-211。

[73.](#_73_6) Klaus Fischer, ‘Der quantitative Beitrag der nach 1933 emigrierten Naturwissenschaftler zur deutschsprachigen physikalischen Forschung’, Berichte zur Wissenschaftsgeschichte, 11 (1988), 83-104稍微修改了以下作品中較高的數字：Alan D. Beyerchen, Scientists under Hitler: Politics and the Physics Community in the Third Reich (New Haven, 1977), 43-7，以及Norbert Schnappacher, ‘Das Mathematische Institut der Universität Göttingen’，和Alf Rosenow, ‘Die Göttinger Physik unter dem Nationalsozialismus’, 兩文均收錄于Heinrich Becker et al. (eds.) Die Universität Göttingen unter dem Nationalsozialismus: Das verdrängte Kapitel ihrer 250 jährigen Geschichte (Munich, 1987), 345-73, 374-409。

[74.](#_74_5) Ute Deichmann, Biologists under Hitler (Cambridge, Mass., 1996 [1992.]), 26.

[75.](#_75_5) Beyerchen, Scientists, 43.

[76.](#_76_5) Max Born (ed.), The Born-Einstein Letters: Correspondence between Albert Einstein and Max and Hedwig Born from 1916 to 1955 (London, 1971), 113-14.

[77.](#_77_5) Fritz Stern, Dreams and Delusions: The Drama of German History (New York, 1987), 51-76 (‘Fritz Haber: The Scientist in Power and in Exile’); Margit Szöllösi-Janze, Fritz Haber 1868-1934: Eine Biographie (Munich, 1998), 643-91.

[78.](#_78_6) Max Planck, ‘Mein Besuch bei Hitler’, Physikalische Blätter, 3 (1947), 143; Fritz Stern, Einstein's German World (London, 2000 [1999]), 34-58.

[79.](#_79_5) Remy, The Heidelberg Myth, 17-18。綜述參見Fritz Köhler, ‘Zur Vertreibung humanistischer Gelehrter 1933/34’, Blätter für deutsche und internationale Politik, II (1966), 696-707。

[80.](#_80_5) Beyerchen, Scientists, 15-17, 63-4, 199-210.

[81.](#_81_5) Remy, The Heidelberg Myth, 24-9；另見Christian Jansen, Professoren und Politik: Politisches Denken und Handeln der Heidelberger Hochschullehrer 1914-1935 (Göttingen, 1992)。

[82.](#_82_5) 引用于Noakes and Pridham (eds.) Nazism, II. 252。

[83.](#_83_5) 出處同上，II. 第250頁；Turner, German Big Business, 337。

[84.](#_84_5) Remy, The Heidelberg Myth, 20.

[85.](#_85_6) 出處同上，第31頁。

[86.](#_86_5) Grüttner, Studenten, 71-4.

[87.](#_87_5) 出處同上，第81-6頁。

[88.](#_88_5) Axel Friedrichs (ed.),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Revolution 1933 (Dokumente der deutschen Politik, I, Berlin, 1933), 277; 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I/II. 419 (11 May 1933).

[89.](#_89_5) 各種版本收錄于Gerhard Sauder (ed.) Die Bücherverbrennung: Zum 10. Mai 1933 (Munich, 1983), 89-95。

[90.](#_90_5) Clemens Zimmermann, ‘Die Bücherverbrennung am 17. Mai 1933 in Heidelberg: Studenten und Politik am Ende der Weimarer Republik’, in Joachim-Felix Leonhard (ed.), Bücherverbrennung. Zensur, Verbot, Vernichtung unter dem Nationalsozialismus in Heidelberg (Heidelberg, 1983), 55-84.

[91.](#_91_6) Wolfgang Strätz, ‘Die studentische “Aktion wider den undeutschen Geist”’, VfZ 16 (1968), 347-72（錯誤地把此行動歸因于宣傳部）；Jan-Pieter Barbian, Literaturpolitik im ‘Dritten Reich’: Institutionen, Kompetenzen, Betätigungsfelder (Frankfurt am Main, 1993), 54-60, 128-42；Hildegard Brenner, Die Kunstpolitik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Hamburg, 1963), 186。

[92.](#_92_6) Leonidas E. Hill, ‘The Nazi Attack on “Un-German” Literature, 1933-1945’, in Jonathan Rose (ed.) The Holocaust and the Book (Amherst, Mass., 2001), 9-46；Sauder (ed.) Die Bücherverbrennung, 9-16；另見Anselm Faust, ‘Die Hochschulen und der “undeutsche Geist”: Die Bücherverbrennung am 10. Mai 1933 und ihr Vorgeschichte’, in Horst Denkler and Eberhard Lämmert (eds.) ‘Das war ein Vorspiel nur...’: Berliner Kolloquium zur Literaturpolitik im ‘Dritten Reich’ (Berlin, 1985), 31-50；Grüttner, Studenten, 75-77指出，學生會的檔案中沒有發現來自宣傳部的指令，戈培爾日記中也沒有說自己策劃了此次焚書行動。

[93.](#_93_6) Rebentisch and Raab (eds.), Neu-Isenburg, 86-7.

[94.](#_94_6) 關于瓦爾特堡事件，參見Wehler, Deut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II. 334-6；海涅在瓦爾特堡事件之后所寫的這句名言在他出版于1823年的詩集《阿爾曼索》（Almansor, 245，引用于Knowles (ed.)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Quotation, 368，也收錄于其他許多名言集。火刑當時仍然在普魯士州用于處決縱火殺人犯，最后一次使用是在1812年的柏林（Evans, Rituals, 213-14）。

[95.](#_95_6) Michael Wildt, ‘Violence against Jews in Germany, 1933-1939’, in David Bankier (ed.) Probing the Depths of German Antisemitism: German Society and the Persecution of the Jews 1933-1941 (Jerusalem, 2000), 181-209, at 181-2; Saul Friedlander, Nazi Germany and the Jews: The Years of Persecution 1933-1939 (London, 1997), 107-10; Walter, Antisemitische Kriminalität, 236-43。當時的文獻檔案，參見Comité des Delegations Juives (ed.), Das Schwarzbuch: Tatsachen und Dokumente. Die Lage der Juden in Deutschland 1933 (Paris, 1934)。綜述參見Shulamit Volkov, ‘Antisemitism as a Cultural Code: Reflections on the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of Antisemitism in Imperial Germany’, Year Book of the Leo Baeck Institute, 23 (1978), 25-46。

[96.](#_96_6) Longerich, Politik der Vernichtung, 26-30.

[97.](#_97_6) Gruchmann, Justiz, 126; Longerich, Der ungeschriebene Befehl, 43-4.

[98.](#_98_6) Haffner, Defying Hitler, 125.

[99.](#_99_6) Halbmonatsbericht des Regierungspräsidenten von Niederbayern und der Oberpfalz, 30. 3. 1933, in Broszat et al. (eds.), Bayern, I. 432.

[100.](#_100_6) Friedländer, Nazi Germany and the Jews, 41-2.

[101.](#_101_6) World Committee (ed.), The Brown Book, 237，關于迫害猶太人的綜述，見第222-69頁。

[102.](#_102_6) Friedländer, Nazi Germany and the Jews, 17-18.

[103.](#_103_6) Minuth (ed.), Die Regierung Hitler, I. 270-71; Longerich, Der ungeschriebene Befehl, 44-6.

[104.](#_104_5) Fro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I/II. 398 (27 March 1933).

[105.](#_105_5) Moshe R. Gottlieb, American Anti-Nazi Resistance, 1933-1941: An Historical Analysis (New York, 1982), 15-24; Deborah E. Lipstadt, Beyond Belief: The American Press and the Coming of the Holocaust, 1933-1945 (New York, 1986).

[106.](#_106_5) 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I/II. 398-401; Reuth, Goebbels, 281; Klemperer, I Shall Bear Witness, 9-10.

[107.](#_107_5) Longerich, Politik der Vernichtung, 36-9; more generally, Avraham Barkai, From Boycott to Annihilation: The Economic Struggle of German Jews, 1933-1945 (Hanover, NH, 1989), 17-25; Helmut Genschel, Die Verdrängung der Juden aus der Wirtschaft im Dritten Reich (Berlin, 1966), 47-70.

[108.](#_108_5) Friedländer, Nazi Germany and the Jews, 21-2; Broszat et al. (eds.), Bayern, I. 433-5; Klemperer, I Shall Bear Witness, 10.

[109.](#_109_6) Friedländer, Nazi Germany and the Jews, 24-5; Haffner, Defying Hitler, 131-3.

[110.](#_110_6) Longerich, Politik der Vernichtung, 39-41.

[111.](#_111_6) Friedländer, Nazi Germany and the Jews, 26-31.

[112.](#_112_6) Longerich, Der ungeschriebene Befehl, 46.

[113.](#_113_6) Longerich, Politik der Vernichtung, 41-5.

[114.](#_114_5) Friedländer, Nazi Germany and the Jews, 35-7.

[115.](#_115_5) Allen, The Nazi Seizure of Power, 218-22.

[116.](#_116_5) Konrad Kwiet and Helmut Eschwege, Selbstbehauptung und Widerstand: Deutsche Juden im Kampf um Existenz und Menschenwürde 1933-1945 (Hamburg, 1984), 50-56.

[117.](#_117_6) Klemperer, I Shall Bear Witness, 5-9；同一作者的Tagebücher 1933-1934 (Ich will Zeugnis ablegen bis zum Letzten), I (Berlin, 1999 [1995]), 6-15。本書所參考的德文版平裝本中的有些材料，不見于該書的英文版。

[118.](#_118_6) Norbert Frei, ‘“Machtergreifung”: Anmerkungen zu einem historischen Begriff’, VfZ 31 (1983), 136-45。“奪權”一詞實際上是因Bracher、Schulz和Sauer的大部頭著作《納粹奪權》（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Machtergreifung）而被廣泛使用；但是從這部巨著的內容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們的“奪權”概念所涵蓋的時間范圍是從1933年1月30日之后至同年的夏末。

[119.](#_119_6) “權力真空”是Bracher的經典著作Die Auflösung中的核心內容之一。

[120.](#_120_6) 見Turner, Hitler's Thirty Days, 172-6的有趣推測；在我看來，這些推測低估了德國軍官團的種族主義和反猶主義，也低估了軍官團重新“謀求德國的世界霸權”的欲望，這是它在20世紀初曾強烈支持的事業；然而進行歷史假設時，我們只能完全借助猜測，因此無從判斷我的推測是否比Turner的有道理。關于我對這些問題的思考，參見Richard J. Evans, ‘Telling It Like It Wasn't’, BBC History Magazine, 3 (2002), no. 12, 22-5。

[121.](#_121_6) Volker Rittberger (ed.), 1933: Wie die Republik der Diktatur erlag (Stuttgart, 1983), esp. 217-21; Martin Blinkhorn, Fascists and Conservatives: The Radical Right and the Establishment in Twentieth-Century Europe (London, 1990); idem, Fascism and the Right in Europe 1919-1945 (London, 2000); Payne, A History of Fascism, 14-19.

[122.](#_122_6) Paul, Aufstand, 255-63; Richard Bessel, ‘Violence as Propaganda: The Role of the Storm Troopers in the Rise of National Socialism’, in Thomas Childers (ed.), The Formation of the Nazi Constituency, 1919-1933 (London, 1986), 131-46.

[123.](#_123_6) Geoff Eley, ‘What Produces Fascism: Pre-Industrial Traditions or a Crisis of the Capitalist State?’, in idem, From Unification to Nazism, 254-84; Gessner, Agrarverbände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Geyer, ‘Professionals and Junkers’; Peukert, The Weimar Republic, 275-81。Winkler, Weimar, 607強調了“工業化以前的”精英人士的作用。

[124.](#_124_6) Erdmann and Schulze (eds.), Weimar; Heinz Höhne, Die Machtergreifung: Deutschlands Weg in die Hitler-Diktatur (Reinbek, 1983), chapter 2 (‘Selbstmord einer Demokratie’)。

[125.](#_125_6) Joseph Goebbels, Der Angriff: Aufsätze aus der Kampfzeit (Munich, 1935), 61.

[126.](#_126_6) Bracher, The German Dictatorship, 246.

[127.](#_127_6) 出處同上，第248-50頁。

[128.](#_128_6) Thomas Balistier, Gewalt und Ordnung: Kalkül und Faszination der SA (Münster, 1989).

[129.](#_129_5) Der Prozess, XXVI. 300-301 (783-PS)，以及Broszat, ‘The Concentration Camps’, 406-23。

[130.](#_130_5) 可參閱Lothar Gruchmann, ‘Die bayerische Justiz im politischen Machtkampf 1933/34: Ihr Scheitern bei der Strafverfolgung von Mordfällen in Dachau’, in Broszat et al. (eds.) Bayern, II. 415-28。

[131.](#_131_5) Wachsmann, Hitler's Prisons, chapter 2。

[132.](#_132_5) Haffner, Defying Hitler, 103-25. Dirk Schumann, Politische Gewalt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Kampf um die Strasse und Furcht vor dem Bürgerkrieg (Essen, 2001), esp. 271-368.

[133.](#_133_5) Hitler, Hitler: Reden, Schriften, Anordnungen, III. 434-51, at 445.

[134.](#_134_5) Bessel, Political Violence, 123-5.

[135.](#_135_5) Ludwig Binz, ‘Strafe oder Vernichtung?’, Völkischer Beobachter, 5 January 1929.

[136.](#_136_5) Hermann Rauschning, Germany's Revolution of Destruction (London, 1939 [1938]), 94, 97-9, 127.

[137.](#_137_5) Bracher, Stufen, 21-2.

[138.](#_138_5) Richard Bessel, ‘1933: A Failed Counter-Revolution’, in Edgar E. Rice (ed.),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Oxford, 1991), 109-227; Horst Möller,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Machtergreifung: Konterrevolution oder Revolution?’, VfZ 31 (1983), 25-51; Jeremy Noakes, ‘Nazism and Revolution’, in Noel O'Sullivan (ed.), Revolutionary Theory and Political Reality (London, 1983), 73-100; Rainer Zitelmann, Hitler: The Policies of Seduction (London, 1999 [1987]).

[139.](#_139_5) 最重要的參考書是Jacob L. Talmon,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 Democracy (London, 1952)。

[140.](#_140_5) Bracher, Stufen, 25-6.

[141.](#_141_5) Minuth (ed.), Die Regierung Hitler, I. 630.

[142.](#_142_5) 出處同上，第634頁。

[143.](#_143_5) AT 6 and 99, in Merkl, Political Violence, 469.

[144.](#_144_5) Bracher, Stufen, 48.

[145.](#_145_5) Leon Trotsky, Th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3 vols., London, 1967 [1933-4]), III. 289.

[146.](#_146_5) Domarus, Hitler, I. 487.

[147.](#_147_5) Richard Löwenthal,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Machtergreifung” - eine Revolution? Ihr Platz unter den totalitären Revolutionen unseres Jahrhunderts’, in Martin Broszat et al. (eds.), Deutschlands Weg in die Diktatur (Berlin, 1983), 42-74.

# 參考文獻

Abel, Theodore, Why Hitler Came to Power (Cambridge, Mass, 1986 [1938]).

Abrams, Lynn, Workers' Culture in Imperial Germany: Leisure and Recreation in the Rhineland and Westphalia (London, 1992).

Ackermann, Josef, Himmler als Ideologe (Göttingen, 1970).

——, ‘Heinrich Himmler: Reichsfuhrer-SS’, in Smelser and Zitelmann (eds.), The Nazi Elite, 98-112.

Adam, Peter, Arts of the Third Reich (London, 1992).

Adam, Uwe Dietrich, Hochschule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Die Universität Tübingen im Dritten Reich (Tübingen, 1977).

Adolph, Hans J. L., Otto Wels und die Politik der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ie 1934-1939: Eine politische Biographie (Berlin, 1971).

Afflerbach, Holger, Falkenhayn: Politisches Denken und Handeln im Kaiserreich (Munich, 1994).

Albrecht, Richard, ‘Symbolkampf in Deutschland 1932: Sergej Tschachotin und der “Symbolkrieg” der drei Pfeile gegen den Nationalsozialismus als Episode im Abwehrkampf der Arbeiterbewegung gegen den Faschismus in Deutschland’, Internationale Wissenschaftliche Korrespondenz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ben Arbeiterbewegung, 22 (1986), 498-533.

Aldcroft, Derek H., From Versailles to Wall Street 1919-1929 (London, 1977).

Allen, William S., The Nazi Seizure of Power: The Experience of a Single German Town, 1922-1945 (New York, 1984 [1965]).

Althaus, Hans-Joachim, et al., ‘Da ist nirgends nichts gewesen ausser hier’: Das ‘rote Mössingen’ im Generalstreik gegen Hitler. Geschichte eines schwäbischen Arbeiterdorfes (Berlin, 1982).

Ambrosius, Lloyd E., Wilsonian Statecraft: Theory and Practice of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during World War I (Wilmington, Del., 1991).

Andersch, Alfred, Der Vater eines Mörders: Eine Schulgeschichte (Zurich, 1980).

Anderson, Margaret L., Practicing Democracy: Elections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Imperial Germany (Princeton, 2000).

Angell, Norman, The Story of Money (New York, 1930).

Angermund, Ralph, Deutsche Richterschaft 1918-1945: Krisenerfahrung, Illusion, Politische Rechtsprechung (Frankfurt am Main, 1990).

Angress, Werner, Stillborn Revolution: The Communist Bid for Power in Germany, 1921-1923 (Princeton, 1963).

Arendt, Hannah,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1958).

Aschheim, Steven E., Brothers and Strangers: The East European Jew in German and German Jewish Consciousness 1800-1923 (Madison, 1982).

——, The Nietzsche Legacy in Germany 1890-1990 (Berkeley, 1992). Auerbach, Helmuth, ‘Hitlers politische Lehrjahre und die Münchner Gesellschaft 1919-1923,’ VfZ 25 (1977), I-45.

Ayass, Wolfgang, ‘Vagrants and Beggars in Hitler's Reich’, in Evans (ed.), The German Underworld, 210-37.

——, ‘Asoziale’ im Nationalsozialismus (Stuttgart, 1995).

Ayçoberry, Pierre, The Nazi Question: An Essay on the Interpretations of National Socialism (1922-1975) (New York, 1981).

Bacharach, Walter Zwi, Anti-Jewish Prejudices in German-Catholic Sermons (Lewiston, Pa., 1993).

Backes, Uwe, et al., Reichstagsbrand: Aufklärung einer historischen Legende (Munich, 1986).

Badde, Paul, et al. (eds.), Das Berliner Philharmonische Orchester (Stuttgart, 1987).

Bahar, Alexander, and Kugel, Wilfried, ‘Der Reichstagsbrand: Neue Aktenfunde entlarven die NS-Täter’, 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43 (1995), 823-32.

Bahne, Siegfried, ‘Die Kommunis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in Matthias and Morsey (eds.), Das Ende, 655-739.

Bajohr, Frank (ed.), Norddeutschland im Nationalsozialismus (Hamburg, 1993).

Balderston, Theo, The Origins and Course of the German Economic Crisis, 1923-1932 (Berlin, 1993).

——, Economics and Politics in the Weimar Republic (London, 2002).

Balistier, Thomas, Gewalt und Ordnung: Kalkül und Faszination der SA (Münster, 1989).

Baranowski, Shelley, The Sanctity of Rural Life: Nobility, Protestantism and Nazism in Weimar Prussia (New York, 1995).

Barbian, Jan-Pieter, Literaturpolitik im ‘Dritten Reich’: Institutionen, Kompetenzen, Betätigungsfelder (Frankfurt am Main, 1993).

Barkai, Avraham, From Boycott to Annihilation: The Economic Struggle of German Jews, 1933-1945 (Hanover, NH, 1989).

Barth, Erwin, Joseph Goebbels und die Formierung des Führer-Mythos 1917 bis 1934 (Erlangen, 1999).

Bartsch, Günter, Zwischen drei Stühlen: Otto Strasser. Eine Biographie (Koblenz, 1990).

Becker, Heinrich, et al. (eds.), Die Universität Göttingen unter dem Nationalsozialismus: Das verdrängte Kapitel ihrer 250 jährigen Geschichte (Munich, 1987).

Becker, Howard, German Youth: Bond or Free? (New York, 1946).

Becker, Josef, ‘Zentrum und Ermächtigungsgesetz 1933: Dokumentation’ VfZ 9 (1961), 195-210.

——, and Becker, Ruth (eds.), Hitlers Machtergreifung: Dokumente vom Machtantritt Hitlers 30. Januar 1933 bis zur Besiegelung des Einparteienstaates 14. Juli 1933 (2nd edn., Munich, 1992 [1983]).

Bennett, Edward W., German Rearmament and the West, 1932-1933 (Princeton, 1979).

Benz, Wolfgang (ed.), Jüdisches Lebe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Tübingen, 1998).

Berg, Nicolas, Der Holocaust und die westdeutschen Historiker: Erforschung und Erinnerung (Cologne, 2003).

Berger, Stefan, Social Democracy and the Working Class in Nineteenth-and Twentieth-Century Germany (London, 2000).

Berghahn, Volker R., Der Stahlhelm: Bund der Frontsoldaten 1918-1935 (Düsseldorf, 1966).

——, Der Tirpitz-Plan: Genesis und Verfall einer innenpolitischen Krisenstrategie unter Wilhelm II. (Düsseldorf, 1971).

——, Germany and the Approach of War in 1914 (London, 1973).

—— (ed.), Militarismus (Cologne, 1975).

——, Militarism: The History of an International Debate 1861-1979 (Cambridge, 1984 [1981]).

Bergmann, Klaus, Agrarromantik und Grossstadtfeindschaft (Meisenheim, 1970).

‘Bericht des Obersten Parteigerichts an den Ministerpräsidenten Generalfeldmarschall Goring, 13.1.1939’, document ND 3063-PS in Der Prozess, XXII. 20-29.

Bering, Dietz, The Stigma of Names: Antisemitism in German Daily Life, 1812- 1933 (Cambridge, 1992 [1987]).

Berliner Börsen-Zeitung 1933.

Berliner Illustrierte Nachtausgabe 1933.

Berliner Lokal Anzeiger 1933.

Berliner Morgenpost 1923.

Berliner Tageblatt 1930.

Bernard, Birgit, “‘Gleichschaltung” im Westdeutschen Rundfunk 1933/34’, in Dieter Breuer and Gertrude Cepl-Kaufmann (eds.), Moderne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im Rheinland (Paderborn, 1997), 301-10.

Bessel, Richard, ‘The Potempa Murder’,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10 (1977), 241-54.

——, ‘The Rise of the NSDAP and the Myth of Nazi Propaganda’, Wiener Library Bulletin, 33 (1980), 20-29.

——, Political Violence and the Rise of Nazism: The Storm Troopers in Eastern Germany 1925-1934 (London, 1984).

——, ‘Violence as Propaganda: The Role of the Storm Troopers in the Rise of National Socialism’, in Thomas Childers (ed.), The Formation of the Nazi Constituency, 1919-1933 (London, 1986), 131-46.

——, ‘Why did the Weimar Republic Collapse?’, in Kershaw (ed.), Weimar, 120-34.

——, ‘1933: A Failed Counter-Revolution’, in Edgar E. Rice (ed.),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Oxford, 1991), 109-227.

——, ‘Militarisierung und Modernisierung: Polizeiliches Handel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in Alf Lüdtke (ed.), ‘Sicherbeit’ und ‘Wohlfahrt’: Polizei, Gesellschaft und Herrschaft im 19. und 20. Jahrhundert (Frankfurt am Main, 1992), 323-43.

——, Germany after the First World War (Oxford, 1993).

Beyer, Hans, Von der Novemberrevolution zur Räterepublik in München (Berlin, 1957).

Beyerchen, Alan D., Scientists under Hitler: Politics and the Physics Community in the Third Reich (New Haven, 1977).

Biesemann, Jörg, Das Ermächtigungsgesetz als Grundlage der Gesetzgebung im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Deutschland: Ein Beitrag zur Stellung des Gesetzes in der Verfassungsgeschichte 1919-1945 (Münster, 1992 [1985]).

Binding, Karl, and Hoche, Alfred, Die Freigabe der Vernichtung lebensunwerten Lebens: Ihr Mass und ihre Form (Leipzig, 1920).

Binion, Rudolph, Frau Lou: Nietzsche's Wayward Disciple (Princeton, 1968).

Birkenfeld, Werner, ‘Der Rufmord am Reichsprasidenten: Zu Grenzformen des politischen Kampfes gegen die frühe Weimarer Republik 1919-1925’, Archiv für Sozialgeschichte, 15 (1965), 453-500.

Blackbourn, David, ‘Roman Catholics, the Centre Party and Anti-Semitism in Imperial Germany’, in Paul Kennedy and Anthony Nicholls (eds.), Nationalist and Racialist Movements in Britain and Germany before 1914 (London, 1981), 106-29.

——, Populists and Patricians: Essays in Modern German History (London, 1987).

——, Marpingen: Apparitions of the Virgin Mary in Bismarckian Germany (Oxford, 1993).

——, The Fontana History of Germany 1780-1918: The Long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1997).

——, and Eley, Geoff, The Peculiarities of German History: Bourgeois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Nineteenth-Century Germany (Oxford, 1984).

——, and Evans, Richard J. (eds.), The German Bourgeoisie: Essays on the Social History of the German Middle Class from the Late Eighteenth to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1991).

Blaich, Fritz, Die Wirtschaftskrise 1925/26 und die Reichsregierung: Von der Erwerbslosenfürsorge zur Konjunkturpolitik (Kallmünz, 1977).

——, Der scbwarze Freitag: Inflation und Wirtschaftskrise (Munich, 1985).

Blaschke, Olaf, Katholizismus und Antisemitismus im Deutschen Kaiserreich (Göttingen, 1997).

—— (ed.), Konfessionen im Konflikt: Deutschland zwischen 1800 und 1970; Ein zweites konfessionelles Zeitalter (Göttingen, 2002).

——, and Mattioli, Aram (eds.), Katholischer Antisemitismus im 19. Jahrhundert: Ursachen und Traditionen im internationalen Vergleich (Zurich, 2000).

Bley, Helmut, Namibia under German Rule (Hamburg, 1996 [1968]).

Blinkhorn, Martin, Fascists and Conservatives: The Radical Right and the Establishment in Twentieth-Century Europe (London, 1990).

——, Fascism and the Right in Europe 1919-1945 (London, 2000).

Boak, Helen L., ‘“Our Last Hope”: Women's Votes for Hitler - A Reappraisal’, German Studies Review, 12. (1989), 289-310.

Boemeke, Manfred F., et al. (eds.), The Treaty of Versailles: A Reassessment after 75 Years (Washington, DC, 1998).

Bohrmann, Hans (ed.), Politische Plakate (Dortmund, 1984).

Boldt, Harald, ‘Der Artikel 48 der Weimarer Reichsverfassung: Sein historischer Hintergrund und seine politische Funktion’, in Michael Stürmer (ed.), Die Weimarer Republik: Belagerte Civitas (Königstein im Taunus, 1980), 288-309.

Bollmus, Reinhard, ‘Alfred Rosenberg: National Socialism's “Chief Ideologue”’, in Smelser and Zitelman (eds.), The Nazi Elite, 183-93.

Booms, Hans, ‘Die Deutsche Volkspartei’, in Matthias and Morsey (eds.), Das Ende, 521-39.

Borchardt, Knut, ‘Zwangslagen und Handlungsspielräume in der grossen Wirtschaftskrise der frühen dreissiger Jahre: Zur Revision des überlieferten Geschichtsbildes’, in idem, Wachstum, Krisen, Handlungsspielräume der Wirtschaftspolitik (Göttingen, 1982), 165-82.

——, Perspectives on Modern German Economic History and Policy (Cambridge, 1991).

Born, Karl Erich, Staat und Sozialpolitik seit Bismarcks Sturz 1890-1914: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r innenpolitischen Entwicklung des deutschen Reiches 1890-1914 (Wiesbaden, 1957).

Born, Max (ed.), The Born-Einstein Letters: Correspondence between Albert Einstein and Max and Hedwig Born from 1916 to 1955 (London, 1971).

Bosworth, Richard J. B., Mussolini (London, 2002).

Böttger, Marcus, Der Hochverrat in der höchstrichterlichen Rechtsprechung der Weimarer Republik: Ein Fall politischer Instrumentalisierung von Strafgesetzen? (Frankfurt am Main, 1998).

Bowlby, Chris, ‘Blutmai 1929: Police, Parties and Proletarians in a Berlin Confrontation’, Historical Journal, 29 (1986), 137-58.

Boyer, John W., Political Radicalism in Late Imperial Vienna: Origins of the Christian Social Movement, 1848-1897 (Chicago, 1981).

Bracher, Karl Dietrich, Die Auflosung der Weimarer Republik: Eine Studie zum Problem des Machtverfalls in der Demokratie (3rd edn., Villingen, 1960 [1955]).

——, The German Dictatorship: The Origins, Structure, and Consequences of National Socialism (New York, 1970 [1969]).

——, ‘Brünings unpolitische Politik und die Auflösung der Weimarer Republik’, VfZ 19 (1971), 113-23.

——, Die totalitäre Erfahrung (Munich, 1987).

——, et al.,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Machtergreifung: Studien zur Errichtung des totalitären Herrschaftssystems in Deutschland 1933/34 (Frankfurt am Main, 1974 [1960]), I: Stufen der Machtergreifung (Bracher), II: Die Anfänge des totalitären Massnahmestaates (Schulz); III: Die Mobilmachung der Gewalt (Sauer).

Brady, Robert, The Rationalization Movement in Germany: A Study in the Evolution of Economic Planning (Berkeley, 1933).

Brandenburg, Hans-Christian, Die Geschichte der HJ. Wege und Irrwege einer Generation (Cologne, 1968).

Brandt, Willy, Erinnerungen (Frankfurt am Main, 1989).

Brecht, Arnold, ‘Gedanken über Brünings Memoiren’, Politische Vierteljahresschrift, 12 (1971), 607-40.

Bredel, Willi, Ernst Thälmann: Beitrag zu einem politischen Lebensbild (Berlin, 1948).

Brendon, Piers, The Dark Valley: A Panorama of the 1930s (London, 2000).

Brenner, Arthur D., Emil J. Gumbel: Weimar German Pacifist and Professor (Boston, 2001).

Brenner, Hildegard, Die Kunstpolitik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Hamburg, 1963).

Bresciani-Turroni, Constantino, The Economics of Inflation; A Study of Currency Depreciation in Post-War Germany (London, 1937).

Breuer, Stefan, Ordnung der Ungleichheit—die deutsche Rechte im Widerstreit ihrer Ideen 1871-1945 (Darmstadt, 2001).

Bridenthal, Renate, and Koonz, Claudia, ‘Beyond Kinder, Küche, Kirche: Weimar Women in Politics and Work’, in Renate Bridenthal et al. (eds.), When Biology Became Destiny: Women in Weimar and Nazi Germany (New York, 1984), 33-65.

Brinkmann, Reinhold, and Wolff, Christoph (eds.), Driven into Paradise: The Musical Migration from Germany to the United States (Berkeley, 1999).

Broszat, Martin, ‘Die Anfänge der Berliner NSDAP 1926/27’, VfZ 8 (1960), 85-118.

——, ‘The Concentration Camps 1933-1945’, in Helmut Krausnick et al., Anatomy of the SS State (London, 1968 [1965]), 397-496.

——, Der Staat Hitlers: Grundlegung und Entwicklung seiner inneren Verfassung (Munich, 1969).

——, ‘Betrachtungen zu “Hitlers Zweitem Buch”’, VfZ 9 (1981), 417-29.

——, Hitler and the Collapse of Weimar Germany (Oxford, 1987 [1984]).

——, et al., (eds.), Bayern in der NS-Zeit (6 vols., Munich, 1977-83).

Browder, George C., Hitler's Enforcers: The Gestapo and the SS Security Service in the Nazi Revolution (New York, 1996).

Brown, Brendan, Monetary Chaos in Europe: The End of an Era (London, 1988).

Brügel, Johann Wilhelm, and Frei, Norbert (eds.), ‘Berliner Tagebuch, 1932-1934: Aufzeichnungen des tschechoslowakischen Diplomaten Camill Hoffmann’, VfZ 36 (1988), 131-83.

Brüning, Heinrich, Memoiren 1918-1934 (ed. Claire Nix and Theoderich Kampmann, Stuttgart, 1970).

Brustein, William, The Logic of Evil: The Social Origins of the Nazi Party, 1925-1933 (New Haven, 1996).

Bucher, Peter, Der Reichswehrprozess: Der Hochverrat der Ulmer Reichswehroffiziere 1929-30 (Boppard, 1967).

Buchheim, Hans, ‘The SS - Instrument of Domination’, in Helmut Krausnick et al., Anatomy of the SS State (London, 1968 [1965]), 127-203.

Buchwitz, Otto, 50 Jahre Funktionär der deutschen Arbeiterbewegung (Stuttgart, 1949).

Buder, Johannes, Die Reorganisation der preussischen Polizei 1918/1923 (Frankfurt am Main, 1986).

Bullivant, Keith, ‘Thomas Mann and Politics in the Weimar Republic’, in idem (ed.), Culture and Society in the Weimar Republic (Manchester, 1977), 24-38.

Bullock, Alan, Hitler: A Study in Tyranny (London, 1953).

Burkert, Hans-Norbert, et al., ‘Machtergreifung’ Berlin 1933: Stätten der Geschichte Berlins in Zusammenarbeit mit dem Pädagogischen Zentrum Berlin (Berlin, 1982).

Burkhardt, Bernd, Eine Stadt wird braun: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Machtergreifung in der Provinz. Eine Fallstudie (Hamburg, 1980).

Burleigh, Michael, Death and Deliverance: ‘Euthanasia’, in Germany 1900-1945 (Cambridge, 1994).

——, The Third Reich: A New History (London, 2000).

——, and Wippermann, Wolfgang, The Racial State: Germany 1933-1945 (Cambridge, 1991).

Busch, Fritz, Aus dem Leben eines Musikers (Zurich, 1949).

Busch, Günter, Max Liebermann: Maler, Zeichner, Graphiker (Frankfurt am Main, 1986).

Büsch, Otto, Militärsystem und Sozialleben im alten Preussen 1713-1807: Die Anfänge der sozialen Militarisierung der preussisch-deutschen Gesellschaft (Berlin, 1962).

Butler, Rohan d’Olier, The Roots of National Socialism 1783-1933 (London, 1941).

Caplan, Jane, Government without Administration: State and Civil Service in Weimar and Nazi Germany (Oxford, 1988).

——, ‘The Historiography of National Socialism’, in Michael Bentley (ed.), Companion to Historiography (London, 1997), 545-90.

Carsten, Francis L., The Reichswehr and Politics 1918-1933 (Oxford, 1966).

——, Revolution in Central Europe 1918-1919 (London, 1972).

——, Fascist Movements in Austria: From Schönerer to Hitler (London, 1977).

——, August Bebel und die Organisation der Massen (Berlin, 1991).

Cecil, Hugh, and Liddle, Peter (eds.), At the Eleventh Hour: Reflections, Hopes and Anxieties at the Closing of the Great War, 1918 (Barnsley, 1998).

Cecil, Robert, The Myth of the Master Race: Alfred Rosenberg and Nazi Ideology (London, 1972).

Chamberlain, Houston Stewart, Die Grundlagen des XIX. Jahrhunderts (2 vols., Munich, 1899).

Chickering, Roger, Imperial Germany and a World without War: The Peace Movement and German Society, 1892-1914 (Princeton, 1975).

——, We Men Who Feel Most German: A Cultural Study of the Pan-German League 1886-1914 (London, 1984).

——, Imperial Germany and the Great War, 1914-1918 (Cambridge, 1998). Childers, Thomas, The Nazi Voter: The Social Foundations of Fascism in Germany, 1919-1933 (Chapel Hill, NC, 1981).

Clark, Christopher, Kaiser Wilhelm II (London, 2000).

Clavin, Patricia, The Great Depression in Europe, 1929-1939 (London, 2000).

Coetzee, Marilyn S., The German Army League: Popular Nationalism in Wilhelmine Germany (New York, 1990).

Cohen, Deborah, The War Come Home: Disabled Veterans in Britain and Germany, 1914-1918 (Berkeley, 2001).

Cohn, Norman, Warrant for Genocide: The Myth of the Jewish World-Conspiracy and the 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 (London, 1967).

Comité des Delegations Juives (ed.), Das Schwarzbuch: Tatsachen und Dokumente. Die Lage der Juden in Deutschland 1933 (Paris, 1934).

Conze, Werner, review of the first edition of Bracher, Die Auflösung der Weimarer Republik, in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183 (1957), 378-82.

Cornelissen, Christoph, Gerhard Ritt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im 20. Jahrhundert (Düsseldorf, 2001).

Corni, Gustavo, ‘Richard Walther Darré: The Blood and Soil Ideologue’, in Smelser and Zitelmann (eds.), The Nazi Elite, 18-27.

Cornwell, John, Hitler's Pope: The Secret History of Pius XII (London, 1999).

Cossé, Peter, ‘Die Geschichte’, in Badde et al. (eds.), Das Berliner Philharmonische Orchester, 10-17.

Craig, Gordon A., ‘Briefe Schleichers an Groener’, Die Welt als .Geschichte, 11 (1951), 122-33.

——, The Politics of the Prussian Army 1640-1945 (New York, 1964 [1955]).

Crew, David F., Germans on Welfare: From Weimar to Hitler (New York, 1998).

Crook, Paul, Darwinism, War and History: The Debate over the Biology of War from the ‘Origin of Species’ to the First World War (Cambridge, 1994).

Czarnowski, Gabriele, Das kontrollierte Paar: Ehe- und Sexualpolitik im Nationalsozialismus (Weinheim, 1991).

Daim, Wilfried, Der Mann, der Hitler die Ideen gab: Die sektiererischen Grundlagen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Vienna, 1985 [1958]).

Danner, Lothar, Ordnungspolizei Hamburg: Betrachtungen zu ihrer Geschichte 1918-1933 (Hamburg, 1958).

Dapper, Beate, and Rouette, Hans-Peter, ‘Zum Ermittelungsverfahren gegen Leipart und Genossen wegen Untreue vom 9. Mai 1933’, Internationale Wissenschaftliche Korrespondenz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Arbeiterbewegung, 20 (1984), 509-35.

Dedering, Tilman, ‘“A Certain Rigorous Treatment of all Parts of the Nation”: The Annihilation of the Herero in German Southwest Africa 1904’, in Mark Levene and Penny Roberts (eds.), The Massacre in History (New York, 1999), 205-22.

Dehio, Ludwig, Germany and World Politics (London, 1959 [1955]).

Deichmann, Ute, Biologists under Hitler (Cambridge, Mass., 1996 [1992.]).

Deist, Wilhelm, Flottenpolitik und Flottenpropaganda: Das Nachrichtenbüro des Reichsmarineamts 1897-1914 (Stuttgart, 1976).

——, ‘Censorship and Propaganda in Germany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 in Jean-Jacques Becker and Stéphane Audoin-Rouzeau (eds.), Les Sociétés européennes et la guerre de 1914-1918 (Paris, 1990), 199-210.

——, ‘The Military Collapse of the German Empire: The Reality Behind the Stab-inthe-Back Myth’, War in History, 3 (1996), 186-207.

Demeter, Karl, Das deutsche Offizierkorps in Gesellschaft und Staat 1650-1945 (Frankfurt am Main, 1962.).

Deuerlein, Ernst, ‘Hitlers Eintritt in die Politik und die Reichswehr’, VfZ 7 (1959), 203-5.

—— (ed.), Der Hitler-Putsch: Bayerische Dokumente zum 8./9. November 1923 (Stuttgart, 1962).

—— (ed.), Der Aufstieg der NSDAP in Augenzeugenberichten (Munich, 1974).

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 1933.

Deutsche Zeitung 1933.

Diehl, James M., Paramilitary Politics in Weimar Germany (Bloomington, Ind., 1977).

Diels, Rudolf, Lucifer ante Portas: Es spricht der erste Chef der Gestapo (Stuttgart, 1950).

Dijkstra, Bram, Idols of Perversity: Fantasies of Female Evil in Fin-de-Siècle Culture (New York, 1986).

Diller, Ansgar, Rundfunkpolitik im Dritten Reich (Munich, 1980).

Distl, Dieter, Ernst Toller: Eine politische Biographie (Schrobenhausen, 1993).

Domarus, Max (ed.), Hitler: Speeches and Proclamations 1932-1945: The Chronicle of a Dictatorship (4 vols., London, 1990- [1962-3]).

Dorpalen, Andreas, Hindenburg and the Weimar Republic (Princeton, 1964).

——, German History in Marxist Perspective: The East German Approach (Detroit, 1988).

Dowe, Dieter, and Witt, Peter-Christian, Fredrich Ebert 1871-1925: Vom Arbeiterführer zum Reichspräsidenten (Bonn, 1987).

Drewniak, Boguslav, Das Theater im NS-Staat: Szenarium deutscher Zeitgeschichte 1933-1945 (Düsseldorf, 1983).

Duhnke, Horst, Die KPD von 1933 bis 1945 (Cologne, 1972).

——, Die KPD und das Ende von Weimar: Das Scheitern einer Politik 1932-1935 (Frankfurt am Main, 1976).

Dülffer, Jost, Nazi Germany 1933-1945: Faith and Annihilation (London, 1996 [1992]).

Düsterberg, Theodor, Der Stahlhelm und Hitler (Wolfenbüttel, 1949).

Ebeling, Frank, Geopolitik: Karl Haushofer und seine Raumwissenschaft 1919-1945 (Berlin, 1994).

Ebert, Friedrich, Schriften, Aufzeichnungen, Reden (2 vols., Dresden, 1936).

Ehni, Hans-Peter, Bollwerk Preussen? Preussen-Regierung, Reich-Länder-Problem und Sozialdemokratie 1928-1932 (Bonn, 1975).

Ehrt, Adolf, Bewaffneter Aufstand! Enthüllungen über den kommunistischen Umsturzversuch am Vorabend der nationalen Revolution (Berlin, 1933).

Eichengreen, Barry, Golden Fetters: The Gold Standard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 1919-1939 (Oxford, 1992).

Eisner, Freya, Kurt Eisner: Die Politik der libertären Sozialismus (Frankfurt am Main, 1979).

Eksteins, Modris, The Limits of Reason: The German Democratic Press and the Collapse of Weimar Democracy (Oxford, 1975).

Eley, Geoff, Reshaping the German Right: Radical Nationalism and Political Change after Bismarck (London, 1980).

——, From Unification to Nazism: Reinterpreting the German Past (London, 1986).

Elfferding, Wieland, ‘Von der proletarischen Masse zum Kriegsvolk: Massenaufmarsch und Öffentlichkeit im deutschen Faschismus am Beispiel des I. Mai 1933’, in Neue Gesellschaft für bildende Kunst (ed.), Inszenierung der Macht: Ästhetische Faszination im Faschismus (Berlin, 1987), 17-50.

Eliasberg, George, Der Ruhrkrieg von 1920 (Bonn, 1974).

Engelberg, Ernst, Bismarck (2 vols., Berlin, 1985 and 1990).

Epstein, Klaus, review of William L. Shirer,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 in Review of Politics, 23 (1961), 130-45.

Erdmann, Karl Dietrich, and Schulze, Hagen (eds.), Weimar: Selbstpreisgabe einer-Demokratie. Eine Bilanz heute (Düsseldorf, 1980).

Erger, Johannes, Der Kapp-Lüttwitz-Putsch: Ein Beitrag zur deutschen Innenpolitik 1919/20 (Düsseldorf, 1967).

Eschenburg, Theodor, ‘Franz von Papen’, VfZ I (1953), 153-69.

——, ‘Die Rolle der Persönlichkeit in der Krise der Weimarer Republik: Hindenburg, Brüning, Groener, Schleicher’, VfZ 9 (1961), 1-29.

——, Die improvisierte Demokratie (Munich, 1963).

Eschenhagen, Wieland (ed.), Die ‘Machtergreifung’: Tagebuch einer Wende nach Presseberichten vom I. Januar bis 6. März 1933 (Darmstadt, 1982).

Evans, Richard J., ‘German Women and the Triumph of Hitler’,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48 (1976), 123-75.

——, The Feminist Movement in Germany 1894-1933 (London, 1976).

—— (ed.),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Wilhelmine Germany (London, 1978).

——, Death in Hamburg: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the Cholera Years 1830-1910 (Oxford, 1987).

——, Rethinking German History: Nineteenth-Century German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Third Reich (London, 1987).

—— (ed.), The German Underworld: Deviants and Outcasts in German History (London,1988).

——, In Hitler's Shadow: West German Historians and the Attempt to Escape from the Nazi Past (New York, 1989).

—— (ed.), Kneipengespräche im Kaiserreich: Die Stimmungsberichte der Hamburger Politischen Polizei 1892-1914 (Reinbek, 1989).

——, Rituals of Retribution: Capital Punishment in Germany 1600-1987 (Oxford, 1996).

——, review of Maria Tatar, Lustmord: Sexual Murder in Weimar Germany (Princeton, 1995), in German History, 14 (1996), 414-15.

——, Rereading German History: From Unification to Reunification 1800-1996 (London,1997).

——, Tales from the German Underworld: Crime and Punishment in the Ninteenth Century (London, 1998).

——, ‘Hans von Hentig and the Politics of German Criminology’, in Angelika Ebbinghaus and Karl Heinz Roth (eds.), Grenzgänge: Deutsche Geschichte des 20. Jahrhunderts im Spiegel von Publizistik, Rechtsprechung und historischer Forschung (Lüneburg, 1999), 238-64.

——, Telling Lies About Hitler: The Holocaust, History, and the David Irving Trial (London, 2002).

——, ‘History, Memory, and the Law: The Historian as Expert Witness’, History and Theory, 41 (2002), 277-96.

——, ‘Telling It Like It Wasn’t’, BBC History Magazine, 3 (2002), no. 12,22-5.

——, and Geary, Dick (eds.), The German Unemployed: Experiences and Consequences of Mass Unemployment from the Weimar Republic to the Third Reich (London,1987).

Eyck, Erich, A History of the Weimar Republic (2 vols., Cambridge, 1962-4 [1953-6]).

Faesi, Robert (ed.), Thomas Mann - Robert Faesi: Briefwechsel (Zurich, 1962).

Falter, Jürgen W., ‘Die Wähler der NSDAP 1928-1933: Sozialstruktur und parteipolitische Herkunft’, in Wolfgang Michalka (ed.),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Machtergreifung (Paderborn, 1984), 47-59.

——, et al., Wahlen und Abstimmunge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Materialien zum Wahlverhalten 1919-1933 (Munich, 1986).

——, Hitlers Wähler (Munich, 1991).

——, ‘How Likely were Workers to Vote for the NSDAP?’, in Conan Fischer (ed.), The Rise of National Socialism and the Working Classes in Weimar Germany (Oxford, 1996), 9-45.

——, ‘“Die Märzgefallenen” von 1933: Neue Forschungsergebnisse zum sozialen Wandel innerhalb der NSDAP-Mitgliedschaft während der Machtergreifungsphase’,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24 (1998), 595-616.

Fandel, Thomas, ‘Konfessionalismus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in Blaschke (ed.), Konfessionen, 299-334.

Farquharson, John E., The Plough and the Swastika: The NSDAP and Agriculture in Germany, 1928-1945 (London, 1976).

Farr, Ian, ‘Populism in the Countryside: The Peasant Leagues in Bavaria in the 1890s’, in Evans (ed.), Society and Politics, 136-59.

Fattmann, Rainer, Bildungsbürger in der Defensive: Die akademische Beamtenschaft und der ‘Reichsbund der höheren Beamte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Göttingen, 2001).

Faust, Anselm,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Studentenbund: Studenten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Düsseldorf, 1973).

——, ‘Die Hochschulen und der “undeutsche Geist”: Die Bucherverbrennung am 10.

Mai 1933 und ihr Vorgeschichte’, in Horst Denkler and Eberhard Lämmert (eds.), ‘Das war ein Vorspiel nur...’: Berliner Kolloquium zur Literaturpolitik im ‘Dritten Reich’ (Berlin, 1985), 31-50.

Feder, Gottfried, Das Programm der NSDAP und seine weltanschaulichen Grundgedanken (Munich, 1934).

Feinstein, Charles H., et al., The European Economy between the Wars (Oxford, 1997).

Feldman, Gerald D., Army, Industry and Labor in Germany, 1914-1918 (Princeton, 1966).

——, ‘The Origins of the Stinnes-Legien Agreement: A Documentation’, Internationale Wissenschaftliche Korrespondenz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Arbeiterbewegung, 19/20 (1973), 45-104.

—— (ed.), Die Nachwirkungen der Inflation auf die deutsche Geschichte 1924-1933 (Munich, 1985).

——, The Great Disorder: Politics, Economic, and Society in the German Inflation, 1914-1924 (New York, 1993).

——, ‘Right-Wing Politics and the Film Industry: Emil Georg Strauss, Alfred Hugenberg, and the UFA, 1917-1933’, in Christian Jansen et al. (eds.), Von der Aufgabe der Freiheit: Politische Verantwortung und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im 19. und 20. Jahrhundert: Festschrift für Hans Mommsen zum 5. November 1995 (Berlin, 1995), 219-30.

——, Hugo Stinnes: Biographie eines Industriellen 1870-1924 (Munich, 1998).

Fenske, Hans, ‘Monarchisches Beamtentum und demokratischer Rechtsstaat: Zum Problem der Bürokratie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in Demokratie und Verwaltung: 25 Jahre Hochschule für Verwaltung Speyer (Berlin, 1972), 117-36.

Ferguson, Niall, Paper and Iron: Hamburg Business and German Politics in the Era of Inflation, 1897-1927 (Oxford, 1995).

——, The World's Banker: The History of the House of Rothschild (London, 1998).

Fest, Joachim C., The Face of the Third Reich (London, 1979 [1970]).

——, ‘Joseph Goebbels: Eine Porträtskizze’, VfZ 43 (1995), 565-80.

Feuchtwanger, Edgar, Bismarck (London, 2002.).

Fieberg, Gerhard (ed.), Im Namen des deutschen Volkes: Justiz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Cologne, 1989).

Field, Geoffrey G., Evangelist of Race: The Germanic Vision of 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 (New York, 1981).

Figes, Orlando, A People's Tragedy: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891-1924 (London, 1996).

Fischer, Conan, ‘Ernst Julius Röhm: Chief of Staff of the SA and Indispensable Outsider’, in Smelser and Zitelmann (eds.), The Nazi Elite, 173-82.

——, The Ruhr Crisis 1923-1924 (Oxford, 2003).

Fischer, Fritz, Germany's Aims in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 1967 [1961]).

——, War of Illusions: German Politics from 1911 to 1914 (London, 1975 [1969]).

Fischer, Klaus, ‘Der quantitative Beitrag der nach 1933 emigrierten Naturwissenschaftler zur deutschsprachigen physikalischen Forschung’, Berichte zur Wissenschaftsgeschichte, II (1988), 83-104.

Flemming, Jens, Landwirtschaftliche Interessen und Demokratie: Ländliche Gesellschaft, Agrarverbände und Staat 1890-1925 (Bonn, 1978).

Fout, John C., ‘Sexual Politics in Wilhelmine Germany: The Male Gender Crisis, Moral Purity, and Homophobia’,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2 (1992), 388-421.

Fowkes, Ben, Communism in Germany under the Weimar Republic (London, 1984).

Fraenkel, Ernst, The Dual State (New York, 1941).

Frank, Hans, Im Angesicht des Galgens: Deutung Hitlers und seiner Zeit auf Grund eigener Erlebnisse und Erkenntnisse (2nd edn., Neuhaus, 1955 [1953]).

Franz-Willing, Georg, Ursprung der Hitlerbewegung 1919-1922 (Preussisch Olendorf, 1974 [1962]).

——, Krisenjahr der Hitlerbewegung 1923 (Preussisch Oldendorf, 1975).

——, Putsch und Verbotszeit der Hitlerbewegung November 1923 - Februar 1925 (Preussisch Olendorf, 1977).

Frehse, Michael, Ermächtigungsgesetzgebung im Deutschen Reich 1914-1933 (Pfaffenweiter, 1985).

Frei, Norbert, ‘“Machtergreifung”: Anmerkungen zu einem historischen Begriff’, VfZ 31 (1983), 136-45.

——, National Socialist Rule in Germany: The Führer State 1933-1945 (Oxford, 1993 [1987]).

——, Der Fiihrerstaat: Nationalsozialistische Herrschaft 1933 bis 1945 (Munich, 2001 [1987]).

Freitag, Werner, ‘Nationale Mythen und kirchliches Heil: Der “Tag von Potsdam”’, Westfälische Forschungen, 41 (1991), 379-430.

Frevert, Ute, ‘Bourgeois Honour: Middle-Class Duellists in Germany from the Late Eighteenth to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in Blackbourn and Evans (eds.), The German Bourgeoisie, 255-92.

——, Ehrenmänner: Das Duell in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 (Munich, 1991).

——, Die kasernierte Nation: Militärdienst und Zivilgesellschaft in Deutschland (Munich, 2001).

Fricke, Dieter, Kleine Geschichte des Ersten Mai: Die Maifeier in der deutschen und internationalen Arbeiterbewegung (Berlin, 1980).

Friedlander, Henry, The Origins of Nazi Genocide: From Euthanasia to the Final Solution (Chapel Hill, NC, 1995).

Friedlander, Saul, ‘Die politischen Veränderungen der Kriegszeit und ihre Auswirkungen auf die Judenfrage’, in Werner E. Mosse (ed.), Deutsches Judentum in Krieg und Revolution 1916-1923 (Tübingen, 1971), 27-63.

——, Nazi Germany and the Jews: The Years of Persecution 1933-1939 (London, 1997).

Friedrich, Carl J., and Brzezinski, Zbigniew K., 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 (New York, 1963).

Friedrichs, Axel (ed.),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Revolution 1933 (Dokumente der deutschen Politik, I, Berlin, 1933).

Fritzsche, Peter, Germans into Nazis (Cambridge, Mass., 1998).

Fröhlich, Elke, ‘Joseph Goebbels und sein Tagebuch: Zu den handschriftlichen Aufzeichnungen von 1924 bis 1941, VfZ 35 (1987), 489-522.

—— (ed.), 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 Sämtliche Fragmente. part I: Aufzeichnungen 1924-1941 (Munich, 1987).

——, ‘Joseph Goebbelsi The Propagandist’, in Smelser and Zitelmann (eds.), The Nazi Elite, 48-61.

Fulda, Bernhard, ‘Press and Politics in Berlin, 1924-1930’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2003).

——, ‘Horst Wessel: Media, Myth and Memory’ (unpublished paper to be delivered to the Research Seminar in Modern European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November 2003).

Gadberry, Glen W. (ed.), Theatre in the Third Reich, the Prewar Years: Essays on Theatre in Nazi Germany (Westport, Conn., 1995).

Gall, Lothar, Bismarck: The White Revolutionary (2 vols., London, 1986 [1980]).

——, Bürgertum in Deutschland (Berlin, 1989).

Galos, Adam, et al., Die Hakatisten: Der Deutsche Ostmarkenverein 1894-1934 (Berlin, 1966).

Gay, Peter, Weimar Culture: The Outsider as Insider (London, 1969).

Geary, Dick, ‘Unemployment and Working-Class Solidarity: The German Experience 1929-33’, in Evans and Geary (eds.), The German Unemployed, 261-80.

——, ‘Employers, Workers,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Weimar Republic’, in Kershaw (ed.), Weimar, 92-119.

——, ‘Nazis and Workers before 1933’,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History, 48 (2002), 40-51.

Gebhardt, Manfred, Max Hoelz: Wege und Irrwege eines Revolutionärs (Berlin, 1983).

Geiss, Imanuel (ed.), July 1914: The Outbreak of the First World War. Selected Documents (London, 1967 [1965]).

——, ‘Kritischer Rückblick auf Friedrich Meinecke’, in idem, Studien über Geschichte und Geschichtswissenschaft (Frankfurt am Main, 1972), 89-107.

Gellately, Robert,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Despair: Shopkeepers and German Politics, 1890-1914 (London, 1974).

——, The Gestapo and German Society: Enforcing Racial Policy 1933-1945 (Oxford, 1990).

——, and Stoltzfus, Nathan (eds.), Social Outsiders in Nazi Germany (Princeton, 2001).

Genschel, Helmut, Die Verdrängung der Juden aus der Wirtschaft im Dritten Reich (Berlin, 1966).

Gerlach, Hellmuth von, Von rechts nach links (Hildesheim, 1978 [1937]).

Gessner, Dieter, Agrarverbände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Wirtschaftliche und soziale Voraussetzungen agrarkonservativer Politik vor 1933 (Diisseldorf, 1976).

——, Agrardepression und Präsidialregierungen in Deutschland 1930-1933: Probleme des Agrarkapitalismus am Ende der Weimarer Republik (Düsseldorf, 1977).

Geyer, Martin, Verkehrte Welt: Revolution, Inflation, und Moderne. München 1914-1924 (Göttingen, 1998).

Geyer, Michael, ‘Die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Militärs von 1860-1956: Ein Bericht über die Forschungslage (1945-1975)’, in Hans-Ulrich Wehler (ed.), Die modern deutsche Geschichte in der internationalen Forschung 1945-1975 (Göttingen, 1978), 256-86.

——, Aufrüstung oder Sicherheit: Reichswehr in der Krise der Machtpolitik, 1924-1936 (Wiesbaden, 1980).

——, ‘Professionals and Junkers: German Rearmament and Politics in the Weimar Republic’, in Richard Bessel and Edgar Feuchtwanger (eds.), Social Change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Weimar Germany (London, 1981), 77-113.

Gies, Horst, R. Walther Darré und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Bauernpolitik 1930 bis 1933 (Frankfurt am Main, 1966).

Giles, Geoffrey J., ‘The Rise of the National Socialist Students’ Association and the Failure of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Third Reich’, in Peter Stachura (ed.), The Shaping of the Nazi State (London, 1978), 160-85.

——, Students and National Socialism in Germany (Princeton, 1985).

Gilman, Sander L., On Blackness without Blacks: Essays on the Image of the Black in Germany (Boston, 1982).

Gisevius, Hans Bernd, To the Bitter End (London, 1948).

Goebbels, Joseph, Der Angriff: Aufsätze aus der Kampfzeit (Munich, 1935).

——, Vom Kaiserhof zur Reichskanzlei: Eine historische Darstellung in Tagebuchblattern (vom 1. Januar 1932 bis zum I. Mai 1933) (Munich, 1937 [1934]).

Goeschel, Christian, ‘Methodische Überlegungen zur Geschichte der Selbsttötung im Nationalsozialismus’, in Hans Medick (ed.), Selbsttötung als kulturelle Praxis (Berlin, 2004).

Goldbach, Marie-Luise, Karl Radek und die deutsch-sowjetischen Beziehungen 1918-1923 (Bonn, 1973).

Goldhagen, Daniel J., Hitler's Willing Executioners: Ordinary Germans and the Holocaust (New York, 1996).

Goldstein, Robert J., Political Repress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London, 1983).

Golomstock, Igor, Totalitarian Art in the Soviet Union, Third Reich, Fascist Italy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ondon, 1990).

Göppinger, Horst, Juristen jüdischer Abstammung im ‘Dritten Reich’: Entrechtung und Verfolgung (Munich, 1990 [1963]).

Gordon, Harold J., The Reichswehr and the German Republic 1919-26 (Princeton, 1957).

——, Hitler and the Beer Hall Putsch (Princeton, 1972).

Gottlieb, Moshe R., American Anti-Nazi Resistance, 1933-1941: An Historical Analysis (New York, 1982).

Graf, Christoph, Politische Polizei zwischen Demokratie und Diktatur (Berlin, 1983).

Grahn, Gerlinde, ‘Die Enteignung des Vermögens der Arbeiterbewegung und der politischen Emigration 1933 bis 1945’, 1999: Zeitschrift für Sozialgeschichte des 20. und 21. Jahrhunderts, 12. (1997), 13-38.

Gräser, Marcus, Der blockierte Wohlfahrtsstaat: Unterschichtjugend und Jugendfürsorge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Göttingen, 1995).

Grau, Bernhard, Kurt Eisner 1867-1919: Eine Biographie (Munich, 2001).

Griech-Polelle, Beth A., Bishop von Galen: German Catholicism and National Socialism (New Haven, 2002).

Griffin, Roger, International Fascism—Theories, Causes and the New Consensus (London, 1998).

Grimm, Hans, Volk ohne Raum (Munich, 1926).

Gritschneider, Otto, Bewährungsfrist für den Terroristen Adolf H.: Der Hitler-Putsch und die bayerische Justiz (Munich, 1990).

——, Der Hitler-Prozess und sein Richter Georg Neithardt: Skandalurteil von 1924 ebnet Hitler den Weg (Munich, 2001).

Gross, Babette, Willi Miinzenberg: Eine politische Biographie (Stuttgart, 1967).

Grossmann, Atina, ‘“Girlkultur” or Thoroughly Rationalized Female: A New Woman in Weimar Germany’, in Judith Friedlander et al. (eds.), Women in Culture and Politics: A Century of Change (Bloomington, Ind., 1986), 62-80.

——, Reforming Sex: The German Movement for Birth Control and Abortion Reform 1920-1950 (New York, 1995).

Grossmann, Kurt R., Ossietzky: Ein deutscher Patriot (Munich, 1963).

Gruchmann, Lothar, ‘Die Überleitung der Justizverwaltung auf das Reich 1933-1935’, in Vom Reichsjustizamt zum Bundesministerium der Justiz: Festschrift zum hundertjährigen Gründungstag des Reichsjustizamts (Cologne, 1977).

——, ‘Die bayerische Justiz im politischen Machtkampf 1933/34: Ihr Scheitern bei der Strafverfolgung von Mordfällen in Dachau,’ in Broszat et al. (eds.), Bayern, II. 415-428.

——, Justiz im Dritten Reich 1933-1940: Anpassung und Unterwerfung in der Ära Gürtner (Munich, 1988).

——, ‘Ludendorffs “prophetischer” Brief an Hindenburg vom Januar/Februar 1933’, VfZ 47 (1999), 559-62.

——, and Weber, Reinhard (eds.), Der Hitler-Prozess 1924: Wortlaut der Hauptverhandlung vor dem Volksgericht München 1 (2 vols., Munich, 1997, 1999).

Grunwald, Henning, ‘Political Lawyers in the Weimar Republic’, (Ph.D. dissertation, Cambridge, 2002).

Grüttner, Michael, ‘Working-Class Crime and the Labour Movement: Pilfering in the Hamburg Docks, 1888-1923’, in Richard J. Evans (ed.), The German Working Class 1888-1933: The Politics of Everyday Life (London, 1982), 54-79.

——, Studenten im Dritten Reich (Paderborn, 1995).

Gumbel, Emil J., Vier Jahre politischer Mord (Berlin, 1924).

——, Verschwörer: Zur Geschichte und Soziologie der deutschen nationalistischen Geheimbünde 1918-1924 (Heidelberg, 1979 [1924]).

Guratzsch, Dankwart, Macht durch Organisation: Die Grundlegung des Hugenbergschen Presseimperiums (Düsseldorf, 1974).

Gusy, Christoph, Die Weimarer Reichsverfassung (Tübingen, 1997).

Guttsman, Wilhelm L., Workers’ Culture in Weimar Germany: Between Tradition and Commitment (Oxford, 1990).

Haffner, Sebastian, Defying Hitler: A Memoir (London, 2002).

Hagen, William W., Germans, Poles, and Jews: The Nationality Conflict in the Prussian East, 1772-1914 (Chicago, 1980).

Hagenlücke, Heinz, Die deutsche Vaterlandspartei: Die nationale Rechte am Ende des Kaiserreiches (Düsseldorf, 1997).

Hailey, Christopher, Franz Schreker, 1878-1934: A Cultural Biography (Cambridge, 1993).

Hall, Alex, ‘By Other Means: The Legal Struggle against the SPD in Wilhelmine Germany 1890-1900’, Historical Journal, 17 (1974), 365-86.

——, Scandal, Sensation and Social Democracy: The SPD Press and Wilhelmine Germany 1890-1914 (Cambridge, 1977).

Hamann, Brigitte, Hitler's Vienna: A Dictator's Apprenticeship (Oxford, 2000).

——, Winifred Wagner oder Hitlers Bayreuth (Munich, 2002).

Hamburger, Ernest, ‘Betrachtungen über Heinrich Brünings Memoiren’, Internationale Wissenschaftliche Korrespondenz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Arbeiterbewegung, 8 (1972), 18-39.

Hamel, Iris, Völkischer Verband und nationale Gewerkschaft: Der Deutschnationale Handlungsgehilfenverband, 1893-1933 (Frankfurt am Main, 1967).

Hamilton, Richard F., Who Voted for Hitler? (Princeton, 1981).

Hammer, Hermann, ‘Die deutschen Ausgaben von Hitlers “Mein Kampf”’, VfZ4 (1956), 161-78.

Hammerstein, Notker, Die Johann Wolfgang Goethe-Universität: Von der Stiftungsuniversität zur staatlichen Hochschule (2 vols., Neuwied, 1989).

Hanfstaengl, Ernst, Zwischen Weissenz und Braunem Haus: Memoiren eines politiscben Aussenseiters (Munich, 1970).

Hänisch, Dirk, ‘A Social Profile of the Saxon NSDAP Voters’, in Szejnmann, Nazism, 219-31.

Hankel, Gerd, Die Leipziger Prozesse: Deutsche Kriegsverbrechen und ihre strafrechtliche Verfolgung nach dem Ersten Weltkrieg (Hamburg, 2003).

Hannover, Heinrich and Hannover-Drück, Elisabeth, Politische Justiz 1918-1933 (Frankfurt am Main, 1966).

Hansen, Ernst W., Reichswehr und Industrie: Rüstungswirtschaftliche Zusammenarbeit und wirtschaftliche Mobilmachungsvorbereitungen 1923-1932 (Boppard, 1978).

Harpprecht, Klaus, Thomas Mann: Eine Biographie (Reinbek, 1995).

Harris, James F., The People Speak! Anti-Semitism and Emancip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Bavaria (Ann Arbor, 1994).

Harsch, Donna, German Social Democracy and the Rise of Nazism (Chapel Hill, NC, 1993).

Harvey, Elizabeth, ‘Youth Unemployment and the State: Public Policies towards Unemployed Youth in Hamburg during the World Economic Crisis’, in Evans and Geary (eds.), The German Unemployed, 142-70.

——, ‘Serving the Volk, Saving the Nation: Women in the Youth Movement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Weimar Germany’, in Larry Eugene Jones and James Retallack (eds.), Elections, Mass Politics, and Social Change in Modern Germany: New Perspectives (New York, 1992), 201-22.

——, Youth Welfare and the State in Weimar Germany (Oxford, 1993).

Hassell, Ulrich von, Die Hassell-Tagebücher 1938-1944 (ed. Friedrich Freiherr Hiller von Gaertringen, Berlin, 1989).

Hattenhauer, Hans, ‘Wandlungen des Richterleitbildes im 19. und 20. Jahrhundert’, in Ralf Dreier and Wolfgang Sellert (eds.), Recht und Justiz im ‘Dritten Reich’ (Frankfurt am Main, 1989), 9-33.

Hayes, Peter, Industry and Ideology: I.G. Farben in the Nazi Era (Cambridge, 1987).

Hearnshaw, Fossey J. C., Germany the Aggressor throughout the Ages (London, 1940).

Heberle, Rudolf, Landbevölkerung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Eine soziologiscbe Untersuchung der politischen Willensbildung in Schleswig-Holstein 1918 bis 1932 (Stuttgart, 1963).

——, From Democracy to Nazism: A Regional Case Study on Political Parties in Germany (New York, 1970 [1945]).

Heer, Hannes, Burgfrieden oder Klassenkampf: Zur Politik der sozialdemokratischen Gewerkschaften 1930-1933 (Neuwied, 1971).

——, Ernst Thälmann in Selbstzeugnissen und Bilddokumenten (Reinbek, 1975).

Heiber, Helmut (ed.), The Early Goebbels Diaries: The Journal of Josef Goebbels from 1925-1926 (London, 1962).

Heidegger, Martin, Die Selbstbehauptung der deutschen Universität: Rede, gehalten bei der feierlichen Übernahme des Rektorats der Universität Freiburg i. Br. am 27.5. 1933 (Breslau, 1934).

Heiden, Konrad, Geschichte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Die Karriere einer Idee (Berlin, 1932.).

——, Adolf Hitler: Das Zeitalter der Verantwortungslosigkeit. Eine Biographie (Zurich, 1936).

Heilbronner, Oded, Catholicism, Political Culture and the Countryside: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Nazi Party in South Germany (Ann Arbor, 1998).

Hein, Annette, ‘Es ist viel “Hitler” in Wagner’: Rassismus und antisemitische Deutschtumsideologie in den ‘Bayreuther Blättern’ (1878-1938) (Tübingen, 1996).

Heinemann, Ulrich, Die verdrängte Niederlage: Politische Offentlichkeit und Kriegsschuldfrage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Göttingen, 1983).

Heitzer, Horstwalter, Der Volksverein für das katholische Deutschland im Kaiserreich 1890-1918 (Mainz, 1979).

Hennig, Diethard, Johannes Hoffmann: Sozialdemokrat und Bayerischer Ministerpräsident: Biographie (Munich, 1990).

Hentschel, Volke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Sozialpolitik (1880-1980) (Frankfurt am Main, 1983).

Herbert, Ulrich, Hitler's Foreign Workers: Enforced Foreign Labor in Germany under the Third Reich (Cambridge, 1997 [1985]).

——, Best: Biographische Studien über Radikalismus, Weltanscbauung und Vernunft 1903-1989 (Bonn, 1996).

——et al. (eds.), Die nationalsozialischer Konzentrationslager: Entwicklung und Struktur (2 vols., Göttingen, 1998).

Herbst, Ludolf, Das 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land 1933 -1945 (Frankfurt am Main, 1996).

Hermand, Jost, and Trommler, Frank, Die Kultur der Weimarer Republik (Munich, 1978).

Hertz-Eichenröde, Dieter, Politik und Landwirtschaft in Ostpreussen 1919-1930: Untersuchung eines Strukturproblems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Opladen, 1969).

——, Wirtschaftskrise und Arbeitsbeschaffung: Konjunkturpolitik 1925/26 und die Grundlagen der Krisenpolitik Brünings (Frankfurt am Main, 1982).

Hess, Wolf Rudiger (ed.), Rudolf Hess: Briefe 1908-1933 (Munich, 1987).

Heyworth, Peter, Otto Klemperer: His Life and Times, I: 1885-1933 (Cambridge, 1983).

Hildenbrand, Hans-Joachim, ‘Der Betrug mit dem Fackelzug’, in Rolf Italiander (ed.), Wir erlebten das Ende der Weimarer Republik: Zeitgenossen berichten (Düsseldorf, 1982), 165.

Hill, Leonidas E., ‘The Nazi Attack on “un-German” Literature, 1933-1945’, in Jonathan Rose (ed.), The Holocaust and the Book (Amherst, Mass., 2001), 9-46.

Hiller von Gaertringen, Friedrich Freiherr, ‘Die Deutschnationale Volkspartei’, in Matthias and Morsey (eds.), Das Ende, 541-652.

——, ‘“Dolchstoss-Diskussion” und “Dolchstosslegende” im Wandel von vier Jahrzehnten’, in Waldemar Besson and Friedrich Freiherr Hiller von Gaertringen (eds.), Geschichts- und Gegenwartsbewusstsein (Göttingen, 1963), 122-60.

Hillmayr, Heinrich, Roter und weisser Terror in Bayern nach 1918: Erscheinungsformen und Folgen der Gewaltätigkeiten im Verlauf der revolutionären Ereignisse nach dem Ende des Ersten Weltkrieges (Munich, 1974).

Hindenburg, Paul von, Aus meinem Leben (Leipzig, 1920).

Hirte, Chris, Erich Mühsam: ‘Ihr seht mich nicht feige’. Biografie (Berlin, 1985).

Hitler, Adolf, Mein Kampf (trans. Ralph Manheim, introd. D. C. Watt, London, 1969 [1925/6]).

——, Hitler's Secret Book (New York, 1961).

——, Hitler's Table Talk 1941-1944: His Private Conversations (London, 1973 [1953]).

——, Hitler: Reden, Schriften, Anordnungen. Februar 1925 bis Januar 1933 (5 vols., Institut für Zeitgeschichte, Munich, 1992-8).

Hitzer, Friedrich, Anton Graf Arco: Das Attentat auf Kurt Eisner und die Schüsse im Landtag (Munich, 1988).

Hobsbawm, Eric J., Age of Extremes: The Short Twentieth Century 1914-1991 (London,1994).

Hoegner, Wilhelm, Der schwierige Aussenseiter: Erinnerungen eines Abgeordneten, Emigranten und Ministerpräsidenten (Munich, 1959).

Hoepke, Klaus-Peter, Die deutsche Rechte und der italienische Faschismus: Ein Beitrag zum Selbstverständnis und zur Politik von Gruppen und Verbänden der deutschen Rechten (Düsseldorf, 1968).

Hofer, Walther, and Bahar, Alexander (eds.), Der Reichstagsbrand: Eine wissenschaftliche Dokumentation (Freiburg im Breisgau, 1992 [1972, 1978]).

Hohne, Heinz, The Order of the Death's Head: The Story of Hitler's SS (Stanford, Calif., 1971 [1969]).

——, Die Machtergreifung: Deutschlands Weg in die Hitler-Diktatur (Reinbek, 1983).

Höhnig, Klaus, Der Bund Deutscher Frauenvereine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1919-1923 (Egelsbach, 1995).

Holtfrerich, Carl-Ludwig, The German Inflation, 1914-1923: Causes and Effects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New York, 1986 [1980]).

——, ‘Economic Policy Options and the End of the Weimar Republic’, in Kershaw (ed.), Weimar, 58-91.

Hömig, Herbert, Brüning: Kanzler in der Krise der Republik. Eine Weimarer Biographie (Paderborn, 2000).

Hong, Young-Sun, Welfare, Modernity, and the Weimar State, 1919-1933 (Princeton, 1998).

Horn, Daniel, ‘The National Socialist Schülerbund and the Hitler Youth, 1929-1933’,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II (1978), 355-75.

Horne, John, and Kramer, Alan, German Atrocities 1914: A History of Denial (London, 2001).

Hornung, Klaus, Der Jungdeutsche Orden (Düsseldorf, 1958).

Hosking, Geoffrey, Russia: People and Empire 1552-1917 (London, 1997).

Höss, Rudolf, Commandant of Auschwitz (London, 1959 [1951]).

Hubatsch, Walter, Hindenburg und der Staat: Aus den Papieren des Generalfeldmarschalls und Reichspräsidenten von 1878 bis 1934 (Göttingen, 1966).

Huber, Ernst Rudolf, Deutsche Verfassungsgeschichte seit 1789, V-VII (Stuttgart, 1978-84).

Hunt, Richard N., German Social Democracy 1918-1933 (New Haven, 1964).

Iggers, Georg G. (ed.),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Transformation: New Orientations in Recent East German History (Oxford, 1992).

Jablonsky, David, The Nazi Party in Dissolution: Hitler and the Verbotszeit 1923-1925 (London, 1989).

Jäckel, Eberhard, Hitler's Weltanschauung: A Blueprint for Power (Middletown, Conn., 1972 [1969]).

——, and Kuhn, Axel (eds.), Hitler: Sämtliche Aufzeichnungen 1905-1924 (Stuttgart, 1980).

Jacobsen, Hans-Adolf, Karl Haushofer: Leben und Werk (2 vols., Boppard, 1979).

Jahn, Peter (ed.), Die Gewerkschaften in der Endphase der Republik 1930-1933 (Cologne, 1988).

Jahr, Christoph, Gewöhnliche Soldaten: Desertion und Deserteure im deutschen und britischen Heer 1914-1918 (Göttingen, 1998).

James, Harold, The German Slump: Politics and Economics, 1924-1936 (Oxford, 1986).

——, ‘Economic Reasons for the Collapse of the Weimar Republic’, in Kershaw (ed.), Weimar, 30-57.

Jansen, Christian, Professoren und Politik: Politisches Denken und Handeln der Heidelberger Hochschullehrer 1914-1935 (Göttingen, 1992).

Janssen, Karl-Heinz, ‘Geschichte aus der Dunkelkammer: Kabalen um den Reichstagsbrand. Eine unvermeidliche Enthüllung’, Die Zeit, 38 (14 September 1979), 45-8; 39 (21 September 1979), 20-24; 40 (28 September 1979), 49-52; 41 (5 October 1979), 57-60.

Jarausch, Konrad H., Deutsche Studenten 1800-1970 (Frankfurt am Main, 1984).

Jasper, Gotthard, Der Schutz der Republik (Tübingen, 1963).

——, Die gescheiterte Zähmung: Wege zur Machtergreifung Hitlers 1930-1934 (Frankfurt am Main, 1986).

Jászi, Oszkár,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in Hungary (London, 1924).

Jefferies, Matthew, Imperial Culture in Germany, 1871-1918 (London, 2003).

Jelavich, Peter, Munich and Theatrical Modernism: Politics, Playwriting, and Performance 1890-1914 (Cambridge, Mass., 1985).

——, Berlin Cabaret (Cambridge, Mass., 1993).

Jellonek, Burkhard, Homosexuelle unter dem Hakenkreuz: Verfolgung von Homosexuellen im Dritten Reich (Paderborn, 1990).

Jens, Inge (ed.), Thomas Mann an Ernst Bertram: Briefe aus den Jahren 1910-1955 (Pfullingen, 1960).

Jesse, Eckard (ed.), Totalitarismus im 20. Jahrhundert (Baden-Baden, 1996).

Jetzinger, Franz, Hitler's Youth (London, 1958 [1956]).

Joachimsthaler, Anton, Hitlers Weg begann in München 1913-1923 (Munich, 2000 [1989]).

Jochmann, Werner (ed.),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Revolution: Ursprung und Geschichte der NSDAP in Hamburg 1922-1933 (Frankfurt am Main, 1963).

——, ‘Brünings Deflationspolitik und der Untergang der Weimarer Republik’, in Dirk Stegmann et al. (eds.), Industrielle Gesellschaft und politisches System: Beiträge zur politischen Sozialgeschichte. Festschrift für Fritz Fischer zum siebzigsten Geburtstag (Bonn, 1978), 97-112.

——, Gesellschaftskrise und Judenfeindschaft in Deutschland 1870-1945 (Hamburg, 1988).

Jones, Larry Eugene, German Liberalism and the Dissolution of the Weimar Party System, 1918-1933 (Chapel Hill, NC, 1988).

——, ‘“The Greatest Stupidity of My Life”: Alfred Hugenberg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Hitler Cabinet’,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27 (1992), 63-87.

Jünger, Ernst, In Stahlgewittern: Aus dem Tagebuch eines Stosstruppführers (Hanover, 1920); English edn., Storm of Steel (London, 2003).

Junker, Detlef, Die Deutsche Zentrumspartei und Hitler: Ein Beitrag zur Problematik des politischen Katholizismus in Deutschland (Stuttgart, 1969).

Kaes, Anton, et al. (eds.), The Weimar Republic Sourcebook (Berkeley, 1994).

Kai, Michel, Vom Poeten zum Demagogen: Die schriftstellerischen Versuche Joseph Goebbels’ (Cologne, 1999).

Kaiser, Jochen-Christoph, Sozialer Protestantismus im 20. Jahrhundert: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 Inneren Mission 1914-1945 (Munich, 1989).

——, et al. (eds.), Eugenik, Sterilisation, ‘Euthanasie’: Politische Biologie in Deutschland 1893-1945 (Berlin, 1992).

Kaminski, Andrej, Konzentrationslager 1896 bis heute: Eine Analyse (Stuttgart, 1982).

Kampe, Norbert, Studenten und ‘Judenfrage’ im deutschen Kaiserreich: Die Entstehung einer akademischen Trägerschicht des Antisemitismus (Gottingen, 1988).

Kaplan, Marion A., ‘The Acculturation, Assimil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Jews in Imperial Germany’, Year Book of the Leo Baeck Institute, 27 (1982), 3-35.

Karasek, Horst, Der Brandstifter: Lehr- und Wanderjahre des Maurergesellen Marinus van der Lubbe, der 1933 auszog, den Reichstag anzuzünden (Berlin, 1980).

Kasischke-Wurm, Daniela, Antisemitismus im Spiegel der Hamburger Presse während des Kaiserreichs (1884-1914) (Hamburg, 1997).

Kater, Michael H., Studentenschaft und Rechtsradikalismus in Deutschland 1918-1933: Eine sozialgeschichtliche Studie zur Bildungskrise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Hamburg, 1975).

——, ‘The Work Student: A Socio-Economic Phenomenon of Early Weimar German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10 (1975), 71-94.

——, The Nazi Party: A Social Profile of Members and Leaders, 1919-1945 (Oxford, 1983).

——, Different Drummers: Jazz in the Culture of Nazi Germany (New York, 1992).

——, The Twisted Muse: Musicians and their Music in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 1997).

Katz, Jacob, The Darker Side of Genius: Richard Wagner's Anti-Semitism (Hanover, 1986).

——, From Prejudice to Destruction: Anti-Semitism, 1700-1933 (Cambridge, Mass., 1980).

Kauders, Anthony, German Politics and the Jews: Düsseldorf and Nuremberg 1910-1933 (Oxford, 1996).

Kaufmann, Doris, Katholisches Milieu in Münster 1928-1933 (Düsseldorf, 1984).

Kelly, Andrew, Filming 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 - ‘Brutal Cutting, Stupid Censors, Bigoted Politicos’ (London, 1998), 平裝本的書名為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 The Story of a Film (London, 2002).

Kent, Bruce, The Spoils of War: The Politics, Economics and Diplomacy of Reparations 1918-1932. (Oxford, 1989).

Kershaw, Ian, Popular Opinion and Political Dissent in the Third Reich: Bavaria 1933-1945 (Oxford, 1983).

——, ‘Ideology, Propaganda, and the Rise of the Nazi Party’, in Peter D. Stachura (ed.), The Nazi Machtergreifung, 1933 (London, 1983), 162-81.

—— (ed.), Weimar: Why did German Democracy Fail? (London, 1990).

——, Hitler, I: 1889-1936: Hubris (London, 1998).

——, Hitler, II: 1936-1945: Nemesis (London, 2000).

——, The Nazi Dictatorship: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of Interpretation (4th edn., London, 2000 [1985]).

——, and Lewin, Moshe (eds.), Stalinism and Nazism: Dictatorships in Comparison (Cambridge, 1997).

Kertzer, David, Unholy War: The Vatican's Role in the Rise of Modern Anti-Semitism (London, 2001).

Kessler, Harry Graf, Tagebücher 1918-1937 (ed. Wolfgang Pfeiffer-Belli, Frankfurt am Main, 1961).

Kettenacker, Lothar, ‘Der Mythos vom Reich’, in Karl H. Bohrer (ed.), Mythos und Moderne (Frankfurt am Main, 1983), 262-89.

Kiesewetter, Hubert, Industrielle Revolution in Deutschland 1815-1914 (Frankfurt am Main, 1989).

Kindleberger, Charles P.,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 (Berkeley, 1987 [1973]).

Kirkpatrick, Clifford, Nazi Germany: Its Women and Family Life (New York, 1938).

Kissenkoetter, Udo, Gregor Strasser und die NSDAP (Stuttgart, 1978).

——, ‘Gregor Strasser: Nazi Party Organizer or Weimar Politician?’, in Smelser and Zitelmann (eds.), The Nazi Elite, 224-34.

Kitchen, Martin, The German Officer Corps 1890-1914 (Oxford, 1968).

——, A Military History of Germany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Day (London, 1975).

——, The Silent Dictatorship: The Politics of the German High Command under Hindenburg and Ludendorff, 1916-1918 (London, 1976).

——, The Coming of Austrian Fascism (London, 1980).

Klaus, Martin, Mädchen in der Hitlerjugend: Die Erziehung zur ‘deutschen Frau’ (Cologne, 1980).

Klein, Gotthard, Der Volksverein für das katholische Deutschland 1890-1933: Geschichte, Bedeutung, Untergang (Paderborn, 1996).

Klein, Ulrich, ‘SA-Terror und Bevölkerung in Wuppertal 1933/34, in Detlev Peukert and Jürgen Reulecke (eds.), Die Reihen fast geschlossen: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s Alltags unterm Nationalsozialismus (Wuppertal, 1981) 45-64.

Kleist-Schmenzin, Ewald von, ‘Die letzte Möglichkeit: Zur Ernennung Hitlers zur Reichskanzler an 30. Januar 1933’, Politische Studien, 10 (1959), 89-92.

Klemperer, Victor, LTI: Notizbuch eines Philologen (Leipzig, 1985 [1946]).

——, Leben sammeln, nicht fragen wozu und warum, I: Tagebücher 1919-1925; II: Tagebücher 1925-1932 (Berlin, 1996).

——, Curriculum Vitae: Erinnerungen 1881-1918 (2 vols., Berlin, 1996 [1989]).

——, I Shall Bear Witness: The Diaries of Victor Klemperer 1933-1941 (London, 1998).

——, Tagebücher 1933-1934 (Ich will Zeugnis ablegen bis zum Letzten, I); Berlin, 1999 [1995]).

Klepper, Jochen, Unter dem Schatten deiner Flügel: Aus den Tagebüchern der Jahre 1932-1942 (Stuttgart, 1956).

Klepsch, Thomas, Nationalsozialistische Ideologie: Eine Beschreibung ihrer Struktur vor 1933 (Münster, 1990).

Klessmann, Christoph, ‘Hans Frank: Party Jurist and Governor-General in Poland’, in Smelser and Zitelmann (eds.), The Nazi Elite, 39-47.

Klier, John D., and Lambroza, Shlomo (eds.), Pogroms: Anti-Jewish Violence in Modern Russian History (Cambridge, 1992).

Klinger, Max (pseud.; i.e. Curt Geyer), Volk in Ketten (Karlsbad, 1934).

Klönne, Arno, Jugend im Dritten Reich: Dokumente und Analysen (Cologne, 1982).

Kluke, Paul, ‘Der Fall Potempa’, VfZ 5 (1957), 279-97.

Knock, Thomas J., To End All Wars: Woodrow Wilson and the Quest for a New World Order (New York, 1992).

Knowles, Elizabeth (ed.),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Quotations (5th edn., Oxford, 1999).

Kocka, Jürgen, ‘German History Before Hitler: The Debate about the German Sonderweg’,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23 (1988), 3-16.

Koehler, Karen, ‘The Bauhaus, 1919-1928: Gropius in Exile and the Museum of Modern Art, N. Y., 1938’, in Richard A. Etlin (ed.), Art, Culture and Media under the Third Reich (Chicago, 2002), 287-315.

Kohl, Horst (ed.), Die politischen Reden des Fürsten Bismarck (14 vols., Stuttgart, 1892-1905).

Kohler, Eric D., ‘The Crisis in the Prussian Schutzpolizei 1930-32’, in George L. Mosse (ed.), Police Forces in History (London, 1975), 131-50.

Köhler, Fritz, ‘Zur Vertreibung humanistischer Gelehrter 1933/34’, Blätter für deutsche und internationale Politik, II (1966), 696-707.

Kohn, Hans, The Mind of Germany: The Education of a Nation (London, 1961).

—— (ed.), German History: Some New German Views (Boston, 1954).

Kolb, Eberhard, The Weimar Republic (London, 1988).

——, ‘Die Reichsbahn vom Dawes-Plan bis zum Ende der Weimarer Republik’, in Lothar Gall and Manfred Pohl (eds.), Die Eisenbahn in Deutschland: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r Gegenwart (Munich, 1999), 109-64.

Kolbe, Ulrich, ‘Zum Urteil über die “Reichstagsbrand-Notverordnung” vom 28. 2. 1933’, Geschichte in Wissenschaft und Unterricht, 16 (1965), 359-70.

Könnemann, Erwin, et al. (eds.), Arbeiterklasse siegt über Kapp und Lüttwitz (2 vols., Berlin, 1971).

Koonz, Claudia, Mothers in the Fatherland: Women, the Family, and Nazi Politics (London, 1987).

Koszyk, Kurt, Deutsche Presse im 19. Jahrhundert: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Presse, II (Berlin, 1966).

——, Deutsche Presse 1914-1945: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Presse, III (Berlin, 1972).

Kotowski, Georg, Friedrich Ebert: Eine politische Biographie, I: Der Aufstieg eines deutschen Arbeiterführers 1871 bis 1917 (Wiesbaden, 1963).

Kracauer, Siegfried, From Caligari to Hitler: A Psychological History of the German Film (Princeton, 1947).

Kramer, Helgard, ‘Frankfurt's Working Women: Scapegoats or Winners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in Evans and Geary (eds.), The German Unemployed, 108-41.

Kraul, Margret, Das deutsche Gymnasium 1780-1980 (Frankfurt am Main, 1984).

Krause, Thomas, Hamburg wird braun: Der Aufstieg der NSDAP 1921-1933 (Hamburg, 1987).

Kreutzahler, Birgit, Das Bild des Verbrechers in Romanen der Weimarer Republik: Eine Untersuchung vor dem Hintergrund anderer gesellschaftlicher Verbrecherbilder und gesellschaftlicher Grundzüge der Weimarer Republik (Frankfurt am Main, 1987).

Kritzer, Peter, Die bayerische Sozialdemokratie und die bayerische Politik in den Jahren 1918-1923 (Munich, 1969).

Krohn, Klaus-Dieter, Stabilisierung und ökonomische Interessen: Die Finanzpolitik des deutschen Reiches 1923-1927 (Düsseldorf, 1974).

Krüger, Gerd, ‘“Ein Fanal des Widerstandes im Ruhrgebiet”: Das “Unternehmen Wesel” in der Osternacht des Jahres 1923. Hintergründe eines angeblichen “Husarenstreiches”’, Mitteilungsblatt des Instituts fur soziale Bewegungen, 4 (2000), 95-140.

Kruger, Gesine, Kriegsbewältigung und Geschichtsbewusstsein: Realität, Deutung und Verarbeitung des deutschen Kolonialkrieges in Namibia 1904 bis 1907 (Gottingen, 1999).

Kruse, Wolfgang, ‘Krieg und Klassenheer: Zur Revolutionierung der deutschen Armee im Ersten Weltkrieg’,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22 (1996), 530-61.

Kube, Alfred, Pour le mérite und Hakenkreuz: Hermann Goering im Dritten Reich (2nd edn., Munich, 1987 [1986]).

——, ‘Hermann Goering: Second Man in the Third Reich’, in Smelser and Zitelmann (eds.), The Nazi Elite, 62-73.

Kubizek, August, Adolf Hitler: Mein Jugendfreund (Graz, 1953).

Kühn, Volker (ed.), Deutschlands Erwachen: Kabarett unterm Hakenkreuz 1933-1945 (Weinheim, 1989).

Kurz, Thomas, ‘Blutmai’: Sozialdemokraten und Kommunisten im Brennpunkt der Berliner Ereignisse von 1929 (Bonn, 1988).

Kwiet, Konrad, and Eschwege, Helmut, Selbstbehauptung und Widerstand: Deutsche Juden im Kampf um Existenz und Menschenwürde 1933-1945 (Hamburg, 1984).

Lamberti, Marjorie, State, Society and the Elementary School in Imperial Germany (New York, 1989).

——,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and the Struggle against Social Democracy in Wilhelmine Germany’, History of Education Quarterly, 12 (1992), 74-97.

Lane, Barbara Miller, Architecture and Politics in Germany, 1918-1945 (Cambridge, Mass., 1968).

——, and Rupp, Leila J. (eds.), Nazi Ideology before 1933.‘A Documentation (Manchester, 1978).

Lang, Jochen von, ‘Martin Bormann: Hitler's Secretary’, in Smelser and Zitelmann (eds.), The Nazi Elite, 7-17.

Langbehn, Julius, Rembrandt als Erzieher (38th edn., Leipzig, 1891 [1890]), 292.

——, Der Rembrandtdeutsche: Von einem Wahrheitsfreund (Dresden, 1892).

Lange, Karl, ‘Der Terminus “Lebensraum” in Hitler's Mein Kampf’, VfZ 13 (1965), 426-37.

Langer, Michael, Zwischen Vorurteil und Aggression: Zum Judenbild in der deutschsprachigen katholischen Volksbildung des 19. Jahrhunderts (Freiburg, 1994).

Laqueur, Walter, Young Germany: A History of the German Youth Movement (London, 1962).

——, Russia and Germany: A Century of Conflict (London, 1965).

——, Weimar: A Cultural History 1918-1933 (London, 1974).

Large, David Clay, Where Ghosts Walked: Munich's Road to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 1997).

——,‘“Out with the Ostjuden”: The Scheunenviertel Riots in Berlin, November 1923’, in Werner Bergmann et al. (eds.), Exclusionary Violence: Antisemitic Riots in Modern Germany (Ann Arbor, 2002), 123-40.

Laski, Harold, The Germans - are they Human? (London, 1941).

Laursen, Karsten, and Pedersen, Jürgen, The German Inflation 1918-1923 (Amsterdam, 1964).

Lebeltzer, Gisela, ‘Der “Schwarze Schmach”: Vorurteile - Propaganda - Mythos’,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11 (1985), 37-58.

Lehnert, Detlef, Sozialdemokratie zwischen Protestbewegung und Regierungspartei 1848-1983 (Frankfurt am Main, 1983).

Lenman, Robin, ‘Julius Streicher and the Origins of the NSDAP in Nuremberg, 1918-1923’, in Nicholls and Matthias (eds.), German Democracy, 161-74.

——, ‘Art, Society and the Law in Wilhelmine Germany: The Lex Heinze’, Oxford German Studies, 8 (1973), 86-113.

Lepsius, M. Rainer, ‘Parteisystem und Sozialstruktur: Zum Problem der Demokratisierung der deutschen Gesellschaft’, in Gerhard A. Ritter (ed.), Die deutschen Parteien vor 1918 (Cologne, 1973), 56-80.

Lerner, Warren, Karl Radek: The Last Internationalist (Stanford, Calif., 1970).

Lessing, Hellmut, and Liebel, Manfred, Wilde Cliquen: Szenen einer anderen Arbeiterbewegung (Bensheim, 1981).

Lessing, Theodor, Haarmann: Die Geschichte eines Werwolfs. Und andere Kriminalreportagen (ed. Rainer Marwedel, Frankfurt am Main, 1989).

Lessmann, Peter, Die preussische Schutzpolizei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Streifendienst und Strassenkampf (Düsseldorf, 1989).

Leuschen-Seppel, Rosemarie, Sozialdemokratie und Antisemitismus im Kaiserreich: Die Auseinandersetzung der Partei mit den konservativen und völkischen Strömungen des Antisemitismus 1871-1914 (Bonn, 1978).

Levi, Erik, Music in the Third Reich (London, 1994).

Levy, Richard S., The Downfall of the Anti-Semitic Political Parties in Imperial Germany (New Haven, 1975).

Lewy, Günther, The Catholic Church and Nazi Germany (New York, 1964).

Liang, Hsi-Huey, The Berlin Police Force in the Weimar Republic (Berkeley, 1970).

Lidtke, Vernon L., The Outlawed Party: Social Democracy in Germany, 1878-1890 (Princeton, 1966).

——, The Alternative Culture: Socialist Labor in Imperial Germany (New York, 1985).

Liepach, Martin, Das Wahlverhalten der jüdischen Bevölkerung: Zur politischen Orientierung der Jude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Tübingen, 1996).

Lindenberger, Thomas, and Lüdtke, Alf (eds.), Physische Gewalt: 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r Neuzeit (Frankfurt am Main, 1995).

Link, Arthur S. (ed.),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69 vols., Princeton, 1966- ).

Lipstadt, Deborah E., Beyond Belief: The American Press and the Coming of the Holocaust, 1933-1945 (New York, 1986).

Liulevicius, Vejas Gabriel, War Land on the Eastern Front: Culture, National Identity and German Occupation in World War I (Cambridge, 2000).

Lobe, Paul, Der Weg war lang: Lebenserinnerungen von Paul Löbe (Berlin, 1954 [1950]).

Lohalm, Uwe, Völkischer Radikalismus: Die Geschichte des Deutschvölkischen Schutz- und Trutzbundes, 1919-1923 (Hamburg, 1970).

London, John, Theatre under the Nazis (Manchester, 2000).

Longerich, Peter, Die braunen Bataillone: Geschichte der SA (Munich, 1989).

——, Politik der Vernichtung: Eine Gesamtdarstellung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Judenverfolgung (Munich, 1998).

——, Der ungeschriebene Befehl: Hitler und der Weg zur ‘Endlösung’ (Munich, 2001).

Löwenthal, Richard,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Machtergreifung” - eine Revolution? Ihr Platz unter den totalitären Revolutionen unseres Jahrhunderts’, in Martin Broszat et al. (eds.), Deutschlands Weg in die Diktatur (Berlin, 1983), 42-74.

Lowry, Bullitt, Armistice 1918 (Kent, Ohio, 1996).

Lucas, Erhard, Märzrevolution im Ruhrgebiet (3 vols., Frankfurt am Main, 1970-78).

Ludendorff, Erich, Kriegführung und Politik (Berlin, 1922).

Lyttelton, Adrian, The Seizure of Power: Fascism in Italy 1919-1929 (London, 1973).

Macartney, Carlile A., The Habsburg Empire 1790-1918 (London, 1968).

McElligott, Anthony, ‘Mobilising the Unemployed: The KPD and the Unemployed Workers’ Movement in Hamburg-Altona during the Weimar Republic’, in Evans and Geary (eds.), The German Unemployed, 228-60.

——, Contested City: Municipal Politics and the Rise of Nazism in Altona, 1917-1937 (Ann Arbor, 1998).

Macmillan, Margaret, Peacemakers: The Paris Conference of 1919 and its Attempt to End War (London, 2001).

Mai, Gunther,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Betriebszellen-Organisation: Zum Verhältnis von Arbeiterschaft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VfZ 31 (1983), 573-613.

Mallmann, Klaus-Michael, Kommuniste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Sozialgeschichte einer revolutionären Bewegung (Darmstadt, 1996).

——, ‘Gehorsame Parteisoldaten oder eigensinnige Akteure? Die Weimarer Kommunisten in der Kontroverse - eine Erwiderung’, VfZ 47 (1999), 401-15.

Mannes, Astrid Luise, Heinrich Brüning: Leben, Wirken, Schicksal (Munich, 1999).

Manstein, Peter, Die Mitglieder und Wähler der NSDAP 1919-1933: Untersuchungen zu ihrer schichtmässigen Zusammensetzung (Frankfurt am Main, 1990 [1987]).

Marcuse, Harold, Legacies of Dachau: The Uses and Abuses of a Concentration Camp, 1933-2001 (Cambridge, 2001).

Marks, Sally, ‘Black Watch on the Rhine: A Study in Propaganda, Prejudice and Prurience’, European Studies Review, 13 (1983), 297-334.

Marquis, Alice Goldfarb, ‘Words as Weapons: Propaganda in Britain and Germany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13 (1978), 467-98.

Marr, Wilhelm, Der Sieg des Judenthums über das Germanenthum vom nicht konfessionellen Standpunkt aus betrachtet (Berlin, 1873).

——, Vom jüdischen Kriegsschauplatz: Eine Streitschrift (Berne, 1879).

Martens, Stefan, Hermann Goering: ‘Erster Paladin des Führers’ und ‘Zweiter Mann im Reich’ (Paderborn, 1985).

Martin, Bernd, ‘Die deutschen Gewerkschaften und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Machtübernahme’, Geschichte in Wissenschaft und Unterricht, 36 (1985), 605-31.

—— (ed.), Martin Heidegger und das ‘Dritte Reich’: Ein Kompendium (Darmstadt, 1989).

Marx, Karl,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1852), in Lewis Feuer (ed.), Marx and Engels: Basic Writings on Politics and Philosophy (New York, 1959), 358-88.

——, ‘Randglossen zum Programm der deutschen Arbeiterpartei’ (Kritik des Gothaer Programms, 1875), in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Ausgewählte Schriften (2 vols., East Berlin, 1968), II. 11-28.

Maschmann, Melita, Account Rendered: A Dossier on my Former Self (trans. Geoffrey Strachan, London, 1964).

Maser, Werner, Die Frühgeschichte der NSDAP: Hitlers Weg bis 1924 (Frankfurt am Main, 1965).

——, Hitlers Mein Kampf: Geschichte, Auszüge, Kommentare (Munich, 1966).

——, Hermann Göring: Hitlers janusköpfiger Paladin. Die politische Biographie (Berlin, 2000).

Mason, Tim W., Social Policy in the Third Reich: The Working Class and the ‘National Community’ (ed. Jane Caplan, Providence, RI, 1993 [1977]).

——, Nazism, Fascism and the Working Class: Essays by Tim Mason (ed. Jane Caplan, Cambridge, 1995).

Massing, Paul W., Rehearsal for Destruction (New York, 1949).

Matthias, Erich, ‘Der Untergang der Sozialdemokratie 1933’, VfZ 4 (1956), 179-226 and 250-86.

——, ‘Hindenburg zwischen den Fronten 1932’, VfZ 8 (1960), 75-84.

——, and Morsey, Rudolf (eds.), Das Ende der Parteien 1933: Darstellungen und Dokumente (Düsseldorf, 1960).

——, ‘Die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in Matthias and Morsey (eds.), Das Ende, 101-278.

Maurer, Trude, Ostjuden in Deutschland, 1918-1933 (Hamburg, 1986).

Mayer, Arno J., Politics and Diplomacy of Peacemaking: Containment and Counterrevolution at Versailles 1918-1919 (2nd edn., New York, 1969 [1967]).

Mazower, Mark, Dark Continent: Europe's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1998).

Medalen, Charles, ‘State Monopoly Capitalism in Germany: The Hibernia Affair’, Past and Present, 78 (February 1978), 82-112.

Meinecke, Friedrich, ‘Bismarck und das neue Deutschland’, in idem, Preussen und Deutschland im 19. und 20. Jahrhundert (Munich, 1918).

——, Die deutsche Katastrophe (Wiesbaden, 1946).

——, The German Catastrophe: Reflections and Recollections (Cambridge, Mass., 1950).

Meiring, Kerstin, Die christlich-jüdische Mischehe in Deutschland, 1840-1933 (Hamburg, 1998).

Meissner, Otto, Staatssekretär unter Ebert - Hindenburg - Hitler: Der Schicksalsweg des deutschen Volkes von 1918- 1945, wie ich ihn erlebte (Hamburg, 1950), 216-17.

Mergel, Thomas, Parlamentarische Kultur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Politische Kommunikation, symbolische Politik und Öffentlichkeit im Reichstag (Düsseldorf, 2002).

Merkl, Peter H., Political Violence under the Swastika: 581 Early Nazis (Princeton, 1975).

Merson, Allan, Communist Resistance in Nazi Germany (London, 1985).

Meyer, Folkert, Schule der Untertanen: Lehrer und Politik in Preussen 1848-1900 (Hamburg, 1976).

Meyer, Michael, The Politics of Music in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 1991).

Michalka, Wolfgang, and Niedhart, Gottfried, Die ungeliebte Republik: Dokumente zur Innen- und Aussenpolitik Weimars 1918-1933 (Munich, 1980).

Mierendorff, Carlo, ‘Der Hindenburgsieg 1932’, 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 4 April 1932, 197.

Milatz, Alfred, ‘Das Ende der Parteien im Spiegel der Wahlen 1930 bis 1933’, in Matthias and Morsey (eds.), Das Ende, 743-93.

——, Wähler und Wahle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Bonn, 1965).

Miller, Max, Eugen Bolz (Stuttgart, 1951).

Miller, Susanne, and Potthoff, Heinrich, A History of German Social Democracy: From 1848 to the Present (Leamington Spa, 1986 [1983]).

Milward, Alan, and Saul, Samuel B.,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ies of Continental Europe 1850-1914 (London, 1977).

Ministe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ed.), Documents Diplomatiques Français, 1932-1939, ser. I, vol. II (Paris, 1966).

Minuth, Karl-Heinz (ed.), Akten der Reichskanzlei: Weimarer Republik. Das Kabinett von Papen, I. Juni bis 3. December 1932 (Boppard, 1989).

——(ed.), Akten der Reichskanzlei: Die Regierung Hitler, I: 1933-1934 (2 vols., Boppard, 1983).

Mitchell, Allan, Revolution in Bavaria 1918/1919: The Eisner Regime and the Soviet Republic (Princeton, 1965).

Moeller, Robert G., ‘Winners as Losers in the German Inflation: Peasant Protest over the Controlled Economy’, in Gerald D. Feldman et al. (eds.), The German Inflation: A Preliminary Balance (Berlin, 1982), 255-88.

——, ‘The Kaiserreich Recast?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Modern German Historiography’,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17 (1984), 655-83.

Moeller van den Bruck, Arthur, Das Dritte Reich (3rd edn., Hamburg, 1931 [Berlin, 1923]).

Möller, Horst,‘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Machtergreifung: Konterrevolution oder Revolution?’, VfZ 31 (1983), 25-51.

Mommsen, Hans, ‘Der Reichstagsbrand und seine politischen Folgen’, VfZ 12 (1964), 351-4113.

——, Beamtentum im Dritten Reich: Mit ausgewählten Quellen zu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Beamtenpolitik (Stuttgart, 1966).

——, ‘Betrachtungen zu den Memoiren Heinrich Brünings’, Jahrbuch für die Geschichte Mittel- und Ostdeutschlands, 22 (1973), 270-80.

——, ‘Van der Lubbes Weg in den Reichstag- der Ablauf der Ereignisse’, in Backes et al., Reichstagsbrand, 33-57.

——, Der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die deutsche Gesellschaft: Ausgewählte Aufsdtze (Reinbek, 1991).

——, From Weimar to Auschwitz: Essays in German History (Princeton, 1991).

——, The Rise and Fall of Weimar Democracy (Chapel Hill, NC, 1996 [1989]).

——, ‘Das Jahr 1930 als Zäsur in der deutschen Entwicklung der Zwischenkriegszeit’, in Lothar Ehrlich and Jürgen John (eds.), Weimar 1930: Politik und Kultur im Vorfeld der NS-Diktatur (Cologne, 1998), 1-13.

Mommsen, Wolfgang J., Das Ringen um den nationalen Staat: Die Gründung und der innere Ausbau des Deutschen Reiches unter Otto von Bismarck 1850-1890 (Berlin, 1993).

——, Bürgertolz und Weltmachtstreben: Deutschland unter Wilhelm II. 1890 bis 1918 (Berlin, 1995).

Moreau, Patrick, Nationalsozialismus von ‘links’: Die ‘Kampfgemeinschaft Revolutionärer Nationalsozialisten’ und die ‘Schwarze Front’ Otto Strassers 1930-1935 (Stuttgart, 1984).

Mork, Andrea, Richard Wagner als politischer Schriftsteller: Weltanschauung und Wirkungsgeschichte (Frankfurt am Main, 1990).

Morsch, Günter, ‘Oranienburg - Sachsenhausen, Sachsenhausen - Oranienburg’, in Herbert et al. (eds.),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Konzentrationslager, 111-34.

Morsey, Rudolf, ‘Die Deutsche Zentrumspartei’, in Matthias and Morsey (eds.), Das Ende, 279-453.

——, ‘Hitler als Braunschweiger Reigierungsrat’, VfZ 8 (1960), 419-48.

——, ‘Hitlers Verhandlungen mit der Zentrumsführung am 31. Januar 1933’, VfZ 9 (1961), 182-94.

——, ‘Zur Geschichte des “Preussenschlags” am 20. Juli 1932’, VfZ 9 (1961), 436-9.

——, Der Untergang des politischen Katholizismus: Die Zentrumspartei zwischen christlichem Selbstverständnis und ‘Nationaler Erhebung’ 1932/33 (Stuttgart, 1977).

——, ‘Beamtenschaft und Verwaltung zwischen Republik und “Neuem Staat”’, in Erdmann and Schulze (eds.), Weimar, 151-68.

—— (ed.), Das ‘Ermächtigungsgesetz’ vom 24. März 1933: Quellen zur Geschichte und Interpretation des ‘Gesetzes zur Behebung der Not von Volk und Reich’ (Düsseldorf, 1992).

Mosse, George L., The Crisis of German Ideology: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the Third Reich (London, 1964).

——, The Nationalization of the Masses: Political Symbolism and Mass Movements in Germany from the Napoleonic Wars through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 1975).

Mosse, Werner E., Jews in the German Economy: The German-Jewish Economic Élite 1820-1935 (Oxford, 1987).

——, The German-Jewish Economic Élite 1820-1935: A Socio-Cultural Profile (Oxford, 1989).

Mühlberger, Detlef, ‘A Social Profile of the Saxon NSDAP Membership before 1933’, in Szejnmann, Nazism, 211-19.

——, Hitler's Followers: 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the Nazi Movement (London, 1991).

Mühlhausen, Walter, Friedrich Ebert: Sein Leben, sein Werk, seine Zeit (Heidelberg, 1999).

Müller, Dirk, Arbeiter, Katholizismus, Staat: Der Volksverein für das katholische Deutschland und die katholischen Arbeiterorganisatione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Bonn, 1996).

Müller, Fritz Ferdinand, Deutschland-Zanzibar-Ostafrika: Geschichte einer deutschen Kolonialeroberung 1884-1890 (Berlin, 1990 [1959]).

Müller, Hans (ed.), Katholische Kirche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Dokumente 1930-1935 (Munich, 1963).

Müller, Ingo, Hitler's Justice: The Courts of the Third Reich (London, 1991 [1987]).

Müller, Klaus-Jürgen, The Army,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Germany 1933-1945: Studies in the Army's Relation to Nazism (Manchester, 1987).

——, ‘Der Tag von Potsdam und das Verhältnis der preussisch-deutschen Militär-Elite zum Nationalsozialismus’, in Bernhard Kröner (ed.), Potsdam - Stadt, Armee, Residenz in der preussisch-deutschen Militärgeschichte (Frankfurt am Main, 1993), 435-49.

Müller-Jabusch, Maximilian (ed.), Handbuch des öffentlichen Lebens (Leipzig, 1931).

Nahel, Irmela, Fememorde und Fememordprozesse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Cologne, 1991).

Nationalsozialistischer Deutscher Frontkämpferbund (ed.), Der NSDFB (Stahlhelm): Geschichte, Wesen und Aufgabe des Frontsoldatenbundes (Berlin, 1935).

Nelles, Dieter, ‘Jan Valtins “Tagebuch der Hölle” - Legende und Wirklichkeit eines Schlüsselromans der Totalitarismustheorie’, 1999: Zeitschrift für Sozialgeschichte des 20. und 21. Jahrhunderts, 9 (1994), 11-45.

Nelson, Keith, ‘“The Black Horror on the Rhine”: Race as a Factor in Post-World War I Diplomacy’,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42 (1970), 606-27.

Neugebauer, Rosamunde,‘“Christus mit der Gasmaske” von George Grosz, oder: Wieviel Satire konnten Kirche und Staat in Deutschland um 1930 ertragen?’, in Maria Rüger (ed.), Kunst und Kunstkritik der dreissiger Jahre: 29 Standpunkte zu künstlerischen und ästhetischen Prozessen und Kontroversen (Dresden, 1990), 156-65.

Neumann, Franz, Behemoth: The Structure and Practice of National Socialism (New York, 1942).

Nicholls, Anthony J., ‘Die höhere Beamtenschaft in der Weimarer Zeit: Betrachtungen zu Problemen ihrer Haltung und ihrer Fortbildung’, in Lothar Albertin and Werner Link (eds.), Politische Parteien auf dem Weg zur parlamentarischen Demokratie in Deutschland: Entwicklungslinien bis zur Gegenwart (Düsseldorf, 1981), 195-207.

——, Weimar and the Rise of Hitler (4th edn., London, 2000 [1968]).

——, and Matthias, Erich (eds.), German Democracy and the Triumph of Hitler: Essays in Recent German History (London, 1971).

Niehuss, Merith, ‘From Welfare Provision to Social Insurance: The Unemployed in Augsburg 1918-27’, in Evans and Geary (eds.), The German Unemployed, 44-72.

Niewyk, Donald L., The Jews in Weimar Germany (Baton Rouge, La., 1980).

Nipperdey, Thomas, Germany from Napoleon to Bismarck (Princeton, 1986 [1983]).

——, Deutsche Geschichte 1866-1918, I: Arbeitswelt und Bürgergeist (Munich, 1990).

——, Deutsche Geschichte 1866-1918, II: Machtstaat vor der Demokratie (Munich, 1992).

Nitschke, August, et al. (eds.), Jahrhundertwende: Der Aufbruch in die Moderne 1880-1930 (2 vols., Reinbek, 1990).

Noack, Paul, Ernst Jünger: Eine Biographie (Berlin, 1998).

Noakes, Jeremy, The Nazi Party in Lower Saxony 1921-1933 (Oxford, 1971).

——, ‘Nazism and Revolution’, in Noel O’Sullivan (ed.), Revolutionary Theory and Political Reality (London, 1983), 73-100.

——, ‘Nazism and Eugenics: The Background to the Nazi Sterilization Law of 14 July 1933’, in Roger Bullen et al. (eds.), Ideas into Politics: Aspects of European History 1880-1950 (London, 1984), 75-94.

——, and Pridham, Geoffrey (eds.), Nazism 1919-1945 (4 vols., Exeter 1983-98 [1974]).

Nolan, Mary, Visions of Modernity: American Business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Germany (New York, 1994).

Nolte, Ernst, Three Faces of Fascism: Action Française, Italian Fascism, National Socialism (New York, 1969 [1963]).

——, Der europäische Bürgerkrieg 1917-1945;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Bolschewismus (Frankfurt am Main, 1987).

Nonn, Christoph, Eine Stadt sucht einen Mörder: Gerücht, Gewalt und Antisemitismus im Kaiserreich (Göttingen, 2002).

Norton, Robert E., Secret Germany: Stefan George and his Circle (Ithaca, NY, 2002).

Nowak, Kurt, and Raulet, Gérard (eds.), Protestantismus und Antisemitismus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Frankfurt am Main, 1994).

Nuss, Karl, Militär und Wiederaufrüstung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Zur politischen Rolle und Entwicklung der Reichswehr (Berlin, 1977).

Oertel, Thomas, Horst Wessel. Untersuchung einer Legende (Cologne, 1988).

O’Neill, Robert J., The German Army and the Nazi Party 1933-1939 (London, 1966).

Orlow, Dietrich, The History of the Nazi Party, I: 1919-1933 (Newton Abbot, 1971 [1969]).

——, Weimar Prussia 1918-1925: The Unlikely Rock of Democracy (Pittsburgh, 1986).

——, ‘Rudolf Hess: Deputy Führer’, in Smelser and Zitelmann (eds.), The Nazi Elite, 74-84.

Orth, Karin, Das System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Konzentrationslager (Hamburg, 1999).

Osterroth, Franz, and Schuster, Dieter, Chronik der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ie (Hanover, 1963).

Ostwald, Hans, Sittengeschichte der Inflation: Ein Kulturdokument aus den Jahren des Marksturzes (Berlin, 1931).

Ott, Hugo, Martin Heidegger: A Political Life (London, 1993).

Overy, Richard, Goering: The ‘Iron Man’ (London, 1984).

Owen, Richard, ‘Military-Industrial Relations: Krupp and the Imperial Navy Office’, in Evans (ed.), Society and Politics, 71-89.

Paret, Peter, An Artist against the Third Reich: Ernst Barlach 1933-1938 (Cambridge, 2003).

Passmore, Kevin, Fasc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2002).

Patch, William L., Jr., Heinrich Brüning and the Dissolution of the Weimar Republic (Cambridge, 1998).

Paul, Gerhard, Aufstand der Bilder: Die NS-Propaganda vor 1933 (Bonn, 1990).

Payne, Stanley G., A History of Fascism 1914-1945 (London, 1995).

Peal, David, ‘Antisemitism by Other Means? The Rural Cooperative Movement in Late 19th Century Germany’, in Herbert A. Strauss (ed.), Hostages of Modernization: Studies on Modern Antisemitism 1870-1933/39 : Germany – Great Britain – France (Berlin, 1993), 128-49.

Petropoulos, Jonathan, The Faustian Bargain: The Art World in Nazi Germany (London, 2000).

Petzina, Dietmar, ‘The Extent and Causes of Unemployment in the Weimar Republic’, in Peter D. Stachura (ed.), Unemployment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 in Weimar Germany (London, 1986), 29-48.

——, et al., Sozialgeschichtliches Arbeitsbuch, III: Materialien zur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Reiches 1914-1945 (Munich, 1978).

Petzold, Joachim, Franz von Papen: Ein deutsches Verhängnis (Munich, 1995).

Peukert, Detlev J. K., Die KPD im Widerstand: Verfolgung und Untergrundarbeit an Rhein und Ruhr, 1933 bis 1945 (Wuppertal, 1980).

——, Grenzen der Sozialdisziplinierung: Aufstieg und Krise der deutschen Jugendfiirsorge 1878 bis 1932 (Cologne, 1986).

——, ‘The Lost Generation: Youth Unemployment at the End of the Weimar Republic’, in Evans and Geary (eds.), The German Unemployed, 172-93.

——, Jugend zwiscben Krieg und Krise: Lebenswelten von Arbeiterjunge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Cologne, 1987).

——, Inside Nazi Germany: Conformity, Opposition and Racism in Everyday Life (London, 1989 [1982.]).

——, The Weimar Republic: The Crisis of Classical Modernity (London, 1991 [1987]).

Pflanze, Otto, Bismarck (3 vols., Princeton, 1990).

Phelps, Reginald H., ‘Aus den Groener Dokumenten’, Deutsche Rundschau, 76 (1950), 1019, and 77 (1951), 26-9.

——, ‘“Before Hitler Came”: Thule Society and Germanen Orden’,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35 (1963), 145-61.

——, ‘Hitler als Parteiredner im Jahre 1920’, VfZ 11 (1963), 274-330.

Pikart, Eberhard, ‘Preussische Beamtenpolitik 1918-1933’, VfZ 6 (1958), 119-37.

Planck, Max, ‘Mein Besuch bei Hitler’, Physikalische Blätter, 3 (1947), 143.

Planert, Ute, Antifeminismus im Kaiserreich: Diskurs, soziale Formation und politische Mentalität (Göttingen, 1998).

——, Nation, Politik und Geschlecht: Frauenbewegungen und Nationalismus in der Moderne (Frankfurt am Main, 2000).

Plant, Richard, The Pink Triangle: The Nazi War against Homosexuals (Edinburgh, 1987).

Plewnia, Margarete, Auf dem Weg zu Hitler: Der völkische Publizist Dietrich Eckart (Bremen, 1970).

Pogge-von Strandmann, Hartmut, ‘Staatsstreichpläne, Alldeutsche und Bethmann Hollweg’, in idem and Imanuel Geiss, Die Erforderlichkeit des Unmöglichen: Deutschland am Vorabend des ersten Weltkrieges (Frankfurt am Main, 1965), 7-45.

Pommerin, Reiner, ‘Sterilisierung der Rheinlandbastarde’: Das Schicksal einer farbigen deutschen Minderheit 1918-1937 (Düsseldorf, 1979).

Preller, Ludwig, Sozialpolitik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Düsseldorf, 1978 [1949]).

Pridham, Geoffrey, Hitler's Rise to Power: The Nazi Movement in Bavaria 1923-1933 (London, 1973).

Prieberg, Fred K., Trial of Strengthi Wilhelm Furtwängler and the Third Reich (London, 1992).

Proctor, Robert N., Racial Hygiene: Medicine under the Nazis (Cambridge, Mass., 1988).

Der Prozess gegen die Hauptkriegsverbrecher vor dem Internationalen Militärgerichtshof (Nuremberg, 1947).

Puhle, Hans-Jürgen, Agrarische Interessenpolitik und preussischer Konservatismus im wilhelminischen Reich 1893-1914: Ein Beitrag zur Analyse des Nationalismus in Deutschland am Beispiel des Bundes der Landwirte und der Deutsch-Konservativen Partei (Hanover, 1967).

Pulzer, Peter J. G., The Rise of Political Anti-Semitism in Germany and Austria (New York, 1964).

——, ‘Der Anfang vom Ende’, in Arnold Paucker (ed.), Die Juden im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Deutschland 1933-1944 (Tübingen, 1986), 3-15.

——, Jews and the German State: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a Minority, 1848-1933 (Oxford, 1992).

——, ‘Jews and Nation-Building in Germany 1815-1918’, Year Book of the Leo Baeck Institute, 41 (1996), 199-224.

Pyta, Wolfram, ‘Konstitutionelle Demokratie statt monarchischer Restauration: Die verfassungspolitische Konzeption Schleichers in der Weimarer Staatskrise’, VfZ 47 (1999), 417-41.

Rabenau, Friedrich von, Seeckt - aus seinem Leben 1918-1936 (Leipzig, 1940).

Radkau, Joachim, Das Zeitalter der Nervosität: Deutschland zwischen Bismarck und Hitler (Munich, 1998).

Rahden, Till van, Juden und andere Breslauer: Die Beziehungen zwischen Juden, Protestanten und Katholiken in einer deutschen Grossstadt von 1860 bis 1925 (Göttingen, 2000).

Rainbird, Sean (ed.), Max Beckmann (London, 2003).

Rauschning, Hermann, Germany's Revolution of Destruction (London, 1939 [1938]).

Rebentisch, Dieter, and Raab, Angelika (eds.), Neu-Isenburg zwischen Anpassung und Widerstand: Dokumente über Lebensbedingungen und politisches Verhalten 1933-1934 (Neu-Isenburg, 1978).

Reiche, Eric 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A in Nürnberg, 1922-1934 (Cambridge, 1986).

Reimann, Aribert, Der grosse Krieg der Sprachen: Untersuchungen zur historischen Semantik in Deutschland und England zur Zeit des Ersten Weltkriegs (Essen, 2000).

Reimer, Klaus, Rheinlandfrage und Rheinlandbewegung (1918-1933):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r regionalistischen Bewegung in Deutschland (Frankfurt am Main, 1979).

Reithel, Thomas, and Strenge, Irene, ‘Die Reichstagsbrandverordnung: Grundlegung der Diktatur mit den Instrumenten des Weimarer Ausnahmezustandes’, VfZ 48 (2000), 413-60.

Remy, Steven P., The Heidelberg Myth: The Nazification and Denazification of a German University (Cambridge, Mass., 2002).

Repgen, Konrad, ‘Zur vatikanischen Strategie beim Reichskonkordat’, VfZ 31 (1983), 506-35.

Retallack, James N., Notables of the Right: The Conservative Party and Political Mobilization in Germany, 1876-1918 (London, 1988).

Reulecke, Jürgen, “‘Hat die Jugendbewegung den Nationalsozialismus vorbereitet?” Zum Umgang mit einer falschen Frage’, in Wolfgang R. Krabbe (ed.), Politische Jugend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Bochum, 1993), 222-43.

——, ‘Ich möchte einer werden so wie die ...’ Männerbünde im 20. Jahrhundert (Frankfurt am Main, 2001).

Reuth, Ralf Georg, Goebbels: Eine Biographie (Munich, 1995).

Richardi, Hans-Günter, Schule der Gewalt: Das Konzentrationslager Dachau, 1933-1934 (Munich, 1983).

Richarz, Monika, Jüdisches Leben in Deutschland, II: Selbstzeugnisse zur Sozialgeschichte im Kaiserreich (Stuttgart, 1979).

Richter, Ludwig, ‘Das präsidiale Notverordnungsrecht in den ersten Jahren der Weimarer Republik. Friedrich Ebert und die Anwendung des Artikels 48 der Weimarer Reichsverfassung’, in Eberhard Kolb (ed.), Friedrich Ebert als Reichspräsident: Amtsführung und Amtsverständnis (Munich, 1997), 207-58.

Riebicke, Otto, Was brauchte der Weltkrieg? Tatsachen und Zahlen aus dem deutschen Ringen 1914-18 (Berlin, 1936).

Rietzler, Rudolf, ‘Kampf in der Nordmark’: Das Aufkommen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in Schleswig-Holstein (1919-1928) (Neumünster, 1982).

Ritchie, James M., German Literature under National Socialism (London, 1983).

Rittberger, Volker (ed.), 1933: Wie die Republik der Diktatur erlag (Stuttgart, 1983).

Ritter, Gerhard, Europa und die deutsche Frage: Betracht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liche Eigenart des deutschen Staatsgedankens (Munich, 1948).

——, ‘The Historical Foundations of the Rise of National-Socialism’, in Maurice Beaumont et al., The Third Reich: A Study Published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Philosophy and Humanistic Studies with the Assistance of UNESCO (New York, 1955), 381-416.

Ritter, Gerhard A., ‘Kontinuität und Umformung des deutschen Parteiensystems 1918-1920’, in Eberhard Kolb (ed.), Vom Kaiserreich zur Weimarer Republik (Cologne, 1972), 218-43.

——, Wahlgeschichtliches Arbeitsbuch: Materialien zur Statistik des Kaiserreichs 1871-1918 (Munich, 1980).

——, Sozialversicherung in Deutschland und England: Entstehung und Grundzüge im Vergleich (Munich, 1983).

——, Die deutschen Parteien 1830-1914: Parteien und Gesellschaft im konstitutionellen Regierungssystem (Göttingen, 1985).

—— and Miller, Susanne (eds.), Die deutsche Revolution 1918-1919: Dokumente (Frankfurt am Main, 1968),

Ritthaler, Anton,‘Eine Etappe auf Hitlers Weg zur ungeteilten Machti Hugenbergs Rücktritt als Reichsminister’, VfZ 8 (1960), 193-219.

Rohe, Karl, Das Reicbsbanner Schwarz Rot Gold: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und Struktur der politischen Kampfverbände zur Zeit der Weimarer Republik (Düsseldorf, 1966).

——, Wahlen und Wählertraditionen in Deutschland (Frankfurt am Main, 1992).

Röhl, John C. G. (ed.), From Bismarck to Hitler: The Problem of Continuity in German History (London, 1970).

Röhm, Ernst, Die Geschichte eines Hochverräters (Munich, 1928).

Rohrwasser, Michael, Der Stalinismus und die Renegaten: Die Literatur der Exkommunisten (Stuttgart, 1991).

Rolfs, Richard W., The Sorcerer's Apprentice: The Life of Franz von Papen (Lanham, Md., 1996).

Rosenberg, Alfred (ed.), Dietrich Eckart: Ein Vermächtnis (4th edn., Munich, 1937 [1928]).

——, Selected Writings (ed. Robert Pois, London, 1970).

Rosenberg, Arthur, The Birth of the German Republic (Oxford, 1931 [1930]).

——, A History of the German Republic (London, 1936 [1935]).

Rosenhaft, Eve, ‘Working-Class Life and Working-Class Politics: Communists, Nazis, and the State in the Battle for the Streets, Berlin, 1918-1932’, in Richard Bessel and Edgar J. Feuchtwanger (eds.), Social Change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Weimar Germany (London, 1981), 207-40.

——, ‘Organising the “Lumpenproletariat”: Cliques and Communists in Berlin during the Weimar Republic’, in Richard J. Evans (ed.), The German Working Class 1888-1933: The Politics of Everyday Life (London, 1982), 174-219.

——, Beating the Fascists? The German Communists and Political Violence 1929-1933 (Cambridge, 1983).

——, ‘The Unemployed in the Neighbourhood: Social Dislocation and Political Mobilisation in Germany 1929-33’, in Evans and Geary (eds.), The German Unemployed, 194-227.

——, ‘Links gleich rechts? Militante Strassengewalt um 1930’, in Lindenberger and Lüdtke (eds.), Physische Gewalt, 239-75.

Rosenow, Ulf, ‘Die Göttinger Physik unter dem Nationalsozialismus’, in Becker et al. (eds.), Die Universität Göttingen, 345-409.

Rote Fahne, Die, 1933.

Roth, Karl Heinz, ‘Schein-Alternativen im Gesundheitswesen: Alfred Grotjahn (1869-1931) - Integrationsfigur etablierter Sozialmedizin und nationalsozialistischer “Rassenhygiene”’, in Karl Heinz Roth (ed.), Erfassung zur Vernichtung: Von der Sozialhygiene zum ‘Gesetz über Sterbehilfe’ (Berlin, 1984), 31-56.

Rousso, Henry, The Haunting Past: History, Memory, and Justice in Contemporary France (Philadelphia, 2002 [1998]).

Ruck, Michael, Bibliographie zum Nationalsozialismus (2 vols., Darmstadt, 2000 [1995]).

Runge, Wolfgang, Politik und Beamtentum in Parteienstaat: Die Demokratisierung der politischen Beamten in Preussen zwischen 1918 und 1933 (Stuttgart, 1965).

Rupieper, Hermann J., The Cuno Government and Reparations 1922-1923: Politics and Economics (The Hague, 1979).

Ruppert, Karsten, Im Dienst am Staat von Weimar: Das Zentrum als regierende Partei in der Weimarer Demokratie 1923-1930 (Düsseldorf, 1992).

Rürup, Reinhard, ‘Entstehung und Grundlagen der Weimarer Verfassung’, in Eberhard Kolb (ed.), Vom Kaiserreich zur Weimarer Republik (Cologne, 1972), 218-43.

—— (ed.), Topographie des Terrors: Gestapo, SS und Reichssicherheitshauptamt auf dem ‘Prinz-Albrecht-Gelände’: Eine Dokumentation (Berlin, 1987).

Sabrow, Martin, Der Rathenaumord: Rekonstruktion einer Verschwörung gegen die Republik von Weimar (Munich, 1994).

Safranski, Rüdiger, Ein Meister aus Deutschland: Heidegger und seine Zeit (Munich, 1994).

Sailer, Joachim, Eugen Bolz und die Krise des politischen Katholizismus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Tübingen, 1994).

Sauder, Gerhard (ed.), Die Bücherverbrennung: Zum 10. Mai 1933 (Munich, 1983).

Saul, Klaus, ‘Der Staat und die “Mächte des Umsturzes”: Ein Beitrag zu den Methoden antisozialistischer Repression und Agitation vom Scheitern des Sozialistengesetzes bis zur Jahrhundertwende’, Archiv für Sozialgeschichte, 12 (1972), 293-350.

Schade, Franz, Kurt Eisner und die bayerische Sozialdemokratie (Hanover, 1961).

Schairer, Erich, ‘Alfred Hugenberg’, Mit anderen Augen: Jahrbuch der deutschen Sonntagszeitung (1929), 18-21.

Schanbacher, Eberhard, Parlamentarische Wahlen und Wahlsystem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Wahlgesetzgebung und Wahlreform im Reich und in den Ländern (Düsseldorf, 1982).

Schappacher, Norbert, ‘Das Mathematische Institut der Universität Göttingen’, in Becker et al. (eds.), Die Universität Göttingen, 345-73.

Scheck, Raffael, Mothers of the Nation: Right-Wing Women in German Politics, 1918-1923 (London, 2004).

Scheil, Stefan, Die Entwicklung des politischen Antisemitismus in Deutschland zwischen 1881 und 1912: Eine wahlgeschichtliche Untersuchung (Berlin, 1999).

Schirach, Baldur von, Die Feier der neuen Front (Munich, 1929).

Schirmann, Leon, Altonaer Blutsonntag 17. Juli 1932: Dichtung und Wahrheit (Hamburg, 1994).

Schlotterbeck, Friedrich, The Darker the Night, the Brighter the Stars: A German Worker Remembers (1933-1945) (London, 1947).

Schmädeke, Jürgen, et al., ‘Der Reichstagsbrand im neuen Licht’,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269 (1999), 603-51.

Schmelz, Usiel O., ‘Die demographische Entwicklung der Juden in Deutschland von der Mitte des 19. Jahrhunderts bis. 1933’, Bulletin des Leo Baeck Instituts, 83 (1989), 15-62.

Schmidt, Christoph, ‘Zu den Motiven “alter Kämpfer” in der NSDAP’, in Detlev J. K. Peukert and Jürgen Reulecke (eds.), Die Reihen fast geschlossen: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s Alltags unterm Nationalsozialismus (Wuppertal, 1981), 21-44.

Schmuhl, Hans-Walter, Rassenhygiene, Nationalsozialismus, Euthanasie: Von der Verhütung zur Vernichtung ‘lebensunwerten Lebens’, 1890-1945 (Göttingen, 1987).

Schneeberger, Guido, Nachlese zu Heidegger: Dokumente zu seinem Leben und Denken (Berne, 1962).

Schneider, Hans, ‘Das Ermächtigungsgesetz vom 24. März 1933’, Vfz I (1953), 197-221.

Schneider, Michael, A Brief History of the German Trade Unions (Bonn, 1991 [1989]).

——, Unterm Hakenkreuz: Arbeiter und Arbeiterbewegung 1933 bis 1939 (Bonn, 1999).

Schneider, Werner, Die Deutsche Demokratische Partei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1924-1930 (Munich, 1978).

Schoenbaum, David, Zabern 1913: Consensus Politics in Imperial Germany (London, 1982).

Scholder, Klaus, The Churches and the Third Reich (2 vols., London, 1987-8 [1977, 1985]).

Schönhoven, Klaus, Die Bayerische Volkspartei 1924-1932 (Düsseldorf, 1972).

Schorske, Carl E., Fin-de-Siècle Vienna: Politics and Culture (New York, 1980).

Schotte, Walter, Der neue Staat (Berlin, 1932).

Schouten, Martin, Marinus van der Lubbe (1909-1934): Eine Biographie (Frankfurt, 1999 [1986]).

Schreiber, Georg, Brüning, Hitler, Schleicher: Das Zentrum in der Opposition (Cologne, 1932).

Schiiddekopf, Otto-Ernst, Das Heer und die Republik - Quellen zur Politik der Reichswehrführung 1918 bis 1933 (Hanover, 1955).

Schüler, Hermann, Auf der Flucht erschossen: Felix Fechenbach 1894-1933. Eine Biographie (Cologne, 1981).

Schüler, Winfried, Der Bayreuther Kreis von seiner Entstehung bis zum Ausgang der wilhelminischen Ara (Münster, 1971).

Schüler-Springorum, Stefanie, Die jüdische Minderheit in Königsberg, Preussen 1871-1945 (Göttingen, 1996).

Schulte, Regina, Sperrbezirke: Tugendhaftigkeit und Prostitution in der bürgerlichen Welt (Frankfurt am Main, 1979).

Schulz, Gerhard, Zwischen Demokratie und Diktatur: Verfassungspolitik und Reichsreform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3 vols., Berlin, 1963-92).

——, ‘Artikel 48 in politisch-historischer Sicht’, in Ernst Fraenkel (ed.), Der Staatsnotstand (Berlin, 1965), 39-71.

—— (ed.), Ploetz Weimarer Republik: Eine Nation im Umbruch (Freiburg, 1987).

Schulze, Hagen, Freikorps und Republik 1918-1920 (Boppard, 1969).

——, Otto Braun oder Preussens demokratische Sendung (Frankfurt am Main, 1977).

——, Weimar: Deutschland 1917-1933 (Berlin, 1982).

Schumann, Hans-Gerhard,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Gewerkschaftsbewegung: Die Vernichtung der deutschen Gewerkschaften und der Aufbau der ‘Deutschen Arbeitsfront’ (Hanover, 1958).

Schuster, Kurt G. P., Der Rote Frontkämpferbund 1924-1929: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und Organisationsstruktur eines politischen Kampfbundes (Düsseldorf, 1975).

Schwabe, Klaus (ed.), Die Ruhrkrise 1923: Wendepunkt der internationalen Beziehungen nach dem Ersten Weltkrieg (Paderborn, 1985).

——, ‘Die deutsche Politik und die Juden im Ersten Weltkrieg’, in Hans Otto Horch (ed.), Judentum, Antisemitismus und europäische Kultur (Tübingen, 1988), 255-66.

Schwarz, Johannes, Die bayerische Polizei und ihre historische Funktion bei der Aufrechterhaltung der öffentlichen Sicherheit in Bayern von 1919 bis 1933 (Munich, 1977).

Schwerin von Krosigk, Lutz Graf, Es geschah in Deutschland: Menschenbilder unseres Jahrhunderts (Tübingen, 1951).

Service, Robert, Lenin: A Political Life (3 vols., London, 1985-95).

Shapiro, Leonard, Totalitarianism (London, 1972).

Sharp, Alan, The Versailles Settlement: Peacekeeping in Paris, 1919 (London, 1991).

Sheehan, James J., German History 1770-1866 (Oxford, 1989).

Shirer, William L.,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 A History of Nazi Germany (New York, 1960).

Siggemann, Jürgen, Die kasernierte Polizei und das Problem der inneren Sicherheit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Eine Studie zum Auf- und Ausbau des innerstaatlichen Sicherheitssystems in Deutschland 1918/19-1933 (Frankfurt am Main, 1980).

Skzrypczak, Henryk, ‘Das Ende der Gewerkschaften’, in Wolfgang Michalka (ed.),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Machtergreifung (Paderborn, 1984), 97-110.

Sluga, Hans, Heidegger's Crisis: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in Nazi Germany (Cambridge, Mass., 1993).

Smelser, Ronald, and Zitelmann, Rainer (eds.), The Nazi Elite (London, 1989).

Smith, Bradley F., Heinrich Himmler 1900-1926: A Nazi in the Making (Stanford, Calif., 1971).

Smith, Denis Mack, Mussolini (London, 1981).

Smith, Helmut Walser, The Learned and the Popular Discourse of Anti-Semitism in the Catholic Milieu in the Kaiserreich’,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27 (1994), 315-28.

——, The Butcher's Tale: Murder and Anti-Semitism in a German Town (New York, 2002).

Smith, Woodruff D., The German Colonial Empire (Chapel Hill, NC, 1978).

——,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Nazi Imperialism (New York, 1986).

Snell, John L. (ed.), The Nazi Revolution - Germany's Guilt or Germany's Fate? (Boston, 1959).

Sollner, Alfons (ed.), Totalitarismus: Eine Ideengeschichte des 20. Jahrhunderts (Berlin, 1997).

Sontheimer, Kurt, ‘Thomas Mann als politischer Schriftsteller’, VfZ 6 (1958), 1-44.

——, Antidemokratisches Denke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Munich, 1978 [1962]).

Sösemann, Bernd, ‘Die Tagesaufzeichnungen des Joseph Goebbels und ihre unzulänglichen Veröffentlichungen’, Publizistik, 37 (1992), 213-44.

Speier, Hans, German White-Collar Workers and the Rise of Hitler (New Haven, 1986).

Spengler, Oswald, 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 Umrisse einer Morphologie der Weltgeschichte, I: Gestalt und Wirklichkeit (Vienna, 1918).

——, Spengler Letters 1913-1936 (ed. Arthur Helps, London, 1966).

Splitt, Gerhard, Richard Strauss 1933-1935: Aesthetik und Musikpolitik zu Beginn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Herrschaft (Pfaffenweiler, 1987).

Spotts, Frederic, Hitler and the Power of Aesthetics (London, 2002).

Stachura, Peter D., Nazi Youth in the Weimar Republic (Santa Barbara, Calif., 1975).

——, The German Youth Movement, 1900-1945: An Interpretative and Documentary History (London, 1981).

——, Gregor Strasser and the Rise of Nazism (London, 1983).

—— (ed.), Unemployment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 in Weimar Germany (London, 1986).

Stackelberg, Roderick, and Winkle, Sally A. (eds.), The Nazi Germany Sourcebook: An Anthology of Texts (London, 2002).

Staewen-Ordermann, Gertrud, Menschen der Unordnung: Die proletarische Wirklichkeit im Arbeitsschicksal der ungelernten Grossstadtjugend (Berlin, 1933).

Staff, Ilse, Justiz im Dritten Reich: Eine Dokumentation (2nd edn., Frankfurt am Main, 1978 [1964]).

Stansfield, Agnes, ‘Das Dritte Reich: A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Third Kingdom” in German Literature from Herder to Hegel’, Modern Language Review, 34 (1934), 136-72.

Stargardt, Nicholas, The German Idea of Militarism 1866-1914 (Cambridge, 1994).

Stark, Gary D., ‘Pornography, Society and the Law in Imperial Germany’,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14 (1981), 200-220.

——, Entrepreneurs of Ideology: Neo-Conservative Publishers in Germany, 1890-1933 (Chapel Hill, NC, 1981).

Steakley, James D., The Homosexual Emancipation Movement in Germany (New York, 1975).

Steger, Bernd, ‘Der Hitlerprozess und Bayerns Verhältnis zum Reich 1923/24’, VfZ 23 (1977), 441-66.

Stegmann, Dirk, Die Erben Bismarcks: Parteien und Verbände in der Spätphase des Wilhelminischen Deutschlands: Sammlungspolitik 1897-1914 (Cologne, 1970).

——, ‘Zwischen Repression und Manipulation: Konservative Machteliten und Arbeiterund Angestelltenbewegung 1910-1918. Ein Beitrag zur Vorgeschichte der DAP/NSDAP’, Archiv für Sozialgescbichte, 12 (1972), 351-433.

Steigmann-Gall, Richard, The Holy Reich: Nazi Conceptions of Christianity, 1919-1945 (New York, 2003).

Steinberg, Michael S., Sabers and Brown Shirts: The German Students’ Path to National Socialism, 1918-1935 (Chicago, 1977).

Steinle, Jürgen, ‘Hitler als “Betriebsunfall in der Geschichte”’, Geschichte in Wissenschaft und Unterricht, 45 (1994), 288-302.

Stenographischer Bericht über die öffentlichen Verhandlungen des 15. Untersuchungsausschusses der verfassungsgebenden Nationalversammlung, II (Berlin, 1920).

Stephenson, Jill, The Nazi Organisation of Women (London, 1981).

Stern, Fritz, 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Despair: A Study in the Rise of the German Ideology (New York, 1961).

——, Gold and Iron: Bismarck, Bleichröder and the Building of the German Empire (New York, 1977).

——, Dreams and Delusions: The Drama of German History (New York, 1987).

——, Einstein's German World (London, 2000 [1999]).

Stoakes, Geoffrey, Hitler and the Quest for World Dominion (Leamington Spa, 1987).

Stoehr, Irene, ‘Neue Frau und alte Bewegung? Zum Generationskonflikt in der Frauenbewegung der Weimarer Republik’, in Jutta Dalhoff et al. (eds.), Frauenmacht in der Geschichte (Düsseldorf, 1986), 390-400.

Strachan, Hew, The First World War, I: To Arms (Oxford, 2001).

Strätz, Wolfgang, ‘Die studentische “Aktion wider den undeutschen Geist”’, VfZ 16 (1968), 347-72.

Striefler, Christian, Kampf um die Macht: Kommunisten und Nationalsozialisten am Ende der Weimarer Republik (Berlin, 1993).

Stümke, Hans-Georg, Homosexuelle in Deutschland: Eine politische Geschichte (Munich, 1989).

——, and Finkler, Rudi, Rosa Winkel, Rosa Listen: Homosexuelle und ‘Gesundes Volksempfinden’von Auschwitz bis heute (Hamburg, 1981).

Suhr, Elke, Carl von Ossietzky: Eine Biographie (Cologne, 1988).

Suval, Stanley, Electoral Politics in Wilhelmine Germany (Chapel Hill, NC, 1985).

Szejnmann, Claus-Christian W., Nazism in Central Germany: The Brownshirts in ‘Red’ Saxony (New York, 1999).

Szöllösi-Janze, Margit, Fritz Haber 1868-1934: Eine Biographie (Munich, 1998).

Talmon, Jacob L.,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 Democracy (London, 1952).

Tanner, Michael (ed.), Wilhelm Furtwängler, Notebooks 1924-1945 (London, 1989).

Tatar, Maria, Lustmord: Sexual Murder in Weimar Germany (Princeton, 1995).

Taureck, Bernhard H. F., Nietzsche und der Faschismus: Ein Politikum (Leipzig, 2000).

Taylor, Alan J. P., The Course of German History (London, 1945).

——, Bismarck: The Man and the Statesman (London, 1955).

Taylor, Brandon, and Will, Wilfried van der (eds.), The Nazification of Art: Art, Design, Music, Architecture and Film in the Third Reich (Winchester, 1990).

Taylor, Simon, Germany 1918-1933: Revolution, Counter-Revolution and the Rise of Hitler (London, 1983).

Temperley, Harold (ed.), A History of the Peace Conference of Paris (6 vols., London, 1920-24).

Thälmann, Irma, Erinnerungen an meinen Vater (Berlin, 1955).

Thamer, Hans-Ulrich, Verführung und Gewalt: Deutschland 1933-1945 (Berlin, 1986).

Theweleit, Klaus, Male Fantasies (2 vols., Cambridge, 1987 and 1989 [1978]).

Thomas, Richard Hinton, Nietzsche in German Politics and Society 1890-1918 (Manchester, 1983).

Thompson, Alastair, Left Liberals, the State, and Popular Politics in Wilhelmine Germany (Oxford, 2000).

Thomson, David, The New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Film (4th edn., 2002 [1975]).

Thoss, Bruno, Der Ludendorff-Kreis: 1919-1923. München als Zentrum der mitteleuropäischen Gegenrevolution zwischen Revolution und Hitler-Putsch (Munich, 1978).

Timm, Annette F., ‘The Ambivalent Outsider: Prostitution, Promiscuity, and VD Control in Nazi Berlin’, in Gellately and Stoltzus (eds.), Social Outsiders, 192-211.

Tims, Richard W., Germanizing Prussian Poland: The H-K-T Society and the Struggle for the Eastern Marches in the German Empire 1894-1919 (New York, 1941).

Tobias, Fritz, The Reichstag Fire: Legend and Truth (London, 1962).

——, ‘Ludendorff, Hindenburg, Hitler: Das Phantasieprodukt des Ludendorff-Briefes vom 30. Januar 1933’, in Uwe Backes et al. (eds.), Die Schatten der Vergangenheit: Impulse zur Historisierung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Frankfurt am Main, 1990), 319-43.

Tooze, J. Adam, ‘Big Business and the Continuities of German History, 1900- 1945’, in Panikos Panayi (ed.), Weimar and Nazi Germany: Continuities and Discontinuities (London, 2001), 173-98.

Toury, Jacob, Soziale und politische Geschichte der Juden in Deutschland 1847-1871: Zwischen Revolution, Reaktion und Emanzipation (Düsseldorf, 1977).

Trevor-Roper, Hugh R., The Last Days of Hitler (London, 1947).

——, ‘The Mind of Adolf Hitler’, in Hitler, Hitler's Table-Talk, vii-xxxv. Trotsky, Leon, Th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3 vols., London, 1967 [1933-4]).

Tuchel, Johannes. Organisationsgeschichte und Funktion der ‘Inspektion der Konzentrationslager’ 1933-1938 (Boppard, 1991).

Turner, Henry Ashby, Jr., Gustav Stresemann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Weimar Republic (Princeton, 1965 [1963]).

——, German Big Business and the Rise of Hitler (New York, 1985).

——, Hitler's Thirty Days to Power: January 1933 (London, 1996).

Tyrell, Albrecht (ed.), Führer befiehl...: Selbstzeugnisse aus der ‘Kampfzeit’ der NSDAP (Düsseldorf, 1969).

——, Vom ‘Trommler’ zum ‘Führer’: Der Wandel von Hitlers Selbsverständnis zwischen 1919 und 1924 und die Entwicklung der NSDAP (Munich, 1975).

Ullrich, Volker, Die nervöse Grossmacht 1871-1918: Aufstieg und Untergang des deutschen Kaiserreichs (Frankfurt am Main, 1997).

——, Der ruhelose Rebell: Karl Plättner 1893-1945. Eine Biographie (Munich, 2000).

Usborne, Cornelie, The Politics of the Body in Weimar Germany: Women's Reproductive Rights and Duties (London, 1991).

Valtin, Jan (pseud.; i.e. Richard Krebs), Out of the Night (London, 1941, reprinted with postscript by Lyn Walsh et al., London, 1988).

Verhey, Jeffrey, The Spirit of 1914: Militarism, Myth and Mobilization in Germany (Cambridge, 2000).

Vermeil, Edmond, German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1956).

Viereck, Peter, Metapolitics: From the Romantics to Hitler (New York, 1941).

Vogelsang, Thilo (ed.), ‘Neue Dokumente zur Geschichte der Reichswehr, 1930-1933’, VfZ 2 (1954), 397-436.

——, ‘Zur Politik Schleichers gegenüber der NSDAP 1932’, VfZ 6 (1958), 86-118.

——, ‘Hitlers Brief an Reichenau vom 4. Dezember 1932’, VfZ 7 (1959),429-37.

——, Reichswehr, Staat und NSDAP: Beiträge zur deutschen Geschichte 1932-1933 (Stuttgart, 1962).

Völkischer Beobachter 1933.

Volkov, Shulamit, ‘Antisemitism as a Cultural Code: Reflections on the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of Antisemitism in Imperial Germany’, Year Book of the Leo Baeck Institute, 23 (1978), 25-46.

——, Jüdisches Leben und Antisemitismus im 19. und 20. Jahrhundert (Munich, 1990).

——, Die Juden in Deutschland 1780-1918 (Munich, 1994).

Vossische Zeitung 1933.

Wachsmann, Nikolaus, ‘Marching under the Swastika? Ernst Jünger and National Socialism, 1918-33’,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33 (1998), 573-89.

——, ‘From Indefinite Confinement to Extermination: “Habitual Criminals” in the Third Reich’, in Gellately and Stoltzfus (eds.), Social Outsiders, 165-91.

——, Hitler's Prisons: Legal Terror in Nazi Germany (forthcoming, 2004).

——, et al., ‘“Die soziale Prognose wird damit sehr trübe ...”: Theodor Viernstein und die Kriminalbiologische Sammelstelle in Bayern’, in Michael Farin (ed.), Polizeireport München 1799-1999 (Munich, 1999), 250-87.

Wagner, Cosima, Die Tagebücher (ed. Martin Gregor-Dellin and Dietrich Mack, Munich, 1977).

Wagner, Patrick, Volksgemeinschaft ohne Verbrecher: Konzeptionen und Praxis der Kriminalpolizei in der Zeit der Weimarer Republik und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Hamburg, 1996).

——, Hitlers Kriminalisten: Die deutsche Kriminalpolizei und der Nationalsozialismus (Munich, 2002).

Waite, Robert G. L., Vanguard of Nazism: The Free Corps Movement in Postwar Germany 1918-1923 (Cambridge, Mass., 1952).

Waldenfels, Ernst von, Der Spion, der aus Deutschland kam: Das geheime Leben des Seemanns Richard Krebs (Berlin, 2003).

Walter, Bruno, Theme and Variations: An Autobiography (New York, 1966).

Walter, Dirk, Antisemitische Kriminalität und Gewalt: Judenfeindschaft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Bonn, 1999).

Walworth, Arthur, Wilson and his Peacemakers: American Diplomacy at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 1919 (New York, 1986).

Watt, Donald Cameron, ‘Die bayerischen Bemühungen um Ausweisung Hitlers 1924’, VfZ 6 (1958), 270-80.

Watt, Richard M., The Kings Depart: The German Revolution and the Treaty of Versailles 1918-19 (London, 1973 [1968]).

Webb, Steven B., Hyperinflation and Stabilization in Weimar Germany (Oxford, 1989).

Weber, Hermann, Die Wandlung des deutschen Kommunismus: Die Stalinisierung der KPD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2 vols., Frankfurt am Main, 1969).

Weber, Max, ‘Der Nationalstaat und die Volkswirtschaftspolitik’, in idem, Gesammelte politische Schriften (3rd edn., Tübingen, 1971).

Wehler, Hans-Ulrich, Deut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II: Von der Reformära bis zur industriellen und politischen ‘Deutschen Doppelrevolution’ 1815-1845/49 (Munich, 1987).

——, Deut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III: Von der ‘Deutschen Doppelrevolution’ bis zum Beginn des Ersten Weltkrieges 1849-1914 (Munich, 1995).

Weidenfeller, Gerhard, VDA: Verein für das Deutschtum im Ausland: Allgemeiner Deutscher Schulverein (1881-1918).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Nationalismus und Imperialisms im Kaiserreich (Berne, 1976).

Weiland, Ruth, Die Kinder der Arbeitslosen (Eberswalde-Berlin, 1933).

Weindling, Paul, Health, Race and German Politics between National Unification and Nazism 1870-1945 (Cambridge, 1989).

Weingart, Peter, et al., Rasse, Blut und Gene: Geschichte der Eugenik und Rassenhygiene in Deutschland (Frankfurt am Main, 1992 [1988]).

Weisbrod, Bernd, Schwerindustie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Interessenpolitik zwischen Stabilisierung und Krise (Wuppertal, 1978).

——, ‘The Crisis of German Unemployment Insurance in 1928/29 and its Political Repercussions’, in Wolfgang J. Mommsen (ed.), The Emergence of the Welfare State in Britain and Germany, 1850-1950 (London, 1981), 188-204.

——, ‘Industrial Crisis Strategy in the Great Depression’, in Jürgen Freiherr von Krudener (ed.), Economic Crisis and Political Collapse: The Weimar Republic, 1924-1933 (New York, 1990), 45-62.

——, ‘Gewalt in der Politik: Zur politischen Kultur in Deutschland zwischen den beiden Weltkriegen’, Geschichte in Wissenschaft und Unterricht, 43 (1992), 391-404.

Weiss, Sheila F., Race Hygiene and National Efficiency: The Eugenics of Wilhelm Schallmayer (Berkeley, 1987).

——, ‘The Race Hygiene Movement in Germany, 1904-1945’, in Mark B. Adams (ed.), The Wellborn Science: Eugenics in Germany, France, Brazil, and Russia (New York, 1990), 8-68.

Weitz, Eric D., Creating German Communism, 1890-1990: From Popular Protests to Socialist State (Princeton, 1997).

Welch, David, ‘Propaganda and the German Cinema 1933-1945’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London University, 1979).

——, Germany, Propaganda and Total War, 1914-1978: The Sins of Omission (London, 2000).

——, The Third Reich: Politics and Propaganda (2nd edn., London, 2002 [1993]). Welt am Abend, Die, 1933.

Wendt, Bernd-Jürgen, Deutschland 1933-1945: Das Dritte Reich. Handbuch zur Geschichte (Hanover, 1995).

Werner, Wolfram, ‘Zur Geschichte des Reichsministeriums fur Volksaufklärung und Propaganda und zur Überliererung’, in idem (ed.), Findbücher zu Beständen des Bundesarchivs, XV: Reichsministerium für Volksaufklärung und Propaganda (Koblenz, 1979).

Wertheimer, Jack, Unwelcome Strangers: East European Jews in Imperial Germany (New York, 1987).

West, Shearer, The Visual Arts in Germany 1890-1936: Utopia and Despair (Manchester, 2000).

Wette, Wolfram, Gustav Noske: Eine politische Biographie (Düsseldorf, 1987).

Wetzell, Richard F., Inventing the Criminal: A History of German Criminology 1880-1945 (Chapel Hill, NC, 2000).

Whalen, Robert W., Bitter Wounds: German Victims of the Great War, 1914-1939 (Ithaca, NY, 1984).

Wheeler-Bennett, John W., Hindenburg: The Wooden Titan (London, 1936).

——, The Nemesis of Power: The German Army in Politics 1918-1945 (London, 1953).

Whiteside, Andrew G., Austrian National Socialism before 1918 (The Hague, 1962).

——, The Socialism of Fools: Georg von Schönerer and Austrian Pan-Germanism (Berkeley, 1975).

Whitford, Frank, The Bauhaus (London, 1984).

Wickert, Christl, Helene Stöcker 1869-1943: Frauenrechtlerin, Sexualreformerin und Pazifistin. Eine Biographie (Bonn, 1991).

Widdig, Bernd, Culture and Inflation in Weimar Germany (Berkeley, 2001).

Wildt, Michael, ‘Violence against Jews in Germany, 1933-1939’, in David Bankier (ed.), Probing the Depths of German Antisemitism: German Society and the Persecution of the Jews 1933-1941 (Jerusalem, 2000), 181-209.

——, Generation des Unbedingten: Das Führungskorps des Reichssicherheitshauptamtes (Hamburg, 2002).

William II, My Memoirs 1878-1918 (London, 1922).

Wilson, Stephen, Ideology and Experience: Antisemitism in France at the Time of the Dreyfus Affair (New York, 1982 [1980]).

Wingler, Hans, The Bauhaus - Weimar, Dessau, Berlin, Chicago 1919-1944 (Cambridge, Mass., 1978).

Winkler, Heinrich August, ‘Die deutsche Gesellschaft der Weimarer Republik und der Antisemitismus’, in Bernd Martin and Ernst Schulin (eds.), Die Juden als Minderheit in der Geschichte (Munich, 1981), 271-89.

——, Von der Revolution zur Stabilisierung: Arbeiter und Arbeiterbewegung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1918 bis 1924 (Bonn, 1984).

——, Der Schein der Normalität: Arbeiter und Arbeiterbewegung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1924 bis 1930 (Bonn, 1985).

——, Der Weg in die Katastrophe: Arbeiter und Arbeiterbewegung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1930 bis 1933 (Bonn, 1987).

——, Weimar 1918-1933: Die Geschichte der ersten deutschen Demokratie (Munich, 1999).

——, Der lange Weg nach Westen, I: Deutsche Geschichte vom Ende des Alten Reiches bis zum Untergang der Weimarer Republik; II: Deutsche Geschichte vom ‘Dritten Reich’ bis zur Wiedervereinigung (Munich, 2000).

——, The Long Shadow of the Reich: Weighing up German History (The 2001 Annual Lecture of the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 London; London, 2002).

Wippermann, Wolfgang, ‘Friedrich Meineckes “Die deutsche Katastrophe”: Ein Versuch zur deutschen 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 in Michael Erbe (ed.), Friedrich Meinecke heute: Bericht über ein Gedenk-Colloquium zu seinem 25. Todestag am 5. und 6. April 1979 (Berlin, 1981), 101-21.

Wirsching, Andreas, ‘“Stalinisierung” oder entideologisierte “Nischengesellschaft”? Alte Einsichten und neue Thesen zum Charakter der KPD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VfZ 45 (1997), 449-66.

——, ‘“Man kann nur Boden germanisieren”: Eine neue Quelle zu Hitlers Rede vor den Spitzen der Reichswehr am 3. Februar 1933’, VfZ 49 (2001), 516-50.

Witt, Peter-Christian, ‘Finanzpolitik als Verfassungs- und Gesellschaftspolitik: Überlegungen zur Finanzpolitik des Deutschen Reiches in den Jahren 1930 bis 1932’,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8 (1982), 387-414.

Wohlfeil, Rainer, ‘Heer und Republik’, in Hans Meier-Welcker and Wolfgang von Groote (eds.), Handbuch zur deutschen Militärgeschichte 1648-1939, VI (Frankfurt am Main, 1970), 11-304.

Wolff, Charlotte, Magnus Hirschfeld: A Portrait of a Pioneer in Sexology (London, 1986).

Woltmann, Ludwig, Politische Anthropologie (ed. Otto Reche, Leipzig, 1936 [1900]).

World Committee for the Victims of German Fascism (President Einstein) (ed.), The Brown Book of the Hitler Terror and the Burning of the Reichstag (London, 1933).

Wortmann, Michael, ‘Baldur von Schirach: Student Leader, Hitler Youth Leader, Gauleiter in Vienna’ in Smelser and Zitelmann (eds.), The Nazi Elite, 202-11.

Woycke, James, Birth Control in Germany 1871-1933 (London, 1988).

Wright, Jonathan, Gustav Stresemann: Weimar's Greatest Statesman (Oxford, 2002).

Wulf, Josef, Musik im Dritten Reich: Eine Dokumentation (Gütersloh, 1963).

——, Die Bildenden Künste im Dritten Reich: Eine Dokumentation (Gütersloh, 1963).

——, Literatur und Dichtung im Dritten Reich: Eine Dokumentation (Gütersloh, 1963).

——, Theater und Film im Dritten Reich: Eine Dokumentation (Gütersloh, 1964).

——, Presse und Funk im Dritten Reich: Eine Dokumentation (Gütersloh, 1964).

Zalka, Siegfried, Polizeigeschichte: Die Exekutive im Lichte der historischen Konfliktforschung. Untersuchungen über die Theorie und Praxis der preussischen Schutzpolizei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zur Verhinderung und Bekämpfung innerer Unruhen (Lübeck, 1979).

Zechlin, Egmont, Die deutsche Politik und die Juden im Ersten Weltkrieg (Gottingen, 1969).

Zeidler, Manfred, Reichswehr und Rote Armee 1920-1933: Wege und Stationen einer ungewöhnlichen Zusammenarbeit (Munich, 1993).

Zeller, Joachim, ‘“Wie Vieh wurden Hunderte zu Getriebenen und wie Vieh begraben”: Fotodokumente aus dem deutschen Konzentrationslager in Swakopmund/Namibia 1904-1908’, 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49 (2001), 226-43.

Zeman, Zbynek A, B., Nazi Propaganda (2nd edn., Oxford, 1973 [1964]).

Ziemann, Benjamin, ‘Fahnenflucht im deutschen Heer 1914-1918’, Militärgeschichtliche Mitteilungen, 55 (1996), 93-130.

Zimmermann, Clemens, ‘Die Bücherverbrennung am 17. Mai 1933 in Heidelberg: Studenten und Politik am Ende der Weimarer Republik’, in Joachim-Felix Leonhard (ed.), Bücherverbrennung: Zensur, Verbot, Vernichtung unter dem Nationalsozialismus in Heidelberg (Heidelberg, 1983), 55-84.

Zimmermann, Moshe, Wilhelm Marr: The Patriarch of Anti-Semitism (New York, 1986).

Zimmermann, Peter, ‘Literatur im Dritten Reich’, in Jan Berg et al. (eds.), Sozial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von 1918 bis zur Gegenwart (Frankfurt am Main, 1981), 361-416.

Zitelmann, Rainer, Hitler: The Policies of Seduction (London, 1999 [1987]).

Zürn, Gaby, ‘“Von der Herbertstrasse nach Auschwitz”’, in Angelika Ebbinghaus (ed.), Opfer und Täterinnen: Frauenbiographien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Nördlingen, 1987), 91-101.